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10卷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第10卷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卷主编 郑异凡


A1038542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0卷/沈志华执行总主编;郑异凡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8
(内部发行)
ISBN 7-80149-634-5

Ⅰ.苏… Ⅱ.①沈… ②郑… Ⅲ.历史档案-档案资料-汇编-苏联-现代 Ⅳ.K5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85922号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10卷

执行总主编: 沈志华
本卷主编: 郑异凡
责任编辑: 章若男 刘仲亨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65139963 邮编100732)
网址:http://www.ssdph.com.cn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本《选编》正文用纸由山东华泰纸业有限公司提供

开 本: 889×1194毫米 1/32开
印 张: 19.75
字 数: 477千字
版 次: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149-634-5/K·086 全套定价:4000.00元

内部发行 不得公开引用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学术顾问委员会

名誉主任：李铁映

主　　任：王忍之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齐世荣　朱庭光　金冲及　阎明复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主　　任：李慎明　郭永才

副 主 任：何秉孟（常务）　沈志华

郑异凡　李正乐　谢寿光

执行总主编：沈志华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明*　于　沛　王　正　石　泽

叶　军　叶书宗*　刘　逖　刘仲亨*

邢广程　孙凌齐*　沈志华*　吴　伟*

杨存堂*　杨建国　金　雁　郑异凡*

张盛发*　赵国顺*　闻　一　姚　海*

徐天新*　薛衔天　戴隆斌*

秘　　书：方　琼

编　　务：罗淑娴　闻　静　胡甫强　宗　静

注：*为分卷主编。

编者的话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称《选编》）是一部从我们所搜集到的有关苏联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原始档案资料选编而成的大型文献集。

自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国陆续解密并公布了苏联时期自1917年十月革命至1991年底70余年间大量历史档案，引起国际理论界和史学界的极大关注。我国史学界对这些档案材料也极为重视，尽其所能地展开了收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199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选编》课题组并于同年8月将《选编》作为院“九五”重点研究课题正式立项。项目开展以来，一直受到各方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

为了能尽快翻译、出版，1998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进一步加强了对课题组的领导，同时加大了资助力度。几年来，课题组开展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各国有关俄国解密档案的文献专集和杂志、报刊上发表的有关苏联的历史档案，并分赴俄国、美国、德国、荷兰等有关国家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俄国解密的原始档案；组织大批翻译力量，将其中的万

余件档案译成中文；编委会对这些文献进行整理、校对、注释、编辑，加工成为数百项专题并分别编成34卷（包括总目录1卷），总计近2000万字。现在，这一对于研究世界近现代史、研究苏联兴亡史、研究俄罗斯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大课题终于结项。

历史档案是记录历史事实的文字材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资料。然而某一件档案材料是否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实”，是需要研究者从多方面加以判断的。因而不可认为凡是档案记录的，都是历史事实。正如马克思早在《神圣家族》中所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①]。记录历史档案、保管历史档案，乃至解密公布历史档案，都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也就是说，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其他目的服务的。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档案材料也是如此。它们形成于苏联历史中各个不同时期，出自于不同人之手，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甚至往往还出现关于同一件事而说法迥然不同的材料；再者，哪些材料应该公布，哪些材料不应该公布，也都取决于档案持有者的某种需要。俄罗斯解密并公布苏联时期部分历史档案也是如此。苏联解体后，俄国档案管理虽在法律上规定逐步向社会开放，但在实际操作上依然服从于一定政治目的。叶利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118～119页。

为对前苏联共产党官员进行审判提供证据，向宪法法院提交了大量没有达到解密期限的文件；为调整与某些国家关系开放了大量涉外事件的文件；俄国国内的大小刊物在追求一定政治经济利益的背景之下，争相刊登从多种渠道获取的档案文件。因此，我们现在所编纂的这些档案资料的价值还有待于研究者去判断。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史料进行考证、探寻、对比、分析，才有可能获得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

值此《选编》问世之际，编委会深感本书年代跨度之大，涉及方面之广，造成编译上巨大困难。工作中我们力求坚持严谨作风，译文力求严格忠实于原文，体例力求清晰，便于查阅，编者注释只在于辅助说明事件、人物等方面的背景。虽然如此，疏漏和错误之处仍然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选编》的出版，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及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在此，我们谨致诚挚的谢意！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编辑委员会

2001 年 12 月

体 例 说 明

一、《苏联历史档案选编》（以下简称《选编》）共34卷（包括总目录卷1卷），收入自80年代末以来前苏联和俄国解密的历史档案文献10000余件，文献上限为1917年初，下限至90年代初。

二、本《选编》所收入的文献主要来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等，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有些选自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集和专业杂志（包括少量的英文刊物），还有些是国外学界同仁赠与的。

三、本《选编》大体上按时间顺序分卷，每卷分若干专题，各个专题内的档案文献按时间顺序编排。最后一卷为全书总目录卷，总目录按全部所选文献的时间顺序编排，并标注卷次和页码。为便于读者查阅，同时编有全书专题的总目录。

四、本《选编》专题名称、专题说明、文献标题、文献日期、注释均为编者所加，个别标题是原有的。档案原件中有批注或划线的地方，凡能辨识者均予以保留或加注说明。

五、文件所标的档案编号只是为便于核查原文由编者所加的收藏编号。

六、凡人名、地名、书报刊名、组织机构名称及专门用语等，均参照以下工具书翻译：《列宁著作译名汇编》、《苏联百科词典》、《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俄语姓名译名手册》（新华社编）等。必要时采取音译和或加注说明。

本卷前言

1926年春夏之交，托洛茨基反对派与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结成了“托季联盟”，反对派的几个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分子先后被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直至被开除出党，被解除在共产国际的职务。其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表示悔过，得以恢复党籍。托洛茨基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1928年被流放阿拉木图。在流放地托洛茨基继续与各地的反对派分子建立联系，写作《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政策。经过权衡利弊，1929年1月政治局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这样，托洛茨基就开始了其第三次流亡生活（第一、二两次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在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主要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著书立说，写作并出版了《俄国革命史》、《不断革命》、《被背叛了的革命》等书，创办了《反对派通报》杂志，另一件事是组建了“第四国际”。

本卷共有两个专题。

一个专题是“关于‘托季联盟’（二）”资料，收入1927年下半年的有关党内斗争的文献，主要是反映反对派观点和活动的资料。这部分资料加上第9卷的资料，有关联共党内最大的反对派“托季联盟”的资料就比较完备了。

另一个专题是有关“托洛茨基的第三次流亡”的资料。由于托洛茨基本人所著的《我的生涯》（又译作《托洛茨基自传》）只写到流放以前，因此对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国以后的流亡生活，中国读者看到的资

料并不多。本卷的这一专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空缺。特别是托洛茨基的流亡日记，尽管是摘选，还是为研究托洛茨基的思想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1940年8月，托洛茨基遭暗杀，有关他的资料也至此中断。

郑异凡

2000年7月

目　　录

本卷前言 …… 10－1

关于“托季联盟”（二）

（1927 年 6 月至 1927 年 12 月）

专题说明…… 10－1

№09450 斯米尔诺夫：在列宁的旗帜下（摘录）
（1927 年 6 月 27 日） …… 10－2

№09456 叶夫多基莫夫等致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
（1927 年 7 月 1 日） …… 10－90

№09458 西尔伯曼：雅罗斯拉夫斯基“学派”
（1927 年 7 月 8 日） …… 10－95

№09459 季诺维也夫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
（1927 年 7 月） …… 10－97

№09460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 年 7 月 11 日） …… 10－98

№09461 托洛茨基致《真理报》编辑部和政治局
（1927 年 7 月 11 日） …… 10－100

№07495 托洛茨基答戈利曼
（1927 年 7 月 13 日） …… 10－101

№07496　叶梅利亚诺夫等就斯列普科夫的文章致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年7月13日）…… 10－105
№07497　托洛茨基就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讲演致
卡涅夫斯基（1927年7月16日）…… 10－108
№07498　托洛茨基：热月（1927年7月）…… 10－110
№07499　季诺维也夫：我们的国际形势与战争危险
（摘录）（1927年7月）…… 10－116
№07500　托洛茨基就党内状况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7年7月26日）…… 10－127
№07504　斯米尔诺夫等向中央全会提出的申诉
（1927年7月29日）…… 10－131
№07505　托洛茨基就枪毙逃兵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7年8月1日）…… 10－133
№07506　托洛茨基论战争危险和国防政策
（1927年8月1日）…… 10－134
№07526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行动纲领草案（摘录）
（党的危机及克服危机的办法）
（1927年8月1日）…… 10－148
№07507　普特纳就党内状况致托洛茨基
（1927年8月3日）…… 10－227
№07508　托洛茨基：答曼努伊尔斯基
（1927年8月3日）…… 10－229
№07509　托洛茨基：喀琅施塔得
（1927年8月3日）…… 10－230
№07510　托洛茨基：中国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与
孟什维主义（1927年8月）…… 10－231

№07511　致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8月4日）…… 10－233
№07512　加米涅夫等就莫洛托夫发言的声明（1927年8月4日）…… 10－234
№07513　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的三个国民党（1927年8月）…… 10－238
№07514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1927年8月6日）…… 10－241
№07515　托洛茨基等13人声明（1927年8月8日）…… 10－264
№07516　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1927年8月9日）…… 10－267
№07517　季诺维也夫的发言草稿（1927年8月11日）…… 10－269
№07518　托洛茨基给柏林的克列斯廷斯基的信（1927年8月12日）…… 10－272
№07519　拉狄克：八月全会总结（1927年8月12日）…… 10－275
№07520　越飞致托洛茨基（1927年8月12日）…… 10－282
№07521　季诺维也夫的一封信（1927年8月27日）…… 10－285
№07522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什么把我们开除出党？（给党代表大会的信）（1927年8月）…… 10－288
№07523　叶梅利亚诺夫、霍列奇科：我们对斯列普科夫的回答（1927年8月）…… 10－294

№07524　托洛茨基就奥斯特罗乌莫娃的行为致明仁斯基
（1927年9月3日）…… 10－309
№07525　季诺维也夫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央监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1927年9月6日）…… 10－310
№07527　托洛茨基就南方面军问题致谢列布里亚科夫
（1927年9月12日）…… 10－323
№07528　托洛茨基就叶努基泽问题给埃利钦的便条
（1927年9月12日）…… 10－325
№07529　托洛茨基就提纲草稿致季诺维也夫
（1927年9月17日）…… 10－328
№07530　托洛茨基就洛佐夫斯基的文章致季诺维也夫
（1927年9月22日）…… 10－329
№07531　他们如何同反对派作斗争
（1927年9月）…… 10－330
№07532　托洛茨基：“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与党内制度
（1927年9月24日）…… 10－333
№07533　托洛茨基就法国债务问题致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7年9月30日）…… 10－342
№07534　反犹主义（1927年9月）…… 10－345
№07536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
（1927年10月1日）…… 10－347
№07537　托洛茨基等告全体党员书
（1927年10月4日）…… 10－359
№07538　波兹南斯基致《真理报》编辑部
（1927年10月5日）…… 10－365
№07539　托洛茨基：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
（1927年10月5日）…… 10－366

№07540　托洛茨基就发表《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问题致《真理报》编辑部（1927 年 10 月 6 日）…… 10－370
№07541　托洛茨基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1927 年 10 月 6 日）…… 10－371
№07542　托洛茨基：7 小时工作制（1927 年 10 月 10 日）…… 10－373
№07543　季诺维也夫等就会议记录问题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1927 年 10 月 12 日）…… 10－377
№07544　托洛茨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会议上就纪念日宣言发表的讲话（1927 年 10 月 15 日）…… 10－378
№07545　季诺维也夫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发言和宣读的建议（1927 年 10 月 15 日）…… 10－383
№07546　托洛茨基针对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问题的发言（1927 年 10 月 23 日）…… 10－390
№07548　托洛茨基致中央书记处（1927 年 10 月 24 日）…… 10－399
№07549　托洛茨基：他们怎样瓦解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 10 月 31 日）…… 10－401
№07547　声明（1927 年 10 月）…… 10－404
№07550　托洛茨基：反提纲（1927 年 10 月）…… 10－412
№07551　希望听取反对派意见的工人名单（1927 年 10～11 月）…… 10－414
№07552　托洛茨基致伊里奇工厂全体工人大会（1927 年 11 月 1 日）…… 10－415
№07553　托洛茨基致《争论专页》编辑部（1927 年 11 月 2 日）…… 10－416

№07554　托洛茨基：关于争论中的发言
（1927年11月2日）…… 10－420
№07555　托洛茨基致租让总委员会联共（布）支部书记
（1927年11月3日）…… 10－423
№07556　托洛茨基致《争论专页》编辑部
（1927年11月3日）…… 10－424
№07557　季诺维也夫：我们的意见分歧和非党工人
（1927年11月3日）…… 10－425
№07558　拉柯夫斯基致《争论专页》编辑部
（1927年11月3日）…… 10－428
№07559　拉柯夫斯基：反对派和第三势力
（1927年11月3日）…… 10－429
№07560　就反提纲致列·加米涅夫
（1927年11月4日）…… 10－439
№07561　季诺维也夫致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
伊·捷·斯米尔加（1927年11月4日）…… 10－440
№07562　穆拉洛夫等三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中央监委会主席团（1927年11月7日）…… 10－442
№07563　托洛茨基：口头左转之后大步右转
（1927年11月8日）…… 10－445
№07564　托洛茨基等就游行中的暴行致政治局、
中央监委主席团（1927年11月9日）…… 10－448
№07565　尼古拉耶夫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
监察委员会（1927年11月10日）…… 10－451
№07567　1927年11月7日“巴黎”宾馆事件始末
（1927年11月10日）…… 10－454
№07568　阿尔希波夫声明
（1927年11月11日）…… 10－458

№07569　反对派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27年11月）…… 10－461
№07570　托洛茨基：提纲（1927年11月13日）…… 10－464
№07573　奥博林等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1月13日）…… 10－465
№07571　托洛茨基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7年11月15日）…… 10－472
№07572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明”和党内状况（1927年11月17～20日）…… 10－473
№07574　反对派领袖提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两份声明（1927年12月10日）…… 10－480
№07575　穆拉诺夫致托洛茨基（1927年12月18日）…… 10－483

托洛茨基的第三次流亡

（1928年1月至1940年8月）

专题说明…… 10－484
№03609　列·谢多夫：押解阿拉木图（1928年初）…… 10－485
№03610　托洛茨基为基什金出具的证明（1928年1月21～22日）…… 10－493
№03611　托洛茨基就住所问题致明任斯基和加里宁（1928年1月31日）…… 10－494
№03612　托洛茨基就生活条件致奥尔忠尼启则、加里宁和明仁斯基（1928年2月）…… 10－495

№03613　托洛茨基致志同道合者们的信
（1928年2月27日）…… 10－496
№03614　托洛茨基致索斯诺夫斯基
（1928年5月5日）…… 10－498
№03615　托洛茨基就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致梁赞诺夫
（1928年5月中旬）…… 10－501
№03616　致志同道合者们的信（摘录）
（1928年8月20日）…… 10－504
№03617　托洛茨基就停止政治活动问题致联共（布）
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不早于1928年12月16日）…… 10－505
№03618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特别会议记录摘抄
（1929年1月18日）…… 10－510
№11173　托洛茨基致福金（1929年2月12日）…… 10－511
№03619　托洛茨基致凯末尔（1929年2月12日）…… 10－512
№06771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国部给明仁斯基的报告
（1929年2月20日）…… 10－513
№11174　托洛茨基致编辑部的信
（1929年3月22日）…… 10－514
№03987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
（1929年4月29日）…… 10－515
№03987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
（1929年6月13日）…… 10－517
№03989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摘录）
（1929年7月4日）…… 10－519
№06772　谢多夫致弗拉切夫（1929年7月9日）…… 10－520
№03990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摘录）
（1929年8月26日）…… 10－522

№03992　列·李·谢多夫致彼·谢·库罗耶多夫
（1931 年 4 月 27 日）…… 10－523
№03620　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
主席团的信（1932 年 1 月 4 日）…… 10－526
№03991　托洛茨基致亚·李·勃朗施坦（索科洛夫斯卡娅）
（1933 年 1 月 8 日）…… 10－530
№03621　托洛茨基就国内局势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33 年 3 月 15 日）…… 10－532
№03622　托洛茨基 1933 年日记（摘录）
（1933 年 7～8 月）…… 10－534
№03558　托洛茨基 1935 年日记（摘录）
（1935 年 2 月 7 日～9 月 29 日）…… 10－540
№03601　托洛茨基关于离开挪威情况的证词
（1935 年）…… 10－589
№03603　托洛茨基 1937 年日记（摘录）
（1937 年 1 月 7 日）…… 10－592
№03602　关于列夫·谢多夫之死
（1938 年 2 月 18 日）…… 10－598
№03605　托洛茨基遗嘱（1940 年 2 月 27 日）…… 10－600
№03604　托洛茨基致墨西哥总统的信
（不早于 1940 年 5 月 24 日）…… 10－603
№03607　关于托洛茨基死亡的报道
（1940 年 8 月 24 日）…… 10－605

【专题说明】

关于“托季联盟”（二）

（1927年6月至1927年12月）

到1927年下半年，托季联盟大势已去，在斯大林的高压打击和分化瓦解下，联盟开始瓦解。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一大批反对派分子开除出党。这样，托季联盟的斗争以失败告终。在此期间反对派发表了不少重要文件，阐发自己的观点立场，如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的行动纲领草案、十三人声明、斯米尔诺夫的《在列宁的旗帜下》等等。这里收入的文件都是了解反对派观点的重要资料。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参加翻译的有项国兰、韦清豪、韩英、刘燕明、
高晓惠、孙凌齐、李京洲、任建华、张祖武、何宏江等）

№09450

斯米尔诺夫：在列宁的旗帜下（摘录）

（1927年6月27日）

由于无需解释的原因，**《在列宁的旗帜下》**[①]印数不多，只在坚定彻底地持反对派观点的同志们中传阅。因此不论是整本出版物，还是其部分章节，我们都恳请同志们千万不要复制。

在列宁的旗帜下[②]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成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列宁《国家与革命》[③]

在十月革命的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时，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进入了生死存亡的转折时期。

国内一些在十月革命时期统治地位被取消或者遭到破坏的阶级

① “民集”“民主集中派”的出版物，大概主要出自弗·米·斯米尔诺夫之手。——托洛茨基注

② 两修草稿（即T－963号和T－964号文件）的综合稿。

③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

正迅速发展起来：耐普曼、富农和官僚不断发展和增加。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寄生性、官僚主义也在发展，剥削工人和贫苦农民的新旧形式正以独特的方式结合起来。私有经济的积累和需求的增长超过国有经济积累的速度。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逐渐失去了他们所取得的地位。工资不仅没有达到战前水平，反而继续下滑。失业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失业者中不仅有被抛到街头的贫苦农民，还有因为在工业不够发展的情况下实行合理化而被裁减下来的企业工人。

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被终身制的官员们牢牢地把持着。这些官员作为新的统治阶层已经成为劳动群众的对立面，同时他们也是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弊端飞速增长的化身。

社会矛盾日趋激化，阶级斗争不断发展，这种斗争是任何空话也掩饰不了的，是任何粉饰太平的官样文章也抹杀不了的。

同时，我们正步入一个国际关系更加紧张的时期：去年英国的罢工遭到镇压，今年中国的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从而重新加剧了帝国主义者武装干涉苏联的危险，而这种危险只有在国内执行坚定的阶级路线，在国际范围内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才能避免。

但是现在领导党和苏维埃国家的不负责的集团只能实行一条在国内对无产阶级施压，在国际上与机会主义者妥协的路线。这个集团既不能动员国内工人，也不能组织国际无产阶级抵制帝国主义者的计划。

这个集团打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旗号使苏联工人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同时使工人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参与程度遭到削弱，我国宪法的“民主化”和“活跃苏维埃”实际上只是加强了居民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而在工人民主制方面，我们不仅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

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保持沉默已达四年之久。取

消党，把它变成党的机关不负责任的工具的活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与此同时党的机关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正日益融合在一起。

此外，在这个由党的公仆变成党的老爷的机关中，与布尔什维主义格格不入的原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地地道道的市侩越来越多。这个市侩阶层不仅开始影响，而且开始左右党的政策。党的机关和党的上层领导的蜕化已相当严重，因此指望它改正，哪怕是在党的下层施加“压力”的情况下，也是荒谬可笑的幻想，因为如果这种“压力”不能彻底铲除这个机关，那么这个机关就会对党员群众加紧进行镇压。

除了国内的小资产阶级政策，现在又有了露骨的孟什维主义国际政策。导致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和对中国无产阶级血腥镇压的中国“四个阶级的联盟”的策略，与出卖英国罢工的英国工联代表大会总理事会（该理事会在英俄委员会柏林协议中被认为是大不列颠有组织的职业工人“意志的惟一代表者”）妥协的策略，都毫无疑问地说明，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现在事实上在所有领域推行的都是小资产阶级政策。

寡头政治领导人先把列宁变成“圣像”并尊为圣者，然后用列宁的名字掩盖富农长入社会主义，掩盖国家官员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掩盖对世界革命的背叛。列宁的理论、政策和策略实际上已被束之高阁，留下来的只是“列宁主义”这个标签。

革命正处于危机关头。在这个时刻，我们号召所有仍然珍惜革命利益、无产阶级利益的人，所有没有被自己的特权地位腐蚀的人，首先是工人党员，站到列宁的旗帜下，站到老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应当高举这面旗帜打碎现在的党的机关，重建党，解除那些背叛了无产阶级事业的寡头政治上层人物的领导权。解放无产阶级先锋队，解放每一个党员，实行工人民主制而不是小资产阶级民

主制，反对阉割列宁的革命学说——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即将到来的斗争的所有困难。我们的对手是整个官僚机器、国家机器和党的机器，我们的对手是党内所有庸俗的市侩分子，我们的对手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但是我们指出所有这些巨大困难的目的，只是为了克服它们。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团结工人党员反击这种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我们要善于把工人党员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同广大工人群众的利益结合起来，因为他们也必定要为现在中央的小资产阶级政策付出很大的代价。不仅批评这个政策，不仅揭露这个政策的小资产阶级实质，而且要团结所有能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站到老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站到列宁的旗帜下**——这就是我们的呼声。

革命的现阶段和我们的任务

世界革命的前途

1917 年的俄国革命，1918 年的德国和奥地利革命，1919～1921 年间其他的欧洲国家（匈牙利、意大利、英国）的一系列革命运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第一次进攻，是“世界进入战争和革命时代”后，世界革命的首次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次爆发与世界经济的战时危机和战后危机有密切的关系。最后它只是在俄国胜利地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在其余的欧洲国家里取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这个胜利是在社会民主党的积极参与下，通过分权获得的。联合政府是走向现在的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不太长的阶段。第二次较弱些的爆发是 1923 年由于战胜国瓜分德国（占领鲁尔等）而引起的德国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也失败了。于是被称之

为“资本主义的稳定时期”的第二个间歇时期到来了。

这次间歇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较长的和平发展时期呢？当然不是。这只是意味着引起帝国主义战争和随之而来的革命运动浪潮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解决或缓和。而事实上，帝国主义时期的全部特征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卡特尔不断发展，对外部市场的需求日益增加，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失业现象比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不管战后殖民地人民掀起的革命运动迄今为止遭到什么样的失败，也不管这个运动将来受到什么样的失败的威胁，它至少会削弱帝国主义列强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程度，它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使帝国主义列强中间产生了新的矛盾，加剧了帝国主义内部的阶级矛盾。资本主义世界早在世界大战前就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必将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结束。

我们无法预言这个胜利将在多少年之后到来。马克思和列宁认为战争和革命时期有可能持续几十年，工人阶级的成功是交替性的（有胜利，亦有失败）。如果认为，无产阶级既然已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那它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保住政权，直到世界革命胜利，这是空想。在战争与革命的漫长时期内，个别国家工人阶级的胜利可能与失败交替出现（例如，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与失败）。如果认为在革命和战争的整个时期，也就是说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将是连续不断的战争和革命，将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武装搏斗，那也是幼稚的。间歇完全是可能的，间歇期间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和平”发展。但这些“和平”时期与帝国主义时代前的和平时期不能同日而语。在现在的和平时期阶级矛盾仍旧异常尖锐，并且随时可能重新变成武装搏斗。

因此，任何关于稳定的争论，即关于某种暂时的，但却是显而易见的和平生存时期的争论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话。有关革命在某个

时期内不会爆发（斯大林集团关于“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论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任何预言、任何推断都是理论上的巫医术和实践中的机会主义。个别革命运动和个别战争（英国的总罢工和中国的革命和战争）几乎从未间断过，并且随时都可能演变为欧洲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决战。在这种情况下预言和推测只能管几个月。而不是几年。我们现在所处的只是武装斗争中的间歇时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后欧洲局势的变化。由于战争，欧洲在世界经济中不仅失去了统治地位，而且失去了独立的地位。美国成了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资本涌入欧洲意味着欧洲资产阶级将把从本国工人和殖民地榨取的剩余价值让给美国一部分。这样一来，一方面对欧洲工人阶级的剥削必将大大加重，另一方面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之间重新划分殖民地的斗争也将更加尖锐。如果说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那么这种矛盾在欧洲则更加激化。

被战争弄得疲惫不堪的欧洲，在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八、九年时间里就达到了战前的生产水平。但是在达到战前水平的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之间和各阶级之间的矛盾也达到了比战前尖锐得多的程度。这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的能量已经耗尽，它已没有能力把生产力推向前进，至少在它的发祥地欧洲是这样。当然，不能由于其个别特征就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自动停止。在经济战线的个别部门中资本主义已经取得并且能够取得某些成就：技术在发展，工业发展趋于合理。但是从总体上看，生产力规模的增长极其缓慢，而各阶级之间及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冲突又在破坏生产力。

所有这一切使资本主义的欧洲首先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打击之下。而欧洲革命也必将极大地推动美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因为美国现在的“富足”是建立在欧洲资产阶级的暂时胜利之上，建立在欧洲资产阶级对美国资本的依赖之上的。

共产国际的策略应当建立在这种评价的基础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人应当永远只提出那些在出现直接革命形势时才可以采用的办法。在间歇时期，他们应当坚持并提出局部的要求，善于采取包括统一战线在内的策略。但是，一刻也不应忘记，就是在目前的间歇时刻，为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公开斗争进行准备也是世界历史最近阶段的主要任务，所有其他工作都应服从这个主要任务。

苏联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演变的总情况

世界革命的延迟使得苏联必须而且几乎只能依靠国内资源发展经济。由于小农经济的巨大作用和居民中小资产阶级阶层的人数优势，苏维埃政权不可能不承受压力。“只要存在阶级，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因此，一方面，不仅要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而且要从阶级矛盾是加剧还是逐渐消除的角度来评价我们政策的结果。另一方面，我们应当仔细慎重地考虑一下：非无产阶级居民对我们的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评价非无产阶级对党的政策的这种影响和评价这个政策的阶级结果都是必要的。

新经济政策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总情况可归纳如下：

1. 新的、主要是寄生类型的资产阶级产生并壮大起来，它在商业、投机倒把和高利贷盘剥方面占据着牢固的阵地，而且已经占据部分生产领域。

2. 农民正加速分化。据中央农民工作委员会统计，早在1925年年底，农村的贫困人口就已占农民总数的40～45%。离开农村到城里的农民越来越多，雇农的人数增长迅速。富农的实力在迅速增强。富农获得了重大的经济让步：允许他们雇工并租赁土地。这

些让步变得越来越大：起初只允许劳动农户雇工，现在在租赁土地上也允许雇工。起初租赁的最长期限为三年，1926 年 5 月召开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把期限增加到 12 年。富农被允许加入合作社，而且富农在合作社中的作用大到已经开始局部地控制合作社。富农还获准进入苏维埃。富农在农村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它对农村苏维埃的影响和在苏维埃中的影响不断增长（见加米涅夫同志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在实践中检验意见分歧》部分）。

3. 实际工资的增长大大落后于劳动强度的增长。同时，从 1925 年 10 月起，工资停止增长，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然而这一时期每个工人的生产定额却提高了 15% 以上。同时，经济机关对工人的行政压力明显加大，行政机关的权力大大膨胀。所有这一切都使工人阶级的不满在增长，使苏维埃国家与工人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这表现在 1925 年春天大规模的罢工运动上，表现在目前大大增加的冲突次数上，表现在屡见不鲜的“磨洋工”中，表现在工人之间就最高生产定额订立攻守同盟上。

4.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工人阶级的人数大大增加，自从今年年初起出现急剧转折，几乎不再增加。与此同时失业人数的增长愈来愈快：1926 年失业人数的增长已超过工人人数的增长，今年失业人数还在增加，1926～1927 年度的上半年就增加了 38.5 万人，即增加了 26%。

这样，迄今为止我们的整个经济包括国有经济的产量增加得相当快（但经济技术基础的改进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国有经济以外社会不平等加剧，阶级矛盾明显增长，阶级分化日益加深（城乡资产阶级得到加强），而在国有经济内部，工人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之间“在劳动条件问题上的利益对立”大大加强。

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其中主

要是工业国有化。但是中央最近几年的政策对十月革命的这些成果利用得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说现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成分正在排挤资本主义成分，说我们进入了什么新经济政策的“最高阶段”，就是向党和工人阶级隐瞒现实中发生的事情。社会主义建设真正取得成功的标志是：（1）生产力在国有化工业的基础上比资本主义发展得快；（2）只要不发生什么变故（如战争、武装干涉等），工人的状况不断得到改善，；（3）社会的阶级划分逐步消失，社会不公平等逐步减少。这些情况在现实中一个都不存在：我们能够认定的只是经济产量增加得相当快，而不是其生产力发展得相当快。我们无疑使交通运输基础设备的状况和住房状况继续恶化。在工业设备方面我们最多也只是有少许的增加。在战争和革命时期，交通运输和工业生产力遭到的破坏要比农业大得多。因此，国有经济和个体农民经济生产力比例关系的水平甚至还不如革命初期。从新经济政策之初到1925～1926年度，国民收入中工人阶级所占份额最多不过停留在上年的水平上。社会不平等由于农村的分化和新资产阶级的产生而加剧。私人资本积累的绝对增长已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如果在这种积累的速度稍逊于国有经济积累的速度时，把这看成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那就是极大的错误。

我国经济的特点是非生产性消费和获取剩余价值的寄生形式，这是对劳动最落后、最恶劣的剥削形式。有极其特殊作用的高利贷、投机倒把和商业利润（加上苏维埃官僚机构和经济官僚机构的巨大开支）吞噬了国民收入的大部分，只有一小部分用于生产积累，尽管采取了资本主义形式。其余部分则被吃掉，挥霍掉，被用来增加寄生性剥削的基金。这样一来本来可用于改善劳动者状况的部分国民经济资金，可用于发展生产力的部分国民经济资金都无可挽回地失掉了。

所谓“恢复过程”，即根本不下大力加强基本设备的发展生产

过程掩盖了这些消极现象，并造成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假象。因此，随着这个“恢复”过程接近尾声，这些消极现象暴露得越来越充分就决非偶然了。

国有经济生产力发展缓慢，资产阶级不断壮大，农村阶级分化加剧，工业中工人人数增长速度放慢，从1925年中起工人阶级物质状况的改善处于停顿状态，由于所有这一切原因，国有经济本身的资本主义成分在加强，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平等在加剧。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总的来看，近几年来我国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快于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

当然，我国技术的落后及由此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低下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巨大障碍。由于这种落后状况，没有技术先进国家的援助，没有世界社会革命，过渡到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在这种组织中，工人由劳动力变为生产的主人，生产的商品性质逐步消失）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世界革命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防止武装干涉，就像斯大林和布哈林的“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理论”所说的那样，而且同我们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切身利益，特别是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状况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世界革命使我们有可能为我国的建设利用技术先进国家的无疑是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和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不仅仅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列宁语），而且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社会主义关系。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说，世界革命的延迟必定使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遭到灭亡，则是非常荒谬的；毫无疑问，尽管我国的技术落后，但我们在新经济政策范围内依靠工业国有化，能够使我国的经济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如果说最近几年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快于社会主义成分的发展，那并不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客观上做不到，而是由于中央的政策及其一再向小资产阶级的压力

让步造成的。

工　业　化

1923年的危机主要是由于对经济几乎没有进行任何领导造成的。这一次危机使中央领导集团面对似乎发展过快的工业而张皇失措。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说，“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看，除了成本和**最低利润**以外，**把我国基本居民群众显然无力负担的用以迅速发展工业的费用加到商品价格中去**是错误的。今后，必须使价格政策同最主要的农民市场最大限度地协调起来，使工业发展的速度同农民市场容量的总的扩大进程比从前更紧密地协调起来。”实际上，这就是说，要采取使工业保持缓慢的速度发展，使工业消极地适应农业的发展的方针。直到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之前，当时在与“新反对派”的斗争中口头上提出了“工业化”的口号（但同时又疯狂地反对所谓的“超工业化分子”），中央一直遏制工业的发展速度。生产计划的规模一直偏小，以至于在1925～1926年度之前，生产计划在执行中始终超出了计划的规模。可见，市场的自发力量矫正了联共中央的政策。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政策是害怕小资产阶级的结果，是对小资产阶级要求的让步，它不仅损害了工业的发展，而且损害了我们整个经济生产力的发展。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制定的并且作为雷打不动的信条保持至今的所谓降价政策也是向小资产阶级乌托邦要求所作的这种让步。

这个政策的主要错误就是，中央不考虑向市场投放足够的商品，不考虑对生产进行能降低成本从而真正不断降低价格的技术改进，而拼命要把工业品价格降低到成本加上“最低利润”的水平（实际上这个最低利润有时是负数，价格低于成本）。在这个市场与新经济政策同时发展的那个时期，中央违反市场的规律，决定迎合

所有的“消费者”（即包括资产阶级在内）。实际上，从这个“有利于各个阶级”的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只有资产阶级，而且主要是寄生资产阶级。

中央实行这个政策的结果目前可归纳如下：

1．所谓的“降低价格”

从1923年10月开始的降低出厂价只持续到1924年11月。在此期间出厂价降低了36%。从那时起，即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甚至连出厂价都没有丝毫降低，价格表面上停留在同一个水平上。而实际上，价格却在提高，因为从1926年起，在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商品质量（包括纺织品）却急剧下降。在1923年底和1924年初的价格急剧下降之后，从1925年7月起，包括国有商业批发机构的商业加价在内的批发价格开始缓慢地，但是不断地上扬：从1925年7月到1927年1月，价格上涨了7%（见《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发指数而变动的批发工业价格》）——如果再加上商品质量的下降，实际上涨幅要大得多。在1925年7月以前，零售价格下降的速度比出厂价格和批发价格慢得多，最多只下降20%，从这时起又开始迅速上扬，整整上涨了25%，这样到1926年1月又回到了1923年10月的水平。零售价格由于注意到商品质量下滑这一情况，因而超过了这一水平。最近的降低运动不顾巨大的行政压力，总共只降低了几个百分点（3～5），但商品质量仍在继续下滑。这样消费者目前买到的是质量变坏，价格水平几乎与1923年持平的商品。“降价”政策实际上导致价格提高，产品质量下降。

2．资产阶级发财，居民中的寄生阶层增加

零售价格和出厂价格的差距因此而日益扩大。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算，私营商业加价1923年10月为出厂价格的8%，1924年10月已为40%，1925年10月为51%，1926年10月为63%，而1927年1月为66.5%。在最近一次降低运动期间这个差

距又拉大了：出厂价格的下降幅度比零售价格微乎其微的下降幅度大得多。无疑，这使私人资本积累大大增加。而与此同时，商业领域集中了大量的寄生分子。其中有部分人投入到独立的小商品贸易中，从而使小商贩人数猛增，从商业网正常发展的观点来看其人数过多，还有一部分人为较大的商人服务，这些商人雇用他们在国有和合作社商店门前排队。大量的国民资财耗费在这些吃“低”价的人身上，用来养活即由劳动者来养活这支一天买卖几米印花布、专事排队的寄生大军，用来收买和贿赂托拉斯、国有和合作社商业机构的代理人。不仅私人资本在增加，而且增加得最多的是投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非生产性的寄生消费也在增长。

官方资料显示，合作社的加价比私营商业稍低一些，约为40～30%。然而合作社加价较低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经营的是不太畅销的商品，而私商经营的却是需求量大的商品品种。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除了得到超额利润外，高额加价也使它的商业机构大大膨胀，就是说还是养活了居民中的非生产阶层。总之，由于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的这种差距，私商和居民中的寄生阶层获利多多，但我们在1925～1926年度一年中的损失就不少于10亿卢布，而今年损失可能还要大。从1923年到今年年初，这种损失总计为20多亿卢布。如果这笔巨资用于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用来重新装备工业，那么我们 实际上本来有可能降低价格，降低工业产品的成本的。

3．工业的发展和基建投资、成本

从增加产量的角度看，工业的发展还不够，因为在三年时间里甚至没能明显缓和商品荒的状况。1926～1927年度的工业计划低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拟订的相当保守的五年计划方案，根据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计算，即使到1930年我们能向农民提供的工业品也只是他们战前这些商品（包括伏特加）消费量的90%。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也承认，“商品荒的状况还将继续下去”。国家计

划委员会控制数字的计算结果甚至表明商品荒状况还会加剧。

工业技术的改进，设备更新及大修的情况更糟。现在可以断定，在许多重要工业部门（如冶金工业）的产量增加的同时，设备状况日趋恶化。（然而最糟糕的是技术安全状况，企业中不幸事故的数量因此而不断上升。）从这个角度来看，明年的基本建设开支远远不够。中央二月全会上发言的人几乎都公开承认这一点，我们的报刊也部分地指出了这一点。基本建设开支的这种不足是1925～1926年度工业产品成本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年产品成本还在继续增加。成本的这种增加最清楚地表明，中央所实行的政策与真正降低价格的政策毫无共同之处。在成本增加的情况下，任何降价政策自然都是不可能的。

4. 切尔文卢布的购买力，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工人生活费的增加

然而，尽管产量增加不多，商品掺假，设备状况恶化，但由于我们的价格政策，仍从工业中抽取资金支持私商和寄生者大军，因而工业只能更加求助于预算并利用银行贷款作为基本建设开支。1926～1927年度的工业计划是在财政相当吃紧的情况下制定的，因此今年必须动用这笔资金，否则只能削减基本建设开支。[①]我国卢布的购买力也因此而降低。因此，从1926年秋天起，**不得不提高所有集约农产品**（亚麻、葵花子、蛋、黄油等）的价格。由于这次提价为时过晚，或者说幅度不够，集约农产品的增长处于停顿状态（亚麻），甚至有所减少（葵花子）。在农业集约化方面，最近一年我们非但没有前进、反而后退了。

另一方面，切尔文购买力的下降对工人的打击也很大。中央借

① 根据中央二月全会决议，计划外降低出厂价格5%以后，在成本进一步提高（这是计划原有预见到的）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尤为突出。——斯米尔诺夫注

口应当通过降低工人消费品的价格来实现工人工资的实际增长，而一直阻止工人名义工资的增长。但由于价格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普遍提高，所以工资呈越来越降低的趋势。“降价”政策实际上是对工人的欺骗，因此工人们不得不为中央的错误付出代价，从而使自己的物质状况每况愈下。

5. 失业人数的增长

最后，从吸收新增劳动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工业发展的速度远远不够。去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所属工业新增工人38万的情况下，失业人数增长了15万。今年，在预计新增工人只有13.6万的情况下，失业人数直线上升，仅上半年增加的数量就是去年全年的2.5倍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生产“合理化”（这是对技术进步的取代，因为这种合理化主要是增加劳动强度，而技术却没有多少重大的改进）只能导致工人被解雇。**由于工业化速度缓慢，致使改进生产的利益与工人利益之间产生了严重冲突。**

中央工业政策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相当严重，以致这种政策不仅不能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甚至连必须发展国家生产力的任务也不能解决。**

与此相反，正确的工业化政策应当是：

1）工业不能也不应消极地适应农业的需要。工业应当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彻底革新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它在为农业原料开拓销售市场的同时，应当促进技术作物的生产，促进农业的集约化和工业化（建立原料初加工工厂等）的发展。这样，工业一方面能缓和工人离开农村的势头，另一方面能通过发展工业生产保证吸收新增的劳动力。

2）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不应当建立在利用旧设备并提高劳动强度上，而应当建立在技术改造上。

3）这种发展的资金能够而且应当通过灵活的价格政策获得，

这种政策利用有利的市场行情，否则，能够利用这种行情的将不是消费者，而是寄生资产阶级。由此看来，工业品的价格降低只能是降低这些工业品价值的结果（而不是人为地降低发展工业所必需的利润和工资的结果），只能是向市场上投放相当多的工业品的结果。在商品荒和成本增加的情况下，降低出厂价格和“最低利润”的政策实际上就是高价并不断提高价格的政策，这种政策会使寄生的私人资本发大财，因此应当坚决摈弃这种政策。调节市场和价格的目的不是靠牺牲利润虚假地降低出厂价格，而是利用利润改造我们的工业，在实际上实行压缩工业价格系统的政策，从而获得真正物美价廉的充足的商品来投放市场。

与此同时，必须在预算中削减我们的行政机关的开支，在降低农村贫困居民税额的同时，增加富农的赋税，**在工人群众积极参与的情况下**，不是靠牺牲工人利益，而是靠削减非生产性开支，在各个工厂实际推行节约制度，把生产会议变成真正实现工人参加管理企业的机关。但是，显然，只有在实行工人民主制的条件下，所有这些措施才能得到实现。

劳 动 问 题

1．劳动生产率和工资

在1923年争论时期，在当时爆发的罢工的影响下，为了博得工人的好感，中央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并确定了“根据工业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情况提高工资的方针”。然而，这个与经济政策的基本路线明显不一致，即与工业缓慢地增长及中央实行的价格政策明显不一致的决议仍然停留在纸上。

为这一政策所迫而降低成本的工业采取了阻力最小的路线，即向工人施加压力：从1924年秋天起，在开展“面向农村”运动的

同时，一场向工人阶级施压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上是提高劳动强度）的运动也大力开展起来，工资不仅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反而有所降低。**“低”价政策主要使投机商人发了大财，这种政策不仅影响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使工人的状况恶化。**反对派被压下去以后，“根据工业和劳动生产率的情况增长”提高工资的方针立即被抛到一边。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行无限制的计件工资，不断提高生产定额和降低单位工资成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办法。生产定额和单位工资的这些变化往往使工资数额急剧下降。这必然导致工人与苏维埃国家之间的冲突并且损害苏维埃国家的威信。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第一个运动以群众性罢工宣告结束。罢工开始于1925年1月，到春天已具有群众性。在罢工的压力下，1925年春天宣布了“新方针”。工资到8月大约提高了25%，但仍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从这时起，实际工资停止了增长，现在实际工资甚至低于1925年秋天的水平。

尽管工资停止增长，劳动强度却有增无减。规定定额的工作实质上成了制定能力最强的工人的能完成的极限定额，其他人也都必须完成。在计件工作的情况下，废品不断增加——即使不提高甚至降低计件工资也是如此。结果，在工资甚至据最乐观的计算也不超过战前水平的情况下，在设备不如战前的情况下，每个工人的工作定额却大大超过战前，往往超过一倍还多。这使工人明显疲惫不堪，使丧失劳动能力的工人不断增加。

总之，从1924年10月至1926年10月，实际情况与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是完全矛盾的，例如，每个工人的工作定额增加了47.5%，但与此同时，日工资仅提高26%，月工资只提高15%。现在，联共中央最近关于生产合理化的决定正式撤消了这个决议。最近的决定说：“在那些对生产的组织和技术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

改进的企业，必须根据组织和技术改进的结果重新审订生产定额和单位工资，但是重新审订不能使实行技术和组织改进前的工作日工资下降，而应相反，要尽可能在提高劳动强度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工人的工资”。

这里公然规定，工人只有靠加大劳动量才能获得更多的工资。在联共中央看来，通过提高技术而增加的社会财富与工人毫无关系，增加的这部分财富工人甭想得到一点儿。口头上，中央通过布哈林学派的理论家们宣传说，劳动力已不再是商品，而实际上却制定出纯粹资本主义的工人报酬原则。

生产40度的伏特加酒受害最大的是工人。低工资和高强度的劳动生产率为过度嗜酒创造了特别有利的条件。旷工现象急剧增加。工人不仅由于支付“醉酒税”而使自己的其他需求得不到满足，不仅由于嗜酒过度而毒害了自己，而且还因旷工而失去了自己的部分工资。伏特加酒对青年工人开禁对他们产生了特别有害的影响。预算是靠牺牲工人的健康和工资增加的。

低工资使工人没有可能支付还算过得去的住房的租金。这是日益加剧的住房危机和工人人均住房面积年年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建设和维修住房（尤其是工人住房）是赔本买卖。目前正试图一方面靠从预算中拨出数目少得可怜的（与需求相比）住宅建设资金，另一方面靠提高房租，但不增加工资来寻找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统计的工人消费品指数中不包括不断上涨的房租。）因此房租与工人的工资相比实在太高，成了工人的沉重负担，而房租与住房所必需的支出相比又实在太低，于是工人注定要住在陋室中。像买其他商品一样，工人在这里用“便宜”价格买了次品。

2．节约制度和厂内规章

“节约制度”也变成了对工人的压力：工人的电车费被取消，

用于托儿所和其他文化需求的开支减少。与旷工现象作斗争变成了工人迟到片刻就被辞退的惩罚体制，而旷工在很大程度上是伏特加酒解禁的后果。保险基金减少了生病期间的赔付天数，其借口是病人不遵医嘱，并建议他们去干病号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所从事的“轻松”工作。“这种形式的节约制度在莫斯科广为流行。不难想象，地方保险基金对投保人实行的是什么‘制度’。”（《劳动报》1927年3月15日《对投保人实行节约》）

节约制度的另一种形式就是缩减用于安全技术的支出。在基本建设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削减安全技术支出首当其冲。“企业中不幸事故的数量在上升。如莫斯科各类工厂1925年登记的不幸事故是2775起，而1926年已达到6111起。据中央统计局的资料，1925年第一季度，在每10万个工作日中，使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不幸事故有22起，第二季度为24起，第三季度为29起，第四季度为33起，等等。”（《劳动报》1927年3月8日《不幸事故的数量在上升》）

尽管存在失业现象，加班（劳动人民委员部很少拒绝批准这样做）和雇用“临时”工的做法却非常普遍。这些临时工与固定工相比在辞退和退职金方面处于更恶劣的劳动条件下（辞退通知提前一天或三天发出，或者发给一天或三天的退职金，而固定工则发给两个星期的退职金），他们实际上与固定工的区别往往只是在工作期满后被辞退几天，而后作为临时工被重新录用。这种滥用临时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所谓的劳动力“流动”（据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资料，我国劳动力的一个完整的流动周期平均为10个月，就是说重新被雇用的工人数量在一年时间内超过了工人的总数），导致熟练工人遭到不熟练工人的排挤和工资的降低。人民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非但不制止这种滥用现象，反而把雇用临时工的最长期限由1个月延长到2个月，从而为滥用现象大开方便之门。

在厂内规章方面，工厂管理机关的权力越来越不受约束。在辞退有过错的工人方面，管理机关被授予最后决定权。录用工人也由管理机关独自进行，工厂委员会的作用只是负责登记被录用的工人。工长向工人索贿的现象也因此而滋生蔓延。工长与工人之间逐步形成革命前的那种关系。除了劳动法典，还提出要制定强制性的工业法典，工业法典应确定管理机关的权力，并授予管理机关最后决定权。（《工商报》第147号）

逐步吸收工人管理企业的做法被强化管理机关权力的做法所取代。对生产会议和工人指出的生产安排中的严重失误不理不睬，甚至宣布生产会议和工人是在“胡闹”。相反，那些与工会不配合的工长倒被看作好工长（加里宁在戈梅利的讲话）。制订单位工资的权力完全由工长掌握。工厂的所有内部规章愈来愈接近“革命前的规章”，而在一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3．工会和工人民主制

党的第十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全面详尽地提出了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的第六条说，“工会的主要工作方法不是强制的方法，而是说服的方法。在三年极端残酷的国内战争中被大大削弱的工人民主制的工作方法，应当在工会运动中首先广泛地恢复起来。在工会中，首先必须在各级工会运动机关中恢复选举制，取消委任制。

工会组织应当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基础上。但与此同时，在工会运动中特别需要最坚决和有计划地反对把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法蜕变为官僚主义和因循敷衍的现象。”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对此补充说，国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就必然在劳动条件问题上，造成工人群众的利益同管理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或国有企业所隶属的主管机关利益的某种对立”，代表大会规定，“在专业化的

国有企业中”（更不用说私营企业和委托代管企业了），“维护劳动者利益的责任毫无疑问地落到工会肩上”。（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第三条）那次代表大会还允许在国有企业中进行有限的罢工，“在无产阶级执政的国家里采取罢工斗争，说明并且只能证明无产阶级国家中还存在官僚主义弊病，它的机关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旧时代的残余”。（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第四条）这些明确地规定了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中的地位的决议早已成为被遗忘的文字。

党组织和工会组织不是同经济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作斗争，而是笼统地去维护经济工作领导人采取的所有措施，从而实际上变成了他们的代理人。在许多情况下，宣布对罢工采取措施的决定不是由工厂厂长签署，而是由党委会和工厂委员会签署。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履行职能中的这种相当反常的现象，不仅使工人处于无保护状态，也使这些机关在工人心目中丧生了威信。[①]应当指出，冷漠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有的时候工人则对自己的工会组织持敌视态度。工人会议死气沉沉，有时还要借助于管理机关的强制措施（如关上大门等）。对生产会议的兴趣不断下降。工人们背着工会组织私下订立不超额完成定额的攻守同盟。

在解决经济工作领导人与工人之间的冲突方面，国有企业的工会依旧不能采取罢工的方式，虽然所有其他办法都已用尽。此外，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提出，必须“将工会拥有的把争议转交国家仲裁法庭审理的权利扩大到另一方即经济管理机关”。这样一来，如果以前工会可以对任何争议作出迫使厂长服从仲裁法庭的裁决，那么现在，经济管理机关可以不经工会同意而将案件移交仲裁法庭审理。由于这种情况，罢工时常常选出秘密的罢工委员会，从而出现了非法工会的萌芽（如互助储金会）。

① 见托姆斯基在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斯米尔诺夫注

在矛盾日益发展的情况下，工人为改善自身的状况而进行的斗争必然要完全背着党和工会，甚至与党和工会背道而驰，这样一来就进入了反革命组织的轨道，采取这种立场是经过慎重权衡的。

工会与党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不正常的。在1923～1924年的争论之后，尽管为此作出了无数“关于不允许琐碎的监管”的决议，由于党内民主制的最后残余被一扫而光，仍然使工会机关失去了任何独立性，并且对工会工作的直接管理都集中到了党的机关手中。工会工作者也是按照苏维埃组织选干部的原则即听话原则选择出来的。结果党的机关不是通过工会党团共同领导工会的活动，而是开始在实际上取代工会。形成了一个合乎逻辑的链条：党的官僚化——工会的官僚化——党和工会都变成了经济管理机构的辅助机关，结果形成了党组织、工会组织和经济管理机构反对非党工人的统一战线，而非党工人也试图建立反对所有这些组织的统一战线。**工会不再是“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组织工人保护我们国家”**（列宁语）**的组织**，不再是共产主义的学校。

因此，工会组织也日益官僚化。工会会员资格成为一种招牌，首先是得到一次就业机会的凭证，也是裁员时不被辞退的一种保证。工会机关的选举也是一种形式，因为在业已形成的党内关系的情况下，即在党与工会之间和工会与工人群众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每一个工会组织的领导成员都是委任的。从工作人员缺乏自己的见解到滥用公款，工会沾染了官僚主义组织的所有毛病。

彻底取消一切党内民主也没有为正确组织工会工作提供任何机会，在1925年春季罢工影响下宣布的“活跃”工会工作的措施仍旧停留在纸上，并且现在已被遗忘殆尽。在解决经济工作领导人和工人的争议方面，即使所有其他办法都已用尽，工会仍旧不能在国有企业组织罢工。不仅如此，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工作的决议说，为了避免“非党工人群众对自己工会的信任发生动摇”，并

且“避免在解决工会和经济管理机关的争议中过分的集中化”，必须“将原来只有工会才拥有的把争议转交国家仲裁法庭审理的权利扩大到另一方即经济管理机关”。这样一来，如果以前工会可以迫使经济管理机关服从仲裁法庭就任何争议作出的裁决，那么现在经济管理机关可以不经工会同意而将案件移交仲裁法庭审理。因此，这种彻底剥夺工会在国有企业组织罢工的权利未必能提高工人对工会的信任。

总而言之，在工人民主制方面，当非无产阶级的积极性不断高涨时，我们却后退了。

失　　业

正如上面指出的，由于工业化的速度不够快，致使失业人数大量增加。总的变化情况下如：

登记在册的失业工人数

总　　计			熟练的和半熟练的产业工人		非脑力劳动的非熟练工人和杂工		非熟练的产业工人和杂工总数		在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人数	
时间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千人	%
1925年10月1日	920	100	142.8	100	485.1	100	689.3	100	2034.5	100
1926年10月1日	1070	116	182.77	128.5	589.6	121.2	777.3	123.9	2279.2	112
1926年12月1日	1254	136	206.1	144.9	668.5	237.5	874.8	138.6	2285.5	112.3
1927年4月1日	1455	158								

可见，失业人数比工人人数增长得快。而且产业工人失业的人数增长得最快。这表明，这里的问题完全不仅仅在于农村抛出了许

多失业者。实质问题是，我们的企业在使用从农村涌入的工人的过程中开始千方百计（包括采取雇用“临时”工或不通过职业介绍所雇用的方式）用农村来的更廉价的工人代替熟练的劳动力。只有这一点才能说明，为什么在工人增加（尽管增加缓慢）的情况下，熟练工人的失业人数却比非熟练工人的失业人数增长得快。失业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引起中央的任何关注。至今为止所做的惟一一件事就是1925年秋季改变了失业者登记的制度，从而减少了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然而，1926～1927年度第一季度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甚至使经济工作领导人也感到惊慌。

工业计划预计1926～1927年度工业新增工人仅为12.5万，而1925～1926年度为38万。但就是这个增加数字也没有把“生产合理化”考虑在内。这种“合理化”使经济工作领导人必须**解雇在职工人**。对此他们拿不定注意，而且工会表示出一定程度的抵制，中央二月全会上关于工业计划问题的所有争论都集中到由于合理化而“吐出”工人这一问题上。中央委员会在其决定中最终解决了经济工作领导人摇摆不定的状况。这个决定说：“合理化问题在下述情况下即技术改进和生产合理化不能使该企业扩大生产，或者现有工人数量超过企业的需求，这时企业就必须解雇富余的劳动力。”

决定接下来指示说：“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确定自由交换住房的权利方面要加速制定法规以调节住房（公用住房、合作社住房和企业所属的住房）的使用，**在使用工厂住房方面实行期限合同原则，合同期满后，工人应当退出所占用的住房，规定有权从一个住房合作社自由转到另一个住房合作社，那些已经不在该企业工作的人应全部退出工厂的住房**。同时应当规定，没有正当理由，每月缺勤不得超过三天。”

这样，“企业解雇富余工人”的问题自然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行政部门现在有权辞退工人，而且用不着考虑他们今后的生活，它

有权让工人从现住宅搬出，最后它还得到了辞退工人的现成理由即“没有正当理由”三天不上班。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似乎应该采取措施保证这些被辞退者重新就业，或者至少是给失业者以更多的帮助。

从本经济年度开始，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失业人数的增加与今年工业新增工人数量急剧减少有直接的关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工业计划预计新增工人的数量仅为13.6万人。但是没有考虑到“合理化”。实际上，在上半年内工业中的工人只增加了6.1万人，而4月就裁减了3.8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领导人面对的问题是：要么不搞“合理化”，要么解雇工人。这个问题相当尖锐，以致二月全会上关于工业计划的所有争论都集中到有关“吐出”工人这个问题上。中央委员会非但不承认工业计划不能令人满意并提议修改计划，反而公然指示经济工作领导人辞退工人。中央关于生产合理化的决定说：“在改进技术和生产组织不能使该企业扩大，或者在现有工人数量超过企业需求的情况下，企业就必须解雇富余的劳动力。”

与此同时又指示劳动人民委员部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法规，法规应规定：“在使用工厂住房期限方面实行合同制，合同期满后，工人应当退出所占用的住房”，并且“那些已经不在该企业工作的人应全部退出工厂的住房。”与此同时，中央认为必须规定“没有正当理由，每月缺勤不得超过三天”。

可见，面对日益增长的失业现象中央想的只是如何让企业解雇富余的工人：授权行政机关辞退工人，而且用不着考虑他们今后的命运。有权让被辞退的工人搬出现住宅，最后它还得到了一个辞退工人的现成理由，即没有“正当理由”三天不上班。但如何安排这些“被解雇的”工人呢，中央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它只是笼统地说，“发展工业的计划应当使生产得到扩大，以保证工人的总数不

会减少，而会增加”。但是要知道，问题不仅仅在于使工人的数量不减少，我们暂时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问题在于富余劳动力增加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中工人增加的速度。如果中央只要求工人数量得到增加，而对这种增加应达到什么样的速度避而不谈，**那么它就是承认，它在自己的现行政策下无力解决失业问题。**

作为补救措施，中央只是提出将因合理化而被辞退者的补助金增加至 1.75～3 个月。只字未提减少我们这里盛行的加班工作，而减少加班确实能够缓解失业现象。只字未提加大对失业者的帮助，尽管失业现在简直成了一种天灾。相反，苏联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失业者登记的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职业介绍所推荐的工作者；拒绝推荐的尽管与专业不符，但合适的工作者；拒绝所推荐的在失业者集体中和共公工程中工作者；单身失业者拒绝推荐的外出工作者，以及家庭人口少的失业者在工作单位能提供住房的情况下而拒绝外出工作者，一律取消救助金和在职业介绍所的登记。”（《劳动报》1927 年 3 月 4 日第 52 号）

由此可见斯大林集团以自己的政策造成庞大的失业大军后，不是尽力增加对这些失业者的帮助，而只是想法让失业者退出他们所需要的住房，想法让工厂解雇“富余”的工人，想法减少在职业介绍所注册的失业人数并减少用于新失业者和所有失业者的支出，总之，他们的所作所为同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一模一样。

这种状况是极其危险的——工人和苏维埃国家有决裂的危险。毫无疑问工人中反苏维埃情绪在增长。我们不论是采用宣传还是镇压的方式都无法消除这种情绪。工人群众只有在他们的物质状况不断得到改善，并能越来越多地参与管理生产和国家时，才能感到自己不是在理论上，而是真正成了统治阶级。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绝对不容许把改善工人状况的问题放到次要地位，更不能把这看成是满足工人阶级的“行业利益”。有文化的生活在作为人**

的条件下生活的工人，就像发展国有工业一样，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必不可少的条件。忘记这一点将导致工人与国家的对立，加强小资产阶级势力对工人的影响并使工人消极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在当前由于中央的政策而使工人产生了悲观失望和对苏维埃政权的不信任感的条件下，尤其不能忘记这一点。斯大林同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会议上有关“合理化”问题的讲话是官僚主义自满的最高表现。他说：“如果没有一部分工人为了我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作**某些牺牲**，我们要向前迈一大步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以为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应当不怕某些轻微的牺牲。”只有那些被权力弄得神魂颠倒的人才会讲这种话，他们已经丧失了理解工人的能力。这是打着反对不愿“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作某些轻微牺牲”的“一部分工人阶级”的幌子，公开依靠非无产阶级反对整个工人阶级。斯大林的话是一个脱离工人并且即将公开背叛工人阶级的人说的话。

把在半年时间内失业人数增加了38万说成是轻微的牺牲，认为这种情况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来说是正常的，这就意味着脱离工人，就意味着要求工人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是为中央政策的错误作出牺牲，就意味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并动摇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

如果共产党允许斯大林实际推行这种小资产阶级独裁者的观点，那共产党就不再是共产党了。共产党应当坚决摒弃这种毁灭性政策。与此相反，共产党应当通过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通过真正实行工人民主制的途径，确立与工人阶级加强联系和提高工人阶级积极性的坚定方针。具体如下：

1. 既然工人的劳动强度已经超过战前的水平，那么最近的任务就是把工资提高到相应的水平，至少应当做到工人的劳动强度超过战前多少，工资就超过多少。今后，工资的增长至少应与劳动生

产率（而不只是强度）的增长成正比，就是说，在社会财富增加的同时，工人的状况也应得到经常的绝对的和相对的改善。同时要摒弃那种认为工资的增长只能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的极其反动的论断。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本身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应在劳动生产率之后，而应经常在它之前。①

2. 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不应靠增加劳动强度，而是要在增加工资的情况下，靠生产过程的技术改进和组织改进。应当制定劳动强度的最高限额，计件工资要规定得恰到好处，就是说工人既能获得正常的工资，又不致精疲力尽。

3. 必须立即开始减少伏特加酒的产量，特别是在城市中，应考虑在两年内完全停止生产伏特加酒。

4. 改善工人的居住条件也是当前的一项首要任务。要保证使工人的工资达到这样的水平，即在不减少其他需求的情况下，工人能够支付还过得去的住房的租金。工资的提高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就不能提高房租。与此同时，必须要求企业加大对住房建设的投入，必须增加对住房建设的预算拨款和贷款，以期在最近五年内消除住房危机。

5. 应修改工厂的内部规章以使其民主化。应当坚定地执行提倡自觉纪律（以工人和行政机关——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的同志式团结为基础的自觉纪律）、让工人群众更积极地参与生产管理

① 据官方统计，现在工资平均水平大约已经达到战前的100%（但是，在冶金和矿山这样一些战前在工资水平方面就占首位的重要部门中，工资只达到战前水平的83%和72%）。然而在这些统计中根据工厂检查机关（检查机关统计的只是那些被罚款的人）的资料计算出来的点战前工资水平过低。此外，在统计工人的生活费用时，及有考虑到工作消费品质量下降引起消费品支出增多这一因素。为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实际平均工资不是战前的100%，而是80～85%。——斯米尔诺夫注

的方针。

（1）上级经济管理机关在任命工厂厂长和副厂长时应将候选人名单交全厂工人大会或车间大会讨论，工人们也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最终的任命只能在这种讨论之后作出，应考虑工人对候选人的态度及全厂大会的建议。

（2）应当设立厂长负责的常务会议，会议由上级行政机关、生产会议代表和由全厂工人大会选出的工人代表组成，常务会议的决定对厂长来说不是必须执行的，但是，企业经营活动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应当在常务会议上讨论，以使工人代表完全了解企业的状况，使行政机关知道工人对所实行的措施的态度。大车间也应实行这种制度。

（3）取消现在五花八门的生产会议的组织方式，生产会议普遍实行选举制并向工人汇报工作。生产会议的工作应当与上面提到的厂长负责的常务会议的工作紧密联系起来。

（4）包括工厂委员会在内的所有工会机关都应当独立于行政管理机关，都要真正维护工人的利益，而不应成为执行行政管理机关措施的工具。例如，招收和辞退工人，以及抽调工人做别的工作超过两个星期，都应经过工厂委员会。行政管理机关只拥有向上级工会机关投诉工厂委员会决定的权利，但工厂委员会通过的决定的执行不得中断。改变厂内规章也像改变计件工资额一样，必须取得工人同意。

（5）招收和辞退工人应通过工厂委员会。行政管理机关只拥有向上级机关投诉工厂委员会决定的权利。

（6）生产会议的作用应提到应有的高度。对生产会议的决定工厂委员会必须执行，而且工厂委员会应当对生产会议决定的贯彻实施负责。

（7）所有工会组织都应当建立在真正的工人民主制的基础上。准备实行的工人政策方面的措施都应事先交全体工人大会和工人代表会议酝酿讨论，以便根据和考虑基层讨论的结果作出最后决定。工会组织应当在这一基础上实行真正的选举制并向工会会员群众汇报工作。

（8）鉴于经济管理机关的官僚主义弊病在阶级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必然增加，为了把工会变成真正捍卫工人利益的机关，应当保证工会拥有在租让企业及其他私营企业组织罢工的权利，而作为一种非常的斗争方式，在国有企业也有权组织罢工。在工会与经济工作领导人发生争执的情况下，只有经工会组织的同意或根据工会组织的要求，方可将争执提交仲裁法庭裁决。

（9）为了使工会工作同无产阶级的普遍阶级利益相一致，并从这一观点出发监督工会工作，党组织在领导工会工作时，应当为工会的共产党党团提供充分的自主权。任何有可能导致在实际上以党组织代替工会组织的干预工会工作的做法都应当被坚决摒弃。

工会组织也应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非党工人真正参与的基础之上，以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将组织强制手段的使用降到最低限度。

7．必须同经济管理机关破坏劳动法典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同无视正常工作日法令的现象进行顽强斗争，除迫不得已的情况外，不允许加班，不允许滥雇临时工，将雇用临时工的时间限定为两周。废除最近几年对劳动法典所作的使工人状况恶化的修改，如减少从事有害工作者的休假时间，扩大使用女工劳动的范围，减少未成年人应有的权利等。不允许实行不付酬的学徒制。加重发生不幸事故的企业责任，对未采取措施保证安全生产者处以严厉惩处。

8．同去年的集体合同相比，不允许因今年集体合同的修改而使工人的处境恶化。集体合同要做到使工厂行政管理部门无法忽视合同，从而按照合同的规定去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

9. 不允许继续降低社会保险费，并且要同某些经济管理机关实际不缴纳保险费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要同“在保险人身上节约”的现象进行顽强的斗争。停止保险基金会的资金用于全体公民保健需要（“公民基金”）的广为流行的做法。增加对工人的疗养资助。废除社会保险基金会的所谓“委托医生”制，有权决定工人因病下岗的医生应当是独立的，既不依赖于工厂行政管理部门，也不依赖于保险基金会。通过工会建立基层工人和职员对保险基金会活动的地方监督。

10. 增加工人的退休金。计算工人的退休金不应根据其转入社会保障前的最后的工资，而应根据相当于他的正常的专业技能的工资，使工人和职员的平均退休金持平。

11. 失业问题总的来说只能靠加快工业化的速度，即改变总的经济政策来解决。但是苏维埃国家不能不对失业人数的增加负责。鉴于失业现象近来已具有社会灾难性质，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1）撤消苏联人民委员会3月4日作出的有可能以各种借口取消失业者补助金和不准在职业介绍所登记的决定（决定规定，对无正当理由而拒绝所推荐的工作者，对拒绝从事与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者，对拒绝在失业者集体中或公共工程中工作者等等取消登记）。应当规定，今后失业者在职业介绍所登记的条件不能恶化。

（2）增加失业者补助金的数量。

（3）对因裁减工人而被企业辞退的失业者提供比一般标准高的补助金，并发给他们相应的退职金。

（4）如果为实行这些措施所安排的社会保险经费不足，应相应地增加这部分经费的百分比。

只有坚定地执行改善工人阶级状况并调动工人阶级积极性的方针，党和苏维埃国家才能通过工会同工人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并顶住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但是只有实行真正的党内民主制，

才能执行这条路线，没有真正的党内民主制，工人运动必然要畸形发展：要么是工会脱离党，要么是工人群众脱离工会。

党的农村政策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农村政策的重要路线就是**“消灭阶级而不是依靠小生产者的路线”**。

“如果我们离开了这条根本的和主要的路线，那我们就会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者，就会滚到小资产者阵营，滚到无产阶级当前最凶恶的敌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阵营里去。”（列宁在俄共1921年五月代表会议上《关于粮食税的报告的总结发言》[①]）这就是说，我们反对富农的斗争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支持小经济和反对大经济，不是要巩固作为个体经济的贫农经济和中农经济，**这个斗争意味着反对资本主义的大经济和支持社会主义的大经济**，意味着我们要依靠与富农敌对的农村贫农，并通过贫农与中农建立联系而进行斗争。

解决这个任务即向社会主义大农业过渡是极其困难的。与贫苦农民的政治联盟是解决这个任务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有这一个条件就行了。

小农经济在提高商品率的条件下（而我们又不能不给自己提出提高农业商品率的任务）自发地力图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为了克服这种自发倾向，为了使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向社会主义大经济过渡（当然这种过渡是缓慢的和逐步地），对下层农民不仅要有政治上的同情，而且要有积极的经济政策，还要有国有经济物质上的积极支持。没有这个条件，农村生产力只能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

① 《列宁全集》，第41卷，第312页。

不仅如此，反对农村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如果没有国家的物质支持，或者支持得不够，结果就只会延缓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导致生产力的下降，从而使农村贫困化，因此，**不能用“依靠富农的方针”代替“依靠贫农的方针”，因为只有确立了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方针，与贫苦农民结成政治联盟，并通过贫农与中农建立联系，与富农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如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中央由于害怕农村小资产阶级而实行将国有经济的积累压到最低限度的方针政策和使工业消极地适应农业的方针政策，显然，这样的方针政策是根本不能解决这一任务的。在农村政策方面，中央也采取了消极的立场，并且向小资产阶级让步，而实际上变成了向富农让步。当中央在反对派的压力下不得不暂时放弃富农路线时，它采取的措施也不过是给贫苦农民以小恩小惠（贫苦农民基金等等），这些措施与社会主义路线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只是向穷人的施舍。

所以，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有关工业政策的小资产阶级路线仅过了一年，即在有名的“面向农村”运动之后，就导致了公开的富农取向，这决不是偶然的。对这种取向布哈林表述得最精彩：“我们的农村政策应当朝这样的方向发展，即放宽或在某种程度上取消许多阻碍富裕农户和富农户发展的框框。要对农民，对全体农民说：发财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不要担心会受到压制。”（《真理报》1925年4月21日）**这种赤裸裸的富农理论**（不论中央和布哈林本人如何回避，都是中央农村政策的集中体现）**是从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得出的必然结论：既然国有经济只能保持最低限度的积累，那么农业生产力也就只能在富农积累的基础上发展。**

由于中央委员会不能在农村实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政策，结果导致农业生产力自发地沿着资本主义轨道发展。现在，私人资本主义

农户（富农户、所谓的生产能力强的农户和富裕农户等）雇用的工人数量大大超过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等的工作人员数量，而这些农业资本主义企业的增长正在迅速超过农业公有形式的增长。同时，这些形式上的集体经济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隐蔽的富农企业及其联合体。资本主义成分的发展正自发地冲破土地法形式上的限制（租赁、雇用劳动力等等），土地法正日益变成单纯的事实登记，变成正在实现的资本主义进程的赤裸裸的法律装饰（请看围绕土地使用、土地规划的主要原则的法律草案进行的争论）。现在，一种非但不积极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式，反而要取消和消灭阻碍农村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生产力的倾向在党的土地政策中越来越占上风。

中央在农村非但不执行社会主义政策，反而老想掩饰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掩饰惯用的手法就是拿土地国有化和合作社的发展作挡箭牌，似乎它们能自动成为农村社会主义的可靠支柱。这种企图用土地国有制或小生产者合作社联合体的空洞形式（不顾这些形式包含的实际内容）掩盖实际力量的做法，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鲜明地体现了小资产阶级拜物教。

苏维埃国家的土地国有化就是在纸上也远没有完全实现，因为至今没有一个法令非常明确地规定土地归国家所有，而有关土地使用基本原则的最新草案则竭力缩小土地国有制的概念。但是不管文字上如何表述，我国的土地国有化实际上没有实现，因为国家没有收到应得的地租。不仅农村中的小农户（且不说向它们收取租金相当困难，而且也不合适），就是农业企业也不向国家交纳租金。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土地国有化即使得到充分实现，它本身也不可能成为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保证，因为农业生产工具集中在私人手中。相反，正如列宁曾经指出的那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加速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国家只有在集

中大笔资金在公有土地上建立社会化生产的情况下，才能使农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为此而利用土地国有化。但是这要求制定与中央现在实行的政策完全不同的国家积累政策。

合作社的情况也是如此。为了使合作社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就要向合作社注入国家资本、就要使合作社与国有经济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否则就会像现在这样，农业合作社要么惨淡经营，要么依靠富农。因此，合作社的领导人（如卡敏斯基[①]）公开维护富农路线这就不足为奇了，**因为在合作社目前的经营条件下它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在得不到国家资金的情况下合作社只能靠富农存款并且只有吸收富农参加才能运转。

国家给合作社的帮助主要是由小生产者合作社联合体作保向小生产者提供贷款，这种帮助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慈善事业的性质。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联合体不是集体国有联合大经济的幼芽，而是分配贷款的机关和接受贷款应对国家履行义务的保人团体。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合作社联合体主要是给那些有还贷能力的自己的最“富裕的社员”以贷款，而只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或在所谓的“贫苦农民基金”出资时才肯给贫苦农民贷款。依靠小生产者的路线，不管其愿望多么善良，都必然会变成依靠富农的路线。

因此，认为斯大林集团在农村政策问题上采取的是与斯米尔诺夫、加里宁和卡敏斯基等的公开的右倾立场截然相反的“左倾”立场，是完全错误的。斯大林只是用某些妥协来掩盖右倾立场，靠着这种妥协，这种右倾立场才得以贯彻实施，如果没有这些妥协，这种右倾立场必定会遭到失败，但尽管如此，斯大林的这些妥协甚至丝毫没有使他接近这方面的正确路线，因为所有“左的”让步都无

① 卡敏斯基，格·瑙·（1895～1938）历任图拉市苏维埃主席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毫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苏联卫生人民委员等职。

非是要么较多地限制了富农，要么向贫苦农民施以小恩小惠。但是这种“左的”让步不仅对以社会主义方式发展农业生产力毫无帮助，反而会阻碍农业生产力的任何发展。

毫无疑问，最近一年，有许多迹象表明农业在退步：（1）技术作物播种面积没有增加，甚至有所减少。（2）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劳动力急剧增加，这种现象无可争议地表明，农村无产阶级化的阶层在农业中哪怕是在富农户中找到工作的机会越来越少。（3）所有迹象都表明农村资产阶级在成长壮大，但主要不是表现在形成较大的农户方面，而是表现在通过高利贷和商业手段加强对小生产者的剥削方面。这里产生了一个与城市完全类似的现象，**日益发展的农村资产阶级也像城市资产阶级一样，是寄生的资产阶级，不仅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胜利的角度来看，而且从发展整个生产力的角度来看，这种资产阶级都是有害的。**

中央在工业方面的政策使富农成了发展农业生产力必不可少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在经济上向富农作出让步之后，不能不跟着在政治上作出让步。

尽管在中央1923年争论中对反对派提出的主要指责是反对派以党内民主的要求为政治民主的要求鸣锣开道，但是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后仅过了半年，中央就开始实行农民民主制。1924年秋召开的中央全会为格鲁吉亚起义所震惊，于是宣布了“活跃”农村苏维埃的方针。随后，反对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和所谓“对农民估计过低”的运动以“面向农村”而告结束，与此同时城市开展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运动。在1925年初召开的研究活跃苏维埃问题的会议上，加里宁对自由选举（农村的）大加赞扬，而这是任何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都会做的。甚至当最初的自由选举在许多场合下使富农占优势后，斯大林在他的《问题和答复》中仍认为必须强调指出，第十四次代表会议确定的农民民主的范围不是一成不

变的，随着我们的“巩固”，这种范围可以进一步扩大，而他在与农村通讯员座谈（见1925年4月5日《贫苦农民报》第2078号）时竟说，必须把农民的选举权与工人的选举权拉平。苏维埃立法机关走上了所谓的“活跃苏维埃”的道路后，在其选举细则中大大地扩大了富农和“富裕农民”的选举权，就连中央的追随者卡尔宾斯基同志也不得不认为这是“向资产阶级民主的不可遏止的演变，演变以根据土地法典向一些阶层提供权利开始，以给所有进步的资产阶级提供权利而结束”。（《布尔什维克》杂志1926年第13期第39页）1925～1926年改选的糟糕结果和反对派的激烈批评，迫使中央取消了这些细则。可是就在中央二月全会上，当时扩大选举权的细则被取消后进行的新的改选的最初结果刚刚揭晓，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发表声明说，我们的做法过左，“限制”富农的权利（这种限制只是取消扩大了的权利，而且还不是完全取消）是打击“中农”，而且使农民失去了改善自己经济的积极性。这清楚地表明，路线还是原来的路线。

由此可见，**1923年取消党内民主制及与此相连的工人民主制只不过是实行农民—富农民主制的开始。**中央的政策不仅束缚了无产阶级的积极性，而且调动了非无产阶级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中央千方百计掩饰自己政策的真实意图。为富农发明了各种别名，如“富裕农民”、“生产能力强的中农”等。在农村允许租赁和雇用劳动力不被看做是向富农的让步，而被看做向中农和贫苦农民的让步（布哈林语）。一方面对实际上是富农户的示范农户大吹大擂，另一方面提出要对不幸的贫苦农民和应被视为苏维埃政权敌人的“二流子懒汉加以区别”。千方百计掩饰富农在农村中的作用，提供明显做了手脚的数字，即把富农的数量说得过少，并以此增加“中农”的数量。这种掩盖农村阶级分化进程和掩盖允许雇工和租赁以及延长租赁期限等措施的真实用意的做法，会削弱

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会使组织贫雇农反对富农和富裕农民的阶级斗争化为乌有，**中央实行的不是消灭阶级的路线，而是**束缚贫苦农民在反对富农的斗争中的积极性的**阶级“调和”路线。**

与这条实际上的富农路线和掩盖阶级矛盾的做法截然相反，无产阶级的农村政策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另一方面是组织贫雇农反对富农剥削他们的阶级斗争。为此：

（1）必须实际着手组织大型国营农场，这些农场拥有完善的生产技术，拥有依地区而异的农业各部门的最佳组合，拥有农产品和农业原料加工厂（干酪制造厂、制糖厂、亚麻初加工厂等等）。这些农场应当同农村贫苦农民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应主要从贫苦农民那里获得农场所需要的农产品，并从贫苦农民中雇用所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要以预支款、定金和贷款等形式给贫苦农民以直接帮助。这些措施在破坏富农的经济作用的同时，必将从经济上把贫苦农户与国有经济联系起来。纵使有千难万险，也必须提出这个任务并努力逐步地加以完成，因为这个任务不解决，社会主义政策在农村就不可能获得成功。

（2）加紧组织集体经济，必须引入国家资本并保证国家资本拥有足够的影响。集体经济应当尽可能实行与辅助类型的工业企业相匹配的完善的经营管理方法。

（2a）组建进行农业原料加工和土地耕作的国有企业和国有—合作社联营企业，这些企业主要与个体贫农农户和中农农户保持联系。

（3）农业信贷应当建立在国有—合作社的原则基础上。国家不能也不应当局限于扮演基层信贷合作社贷款人的角色，国家应当参加这些合作社，以使这些合作社的工作处于国家的经常监督和领导之下。这些只有贫农和中农才能参加的合作社的任务应当是组织信贷，以使农村的这些阶层摆脱富农的盘剥。特别应当重视组织实物

信贷（歉收年贷粮食，种子等等），当然这种信贷不应变为单纯的慈善行为。这些合作社组织应当在农村将贫农和中农阶层在反对富农盘剥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同时，应当通过一系列深思熟虑的措施帮助其成员转而以国有—集体方式组织生产，特别是以信贷方式协助组织已不属于个别农户，而属于整个合作社联合体的企业（面粉厂、碾米厂等）。

（4）组建同样只允许贫农和中农参加、也有国家资本的参与并在它的监督之下的农业合作社。农业合作社不仅应将其成员在销售与采购业务的基础上组织起来，还应当从使这些成员逐步改行上面指出的集体经营管理的角度来开展工作。

（5）真正建立国家的粮食储备，该项储备的任务不仅是调节消费市场，而且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是贫农阶层和中农阶层的保险储备。

（6）坚决拒绝吸收富农分子加入合作社。至于说到以信贷方式吸收富农上层的资金问题，那么应当通过发展储蓄网点、发行适合小私有者购买的国债的手段来实现吸收这部分资金的目的，但无论如何不能采取使合作社富农化的方式。

（7）随着农村征税制度和技术的完善，应逐步提高富农上层的纳税额。立即停止向占农户总数50%以上的农村下层征收农业税。禁止拍卖欠税户必需的农具和家庭日常生活必需品。

（8）既然农村的阶级分化已成为事实，既然这种分化还将继续下去，那么在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还没有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壮大起来的时候，党就不能而且也不应掩饰这种分化的程度。相反，党的直接任务就是在国家的协助下，组织贫雇农进行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为此，应当制定有关农村劳动保护和反对奴役性剥削的法律体系（反对富农“租赁”贫苦农民的土地，反对贫农“雇用”富农及其马匹和农具耕种自己的土地等等），在

此基础上，党和工会应当在组织贫雇农方面尽可能广泛地开展工作。特别是必须在工会的参加下恢复签订实际上被取消的与农业工人的劳动协议并且在农村苏维埃进行登记，规定由地方苏维埃对雇主履行这些协议的条款进行监督。

当然上述措施要求国家大大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只有在摒弃将国有经济的积累压到最低限度的方针的情况下，只有在国家转到真正实行工业化方针的情况下才能实行。

苏维埃国家

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有关国家的任务马克思是这样表述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指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和基本的东西”。①

“公社一开始想必就认识到，工人阶级一旦取得统治权，就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②）

无产阶级就是由此开始走向十月革命的。它摧毁了旧的内阁和地方自治机关及城市的机构，代之以苏维埃，取代沙皇军队的是工农赤卫队，后来又建立了劳动者的红军，为保卫革命而成立了全俄肃反委员会。正因为打碎了这些旧的机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顶住了反革命的猛烈进攻。

国家是资产阶级的机关，而且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它甚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12页。

至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仍旧是这样的机关。“可是，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①]（列宁《国家与革命》第5章第4节）因此，第一，“被压迫阶级要求得解放，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章第1节）第二，代替这个旧的机构，“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第2章第1节）

“无产阶级也得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国家应当成为镇压剥削者的工具，国家机关不能像一般的国家机关所固有的那样“由社会的公仆变成社会的主人”。能成为这种国家的“不是官吏的国家，而是武装工人的国家”（列宁《国家与革命》第5章第4节），（1）不但选举产生，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这几条是防止把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工人和职员变成官僚的保证。（列宁《国家与革命》第6章第2节）[②]

共产党人关于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就是如此。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指出，“由于广大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被群众推荐到重要岗位上来的工作人员缺乏必要的管理方面的技能，在困难的条件下因为有必要而匆忙吸收了一批旧学校出来的专家参加工作，调

① 列宁接着又补充说：“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这正打中了某些现代理论家的要害。——斯米尔诺夫注

② 见《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

走了一批最先进的城市工人去担任军事工作，由于这一切，就使得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内部部分地复活起来”，同时提出“采取下列措施彻底消灭这一祸害：

1．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一个代表来担负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

2．不断变换他们的工作，使他们逐渐掌握所有管理部门；

3．逐渐把所有劳动人民毫无例外地吸收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

事实上，不仅吸收无产阶级的优秀力量参加军事工作的国内战争时期，而且国内战争之后也没有实施这个逐渐接近公社－国家类型的纲领。相反，正是在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可怕地发展起来了。

恩格斯曾认为随时选举和撤换所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的方法”，现在则把希望寄托在内行官员身上。竞选会议和选举会议正从政治上发挥作用的会议变成丧失一切政治内容的选举程序，工人在这些会议上迫于“组织结论”的威胁而投票选举上头提出的候选人。尽管党的反对派成员在工人中享有声望，但不允许他们进入苏维埃。选举实际上已名存实亡，变成了苏维埃以顺从为标准而进行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选民失去了召回代表的权利。相反，这种召回权利成为党的机关用来消除“不驯服者”的工具。代表不对选民负责，而执行委员会也不对苏维埃负责。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时间一拖再拖。代表和执行委员会向选民作的工作报告采取了不接受批评的说教形式。凡此种种使苏维埃宪法的革命内容愈益遭到阉割。广大工人阶级群众不仅被官僚们剥夺了直接管理苏维埃国家的权利，而且实际上失去了利用十月革命获得的工人民主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选民对待选举像履行劳动义务一样是走形式。苏维埃的威信在工人群众心目中逐渐下降。工人群众逃避选举。他们留下来开选举会议是迫不得已（大门上锁

等等)。吸收群众管理国家仅仅被归结为所谓的“提拔干部”。这种提拔最常见的要么是以高薪和特权收买，要么是在企业党的机关中“安插”不受欢迎的脱离群众的工人。由于这种实际情况，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正在变成议会式的表决机器，而其机构正在变成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旧机构”（列宁语）的官员膨胀起来的巨大的官僚主义机器。这些机构与破除了“廉价政府之谜”（马克思语）的巴黎公社相反，成了工人阶级的沉重负担。

这支官僚主义官员大军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支不替换、不对工人阶级负责的大军拥有对社会化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和强制机构，正逐渐成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强大力量，并且极力维护和强化官僚主义制度。它日益变成特殊的独立的社会阶层。

甚至在同反革命斗争中承担了一项决定性任务并且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的继任者——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在目前普遍官僚化的形势下也日益偏离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它不是反对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反革命，而是逐渐开始同由官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弊病引起的工人理所当然的不满作斗争，甚至同党内反对派作斗争。

红军中的情况尤其危险。与党纲关于必须保持“阶级团结”和“尽可能使部队与工厂、工会、农村贫农组织保持密切联系”和“最初阶段由有觉悟的工农补充‘指挥人员’（哪怕是基层指挥人员”）的要求相反，红军指挥人员多半由旧军官和农民中的富农分子组成。

对非劳动分子参军的限制逐渐取消。在步兵中，特别是在骑兵部队中富裕农民占多数，基层指挥员的职务多由富农担任。至于说到党员红军指挥员，那么党的官僚化和党与工人的关系的削弱不可能不对他们产生影响。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有变成波拿巴分子进行冒险的方便工具的危险。

列宁1921年是这样给苏维埃国家下定义的：“工人国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人国家首先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即在这个国家里，占人口多数的不是工人而是农民；其次，这个工人国家还带有官僚主义的弊病。”（列宁《党内危机》）而他在1923年写道：“我们的国家机关，除了外交人民委员部，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极少有重大的改变。这些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

由于最近三年来中央的错误政策，机关中的消极方面大大加强，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增长了，富农获得了政治权利（进入苏维埃）。现在“官僚主义的弊病”大肆滋长蔓延，以致使人明显感觉到小资产阶级蜕变的味道。

“以往国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会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机关。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机关——为首的是国家政权——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这样的例子不但在世袭君主国内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内也同样可以看到”。（恩格斯《法兰西内战》）

中央的政策正在把苏维埃国家往这个方向上推。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的危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由于越来越脱离它赖以产生的阶级，同时也没有充分表达其他任何一个阶级的利益，有可能变成一个超阶级的、在各阶级间随机应变、哪个阶级的攻势猛就倒向谁的政权，继续执行这种政策，用恩格斯的话说，有把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变成“有时是作为两个阶级之间虚幻的中间人而在它们中间获得某种独立性”的一种政权的危险。

官僚化的官员大军由于不替换、不对工人阶级负责，独占社会化生产资料的支配权，而变成了独立的社会阶层。受这一阶层任意

支配的所有司法审判机构、垄断性的报刊和国有工业正使这一阶层变成有组织的、经济上强大的、武装起来的、因而竭力维护自己权力的阶层。对他们来说，权力成了目的本身。

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必须：

（1）取消官方提出的名为“活跃苏维埃”，实为发展小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提出恢复苏维埃这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口号，保证工人和农村贫民在苏维埃中占绝对优势。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非劳动分子、富农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参加苏维埃选举。

（2）恢复城市苏维埃尤其是工业中心的苏维埃这些最重要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的独立性。

（3）恢复选民召回自己代表的权利，并且在实际上保证这种召回的可能性。保证在工人报刊和党报及会议上对所有苏维埃机关及其领导人提出批评的自由。

（4）苏维埃应成为真正的工人机关，应按苏维埃确定的分工交给每个人一份明确的工作。应根据党纲定期更换这些工人。必须坚决反对把苏维埃机关中官气十足、视获得苏维埃成员的称号为荣誉封号的人选入苏维埃。

（5）坚决按计划将苏维埃行政管理机关的编制在两年内精简50%。追究破坏精简计划者的刑事责任。

（6）实行国家工作人员享受与工人相同的物质待遇的方针，真正贯彻负责工作人员的工资不应超过工人工资的口号。取消职员和负责工作人员的所有物质特权。取消用于官僚特权的专项“储备”基金。

（7）坚持红军必须利用旧军队的军事专家的方针，但新补充的指挥人员必须全部来自劳动者，而且主要来自工人。无论如何不允许非劳动分子担任指挥职务，哪怕是高级职务。不允许富农参加地方部队，应以贫苦农民充实地方部队。

当然，这些措施中提出的活跃工人民主制的方针只有在应该恢复自己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的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落到实处。不建立党内民主制度，不拨正党的阶级路线，这个方针就不可能得到贯彻实行。只有同时实行党内民主制和工人民主制，才能重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党

列宁去世后，中央在党内建设方面的政策就是不断地使党官僚化，现在则变为公开取消党。

放弃以民主的方法领导党并转而采用军事化的方法（先是由于国内战争，而后来是因为从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造成了极其紧张的局势）本来是权宜之计，后来不仅变成了正常的党内制度，而且达到了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最危急的时刻也从未达到的可怕的程度。

国内战争结束并过渡到和平建设之后紧接着召开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应该像过去实行党的军事化方针一样，坚定不移地实行工人民主制方针”；工人民主制“应当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工人民主制的形式排斥作为制度的一切委任制，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从上到下的所有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工作方法首先是，对一切问题广泛开展讨论，就这些问题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和争论”；必须“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性监督”。列宁去世后，获得了领导党的权力的中央委员集团违背这一精神，利用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在党内建立了骇人听闻的恐怖制度，对任何中央行为的批评，不仅是集体的，而且是个人的，都会受到追究，任何主动精神，只要不是来

自中央领导集团的都会受到压制。

列宁早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就指出了党内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危险。1922年，在代表大会结束之后，他建议成立一个隶属政治局的同官僚主义、蜕化变质及各种丑恶现象作斗争的专门委员会，要该委员会从党的高级机关，特别是从组织局入手开始自己的工作，他认为官僚主义在组织局中占了上风。

列宁的病使他的这个建议被党的上层束之高阁。不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反而在党内实行命令制，选举制被公开或隐蔽的委任制代替。党内“万马齐喑”，有时则“缄默抵制”，而这种情况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开始产生秘密的派别。

世界革命的延缓使俄国革命处于困难的条件之下，这对党的上层的蜕化和党的机构的官僚化的进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艰苦的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耗尽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被派往前线，无产阶级的后方削弱了。同时，在国内战争的艰苦情况下实行了“党的军事化”，行政命令和委任制的方法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所有这一切都导致国内战争结束时党内官僚主义因素的极大积聚。

国内战争的结束和向和平建设的过渡提供了消灭官僚主义的可能性，于是坚决向党提出了这种要求。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国内战争时期我们试图走的直接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世界革命延缓的情况下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可能了。农民在国内战争时期尚可容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但战争一结束立即以农民起义和喀琅施塔得暴动的形式对这一政策表示了坚决抗议。在无产阶级有丧失政权危险的情况下，客观形势要求从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转向迂回的方式，即新经济政策的方式。

转向新经济政策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倾向的合法发展和非无产阶级向苏维埃政权不断施加压力。列宁写道：“在我们改变了我们

的经济政策以后，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的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这种危险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列宁1921年《在莫斯科省第七次党代表会议上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新经济政策不是在公开的武装中战斗，而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日常斗争中提出了谁战胜谁的问题。**反革命暴力政变的危险让位于无产阶级专政蜕化的危险**。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是向社会主义的迂回过渡，还是变成了向资本主义的直接过渡，这是从转向新经济政策时起以乌斯特里亚洛夫为首的路标转换派知识分子所盼望的。

为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胜利，要求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党应当更紧密地与工人阶级团结在一起，组织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在资本主义成分的压力下产生的官僚主义弊病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正因为如此，认为必须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把党的建设的主要任务概括如下：“必须把战争时期分散成各个独立的队伍的党重新集合起来。必须使‘上层’和‘下层’、军事工作人员和非军事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和苏维埃工作者、老党员和新党员、‘青年人’和‘老年人’建立密切联系。不解决这一主要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就不能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决议接着说：“在保存着旧的组织形式的情况下，这项任务是不能解决的。**目前形势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

民主制。现在应该像过去实行党的军事化方针一样，坚定不移地实行工人民主制方针。”

决议继续说，“党内的工人民主制就是在实行党的共产主义政策时所采取的这样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能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而且同样积极地参加党的建设；工人民主制排斥作为一种制度的一切委任制，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从下至上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工作方法首先就是对所有问题开展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开展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决议。”①

这条正确规定的路线注定难以实施。无产阶级当时还不够坚强，而在列宁生病期间和去世后，获得领导党的权力的一伙中央委员视这种领导权为自己的垄断权。这个所谓的“列宁式的核心”（后来分裂了）千方百计要保持这种垄断权，但又不具备足够的领导的威望，它没有采取在工人民主制（工人民主制能够抵抗敌对阶级的影响并且在我们取胜的情况下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的基础上把党与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方针，而是采取了向党发号施令的方针。

这个集团不仅把放弃领导党的民主方法这一权宜之计变成了正常的党内制度，而且使这种做法达到了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最危急的时刻也从未达到的可怕的程度。党内建立了当时闻所未闻的压制制度，任何对中央行为的批评不仅是集体的，而且是个人的，都会受到追究，任何主动精神，只要不是来自中央领导集团的都会受到压制，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由于这些原因，到1923年底党已经发展到对这期间发生的工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53～54页。

人罢工不知所措的地步。这些罢工和经济危机的结果是，党员群众的不满情绪以争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广大党员群众的巨大压力下，党的上层不得不作出让步。但是它在口头上宣布实行党内民主制（12月5日的决议）后，便立即开始了激烈的斗争以千方百计维护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为此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直至歪曲党组织的决议。尽管大多数党员反对党的上层，但党的上层依靠反党的党机关最终还是占了上风，将无产阶级党员群众压下去，并宣布这部分党员有“小资产阶级倾向”。

为了巩固在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取得的反对党的大多数的胜利并“准备”应届党代表大会，党的上层几乎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宣布清党。在维护党的阶级纯洁性的口号下，原来持反对派立场的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被开除出党。当然，为了掩盖这些镇压行为，一部分真正的自私鬼也被消除出党；但是机会主义者、“昨天的列宁派”和庸俗分子未受任何触动，他们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随时准备支持统治集团。清洗不是公开进行的，即不是在支部会议上，而是一对一地进行：逼迫被清洗者告密，要求他们忏悔和出卖他人，而所有这一切都用“列宁主义”的目标和任务来加以解释。

清洗在工人支部中没敢进行，但是，一方面，一种暗中收买的方法广为流行，即打着提拔的幌子将有些人调到工资更高的岗位上，另一方面，惩罚的方式也被广泛采用，即将人调到工资更低的岗位上或干脆予以辞退。于是出现了反对派成员纷纷失业的景象。在这种无法无天、任意惩罚、挑拨离间和出卖告密的气氛中，出现了“万马齐喑”和“缄默抵制”的局面，而且比1923年争论前还严重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依旧坚持自己以往的立场；他们被排斥在党的合法生活之外，处于无所事事的境地。政治上无气节者则被收买，他们宣誓、告密，真是名副其实的蜕化变

质。甚至还有许多人自杀（卢托维诺夫[①]同志、博什[②]同志和扎伊德列尔同志等，这是党内从未有过的现象）。不满被深藏起来。在这种形势下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领导集团提出的所有决议，领导集团宣布这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和“党的团结的加强”。

这一胜利在围绕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1924年）而开展的所谓“笔战”时期进一步得到巩固。中央迫害的威胁、托洛茨基本人和反对派的沉默导致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用脚表决”即拔脚退出会场的情况。为数不多的人弃权，只有几个人投反对票，没有一个人敢发言。党员第一次不说自己的心里话，甚至违心地投票。这次“笔战”对党的腐蚀性影响是巨大的。反对派实际上被置于非法地位。右倾机会主义派别的专政得到彻底的巩固。党员群众被弄得情绪低落、消极被动。党的机关的专制制度建立起来了。

党内的蜕化分子因此而急剧增加。随着无产阶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被压制，上层由于感到没有人监督自己，因而本身也开始腐化。不坚定分子、摇摆分子，甚至那些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之辈都开始往党里钻，这些家伙革命前对党袖手旁观，而夺取政权后党变成了对他们有引诱力的力量，资产阶级固有的习气开始向共产党的上层人物中渗透。钻营行为、任人惟亲、惟命是从、奴颜婢膝、玩弄阴谋之风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甚至刑事犯罪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新反对派”，它最初产生于中央领导

① 卢托维诺夫，尤·赫·（1887～1924）——十月革命后参加国内战争。1920年起任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团委员。

② 博什，叶·波·（1879～1925）——俄国女革命活动家。为乌克兰建立苏维埃政权俄斗争的领导人之一。十月革命后参加乌克兰苏维埃政府，担任党政领导工作。

集团内两派争夺权力的斗争。其中一派（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集团）在中央内部失败后不得不求助于党，他们企图依靠列宁格勒无产阶级并提出了左的观点。这个企图没有实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集团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性，没有在党员群众中打下基础，并且只是依靠列宁格勒党组织的机关。工人和基层党员因季诺维也夫过去实行的苦役般的制度而对他极不信任；1923 年的反对派（列宁格勒组织的上层是其最激烈的反对者）由于弄不清新反对派的面貌而自然采取了中立的立场。最后斯大林集团巧妙地利用了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共同制定的党内制度，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不允许进行任何争论，只有列宁格勒组织支持新反对派。这个反映（尽管极不准确）彼得堡工人情绪的组织被党的机构和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利益的地方农民组织击败了。

“新反对派”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被粉碎以后，该派别的左倾纲领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从而使该派别与 1923 年的反对派迅速接近。1926 年的反对派联盟是这种接近的必然结果和政治上的正常步骤。

但是这个联盟具有重大的政治缺陷：（1）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集团打着“全体党员都同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的幌子，大肆中伤 1923 年的反对派之后，两派中的大多数普通成员和同情他们的党员都表示对联盟不理解。然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却不愿意公开承认他们 1923 年的错误。（2）联盟没有一个明确的纲领，而且在一系列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这又被斯大林集团所利用，宣布该联盟是“无原则的”。（3）联盟没有明确的斗争远景规划，没有以党内工人为目标的明确方向，也没有提出相应的口号。因此导致该联盟一遇挫折就犹豫不决和张皇失措，后来更导致其领袖人物的投降。

斯大林统治集团利用最近几年的制度所造成的党员群众不可能

一下子活跃起来的党内形势，决定采取公开的法西斯手段对付反对派联盟。这些手段包括：禁止正式争论，开除出党，以免职相威胁，公开捣乱等。斯大林“统治集团”采取这些手段获得胜利后，又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以实际上永远禁止争论而巩固了这一胜利。这种禁止通过党内途径解决意见分歧的基本方法和国家机关对党内斗争的公开干预是取消党的开始。所有表明党愈来愈蜕化的现象与斯大林取消党的方针是完全一致的。

农村支部和红军支部本应在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领导下成为影响分散的农民群众的引路人，但实际上愈益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成为一个控制了许多地方组织（北高加索、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具有小资产阶级影响和倾向的党。由于苏维埃组织完全脱离了工人群众，再加上在这些组织中出身于城市市民知识分子阶层的人占了大多数，而且来自小资产阶级政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和崩得等）的人占有很大的百分比，因此与无产阶级水火不相容的倾向通过苏维埃组织不断渗透到党内来。

在斯大林制度下，在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向工人阶级进攻的条件下，原本曾是党的主要支部的生产支部，正在逐渐失去自己在党内的分量。

在1926年党员登记期间有10万多工人退党，1926年10月反对派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他们退党的直接原因，而他们退党则是党内危机的明显标志。

列宁去世后所实行的党内教育大大加快了党的蜕化。斯大林的整个党内教育体系不是为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这个任务服务，而是为抽去和阉割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内容的任务服务的，把伪造的列宁主义塞给无产阶级政党，歪曲马克思恩格斯阶级学说的内涵，使党员养成惟命是从、奴颜婢膝的习惯。

共青团的教育也是为上述任务服务的，从而毒害了无产阶级青

年。

党委会已完全不再是党员群众的教育者。相反，党员群众成了党委会手中的工具。这一点在党的代表大会前夕表现得最明显，当时两个最大的无产阶级组织的代表会议——莫斯科组织和列宁格勒组织的代表会议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列宁格勒组织一致支持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立场，而莫斯科组织则一致支持斯大林同志的立场。

与此同时，党委会自己的权力转到了实际由上面任命的书记手中。党员群众服从于党委会，而党委会实际上服从于书记。

党的最高执行机关——中央委员会也没有逃脱这种命运。从1923年开始，党的领导权实际上从政治局手中逐渐转到了以总书记斯大林同志为首的书记处手中。政治局中的“列宁主义核心”内部也因此而闹起了摩擦，这些摩擦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前夕导致彻底的分裂并且形成了“新反对派”。

政治局多数派控制着所有基层组织，他们对这一分裂早有认真的准备，因而得以将自己的追随者安插到除列宁格勒之外的所有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上。根本不允许党员群众以任何形式参与上层发生的争论，况且党员群众几乎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争论。没有进行任何争论。只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关于这些分歧的问题才在没有列入会议议程的情况下突然提交给莫斯科代表会议和列宁格勒代表会议，而这时选举已经结束。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格勒反对派不可能不被击溃。尽管其领导人在一段时间内仍留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内，但实际上在其中已不起任何作用。总书记的个人专权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得到彻底巩固。

党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组织结构有了非常完备的形式。支部服从书记。支部书记服从控制着党委会的地方党委书记。地方党委书记服从总书记，实际上中央委员会也服从总书记。这就是现在

无产阶级政党的地道的官僚主义组织。

这个“组织”实际上是斯大林机会主义集团的不受监督和不负责任的统治的完备形式，这个集团借助于从组织上和物质上对党进行强制的极其特殊的办法，依靠对言论和报刊的垄断，攫取了以党的名义并且代替党说话办事的权利。

在这种形势下，1926年秋，联合反对派试图开始争论。中央仗着它由于党的这种新的组织而获得的全部组织优势（党的新的组织使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不可能迅速调动起来），不惜采取粗暴的强制斗争方法——正式禁止争论，开除出党，以免职相威胁，公开捣乱等。中央采取这些手段获得胜利后，又延期一年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并且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以实际上永远禁止争论而巩固了自己的胜利。于是代表会议通过决定，禁止使用列宁领导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认定的党的基本工作方法。

这样，把内战时期“分散成各个独立的队伍”的党集合起来的任务依旧没有完成。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分散成各个独立的队伍，而且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分成与国家机关密切相连的“上层”和没有任何党员权利的“下层”。此外，在国有经济内部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这些“下层”不仅在党内服从上层，而且在经济上处于直接依附上层的地位（工人党员和行政管理人员党员）。

与此同时，“上层”与“下层”在物质状况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在党内不仅形成了观点各异，而且物质状况和利益各异的集团。

随着无产阶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被压制，“上层”由于感到没有人监督自己，因而开始腐化。资产阶级固有的习气开始逐渐向他们中间渗透。钻营行为、任人惟亲、玩弄阴谋之风开始蔓延滋长，甚至刑事犯罪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

另一方面，不坚定分子、摇摆分子、甚至冲着高官厚禄而入党

的自私自利之辈迅速钻进了上层。所有不赞成盲目听从上级指令的人被解除领导职务造成了工作人员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这些动摇不定和自私自利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原是佩特留拉政府的成员，1918 年在报刊上赞成谋害列宁的拉费斯和直到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才赞同苏维埃政权的人，现都在共产国际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利亚多夫 1917 年夏天还向孟什维克发誓，说他早就同布尔什维克断绝了一切关系，他还请求齐赫泽[①] 吸收他加入孟什维克组织以从事有报酬的工作，现在却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从事教育共产主义大学生的工作。原是崩得分子的彼得罗夫斯基（利内）现在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在英国从事工人运动。原孟什维克布罗伊多现在是国家出版社社长，尽管他干过近似犯罪的肮脏勾当，但连中央监察委员会也对他无可奈何。类似的“被提拔者”的名单不胜枚举。“一些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不在共产党的队伍中，而在社会民主党或其他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队伍中的集团和阶层都不遗余力地想钻进惟一的合法的党。这些人有时也真诚地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但在实际中却没有抛弃小资产阶级的‘旧我’，并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心理和思维习惯带到俄国共产党里来。”（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中央现在正是从这些来自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人员中招募最忠实的“百分之百的”拥护者。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正在对为数不多的老布尔什维克骨干——因为大部分都在国内战争前线牺牲了——施以腐蚀性的影响。

对青年党员的教育不是为了培养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为了培养听话的国家机关和党的机关的官员。对青年党员进行的不切实际的教育阉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内容，歪曲了这个学说

① 齐赫泽，尼·谢·（1864～1962）——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 年任版得格勒苏维埃主席，1918 年起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后流亡国外。

的阶级内涵，磨掉了青年与无产阶级密切联系的意识。

工人群众对党机械服从的体制，工人群众对上层的依附关系，导致他们的积极性被削弱，党也因此而脱离了工人阶级。1926年登记期间有10万多工人退党就是这方面最明显的标志和对全党的严厉警告。党的官僚化及其当权人物的蜕化，党的领导机关与官僚主义国家机关的融合，工人党员在党的生活中的分量减少，在党内斗争中采取国家机关干预的办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央的压制党的政策已经开始**取消党，并把党变成国家的附属机关**。把党变成苏维埃国家的附属机关，党的领导机关与官僚主义国家机关的融合，这是取消党的直接步骤，是中央带领党所走的取消党的道路的几个阶段。

党内的这种政策与中央的整个机会主义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并且促进了中央机会主义政策的贯彻执行。应当使党回到无产阶级阶级立场上来，即重建列宁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并保证今后执行彻底的阶级路线。

如果党被彻底取消，那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的终结。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工具。没有党无产阶级的胜利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保持都不可能。即使领导国家的是由真诚忠于无产阶级的人组成的集团，即使这个集团制定了正确的政策路线，但如果没有党这个集团也注定要蜕化，而且路线也注定要扭曲变形。因此，当前的中心问题不是更换党的领导成员，而是重建党，恢复党的独立性，恢复党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为此必须做到：

1. 按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彻底恢复党内的工人民主制，当前的口号不应是禁止“派别”和“集团”，这将导致取消一切党内批评，而应是要求党合法化，因为全党都被党的机关赶到了地下。甚至领导集团的活动也互相保密。

党被完全赶到了地下，以致连中央的拥护者都不在通常的党的会议上讨论自己的事情，而是背着党员群众秘密进行，党应当合法化。

2．党的领导干部必须服从党组织。为此，必须消除领导干部对党的上级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及经济管理机关的物质依赖。他们的工资应由党费支出。他们享有的任何特权包括配发的不公开津贴都应当取消。

3．为了同官僚主义、自私自利行为和钻营行为作斗争，为了取消党的机关中的肥缺，国家和地方预算中拨给党的机关的活动经费开始要大约减少一半，而后完全停止拨款，把这笔资金用于消除失业现象。

4．保证所有党组织和党员在党内有权以口头和书面方式，以个人或集体的名义就有关党、苏维埃、工会经济管理及合作社、共产国际的活动以及其各支部的状况等等提出问题并加以讨论。任何对提出问题的党员的迫害行为都是对党的犯罪行为，应受到惩处。

5．如果党员因某种原因认为自己写的东西不能在党报上登载，应赋予他们在党员中间散发手稿的权利。

6．修改党章，撤销最近几年通过的那些歪曲党内民主制的原则、导致取消党的机关选举制，使党的机关和全党丧失独立性的决议，特别要：

（1）彻底地无条件地由下而上恢复所有党的机关的选举制；

（2）废除上一级委员会（包括中央委员会）对书记、支部委员会、其他党的机关和个人的任命制；

（3）按照中央委员会的选举办法，各级党组织书记、支部委员会和委员会的选举实行不记名投票；

（4）鉴于当选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代表在许多情况下，被以紧急出差和任命等等为借口剥夺了参加这些会议的机会，应规定，

任何人都不得剥夺当选为地方和全国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根据授予他们的权利参加这些会议的机会；

（5）恢复老布尔什维克的传统，即每个党员都有权参加任何党员会议：支部会、小组会等等（哪怕他不是该组织成员），并且在会上有发言权。

7. 停止实际上变成了派别斗争、内讧和个人纠纷工具的所谓“清党”。只有真正建立党内民主制和自由评议党员行为的制度（不论党员职位高低），才能保证比任何清党都更有效地将异己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

8. 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全部活动都是对列宁在其最后的文章中提出的设想的严重歪曲，它非但不“密切注视可能发生分裂的情况”，不去“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不顾情面，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物严格按照规定办事”（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反而实际上成了政治局镇压反对派的工具，成了派别斗争的附属机关。应当从根本上改变各级监察委员会的活动，把监察委员会真正变成工人党员监督党和国家机关的工具。监察委员会的成员要彻底更换。其主要核心应由一线工人组成，定期轮换，以防止脱离群众。中央监察委员会应当真正成为维护党的统一，防止“纯粹个人因素和偶然情况的影响”（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对党造成危害的工具。

[另一草稿]

8. 包括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内的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全部活动表明，监察委员会不是反对分裂行为，同个别党员与党员称号不相容的行为作斗争的工具，而是成了派别斗争、勾心斗争的附属机关，其目的是在党内建立跟踪、监视、暗中检查党员信件、告密、挑拨

离间的制度。有鉴于此，监察委员会应予撤销，以便通过建立临时委员会，根据十月革命前党的老传统来分析党员各种不符合准则的行为。

9. 与此同时，必须取消所谓的党内报告员制度，这些人被党委会派去参加各种会议不是为了参加那里的工作，而是为了监视党员发言，并将“政治上不可靠分子”报告给区委会。

10. 停止对被指控参与反对派活动的党员的各种迫害，而且今后不准进行任何形式的迫害，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如“调动”、辞退及禁止在党内某个部门工作等等。

11. 应规定，只有代表大会有权就因党内分歧和所谓“派别活动”而开除党员党籍的问题作出最后决定。所有其他各级组织因上述理由作出的开除党籍只是初步的。对这些决定提出上诉的党员，仍然享有党员的一切权利，直至代表大会作出决定。

12. 恢复因反对派活动而被开除出党的所有同志的党籍。

共产国际的政策

联共（布）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起了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首先，它是准备和完成十月革命的党，第二，它是倡议创建共产国际的党，第三，它是在 1905 年和 1907 年秘密革命斗争时期和反动时期的秘密工作的困难条件下积累了丰富的和特有的经验的党。这一切自然保证了联共（布）在共产国际中的领导作用。然而，这种领导作用在联共能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无产阶级阶级立场时在组织世界无产阶级运动和世界革命中曾是最大的积极因素，而从党日益滑向小资产阶级轨道时起则变成了巨大的危险。

在国内政策问题上背离无产阶级的立场不能不导致对共产国际领导工作的歪曲，而这种歪曲对第三国际各国共产党的发展和世界

工人运动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最初的政策首先是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推行联共建立的制度。不是像列宁做过的那样，善于把所有真正的革命者挑选到西方还年轻的共产党内，并用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精神进行教育，而是首先要求西方共产党人绝对听话。许多真正的革命者因此被强令离开共产主义运动，相反，一些除了听话什么也不会的人却被提拔到领导岗位上。

从此对各国共产党的领导蜕变成联共上层（在信息不灵、情况不明和中央使广大党员群众对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问题态度消极的情况下）对共产国际的外国支部发号施令。外国代表团越来越被排斥在对共产国际的领导之外。这样联共的国内政策就摆脱了共产国际的监督，西方的无产阶级政党已经无法帮助它克服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在党内愈益严重的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相反，联共却获得了对任何外国支部内的无谓争吵横加干涉的无限权利。可见，小资产阶级的歪曲不仅没有在共产国际内遭到反击，而且，随着歪曲的变本加厉，对外国支部的革命策略的歪曲越来越严重。

起初，这种把领导蜕变成发号施令的做法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即它削弱了对西方年轻共产党的革命教育和掩盖了共产国际当时的领导人对领导世界无产阶级运动的无能。

一方面是保加利亚和爱沙尼亚的冒险主义，另一方面是坐失德国1923年的革命形势，结果，德国1923年的革命运动走上了放任自流、毫无领导的发展道路。这种无能的政策的失败全部归罪于外国支部：于是立即“改组内阁”，以便向大家表明，领导是好的，只是执行者不好。

新的阶段始于1923年的争论。中央在同苏联国内反对派的斗争中遇到了困难，因此需要显示共产国际对它的支持。开始更换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为了让他们支持中央反对反对派。从这个时期

开始，挑选共产国际各支部的领导人不是着眼于国际运动的利益，而是着眼于俄共的内部斗争。从这时起变本加厉的这些做法，导致一系列的分裂和断绝关系，从而丧失了大量党员（在最主要的支部里丧失了60～70%以上），降低了各国共产党在广大工人群众心目中的威信，丧失了几百万的选民。但是，现在，在斯大林领导的情况下，这些做法由于新的歪曲而趋于复杂，因为新的歪曲同进一步背离无产阶级路线、同中央政策的民族局限性密不可分。如果说中央以前竭力使共产国际成为自己党内政策的工具，那么，现在则开始主要从苏联整体国家的利益出发来制定共产国际的政策。

当然，只要苏维埃共和国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利益从世界革命的角度来看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在领导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时一定要加以考虑。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应当首先从这些利益出发来制定共产国际的政策。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发展世界革命，而如果在某个阶段，发展这一革命的任务对苏联有一定的危险，那么为使自己摆脱这些危险而不惜损害世界革命的发展，就是对世界革命的背叛。其实，我们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上已经走上了这条靠削弱世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来保卫苏联的安全（实际是虚假的保卫）的道路。

首先，这表现在对英俄委员会的政策上。主张保留这个机构的人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作辩护，说什么他们的立场是从“统一战线的策略”出发的。不难说明，在这里提“统一战线的策略”有些牵强。要知道，这一策略的含义是，只要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领袖还用捍卫工人的个别要求来掩饰他们对工人阶级的背叛，就要支持并同他们一起为这些要求而斗争，同时指出光有这些要求是不够的，必须转向革命的斗争方法。但是，如果机会主义者在发生重大事件时公然背叛无产阶级，就应坚决同他们决裂，坚决揭穿他们这些领袖的无用，把群众从他们那里夺过来。

根据这种观点，建立英俄委员会并在总理事会5月背叛以前加入该委员会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无论怎样狡辩都无法证明，为什么在总理事会公开背叛以后，它在总罢工期间同资产阶级直接勾结以后，我们还同这些叛徒坐在一起，同他们讨论工人运动的实际问题，从而向群众表明，就是现在也可以期望这些叛徒做出什么好事来。这一策略的荒谬之处最明显地表现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试图在保留英俄委员会的同时发动一场揭露总理事会的领袖运动，结果这场运动可耻地失败了：英国共产党由于保留英俄委员会而处于最模棱两可的状态，它甚至不敢发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揭露总理事会的声明，英国工人只是从工联极右翼领袖托马斯那里才得知这个声明，托马斯在发表这个声明时作了一些相关的说明，以此证明俄国工会不愿意工会运动保持团结，所以必须解散英俄委员会。

由此可见，保留英俄委员会是对统一战线策略的令人发指的机会主义的歪曲，是转向同社会主义叛徒妥协的立场。我国代表团（它的行动完全得到联共中央四月全会的赞同）站在这个立场上，在英俄委员会柏林会议上走上了**公开为总理事会的背叛行径辩护和同英国工会上层分子妥协的道路，不惜损害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团结。**

这次会议断言，1925年4月英俄工会代表会议“警告全世界的工人说，对他们的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进攻正在来临……对英国矿工的进攻，剥削的加剧、工资的降低和工作日的延长向欧洲工人**表明，这一警告是及时的和正确的**”。这样经共产党联盟代表团同意宣布，社会主义叛徒们仿佛“正确地和及时地警告”工人们提防资本家进攻的危险。至于总理事会在这种进攻期间公开同资产阶级勾结，破坏总罢工并千方百计破坏矿工的罢工的行径却只字未提。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团用自己的威信在这里公然掩盖英国罢工的

叛徒们的罪行。

这个决议还宣布：“英国工会运动的国际团结和民族团结的惟一代表是英国工联代表大会和它的总理事会。”**可见，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承认，无产阶级的叛徒是英国工会组织的工人的惟一代表**，在这些叛徒的协助下，资产阶级甚至拒绝了矿工们的经济要求。这意味着，以后俄国的工会同英国的工会的一切往来只有经总理事会同意才能进行，我们只有经这个总理事会（它在总罢工期间拒绝接受“万恶的俄国钱”）同意才能向英国工人提供。

决议接着解释说：“两国工会运动之间的兄弟联盟决不可以也不应该排挤它们（总理事会或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国内工作中的活动……或者允许一方干涉另一方的内部事务……”“并以此公开地声明，对英国工人的背叛是英国工会领袖们的内部事务”，俄国工会“决不可以也不应该”对这种背叛加以干涉。无论对统一战线的策略作何种解释，哪怕是强词夺理的解释，也无法证明这种可耻地放弃布尔什维克在国际工会运动中的所有阵地并转向阿姆斯特丹工会联合会立场的做法是正确的。因此，托姆斯基在四月全会上只能辩解说，这些“让步”对保留英俄委员会来说是必要的，**在解决英俄委员会问题时决不能忘记使苏联这个世界革命的堡垒摆脱战争的危险**。可见，他在这里完全重复加里宁去年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过的话，当时正在解决在总理事会破坏总罢工后是否保留英俄委员会的问题。加里宁当时论证说，断绝同英俄委员会的关系就是断绝同英国工党的关系，而他认为工党是英国反对干涉的主要力量。**必须保留英俄委员会，以便削弱干涉的危险性，这就是保留英俄委员会的决定性理由。为此工人阶级的叛徒们被宣布为英国工会组织的工人的“惟一代表和体现者”**。国际工会运动的利益在这里成了外交把戏和幻想的牺牲品，似乎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能够并且将进行反战斗争。

不错，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这里取得了“胜利”。会议的决议说：“正像最近一些事件（什么事件?）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英俄工会的团结对于防止进攻苏联——第一批工人共和国的发源地的危险来说特别必要”。为了这句毫无意义和毫不承担责任的话而出卖了真正的国际工会团结的利益。很难想像出比这更严重的背叛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行为。

列宁总是强调说，机会主义者的和平声明一文不值，任何和平主义的空话都是卑鄙无耻的谎言，反对战争的惟一方法是推翻资本主义。现在总理事会自称是反战堡垒，正是它“及时地警告”英国工人提防资本进攻的危险并在这种进攻期间出卖了他们。它现在“及时地”警告人们提防进攻苏联的危险只是意味着，它在进攻期间也会像出卖本国工人一样出卖苏联。

英国“工”党在议会辩论关于中断同苏联的贸易关系时的行径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它向资产阶级议会发誓它憎恨共产主义，它投票反对中断关系只是因为苏联的“罪行”证据不足。

……

可见，斯大林中央的政策一直是从领导国际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路线向维护苏联的利益不受帝国主义列强损害的路线偏移。这种路线必然导致对共产国际外国支部策略的孟什维主义的歪曲。然而，就是在这条道路上，这条路线也会遭到失败：只要苏联仍然是革命的国家，要保证苏联不受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分割，就只有通过工人反对资本家的革命斗争才能达到。像在其他场合一样，中央这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政策，甚至不可能解决它为自己提出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共产国际的路线迫切需要加强外国党首先是其中最有经验的党（德国、法国、意大利）在共产国际中的作用，而不管联共内部各种力量的对比如何。共产国际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政策的内容上和执行机构的组成上，都应当成为世界

革命的战斗司令部。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支部，包括联共在内，都应该同样服从这个司令部的领导，联共的“内部事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事务。

反对斯大林中央的斗争不仅仅是俄国反对派的事情，而且是共产国际所有真正的革命分子的事情。

但是，这个司令部只有在它能够组建领导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情况下，才能成为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而这只有在取消共产国际中建立的制度、在共产国际中恢复党内民主和正确的阶级路线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反对斯大林中央的斗争不仅仅是俄国反对派的事情，而且也是共产国际所有真正的革命分子的事情。共产国际的路线在斯大林中央的影响下被歪曲得越厉害，共产国际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反对派就越多。这些反对派只是在不久前才开始形成，由于斯大林的政策，有时难免混进一些异己分子，有时会作出一些不正确的表述，在自己的斗争中发生时而向左时而向右的过火行为。但是，如果根据这一点就对它加以否定是极大的错误。相反，联共的革命无产阶级部分应当主动组织和团结共产国际的革命分子，在共产国际内部建立一个实际上能够组成并承担领导共产国际重任的牢固的无产阶级核心。必须牢记，不管联共内部的斗争结局如何，在欧洲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国际反对派完全有可能在共产国际中取得胜利，而斗争的胜利只取决于耐心、组织性和团结。

放弃这条机会主义的路线是保存共产国际这个世界革命的战斗司令部的必要条件。因此：

（1）在西欧运动方面，必须结束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歪曲，因为统一战线的策略是自下而上的统一的策略，而不是社会民主党内上层妥协的策略。必须中止英俄委员会的活动。

（2）在中国革命方面，共产国际应当采取的路线不是依靠将军

们，也不是依靠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而是要广泛开展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鉴于革命正在发展（尽管将军们背叛了），应当立即宣布组织苏维埃的口号，共产党应当立即提出一系列完整的口号（农民夺取土地即停止向私有者交纳租金、八小时工作日、罢工自由、废除强制仲裁、武装工人），不要害怕提出这样的口号会被开除出国民党。

（3）应当加强外国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中的作用，首先是最有经验的党（德国、法国、意大利）的作用。共产国际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政策的内容上和执行机构的组成上，都应该成为世界革命的战斗司令部。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支部，包括联共在内，都应该同样服从这个司令部的领导，联共的“内部事务”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应成为国际无产阶级的事务。

（4）但是，这个司令部只有在它能够组建领导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的共产党的情况下，才能真正成为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而这只有在取消共产国际的现有制度、恢复党内民主制度的条件下才有可能。

（5）恢复所有因反对对共产国际的路线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而被开除出共产国际、在共产国际之外仍站在列宁的布尔什维主义立场上的派别的共产国际成员的权利。

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修正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

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加工’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列宁《国家与革命》第1章）①

历史正在重演。最聪明的资产者和斯大林—布哈林派的机会主义者现在正在对列宁的学说干着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人曾对马克思学说干过的事情。乌斯特里亚洛夫已经宣布自己是列宁主义者并为斯大林反对反对派行为辩解，他断言，斯大林忠于列宁的“精神”，而反对派只不过抓住了列宁学说的“片言只语”。他的德国同行试图把革命家马克思宣布为“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同上），而他则效仿他们把列宁宣布为“俄罗斯民族的”列宁、“俄罗斯复兴的”英雄，使俄国走上通往“由它的历史准备好的民族的万神庙”（见乌斯特里亚洛夫的《二十世纪的会议》一文）的道路。另一方面，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行为当然是极端隐蔽、极富欺骗性的，他们口头上非常尊重列宁的学说，为列宁“永垂不朽的”遗体建造了陵墓，实际上一步步地开始歪曲列宁的学说，把列宁在世时强烈反对的东西说成是“列宁主义”。布哈林为了偷运自己过渡时期的观点，发明了列宁“两个计划”论——国家资本主义计划和合作社计划。列宁认为，同农民的“结合”“只有当这种妥协支持工人阶级专政并且成为一种消灭阶级的手段时，它才是可以容许的、正确的和原则上可行的”，②，现在这种结合正在变成目的本身，变成同农民达成妥协，目的是满足他们，而不是消灭阶级。列宁在整个过渡时期不止一次地强调国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的必然性，现在这种矛盾被宣布不存在了。列宁提出的统一战线策略是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进行斗争的手段，现在则越来越变成同机会主义者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4页。

② 见《列宁全集》第41卷，第298页。

达成妥协的策略。

中央一方面越来越背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掩盖这种背离，斯大林—布哈林派理论家的做法与此完全一样，他们口头上把自己吹嘘成正统的“列宁主义者”，而实际上却修正列宁，并越来越“阉割”列宁学说的“革命内容”。对列宁主义的这种修正十分明显地表现在三个彼此密切相联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同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理论”），关于我国整个经济的性质问题，特别是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问题。

一国社会主义胜利

我觉得，我们在辩论（反对“托洛茨基主义”）中使全党清楚而明确地认识到，我们不会由于**我们国内的阶级差别**、由于我国技术的落后而灭亡，我们甚至能够在这种技术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这种发展将慢很多倍，我们将像乌龟一样地爬行，可是我们仍然在建设这个社会主义，而且**“我们一定能建成这个社会主义。”**（布哈林《三个讲话》，第48页）对我们来说，国际革命的意义在于，“只有国际社会主义革命才能保证我们避免资本主义军队的刺刀带来武装干涉、新的战争和复辟”。（同上，第49页）。问题的这种提法是对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采取的立场的骇人听闻的机会主义歪曲，而这种立场的表述者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同志，正是他在1924年4月所写的那本小册子《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像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

共同努力。”只要看一看斯大林同志现在是怎样可怜巴巴地试图（例如在他的小册子《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和他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的讲话中）把这种说法解释为：在一个国家内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但是没有国际革命就不能完全保证社会主义避免武装干涉，看看这种说法就会知道，这位党的“领袖”多么迅速地、甚至来不及消灭痕迹就陷入了修正主义的泥潭，而且陷得已经很深。

这种新理论的机会主义实质毋庸置疑：

（1）在这样提出问题的情况下，国际革命成了只是保卫我们共和国的一种手段。这在客观上意味着对国际资产阶级转而采取防御的立场，这一点在斯大林和斯大林集团的许多讲话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斯大林集团在讲话中满意地指出，只要欧洲存在工人运动就足以消除对我们进攻的危险。在这里，西方的工人运动首先被看做保卫苏联免遭帝国主义列强进攻的手段，而不是看做通向国际革命的道路。不难看出，把西方的革命运动的这种意义提到首位非常适合在小资产阶级面前为共产国际的活动进行辩护。

（2）大家非常清楚，我们的国际革命的政策是资本主义列强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的主要原因之一，放弃这种政策是“避免武装干涉”的相当重要的“保证”。**由此可见，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新理论导致为了保卫苏联的安全而背叛国际革命**。斯大林集团在他们对英俄委员会和中国革命的政策中就干出了这种背叛行径。

（3）这种理论的炮制者们自己也认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我们需要 20～40 年时间（见李可夫同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中央的政治报告所作的发言）。但这样一来，只有在这种理论的炮制者们认为西方的革命有可能被推迟相当一段时期的情况下，这种理论才有实际的意义。而且毋庸置疑，斯大林集团在开始制定自己的政策时确实默认，国际革命真的被推迟了并且推迟了很久。**这意味**

着放弃列宁关于资本主义世界进入战争和革命时代的公式，意味着对世界革命采取取消的立场。

（4）既然世界革命首先是“避免武装干涉的保证”，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种保证用其他方式也可能得到，那么，在工人阶级看来，世界革命已不再是同它的日常利益有联系的革命，对工人阶级来说只是一种道义上的责任，有时是一种不愉快的责任。**这直接导致我国无产阶级同国际无产阶级的分离。**与此完全一致的是，国际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生活中被放到次要地位，而有时则故意向党隐瞒（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上就是这样）。甚至党内相当成熟的阶层也完全消极地对待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面临的问题。

斯大林分子关于反对派竭力证明我们没有世界革命就会马上灭亡的断言，是蛊惑人心的诽谤。无产阶级专政灭亡的问题不是由理论上的争论决定的，而是由各阶级的实际斗争决定的。争论的不是灭亡问题，而是关于我们没有比较先进的国家的援助能否转向以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能否越出新经济政策及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和危险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谈一谈我国经济和我国国有企业的性质问题。

我国的整个经济

列宁对我国的经济制度所作的基本评价清楚地表现在下面这些话里：

“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但并不是所有承认这点的人都考虑到：俄国现有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究竟是怎样的。问题的全部关键就在

这里。

现在我们把这些成分列举如下：

（1）宗法式的，即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经济的农民经济；

（2）小商品生产（这里包括大多数出卖粮食的农民）；

（3）私人资本主义；

（4）国家资本主义；

（5）社会主义。”①

这里说的是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只有在布哈林随心所欲的叙述中，“俄国现有的各种社会经济结构**成分**”才变成了**五种经济类型**。这意味着，列宁在确定我国的经济制度是过渡的、混合的经济制度时，根本没有认为一种经济是宗法式的（即完全的自然经济）经济，另一种小商品经济（即只为市场生产的经济），第三种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即完全靠剩余价值维持的经济，它不同于自己也劳动的富农），第四种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第五种是纯社会主义经济。相反，他不倦地强调指出，在过渡时期，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之间的斗争在各条战线上进行，各种成分按照不同的组合和不同的比例交织在一起，“这种小资产阶级九头蛇的千百万触角，时此时彼地缠住了工人中的个别阶层，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

他的计划的意义在于，依靠我们已经牢牢掌握的那部分经济，依靠国有工业——通过租让企业、合营公司、合作社控制私人经济，将资本主义成分置于无产阶级国家的监督之下并逐步削弱它们的实力，走向以社会主义的方式组织生产。布哈林—斯大林的理论不是这样深刻而辩证地提出问题，而是把我国整个经济形而上学地分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等等，凡是国家掌握的一切（即

① 见《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5页。

无论是信贷，还是国有商业，或是货币流通）都属于社会主义。这种理论由此得出结论说，既然一方面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租让企业和租赁企业不成功，而另一方面，国有经济的作用在这个时期又增长了，所以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意义就被说得微不足道，列宁自己似乎也转向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另外的计划即“合作社计划”，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任务现在被归结为只是加强“社会主义的”、国有的和合作社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这种理论极力掩盖在国有经济中也有资本主义的成分，它们的作用随着向货币经济的转变而得到加强，忘记了列宁把自然的商品流转转到货币的商品流转看做进一步的退却①，并就这种退却的危险性提出警告②。“斯大林分子”和“布哈林分子”却无视这些危险。因此，他们完全以新的方式提出关于我国经济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斗争问题。

“或者是我们使这些小资产者服从我们的监督和计算，或者是这些小资产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推翻我们的工人政权，就像那些正是在这种小私有者土壤上生长起来的拿破仑和卡芬雅克们推翻了革命一样。问题就是如此。问题只能如此。”③ 列宁就是这样提出

① 商品交换一方面一事无成，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简单的“买卖”代替了商品交换。“现在我们处于必须再后退一些的境地，不仅要退到国家资本主义上去，而且要退到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见《列宁全集》第42卷第228、229页）。——斯米尔诺夫注

② “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的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困难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产阶级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2页）——斯米尔诺夫注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7页。

问题的。

斯大林集团却不是这样提出问题：“决不可把俄国农业和西方农业混为一谈。西方农业是按通常的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在俄国却不是这样。我国农业是**不能循着这样的道路去发展的**，因为单是苏维埃政权的存在和基本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国有化的事实**就不容许循着这条道路去发展**。”（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农民按其地位来说是非社会主义性的。但是，他们应当走上而且一定会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因为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足以使农民免于贫困和破产的道路。”（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谁战胜谁”的问题对新理论来说是不存在的。它已经被解决了：既在工业掌握在我们手中，那么它就是社会主义的，既然它是社会主义的，那么农民必然会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要知道，既然农民不愿意贫困和破产，那么他们就能够做到没有这种贫困和破产。用这种逻辑的推理代替了对现实的具体分析，这种推理颇有民粹主义的特色，它导致了与民粹主义同样的后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发展必然性的甜言蜜语消除了任何“对富农的惊恐”，只能促使人们觉察不到“小资产阶级的九头蛇渗入我们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削弱我们对我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的斗争。

列宁就这个问题说道：“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他就恰恰由于盲目无知而暴露出自己做了小资产阶级的偏见俘虏。”

我国的国有企业

斯大林集团关于我国企业的性质问题的论断也充满了同样的烦琐哲学。

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在第十四次莫斯科代表会议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李可夫和布哈林在讲话中说，我国的工业简直就是社会

主义的工业。只字未提我国工业中存在着个别资本主义成分。在他们看来，我国工业的缺点无非是“我国工业贫乏，工人生活贫困，工资低，我国工人的收入比福特的工人少”。（李可夫的报告）只是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里和代表大会以后才提到一些保留条件，说什么虽然我国的企业始终是社会主义类型的企业，但是“在国有工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完全是社会主义的关系”。（布哈林：《1926年1月5日在莫斯科组织积极工作者会议上的报告》）但是，这种胆怯的保留条件掩盖不了宣布我国的工业结构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结构的总趋势，特别是如果回忆起，早在同考茨基进行争论时，这位布哈林面对日益增长的失业人数竟有令人难以理解的勇气声称，“严格地说，‘雇佣工人’这个术语不适用于国有工业的工人。我们只是因为没有其他术语才用它”。（《国际资产阶级和它的信徒卡尔·考茨基》第64页）这一烦琐哲学[①]实际上完全是帮机会主义的忙。

我国的企业属于国家，而领导这个国家的是无产阶级。这正是同资本主义企业的巨大的原则性的差别，由于这种差别，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权能保持并得以巩固，我国的企业自然会竭力用**演变的办法**转向社会主义的生产形式。[②]这是它们不同于我国现有的所有其他经济形式的地方。同时，即使在无产阶级专政牢不可破的情况下，其他经济形式也能够（例如合作社经济形式）或者是自发地（例如农民的、手工业的和私人的经济形式）沿着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因此，保持无产阶级专政是保证我国国有企业向社会主义方

① 难怪列宁在他的遗嘱中说布哈林：“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斯米尔诺夫注

② 但这就意味着，如果小资产阶级对苏维埃国家的影响得到加强，那么就像在我国发生的那样，资本主义成分就会在我们的国有企业中得到加强。——斯米尔诺夫注

面发展的惟一的、必要的条件。只有这种专政被推翻或发生蜕变，才能改变它们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在我国整个经济体系中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现在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企业。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在于，劳动力不再是商品。然而，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劳动力可以购买，尽管购买者是无产阶级国家，但在市场上只是作为商品同生产资料一起成为生产过程的因素之一。正如布哈林青年学派某些理论家所说的那样，这种状况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企业为了某种目的而始终要戴的“资本主义面具”，而且导致非常实际的后果，立即暴露出来的是，这些劳动力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对生产来说成为多余的。这样一来工人就会失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他们的补助金可以多于资本家[①]，我们可以更多地关心他们，但所有**这一切不能消灭同社会主义的生产结构的根本区别，在社会主义的生产结构下，如果劳动力多于对它的需求则会减少每个工人的劳动量，而不会减少工人的数量**。把劳动力仍然是商品生产组织形式称为社会主义（虽然是糟糕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庸俗地掩饰现实，这只能损害社会主义在工人眼里的声誉，意味着宣布还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已经解决——**宣布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

在把主要的生产资料集中在国家手中以后，我们就建立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前提。但是，甚至在像企业对待工人的关系这样最重要的方面，我们还不得不保持资本主义的（虽然没有资本家）形式。而我们不得不保持它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非常低，是因为我们不能保证让国内现有的大批自由劳动力保持哪怕不高的生活水平（结果，我们不得不使其中的一部分人处于劳动后备

① 虽然实际上我们远不能总是这样做。——斯米尔诺夫注

大军的地位），是因为在农村，我们由于同样的原因不能保证在没有阶级分化的情况下使生产力得到发展，从而使农村里正在产生出大量的失业者。**我们只有在西欧高度的技术水平的基础上，才能够克服所有这些现象，从而不仅能够改善工人的状况**（在我国的经济范围内，我们也应当而且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把他们由雇用工人变成工作和生活资料永远有保障的社会主义社会成员。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国际革命的有机联系正是在这里。**斯大林的中央放弃这一立场，转到民族社会主义的立场，而这种民族社会主义又被简化为新经济政策。**

如果认为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学说的这种歪曲只是停留在理论方面，那是极其幼稚的——从中可以得出非常实际的结论。这些结论最明显地表现在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里。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因此**我们决不能允许同工人国家相对抗。**党甚至不能也不应允许产生这种思想。”他接着说道：“怎么能让工人接近国家，即让工人自己接近执政的工人阶级呢？”只要把这种论断同列宁在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党团会议上就工会问题反对布哈林和托洛茨基的讲话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列宁主义者是怎样肆无忌惮地歪曲列宁。列宁甚至在1921年初，即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就非常尖锐地强调指出：“组织起来的全体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同时也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组织工人保护我们的国家。**”[①] 这一点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也得到了确认，当时正转而实行广泛的新经济政策，在国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并实行货币商品流转。这次代表大会关于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的决议说：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第204～205页。

“国有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必然会在劳动问题上，造成工人群众利益同管理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或其主管部门**利益的某种对立。**”而现在，在更加广泛地实行新经济政策、农民的阶级分化加剧、新资产阶级出现和这些阶级对工人国家的压力必然要比当时大得多的情况下，列宁曾痛斥为“知识分子的空谈”和“抽象的议论”的陈旧的烦琐哲学又复活了，它硬说工人和工人国家是一回事。这就是说，**在新经济政策盛行时，**工会国家化的理论又死灰复燃，工人对国家的任何要求都几乎被宣布为暴动，给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松绑，却束缚工人阶级的手脚，从而向小资产阶级分子敞开工人国家的大门，把苏维埃政权引向蜕变的道路。

我们看到，中央最近几年在工人问题上的政策实际上是在贯彻这一理论。每当由于客观条件或中央的小资产阶级错误而产生经济困难，就要求工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全阶级的利益”作出牺牲。工人对此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都被宣布为“维护行会的利益”。斯大林现在控制了一整套理论，仿佛“没有一部分工人为了我国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作某些牺牲，我们要向前迈一大步是做不到的”，“为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我们应当不怕某些轻微的牺牲”（这些“轻微的”牺牲意味着在3个月内增加失业者20万人，即增加19%）。（斯大林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①] 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斯大林最后不仅真的要把我国革命引向反革命政变，而且由他亲自实现这种政变，那么，他的这次反革命政变（他在政变中将依靠小资产阶级反对工人）将在保护所谓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反对所谓工人的“落后”阶层的行会情绪的旗号下进行。关于在这些工人的企业里充满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和在苏维埃国家与工人之间没有任何矛盾的情况给斯大林集团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78页。

发动反革命政变提供了现成的口号。

无产阶级政党不需要粉饰现实。相反，它应当像列宁那样，准确而清楚地向工人阶级说明，我们向社会主义接近的实际情况如何，这方面不容许有丝毫的夸大。在我国劳动力仍然是商品，这不是我们的罪过，而是我们的不幸，对此无产阶级政党无须隐瞒。所以，迄今为止，只要劳动力仍然是商品，我国的生产就不能称之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就不能在工人和工人国家之间画等号，我们在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时就应当仍然坚持以前列宁的表述，它反映了存在的矛盾并指出了克服这些矛盾的办法：**我们的任务是把工人组织起来，以便保护他们免遭我们的不完善的企业和不完善的工人国家的侵害，并由工人来保卫这些不完善的企业和不完善的国家免遭阶级敌人的侵害。**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的理论臆造现在妄想成为党的正式的意识形态，但它同列宁学说的相同之处还没有战前时期第二国际领袖们的马克思主义同马克思学说的相同之处多。

总　　结

1．国家工业化方面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导致国家生产力增长的停滞、工农业之间比例失调的加剧、寄生资产阶级的增多以及苏维埃国家和工人之间矛盾的发展。2．中央农村政策的富农取向一方面导致发展农业社会主义成分的措施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导致放弃对富农的阶级斗争。3．党内制度导致党和工会的僵化，导致党脱离工人群众。4．共产国际政策方面的摇摆导致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歪曲，甚至同英俄委员会中的无产阶级叛徒联合起来，放弃有关中国阶级斗争阵地的革命策略。5．背离列宁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的性质、关于过渡时期国有化企业的性质等问题的

理论，这实际上意味着向“民族社会主义”立场和宣布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所有这一切无可怀疑地表明，党的上层已堕落成企图取消十月革命成果、取消党的寡头政治集团，如今这个集团离公开背叛无产阶级事业只有一步之遥。

世界革命的推迟使俄国革命处于困难的条件之下，从而加速了党的领导的这种蜕化。艰难的国内战争耗尽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优秀分子上了前线。无产阶级的后方遭到削弱。同时，在内战前线节节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敌视无产阶级的分子越来越多地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他们在国家机关中的影响不断加强。这两种情况早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就已经导致“官僚主义在苏维埃制度中部分地复生”（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已经指出这一点），导致这种官僚主义在内战结束前变得更加严重。其表现是：普遍用任命制取代选举制，削弱执行委员会的作用而加强主席的权力，削弱苏维埃和工会中的共产党党团的作用，甚至连党也受到了影响，党内普遍用由上级任命党组织书记的办法取代选举的做法。这种官僚主义蜕化早在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就引起部分党员的抗议，并对寡头政治蜕化的危险性提出警告，后来，也就是在 1920 年，党内的这种抗议具有了群众性，即变成了下层反对上层的运动。

内战的结束与向和平建设的转变坚决要求党消灭在内战的困难情况下产生的这种官僚主义。与此同时看得很清楚，我们在内战时期尝试过的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在世界革命推迟的情况下，我们已经不可能采用。农民在内战期间尚能容忍军事共产主义政策，但在战争结束后立即声明坚决反对这种政策，结果发生了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暴动。面对无产阶级丧失政权的危险，客观形势要求从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式转向迂回的方式，转向新经济政策的方式。

转向新经济政策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倾向的合法发展和非无产

阶级对苏维埃政权日常压力的加强。列宁写道："在我们改变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后，危险就更大了，**因为整个经济是由大量经营管理方面的日常的琐事构成的，而人们对这些琐事习以为常，不太注意**，这就要求我们聚精会神、全力以赴，这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会用正确方法来克服困难的必要性。**资本主义的恢复，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关系在商业领域的发展等等，这些就是我们目前的经济建设所遇到的危险**，就是我们目前逐步解决远比过去困难的任务时所遇到的危险。**在这一点上切不可有丝毫的糊涂。**"① 新经济政策提出了"谁战胜谁"的问题但不是在公开的武装斗争中，而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进行的日常斗争中。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危险让位于无产阶级专政蜕化的危险。问题在于，新经济政策究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迂回方式还是成为直接走向资本主义的方式，以乌斯特里亚洛夫为首的路标转换派知识分子从转向新经济政策那时起就寄希望于此。

这个问题的解决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要求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发挥极大的积极性。党应当同工人阶级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组织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和对在资本主义分子压力下官僚主义地扭曲苏维埃机关的行为进行经常不断的斗争。正因为如此，第十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转向新经济政策，把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表述如下："必须把战争时期分散成各个队伍的党重新集合起来。必须使上层和下层、军事工作人员和非军事工作人员、工会工作者和苏维埃工作者、老党员和新党员、'年轻人'和'老年人'接近起来。不解决这一基本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就不能在经济建设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在保存着旧的组织形式的情况下，这项任务是不能解决的。**目**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232页。

前形势迫切要求新的组织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工人民主制的形式。现在应该像过去时期实行党的军事化方针一样，毅然决然地实行工人民主制方针。”（《第十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第15和16节）因此，在工会方面规定：“工会工作的主要方法不是强制方法，而是说服方法。在三年极端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大大削弱了的工人民主制的工作方法，现在应当在工会运动中首先是广泛地恢复起来。在工会中，首先必须广泛恢复工会运动的一切机关的选举制，取消委任制。工会组织应当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立。但是同时，在工会运动中特别需要最坚决地有计划地反对把集中制和军事化的工作方法蜕变为官僚主义和因循敷衍的现象。”（《关于工会的决议》第6节）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对此作了补充，更尖锐地强调指出党通过工会同工人阶级建立最密切的联系的必要性，规定“在社会化的国营企业方面”（更不用说私营企业和租让企业了），“工会一定要负责维护劳动者的利益”。（《工会的作用和任务》第3节）

这条正确规定的路线注定不能实现。无产阶级当时还不够坚强，而在列宁患病期间和逝世以后，党的领导落入那些认为这个领导应由他们垄断的人的手里。这个所谓的“列宁主义的核心”（现已四分五裂）使出浑身解数试图保持这种垄断，却不具备足够的威信，这个核心不采取党内团结和党同无产阶级在工人民主的基础上团结的方针（而只有这个方针才能对敌对的阶级影响予以回击和在有利于我们的情况下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采取了对我们党发号施令的方针，从领导中清除他们认为对这种垄断构成危险的竞争者。这必然会导致而且已导致党同工人群众联系的削弱，使革命现在面临着无产阶级和苏维埃政权公开决裂的直接威胁，导致苏维埃机关和工会机关的官僚化，导致党的上层的蜕化和党内蜕化分子的巨大发展。

把国内战争时期“分散成各个队伍”的党集合起来的任务仍然没有实现。党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被分散成各个队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分成“上层和下层”。这些上层现已发展成一支庞大的官吏大军，这支大军中有党的、苏维埃的、工会的、合作社的以及其他的官吏，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老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同工人阶级度过反动和革命的整个时期的工人知识分子。这支大军的绝大部分成员是：（1）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的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二月革命，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布罗伊多、拉德琴柯、利亚多夫、拉费斯、马尔丁诺夫等），只是在苏维埃政权十月胜利之后为了给自己的力量寻找落脚点才涌向惟一合法的政党，当然“在另一种情况，它们是不会加入共产党，而可能加入社会民主党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其他变种的队伍”。（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的巩固和新任务的决议）这些分子“有时候也诚心诚意地以共产党人自居，但是实际上他们并没有丢掉小资产阶级的‘旧亚当’，并且还把自己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和习气带给俄国共产党”，现在所有“百分之百的列宁主义者”几乎都自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柱石”。可是要知道，列宁建议“要把1918年以后即在布尔什维克可望胜利以及后来必胜无疑的时候参加俄国共产党的孟什维克的大约百分之九十九都清除出党”[①]，指的正是他们。（2）在1905年革命前和革命期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工作的知识分子（克尔日扎诺夫斯基、列扎瓦、斯维杰尔斯基等），但他们在反动年代脱离了党，其中有的人在十月革命期间还疯狂反对无产阶级（如谢列布罗夫斯基）。处于小资产阶级孟什维克汪洋大海中的一小部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他们中大部分人在前线牺牲了）退出了政治舞台或者被解除了领导职务，他们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腐化

① 《列宁全集》第42卷，第146～147页。

了：他们时刻关心的是保住乌纱帽和地位。

可见，这支党和国家官吏的队伍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物质上所关心的是保持现在的政策，因而成了斯大林上层的牢固的支柱。它不惜对破坏它的幸福的人采取最严厉的“取缔措施”。

与此相反，同工人阶级（斯大林集团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对它的打击越来越重）联系密切的党的工人部分同操纵党和国家机关的党的蜕化部分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此外，由于中央的政策而造成的阶级关系的紧张使党的社会成分更加复杂。一方面，党的异己分子如剥削贫雇农的善于经营的庄稼汉不断涌入党内。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内部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工人党员和行政干部党员的利益的对立在加剧。党内形成具有不同利益和不同思想的集团。党的工人部分和党的机关之间的矛盾不仅现在和将来都会增长，而且开始具有阶级性质。

在1923年的争论之后，中央在党内斗争中就越来越多地利用国家机关的力量，这不是偶然的。在1926年的争论中和争论之后，利用国家机关进行干预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完全可以认为，一旦发生公开斗争，斯大林集团就会动用各种手段，公开地依靠国家机关的力量。这就是说，它在党内斗争中将依靠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最典型的代表是乌斯特里亚洛夫，此人现在已经因斯大林反对反对派而拥护他。斯大林集团不仅滚到小资产阶级政策上去，而且开始越来越经常地依靠小资产阶级反对工人。

这种情况完全决定着当前斗争的性质：不是纠正斯大林集团，不是同它妥协，而是消灭它的统治，尽管它掌握着党和国家的机关并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十分清楚，反对派只有在他们能够把党的工人部分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用自己的政治路线赢得工人阶级的同情和积极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取得胜利。

因此，必须坚决地屏弃消极等待的策略，不能指望领导集团由

于内部磨擦而“向左转”或者发生分化。所谓的“中派”（斯大林之流）只是所谓的“右派”（李可夫、加里宁等）的挡箭牌，而实际上执行的是这第一种的政策。因此，指望这两个“集团”决裂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纯粹的幻想。“右派”在同“中派”的公开斗争中什么也不可能得到，只有通过同他们妥协才能得到一切。另一方面，“中派”情愿达成这种妥协，因为他们同“右派”的不同之处最多只不过是在执行同样的路线时更加谨慎而已。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仍然不能摆脱这种幻想，他们的动摇和错误就是由此而来的。其中主要的错误如下：

（1）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反对派不是向党指出，右的危险的主要支柱是斯大林集团和服从于它的党的机关（在1926年争论前整个反对派都来自这些机关），而是喋喋不休地告诉党说，斯大林集团能够主动开始同右的危险作斗争。四月全会（中国问题、英俄委员会、党代表大会问题）相当清楚地表明这种方针是完全错误的。

（2）这个联盟在二月全会上（对所有决议一致投赞成票）和以前在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把党的革命部分引入了歧途，并造成一种假象，仿佛中央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接受了反对派的口号。实际上中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迅速地背离无产阶级的立场。

（3）即使撇开是否应当发表10月16日声明问题不谈，单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对该文件所作的模棱两可的评价——起初是“不得已的手段”，以后是认真地和长期地确定反对派策略的基本文件，——就给党内反对派力量的形成和团结的过程造成了困难。

（4）除了所谓斯大林集团可能“向左转”的乐观主义，还有关于工人阶级的毫无根据的悲观主义，即认为工人阶级把“行会利益”置于阶级利益之上。因此前途渺茫，不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赢得

工人阶级对反对派的同情和积极支持的口号。

这样的错误和动摇过去和现在不能不妨碍未来把党的工人部分团结在反对派的周围并动员他们的力量反对斯大林的中央。

但是，如果认为这种动摇是不能容忍的，同时在现阶段就把反对中央的斗争转到党外，现在就开始组织新党，而不集中全部力量来反对机会主义的领导集团和恢复前布尔什维克党，是错误的。

无论这些或那些反对派集团的错误多严重，无论它们在策略问题上的动摇多厉害，整个反对派具有足够的共同点使自己联合起来。在争取恢复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既不容许在思想策略上模棱两可，也不容许夸大现有分歧而分裂和断绝关系。本文件中阐述的政治立场是作为 1926 年反对派联盟基础的观点的进一步发展和形成，除了其他任务以外，还应当成为恢复反对派内部统一、主张所有继续同统治集团进行不调和斗争的反对派分子联合起来的工具。

但是，反对派的主要任务是逐渐地揭露斯大林政策的小资产阶级性，揭露这种政策不仅越来越沉重地打击工人阶级，而且开始越来越依靠非无产阶级。反对派提出的实际要求应当捍卫工人的利益，应当把这些利益同恢复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联系起来。它的策略应当表明它斗争到底的决心。它应当把党的工人部分的自发的不满变成恢复党，即恢复工人的党和布尔什维克党的自觉的积极的斗争。

当然，党的这种恢复完全不意味着只是撤换现在的领导集团。在保留旧制度的情况下，用另一个集团哪怕是好的集团来代替一个毫不中用的集团，状况也得不到纠正。战胜斯大林集团是不够的，必须改变它赖以维持的整个制度。必须使党获得自由，使党合法化。党的官吏由党的公仆变成党的统治者、不可更换、妨碍党的基层组织改选和罢免党的机关的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把试

图这样做的人无情地驱逐出党。必须无情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崇拜，如崇拜领袖、崇拜党的机关、崇拜斯大林集团奉为神话的“统一”，因为斯大林集团在统一的掩饰下推行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对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只有当它的阶级路线坚定不移，只有当它真正成为独立的、自我管理的党时，才能实现战斗的革命的统一。只有那时它才能重新成为工人阶级的真正的先锋队。

［另一稿］

1. 工业方面明显表现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导致我国生产力的增长停滞，工农业比例失调的加剧导致失业的增加和寄生资产阶级的增多。

2. 对工人施加压力、工人的工资水平低和劳动强度大，导致苏维埃国家和工人的利益的对立。

3. 农村实质上的富农路线，一方面导致发展农业社会主义成分的措施软弱无力，另一方面削弱了同富农的阶级斗争。

4. 苏维埃国家的官僚化，同时非无产阶级在其中的影响加强。

5. 共产国际政策方面的摇摆，导致对统一战线策略的歪曲，甚至同英俄委员会中的无产阶级叛徒联合起来和放弃有关中国阶级斗争的革命策略。

6. 背离列宁关于一国社会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经济的性质和国有化企业在过渡时期的性质等问题的理论，这实际上意味着转向“民族社会主义”和宣布新经济政策是社会主义。

7. 党内制度压制党的工人部分的积极性，使党脱离工人阶级群众，导致党的上层蜕化，使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面临被消灭和变成国家政权的附属机关的危险——这一切表明，现在的中央领导人离背离无产阶级立场只有一步之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党已经蜕化。尽管中央的政策由于惧怕小

资产阶级而阻止苏联工业化的发展，无产阶级仍然在不断发展和团结起来。党的工人部分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的反击正在加强。反对反对派的“攻击”的运动收效越来越小。面对无产阶级专政蜕变的危险，党应当在自身中找到力量以根本改变党内制度，恢复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加强已经遭到削弱的同无产阶级的联系，同他们一起对日益增长的小资产阶级压力进行强有力的反击。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应当在这些口号下进行，大会应当对小资产阶级的动摇予以反击并制定一条与之对立的牢固的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扎瓦里扬，H.	1906	党证号 0040175
叶梅利亚诺夫（卡林），B.	1910	党证号 0040174
萨普龙诺夫，季·弗·	1910	党证号
米诺，M.H.	1917.4	党证号 0051235
明科夫，M.И.	1912	党证号 0009835
斯米尔诺夫，B.И.	1907	党证号 0084227
霍列奇科，T.	1914	党证号 0003737
奥博林，瓦·巴·	1904	党证号 0051224
达什科夫斯基，И.K.	1917.3	党证号 0293317
施赖贝尔，C.	1908	党证号 0751642
斯米尔诺夫，M.	1917.4	党证号 0603155
皮利片科，Ф.И.	1917.3	党证号 0009345
标内，Э.	1917.3	党证号 0051603
斯利多夫克尔，A.Л.	1917.4	党证号 0052874
吉洪诺夫，Л.	1917	党证号 0095213

本人签名附后。萨普龙诺夫同志同意签名。

1927 年 6 月 27 日

№09456

叶夫多基莫夫等致全俄五金工会中央委员会

（1927年7月1日）

尊敬的同志们：

在你们的七中全会上，你们根据列普谢同志的报告作出了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这个决议对反对派极尽扯谎和诬蔑之能事，对此我们认为不能对你们的决议保持沉默——尽管我们对五金工会是尊重的。

（1）首先应当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你们把党内斗争问题带到作为非党机关的中央全会上。这在你们工会过去的活动中和我们所有工会的活动中都是没有先例的。你们发表号召书呼吁非党人士反对反对派，似乎想以此迫使我们不仅向党员，而且向非党人士说明，我们的立场同你们决议中的诬蔑不实之词毫无共同之处。

（2）你们在决议中断言，说反对派“拼命地宣传自己失败主义的思想”。什么叫作失败主义呢？在我们党过去的全部历史中，失败主义又被认为是希望本国政府在同外部敌人的战争中失败，并用国内革命斗争的方法加速这种失败。当然，这里说的是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而你们却把“失败主义”一词用到反对派即联共内一个思想派别的政策上。你们以此说明，反对派想使苏维埃国家在它同外部敌人即同资本主义敌人的斗争中失败，并竭力加速这种失败。

只需弄清失败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就足以说明，关于反对派对苏维埃共和国采取失败主义的态度的不实之词是何等荒谬，反对派

过去和现在在参加创建和捍卫苏维埃国家方面，不亚于我们党内的任何人。

（3）你们向人民群众说，数百名最老的党员、地下革命者、列宁最亲密的战友、十月革命的参加者和组织者、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和组织者、社会主义建设的参加者和组织者，现在成了失败主义者，这样你们就把后患无穷的大纷争带到了人民群众的意识中。工人或农民中的每个有觉悟的诚实的读者，都会对自己说，或者是你们在撒谎，制造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论点，或者是苏维埃国家的本质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至这个国家的最直接的建设者成了它的死敌。你们促使人民群众，首先是他们的先锋队——五金工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4）你们关于失败主义的言词在我国工人和国际工人看来简直是荒谬绝论，因为现在站在最重要的外交岗位上直接捍卫工人国家利益免遭资本主义敌人侵害的几乎全是反对派。他们是：在柏林的克列斯廷斯基同志；在巴黎的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弗拉基米尔、柯秀尔同志；在罗马的加米涅夫、格列博夫－阿维洛夫；在布拉格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卡纳特奇科夫；在维也纳的乌菲姆采夫、谢马什柯；在斯德哥尔摩的柯普；在波斯的姆季瓦尼；在墨西哥的柯伦泰；在阿根廷的克拉耶夫斯基，等等。所有这些同志都属于反对派，其中大多数人已表示赞同所谓83人的信，反对派在信中确定了自己对基本的政策问题的态度。如果反对派是“失败主义者”，那么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怎么能委派这些失败主义者冒着敌人的直接打击捍卫工人国家最切身的利益呢？你们的论点不仅是对反对派的诬蔑，而且是对中央委员会的诬蔑，如果中央委员会不把拥护我们国家战胜资产阶级世界的人而把“失败主义者”即“失败”的拥护者放在外交岗位上，那它在党和工人国家面前就是罪人。

（5）当然，问题不只限于反对派外交家。现在在反对派的声明上签名的已约有300名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同志，其中很多人曾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签名者中有下列同志：

安东诺夫－奥夫申柯——前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

巴卡耶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前列宁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

别连基，格·——前红色普列斯尼区委书记

别洛博洛多夫——前中央委员、内务人民委员

沃龙斯基——《红色处女地》编辑

格尔季克——1912年《真理报》的组织者

叶夫多基莫夫——中央委员

佐林——前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书记和联共中央候补委员

季诺维也夫——中央委员、前共产国际主席

越飞，阿·阿·——前中央委员、前驻德国和日本全权代表

伊先科——水运工会主席

卡夫塔拉泽——前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

加米涅夫——中央委员；前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前劳动国防委员会主席、驻意大利全权代表

克列斯廷斯基——前中央委员会书记

库克林，A.C.——前中央委员，列宁格勒维堡区苏维埃主席

利兹金——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姆拉奇科夫斯基——前军区司令

穆拉洛夫——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陆海军检查院检查长

瑙莫夫——前陆海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前列宁格勒省委常委

普里马科夫——军长

彼得松，A.——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普特纳——中央委员、前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驻法国贸易代表

拉狄克——前中央委员、前中国大学校长

拉柯夫斯基——中央委员、前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驻法国全权代表

萨法罗夫——前中央委员

谢列布里亚科夫——前中央委员和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斯米尔加——中央委员、前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斯米尔诺夫，伊·尼·——前中央委员、邮电人民委员

索斯诺夫斯基，列·谢·

索罗金——工人，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委员

托洛茨基——中央委员、前陆海军人民委员

费多罗夫——前中央委员

哈里东诺夫——前中央委员

沙罗夫——前列宁格勒省委常委、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还有其他许多人。

所有这些同志也像大多数其他签署声明的老布尔什维克一样，正在履行党委托的负责工作。

我们再说一遍，那些破坏国家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人才是“失败主义者”。能否容许失败主义者从事任何严肃的工作呢？如果容许的话，党中央应当对党和工人国家承担使用失败主义者的直接责任。

（6）当然，你们知道，中央委员会并没有犯你们归咎于它的罪行。你们不敢说，反对派在完成委托给他们的军事、外交、经济和任何其他工作方面比多数派拥护者差。你们自己十分清楚，关于反对派“失败主义”的说法是恶毒的谎言，仅此而已。你们散布这种

谎言是为了同我们党内的一个思想派别进行派别斗争。为此你们不惜使党的威信受到骇人听闻的损害和给工人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你们把如此骇人听闻的观点硬加在反对派的头上并广为散布，从而为苏维埃国家的真正敌人树立了旗帜并使之合法化。简直难以想像还有比你们的决议更糟、更坏的破坏组织和分裂行为。

（7）我们暂且不谈决议中关于反对派的其他论点：所有这些论点大致处于同样的水平。对我们党和工人国家的起码的革命责任要求我们采取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来驳斥你们向党员群众和非党群众散布的恶毒诽谤之词。

中央委员
叶夫多基莫夫
季诺维也夫
托洛茨基
1927年7月1日

№09458

西尔伯曼：雅罗斯拉夫斯基“学派”

（1927 年 7 月 8 日）

尊敬的季诺维也夫同志：

一次谈话以及这次谈话的背景促使我请求您抽出一点时间，给我解释一下您对那些构成这次谈话内容的问题的看法。

事情是这样的：几天以前，党组织派驻我的工作单位《劳动报》的全权代表（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支部分成许多小组，这些小组同样也给设在劳动宫的各机关选派全权代表），也是报社的责任书记，找我谈话并一字不差地说了如下的话（因为我不久前才到《劳动报》工作，所以，他不知道我赞成反对派的观点）：

“因为您被派到俱乐部工作，所以我应该告诉您，罗戈日－西蒙诺沃区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会上区委书记波隆斯基同志作了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

……反对派加紧活动……某某地方，某某地方发现了派别集团……

……我们与反对派的分歧具有阶级性质……

我们只是表面上在一个党里……我们不能把他们看做共产党员……开除反对派分子没有意义……今天开除一些人，明天就会出现另一些人，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总会有反对派跳出来。

……我们的任务是开除反对派的上层，使跟他们走的人越来越少……

……除了开除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开除的同时应当逮捕，

而且事情很可能发展到这一步……”

由于有几个反对派分子在编辑部里工作，所以委托我以后留意他们送来的材料，一旦有什么情况，就打电话给他或向编辑请示。

这样，党的工作就交给了我，顺便说一句，过了两天又解除了这项工作。

听他说完以后，我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观点，讲了我不赞成（简要地）多数派政策的原因，指出，由于报纸是以非党人士为对象，所以我作为一个守纪律的党员，在报纸上只能阐述党的官方观点，最后我有信心地说，在党的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将进行争论，实事求是地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我认为，不这样就不能解决问题。

他的回答是：

“不会进行任何争论。我们不允许进行争论。此外，难道您以为，如果反对派在争论中获胜我们难道还要服从他们吗？永远也不可能。我们存在着阶级性质的分歧。如果我们获胜，我们就采取一切措施打倒（他的原话）新的多数派。我们作为反对派不会姑息纵容。我们将进行组织工作和党团工作……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打倒。”

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正像波隆斯基同志所说，说话不是私人性质的，而是正式的、指示性的。

您要知道，所有这一切使我思绪万千，浮想联翩。

把这叫做什么呢？

它将在历史上起什么作用呢？

它往何处发展呢？这就是我所产生的并且拟请您回答的问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A. 西尔伯曼

莫斯科，格利尼谢夫斯基胡同3号224室

1927年7月8日

№09459

季诺维也夫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①]

（1927 年 7 月）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国际形势的问题（布哈林同志和契切林同志的报告）。中国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我们向政治局（和《真理报》编辑部）提交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文件至今也没有分发给中央委员。

我们坚决要求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一开幕就把这些材料分发下去（或最好在全会召开之前的几天里，以使同志们来得及阅读）。

这些材料是：

（1）季诺维也夫同志迫不得已的答复。

（2）事实和文件。

（3）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

（4）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从蒋介石到汪精卫）。

我们请求给我们一个答复，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否将这样做。如不答复（对我们一贯如此），我就不得不认为是拒绝。

格·季诺维也夫

1927 年 7 月

① 文件上有托洛茨基的亲笔批注：“看来，是季诺维也夫 1927 年写的。”

№09460

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年7月11日）

抄送：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抄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真理报》上刊登了布哈林同志关于中国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在援引我们尚未发表的文章和给政治局的信件时极尽断章取义之能事。这在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内都是闻所未闻的。这类事情在列宁时代简直难以想象！这在列宁时代是根本不可能的。

1927年5月初政治局作出决定：拉狄克、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一篇都不能发表。当时还可以举出一些理由，如中国的事件正处于关键时刻，争论有可能对中国本身产生不利的影响等等。

现在，布哈林同志亲自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暗中对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召开专门会议对中央委员会进行批评等等。总之，这是正式承认，对错误进行公开批评和分析的时刻已经到来。

现在，还能否继续扣押我们关于中国问题的文件呢？现在，还能否继续禁止发表我们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呢？此类情事哪里还会有呢？

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取消关于不准发表我们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的决定。

（2）至少应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最近我们集体撰写的《从蒋介石到汪精卫》一文。

（3）允许我们将自己关于中国问题的文章和声明结集出版，可由政治局派人从保密的角度对文件进行审查。

（4）如果政治局认为更妥当，可将我们关于中国的材料同正式文件（共产国际和中央委员会的）合编为一个集子出版。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7 月 11 日

№09461

托洛茨基致《真理报》编辑部和政治局

（1927年7月11日）

在我们请求发表我们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的提纲之后，《真理报》刊登了布哈林同志的文章，对这些还没有发表的提纲加以批评。这里，我们并不想讨论这种新的争论方式：扣住文件不发，然后断章取义地摘引个别句子加以批评。我们认为，一个尊重党和尊重自己的人是不会允许进行这样的争论的。但现在问题不在这里。中央机关报（不管他们采取什么方法）认为必须对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进行讨论。布哈林同志的文章就是证明。这也丝毫威胁不到国家利益，否则，布哈林同志看来也不可能发表自己的文章。我们的提纲和布哈林同志的文章分析的是同一些问题。与我们的提纲进行争论的事实本身证明，提纲引起这场争论是必然的，也就是说，这种争论是合理的，否则就用不着争论了，但读者对作为争论对象的提纲得不到发表这个事实应作何解释呢？读者是否有权认为，那些反驳别人的观点但又不允许发表这些观点的人，是不是自认为没有能力进行真正的而不是故意歪曲的思想斗争呢？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坚决要求尽快发表我们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的提纲。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11日

№07495

托洛茨基答戈利曼

（1927 年 7 月 13 日）

尊敬的同志：

我饶有兴致地读了您的来信。您自称“缓冲器”，从来信看来也确实如此。现对您提出的问题简要答复如下：

1．您建议就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从理论上展开争论。但同时又事先为我们的文章大概不能发表表示遗憾，您又补充说：“对严肃认真的自我批评的不能容忍……又使我们的杂志的几乎所有的党内编辑所固有的成见变得更加根深蒂固”。难道我们的编辑部在亲自制定政策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您所说的“不能容忍”似乎有点情绪色彩，而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路线不正确、事变的进程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在同错误路线展开深刻“争论”时，这种“不能容忍”便成了一种自卫形式，即机械地取消就革命基本问题进行的任何意见交换。问题不在编辑部，也不在“不能容忍”，而在于基本的政治路线。

2．您反对领导层四分五裂（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或者是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您在信中是这样写的）。您认为团结一致的领导层更能保证少犯错误。我绝对无意反对这种主张，根据我的判断，这种主张与列宁对我党领导层未来命运所作的估计完全一致。无论意见分歧有多么深刻和尖锐，但我依然准备尽全力支持可促使恢复列宁主义领导中心的基本集团的每一个步骤。但是问题并未就此结束。革命政党的人员结构问题是由领导的

路线问题决定的。我们现在正在滋长一种放肆专横情绪，认为批评中央就如同君主主义者冒犯圣上。这种情绪与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处。中央既不是世袭机构，又不是终身制的党的机构。中央是有权势的机关，但它是党的机关。党可以撤换中央。为此，党应具备谴责中央的可能性。批评中央，特别是在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提出批评，是每个党员合法的完全权利。企图侵害这种权利就意味着把党变成机关下的无力的和意志薄弱的合唱团。稍微懂得一点阶级关系的内在结构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会带来怎样的前景。

3．您承认“从3月份起，中央的对华工作路线就出现了重大失误并导致了中国革命的失败”。我认为，这正是了解您的缓冲立场的弱点的关键。革命是浓缩的政治和浓缩的历史。革命的检验是浓缩的检验。所以就不能把“中国问题”上的路线看成无谓的插曲，哪怕是重大的。在中国，正是由于那里正在进行革命，种种关系都具有浓缩的特点，因此只要基本原则立场对头就不易出错。既然不存在一国社会主义，那也就不存在一国的革命无产阶级政策。对华政策是苏联对内政策的延伸。只不过由于事变发展的迅猛这种延伸较为明显罢了。

4．您在谈及过去时说道，必须“公开批评国民党的妥协主义政策”。这个想法还不够。问题是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革命斗争问题，国民党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它是公开的资本家政府（南京政府）或者是涂上一点妥协主义色彩的政府（汉口政府）。

5．我们是否承认中国经济中存在封建关系？封建主义是以农业中的农奴制关系为依靠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就不能说中国存在封建主义。农奴制关系和半农奴制关系在经济方面和社会生活中都表现得非常强烈。这种关系部分源于封建时代。部分是新生物，即在生产力的发展受阻、过剩的农业人口、商业资

本和高利贷本金的作用等基础上的再生的。至于在中国哪种关系起统治作用，是“封建关系”（确切地说是农奴制关系和所谓资本主义前的关系），还是资本主义关系？肯定是后者。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的整个经济中起绝对主导作用，才有了能谈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鲁宾斯坦同志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述中国经济的好文章。尽管有人（编辑部？）企图把农奴制残余提到首要地位，但他丝毫未能改变文章的下列基本思想：资本主义在中国占优势，工业比农业占优势，城市比农村占优势。中国的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作用现在已经非常之大了。近几年内这种作用只会有增无减。事变已经表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也可以发挥重大作用。领导人的方针完完全全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在事实上夺得领导地位。

6．您问是否可以使用诸如“中央的叛卖政策”和“背叛”之类的提法？您还说我也曾有过类似的评价。您这样说有何根据？

7．您担心进一步扩大分歧会导致分裂。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我也认为分裂是最大的不幸。导致分歧扩大的根源不是反对派的险恶用心，而是事态的发展程度。党内制度已决定无法通过正常的党内途径来解决分歧。党本身的不正常状况又是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必然产物。错误的政治路线是产生危险的主要根源。只有把全部问题都公开地、大胆地提出来，才能促使党不是按照套话，而是从实质上来对待这些问题。这是达到建立在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基础上的统一的惟一途径。统一不能靠怨天尤人的缓冲论调和机关的恫吓来维持。

8．您问道：“思想上和组织上同路特·费舍和马斯洛夫结盟是否相宜？”组织上结盟的说法本身是完全错误的。这方面的任何断言均纯属无中生有。但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接近肯定存在，根据该集团的一些出版物我可以作这样的判断。我认为，该集团放弃了许多

东西，也学到了许多东西。指责这个集团为反革命、叛徒等是完全错误的，犹如指责反对派“支持”张伯伦一样。

最后，我要感谢您寄来您的书。全会之前肯定是无法拜读了。但愿全会之后能够一读，至少可以读读您指出的那一章。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13日

№07496

叶梅利亚诺夫等就斯列普科夫的文章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27 年 7 月 13 日）

抄送：《真理报》编辑部

尊敬的同志们：

7 月 9 日和 12 日的《真理报》刊登了斯列普科夫的文章，该文对 15 人起草的文件表示反对并指责在文件上签名的同志搞修正主义、取消主义和孟什维主义，就差一点儿是反革命了。他的这番指责的依据多半是对我们的文件断章取义和明显胡乱解释。

例如，斯列普科夫从 15 人的文件中引证了这样一段话：“离开先进国家的帮助，离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就不可能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组织过渡”，他的解释是，文件起草人认为对我国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他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责我们，说我们认为十月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说我们认为与农民结成联盟是不可能的。

凡是读过文件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解释十分荒唐，而且很不诚实，因为文件中没过几行就明明写道：“即使是在我国的技术落后和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我们也可以依靠民族工业按照社会主义方向发展我国经济”。另外，我们对中央政策的批评均可归结为中央没有利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潜力。斯列普科夫所引证的论点所指的只是：离开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就不可能向社

会主义的生产组织过渡，就不可能确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主义关系。至于所谓我们认为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指控，只能称之为骗子的伎俩。

斯列普科夫大言不惭地接着瞎说“文件起草人认为应当从自己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中删去”合作社，尽管我们的文件中多处谈到如何把合作社变成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种形式及为此应对我们的政策作哪些修改的问题。

斯列普科夫引证了文件中“应当提出恢复苏维埃的口号”一语，却认为不必再往下引证，哪怕到句号为止，放过说明口号内容的一句话（“恢复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并能保证工人阶级和农村贫民的绝对优势地位的苏维埃”）。通篇文章都是谎言和歪曲。

问题当然不在斯列普科夫。斯列普科夫及其战友的辩论方法之不诚实已相当地为人们熟知，他的种种小骗术只能表明他的批评软弱无力。如果《真理报》的读者能够根据原件对斯列普科夫的论战的“诚实性”进行检验，我们就根本没有必要去理睬了；可是问题在于读者没有这种可能，他们只能根据斯列普科夫的引证对我们的文件作出判断。

党的中央机关报竟然登出对未曾发表的党内文件进行批评的文章，从而在事实上帮助斯列普科夫欺骗党，我们对此不能不表示惊异。与此同时，我们也认为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不会去充当文字骗子的保护人。

这里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曾发表声明要求将我们的文件发给各级党组织。现在，文件中的有些片断已见诸报端，我们完全有权要求也在报刊上（《布尔什维克》杂志或其他专门出版物）全文发表这份文件：如果有人当着党和工人阶级的面指控我们是孟什维主义和取消主义，那么党和工人阶级就有权根据文件的原件、而不是根

据斯列普科夫奉献给他们的引文来检验指控的公正性。我们无法想象中央会不满足我们的要求。

致同志式的敬礼！

瓦·叶梅利亚诺夫（卡林）

M. 明科夫

弗·斯米尔诺夫

T. 霍列奇科

从斯列普科夫文章所引的引文看，他在复制我们的文件时有一些刊误，例如有一个地方把“序幕”印成“借口”，另一个地方把“小生产者路线”印成“我们生产者路线”。我们恳请给我们寄几份重印的文件，以纠正刊误。

1927 年 7 月 13 日

№07497

托洛茨基就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讲演致卡涅夫斯基

（1927年7月16日）

尊敬的同志：

您在来信中写道，卢布内市的组织把我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演讲”内容说成是：“我们这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篡权者的专政”……等等。您表示怀疑是否确有其事？就我而言，我应当这样说：制造这种谣言的人简直以为别人都是傻瓜。实际上我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根本没有发表什么“演讲”，聚集在该处的同志们要求我讲几句话，我说了这样一句：“现在，我们的国家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的时刻，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列宁的革命政党的更加忠诚的儿子！”我没再讲过别的话。我的“演讲”稿是有证人证明的——证人不是反对派，而是反对派的对立面。证词就保存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然而不仅是会上、而且党的刊物都把离奇的演讲强加于我。这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为什么我要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列宁的政党的更加忠诚的儿子”呢？因为有那么几个坏家伙在说什么，反对派与张伯伦是同一条战线上的，说天知道打起仗来反对派会有何表现。说话的坏家伙自己都不相信他们所说的话。但是他的如意算盘是：一部分人愚不可及，另一部分人有切身利害关系。如果有人以下流的诽谤语言说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并不认为每个革命者都有义务捍卫苏维埃共和国，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我们的敌人也会相信。可

见，坏家伙的诽谤是要在国内外阶级敌人的面前削弱我们的力量。我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讲那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联共（布）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国家这个问题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分歧。

您写道，我写给俱乐部工人理事会的那封信遭到了所谓的书报检查机关的查禁。这封信您和其他同志都已读过。我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演讲”与这封被查禁的信在内容上没什么两样。我认为，对我的信秘而不宣同就我们的演讲散布流言蜚语一样，都是粗暴的反党行为，这种行为给党员队伍造成了混乱和涣散。我们需要的不是流言蜚语，不是诽谤，也不是封锁他人信件的内容，我们需要的是全党都来诚实而认真地讨论有争论的问题，只有党才能在列宁主义的革命基础上维护自己统一和自己的战斗力。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7 月 16 日

№07498

托洛茨基：热月

（1927年7月）

我国是否会出现热月？《真理报》借助于引文证明说，没有这种可能。斯大林则说，那些提及热月的人不学无术。然而这些都不对，没有击中要害。

指责反对派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小资产阶级自发性膨胀的表现，与此同时又否认“热月党人”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这就意味着不能自圆其说，意味着两个错误：对反对派的评价错误和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危险的估价错误。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前夕和初期，我们的许多同志曾多次与列宁同志谈及热月问题。这个字眼当时在我国很流行。谁也不会产生荒唐的学究式或冒充内行的关于“不可能”发生热月的想法——由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等等。

列宁在谈到喀琅施塔得暴动时曾说过：“这个事件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政权从布尔什维克手里转到了由各色各样的分子组成的不确定的集团或联盟手里，他们似乎比布尔什维克仅仅稍右一点，甚至也可能稍‘左’一点……”

“……非党分子却做了白卫分子的垫脚石、跳板和桥梁。这在政治上是必然的”。（列宁1921年3月8日在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9页）①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41卷，第18、19页。

大家都知道，喀琅施塔得问题不仅在于非党人士：许多党员水兵也参加了暴动。他们同非党分子一起使政权离开原来的阶级标志。

喀琅施塔得形式的“热月”是武装暴动。不过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较为平和地逐渐滑向热月。既然喀琅施塔得分子（党内的及非党的）能以苏维埃为口号并以苏维埃的名义滑向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即使高举共产主义旗帜也可滑向热月。历史要滑头之处正在于此。

什么是热月？革命因遇到某种挫折或冲击下滑一个台阶，即政权发生右转就是热月。上层人物、掌舵人物似乎没有变，言论和旗帜也没有变。热月 9 日政变的胜利者在政变后的第二天深信并未发生任何灾难性的事情：只不过是惩治了一伙“昔日的领袖人物”，这些人成了离间者、瓦解组织分子、当时的张伯伦—皮特的“客观上的”帮凶。而下面却出现了阶级力量的深刻的重新配置。

私有者在此之前已经恢复元气，扩充实力，抖擞精神。国民秩序得到恢复。新私有者最希望的是不妨碍他们享受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向国家机关、向雅各宾派俱乐部施加压力，因为许多雅各宾分子都觉得自己是私有者、是官家的人；雅各宾党需要改组：把那些比较善于并且愿意追赶新潮流的人推向前台，让非雅各宾党人出身的新人向他们靠拢；把反映城市下层居民即无套裤汉的利益与追求的人排挤至次要地位，让他们靠边站，削弱他们的力量并使他们变得群龙无首。这些下层居民已不像从前那样相信自己的力量——受到来自新私有者及其庇护者国家机关的压力。第一次权力变动还表现为执政的这个政党内的变动：一部分雅各宾党人被另一部分雅各宾党人排挤至次要地位。用列宁的话说，这部分人就成了波拿巴领导下的大资产阶级后来走上夺取政权的道路的垫脚石、跳板和桥梁。

我国是否存在热月危险？这个问题的意思是：（1）我国是否存在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2）有无理由认为，资产阶级复辟不会一

举成功，是通过几次一连串的变动来完成，其中第一次变动是自上而下的、多半是从同一政党内开始的——从代表革命高潮的分子向促使革命走向低潮的分子的变动？

否认受资本主义包围的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存在资产阶级复辟危险这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孟什维克或者对我国革命的国际和国内条件均一无所知的真正的投降主义者才会说热月不可避免。但否认热月的可能性的则只能是官员、饶舌者或扯谎者。当然，我们这里只是谈可能性，只是说危险性，是从列宁所指的那个意义上说的，列宁曾经说过，世界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扼杀土地革命，可是敌人却能够扼杀社会主义革命。

但是一般说来资本主义复辟可能有两种形式：或者是采取彻底而急剧的政变形式（有武装干涉或没有武装干涉），或者是表现为几次一连串的变化。后一种形式被乌斯特里亚洛夫称之为放慢速度往下走，在此过程中并非没有痛苦，法国革命也证明了这一点。热月9日政变就是雾月18日政变的前奏。

因此，只要欧洲革命没有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在我国的条件下两条可能的途径中哪一条更有可能：是急剧的反革命政变的途径，还是几次一连串的变化的途径，连同每个阶段的动荡，连同热月这个最近阶段？我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极其相对的。既然根本不能否定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就得面对复辟的两种方式（放慢速度或不放慢速度），就得权衡两种方式的可能性，发现其准备的因素。政治领域也像经济领域一样，始终存在着“谁战胜谁”的问题。

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对发生热月变化的可能性作了生动的阐述。列宁是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当然，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紧密相连，列宁指出：

“历史上有过各种各样的变化；依靠信念、忠诚和其他优秀品

质，这在政治上是完全不严肃的。”①

“我们听老师说过：‘一个民族征服另一个民族，于是征服人家的民族成了征服者，而被征服的民族则成了战败者。这很简单，人人都懂。至于这两个民族的文化怎样呢？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出征民族的文化高于被征服民族，出征民族就迫使被征服民族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被征服者就会迫使征服者接受自己的文化。’”②

列宁是不是认为掌权者必然会发生那样的蜕变？不是。他是否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当然是。他是否认为大概会发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这样。这是不是悲观主义？不是，这问题本身就很荒唐。（我要马上附带说说这样一件事：一位党的核心人物的同事居心叵测地同这位核心人物开了个玩笑，他把我摘录的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当作自己的文章拿给这位核心人物看。这位“核心人物”不知真正作者是谁，便对列宁的发言作了如下评价：“老生常谈，有反对派的味道”）。可见，列宁并不排除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漫长时期内都有可能发生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资产阶级蜕变，蜕变的方式是不动声色地用新兴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对布尔什维克党的某些阶层实行文化的和政治的同化。正因为如此列宁才承认政权有可能发生热月变化，不过这不是说，列宁认为我们的党是热月党，或干脆责骂我们是热月党人。要明白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在我国，是否存在可能使热月的危险变为现实的过程——由于我们执行的官僚主义的盲目政策——确实存在。我不必再说富农和私营企业者，也不必再说外部的资本主义压力。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过我们来举个例子吧：某工厂革命工人中的老骨干靠边站，甚至被新上来的人赶入反对派行列；这些新上来的人，有的连国内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92页。

② 《列宁全集》第43卷，第94页。

战争都没参加过，而且他们中的不少人革命前在业主面前俯首贴耳，在革命初期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这些人现在身为党员，贯于在上司面前俯首贴耳，用当年责骂布尔什维克的话大骂反对派。这样的“变化”甚至在工厂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是什么？这不是反革命，不是政变，而是同一阶级、同一政党内人员的重新配置，这样一来那些最善于见风使舵的人爬上了高位，阶级的革命抵抗力却因此而降低了。我国眼下是不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按照这样的方针进行着人员的重新配置呢？我可以作出肯定的回答。同反对派的无情斗争就是一种便于在非无产阶级的压力下进行上述党内力量重新配置的办法。再就是最危险的过程之所在，它使我国的热月分子非常容易向党施加打击。

反对指出热月危险的人反复说，我国各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与法国不同，等等，等等。我们也看到，布尔什维克的基础是20世纪的工人阶级，而不是18世纪的前无产阶级。我们还听说，法国革命没有外部出路，因为法国周围都是一些较为落后的封建国家。我国的革命有外部出路，因为我们周围都是一些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反革命在法国绝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我国则只是一种可能性，今后的国际条件同极端错误的对内政策极其不利地结合到一起时才会有这种可能。一个目前正在从理论上瓦解党的人引证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必要去披过去的外衣的论述，并由此作出荒唐而甜蜜诱人的结论：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谈热月。披过去的外衣可以对自己和他人掩饰自己在历史上所起的微不足道的作用。不应该这样做。但是可以而且应当去寻找同过去的相似之处，从过去来学习。列宁于1902年写道，社会民主党人就是把自己同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联系到一起的雅各宾党人。当时，也就是25年前，我不同意列宁的说法，我只说法国革命是小资产阶级革命，而我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必要倒退，又退回到雅各宾党人等等，总之我发挥了如今批评反对派的人一再重复而且冲淡其内容的

绝顶聪明的东西。列宁对18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差别、对无套裤汉与产业工人之间的差别的认识不比我们差，这自不必说，但列宁用一条历史继承性的纽带把雅各宾党人与布尔什维克连到一起则是完全正确的。以热月来类比也具有同样的意义。这样的类比会告诉我们许多东西。热月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革命，这种反革命是分期进行的，它采取了几种方式，初期利用了同一个执政党中的人——通过他们的重新配置和彼此对立。

有那么几个哲人引经据典地说，罗伯斯比尔集团在热月9日的当天还在掌权，并没有成为在野党，这个说法非常可笑。谁也没有说过这两个过程是一码事。如果热月党人不是马上就把罗伯斯比尔集团干掉，而是逐渐地去剥夺它手中的权力，比如说开头只是“狠狠地教训”它一下，那么罗伯斯比尔集团就会变成在野党了。也可以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并不缺少已经完全发育成熟的热月党人，他们要求尽快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这已经是技术问题，而不是过程的政治本质了。

我毫不怀疑，有人会拿我的这些话去作出并公布如下的结论：我国的革命要失败，革命的惟一途径的是热月，我们的党是热月党，社会主义不可能发展，等等，等等。我认为这样的“加工”方法是一个极其恶性的征兆，说明党机关已受到热月党人倾向的影响：那就是解除无产阶级的精神武装，麻痹党，抹煞右派同左派、革命派与机会主义派别之间的思想政治界限、抹煞社会民主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思想政治界限。解除党的理论武装和在政治上麻痹党，为热月党人倾向鸣锣开道。反对派现在和将来都要为反对解除党的武装而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为他们决不认为热月不可避免。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

№07499

季诺维也夫：我们的国际形势与战争危险（摘录）

（1927年7月）

苏联面临帝国主义分子进攻的危险。战争不仅可能发生，而且不可避免。拖延战争的爆发、尽量赢得时间来巩固苏联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这是我们目前一项最重要的实际任务。只有几个决定性国家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制止战争。

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日益临近，其原因在于：（1）资本主义为求得自身巩固而进行的长达几年的斗争及这场斗争的局部胜利，使**市场问题**成为几个关键性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最引人注目问题；（2）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对苏联经济实力的增长确信不疑，他们看到，以对外贸易垄断为防护网的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提供“自由”市场；（3）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用苏联的内部困难搞投机；（4）中国革命的失败以及此前英国的罢工失败使帝国主义者认为他们**可以摧垮苏联**。

英苏外交关系的破裂酝酿已久，然而正是中国革命的失败加速了这个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破裂是因拒绝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对华政策而受到的惩罚。把问题仅仅说成是英苏间贸易形式的改变（“用我们同美国搞贸易的方式来搞贸易”）是完全错误的。现在已经非常清楚，英帝国主义有明确的行动计划。英国是在得到了几个国家的资产阶级赐予的“荣誉委任状”的情况下开始进行反苏战争准备的，它指望以某种方式吸引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

国家，大概还有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匈牙利等国参加反苏战争。

根据各方所面临的情况判断，波兰更倾向于再有一段时间进行反苏战争的准备。但也不排除英国迫使它提前参战。

在法国，英国对反苏统一战线施加压力的做法得到了资产阶级中较有影响的那部分人的支持，这些人越来越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要求和分裂行动。

德国近来的外交政策越是“躲躲闪闪”，人们就看得越清楚，**德国的“定位”**实际上**偏向西方**。德国资产者已经毫不隐讳地说，德国在反苏战争初期可能保持“中立”（像1914年的美国那样），目的是利用战争多多发财，然后再以昂贵的价格向西方帝国主义分子公开出卖自己的中立立场。对苏联根本利益最有害的莫过于将德国资产阶级“定位”偏向西欧一事掩饰起来，因为德国资产阶级对我国发动的突然性打击将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只有公开地“说出事情的真相”，只有唤起苏联工人和**德国工人的警惕性**，才能使我们免遭这一打击，或者至少是使德国资产阶级的打击难以进行。

日本资产阶级在对苏联关系上的手段比德国资产阶级还要高明。他们巧妙地不露声色，佯装“朋友”。他们甚至一度阻拦张作霖夺取中东铁路。但是他们把控制中国的缰绳越绷越紧，而且有可能撤去对苏关系上的伪装。田中政府即使不作反苏战争的主战政府，也肯定会走上敲诈勒索和局部侵占的道路。

在近东（**土耳其、波斯**），我们至少还没有造成帝国主义进攻我国时这两个国家保证严守中立的局面。在我国受到进攻时，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多半会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与我国为敌而为他们效犬马之劳。

一贯与苏联势不两立的美国在帝国主义进攻我国时将成为帝国主义的“后方”，“后方”的意义会因美国可能资助反苏战争而更显得重要。对一些国家的政府（顺便提一下，在德国政府机器的最

重要组成部分——中派党中）都很有影响的天主教教会也在着手组建反苏统一战线。

结论：如果说1923～1925年是我国得到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的承认的时期，那么现在就是一个破裂日益临近的时期。1923～1925年对我国的承认本身并不等于说和平有了保障、喘息能够持久。目前的分裂也并不等于说战争近期已不可避免。至于我们已经进入了国际形势极端尖锐化、有可能进攻苏联的时期，那倒是确定无疑的。

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重重。国际资产阶级很难长期保持反对我国的统一战线。但某几个资产阶级国家在一段时间内搞搞针对我国的局部联合则是完全可能的。

上述种种情况应能促使我们的党：（1）**承认国际形势是危险的；**（2）**重新把国际政策问题提到首要地位；**（3）**全面加强苏联的国防建设，准备应战。**

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会千方百计地向人民隐瞒**帝国主义准备向苏联发动的这场战争的真实性质**。我们的任务是立即向全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讲明，即将爆发的战争是帝国主义者和奴隶主反对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战争，是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为维护整个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而斗争，而苏联是为所有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被奴役国家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为国际革命和社会主义而斗争。

现在我们的各项工作就应在下列口号的指导下进行：（1）打倒帝国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战争。（2）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对苏作战各国的国内战争。（3）对苏作战的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必败——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个真诚的无产者都应为打败“自己”国家政府而积极行动。（4）每个不想做“自己”国家奴隶主的帮凶的外

国士兵都站到红军这边来——苏联是所有劳动者的祖国。（5）“保卫祖国”的口号是掩盖一切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利益的虚伪口号（正在进行反帝民族革命战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除外）。保卫祖国的口号在苏联是正确的，因为我们保卫的是社会主义祖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根据地。（6）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的**“卫国”（列宁语）战争是“保卫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战争，我们的“卫国”战争**“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语）。**我们**所说的保卫祖国即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战争是由工人和以贫农为支柱的雇农与其同盟者——中农进行的、旨在反对“自己的”富农、“新”资产者、官僚、乌斯特里亚洛夫式的专家和白色流亡分子的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真正的正义战争。谁不是保卫苏联的护国派，他肯定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叛徒。

……

*　　*　　*

布尔什维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世界大战和我国革命开创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的党”已经建立。对此表示承认的有关内容写进了“二十一条”，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独立党人”和形形色色的孟什维克分子首先是根据这一方针来划清界限的。

承认战争和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革命的时代，自然决不是说每时每刻都具备直接的革命形势。“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语）尚有可能在某些时期、在某些国家和某些生产领域局部地恢复经济，甚至发展生产力。世界革命时代既包括高涨时期也包括低落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战斗力、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程度和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在这方面起重大的作用。然而高潮低潮都改变不了

列宁对目前整个历史时期所作的基本评价。只有这个评价才能成为共产国际的革命战略的基础。

但是，由于国际革命运动屡遭败绩和因此而滋长的低落情绪，斯大林集团在自己也未觉察的情况下对目前的时代作出了全新的评价。一国社会主义的全套“理论”即是根据资本主义的“稳定”可能继续几十年的假设提出的。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报告通过的决议错误地提出：“在国际关系方面，‘喘息时机’正在巩固和扩大，它已经变成……整个一个时期”。①

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在1926年12月7日的报告中）就是根据十四大决议对国际形势的这个评价制定了共产国际的整个政策②。现在已经可以看出，这个评价（与奥托·鲍维尔、鲁道夫·希法亭和其他社会民主党领袖的评价基本一致）显然是错误的。

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算起又是一年半多的时间过去了。这段时间内发生的事件，择其要者有英国的全国性罢工、中国革命的重大事变和维也纳的工人起义。上述事件都以不可阻挡之势发生在目前的“稳定”条件下。是对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当头一棒。

稳定的不好的一面是2000万人失业、生产企业严重开工不足、疯狂扩充军备和国际经济联系极端不稳固。西欧面临的新的战争危险最彻底地暴露了对持久的和平时期的希望很靠不住，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毫无根据。保持“整十年”的稳定是被资本主义战胜工人所取得的“胜利”和资本主义在技术、经济和政治上的成就搞得头晕目眩的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然而，现实正朝着战争方向，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75页。

② 参看《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第321页。

即打破任何“稳定”的方向发展。东方的工人阶级和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地试图用武力破坏这种“稳定”，他们时而在英国，时而在中国，时而在维也纳举行发动。英国爆发了全国性罢工——英国共产党总共才有5000名党员！维也纳工人起义的牺牲人数几乎相当于整个革命过程中的牺牲人数——奥地利共产党总共才有6000名党员！中国的工农群众正处在大发动之中——**而中共的中央委员会正在变为国民党内的资产阶级上层的附庸**。这就是目前国际形势中存在的尖锐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稳定”就是靠这种矛盾来维持和延长的。

目前最大的任务就是帮助共产党达到当今时代迫切要求其达到的水平。这是共产国际正确认识国际形势特点的前提。

我们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共产国际）应为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团结全世界的工人阶级**为制止战争，为捍卫苏联，**为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战争**而斗争**。为此，工人共产党人首先应当争取怀有革命情绪的非党工人——非党人士、社会民主党人、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或已加入资产阶级组织的工人。“所谓工人统一战线，应该理解为一切愿意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的统一，其中当然也包括还跟着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这类人走的工人。在罗曼语系国家里，这样的工人数量还相当大。”[①]列宁生前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是这样说的。这个决议直到现在仍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国际领导集团直到现在还像1914～1918年那样无耻地从事叛卖活动。保罗－彭吉尔（法国）奉行的准则是在战争时期预先向资产阶级独裁者集团出卖工人及其领袖人物。总理事会（英国）袒护杀害沃伊柯夫的凶手并赞成向中国派遣

① 参看《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1册，第432页。

军队。考茨基（德国）正在策动反对俄国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起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正在组织“红色运动”。芬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部长以及波兰社会党领导人“时刻准备”支持反苏战争。美国官方工会领袖公开当资产阶级的走狗，他们甚至反对承认苏联。巴尔干的“社会党人”支持屠杀“自己”工人的刽子手并一贯支持征伐“异邦的”苏联的军事行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口头上“支持苏联”，可是那些帮助“自己的”法西斯分子将维也纳起义淹没在工人的血泊中的人在关键时刻当然会支持资本家。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仅仅在没有强大的武装干涉者时才反对对苏联进行武装干涉。毫无疑问，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在战争关头将扮演比1914～1918年还要反动的角色。掩盖社会民主党反革命本质的所谓“左翼”社会民主党领袖是目前的主要危险，因为他们大大妨碍了目前还在追随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与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言人一刀两断。随着战争的日益临近，再同这些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上层（各种色彩的上层——从公开的右派到所谓的“左派”）保持暧昧关系就是特别危险的事情。绝不能把统一战线策略解释为同搞叛卖活动的总理事会结盟和向阿姆斯特丹靠拢；因为这样的解释会使工人阶级迷失方向，会提高真正的叛徒的威信并妨碍最大限度地团结我们自己的力量。

斯大林提出的“向左开火”的错误方针的结果是排除了几个左派集团的工作和将其开除出共产国际。这个带有欺骗性的方针在近1～2年里违背工人共产党员的意愿，使共产国际最重要部门的主要领导权落入右派之手（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英国）。

由于目前所处的困难时期，也由于联共（布）内的危机，正在对共产国际各领导部门的个人和集团进行审查。

部分原共产国际委员（卡茨、罗森贝格和科尔什）已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

以消灭共产国际内的全部左派为目标的右翼集团领导人的政策正在削弱共产国际的力量并孕育着一种极大的危险。

被排挤出共产国际的工人革命分子遭到右派的恶毒攻击，他们自己也未能始终坚持在允许的限度内开展批评，像第4个集团那样，这个集团正在捍卫、而且在出现现实危险时也将彻底捍卫苏联的利益，工人革命分子承认，现存分歧如能在自由讨论基础上、通过统一的政党内的正常途径被消除（像列宁在世时那样），分歧无疑就不会存在。

日益临近的战争要求所有能够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为苏联的事业、为国际工人阶级的事业而奋斗到底的力量在共产国际的旗帜下实现大团结。眼下就必须采取坚决而真诚的措施，以便让那些被共产国际开除，但承认共产国际所有五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的同志们回到国际中来，以便贯彻执行真正的列宁路线，改正右派和极右派的错误，保持共产国际的组织统一。

*　　*　　*

1．首先必须完整地充分地重申并加强国际革命的方针，坚决反击“稳定的”假装“从国家的利益考虑”的情绪，诸如根本不该“插手中国”、应“赶快离开中国”、如果我们“理智”行事“我们就可以得到安宁”等等。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在目前有直接的腐蚀作用，明显地妨碍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在苏联周围——因为这种理论正在迷惑其他国家的工人，使之不能敏锐地认识面临的危险。

某些自诩为“现实的政治家”和英明的“国务活动家”的同志被英俄关系破裂和国内困难吓破了胆，他们琢磨出这样一个“方案”：（1）承认债务；（2）在一定程度上取消对外贸易垄断；（3）“离开中国”，即拒绝支持中国革命和整个国民革命运动；（4）在国内采取一种右的“手腕”，进一步扩大新经济政策的范围。希望以此为代价消灭战

争危险、改善苏联的国际地位并消除（或减轻）国内的困难。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所谓资本主义可稳定几十年的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的。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什么“手腕”，在目前形势下这就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彻底投降，意味着这个政权正通过“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新的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倒退。

帝国主义分子会接受所有让步，并更加迅速地转入新的猛攻，直至发动战争。富农、耐普曼和官僚注意到这些让步后便会更加顽强地组织一切反苏维埃势力对付我党。如果我们采取这样的“手腕”就等于把我国的新生资产阶级和外国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苏联的经济发展就会受到国际资本的全面控制：贷给你几个小钱，却把大数盘剥走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基本群众就会不相信苏维埃政权的强大，不相信苏维埃政权真的知道它正在将人民引向何处。

我们应当设法“避开”战争，如果可能的话。然而正是为了这一点我们才应当强大、统一，坚定地捍卫世界革命策略、巩固共产国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以不致断送苏维埃政权的代价尽量拖延战争的爆发，才有可能在战争不可避免时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并在战争中获胜。

列宁曾在经济方面向帝国主义分子作过一定的让步，目的是避免战争或者在能够接受的条件下吸引外资。但是列宁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甚至是在最困难的时刻都从未想过取消对外贸易垄断、将政治权力拱手让给资产阶级、放松对世界革命的支持和放松世界革命的总策略。

2. 另一项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任务是团结我党的队伍，让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领袖无法利用我们的分裂、利用某些人的脱党和“被驱除”等明目张胆地搞投机活动。这项任务与战争问题直接相关，因为帝国主义分子目前主要是以我们在战争问题上的情绪倾向与政策为线索“揣摸”我们。现在国际资产阶级

原书缺页

联盟中就无异于为第二国际的反革命领袖效力。

4. 必须坚决调整我们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路线，首先是在中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中的路线，必须停止执行马尔丁诺夫—斯大林—布哈林的路线，回到列宁的路线和共产国际第二、四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上来。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从民族革命运动的动力变为阻力，东方的工人和农民也必然从此不再同情我们。

5. 必须始终不渝地、有条不紊地、坚韧不拔地为争取和平而斗争。制止战争、推迟战争、“避开”战争——这就是为争取和平而能够做允许做（见第1条）和必须做的一切。另一方面我们现在就要毫不懈怠地着手备战，当务之急是结束思想政治上的分歧，停止在战争危险是否临近的问题上纷争。

6. 坚决调整我们在内政方面的阶级路线。假如战争不可避免，只有布尔什维克的严谨的路线——工人和雇农以贫农为支柱与经济力量薄弱的中农结成联盟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路线能够获胜。

7. 千方百计地从整个经济和预算方面作好应战准备。

*　　*　　*

资本主义正在步入一个新的动荡时期。反苏战争同反华战争一样，会给国际资本主义带来一系列灾难。1914～1918年的战争就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强大“加速器”（列宁语）。新的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如果我们能执行正确的政策，苏联会博得全球劳动者的同情）也会变成加速国际资本主义灭亡的更加强大的“加速器”。不爆发新的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也会发展。但是新的战争必将引起社会主义革命。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7月］

№07500

托洛茨基就党内状况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7 年 7 月 26 日）

现附上对评价党内目前状况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来往信件数封。我想您自己会采取措施对此事展开调查。

附：卡涅夫斯基 7 月 23 日的信。

托洛茨基同志 7 月 25 日和 16 日的信。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7 月 26 日

附件 1：

卡涅夫斯基致托洛茨基

（1927 年 7 月 23 日）

副本

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只得又一次在未收到回信的情况下给您写信了。区党委已得知您 1927 年 7 月 16 日给我的回信（经过非党邮递员之手）。昨晚几个熟人（其中一位是区党委的常委）到休养所来说，区党委知道我接到了您的信，认为我积极参与了反对派活动，并以开除团籍相威胁，要我把您的来信交给区党委。区党委要求我后天去监察委员

会接受质询。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在去监察委员会之前，我想同您解决来信的问题。我认为，来信问题未同您商定就把您的来信交回区党委的做法是不诚实的。因此恳请您回答我，来信交不交出去？我认为区党委对此问题的整个提法没有必要保密。联共党按照对党极其有害的错误路线干出了许多不成体统的事情，以断绝通信来往和开除团籍相威胁，是说明这条路线的又一事例。

我已对区党委的代表声明，我不会由于他们的威胁而停止通信联系（当然，如果您同意继续保持这种联系的话，这也是我对您的恳求），在接到您的回音前我不会对来信一事作公开回答。务请尽快回复。如我提出的以上问题能得到答复，将不胜感激。

尊敬您的　A. 卡涅夫斯基

1927年7月23日

回信请寄：卢布内，区执行委员会，地方委员会卡涅夫斯基收

附件2：

托洛茨基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

（1927年7月25日）

星期天的《真理报》刊登了马列茨基的文章，对我们向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所作的解释提出了反驳。于是在愈来愈严重的瓦解党的道路上迈出了新一步：竟围绕本不该受检查的文件和发言展开了争论。列宁在谈到党内争论时曾说过："谁相信空话，他就是白痴。"对这个问题中央监察委员会是怎么看的呢？我们的制度竟允许这个既不是中央委员、又不是中央监察委员的马列茨基，随心所

欲地利用我们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秘密会议上所作的解释，把针对我们的不成体统的运动继续进行下去并使之更加激烈，对这样的制度中央监察委员会该作如何评价呢？

“谁相信空话，他就是白痴。”为使党员能够验证马列茨基等人的捏造，我们认为惟一的办法是请求允许我们以出版单行本的形式公布我们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下属委员会和主席团面前的证词。

不必说，我们保留利用手中的文件向每个党员说明马列茨基等人所言都是造谣的权利。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7 月 25 日

附件 3：

托洛茨基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

尊敬的同志们：

对你们的第 65/K－12 号质询我可作如下答复：

想必你们指的是那位一条腿跛得很厉害的沃罗宁同志吧？如果是这个人，我还记得相当清楚。是罗森霍尔茨将沃罗宁同志吸收到法庭的军事工作中来的，他对沃罗宁那段时间的工作应该更了解。沃罗宁同志当时工作很勤勉，不过与其说表现得像党员，倒不如说像个官吏。这是在南方面军时的情况。沃罗宁调到列宁格勒军区时在内部关系方面已应付自如，并且开始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很大的主动性，凡是了解他在南方面军是个举止谨小慎微的官吏的人往往因此感到吃惊。沃罗宁同他的整个举止总是让我感到可憎。他虚报党龄这件事完全符合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我根本不记得我同他谈

过什么党龄问题。我不敢说绝无此类谈话——不可能什么全记得，假定沃罗宁同志当时把他虚报党龄一事说成偶然错误，那就更难说了。不过，从我同沃罗宁同志的关系的整个情况来看，我认为他不会与我“探讨”这样的问题。另外，我认为沃罗宁同志如果当时这样表白，那就会使我最终坚信：此人与党离心离德，不能信任。

列·托洛茨基

1927年7月16日

№07504

斯米尔诺夫等向中央全会提出的申诉

（1927 年 7 月 29 日）

6 月 27 日我们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是我们为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准备的纲领性材料。

我们在声明中曾表示，相信我们的文件可传达到党员群众，相信我们有可能在全会上捍卫自己的观点。

但是政治局却认为可以在不公布我们的文件的情况下允许在党的刊物上发表 10 来篇攻击我们的文章，在全体工人阶级面前对我们提出骇人听闻的指责，以政治诽谤作为主要攻击武器，把与我们的真正观点毫无共同之处的东西硬说成是我们的观点。党的刊物不刊登我们的反驳文章。

对我们提出的出席中央全会的要求至今未作任何答复。

因此我们不得不向你们，向中央全会申诉。

你们的日程表上明文写着党的代表大会和反对派的言行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认为，对我们的文件和文章不予刊登是对一批党员实行粗暴的强暴行为。

不允许我们出席全会同样也是一种强暴行为。此外也表示已与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传统公然决裂，我党曾靠这种传统不止一次地克服党内分歧。仅举一例即可说明：1920 年莫斯科组织内出现了几股反对派，反对派的代表在列宁的提议下应邀出席了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这些同志的意见，只是在此之后才认为可以作出决议。1923 年的情况也是如此，由“46 人”组成的代表团也应邀出

席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在中央委员会内的多数派与反对派之间的分歧达到极端尖锐的程度时候，与列宁主义的党的领导传统决裂的行为怎么也不能认为是恰当的。

这同时也是一种公然破坏党章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行为，党章和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保证每个党员都“能够影响党的政策的方向”。

从客观上看，政治局最近几个月来的所作所为表明它在执行分裂党的路线。政治局本该尽一切可能来克服分歧，本该保证全体党员都看到双方的真正文件，本该承认党员群众是解决有争议问题的惟一评判人，政治局没有这样做，却背着党与斯列普科夫的诽谤一唱一和，执行消灭党内反对派的路线。

我们认为，中央全会应当对政治局执行的分裂路线给予反击。我们要求中央全会公布我们的文件并在党的刊物上刊载我们的文章。我们认为允许我们出席中央全会是我们最起码的权利。

我们认为，中央没有理由不接受我们的这些要求。

斯米尔诺夫

扎瓦里扬

米诺

奥博林

斯利多夫克尔

叶梅利亚诺夫（卡林）

明科夫

杜内

霍列奇科

1927年7月29日

№07505

托洛茨基就枪毙逃兵问题致奥尔忠尼启则

（1927 年 8 月 1 日）

未发出

尊敬的同志：

您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就雅罗斯拉夫斯基所谓枪杀共产党人的提法说过大致内容如下的一段话：“这种提法不合适。托洛茨基同志受党的委托做了革命利益要求他做的事。枪毙了逃兵。换了我，我也会这样做的。”这是大意。在今天的会议上您又针对我就枪杀共产党人问题所作的辩驳说：“我的意见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都谈过了，我也不想收回我说的话。”可是，6 月 24 日的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第 33 页只记录了您对米雅斯尼科夫问题的意见，却漏掉了您讲到枪毙逃兵和换了您您也会这样做等较为重要的部分。这该作何解释呢？我对您无意收回自己在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这点毫不怀疑。不过是谁、因为什么要把您的话从速记记录中删掉呢？如果可能的话，请您在今天晚间的会议上再作个答复。相信您会明白这个问题有多么尖锐和重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8 月 1 日

№07506

托洛茨基论战争危险和国防政策

——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会上的发言（摘录）

（1927年8月1日）

托洛茨基：同志们，首先我要拒绝一种荒诞无稽的说法……

李可夫：您要讲多长时间？

插话：15分钟（笑声）。

托洛茨基：45分钟吧。

李可夫：托洛茨基要求讲45分钟。

插话：给他半小时。

李可夫：没有反对意见，45分钟。

托洛茨基：由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涉及面太广，我只提纲挈领地谈。我得从与我本人有关的问题谈起：我要拒绝一种荒诞的说法，说什么我否定资产阶级国家的失败主义政策，特别是其在反苏斗争中的失败主义政策。政治局的提纲有意重提早已消除的分歧，加以渲染并歪曲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那是帝国主义战争期间我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几个问题上的分歧，是我错了。与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等人现在对列宁的背离相比，我当时在这些问题上对列宁的背离（我把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季诺维也夫：说得太对了。（笑声）

托洛茨基：提纲硬说，反对派在有关战争和“失败主义”问题

上有一条托洛茨基主义方针，又是一则谣言！你们提纲中的第13条通篇都是这样的无稽之谈，就反对派这个整体而言，它同列宁之间在这个问题上非常次要的分歧不应负任何责任。至于我个人，这里我可以就这些无耻谰言作个简单答复。还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我就曾以第一届人民委员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就战争和反战问题起草了告国际无产阶级书。我撰写了我党党纲的军事部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主要军事决议和几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有以相当的篇幅阐述了战争问题的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也以大量篇幅对战争、战争的后果及未来军事前景作了评价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性宣言。我起草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纲中关于国际形势及革命和战争的前景问题部分。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我受中央委托作了关于国际革命和战争前景的报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1924年），我撰写了有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十周年的宣言。中央委员会从未因上述文件而产生过分歧，这些文件不但毫无争议，而且未作修改即获通过。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在共产国际相当紧张的工作中我的“倾向”从未反映出来！原来，当我1926年批驳莫洛托夫为英国工人提出的“经济失败主义论”这一文理不通的荒谬口号时，似乎就与列宁分道扬镳了。为什么莫洛托夫在我提出批评之后把自己的荒谬口号藏进口袋了呢？

莫洛托夫：当时没有任何口号。

托洛茨基：照我说也不是什么口号，而是胡言乱语。我现在说的也正是这种胡言乱语。（笑声）

席上插话：胡言乱语也值得一提？

托洛茨基：为什么非要去夸大那些旧的、而且是早已消除了的分歧呢？为了什么？为的是掩盖和粉饰目前确实存在的现实分歧，难道可以一面严肃地提出反战的革命斗争和真正地捍卫苏联这一问

题，一面又执行英俄委员会的方针吗？工人群众在战争过程中举行全国性罢工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和与普塞尔、希克斯等叛徒结盟的方针可以同时存在吗？我不禁要问，我们要坚持的护国主义究竟是布尔什维克的护国主义还是工联主义的护国主义？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这里首先要谈谈现任领导人近一年来在这方面给予莫斯科无产阶级的教诲。这个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我现在逐字逐句地谈一谈莫斯科委员会的指示：**“英俄委员会能够、应当、而且无疑会在反对针对苏联的各种武装干涉行为的斗争中发挥巨大作用。它（英俄委员会！）将成为组织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同国际资产阶级妄图挑起新的战争的一切企图作斗争的组织中心。”**我再逐字逐句地谈一谈为总结联共（布）中央七月全会而准备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都是针对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这两个人正是由于不理解英俄委员会在同……武装干涉行为的斗争中的巨大作用才被指责为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莫洛托夫刚才说：“我们通过英俄委员会瓦解了阿姆斯特丹国际。”这就说明莫洛托夫直到现在还一点不明白。你瓦解的是莫斯科乃至全世界的工人，在区分敌我的问题上欺骗了他们。

斯克雷普尼克：注意腔调！

托洛茨基：腔调是根据问题的严重性确定的。你们团结了阿姆斯特丹国际，却削弱了自己。总理事会现在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齐心协力——反对我们！

但是应当承认，与布哈林那不切实的鬼把戏相比，上面读过的莫斯科委员会的丢脸的指示倒是更全面、更清楚、更真诚地反映了赞成保留英俄委员会的那些人的真实观点。莫斯科委员会给予莫斯科工人的教诲和政治局给予全苏联的工人的教诲即是，一旦出现战争危险可以去抓英俄委员会这根救命绳索。从政治上看问题就是这

样。然而这根绳索已腐朽不堪。星期六的《真理报》社论谈到了由总理事会的“叛徒组成的统一战线”。就连阿尔图尔·库克，托姆斯基钟爱的韦尼阿明都保持了沉默。《真理报》感叹地说这是“莫名其妙的沉默！”“莫名其妙”这句话已经是你们惯用的腔调了，你们开始时把赌注押在蒋介石集团，不，是押在普塞尔和希克斯身上，尔后又把希望寄托在“可信赖的”汪精卫，阿尔图尔·库克的身上，然而库克叛变了，汪精卫也叛变了，那是在布哈林将他列入可信赖者行列的两天之后的事情。我们把少数派的运动交给了总理事会的先生们及其头目，因为我们也不能够而且不愿意让真正的革命者在这样的运动中与乔装打扮的改良派进行较量。我们为了抓到一根虽然粗大、但腐朽不堪的绳索而撇开了虽然细小却很结实的绳索。当你通过一座既窄小又不结实的小桥时，一个虽小但却结实的支撑物就可能成为您的救命之物。可是如果你抓住的是一个腐朽的支撑物，那可就倒霉了，支撑物一倒你就肯定摔下去。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在国际范围内抓住腐朽支撑物的政策。我们曾先后抓住过蒋介石、冯玉祥、唐生智、汪精卫、普塞尔、希克斯和库克等几根绳索。但是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它们都断裂了。我们像《真理报》社论就库克一事一样先说个“莫名其妙”，第二天再补上一句“这并没有出乎我们的预料”。①

关于“中派主义”和腐朽绳索政策

反对派曾警告说中共在你们的指导下必定奉行孟什维主义政策，反对派当时还为此而遭到无情揭露。我们现在还要胸有成竹地警告说，英国共产党在你们强加给它的政策的影响下必将受到中派

① 以下删去“中国的情况如何？”一节。

主义和妥协派的毒害。如果你们不改弦更张，那么给英国共产党造成的后果就不会比给中共造成的后果好。整个共产国际的情况也是如此。

时到如今应该明白，布哈林－斯大林中派主义是经不起事变考验的。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变即是革命和战争。通过中国革命我们对中派主义政策已经有所领教。革命的要求是，从模棱两可的指示中得出完整的结论。中共不得不做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也是中共滑向（也不可能不滑向）孟什维主义的原因所在。你们的指导在中国遭到的空前失败，要求你们最终放弃那种使你们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只得抓住腐朽的绳索的政策。

革命之后的最重大的历史考验便是战争。我们得先说清楚：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半吞半吐、转弯抹角的迂回政策在战时事变中不会有立足之地。这一点也适用于共产国际的各位领导。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现在所面临的惟一考试就是：他们是否日夜准备投票反对“托洛茨基主义”？战争则将对他们提出重要得多的要求。然而，对国民党和英俄委员会所采取的政策显然使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阿姆斯特丹和社会民主党的上层人物身上。无论怎样兜圈子，英俄委员会的路线就是寄希望于阿姆斯特丹官僚的腐朽绳索的路线，总理事会现在是其中最坏的一部分。你们的这种政策不仅使中共内部蓄积了马尔丁诺夫思潮而且使共产国际内部蓄积了普塞尔思潮。一旦爆发战争你们就会接二连三地撞上“意想不到的事情”。腐朽的绳索就会在你们的手中断裂。战争将使目前的共产国际的上层人物产生严重的分化。某一部分人会转向阿姆斯特丹的立场，其口号是：“我们希望认真地捍卫苏联，我们不想成为一小撮狂热分子”。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反对阿姆斯特丹国际，因为他们是失败主义者。这是布哈林推导出的结论！另一部分西欧共产党人则坚信大多数会采取我们所捍卫的列宁的立场，李卜克内西的立场。斯大林的中间

立场不会有立足之地。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问心无愧地对你们说，关于一小撮反对派和光杆将军等说法在我们看来简直滑稽可笑。类似的种种说法布尔什维克派不止一次地听到过，1914 年听到过，1917 年也听到过。我们对明天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并且正在为明天的事作准备。反对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信自己的正确，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团结一致。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完全正确！

托洛茨基：在对内政策方面搞中派主义的缓冲在战争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各种争立党将会更多，阶级矛盾必将变得十分尖锐，我们不得不作出清楚而准确的回答。

我们在战争时期是否需要“革命的统一”或者“神圣的统一”？资产阶级为战争和军事危险时期臆造出名为“内部休战”或“神圣的统一”这样一种特殊的政治局面。这一纯粹的资产阶级概念的含义是：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分歧和争吵，以及各政党内部的分歧在战争期间均告止息，其目的是更加巧妙地蒙蔽和欺骗群众。所谓“神圣的统一”是管理者对被管理者的阴谋的最高形式。无须赘言，既然我们党在和平时期对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无可隐瞒，那么战争时期就更该如此了，此时的政治路线的纯洁和清晰以及与群众联系的深度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之所以要在国内战争的高潮中，在我们党的集中化程度比任何资产阶级政党都严重得多的情况下，还通过异常尖锐的讨论，通过党内民主途径来解决政治领导的所有基本问题，其原因也正在这里。这是一笔必须支付的附加费用，党靠这笔费用制定和加强了正确的路线，巩固了党内的革命统一。现在有些同志，确切地说是昨天有些同志认为，列宁逝世后我们党的领导人的绝对正确同样完全有保障，无须再受党的检验。我们的看法则正相反：现在比我党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党的领导人进行检验与更换。我们需要的不是口是

心非的“神圣的统一”，而是真正的革命统一！

骑墙的中派主义政策在战争时期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它不是向右转，就是向左转，也就是说，不是走热月道路，就是走反对派道路。（喧哗声）

通过热月道路能在战争中取胜吗？一般说来，可能取胜。首先会取缔对外贸易垄断。允许富农成倍地出口成倍地进口。让富农压制中农。让贫农认识到，绕开富农便没有出路。扩大和巩固官僚及行政长官的影响，把工人的要求当做“行会习气”抛弃掉。从政治上排挤苏维埃中的工人，恢复去年的选举条例并使之逐步扩展以适应私有主的需要。这就是所谓的热月道路。我们给他取的名字叫做“分期式的资本主义”。到那个时候，由富农组成的下级军官班子和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高级军官班子就会成为军队的统帅力量。照这条道路走下去的军事上的胜利就将意味着向资产阶级轨道的加速推进。

走革命无产阶级的道路是否可能取胜呢？有可能，岂止是有可能。整个世界的局势都说明，在战争条件下，走这条道路最有把握取胜。但是为此必须首先驱散政治上的迷雾，在政治迷雾的笼罩下，所有的猫看上去都是灰色的。富农在右边，他们是敌人；雇农和贫农在左边，他们是朋友。接近中农则要通过贫农。要创造一种政治局面，使资产阶级和官僚不能一边数落着“这可不是1918年”，一边用胳膊肘推开工人。要使工人阶级能说：“1927年我不仅比1918年吃得饱，而且在政治上真正成了国家的主人。”走这条道路不仅可能取胜，而且取胜的把握最大，因为只有坚持这条道路我们才能得到波兰、罗马尼亚和整个欧洲的下层人民群众的支持……

斯大林的中派主义方针能带来胜利吗？这个方针在两个阵营之间摇来摆去，开始时答应亲切对待富农、收养他们的儿子、疼爱他

们的孙子，后来又犹犹豫豫地转向组建贫农团，年年修改选举条例即苏维埃宪法，起初倾向富农，后来反对富农，再后来又支持他们，在北高加索就是这样；这是一种依赖蒋介石和汪精卫、依赖普塞尔和库克、依赖有叛卖行为的上层人物而在下层制造混乱的方针。（这一方针迫使我们的政治局接受了1926年10月29日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指示，要求不把国内战争引入中国农村，不把同路人或资产阶级、地主和将军、所谓的自由派推开，或者是另外一条要求自由派资产阶级最低限度地（!!!）武装工人的指示。）这一方针激怒了一些人或者说使之变得很冷漠，又没有征服另一些人的心，丢掉了汪精卫这个“朋友”，还在共产党人中制造了混乱。这个方针意味着始终抓住腐朽的绳索。

这样的方针在和平时期还可能存在一段时间。在战争和革命的条件下，中派总要发生或者向左或者向右的剧烈倾斜。它已经分解成了左右两翼，这左右两翼必然不断壮大而使中派日渐缩小。这一过程的进展肯定要加快，战争一旦被强加在我们头上，它会使这一过程变得激烈起来。斯大林的中派必然逐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党就会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反对派的帮助……

巴布什金：现在就不需要帮助了吗？（喧哗声）

托洛茨基：帮助党拨正路线，同时又不破坏革命的统一，不滥用党的基本财富——干部。因为绝大多数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在政策正确、路线明确的情况下，在要求绝对服从的外部条件下都会更新政策，并且凭良心采取真正的坚定的革命方针。我们想做到的就是这个，也仅仅是这个。我们要同那些散布关于有条件的护国主义和两个政党的谎言的诽谤者，同散布关于起义的谎言的诽谤者进行当面对质！

反对派坐席上插话：说得对！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批评会不会降低苏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

威信？（插话听不清）我不能替插话人负责。

这并不是我们对问题的提法。这是教堂里的神父或身居高位的将军对威信问题的提法。天主教就要求其教徒无条件地承认教会的权威性。革命者则是又支持又批评，而且实际上他们的批评权愈是无可争议，他们就会愈加忠诚地为他们亲自参与建设和巩固的事业进行斗争。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当然有可能降低斯大林的虚假威信的“无可争辩性”。然而，革命和共和国不是靠这种东西来支撑的。公开地批评和切实地改正错误将向全世界无产阶级展示我们的制度的内在力量，我们的制度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都能找到正确进行的内部保证。从这个意义上讲，反对派的批评——这种批评已经开始产生的和将要产生的更大的结果，归根结底提高了十月革命的威信，巩固这种威信，靠的是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信任，而不是盲目信任，并从而提高了我国在国际范围内的国防能力。

政治局的决议草案写道：

“准备反苏战争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胜利的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在扩大的基础上的再现。”①

这话对吗？毫无疑问。甚至提这样的问题本身都很荒唐。可是决议又补充说：“任何同我们党内反对派一样的人都对战争的这一性质抱有怀疑……”等等。反对派对战争的一般阶级含义抱有怀疑？一派胡言！并不怀疑。丝毫也不怀疑。只有那些自己糊涂透顶也想把别人搞糊涂的人才会作与此相反的断言。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大家都认同的这种一般阶级含义掩盖了种种错误和种种蜕变行为呢？不是这个意思。也掩盖不了。如果事先就一劳永逸地认为当前的领导层是惟一可以想象的领导层，是天生的领导层……

斯克雷普尼克：即使不是天生的领导集团，也是自然而然的领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273页。

导层。

托洛茨基：那么对错误的领导集团的任何批评都是对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否定，都是煽动起义了！然而这种观点不过是对党的否定。一旦爆发战争党就只能起一种捍卫作用，至于说如何捍卫，那得听别人指挥。

我再简单明确地重复一遍：我们反对派是否对捍卫社会主义祖国持怀疑态度呢？绝对没有。我们不仅希望捍卫祖国，而且还希望教会别人一点什么东西。我们是否对斯大林制定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正确路线的能力抱有怀疑？是怀疑，而且是非常怀疑。

斯大林不久前在《真理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难道反对派会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进行的未来搏斗中取胜吗？”请允许我重复一遍：“难道反对派会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进行的未来搏斗中取胜吗？”且不说这个问题本身有多么无耻。也不想回过头去谈列宁对斯大林的手法所作的经过斟酌的鉴定：粗暴和不忠。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的提法，并对此作出回答。“反对苏联在与帝国主义的未来搏斗中取胜”的只能是白卫分子。反对派支持苏联取胜，它以并不比别人逊色的行动证明了并必将证明这一点。然而对于斯大林来说，问题并不在这里。斯大林实际上指的是另外一个他不能说出来的问题。那就是：“难道反对派认为斯大林领导集团不能保证苏联取胜？”是的，我们是这样认为的。

季诺维也夫：说得对。

托洛茨基：反对派认为斯大林领导集团正在给取胜制造困难。

莫洛托夫：那么党是干什么的？

托洛茨基：党受到你们的压制。反对派认为，斯大林领导集团正在给取胜制造困难。反对派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可以下这样的断言。事变的发展与反对派的警告惊人地相似。应当改变政策，不要坐等灾难性的内部的检验到来。反对派对全党说，应当改变政策，

不要像中国那样坐等灾难性的内部检验。每一个反对派，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反对派而不是冒牌的反对派，都会在战争爆发时在党指派的前线或后方的一个岗位上工作，并自始至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然而任何一个反对派都不会在战争前夜或战争期间放弃为修正党的方针而斗争（党内一贯如此）的权利和义务，因为这种斗争是保证取胜的最重要条件。我来归纳一下：要不要为捍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战？要！要不要为捍卫斯大林的方针而战！不要！我们希望党能够改正那些已经导致了巨大失败的触目惊心的错误，公开地修正斯大林的方针。

插话：应当修正的是你。

斯克雷普克：党没有给你这么大的权利。

托洛茨基：党给了我作为一个中央委员向中央讲真话的权利。

斯克雷普尼克：但是没让你胡来。

席上插话：你是派别集团的全权代表。

稳定与群众的左倾

托洛茨基：《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草案》立论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在纯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都趋于巩固的事实”。另一方面决议又谈到：“西欧无产阶级中的基本过程是左倾的过程”，而且这一思想好像是针对反对派提出的。提纲在这个问题上也和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地混乱。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确已走出了那种不是如1920年在意大利、1923年在德国那样不是完全放手，就是屠杀工人、不断破坏生产力的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共产党的软弱，另一方面是由于领导集团的错误，资本主义在经历异常尖锐的战后危机之后找到了为争取自身巩固和发展而进行内外部斗争的办法。正是这种斗争反映在各阶级间的冲突的加剧和世界范围内的种种摩擦的加剧上，

这种斗争中蕴含了愈来愈多的阶级冲突、军事冲突和动荡。这就是发展的一般战略路线。整个时代仍然是社会革命的时代。正因为如此，巨大历史范围内的群众左倾过程就必然发生并表现为地下的震荡和直接的、冲破普塞尔主义和奥托－鲍威尔主义等地壳的火山爆发。

但是在当代的可说是基本战略曲线中有其策略的转弯、倾斜和洼坑，有时是很深的洼坑。德国无产阶级在1923年遭到的失败，不管其原因如何，都是导致主要是无产阶级上层人物的革命水平暂时下降的原因所在，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削弱共产党来加强了社会民主派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最近在整个欧洲所看到的情况，在共产党内也是右翼比左翼占有暂时性优势，这又是西方多数政党的共同点。

工人贵族、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在这几个时期的作用特别大，也特别反动。在这一国际过程中掌权的联共党也不例外。错误的制度还挫伤了工人的积极性。

席上插话：说的太过分了。

托洛茨基：错误的制度妨碍工人迅速了解失败的原因并消除失败造成的后果。右翼利用强大的机关一个劲儿地攻击左翼，并运用机械手段使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不利于左翼的改变。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才使左翼反对派近来愈来愈无法对共产国际、联共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而那些在十月革命后还在敌人营垒里后来显然是作为考验对象准许进入共产国际队伍的右派分子、半社会民主主义分子却能愈来愈多地代表共产国际慷慨陈词。在这段时间里，群众中积聚着新的左倾的因素，即新的革命高潮的因素，这个高潮或迟或早总会到来。反对派正在为迎接这一天的到来进行理论上和政治上准备。

*　　*　　*

简单谈谈军队问题。一个国家的防务是全部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结合。但是有一种特殊的、直接防御工具，这就是军队。这一工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军事领域是一个最尖锐地反映制度的强大方面和薄弱方面，所有政治变动、政治错误和失误的领域。同时在这个领域内比其他任何领域都更容易被表面现象、外观形象和流言蜚语所蒙蔽。通过军队来对制度进行检验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这方面最好是多一点批评，少一点善良的信赖。最近，几位军事工作者在可能发现的战争威胁的影响下就我国武装力量的状况交换了意见。

斯克雷普尼克：噢，连军事会议都开过了。

托洛茨基：这些人当中有陆海军检查员穆拉洛夫同志、因持反对派观点被解职的集团军司令普特纳同志和普里马科夫同志，还有姆拉奇科夫斯基同志和巴卡耶夫同志。他们当中每一个人都忠于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并不比在座的任何一位逊色。他们讨论的结果写成了文件，文件中有为提高军队的革命水平和战斗力所必须作出改变的计划。这一文件我已通过李可夫同志给中央政治局送去一份。

这份文件以批判、求实的态度谈到了有关红军建设的所有问题。我们没有打算在联席全会上宣读这个文件，并不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该在中央委员会内进行讨论，这是有关党和革命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因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不想为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及其同伙提供口实，他们会借题发挥把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变成闹纠纷的材料，或是像伏罗希洛夫那样用来发表以被污辱的军官的名誉问题为题的、非党的、非共产主义的谈话。可我们提出的是事关党和国家利益的问题。可是在伏罗希洛夫讲话之后我们又认为

应该公布我们的文件（不作速记记录也不收入全会记录），为的是让全会感到需要更加认真地检查国家防务状况，而不是像伏罗希洛夫同志那样在发言中作肤浅的评价。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我们把要不要在这次全会上公布这个文件的问题提请政治局决定。暂时只把一份文件交给李可夫同志（如上所述），在文件上签名的人负有完全的责任。（大厅里有喧哗声）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8 月 1 日

№07526

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提交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行动纲领草案（摘录）（党的危机及克服危机的办法）

（1927年8月1日）

按手稿刊印，仅供联共（布）党员参阅

1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将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下述行动纲领草案提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他们保留自己于代表大会前夕——在报刊和党的会议上交流意见后进一步明确该纲领草案的权利。

穆拉洛夫、叶夫多基莫夫、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斯米尔加、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彼得松、巴卡耶夫、索洛维约夫、利兹金、阿夫杰耶夫。

目　录

一、序言
二、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状况
三、农民

四、国有工业和社会主义建设
五、苏维埃
六、民族问题
七、党
八、共青团
九、我们的国际形势与新战争的危险
十、红军和红海军
十一、关于真正的和臆造的分歧
十二、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统一

一、序　言

列宁在他参加的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又经历了一年，国家掌握在我们手中，但是这一年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它是否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了呢？没有。我们不愿意承认，它没有按照我们的意志行动。它是怎样行动的呢？……汽车不是开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开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这个别人不知是非法活动分子，不法之徒，投机倒把分子，天知道哪里来的人，还是私人经济资本家，或者两者都是。总之，汽车不完全按照，甚至常常完全不按照掌握方向盘的那个人所设想的那样行驶。”①

这番话已经指明了在讨论我们政策的主要问题时必须遵循的尺度。国家、政权这辆汽车开往什么地方呢？是开往我们这些代表着工人和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的共产党人要去的地方吗？还是不是开往那个地方？或者“不完全”开往那个地方？

列宁逝世后的几年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努力使党中央机关、而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85页。

后又使全党都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不正确的领导，列宁指出的危险又加重了许多倍："汽车不是开往"工人和农民利益所需要的地方。在新一届代表大会开幕前夕，我们认为，不论我们遭受到怎样的迫害，我们都有责任用双倍的努力来向全党指出这一点，因为我们相信，事情是可以补救的，党本身可以纠正这件事。

列宁在指出汽车常常开往我们的敌对力量要它去的地方时，意在让我们大家注意两个最重要情况，一是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敌视我们事业的力量——富农、耐普曼分子、官僚主义分子，他们利用了我们的落后和我们政策中的错误、同时又确实依附于整个国际资本主义。二是这些力量颇有影响，他们能够使我们国家和经济这辆汽车不开往要去的地方，接下来他们甚至企图伎用隐蔽的方式掌握这辆汽车的方向盘。

列宁的这番话要求我们大家：1. 密切注意敌对力量——富农、耐普曼分子、官僚主义分子的增长情况；2. 认清这些力量随着国家整体水平的提高将会力求联合，力求"修改"我们的计划，对我们的政策加紧施加压力并通过我们的机关实现他们的利益；3. 采取措施千方百计削弱这些敌对力量，阻止他们的联合，抵消他们施加的压力，不让他们建立其梦寐以求的，虽然是不公开的，但却是实际上的两个政权并存的那种局面；4. 将这些阶级斗争过程中的全部真相毫无保留地告诉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这正是现在关于"热月"的危险性和与之斗争的问题的关键。

自从列宁发出这个警告后，我们的很多方面有了改进，但也有很多方面变得更糟了。国家机关的作用得到加强，可是工人国家的官僚主义现象也随之增多。资本主义在农村的绝对和相对增长及其在城市的绝对增长使我国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意识开始提高。这些资产阶级分子还企图腐蚀在工作和生活中与之接触的那部分共产党员，而且往往能够如愿以偿。斯大林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

这个口号：向左开火！——使党内右翼分子和国内资产阶级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更便于联合起来。

谁战胜谁的问题正通过各阶级在经济、政治、文化战线所有部门中的不断斗争得到解决，斗争的焦点是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是与这两条道路相适应的国民收入分配形式，是无产阶级完全掌握政权还是与新生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在一个小农、极小农和小业主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一些最重要的过程一般是先以分散和隐蔽的方式存在，而后“出人意料地”突然爆发出来的。

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首先表现为农村的分化和私人企业主的增加。农村的上层人物也和城市资产阶级分子一样，同国家经济机构各个环节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这个机构常常帮助新生资产阶级用统计的迷雾来掩盖他们为增加自己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而进行的卓有成效的斗争。

商业机构，包括国家的、集体的和私人的商业机构，吞掉大量国民收入：超过总产值的十分之一；另一方面，近几年私人资本在商业中介周转额中所占的份额大大超过全部周转额的五分之一，用绝对数字表示，每年超过 50 亿。至今为止，普通消费者获得的必需品中 50％以上是由私人企业主提供的。这是私人企业主获取利润和积累的主要源泉。农业和工业价格的剪刀差，批发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农业个别部门、个别地区及季节性的所谓“差价”，国内和国际价格（走私）的剪刀差，这些都是暴利的固定来源。

私人资本靠贷款获取高额利息并依靠国债发财。

私人企业主在工业中的作用也非常明显。即使最近一段时间这个作用相对地降低了，但绝对数还是增加了。私人资本注册工业年总产值为 4 亿。小工业和家庭手工业超过 18 亿。同时，国有工业的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五分之一以上，占整个市场商品总量近

40%。绝大多数国有工业或多或少都同私人资本有联系。商业和手工业企业资本对大量的手工业者进行各种形式的公开的和隐蔽的剥削，这是新生资产阶级最重要的、而且是日益增长的积累的源泉。

税收、工资、价格、贷款是分配国民收入、巩固一些阶级的地位并削弱另一些阶级的地位的最重要的杠杆。

农村的**农业税**通常是一种逆向的累进税——贫困户负担重，富裕户和富农负担轻，据不完全统计，苏联34%的贫困农户（甚至不包括乌克兰、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这样一些贫富差距很大的地区）大致占纯收入的18%；占总户数7.5%的农户高收入也占总收入的18%。与此同时，这两类农户平均每一类交税约占整个税收额的20%，可见，每个贫困户承担的税收负担都比富农和富裕农户重得多。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领导人的担忧相反，我国的税收政策根本没有“剥去”富农的衣服，丝毫也没有影响他们把越来越多的资金和实物积累集中在自己手里。

在我们的预算中，直接税的作用下降，间接税的作用日渐增加。因此，税收的重点也就自然而然地从上向下转移。1925～1926年度工人的税额比上一年高出一倍，而其他城市居民的税额则减少6%。（《财政通报》1927年第2期第52页）白酒税正是加在工业地区的越来越难以承受的重负。

据某些不完全统计，同1925年相比，1926年人均收入的增长农民为19%，工人为26%，私商和企业主为46%。如果把“农民”分成三大类，无疑会发现，富农收入比工人收入的增加幅度要大得多，私商和企业主的收入是依据税收材料计算出来的，实际收入肯定更高。不过，即使这些经过加工的数字也明显地表明，阶级对立现象在日益增加。

在最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农业价格和工业价格的剪刀差进一步扩大。农民出售自己产品的售价不超过战前价格的1.25倍，而购

买工业品却要付出比战前高 2.2 倍的费用。农民，尤其是农民中的贫困阶层一年为剪刀差多支出的钱为 10 亿卢布左右，这不仅加深了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矛盾，而且更加剧了农村的分化。

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差价，使国有经济和消费者双双受到损失，但却让第三者从中渔利。从中渔利者为私商，即资本主义。

1927 年的实际工资收入至多同 1925 年秋季持平，而且，毫无疑问，在这两年中，国家富裕了，整个国民收入增加了，农村的富农阶层以最快的速度增加自己的储备，私人资本、私商、投机倒把分子的积累也迅速增多。可见，工人阶级在整个国家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了，而其他阶级的份额却提高了。这是评价整个局势的最重要的事实。

只有在内心深处认为我们的工人阶级和我们的党对付不了困难和危险的人才会断言，公开指出发展的矛盾和敌对势力的增长是一种惊慌和悲观情绪的表现。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应该清醒地看到危险。我们指出这种危险，恰恰是要信心百倍地与之斗争并加以克服。

敌视我们的富农、耐普曼分子、官僚主义分子的势力有某种程度的增加，这是新经济政策时期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些势力不是用行政命令或简单的经济压力所能消灭的，我们确定和实施新经济政策就是亲自为资本主义关系在我国开辟了一定的地盘，而且还要在很长的时期内承认它有存在的必然性。列宁下面这番话只不过指出了必须让工人知道的真情实况：“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资本主义在俄国就有比共产主义更牢固的经济基础……我们还没有挖掉资本主义的老根，还没有铲除国内敌人的基础。”[①] 如上所述，列宁指出的这一最重要的社会现象并不是轻易就能消灭得了

① 《列宁全集》第 40 卷，第 156 页。

的。但是工人阶级依靠贫苦农民和中农的联盟，通过正确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政策，是能够克服和战胜这一现象的。这个政策主要是全面巩固无产阶级的所有社会阵地，将尽快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命脉同准备和发展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

列宁的正确政策还包括灵活的策略，在同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中，列宁常常采取局部让步的办法，绕开敌人，暂时退却，以便今后更加信心百倍地前进。灵活的策略在目前也是必要的。但是，列宁在用直接进攻的办法不能击溃敌人而采取迂回和灵活的方式同敌人周旋时，始终坚持无产阶级革命的路线。列宁在世时，党总是知道采取灵活策略的原因、意义及其范围、退却的最后界线以及无产阶级重新开始进攻的出发阵地。列宁在世时，退却就叫退却，让步就叫让步。因此，采取灵活策略的无产阶级军队总是能保持自己的团结、战斗精神和对自己目的的明确认识。

最近一段时期，党的领导人严重背离了列宁这些路线。**斯大林集团**率领党盲目地前进。它掩饰敌人的力量，到处制造太平无事的老一套假象。它没有给无产阶级指出任何前途，或更糟糕的是，指出不正确的前途。搞迂回运动，适应和迎合敌对的自发势力，削弱和搞乱无产阶级军队的力量，助长消极情绪、不信任领导和对革命事业缺乏信心的情绪。他们以列宁的灵活策略为借口，极力掩饰其无原则的左右摇摆行为，这是党所始料不及的、无法理解的瓦解党的行为。这种情况只能使敌人赢得时间，继续进攻。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这种灵活策略在国际舞台上的“经典”工作，就是他们的中国政策和在英俄委员会上的政策。在国内则是他们对富农的政策。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党和工人阶级只是在这条完全错误的方针的严重后果已大难临头时才了解到真相和部分真相的。

两年以后，在斯大林集团实际制定党中央机构的政策期间，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这个集团的政策不能有效地阻止（1）打算把

我们国家引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那些势力的过快发展；（2）富农、耐普曼分子和官僚分子力量的不断增长及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地位的削弱；（3）在同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工人国家整体地位的削弱和苏联国际地位的下降。

斯大林集团的直接罪责在于，它不是向党、工人阶级和农民讲清事态的全部真相，而是掩饰这一真相，过低估计敌对势力的增长状况，不让那些要求公布真相和揭露真相的人讲话。

当整个形势表明危险来自右面时，却集中火力向左开火，粗暴而机械地压制对无产阶级革命命运表示正当担忧的无产阶级的任何批评意见，公开纵容右倾行为，削弱无产阶级和老布尔什维克核心力量在党内的影响等等——所有这一切削弱和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此时最需要的是无产阶级发挥积极性，增强党的警惕性和团结，使党对列宁主义的真正嘱咐充满信心。

他们出于掩盖自己一个又一个错误的需要对列宁的话进行歪曲修正和削弱补充。列宁逝世以后，创立了一整套新理论，其目的只有一个，即从理论上对斯大林集团脱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做法进行辩护。孟什维克分子、路标转换派分子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都认为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和新理论，不是“列宁的前进步伐”（乌斯特里亚洛夫语），是“国家的理性”、“现实主义”，是抛弃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空想”，并对这些做法表示欢迎。他们认为将一批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们）从党的领导层中驱逐出去乃是转向新轨道的实际步骤并对此公开表示欢迎。

同时，新经济政策的自发过程由于没有受到强有力的阶级政策的限制和引导仍在继续危险地发展。

2500万小农户是资本主义倾向的主要源泉。这些人中最突出的富农集团正在搞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大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这个过程的今后命运最终将取决于国有经济增长与私人经济增长之间

的比例关系。工业的落后加快农民分化的速度，并且更加剧了由此而产生的政治危险。列宁写道："富农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屡次恢复过地主、皇帝、神父、资本家的政权。以前欧洲历次革命的情况都是这样，每一次都是富农利用工人的软弱得以推翻共和国而恢复君主制，推翻劳动人民的政权而恢复剥削者、富人、寄生虫的无上权力……富农可以而且不难同地主、沙皇、神父和好，即使他们发生过争吵，但是要同工人阶级和好是**永远办不到的。**"① 谁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富农会长入社会主义"，谁就只能使革命陷入困境。

国内存在着两种互相排斥的基本立场。一种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另一种是力图将发展纳入资本主义轨道的资产阶级的立场。

资产阶级阵营和那些追随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把希望寄托在私人的积极性和商品生产者的个人利害关系上。这个阵营把赌注押在"殷实农民"身上，其目的是让合作社、工业和对外贸易好为他们服务。这个阵营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不应该指靠国家预算，其发展速度也不应损害农场主—资本家积累的利益。对于日益强大的小资产者来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斗争就是对工人的肌肉和神经施加压力，争取降价的斗争就是减少社会主义工业的积累，以保证商业资本的利益。对于小资产者来说，同官僚主义的斗争就是分散工业、削弱计划原则、把重工业放到次要位置上，也就是说，还是要适应殷实农民，在不远的将来取消对外贸易垄断权。这是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的道路。这条道路的名称是**分期支付的资本主义**。国内这股强大的潮流对我们党内某些人士也有影响。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5、36页。

列宁对**无产阶级道路**作了如下阐述：“只有在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最终平定剥削者的一切反抗，保证自己完全巩固，完全能够实施领导，根据大规模集体生产和最新技术基础（全部经济电气化）的原则改组全部工业的时候，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的巩固才算有了保证。只有这样，城市才有可能给落后而分散的农村以技术的和社会的根本的帮助，并且在这种帮助下为大大提高耕作和一般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打下物质基础，从而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集体的、机械化的大农业上去。”[①] 应该根据这些观点制定党的全部政策（预算、税收、工业、农业、对内和对外贸易等）。这就是反对派的主要方针。**这就是社会主义道路。**

斯大林的路线介于这两种立场之间（同第一种立场日益接近），其特点是短暂地向左迂回和大踏步地向右转。列宁的道路就是在同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进行不懈斗争中实现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发展。乌斯特里亚洛夫的道路就是通过逐步吞食十月革命的成果，实现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原则基础上的发展。斯大林的道路实际上必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降低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从而为乌斯特里亚洛夫道路的胜利创造条件。斯大林的道路是最危险，最有害的，因为它用人们习以为常的语言和表达方式掩盖实际的转向。恢复阶段结束后，经济发展的所有基本任务都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正因为如此，斯大林的立场是站不住脚的，在处理中国问题或苏联固定资本的改造等重大问题上更是不堪一击。

尽管因现任领导的严重错误而激化的局势异常紧张，但还是完全可以补救的。然而应该改变，而且是坚决地改变领导人的方针，使之转向列宁指出的方向。

---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231页。

二、工人阶级和工会的状况

十月革命使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大国的统治阶级。生产资料国有化就是对整个以人剥削人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开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是今后完全和全面地改变工人阶级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条件的序幕。虽然国家还很贫穷，但劳动法为工人，包括那些过去失去任何保障的最落后的人提供了就连最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过去没有提供，今后也不会提供的法律保障。已成为统治阶级手中最重要的社会工具的工会，一方面能够吸收在其他情况下根本无法接近的群众，另一方面能够直接和间接地影响工人国家政策的全过程。

党的任务就是保证这些最伟大的历史成果得到进一步的实现，即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来加以充实。能否在这条道路上取得成就，不仅取决于国内和国际的客观条件，而且取决于领导路线的正确与否和领导人的实际工作能力。

评价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向前迈进的重要依据是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主义成分对资本主义成分的优势——同改善工人阶级全部生活条件密切相关。这种改善应该反映在物质方面（工业中工人就业人数、实际工资水平、工人预算的性质、工人居住条件、医疗保障等），也反映在政治地位方面（党、工会、苏维埃、共青团）；最后，反映在文化方面（学校、图书、报刊、剧院）。力图把工人的迫切利益放到次要地位并给工人阶级的迫切利益扣上值得怀疑的“行会利益”的帽子，将其与阶级的社会利益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政治上也很危险。

当然，无产阶级国家占有剩余价值不是剥削。但是，第一，我们的工人国家带有官僚主义的残余。日益膨胀的、享有特权的管理

机构吞食了很大一部份剩余价值。第二，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通过贸易和价格剪刀差侵占了国有工业创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总之，在恢复时期，工人人数及其生活条件不仅得到绝对的提高，而且同其他阶级相比，也得到相对的提高。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并继续发生骤变。工人阶级人数的增加及其状况的改善几乎陷于停顿，而其敌人却在继续乃至加速增长，这种情况不仅必然导致工人在工厂中的状况的恶化，而且必然导致无产阶级在苏联社会中的比重的下降。

孟什维克和工人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幸灾乐祸地到处诉说我国工人物质上的苦楚，企图让无产阶级同苏维埃国家对立起来并使工人接受孟什维克资产阶级的口号“退回到资本主义”。自满自足的官员们认为，尖锐地提出工人物质状况问题的反对派就是“孟什维主义”，这是对孟什维主义的最好的效劳，是公然把工人推向孟什维主义的黄旗之下。

要战胜困难，必须了解困难。应该通过劳动群众的实际状况真实和公正地检验我们的成绩和不足。

工人的状况

在1925年秋季以前的恢复时期，工资的增长速度相当快。从1926年开始的实际工资的大幅度下降趋势，到1927年才得以制止。在1926～1927经济年度的头两个季度，大工业的月平均工资为莫斯科卢布30卢布67戈比和30卢布33戈比，而1925年秋季为29卢布68戈比。根据估算，第三季度的工资为31卢布62戈比。因此，今年的实际工资大约同1925年秋季持平。

自然，某些工种和某些地区，首先是首都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工资及整个物质生活水平肯定高于上述平均水平；但另一方面，广大工人阶层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大大低于这些平均数。

同时，所有材料证明，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强度增加了，但劳动的不利条件却仍未改变。

提高劳动强度的要求日益成为提高工资的先决条件。中央在关于合理化的著名决议（见1927年3月25日《真理报》）中确认了这个同社会主义方针格格不入的新倾向。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也通过了同样的决定。这个政策将意味着，虽然依靠技术（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使社会财富增加了，但这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使工资得到提高。

由于工人人数增长缓慢，家庭中的就业人数减少。用实际货币计算，1924年到1925年，工人家庭的预算支出减少了。房租的提高迫使他们将一部分住房面积出租。失业者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就业者的预算生活。酒类消费量的迅速增长使预算更趋紧张。总之，生活水平明显下降。

目前实行的**生产合理化**必然恶化工人阶级的状况，因为工业、运输业等部门的发展规模不可能解决被解雇工人的就业问题。而实际上，“合理化”常常导致一部分工人“被解雇”，另一部分工人的物质状况日渐恶化，这必然造成工人群众对合理化不信任。

在劳动条件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受损害最多的总是那些最弱的群体：粗工、季节工、女工和童工。

1926年几乎在所有部门中女工和男工的工资差距明显拉大。1926年3月在各工业部门的粗工中，女工工资是男工工资的51.8～61.7～83%。就连泥炭工业、装卸工作等部门也未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善妇女的工作条件。

同所有工人的平均工资相比，**童工**的平均工资在不断下降：1923年下降47.1%，1924年下降45%，1925年下降43.4%，1926年下降40.5%，1927年下降39.5%。（《1924～1925年度和1925～1926年度青年经济状况综述》）1926年3月有49.5%的童

工收入低于20卢布。（中央劳动统计局的统计）消除超编现象，压缩编制，是对青年工人和工人家庭的最沉重的打击。失业的童工人数骤增。

雇农。在农村350万雇佣劳动者中，雇农占160万。只有20%的雇农参加了工会，对雇佣合同（常常是劳役性的）的登记制度刚刚建立起来。雇农的工资常常低于国家最低工资标准。国营农场也存在这种情况。实际工资平均不超过战前的63%。工作日很少低于10小时，而实际上工作日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没有限制的。不能正常发放工资，存在严重的拖欠现象。雇农的困苦状况不仅仅是落后的农民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困难所造成的，也是不切实际的方针的必然结果。这个方针在实践中、在事实上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农村的上层身上，而不是放在下层的身上，必须全面系统地捍卫雇农的利益，不仅使他们免遭地主的压迫，还要免遭那些殷实中农的欺压。

住房问题。工人的住房标准常常大大低于全俄城市居民的平均标准。大工业城市的工人是住房最困难的一部分居民。一些被调查城市按社会群体分配住房的情况是这样的：工人——5.6平方米，职员——6.9平方米，手工业者——7.6平方来，自由职业者——10.9平方米，非劳动者——7.1平方米。工人排在最后一位。工人住房面积年年减少，而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住房却在不断增加。住房建设的总体状况对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构成威胁。然而，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五年计划”住房建设的规划，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承认，住房状况将会比现在还糟糕：平均标准从1926年底的11.3平方俄尺下降到1931年底的10.6平方俄尺。

失业现象。工业化发展缓慢带来的最大痛苦是失业。产业无产阶级的骨干队伍也受到失业的冲击。1927年4月正式登记的失业人数为147.8万人（1927年8月27日《劳动报》），而实际的失业

人数接近200万。失业人数比就业工人人数的增长要快得多。工业部门的失业人数也迅速增加。

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五年计划，在整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将接纳40余万固定工人。这就是说，在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入的情况下，到1931年底失业人数至少达到300万。这种现象导致的后果就是流落街头、乞讨和卖淫的人数有增无减。

社会保险银行为失业者提供的帮助引起失业者的强烈不满。失业者人均得到11.9卢布的救济金（相当于战前的5卢布），工会人均救济6.5～7卢布，而且只有大约20%失业的工会会员能够领到这种救济金。

对劳动法典所作的解释实在太多，其数量大大超出法典条文的数量，很多条文被这些解释所取代。临时工和季节工的法律保障特别差。

在过去的**集体合同**运动中几乎普遍存在法律条件恶化、规定定额和计件工资不公平的现象。经济管理机构拥有强制仲裁权，使集体合同成为一纸空文，使它由双边协议变成行政命令。（1927年8月4日《劳动报》）

工业对**劳动保护**的拨款数额太少。根据俄罗斯联邦劳动人民委员部的资料，1925～1926年大企业平均每1000名工人中就会发生97.9次丧失劳动能力的不幸事故。竟有十分之一的工人每年惨遭不幸！

最近几年**冲突急剧**增加。解决冲突的办法实际上不是调解性质的，而是强制性质的。

企业内部机制在恶化。管理机构千方百计地使自己在企业中的权利不受任何约束。招收和解雇工人实际上都是由主管人员决定的。在工长和工人之间正出现革命前制度中常见的那种关系。

生产会议逐渐形同虚设。工人提出的大部分建议都没有得到落

实。由于实施的改进措施常常导致工人被裁减，所以一部分工人对生产会议抱有恶感。这样一来，工人就不大参加生产会议了。

必须把学校问题从日常文化问题中突出出来。工人不仅越来越难以使自己的孩子接受生产培训，而且连初级教育也得不到保证。几乎所有工人居住区都面临学校严重不足的问题。采取由学生家长支付学校各项开支的办法，实际上取消了免费教育。由于缺少学校和幼儿园，相当一部分工人子女接受街头的影响。

工会和工人

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在企业劳动条件问题上……利益的某些对立现象”（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决议）近年来更趋严重。而且，近年来党在工会运动方面的全部实际工作，其中包括工会领导人的实际工作使工会处于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所承认的状况，“工会往往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表现出片面性，有时竟把自己首要的任务——维护会员群众的经济利益并全力提高他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放到次要的地位。”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后，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改进，反而更加糟糕：工会的官僚主义倾向日益严重。

在10个企业工会选举产生的领导机构成员中，来自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非党工人积极分子的比例极小（12～13%）；参加工会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都是已经脱产的人（1927年7月23日《真理报》）。工会和工人群众还从未像现在这样远离社会主义工业的管理。参加工会的有组织的工人群众的独立性被支部书记、工厂厂长和工厂工会委员会主席（“三人领导小组”）的协议所取代。工人对工厂工会委员会持不信任态度。参加全体会议的人数很少。

由于工人的不满情绪在工会中得不到反映，所以积怨更深。他

们常常这样说："我们不可能特别积极；如果你想得到面包，就得少说话。"（参见《中央委员会资料集。工人代表会议的总结。情况综述》第30页等）因此，必然常常发生工人不经过工会组织试图自己改善状况的现象。仅此一点就要求我们必须根本改变工会的现行制度。

最重要的实际建议

A. 在工人物质状况方面

1. 彻底制止延长**八小时工作日**的任何企图。除非万不得已，一律不得加班。不得随意雇用临时劳动力、和把固定工人变成"季节工"。取消一切违反以前公布的条例在有害车间中延长工作日的做法。

2. 首要的任务是提高工资，至少要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执行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有步骤地提高实际工资的方针。必须通过有步骤地提高低收入阶层工资，而不是靠降低高收入阶层工资的办法来使工人各阶层的收入尽量缩小差距。

3. 必须在**合理化**方面根除官僚主义恶习。合理化应该同大力发展工业、合理分配劳动力、反对滥用工人阶级的生产力，特别是滥用熟练的工人骨干紧密联系在一起。

4. 为了减轻**失业**的后果：（1）按照当地真正符合平均工资水平的工资来计算工人的救济金；（2）由于失业时间拖长，故将发放失业救济金的期限延长一年至一年半；（3）不得继续降低专项保险费并同事实上不支付保险费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4）禁止把保险费用于一般公民卫生保健；（5）同"节约受保人应得费用"的现象作坚决的斗争；（6）取消所有可能导致以各种借口停发失业者救济金和在劳动交易所把失业人员注销的决定；（7）实行提高失业救济金——首先是工业失业救济金的方针。

需要出台一些经过深思熟虑和认真研究的长期社会工作计划，根据这些计划，失业者将能够为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

5. 有步骤地改善工人的**住房条件**。坚决贯彻阶级政策。不得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来改善非无产者的住房条件。不得把裁减和解雇的工人从现住房中赶出去。

采取坚决措施整顿住宅建设合作社，使收入低的工人阶层也能参加。不许高级职员占用供工人居住的住房。

否决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同社会主义政策完全背道而驰的住宅建设前景规划。要求企业加大住宅建设的开支，增加该项的预算拨款和贷款，力争最近五年在改善工人住宅问题上有一个大的转折。

6. **集体合同**应该在工人会议上经过真正的而不是走走过场的讨论。建议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取消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机构拥有强制仲裁权的决定。劳动法典应视为劳动条件的最低水平，而不是最高水平。集体合同应包括保证参加本合同的工人和职员在合同有效期内不被裁减的规定（例外情况应作特别说明）。在工资协议整个有效期内，制定工作量应以中等水平的工人而不是优秀工人为标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对集体合同作出使工人的状况不如以往集体合同的更改。

7. 将工资等级制定局的工作置于工会和工人的严格监督之下，结束经常变更工资标准和计件工资的做法。

8. 增加对安全技术的拨款，**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对不执行劳动保护要求者的惩罚政策。

9. 重新审查**劳动法**的所有说明，取消那些使劳动条件恶化的解释。

10. 对**女工**应“同工同酬”。提高女工的劳动技能。

11. 不得实行**无报酬的学徒工制度**。不得实行采取降低未成年工工资的做法。采取措施改善未成年工的劳动条件。

12. **节约制度**绝不能以牺牲工人的切身利益为代价，必须把工人被剥夺的“小福利”（托儿所、电车票、较长的休假等）还给工人。

13. 工会必须加强对季节工的关注。

14. 改善企业工人的医疗条件（诊疗所、医院等）。

15. 增加工人居住区内的工人**子弟学校**的数量。

16. 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工人合作社的地位。

（二）在工会工作方面

1. 评价工会工作首先要以工会在目前经济条件下对工人经济和文化利益的保护程度为依据。

2. 党组织在讨论同工人群众经济、生活和文化利益有关的措施时，应听取工会组织中共产党党团的讨论意见。

3. 工会应根据真正的选举制、公开性、汇报工作制和责任制原则在各级组织中履行自己的使命。

4. 所有工业管理机构的设置都必须经过有关的工会组织的真正的而不是走走过场的协商。

5. 在生产联合会（直至全苏生产联合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所有工会机构，包括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应保证直接从事生产工作的工人占大多数。增加非党工人在这些机构中的比例，使他们不少于三分之一。

将一定数量的工会机构工作人员定期派到企业去从事生产工作。

工会工作以非报酬性工作为主，更多地提倡自愿的原则，尽量把工人从机床边吸引到工会工作中来。

6. 不得因党内分歧撤换经选举产生的工会组织成员中的共产

党员。

7. 必须保证工厂工会委员会和地方工会委员会完全独立于行政机关。招收和解雇工人，将工人从一个工作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超过两周时间均应及时通知工厂工会委员会。利用自己拥有的向有关工会组织和调解冲突机构控告行政机构的决定的权利，同这方面滥用权力的现象作斗争。

8. 必须保证工人通讯员的一定权利，严惩那些迫害揭发问题的工人通讯员的人。

刑法典应增加这样的条款，所有直接或间接地、公开或隐蔽地对工人的批评、独立建议和选举进行迫害的行为应与严重国事罪同样治罪。

9. 必须扩大生产会议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范畴，监督生产会议决议的执行情况并检查保护工人利益的情况。

10. 在国有企业罢工问题上列宁主持通过的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仍然有效。

租让企业的罢工问题与其他私营企业同等对待。

11. 修改整个劳动统计制度，现有制度对工人阶级经济和生活状况的反映是不正确的，是经过明显加工的，因而给捍卫工人阶级经济和生活利益的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在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工人阶级这种艰难处境的最根本原因当然是国家的贫困、外国武装干涉、资本主义对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继续进行包围和经济封锁的结果。这种状况不可能一下子改变。但是如果有正确的政策，这种状况是能够而且应该得到改变的，布尔什维克的任务不是沾沾自喜地渲染已经取得的成就，而是应该坚定和明确地指出，哪些任务尚未完成，应该做哪些工作，能够在正确政策指导下完成哪些任务。

三、农　　民

农业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

“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① 不是无产阶级国家依靠发达的工业克服千百万小农和极小农经济的技术落后，按照大生产和集体化的原则把他们组织起来，就是资本主义在农村扎下根后，腐蚀城市的社会主义基础。

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农民，即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农民基本群众是一支同盟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即社会主义革命的命运取决于能否正确处理同农民的关系。对于我们目前所处的阶段，列宁下面这番话极其准确地指出了我们在对待农民问题上的任务：“善于同中农妥协，——同时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完全地紧紧地依靠贫苦农民。”②

斯大林—布哈林集团在下列最主要的路线上修改了列宁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观点。

（1）放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即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能够帮助农民按照集体化的原则改造农业。

（2）对雇农和农村贫农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农村的社会基础这一点认识不足。

（3）在农业中寄希望于所谓的“殷实”农民，实际上是寄希望于富农。

---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第4页。

②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83～584页。

（4）忽视或公然否定农民所有制和农民经济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这表明他们已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向社会革命党理论靠拢。

（5）对目前农村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素估计不足，掩饰农民分化的现象。

（6）制造麻痹人的理论，似乎“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将走投无路，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预先规定了的”。（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第49页）

（7）采取让“富农合作社的窝巢”长入“我们的体系”的方针（布哈林《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第49页）“问题是，应该充分发挥殷实农民的经济潜力，即富农的经济潜力”。（1925年4月24日《真理报》）

（8）试图把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同列宁的电气化计划对立起来，而列宁本人认为，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窃据我们国家机构重要岗位的新资产阶级的代表借助于这些官方方针中的修正主义倾向，公然要把农村政策转到资本主义道路上。而且，富农及其思想家们极力用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整个”商品率等花言巧语来掩饰自己的全部野心。实际上，富农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农的商品率损害和阻碍着其他所有农户的生产力的发展。

尽管农业的恢复过程比较快，但农民经济的商品率却很低：1925～1926年上市量只及战前的64%，出口只及1913年出口量的24%，究其原因，除农村自身整个需求提高（人口增加、农户分散，而且产粮地区38%的农户购买粮食）以外，还在于农业和工业价格的剪刀差、富农飞快增长的实物积累。就连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也不得不承认，“工业品的短缺使城乡等价交换受到一定限制，降低了商品，即农产品可能实现的规模”（第177页）可见，工业的滞后阻碍了农业的发展，特别是阻碍了农业商品率的提

高，瓦解了城乡的结合，加快了农民的分化。

反对派在农民政策有争议的一些问题上的观点已完全得到证实。虽然在反对派严厉批评的压力下，对总方针作了一些修改，但官方政策仍继续向殷实农民倾斜。加里宁在第四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只字未提农村的分化和富农的增加，就足以说明问题。

这种政策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失去贫农，也拉不住中农。**

农民的分化

最近几年，农村沿着资本主义分化的道路越走越远。

最近四年中，不种地和少种地的农户减少35～45%；同时，种地6～10俄亩的农户增加了100～120%；种地10俄亩和超过10俄亩的农户增加了150～200%。不种地和少种地的农户比例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农户破产和被淘汰造成的。例如，在西伯利亚一年15.8%的不种地者和3.8%种地不足2俄亩者被淘汰；在北高加索14.1%不种地者和3.8%种地不足2俄亩者被淘汰。

无牲畜和无农具农户变为中农的速度极为缓慢。至今为止，全联盟有30～40%为无牲畜和无农具农户，其中大部分是种地少的农户。

北高加索主要生产资料的分配情况是这样的：50%的最贫困农户占有15%的主要生产资料，35%的中等农户占有35%的主要生产资料，而15%的高收入农户占有50%的主要生产资料。在其他地区（西伯利亚、乌克兰等地）生产资料的分配情况也是如此。

某些农户粮食储备的不均衡分配也反映出耕地和生产资料分配的不均衡。到1926年4月1日农村所有余粮的58%控制在6%的农户手中。（《统计述评》1927年第4期第15页）

土地出租规模逐年扩大。租进土地的农户多半是那些自己拥有生产资料、种地多的农户。在大多数情况下，租赁土地的事实被掩

盖起来，以便逃避税收。没有农具和牲畜的种地少的农户在耕种土地时大多使用租来的农具和牲畜。不论出租土地，还是租赁农具和牲畜，其条件都是奴役性的。除实物盘剥外，高利贷盘剥也发展起来。

农户分散的这种过程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两极分化的过程。

机器和贷款并没有成为农业社会化的杠杆，却常常落到富农和富裕农民的手中，帮助他们剥削雇农、贫农和经济实力薄弱的中农。

由于土地和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富裕农户手中，所以这伙人开始大量使用雇佣劳动。

另一方面，贫苦农户和一部分中农户或因完全破产和被淘汰，或因一些家庭成员脱离农业，出现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成为富农和“富裕”中农的奴役对象，他们流入城市，绝大多数找不到任何工作。

尽管早就出现这些使中农“经济比重减少”的过程，但中农仍然是农村人数最多的群体。将中农吸引到社会主义的农业政策方面来，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因此，把希望寄托在所谓的“殷实”农民身上，实际上就是寄希望于中农阶层的继续分化。

只有对雇农给予应有的重视，只有实施依靠贫农和贫农同中农联盟的方针，只有同富农作坚决的斗争，只有实施工业化的方针，只有实施正确的阶级合作和农村贷款方针，才能够把中农吸引到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来。

实际建议

在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党不应只是口头上，而应在实际行动中站在雇农、贫农和中农基本群众的前列，组织他们抵制富农的

剥削企图。

为了加强和巩固作为无产阶级一部分的农业无产阶级的阶级阵地，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这些措施在关于工人阶级状况一节中已经谈到。

农业贷款不应继续优先发放给农村的富裕农户。必须改变现状，目前微薄的贫农基金常常花得不是地方，往往为富裕农民和中农阶层所用。

应该通过更快地发展集体经济来**遏止农村不断发展的农场**。必须有步骤地逐年加大拨款，帮助那些参加集体组织的贫农。

与此同时，必须更加经常地帮助那些没有参加集体组织的**贫困农户**，诸如彻底免除他们按照土地规划政策应交纳的税款，向他们提供农具贷款，吸引他们参加农业合作社等等。

“通过活跃苏维埃建立非党农民积极分子队伍”（斯大林—莫洛托夫）的口号缺少准确的阶级内容，实际上加强了农村上层人物的领导作用，因此，应该针锋相对地提出建立非党雇农、贫农和同他们接近的中农积极分子队伍的口号。

必须切实地、有计划地、全面地和脚踏实地地组织贫农去完成迫切的经济和政治任务，解决机器等问题，搞好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组织合作社，建立贫农合作化基金等。

党应通过正确的价格收购政策以及中农可以接受的信贷合作社组织，多方协助农村中农阶层发展经济，有步骤和逐步地引导农村中人数最多的这个阶层向大规模机械化集体经济过渡。

对于农村不断增长的富农阶层，党的任务应该是尽量限制他们的剥削企图。决不可背离宪法中关于取消农村中剥削阶层的苏维埃选举权的条款。必须实行严格的累进税，必须采取保护雇佣劳动和调整农业工人工资的国家法律措施，必须在土地规划和土地使用方面实行正确的阶级政策，在农村拖拉机和其他生产工具供应方面也

必须实行正确的阶级政策。

农村中不断发展的租赁关系，现行的土地使用制度，即不受苏维埃的领导和任何监督，由受富农影响越来越严重的土地共用社来支配土地；第四届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在重新分配时的“补偿”决议；这一切都破坏了土地国有化的基础。

目前巩固国有化的重要措施之一应该是让土地共用社服从地方政权机构的领导，并由将富农清洗出去的地方苏维埃对整顿土地使用和土地规划问题实施有力的监督，以便最大限度地保护贫农和贫穷中农的利益，不受富农恶势力的欺诈。必须根据现有的经验制定一系列补充措施，肃清土地共用社中的富农恶势力。特别是必须使租入土地的富农完全地、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服从农村苏维埃政权机构的监督。

党应该对所有旨在取消或破坏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基础之一的土地国有化的倾向给予坚决的回击。

必须改变现行的统一农业税制度，免除 40～50% 的最贫困和贫穷农户的税收，同时不向中农基本群众追加任何税款。应使征税期限适合下层纳税人的利益。

应该大大增加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建设的投资。必须给新成立的集体农庄和其他集体化形式提供最大限度的优惠条件。被剥夺选举权者不能成为集体农庄庄员。将小生产引向集体化大生产的任务应该贯彻到合作社的全部工作之中。必须在机器供应方面严格贯彻阶级路线，其中包括同冒牌的机器合作社作斗争。

必须完全依靠国家开展土地规划工作，并且首先应该规划集体农户和贫农农户的土地，最大限度地保护他们利益。

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应保证贫农和中农基本群众至少能够维持自己目前的经营并使之逐步得到改善。应采取一切措施，取消春秋季农产品采购价格的差价，因为这种差价沉重地打击了农村的

下层农户，所有实惠都被上层人物所占有。

不仅需要加大对贫农基金的拨款，还应从根本上改变所有农业贷款方针，为贫农和贫穷中农提供低利和长期贷款，改变现行的担保制度。

关于合作社

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是按照大型机械化集体经济原则改造农业。对于农民基本群众来说，实现这一目的的最简便易行的方式是列宁在《论合作社》一文中所阐述的合作化。这也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整个苏维埃制度给农民的一大好处。只有不断提高农业的工业化水平，才能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化（集体化）建立日益广泛的基础。没有生产方式中的技术革命，即没有机器的耕作，不向多圃制过渡，不采用化肥等，就不可能卓有成效和广泛地开展真正的农业集体化工作。

购销合作社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成为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1）将其置于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首先是大工业和工会的直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之下；（2）农业的商业职能的合作化过程应能逐步加强农业的集体化。

农业合作社的阶级面貌不仅取决于合作社农民各群体在人数上的比重，而且主要取决于他们在经济上的比重。党的任务就是使农业合作社真正成为农村贫农和中农的联合组织，成为这些人同日益增长的富农经济势力作斗争的武器。必须有步骤地和坚定地把农业工人吸引到合作社建设的工作中来。

只有当参加合作社的居民享有最大限度的主动性时，才能顺利地进行合作社建设。要使合作社同大工业和无产阶级国家保持适当的联系，合作社组织就必须开展正常的工作，不得采用官僚主义的调节手段。

鉴于党的领导人公然背离布尔什维克在农村的基本路线，依靠富裕农民和富农，鉴于这条路线被诸如“贫农的幻想”、贫农“坐享其成”和“游手好闲”、贫农对苏联国防来说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没有用处等反无产阶级的言论所掩盖，必须重温一下我们党纲在尖锐提出同中农的联盟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时所说的那些话，这番话明确而清楚地指出：“联共在全部农村工作中仍然是依靠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力量，首先把他们组织成为独立的力量，建立农村党支部、贫农组织、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特别工会等等，尽量使他们接近城市无产阶级，使他们摆脱农村资产阶级和小私有者利益的影响。”

四、国有工业和社会主义建设

工业发展速度

“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只能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①

目前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资本主义包围和世界革命受阻的历史条件下，工业化发展速度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条件，这种工业化发展速度可保证在近期至少实现下列任务：（1）无产阶级在国内的物质地位应绝对和相对地得到加强（增加工人就业人数，减少失业人数，提高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水平，包括使人均住房面积达到合乎卫生的标准）。（2）工业、运输业和电厂的发展至少不得落后于整个国家日益增长的需求和资源。（3）农业应该逐步具有更高的技术基础，并能保证工业获得不断扩大的农业原料基

① 《列宁选集》第3版第4卷，第542页。

地。（4）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在技术方面，在提高工人和全体劳动人民物质福利方面，苏联应在最近几年内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5）工业化应保证国家的国防实力，尤其要适当发展军事工业。（6）应该有步骤地发展社会主义成分，即国有成分和合作成分，对社会主义前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前的）其他经济成分，一部分应加以排挤，另一部分应使之服从并加以改造。

尽管工业、电气化和运输业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工业化远未达到必要和可能的发展水平。目前的工业化速度和近几年的预期速度明显过低。

自然，现在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政策使我们能够一举克服所有困难，并能一步跨越经济和文化有步骤发展的长期阶段。但是，正因为我国经济和文化落后，所以要进一步加快国家的工业化速度，就必须把人力和资源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正确和及时地动用全部积累，正确利用所有资源。

工业、运输业、电气化和建筑业长期落后于居民，国民经济和苏联整个社会体制的需求，制约着整个经济的运转，缩小了农产品的销售和出口，极大地限制了进口，使成本和价格上涨，币值不稳，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延缓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物质福利的提高，导致失业人数大量增加，住房条件不断恶化，破坏了工业同农业的结合，削弱了国家的国防实力。

这种缓慢的工业发展速度也阻碍了农业的发展。然而，如果不从根本上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任何工业化都是不可能的。

价　格

如果不能经常地、持续不断地降低成本、降低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零售价格，使之同国际价格接轨，就不能也不可能实现规定的

工业化速度。不论在向更高的技术基础转变方面，还是在更好地满足劳动人民的需求方面，真正的进步都体现在降低成本和价格上。

那些批评反对派希望提高价格的毫无意义和下流无耻的叫嚷应该结束了。全党在降低价格的意图方面是完全一致的。但光有意图还不够。评价一项政策不能根据意图，而要看结果。目前，这场降价的斗争结果常常迫使最高层领导人提出一个问题：在实施这项政策时是否白白流失了很多资金。今年1月布哈林同志曾问过：“十亿卢布哪里去了?”接着，鲁祖塔克也就此问道：“批发价格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差价哪里去了?”（《1927年3月3日政治局速记记录》第20～21页）在商品长期短缺的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地、笨拙地降低出厂价格的举动是不适宜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人和农民没有从中得到实惠，反而导致国有工业大量资金的流失。由此而产生并不断加大的批发和零售价格之间的剪刀差使私商获得巨大利润（即使在政策对头的情况下，他们也能把一部分国有企业掌握的附加额弄到自己手里）。近年来，根据整个经济发展经验得出的无可争议的结论，要求我们尽快克服比例失调现象，增加工业产品总量，加快工业发展速度。这是真正降低批发和零售价格，首先是降低成本的主要途径，而近年来成本没有下降，反倒有提高的趋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下属委员会制订的五年计划（1926～1927年和1930～1931年）

已列入即将召开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议程的关于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问题理应成为党的关注焦点。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尚未得到正式承认，而且目前这个方案也未必能得到承认。但是它毕竟最系统、最完整地反映了现任经济领导人的基本路线。

在五年计划中，工业的基本建设费用年复一年几乎毫无增长

（明年11.42亿，1931年12.05亿），而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所占的比例却从36.4%下降到27.8%。按照五年计划纲要，国家预算资金对工业的净投资额在五年中大约从2亿下降到9000万。

产值的增长率为4～9%，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的速度。土地、生产资料和银行的国有化以及集中管理的巨大优越性，即社会主义革命的优越性在五年计划中几乎毫无反映。

工业品的个人消费至今微乎其微，在五年中只增长12%。到1931年，棉织品的消费将达到战前的97%，相当于美国1923年的五分之一；煤炭的消费量相当于德国1926年的七分之一，相当于北美合众国1923年的十七分之一；生铁的消费量不到德国的四分之一，相当于北美合众国的十一又五分之一；电能的产量相当于德国的二分之一，相当于北美合众国的七分之一，纸张的消费量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将达到战前的83%。这一切都是十月革命之后15年的情况！向十月革命十周年献上这么一份微不足道的悲观计划，无异于在行动上反对社会主义。

国家计划委员会计划在五年时间内将零售价格降低17%，即使这个计划能够实现，我国的价格同国际价格相比也要高出2.5～3倍。

尽管对价格作了微不足道的下调（目前也只停留在草案上），在五年计划期间，为了抵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每年尚缺4亿卢布的工业品。如果设想在五年内将目前骇人听闻的价格下调22%（这个降幅也是微乎其微的），那么仅此一项就会造成10亿卢布的商品缺口。可见，比例失调原封未动，成了零售价格持续上涨的根源。五年计划向农民保证，到1931年工业品将达到战前标准，但价格却相当于战前的1.5倍。它向大工业工人保证在五年内将名义工资提高33%，尚不包括目前根据不足的对降低价格的期望。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构想，为消除供求失调现象，应将工人的房租

提高 1～1.5 倍，每年约为 4 亿卢布。由于富裕层民的购买力过剩，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们试图通过削减工人实际工资的办法来改变这一局面。很难令人相信，这种实现市场平稳的办法竟是工人国家极其重要的机关提出来的！正是这个虚幻的前景迫使消费者在取消外贸垄断的毁灭性道路上寻求出路。

计划在五年内新修建 6000～7000 俄里铁路（1895～1900 年这五年时间修建了 1.4 万俄里），这个计划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主要地区最起码的经济需求的角度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

这就是实际指导经济发展的国家机构的真正方案（尽管有时有些变化）。现任领导人的路线实际上就是如此。

苏联和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在势不两立的敌对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其结局最终取决于它们的劳动生产率的对比关系，这种关系在市场条件下可以通过国内和国际价格的对比来衡量。列宁在最后几次讲话中就指出过这个根本问题，他告诫全党，这“……是俄国和国际的市场举行的一场考试，我们受制于这个市场，同它有割不断的联系”。[①] 因此，那种认为我们可以用任何速度，哪怕是“用乌龟速度”迈向社会主义（布哈林语）的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庸俗观点。

决不能指望依靠闭关自守的本国经济来回避资本主义的包围，恰恰是这种闭关自守使本国经济发展更加缓慢，其结果不仅不能削弱，反而加强了资本主义军队的压力（武装干涉），首先是资本主义廉价商品的侵入。

在资本主义国家技术水平非常高的环境下，外贸垄断是社会主

① 《列宁全集》第 43 卷，第 82 页。

义建设十分必要的武器。但是，只有在技术、成本、产品质量和价格同世界经济日益接轨的情况下，垄断才能对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经济起保护作用。经济领导人的目标不应该以必然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为代价来建立封闭的、独立的经济，相反，应通过更高的发展速度来千方百计地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

为此必须：认清我国出口的重大意义，出口目前正严重落后于整个经济的发展（苏联参加的国际商品交换从1913年的4.22%下降到1926年的0.97%）；尤其要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因为这项政策使富农能够用自己的高利贷积累和实物累破坏社会主义的出口；发展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全面加快工业化，加强经济的社会主义成分以同资本主义成分相抗衡；在最近一个时期不分散我们有限的积累，逐步地和有计划地向新的生产形式转变，首先保证大量生产我们完全可以制造的、最必需的机器，不断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技术成果，灵活审慎地补充和刺激本国工业。

孤立地发展社会主义和同世界经济脱节的发展速度的方针扭曲了整个前途，使计划经济的领导人迷失方向，不能提供正确调整我国同世界经济关系的准绳。结果，我们无法正确决定自己应该建设什么，应从国外进口什么。因此，要坚决放弃孤立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要在最近几年更加合理地利用我们的资源，更快地实现工业化，更有计划和快速地发展本国机器制造业，更快地增加就业工人人数，切实降低价格，一句话，使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真正巩固起来。

发展国际联系是否会掩盖经济封锁和战争的危险？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从上述结论中得出。

当然，要作好战争的思想准备，就必须建立我们最必需的外国原料储备，及时建立最必需的新企业，例如铝加工等。对一场长期而严酷的战争来说，最重要的是拥有尽可能发达的、能够大规模生

产并可迅速转产的工业。不久前的事实表明，像德国这样一个同国际市场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当战争和经济封锁一下子切断它同全世界的联系时，仍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抵抗力。

只要充分发挥我国的社会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在“和平”时期利用国际市场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我们就一定能够更有准备地、更有实力地去对付任何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

任何国内政策都不能自行使我们摆脱资本主义包围带来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威胁。我们的任务是采取正确的阶级政策，处理好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巩固自己的地位，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大踏步前进。苏联国内资源十分丰富，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此目的，我们在利用国际资本主义市场的同时，应把自己的主要历史任务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今后进程联系起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在先进国家的胜利将打破资本主义的包围圈，使我们摆脱沉重的军事负担，使我们在技术领域得到极大的充实，加快我们在城市和农村、工厂和学校等各行各业的发展，使我们能够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即建成以先进的技术为基础，以所有社会成员在劳动和利用劳动产品方面的真正平等为基础的无阶级社会。

何处筹资

何处筹资，以便更大胆地，更有革命性地解决真正工业化的任务，解决更快提高群众文化水平的任务，也就是说，这些任务的解决决定着社会主义专政的命运，对此，反对派的答复是：

通过正确利用预算、贷款和价格对国民收入进行重新分配，这是资金的主要来源。而正确利用同世界经济的联系应该成为资金的补充来源。

（1）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五年中国家和地方的预

算从60亿增加到89亿卢布，1931年将占国民收入的16%，即比战前沙皇的预算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8%）少。工人国家的预算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在国民收入中比资产阶级的预算占有更大的比例。当然，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条件下，不仅要增加群众的教育开支，而且将为国家的工业化拨出更多的资金。在近五年中，预算中用于工业化需要的净投资额可以而且应该达到每年5亿～10亿卢布。

（2）**税收制度**跟不上农村上层和整个新资产阶级积累的增长速度。必须：①对私营企业主所有形式的超额利润都要征税，数额不少于1.5亿～2亿卢布，而不是现在的500万；②为了加强出口，以借贷的方式从富裕的和富农阶层（大约占10%的农户）的粮食实物储备中征收至少1.5亿普特粮食，这些粮食储备1926～1927年已达8亿～9亿普特，而且绝大部分集中在上层农民手中。

（3）采取果断的政策，有步骤地、坚定不移地**降低批发和零售价格**，缩小批发和零售价格的“剪刀差”，首先降低工人和农民的日用消费品价格（不得降低现有的、本来就不高的产品质量），而且价格下降不能影响国有工业必要的积累，主要依靠扩大商品量、降低成本、减少附加费用、压缩官僚机构等措施来实现。

实施更符合市场条件的、更灵活的、更有特色的、考虑到市场上每一种商品行情的降低批发价格的政策，使国有工业将目前私人资本和整个贸易寄生现象赖以生存的大量资金保留在自己手中。

（4）按照斯大林—李可夫去年的号召实施的每年应获得3亿～4亿卢布的**节约制度**，实际效果微乎其微。节约制度是一个阶级政策问题，只能在群众的直接压力下实现。为此，工人应敢于施加压力。每年降低4亿卢布的非生产费用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5）灵活利用外贸垄断、国外贷款、租借、技术援助等，可提供一些补充资金，但主要是要使自身的花费合理化，采用新技术降

低消耗，加快我们的整个发展速度，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真正摆脱资本主义的包围。

（6）自下而上地**选拔人才**和他们之间正常的关系问题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选拔得越糟糕，需要的资金就越多。官僚主义制度妨碍正确的选拔和正常的关系。

（7）经济领导人的**尾巴主义**作风在实践上就意味着千百万资金的流失，这是对缺乏预见，工作不协调，舍本逐末和落后的惩罚。

（8）税收手段不可能满足国民经济日益增长的所有需要。贷款应成为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最重要的源泉，首先必须加强硬通货制度和健全的货币流通制度。

（9）采取缩小投机倒把和高利盘剥范围的较为坚定的阶级的经济政策，使国家机关和信贷机构能够更顺利地**动用私人积累**，用长期贷款的形式比现在更广泛地实现工业融资。

（10）国家的伏特加酒专卖制度最初只是试行，其目的是把大部分伏特加酒收入用于工业化建设，首先是发展冶金工业。实际上，国家的伏特加酒专卖制度只能使工业化事业付之东流。应该承认，这个试验是不成功的。在苏维埃制度下，国家的伏特沙酒专卖制度不仅像沙皇时期使私有经济出现负增长一样，而且主要由于无人经营、不合格产品增加、机器损坏、不幸事故增多、火灾、打架、伤残等原因，每年要消耗数亿卢布。国有工业因伏特加酒专卖制度而损失的资金要比从伏物加酒中得到的预算收入多得多，比工业本身从预算中得到的资金高出好几倍。在最短的时间内（2～3年）停止国家伏特加酒的专卖制度将会使工业化的物质和精神资源得到自然提高。

这就是对何处去筹资问题的答案。有人认为，资金短缺似乎同工业化速度有直接联系，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资金虽然不够充足，但还是有的。需要正确的政策。

应该坚决抛弃和谴责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因为它从根本上背离了“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的任务。

必须切实改变各阶级之间税收负担的分配情况，让富农和耐普曼分子多交税，让工人和贫农少交税。

降低间接税的比重。在最近几年内取消对伏特加酒的国家专卖制度。

整顿铁路运输业的财务。

整顿工业的财务。

健全疏于管理的林业，林业应该而且能够成为巨大的收入来源。

保证无条件地稳定货币单位。稳定货币要求一方面降低价格，另一方面实现无赤字预算。不得以滥发货币的办法来弥补预算赤字。

需要严格的目标预算，即无赤字的、硬性的、不允许出现额外的、偶然的赤字的预算。

1926～1927年预算应大幅度增加对国防（优先对军事工业）、整个工业、电气化、运输业、铁路建设、农业集体化企业的拨款。

坚决反对破坏对外贸易垄断的企图。坚决实行以提高经济的技术实力、改善群众的物质生活状况为基础的工业化、电气化和合理化方针。

五、苏维埃

任何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不论其形式如何，都凌驾于居民之上。它通过统治阶层的官官相护把官僚们连接在一起，逐渐培养劳动人民对政府诚惶诚恐和逆来顺受的习惯。十月革命用工农兵苏维埃取代旧的国家机器，这是历史上对官僚主义国家偶像的最沉

重的打击。

党纲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指出：

“俄国共产党在与官僚主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时，坚决采取下列措施彻底消灭这一祸害：（1）必须吸收苏维埃的每一个代表来担负一定的国家管理工作；（2）不断变换他们的工作，使他们逐渐掌握所有管理部门；（3）逐渐把所有的劳动人民毫无例外地吸引来参加国家管理工作。彻底而全面地实行这些措施，就是沿着巴黎公社曾经走过的道路向前迈进一步，同时在劳动人民文化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简化管理机关的职能，这将促使国家政权归于消灭。”

苏维埃的官僚主义问题并非只是作风拖拉、机构庞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官僚政治的阶级作用问题，是它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影响，它的力量和特权、它对待耐普曼分子和粗工、对待知识分子和文盲、对待苏维埃“达官贵人”的太太和愚昧无知的农妇的态度等问题。官员站在谁的一边？这是千百万劳动人民每天都在用日常生活经验进行检验的一个主要问题。

还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就引用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因为除了选举产生，还可以随时撤换，并且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工作的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去代替议会式的机构”。[①]

最近几年苏维埃国家机构向哪个方向发展呢？是向精减压缩的方向发展吗？向工人成分占大多数的方向发展吗？向接近城乡劳动人民的方向发展吗？向缩小管理人员和被管理人员之间的差距的方向发展吗？在实现生活条件、权利和义务更大的平等方面情况如何呢？我们是否在这方面向前迈进了呢？十分清楚，这些问题都没有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111页。

得到肯定的答复。当然，真正的完全的平等只有在消灭阶级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在新经济政策阶段，实现平等的任务遇到了困难，延缓下来，但并未取消。新经济政策对我们来说不是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而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逐步使全体劳动居民普遍参与国家管理工作，有步骤地为实现更多的平等而斗争仍然是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只有不断增强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提高无产阶级在物质和文化建设所有部门的领导作用，才能使这一斗争顺利进行，为实现更多的平等而斗争并不排除在过渡时期技术熟练的工人得到较高的报酬，也不排除让教师得到比资产阶级国家更高的工资待遇等。

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近年来我国的官吏大军人数增多，内部联系紧密，这伙人高踞于被管理人员之上，同城乡富裕阶层建立了盘根错节的关系。1925年的《条例》向为数众多的剥削分子提供了选举权，这只不过是官僚机构及其最高领导人对上层人物、富裕农户、有实物积累的农户和暴发户的要求有求必应的一种最明显的表现。取消实际破坏苏联宪法的条例是反对派批评的必然结果。但是，在根据新条例进行的第一次重新选举中，不少地方都可发现从上而下的鼓励缩小富裕阶层中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数的意图。然而，问题的关键已不在这里，而在于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比重不断增加，他们同官僚政治日益接近，领导人采取完全错误的方针，即使被剥夺了权利的富农和耐普曼分子也能够在幕后至少对基层苏维埃机构的工作人员和政策施加影响。

基层富农分子或“小富农”以及城市小市民从1925年开始向苏维埃渗透，由于反对派的反对，使这种渗透时常受阻，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政治过程，如果对此不予重视或加以掩饰，将会给无产阶级专政带来最严重的后果。

城市苏维埃作为普遍吸引工人和全体劳动者参加国家管理的主要工具在最近几年中逐渐失去其作用，这是阶级力量的对比无疑朝着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方向变化的一种反映。

遏制这种现象不能靠苏维埃单纯的行政上的“活跃”，只能靠果断的阶级政策，靠坚决打击新生的剥削者，在苏维埃国家所有机构中无一例外地提高无产阶级和贫农的积极性和作用。

莫洛托夫的理论，即似乎不能要求工人接近国家和国家接近工人，因为我们的国家本身就是工人的国家（1925 年 12 月 13 日《真理报》）——是最拙劣的官僚主义公式，预先就把一切官僚主义现象神圣化。莫洛托夫反列宁主义的“理论”在苏维埃机构中得到大多数人公开或暗中的赞同，而在目前的方针下，对它的批评却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因此，严厉谴责这个“理论”及其他类似的“理论”，是同官僚主义的扭曲变形进行斗争的必要条件——这一斗争不是让一定数量的工人变成官吏，而是让整个国家机构在其全部日常工作中接近工人和农民基本群众。

目前这场不去依靠劳动人民的阶级积极性，却试图以国家机构的努力取而代之的官方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并未取得也不可能取得实质性的结果，甚至在许多场合助长了官僚主义。

最近一段时期，在苏维埃内部生活中还出现了一些显然是消极的过程。苏维埃日益置重要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文化问题于不顾，成了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附庸。所有管理工作都掌握在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手中。在苏维埃全会上讨论问题不过是走走过场。与此同时，苏维埃机构的换届期限延长，苏维埃机构更加脱离广大工人群众。所有这些现象更加强了官僚主义分子对解决问题的影响力。

庞大的城市经济部门的管理权常常掌握在一、两名共产党员手中，他们负责选择专家和所有官吏，并常常依赖这些人。对苏维埃

成员进行正确的培训，自下而上地吸引群众参加工作——这些统统没有。于是总是抱怨苏维埃机构缺乏有能力的干部并继续依靠官吏。

选举产生的苏维埃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只要一同苏维埃主席、甚至同省委书记发生冲突，立刻就被撤换，结果选举制形同虚设，责任感降低。

必须：

（1）坚决采取同官僚主义现象作斗争的方针，用列宁的方式，以争取限制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剥削欲望的真正斗争为基础，在党内、工会和苏维埃中充分发扬工人民主。

（2）提出使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排除富农）接近国家、使机关无条件服从劳动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

（3）把提高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的阶级积极性作为活跃苏维埃的首要任务。

（4）把市苏维埃变成真正的无产阶级权力机构和吸引广大劳动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管理事业的工具。市苏维埃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对省里的各执行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

（5）坚决杜绝撤换经选举产生的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做法。万不得已时除外，但应让选民了解其原因。

（6）应力争做到使最落后的粗工、最不开化的农民根据切身体会相信，一切国家机构都会关心他们，会向他们提出建议，并尽量提供帮助。

六、民族问题

社会主义的整个发展速度放慢，城乡新生资产阶级抬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加强，国家机构中的官僚主义日甚一日，党内

制度很不正常，由此引起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抬头，所有这些问题在各民族自治州和各共和国内部都有反映，并因某些地区至今尚存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残余而显得更加突出。

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尤其是在工业落后的边远地区，私人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这里的经济机构常常着眼于私营企业主；制定价格时不考虑贫农和中农群众的实际情况；人为地降低雇农的工资，不断地扩大工业和原料供应者农民之间的私人中介和官僚中介手续，使合作社建设主要为农村富裕阶层服务；忽略特别落后的阶层、畜牧业人员和半畜牧业人员的利益。在民族自治州贯彻工业建设计划、特别是农业原料加工工业化计划的迫切任务没有受到重视。

官僚制度依靠大国沙文主义把苏维埃的中央集权变成各民族之间因瓜分官位而产生摩擦的根源（外高加索），破坏了中央和边远地区的关系，使民族院实际上不起任何作用，对主权共和国进行官僚主义的监护，直至剥夺它们处理当地居民和俄罗斯居民之间土地纠纷的权利。时至今日，大国沙文主义（尤其是当它通过国家机关起作用时）仍然是各民族劳动人民相互接近和团结的大敌。

真正支持贫农，使中农基本群众接近贫农和雇农，将贫农和雇农组织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力量，这一切在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州内具有特殊的意义，如果不把雇农真正组织起来，如果不让贫农搞合作化和联合起来，我们就可能使条件落后的东部农村处于传统的奴役制条件下，而我们的党支部就可能没有真正的基层干部。

最落后和刚刚觉醒的民族的共产党员的任务是，将民族觉醒的过程引上苏维埃社会主义轨道，这个任务将通过吸引劳动群众参加经济和文化建设，特别是帮助发展地方语言，发展学校建设，使苏维埃机构“民族化”的办法来实现。

在具有同其他民族和少数民族产生磨擦条件的那些地方，在资

产阶级分子日渐增多的情况下，民族主义常常带有明显的进攻性。同时地方机构的“民族化”是靠少数民族来实现的。边境问题常常是民族纠纷的根源。党、苏维埃和工会工作气氛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恶化。

只有一方面克服联盟机关和机构中的大国主义和官僚主义习气，一方面保持无产阶级在各民族共和国中的领导作用，只有依靠农村基层群众，只有同富农和沙文主义分子展开经常性的、不妥协的斗争，才能正确实施乌克兰化、突厥化等。

这些问题对于顿巴斯或巴库这样一些工业中心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那里的无产阶级居民的民族属性大多与周围的农村居民不同。在这种情况下，要在城乡之间建立正常的政治文化关系，只能（1）城市对农村不同民族的物质和精神需求采取特别关心和真正兄弟般的态度；（2）坚决打击资产阶级破坏城乡关系的任何企图，不管是出于对农民的官僚主义傲慢态度，还是出于对城市居民的反动的富农的嫉妒心理。

官僚主义体制在国家机构“民族化”方面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而且是让官吏、专家、小资产阶级教师去做这项工作，这些人同城乡上层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日常联系，因此他们势必设法使自己的政策适合这些上层人物的利益。这就使当地贫民疏远党和苏维埃政权，将其推向当地的商业资产阶级、高利贷者、反动僧侣、封建家长式人物的怀抱。同时官僚体制排挤民族共和国真正的共产党人，常称他们为“倾向分子”，千方百计地迫害他们，例如，那些被斯大林集团罢黜、得到列宁晚年极力保护的大批格鲁吉亚老布尔什维克就曾受到这样的对待。

十月革命激发起来的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州劳动群众的高涨情绪，激励这些群众直接和主动地参加实际建设。然而，官僚主义体制却用地方民族主义来吓唬打击这种积极性。

联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同“大国沙文主义倾向”、“共和国联盟内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不平等”现象，同“曾经受过深重的民族压迫的许多民族中的民族主义残余”作斗争。有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州负责人参加的第四次会议（1923 年）指出，党的一项根本任务是从当地居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分子中培养和发展民族共和国自治州的共产主义组织”……会议一致认为，来自中央的共产党员在落后的共和国和自治州所扮演的角色应当是助手，而“不是教师和保姆”（列宁语）。然而，最近几年情况正在向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中央书记处任命的民族共和国党组织领导人实际上独揽党和苏维埃大权，将当地干部当成二等党员撂到一边，让他们参加工作往往只是为了形式上的“代表性”（克里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北高加索哥里自治州等），自上而下地将所有地方工作人员人为地分为“右派”和“左派”，以便使中央任命的书记能够不受监督地指挥这两部分人。

我们的民族政策也同其他方面一样，必须回到列宁的立场上来。

1. 开展极其系统的、原则性的、坚持不懈的工作，在各民族工人中消除民族纠纷，特别要重视那些重新参加工作的“民族”工人，提高他们的技能，改善他们的住房和文化生活条件等。

切记：从当地居民中造就和培养无产阶级的干部是吸引落后民族的农民参加苏维埃建设的真正动力。

2. 修订五年经济计划，加快工业落后的边远地区的工业化速度，制定 15 年的总计划，照顾到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州的利益。使收购政策符合让贫农户和中农户发展特殊农作物（中亚的皮棉、克里木、阿布哈兹的烟草等）的任务。将合作社贷款政策以及土壤改良政策（在中亚、外高加索等地）纳入严格的阶级轨道，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对畜牧合作社的发展给予应有的重视。从

当地条件出发，实现农业原料加工的工业化。

严格按照有关民族问题的正确政策修改移民政策。

3. 认真落实苏维埃机构以及党、工会和合作社机构的民族化工作，真正顾及到阶级关系和国际关系。同国家、合作社及其他机构工作中的殖民主义倾向作坚决的斗争。减少中部地区和边远地区的官僚主义中间环节。检查外高加索联邦工作经验，使之符合外高加索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利益。

4. 有步骤地消除影响苏联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的基础上尽量接近和联合的所有障碍。坚决反对把主要民族的语言机械地强加给另一民族的工人和农民的做法，让劳动人民在这方面有充分选择的自由。保证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州内部所有少数民族的实际权利。要求在所有工作中注意考虑前被压迫民族和前压迫民族之间关系中的那些特殊性。

5. 在所有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州内坚决贯彻党内民主。彻底抛弃对各民族发号施令的做法以及任命制和流放制。抛弃对站在左派和右派立场上的各民族共产党员施加压力的做法。注意关心选拔和培养当地基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雇农和农民（反对富农的）积极分子。

6. 尤其要在中央人民委员会和国家机关所有部门中同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和各种大国主义倾向作斗争。在民族问题上，依据明确的、坚定的阶级政策同地方民族主义进行思想斗争。

7. 把民族院变成同民族共和国和自治州进行联系并真正能够维护它们利益的真正的工作机构。

8. 应该重视工会工作中的民族因素。关心培养地方无产阶级的干部。工会在公文中使用本民族语言，尊重所有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利益。

9. 无条件地剥夺剥削分子的选举权。

10. 在确实可代表“基层”的基础上召开第五届民族会议。

11. 公开刊登列宁在民族问题上批评斯大林民族问题路线的信件。

七、党

整个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党像我党一样取得如此伟大的胜利，我党领导无产阶级实现自己的专政已达 10 年之久。联共（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杠杆。联共（布）是共产国际的主要政党。没有一个党肩负着像我党这样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重任。不过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执政党应当大胆地批评自己的错误，不掩饰自己的阴暗面，清醒地看到蜕化变质的危险性，以便及时地采取必要的措施。列宁在世时一直都是这样做的，列宁特别警告我们要防止党变成“自高自大的党”。①

我们反对派在描绘党内目前状况及其阴暗面的同时，坚信在执行列宁的正确路线的情况下，党定能战胜自己的所有的疾病，足以胜任所肩负的历史任务。

1. **党的社会成分**近年来愈加恶化。截至 1927 年 1 月 1 日党内有（以整数计）：

从事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工人（一线工人）	430000 人
雇农（和农业工人）	15700 人
农民（现其中一半以上为职员）	303000 人
职员（其中一半以上原系工人）	462000 人

可见，至 1927 年 1 月 1 日为止我党内一线工人占 1/3（甚至仅为 31%），农民、职员、原来的工人及“其他”占 2/3。

① 《列宁全集》第 38 卷，第 354 页。

近一年至一年半以来**我党失去了近10万名一线工人**。1926年普通党员的“机械减员”人数为25000人，其中一线工人占76.5%（《中央委员会通报》第24～25期）。据官方数字（肯定是缩小了的数字），不久前重新登记时的所谓“淘汰”便近8万名党员离党，而且**绝大多数是工人**。“按相对数计今年初重新登记的人占党员总数的93.5%。”（《中央委员会通报》第24～25期）可见，仅一次普通的重新登记就把占党员总数6.5%（近3万人）的人“淘汰”掉了。“被淘汰者”中近一半为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为1/3强。中央委员会故意缩小这些本已缩小过的数字的做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这不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而是斯大林式的“淘汰”。

另外，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以来我党吸收了10万名农民党员，其中多数为中农，雇农所占比例很小。

2．**党的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愈加恶化**。县委会中农民（指出身）占29.5%，职员及“其他”占24.4%；81.8%的县委委员为机关工作人员。**一线工人在党的领导机关中所占比例很小：在州委会和省委会中**占13.2%，在县委会中占9.8%至16.1%（参看1927年6月10日联共（布）中央统计局统计综述）。一线工人在党内约占1/3，而在党的决策机关**仅占1/10左右**。这对于党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危险。工会的情况也是如此（参看《工人状况与工会》一章）。这也表明，我们的那些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管理者”及“工人官僚”掌握了多大权力。这是把党“分着卖掉”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3．**“原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党机关和整个领导岗位所起的作用增大了。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出身于其他政党的人员在出版界领导人中所占比例为38%（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记录第83页）。现在的情况更糟。布尔什维克党对出版界的领导权现在要么

是由修正主义的“青年”学派（斯列普科夫、斯捷茨基和马列茨基等）把持，要么是由“原为其他政党成员者”把持。在党的整个高层积极分子中原社会革命党人和原孟什维克约占1/4。

4. 官僚主义在各个领域都有所抬头，其在党内的抬头为害尤甚。一位当代“担任领导工作”的党的官僚认为：

“我们有些党员对于党本身、党是什么尚不甚明白。他们认为，党源自支部，支部是基石，然后是区委会，再一级一级地直到中央委员会。但不是这么回事（!!）。**应当自上而下地看待我们的党。在实际的相互关系和整个的工作中都应持这样的观点。**”（1927年5月27日《锤子》杂志，联共北部边疆区委员会第二书记的讲话）

职位更高一些的同志，如乌格拉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给党内民主所下定义（参看1926年6月4日《真理报》）实际上也与此大同小异。

这个“新”观点包藏着巨大的危险。如果我们果真认为“应当自上而下地看待我们的党”，那就是说列宁的党，劳动群众的党已不复存在。

5. 党内民主近年来逐步遭到破坏，这同布尔什维克党的整个历史，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明确决定，完全背道而驰。真正意义上的选举制实际上已经不存在。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原则处处受到歪曲。党章的修改使上层的权力变得愈来愈大，基层支部的权力变得愈来愈小。州委会、区委会、省委会、中央委员会的任期延长至一年、三年以至更长时间。省委会、省执行委员会和省工会理事会等上层机构实际上是不能撤换的（任期为3年、5年或更长）。每个党员和党小组“将根本性分歧提交全党法庭”（列宁语）的权利事实上被取消。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召开之前不再（像列宁在世时那样）让全党事先对问题进行自由讨论，要求展开讨论被视为破坏党的纪律。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的司令部应切实以既跟着司令部走

又指挥着司令部的大军的良好的、自觉的意愿为依托的教导已完全置诸脑后。

与总方针紧密相联党内发现了意味深长的过程，即排挤经受过地下活动考验或至少是经内战考验的、较有主见的、能坚持自己意见的老党员，用一些主要是表现得绝对顺从的新人取而代之，上面以革命纪律为托辞鼓励这样的顺从，其实与革命纪律毫无共同之处。这些新共产党员往往是一些惯于顺从老领导的工人，因其对老的工人党员——革命最艰难时刻的工人阶级领袖人物采取公开的极端敌视的态度而得到赏识，提升到了工人支部和行政机关的领导岗位。

这种情况到了国家机关更是变本加厉，国家机关中往往可以遇到炉火纯青的“党”和苏维埃的官吏，他们在庄重场合拿十月革命来赌咒发誓，对所承担的工作满不在乎，小市民的意识在他们身上根深蒂固，他们私下里对上司骂骂咧咧，到党的活动日则又大整特整反对派。

一个位居上层的党员（首先是书记）所拥有的实际权利要比下面的数百名党员的实际权利多若干倍。党本身因斯大林的“理论”愈来愈受到党机关的排挤，斯大林的理论否认在每个布尔什维克看来都无可辩驳的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党的专政才得以实现的论断。

党内民主的消失导致工会和其他许多非党群众组织内的工人民主的消失。

党内分歧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针对被宣布为“反对派”的布尔什维克的观点的中伤性论战成年累月地进行着，却不让这些布尔什维克在党的报刊上原原本本地陈述自己的观点。昔日的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崩得分子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利用《真理报》针对一些中央委员寄给中央的文件展开争论、进行断章取义的歪曲。

文件本身却没有发表。还强迫党的各支部就未曾见到的文件进行表决和“批判”。

党只得根据处处文理不通、无中生有和令人生厌的官方“材料”和小报告对分歧作出评判。列宁的“谁相信口头上说的，谁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傻瓜”这段话换成了新的说法：谁不相信口头上说的，谁就是反对派。同情反对派的一线工人被迫为自己的观点付出失业的代价。普通党员不能大声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老的党的工作者无法在报刊上或会议上发表意见。

捍卫列宁主张的布尔什维克受到恶毒攻击，说他们企图搞“两个党”。这种指责完全是无中生有，目的是引起无疑是在满腔热情地维护党的统一的工人对反对派的反感。对斯大林所犯的孟什维主义的重大错误（在中国革命、英俄委员会及其他问题上的错误）稍有微词即被说成是“反党”；尽管斯大林并未就对华政策方针及其他重要问题事先征求过党的意见。日复一日地指责反对派企图搞“两个党”的人，他们的目的是把布尔什维克派列宁主义者排挤出党，以便“放手”执行机会主义路线。

6．**党内学习**和政治常识普及如今几乎全成了“修理”反对派。**说服的方法**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制的方法**所取代，而且补之以使党产生误解。由于政治常识普及也是唱官方调子，人们开始敬而远之。以“修理”为内容的会议、党校和党小组活动的参加人数都大大下降。党对党的机关目前采取的错误的官方方针持消极抵抗态度。

7．近来党内不仅功名欲、官僚主义和不平等现象有所抬头，而且一股异己阶级的、敌对势力的浊流，如反犹主义也在侵袭着我们的党。同这类丑恶现象作无情斗争是党进行自我保护的需要。

8．与此同时镇压的火力完全集中到左翼身上。反对派因在本支部内发表意见，因呼声高、因试图宣读列宁遗嘱而被开除出党已

是家常便饭。论政治水平，特别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程度，被开除者往往比开除者还要高。因对蒋介石、普塞尔或本国官僚“缺乏信心”和持“悲观主义”态度而被开除的这些同志仍然与党同呼吸共命运，并且继续为党工作，比留在党内的许多循规蹈矩者和平庸之辈忠诚得多。

9. 随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临近，镇压和威胁明显加强，旨在进一步恐吓党，这也说明斯大林—李可夫联合集团正在为掩盖自己的政治错误铤而走险，每次都使党面对既成事实。

10. **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中央委员会系在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根据与斯大林保持一致的原则组成）错误。目前的党中央核心动摇不定，一味向右摇摆。取消党内民主的原因在于政治路线根本错误。由于政治路线反映的是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压力，是包围着我党的非无产阶级阶层的影响，因此这条路线不得不靠自上而下的施压来执行。

在理论领域起垄断作用的是所谓的“青年学派”，即随时准备完成党机关交给的著述工作任务的修正主义分子，而确实保持着布尔什维克党传统的布尔什维克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却不仅受排挤，而且直接遭迫害。

在组织领域，政治局对书记处、书记处对于总书记的事实上的服从早已是既成事实。列宁在其遗嘱中关于斯大林同志不够忠顺、不会完全从党性出发利用“掌握的无限的权力”的最坏的担心得到了证实。①

目前中央委员会以及党和国家的整个领导机关存在着三个主要派别。

第一个派别——公开的右派，这一派又包括两个集团。其中一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页。

个集团的机会主义和事务主义在相当的程度上代表“经济力量雄厚的”中农的利益，执行的是依靠经济力量雄厚的中农的方针，为他们的理想所左右。这是李可夫、亚·彼·斯米尔诺夫[①]、加里宁、格·彼得罗夫斯基、丘巴尔[②]和卡敏斯基[③]等同志的集团。在上述同志周围及其近旁工作的还有“非党人士”康德拉季耶夫之流、萨德林之流、恰亚诺夫之流，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殷实农民的“务实的政治家”，他们或公开或隐蔽地鼓吹乌斯特里亚洛夫主义。现在，每个省以至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小康德拉季耶夫们和小萨德林们，这些人拥有一部分实权和影响。另一个集团为工会的上层人物，他们执行的是工人和职员中收入最为丰厚的阶层的方针。该集团的特点之一是拼命向阿姆斯特丹分子靠拢。托姆斯基、梅利尼昌斯基[④]和多加多夫[⑤]等同志是该集团领导人。上述两集团之间常有摩擦，但使党和国家的国际国内政治方针向右转的共同愿望使他们联合起来；两集团的特点是蔑视列宁主义理论和抛弃世界革命策略的倾向。

第二个派别为“中派”机关。其领导人为斯大林、莫洛托夫、

---

① 斯米尔诺夫，亚·彼·（1877～1938）——1896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十月革命后历任副内务人民委员、副粮食人民委员、农业人民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等职。

② 丘巴尔，弗·雅·（1891～1939）——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34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年7月～1934年任乌克兰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1921年起先后任俄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39年被处决，后平反。

③ 卡敏斯基，格·瑙·（1895～1938）——历任图拉市苏维埃主席和省执行委员会主席、阿塞拜疆共产党（布）中央书记、苏联卫生人民委员等职。

④ 梅利尼昌斯基，格·纳·（1886～1937）——历任莫斯科省工会理事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党中央候补委员。

⑤ 多加多夫，亚·伊·（1888～1937）——1905年入党。1921年起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书记，1929年起任第一书记。1924～1930年任联共中央委员，1930～1934年任候补委员。后遭镇压。

乌格拉诺夫[①]、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基洛夫同志，也就是目前的事实上的政治局。左右摇摆的布哈林“概括”了这个集团的政策。这样的中派机关集团最少反映群众情绪，却企图取代党而且不无成效。如今党、工会、经济组织、合作社和国家机关的“管理者”阶层有数万人之众。其中不乏“工人”官僚，这些人是工人出身，现在脱离了工人群众。

自不待言，在对于革命的命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管理机关和领导机关中有数以千计的坚定的革命者和工人，他们仍然与群众保持着联系，彻底地献身工人事业。这些机关的真正的共产主义工作就是靠他们来支撑的。

但另一方面，政治路线和党内制度的扭曲变形正在产生着人数众多的地道的官僚阶层。

实际上这个阶层的权力很大。正是这个“管理者”阶层需要“安定”，需要“实际的工作”，并一贯“反对争论”。正是这个阶层喜欢洋洋自得地宣布（有时是由衷地认为）我国已“几乎是社会主义”，我们好像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纲领”的“十分之九”。这个阶层对整个党、尤其是对非熟练工人、失业者和雇农都惯于“从上俯视”。这个阶层认为左派即革命的列宁主义者是主要敌人，他们提出了“向左开火”的口号。

右派集团与“中派”集团因敌视反对派而暂时团结起来。剪除“反对派”势必加速他们之间的争斗。

第三个派别是所谓的反对派。他们就是党内的列宁派。把他们

① 乌格拉诺夫，尼·亚·（1886～1937）——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0～1921年先后任彼得格勒省委书记、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书记，1924～1928年党的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21年起任党的中央候补委员，1923～1930年任中央委员，1926～192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1929年任中央书记。后遭镇压。

称作来自右方的反对派（强加上“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等罪名）的卑劣企图意在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反对派主张党内统一。斯大林在推行其“剪除”纲领时，以所谓反对派企图建立“第二”党为幌子，反对派对此的回答是：千方百计地保持列宁的联共（布）的统一。反对派的纲领在本文件中已得到阐述。这个纲领将得到党内的工人和一切真正的列宁派布尔什维克的拥护。

在反对派为列宁的事业而斗争的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有人脱离反对派，这是在所难免的。三个派别的领导层也会有局部的人员改组，但无碍大局。

11．这一切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党内危机**。从列宁逝世时起党内分歧的程度即变得愈来愈深，涉及的根本性问题也愈来愈多。

广大党员的主要情绪是**要求统一**，但是目前的体制使他们无法弄清妨碍统一的真正危险来自何方。斯大林的整个机制是，让广大党员对每一个稍具重要性和尖锐性的问题作出选择：要么放弃自己的看法，要么受到搞分裂的指控。

我们的任务是**千方百计地保持党的统一**，对分裂、脱离、开除和剪除等政策给予坚决反击，**同时也要保证党能在统一的党内自由地讨论和解决一切有争议的问题**。

反对派在揭露党的错误和党内目前的不正常状态的同时也深信，工人党员中的基本群众定能不顾一切地使党重新走上列宁主义道路。在这方面帮助他们便是反对派的基本任务。

具体建议

必须：（1）像列宁在世时那样按照真正的党内民主的程序进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列宁曾经写道：“需要全体党员十分冷静和极其诚恳地研究：第一，分歧的实质，第二，党内斗争的发展……这两个问题都必须研究，而且一定要有最精确的即刊印出

来的文件，以便能从各方面加以检查。”[①] 中央应通过报刊和专门文集等公布至今向党隐瞒的全部文件，使全体党员能够了解党内分歧的实质及党内斗争的发展进程。

每个同志和每个派别的同志均应获得利用报刊和会议等在全党面前捍卫自己观点的机会。中央、地方组织、党员个人及党小组的提案（纲领草案）至少应于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两个月在《真理报》（或《真理报》副刊）及地方党报上公布。

应在严格的同志式和实事求是的范围内进行争论，不得过激和夸大其辞。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整个准备工作的主要口号应当是统一，**即联共（布）和整个共产国际真正列宁主义的而不是装装门面的统一。**

（2）现在就必须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改善党及其领导机关的社会成分。**为此应重申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如下决定：“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应当于近期内成为党员中的大多数。”未来两三年照例只能接受来自第一线的工人、工作人员及雇农入党；接受其他社会集团的人入党须经严格挑选；被接受入党的红军战士和水兵应为工人、雇农和贫农出身；接受贫农和贫下中农入党须经至少两年的社会政治工作考验。停止接受原为其他政党成员的人入党。

必须贯彻实际上已被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不顾反对派的意见）取消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如下决定：在区委会和省委会等的组成人员中，一线工人应不少于50%。在各工业中心，一线工人应占绝对多数（不少于党员总数的3/4）。在县委会中，工人、雇农和贫农也应占绝对多数。

（3）重申并贯彻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40卷，第231～232页。

委员会1923年12月5日联席全会、第十二次党代表会议和第十三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

以全党的名义重申，尽管目前正广为流传有关党内民主的反列宁主义的新提法（乌格拉诺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日沃夫等），**“工人民主就是全体党员享有公开讨论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并就此展开争论的自由，就是自下而上地选举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选举制。”**（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凡实际侵犯党员这一基本权利者均应予以追究。

照例应通过报纸等让全体党员了解党内少数派对任何原则问题的观点。须保密的问题除外。自然，决定一经作出，即以布尔什维克的铁的纪律贯彻之。

扩大党内的争论俱乐部网，使党的各级机关确有可能对其领导人的错误提出批评（**出争论专页和争论专集等**）。

把党章中自十四大以来改坏了的条款删掉（第25、33、37、42和第50条等）。

（4）采取使整个党的机关工人化的坚定方针。一线工人、受到党内外群众欢迎的先进的无产者党员应在整个党的机关中占绝对多数，党的机关根本不应完全由领取报酬者组成，应由工人定期地予以更新。地方组织（包括州一级和省一级组织）的预算应主要由党费构成，地方组织的收支情况应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定期向广大党员报告。党目前的巨额预算应削减数倍，领取报酬的机关亦应如此。相当一部分党的工作可以而且应当无偿进行，可交给党员利用业余时间完成，有步骤地将机关里的部分同志派往生产第一线或基层工作应成为定期更新党机关的人员的措施之一。反对书记任职上的终身制。规定书记和其他职务的最长任职期限。同上层集团的涣散腐化、徇私舞弊和“官官相护”等（例如塞兹兰、赫尔格、伊尔库茨克和赤塔等）作无情的斗争。

（5）早在列宁主持的第十次党代表会议上即通过了必须保证在党内和劳动群众内实行更大的平等的决定。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早已指出部分工作人员因工作中与资产阶级人士密切接触而发生新经济政策下的蜕变的危险性。必须制定完全得当的实际措施以消除专家和领导人与劳动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在生活条件和工资水平等方面），因为这种不平等违反民主制而且是导致党的涣散和共产党人威信下降的根源（第十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第18条）。应当指出，近年来这样不平等的发展速度非常之快。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

（6）必须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为基础重新安排党内学习，把目前大量流行的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货色扫除干净。

（7）必须立即让被开除的反对派分子回到党内。

（8）必须切实按照列宁指示的精神改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必须：

①联系群众，

②不受“机关”的左右，

③在党内享有威信。

惟其如此才能完全恢复对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信任并将其威信提到应有的高度。

（9）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机关的组建必须遵照列宁在1922年12月26日、1922年12月25日和1923年1月4日的信（遗嘱）中的指示进行。应向全体党员公布这些信件。列宁在1922年12月26日的信中写道：“工人中央委员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者的农民……照我的看法，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某些应该

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①]

列宁的这些信写于他就革命的基本问题向党提出最后的经过反复斟酌的建议的时期（《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论合作社》）。

我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正应本着列宁的上述指示组建中央委员会。

八、共青团

错误的政治方针和施加组织压力的做法完全照搬到共青团内，有时甚至变本加厉。对工人青年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工作愈来愈退居次要地位。任何批判性的想法都要受到压制和迫害。党的机关对共青团组织领导人的要求首先是“听话”，是愿意中伤反对派。基层积极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部分基本上是健康的，但因这样的制度而完全失去了个性。自上而下的错误政策使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共青团内比在共产党内更易得逞。

近年来共青团在数量上迅速壮大，却是以社会构成愈来愈差作代价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以来共青团内的无产阶级核心由40.1%下降到34.4%。吸收入团的工厂青年工人的比例由49.8%降至47%。青年工人的政治积极性也在下降。

在这种情况下，违背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使工人青年的境况进一步恶化的一系列决定（压缩保留期、学徒的特殊工资等级、削减工人技校招生名额；还有不发工资的学徒期）是一大错误，这只会使共青团与广大青年工人更加疏远。

农村中的共青团日益失去贫雇农这支依靠力量。农村中的文化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41～342页。

与经济工作主要遵循发展个体经济的路线。贫农在农村支部的总构成中、积极分子在党的核心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在城市青年工人加入共青团的势头不断减弱的同时，农村共青团队伍日益靠来自富裕中农阶层的青年来补充。

城乡的共青团中小资产阶级分子夺取领导权的意图日益强烈：职员和“其他”人员在共青团中，特别是在农村组织中日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加入党组织者中有36%来自共青团。（1927年7月14日《真理报》）而且在共青团中的党的核心内部，“其他”人员占1/4～1/3，农村共青团中的党的核心正在迅速中农化（中农在1925年占20%，1927占32.5%），贫雇农的比例却在缩小。由此可见，共青团正在逐步变成由小资产阶级分子稀释党的源泉之一。

为防止无产阶级核心的领导作用进一步受到削弱，防止知识分子、职员和富裕农民阶层出身的人排挤无产阶级核心，防止由此必然引起的共青团的小资产阶级蜕变，必须做到：

（1）立即制止目前这种取消在青年工人的劳动和教育方面的革命成果的行为，取消青年工人的劳动条件恶化的一切最新决定。这是同共青团内的不健康现象（酗酒和流氓习气等）作斗争的最重要前提之一。

（2）随着工人阶级普遍福利的提高，通过提高工资、扩大厂办技校和职业训练班网和提高青年工人技能等途径有步骤地、不断地提高青年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

（3）也应按照党的和共青团的历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在近几年内将城市和农村的青年工人（雇农青年）百分之百地吸收到共青团中来。

（4）在行动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抓紧吸收贫农青年加入共青团的工作。

（5）吸收力量薄弱的中农加入共青团，也可吸收在社会活动，特别是在同富农的斗争中经受住考验的中农中的其余部分加入共青团。

（6）加紧保护贫农利益，共青团开展的建设新农村的工作不应以个人致富为目标，而要走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

（7）改善党的核心的社会成分，近两年内只能招募工人和贫雇农。

（8）采取坚决措施使共青团机关领导核心实现工人化，有步骤地吸收贫雇农参与领导工作。应规定，在无产阶级集中的大中心区，共青团的省委、区委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绝大多数委员应是一线工人，而且后者应切实参与领导工作。

（9）认真地进行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果断地精简领取报酬的机关，将其数量限制在绝对必须的最小限度，团的工作至少应有一半、在各工业中心应有 3/4 由团员无偿承担，更广泛地吸收普通团员履行共青团的义务。

（10）共青团文化教育工作的开展应同共青团日常积极参与社会政治生活（苏维埃、工会、合作社）和党的生活结合起来。

（11）抛弃使人昏昏的官样文章、墨守成规的“说教”和无中生有、庸俗浅薄的讨论稿，在生动活泼的讨论、同志式的交换意见、真正地而不是装装门面地掌握知识的基础上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12）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在共青团内实行民主制度，不搞压制，停止对在党内和团内问题上持不同意见者的迫害和将其开除团籍的做法，严格遵守章程所规定的召开区、县、省以及其他级别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期限。

九、我们的国际形势与新战争的危险

苏联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

帝国主义者针对苏联的战争不仅可能，而且不可避免。

延缓这一危险，赢得尽可能多的时间以增强苏联的实力、巩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团结，应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实际任务。只有几个举足轻重的国家的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方可防止这一危险。

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明显，这是因为：（1）资本主义几年来为增强自己的实力而进行的斗争以及在这场斗争中所取得的部分成果，已使**市场问题**成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最为紧迫的问题；（2）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苏联经济实力的增长确信无疑，他们看到，在对外贸易垄断保护下的无产阶级专政使资本家在俄国得不到“自由的”市场；（3）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正在利用苏联的**国内困难**；（4）中国革命的失败以及以前的几次英国罢工的失败，使帝国主义者对最终打垮苏联产生了希望。

英国同苏联断交一事早在酝酿之中，但正是中国革命的失败加快了这一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断交是对联共中央放弃在中国的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惩罚。如果认为如今此事不过是英国同我国的贸易方式上的变化（“就像同美国做生意一样”），那就完全错了。现在已经真相大白：英帝国主义有着更广泛的行动计划。它手中握有几个国家的资产阶级的“道义委任状”，正准备向苏联开战，并打算设法让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也许还有南斯拉夫、意大利、匈牙利等国都参加针对我国的战争。

看来，波兰希望再有一段时间来准备同我国作战。不过英国可能会迫使它提前参战。

在**法国**，英国对反苏统一战线施加的压力得到资产阶级权贵的支持，他们的要求越来越强硬，他们在适当的时机当然会不惜采取断交的做法。

最近一段时间，德国外交界愈耍花招，人们就愈明白，实际上**“德国的方针是投向西方”**。德国资产阶级已经公开表示，德国在对苏战争中开始会保持“中立”（与1914年的美国类似），以便在战争中多捞一把，然后再公开将自己的中立开价出卖给西方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根本利益危险最大的莫过于将德国资产阶级转而“投靠”西方的做法掩盖起来，因为资产阶级德国对我们的突然打击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只有公开“说出真相”，只有唤起苏联工人和德国工人的警惕性，才能使我们免遭这一打击，或者至少使德国资产阶级难以得逞。

日本资产阶级在苏联问题上随机应变的手法并不比德国资产阶级逊色。他们可以不留任何痕迹，装出“朋友”的样子。他们甚至一度延缓了张作霖夺取中东铁路的行动。但他们在中国正逐渐加强，也许不久就会撕下对苏关系上的假面具。

在近东（土耳其、波斯），我们至少尚未做到使他们在帝国主义者进犯俄国时保证严守中立。到那时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些国家的政府在帝国主义者的压力下情愿为他们反对苏联提供必要的帮助。

在进犯我国时，始终与苏联势不两立的美国将会充当帝国主义的“大后方”，其作用势必更大，因为只有它能为反苏战争提供财政保证。

结论：如果说1923～1925年是我们得到许多资产阶级国家**承认**的时期，那么现在正面临**断交**时期。1923～1925年这一时期的承认本身并不表明和平有了保证，喘息时机可以持久。目前的断交本身也不能说明战争**在最近期间不可避免**。不过可以肯定，我们已

经进入了国际局势极其紧张、苏联有可能遭受进攻的新时期。

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重重。世界资产阶级很难长期结成反对我国的统一战线。但某些资产阶级国家在一定时期结成局部的反苏同盟则是完全可能的。

这一切应当促使我们党：

（1）承认国际局势是危险的；

（2）再次在广大群众面前将国际政治问题提到首位；

（3）高度紧张地进行苏联防御战争的全面准备工作。

资产阶级政党，包括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一定会千方百计地向人民隐瞒帝国主义准备对苏联发动的这场战争的真正性质。我们的任务是：现在就向全世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讲明，这将是一场帝国主义者和奴隶主反对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战争，是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实际上是为保留整个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体系而战；苏联则是为国际无产阶级，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遭受奴役的国家的利益而战，为国际革命和社会主义的事业而战。

我们的一切工作现在就应遵循下列口号：（1）打倒帝国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战争。（2）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所有与苏联交战国的国内战争。（3）所有与苏联交战的资产阶级国家必败——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个正直的无产者都要为“自己”政府的失败而努力。（4）每一名不愿帮助“自己”国家奴隶主的外国士兵都投向红军——苏联是一切劳动者的祖国。（5）“保卫祖国”的口号在所有资产阶级国家都是保卫帝国主义利益的遮羞布，只有正在进行反帝民族革命战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除外。保卫祖国的口号在苏联才是真实可信的，因为我们保卫的是社会主义祖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根据地。（6）我们从1917年10月25日起就是护国主义者。我们的“卫国”（列宁）战争将是为作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

军中的一支队伍的苏维埃共和国而战，我们的“卫国”战争不是要打出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要打出一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我们保卫祖国就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战争是由工人和雇农依靠贫农、联合中农来进行的，而且也打击“本国的”富农、新资产者、官僚、乌斯特里亚洛夫式专家、白色侨民。我们的战争的确是一场正义的战争。谁如果不是苏联的护国主义者，他无疑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叛徒。

……

资本主义的局部稳定与共产国际的策略

布尔什维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以世界大战和我国革命为开端的时代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共产国际是作为“世界革命的政党”而成立的。对这一点的承认已写进“21条”，这是共产党人与社会民主党人、形形色色的“独立的”孟什维克的首要的分界线。

当然，承认战争和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革命的时代决不是说任何时候都面临革命的形势。在一定时期，在某些国家和某些生产部门，“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能够局部地恢复经济，甚至能够发展生产力。世界革命的时代有高涨期，也有衰落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战斗力、反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共产国际的正确领导在这方面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高潮和低潮都改变不了列宁对整个当今历史时代的基本评价。只有这个评价才能成为共产国际的革命战略的基础。

然而，由于国际革命运动的连续失败和因此而产生的悲观情绪，斯大林集团不知不觉地采用了一种全“新”的、实质上是社会民主党的对当今时代的评价。一国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其实是根据资本的“稳定”可能持续几十年这一假设得来的。就实质而言，这一“理论”完全是颓废的“稳定”情绪的产物。一国社会主

义的“理论”受到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欢迎决非偶然。切尔诺夫[①]正是以此为根据来论述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产主义民粹主义”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写道：“斯大林和布哈林作出了**与民粹派一模一样**的结论，即社会主义可以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斗争旗帜报》1926年第17～18号）社会革命党人之所以赞成这一理论，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理论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策略。

根据斯大林同志的报告通过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以下说法显然是错误的：“在**国际关系**方面，**‘喘息’正在巩固和扩大，它已经变成……整整一个时期。**”[②]

斯大林在1926年12月7日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的共产国际的全部政策，就是根据以世界局势的这一根本不准确的评价制定出来的。（速记报告，第12页）这一评价已显然是错误的。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年7～8月）的决议甚至说资本主义在技术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稳定不受任何限制。这使斯大林对世界局势的评价与第二国际的领袖奥托·鲍威尔、希法亭、考茨基等人的评价更加接近。

从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至今已经有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如果只说最重大的事件的话，发生了英国的全国大罢工，中国革命的重大事件，维也纳的工人起义。在当前“稳定”的条件下以不可阻挡之势接连发生的所有这些事件说明，资本主义积聚了许多爆炸物，它的“稳定”是很不牢固的。所有这些事件是对一国

① 切尔诺夫，维·米·（1873～1952）——社会革命党领袖和理论家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18年1月任立宪会议主席。后流亡国外。

②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3分册，第75页。

社会主义的理论的迎头痛击。

资本主义的“稳定”的背后是2000万人失业，生产部门严重开工不足，军备迅猛增加，世界经济联系极不稳固。欧洲所面临的新的战争危险最好不过地暴露了对持久和平时期所抱的希望之渺茫。小资产阶级正在幻想着“几十年的”稳定，他们被资本主义对工人的“胜利”所迷惑，被资本主义在技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成就所迷惑。然而实际情况正向战争方面发展，也就是说，一切“稳定”都将被炸毁。工人阶级和东方受压迫的人民群众一次又一次地试图打破这个“稳定”：时而在英国，时而在中国，时而在奥地利。英国举行了全国大罢工，而英国共产党只有5000名党员。维也纳爆发了工人起义，牺牲的人数足以进行一场革命，而奥地利共产党只有6000名党员。中国掀起了工农群众武装斗争的高潮，可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却成了国民党资产阶级上层集团的附属品。这就是当前世界局势的最突出的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稳定”得以保持和延续的原因。

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帮助各国共产党成长壮大，以适应当今时代对他们提出的巨大要求。这首先需要共产国际自身对世界局势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们的国际共产党（共产国际）应当向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团结整个国际工人阶级进行防止战争、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取社会主义的战争的斗争。为此，工人共产党员首先应当把愿意革命的非党工人、无党派人士、社会民主党人、工团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以及仍在参加纯资产阶级组织的正直工人争取过来。“统一工人阵线应当是所有愿意同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工人的统一体，当然也包括那些仍然跟随无政府主义者—工团主义者之流的工人。在罗曼语系国家，这类工人的数量还相当多。”列宁在世时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作出了这样的决议。这个决

议至今仍有意义。

第二国际和阿姆斯特丹的领导人已经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在未来战争中的卑鄙做法和背叛行为将超过他们在1914～1918年所扮演的角色。保罗－彭吉尔（法国）正在设法通过一项预先将工人整个出卖给战时的资产阶级独裁者的法律。总理事会（英国）为杀害沃伊柯夫[①]的凶手辩护并同意向中国派兵。考茨基（德国）呼吁在俄国举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起义，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则在策划一场“手榴弹运动”。芬兰和拉脱维亚的社会民主党人部长们、波兰社会党的领导人“时刻准备着”支持对苏战争。美国一些官方工会的领袖们的做法与那些执迷不悟的反动分子一样，公然反对承认苏联。巴尔干的“社会党人”在支持屠杀“本国”工人的刽子手，并且始终支持进军“异己的”苏联。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口头上“支持苏联”，但那些曾帮助本国的法西斯分子血腥镇压维也纳工人起义的人到关键时刻当然会支持资本家。俄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在强大的干涉者出现之前不赞成干涉苏联。掩饰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本质的所谓“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领袖是主要的危险，因为他们在阻止那些仍然跟随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与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彻底断绝关系时最卖力。通过搞极左活动与共产主义决裂的原共产国际成员（如卡茨、施瓦尔茨、科尔什、罗森贝格）也扮演着这类叛卖的角色。

随着战争的临近，与彻头彻尾反革命的（包括从公开的右派到所谓“左派”形形色色的人物）社会民主党上层人物勾勾搭搭。统一阵线的策略决不应解释为与背信弃义的总理事会结盟、与阿姆斯特丹亲近，因为这种政策削弱工人阶级，使之不知所措，提高了真

① 沃伊柯夫，П.Л.（1888～1927）——1913年入党。1924年起任苏联驻波兰全权代表。在华沙被害。

正叛徒的声望，使我们难以最大限度地团结自己的力量。

由于斯大林实行“向左开火”的错误方针，近一两年来，在对共产国际一些极其重要部门的领导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右翼（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意大利），这违背了工人共产党员的意愿。

右派领导集团的旨在剪除共产国际中所有左翼的政策削弱了共产国际的力量，并孕育着极大的危险。其中德国清除乌尔邦斯集团的行动就是按照剪除共产国际中所有左翼的政策进行的。左派因乌尔邦斯—马斯洛夫的支持者被当成“叛徒”、“反革命分子”、“张伯伦的代理人”受到恶意迫害而在论战中说了几句急躁话，斯大林集团便抓住这些话不放，一个劲儿地把德国左派推上另立政党的道路，力图使德国共产党人队伍中的分裂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

其实乌尔邦斯集团在国际工人运动的所有基本问题上一直捍卫列宁的观点。即使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也肯定会一心一意地保卫苏联。他们当中有几百名与广大工人群众相联系的老资格的工人布尔什维克骨干。这个集团受到成千上万仍留在德国共产党内的工人党员爱戴。

让那些承认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所有被开除的同志，首先是乌尔邦斯集团，重返共产国际，这是纠正斯大林分裂共产国际的做法的第一步。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对真正的“极左”错误进行了揭露，他写道，“机会主义”仍然是布尔什维主义在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现在这个敌人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主要敌人。”①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对此又作了补充：“同这一任务比起来，纠正共产主义运动中‘左’派的错误，将是一项容易的任务。”②

①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11－1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39 卷，第 220 页。

列宁所说的“左派”是指极左派，而斯大林现在所说的反对极左派的斗争，指的则是列宁派的革命者。

同右倾机会主义运动这一主要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并纠正“左派”的错误。列宁曾经号召这样做。我们反对派也呼吁这样做。

“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势力归根到底是资本主义势力。当资本主义在战争危机（1918～1921）后的头几年里迅速陷入困境时，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也随之削弱和衰落。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的年代又使社会民主党得以暂时加强。1920～1921年意大利工人的失败，1921～1923年德国无产阶级的失败，1926年英国大罢工的失败以及1927年中国无产阶级的失败，不论其原因如何，这些失败本身成了无产阶级上层革命情绪暂时低落的原因，使社会民主党因共产党被削弱而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加强，使共产党内的右翼因左派被削弱而占有暂时的优势。工人贵族、工人官僚和小资产阶级同路人的作用在这种时期尤其强大，而且尤其反动。

这些进程不会不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联共党。机关的“中派”一味向左“开火”并用机械手段制造对列宁主义左派更加不利的力量对比。于是便形成一种实际上不是由党来表决、而只由党的机关来表决的状况。

基本原因就是这些，由于这些原因，列宁派对共产国际、联共和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的影响暂时削弱，而右派分子和那些十月革命后还留在敌人阵营、后来被允许加入共产国际（确切地说是接受考查）的半社会民主主义分子（马尔丁诺夫、什麦拉尔、拉费斯、彼得罗夫斯基、佩佩尔等人），还有海因茨·诺伊曼那类冒险主义者，却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变本加厉地进行活动。但是群众中已积聚起重新向左靠、重新掀起革命高潮的因素。反对派正在从理论上和政治上为即将到来的这一天作准备。

非常重要的结论

1. 由于受英俄断交和其他国际、国内困难的影响，在多数领导人中正在酝酿一项“计划”，其内容大致如下：（1）承认债务；（2）在一定程度上取消对外贸易垄断；（3）撤离中国，也就是说“暂时”不再支持中国革命和所有民族革命运动；（4）在国内采取右的“机动措施”即再适当地扩大新经济政策的范围。他们希望以此为代价来消除战争的危险，改善苏联在国际上的处境，克服（或减轻）国内的困难。这个“计划”完全是根据所谓资本主义的稳定可以持续几十年的估计制定的。

其实这并不是“机动措施”，而是苏维埃政权在当前形势下的全面投降：通过实行“政治上的新经济政策”、“新的新经济政策”退回资本主义。

帝国主义者会接受这一切让步，并会更快地转入新的进攻，直至发动战争。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一旦得知我们所作的让步，就会更加起劲地组织一切反苏维埃力量来反对我们的党。我们的这种“策略”会使我国的新资产阶级同外国资产阶级完全串通一气。苏联的经济发展会被国际资本完全控制——借债容易赎身难。工人阶级和农民大众会对苏维埃政权的强大失去信心，对苏维埃政权率领人民前进的能力失去信心。

我们必须设法用“赎买”来避免战争，如果可行的话。但是为此我们必须强大、统一，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世界革命的策略并加强壮大共产国际。只有如此才有充分的机会力争尽量推迟战争的爆发，而且不会以动摇苏维埃政权的根基为代价，万一战争无法避免，还可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并战而胜之。

为了赎买战争或者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吸收外国资本，列宁曾在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者作出一定的让步。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即使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刻，列宁也决不考虑废除对外贸易垄断、给予富农政治权利、减少对世界革命的支持、放松整个世界革命的策略。

首先必须完完全全地确立和坚持国际革命的方针，并对诸如根本就不该“插手中国的事务”、应当“赶快撤离中国”、如果我们“理智”行事“我们就不会有麻烦”之类的“稳定的”、虚假的“从国家利益出发”的情绪予以坚决回击。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如今简直是在起腐蚀作用，并且明显有碍于将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在苏联周围，因为它对其他国家的工人起陶醉作用，麻痹他们的危险意识。

2. 团结我们党的队伍，使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无法再直接利用分裂、分离、“剪除”等进行投机，这同样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这同战争问题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因为现在帝国主义者大多是按照这条道义和政治路线来“试探”我们。国际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所有机关报如今都对我们党内的争论异常感兴趣，而且公开鼓动和怂恿现任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人将反对派排挤出党的领导机关，乃至开除出党，甚至公开镇压。从财力十分雄厚的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时报》到极善投机的第二国际的《维也纳工人报》，所有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都欢迎“斯大林的政府”同反对派作斗争，都呼吁坚决剪除“宣传国际革命”的反对派以再次证明其“国家理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敌人对分裂、剪除等所抱的希望越是落空，战争就越能推迟。我们只有保持完全统一，只有首先让帝国主义者对分裂、分离、剪除所抱的希望落空，才能赎买战争（如果这是可行的）并在战争中取胜（如果非打不可的话）。分裂、分离、剪除等只有资本家才需要。

3. 必须修正我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阶级路线，停止反对共产国际左派的斗争，让那些仍承认共产国际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的被

开除者重返共产国际，彻底抛弃同英国总理事会背信弃义的领袖们“真诚合作”的政策。在当前形势下与总理事会的联盟的破裂和1914年的与第二国际的社会党国际局决裂具有相同的意义。列宁当时要求每一个革命者都坚决实行这一决裂。

继续与这样的总理事会结盟无异于至今仍在帮助第二国际的反革命领袖。

4. 必须坚决修正我们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路线，首先是修正在中国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中的路线；必须清除马尔丁诺夫—斯大林—布哈林路线，回到列宁的路线上来，回到共产国际第二次和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上来。否则我们就会从民族革命运动的动力变为民族革命运动的阻力，并且必将失去东方工人和农民的同情。中国共产党要克服组织上和政治上对国民党的任何依赖。共产国际要从自己内部把国民党驱逐出去。

5. 必须连续不断地、坚持不懈地争取和平。为此，必须采取包括推迟战争、“赎买”即将爆发的战争在内的一切可能的和可允许的办法（见第1点）。

同时，现在就要不停地进行战争准备，而且首先要在战争的危险是否临近这个问题上消除思想和政治方面的分歧和混乱。

6. 坚决修正我们在内政方面的阶级路线。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取胜就只能靠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路线：工人和雇农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

7. 千方百计地从整个经济、预算等方面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

* * *

资本主义正步入一个新的动荡时期。对苏战争和对中国的战争一样，会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一连串的灾难。1914～1918年的战争就已是推动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的“加速器”（列宁）。新的战

争，尤其是对苏战争（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苏联就会得到全球劳动者的同情），可能成为促使世界资本主义灭亡的更大的“加速器”。**没有新的战争社会主义革命也会发展。但是，新的战争必将导致社会主义革命。**

十、红军和红海军

国际局势日益将苏联的国防问题推至首位。党、工人阶级和农民现在应该重新对红军和红海军予以极大关注。

国防中包含了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事实。军队是整个社会制度的缩影。军队不仅最明显地反映出制度的优点，也暴露出其弱点。经验表明，在这方面绝不能做表面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宁可再三进行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也不要轻信。

国内各阶级的相互关系问题和党在这方面的正确政策对于军队内部团结、对于官兵关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工业化问题对于国防的技术手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本纲领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工人运动、工业、农业、苏维埃制度、民族问题、党和共青团等方面提出的所有措施对于加强红军和红海军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具体建议已提交政治局。

十一、关于真正的和臆造的分歧

斯大林集团始终力图同臆想的观点、我们过去和现在都从未有过的观点而不是我们的真正观点进行争论，这最好不过地说明了斯大林集团政治上的错误。

当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派别争论的时候，布尔什维克总要向工人群众讲明自己对手真实的观

点。但是当孟什维克或社会革命党同布尔什维克争论的时候，这些人所反驳的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真正观点，而是把布尔什维克从未说过的话强加给他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根本不会向工人群众如实地说明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因为如果这样做工人就会支持布尔什维克。整个阶级斗争机制使这些小资产阶级集团必然同布尔什维克作斗争，骂对方是“阴谋家”、“反革命的帮凶”，以后又是什么“德皇威廉的代理人”，等等。

现在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在同我们的列宁主义观点作斗争时，只能是把我们从未想过和从未说过的东西强加到我们头上。斯大林集团非常清楚，假使我们能够较为自由地维护我们的真正观点，我们党的大多数党员就会支持我们。

诚实的党内辩论的起码条件未得到遵守。反对派在中国革命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上的言论，中央委员会至今没有发表。斯大林集团把党严密地封锁起来，把反对派同党的报刊隔绝开来，正与我们进行不停的论战，日复一日地把种种不实之词和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而党员则越来越不相信这些指责。

1．我们说目前资本主义的稳定并不是可以管几十年的稳定，我们的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列宁），斯大林集团就硬说我们否认资本主义的所有稳定因素。

2．我们跟随列宁，指出为了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还要在一个或几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内取得胜利，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已经论证过，社会主义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特别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内最终取胜，斯大林集团则硬说，我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

3．我们跟随列宁，指出我们这个无产阶级国家的官僚主义蜕化日益严重，斯大林集团则硬说我们一向认为我们的苏维埃国家不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见 1926 年 12 月

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签名的声明，第一条，)："凡是试图直接或间接支持我们、同时又否定我们党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性质、否定苏联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人，今后仍将遭到我们无情的回击。"斯大林集团把我们的声明隐瞒起来，却继续对我们进行诬蔑。

4．我们指出热月的因素在我国日益增加，且有着相当坚实的社会基础；我们要求党的领导者对这些现象及其对我党某些环节的影响进行经常的、坚决的和有计划的回击，斯大林集团则硬说我们宣称党已热月化，无产阶级革命已经蜕化变质。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见上述声明，第14条)："说我们指责我党的多数派右倾，此话不对。我们只是认为在联共党内有右倾派别集团，它们现在具有大得不成比例的影响，但是党能够克服这种影响。"斯大林集团则将我们的声明隐瞒起来，继续对我们进行诬蔑。

5．我们指出富农在大量增加，我们追随列宁仍然断言富农不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它是无产阶级革命最凶恶的敌人，斯大林集团则指责我们想要"剥夺农民"。

6．我们提醒我党注意私人资本的地位加强、私人资本的积累及其在国内的影响过分增长的事实，斯大林集团则指责我们反对新经济政策和要求恢复军事共产主义。

7．我们指出有关工人物质条件方面的政策失当，解决失业和住房短缺的措施不力，非无产阶级分子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过度增加，却被指责为犯了"行会"倾向和"蛊惑人心"的错误。

8．我们有时指出工业一贯落后于国民经济的需要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比例失调、商品荒、联盟破裂，有人却称我们是工业化主义者。

9．我们指出未能抑制物价上涨、倒让私商发财的错误政策，斯大林集团却指责我们赞成提高价格的政策。我们向整个共产国际

声明（见上述声明，第6条）：“反对派从未要求或建议提高物价，但认为我们经济政策的主要错误正是在于没有进行足够的努力来解决必然使零售价格居高不下的工业品荒问题。”他们则对全党隐瞒了这个声明，继续诬蔑我们。

10. 我们反对同总罢工的叛卖者和公开扮演张伯伦代理人角色的英国总理事会的反革命分子“真诚合作”，却被指责为反对共产党人在工会中开展工作，反对统一战线的策略。

11. 我们反对苏联工会加入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反对以任何形式去讨好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却被指责为“社会民主主义倾向”。

12. 我们反对指靠中国的将军们，反对让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对马尔丁诺夫的孟什维克策略，却被指责为“反对中国的土地革命”，“和蒋介石同谋”。

13. 我们基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得出了战争已经临近的结论并及时向党指出这一点，我们却遭到无端的指责，说我们“想打仗”。

14. 我们忠于列宁的教导，指出在战争临近时尤其需要奉行坚定、明确的阶级路线，却有人无耻地指责我们不愿意保卫苏联，说我们是“有条件的护国派”、准失败主义者，等等。

15. 当我们指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即全世界资本家和社会民主党人的报刊都支持斯大林同联共（布）内反对派斗争，赞扬斯大林对左派的迫害，呼吁剪除反对派，将反对派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真理报》以及所有党的和苏维埃的报刊却每天都在欺骗说，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支持反对派”。

16. 我们反对把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交到右翼手中，反对将成百上千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开除出共产国际，斯大林集团却指责我们在策划分裂共产国际。

在目前党的制度不正常的情况下，反对派试图让全党都知道反

对派的观点，这些忠诚的党员却因此被指责为搞“派别活动”，有人还炮制了“分裂行动案”，将最重要的意见分歧搞乱。近来最喜欢用的罪名是说我们搞“托洛茨基主义”。

我们曾向整个共产国际声明（见上面引证的1926年12月15日声明，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签名）：“说我们维护托洛茨基主义，此话不对。托洛茨基曾向共产国际声明，在他和列宁争论过的所有原则问题上，列宁是正确的，特别是在不断革命和农民问题上。”斯大林集团拒不发表这篇向整个共产国际提出的声明，并继续指责我们搞“托洛茨基主义”。

当然上述声明所提到的只是和列宁之间的过去的分歧，绝不是斯大林和布哈林心怀叵测杜撰出来的那些“分歧”。他们人为地把以往的分歧、同十月革命过程中发生的分歧联系起来。

我们注意到，斯大林集团企图施展卑鄙的伎俩，利用1923年和1925年两派之间的分歧，“掩盖”本纲领阐述的反对派的观点。而这些分歧现在已经在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消除了。由于当时党内和国内一些情况不明，布尔什维克两派在1923～1924年的争论中所犯的错误和过激之处，现在已经得到纠正，并不会妨碍大家共同进行反对机会主义和维护列宁主义的斗争。

离列宁越来越远的斯大林和布哈林集团断章取义，粗暴和不正当地滥用任意摘选的列宁很久以前的那些论战评语，向党隐瞒列宁后来的另一些话，公然伪造党的历史和昨天的事实，更为严重的是斯大林和布哈林集团通过曲解和公开偷换现在争论的所有问题，企图欺骗党，使党相信目前这场斗争是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斗争，而实际上这场斗争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机会主义之间的斗争。当初修正主义者就曾打着同“布朗基主义”斗争的旗号同马克思主义斗争。我们之所以能够齐心协力地同斯大林的路线作斗争，是因为我们一致希望捍卫真正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路线。

本纲领是对指责反对派搞托洛茨基主义最好的回答。凡是读过的人都会确信，这个纲领从头至尾贯穿着列宁的教导，渗透着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

让党来了解我们的真正观点。让党看到有关我们的分歧，首先是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分歧的真正证据。列宁教导我们，如果发生分歧，不要相信空话，要看文件，倾听争论双方的意见，认真地弄清真正的分歧所在，去伪存真。我们反对派重申列宁的这个忠告。

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几天党突然面临意见分歧，必须彻底消除发生此类事件的可能性。必须为公正的争论和公正地解决真正的意见分歧创造条件，这是列宁在世时的一贯做法。

十二、反对机会主义，维护党的统一

关于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在内外政策的主要方面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已经坦率地说明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说明了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犯下的这些错误怎样削弱了我党这个革命的主要杠杆。同时我们还说明，尽管如此，党的政策**可以从党内去改正**。不过为了改正党的政策，必须明确和坦诚地提出党的领导所犯错误的性质问题。

这些错误是机会主义的错误。根据列宁的经典定义，机会主义的展开形式就是工人阶级上层和资产阶级组成联盟，反对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在苏联所处的环境下，工人阶级的上层极力同新生的资产阶级（富农和耐普曼）妥协，同世界资本主义妥协，牺牲工人和贫农广大群众的利益，这是登峰造极的机会主义。

我们指出这种倾向在我党的某些部分的最初出现和发展，因此指责我们对党进行诬蔑是荒唐的。因为我们正是呼吁党反对那些正在对党构成威胁的倾向。说我们指责党的某些组织或中央委员会背叛革命和出卖无产阶级利益，这同样是荒唐的。一条错误的政治路

线可以产生于对工人阶级利益最真诚的关怀。甚至我党极端右倾的代表也相信，他们准备同资产阶级达成的妥协是工人和农民利益的需要，是列宁认为完全可以允许的那些策略行动之一。那个代表公开下滑倾向的右倾集团，并不希望出现热月。然而需要悄悄地滑向奉行典型的自我安慰和自欺欺人的政策的“中派”。

斯大林及其亲密助手深信，他们借助于自己的强大机关，无须通过斗争即可以巧妙战胜反对派。他们肯定真的认为他们是在“玩弄”，正如他们暂时“玩弄”中国将军们一样，只要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利用过他们之后，就会像榨干的柠檬一样将其抛弃。斯大林及其助手们肯定真的以为是他们在“玩弄”普塞尔之流，而不是相反［……］①

① 文件至第76页中断。按残本刊印。

№07507

普特纳就党内状况致托洛茨基

（1927 年 8 月 3 日）

尊敬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我想提醒您注意我所了解的我们党过去的一些情况：个别同志和个别集团就外部建设问题打报告，中央并未对他们的行为作出纪律处分，有时甚至还公开表示鼓励或赞成。

首先说说 1921 年那一次吧，我任伏尔加河下游部队司令员，亲眼目睹了红军在同匪帮和饥饿作斗争的艰苦条件下所遭受的艰难困苦，认为有必要向中央汇报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我给中央打了报告（当时列宁还在中央），也并未因此而遭到任何非难，而且无论是中央委员会，还是作为武装力量统帅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都没对我进行镇压（报告的副本还保存在我这里）。

第二次是 1924 年初，高级进修班搞了一个文件，即就军队建设问题写给中央的报告（参加起草的人有德宾科同志、费季科同志、乌里兹基同志和别洛夫同志等），他们通过哈哈尼扬找到我，要我也在文件上签名，借口说个别中央委员已经知道有这个文件，也赞成把它交给中央。

我与提到名字的几位同志在观点上有严重分歧，因此就没在报告上签名，但是我知道，报告确实交给了中央，而且所有在报告上签名的同志都“平安无事”，报告起草人在报告上报后不久还被提升。

我还记得，在 1924 年冬季和春季的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

上已经知道这个写给中央的报告，但是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并未对当时已是党员的这几位同志（高级进修班的）采取任何措施。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普特纳

1927年8月3日于莫斯科

№07508

托洛茨基：答曼努伊尔斯基

（1927 年 8 月 3 日）

曼努伊尔斯基证明说，托洛茨基同志是巴雷尔（Бappep）。曼努伊尔斯基这样也就证明了我国存在热月分子。

指责反对派倾向资产阶级民主派，说反对派成功就等于资产阶级民主派成功，这样指责就是承认存在热月的危险性。

指责反对派是小资产阶级倾向，同时又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复辟的危险性，这就是自相矛盾。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前和新经济政策初期，我们的许多同志曾多次地与列宁谈及热月及其危险。谁也没有产生过那种认为热月不可能发生的教授学究或官僚主义骗子的荒谬看法——由于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等等，等等。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8 月 3 日

№07509

托洛茨基：喀琅施塔得

（1927年8月3日）

喀琅施塔得式的热月是通过夺取军事机制实现的。但是可以滑向喀琅施塔得。既然喀琅施塔得分子是喊着苏维埃的口号和以苏维埃的名义滑向资本主义制度的，那就甚至可以打着共产主义旗帜滑向喀琅施塔得的立场。历史及其狡猾之处就在于此。

列·托洛茨基

1927年8月3日

№07510

托洛茨基：中国问题上的托洛茨基主义与孟什维主义

（1927 年 8 月）

声　　明

在会议快结束时谨作如下声明：

我在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发言中曾提到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即孟什维克完全赞成斯大林—马尔丁诺夫—布哈林的对华工作路线。这一事实和其他许多事实一样，就连我党的高层都不了解，其原因全在于不偏不倚的报刊上刊登的材料都极为偏颇和草率，至于《真理报》上的文章就更不用说了。我曾指出，唐恩和阿布拉莫维奇认为与反对派的正确路线相对立的斯大林—布哈林的路线是孟什维主义路线，全会上有人试图驳斥我的说法，驳斥方式之粗暴并不能掩饰其理屈词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把确切的引文拿出来。这里仅引两段：

第 1 段引文：

“原则上”布尔什维克也主张在民族解放任务尚未完成之前保持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马尔丁诺夫早在 4 月 10 日就在《真理报》上（显然照例把社会民主党人大骂了一通）完完全全地“从孟什维克的立场出发”，明明白白地向左翼反对派拉狄克证明官方的观点是正确的，官方的观点坚持必须保持“四个阶级的联盟”、不要急于毁掉大资产阶级与工人平起平坐的联合政府、不过早把

“社会主义的”任务强加给联合政府。（1927年4月23日《社会主义通报》杂志第8期第4页，前面处黑体是我用的）。

第2段引文：

《社会主义通报》杂志针对斯大林同志为宣传员确定的宣传提纲写道：“如能排除党内首席人物的语言中每每总要出现的糟粕，**对提纲所确定的‘路线’的本质未必能提出多少反对意见。**”尽量不离开国民党并且紧紧地抓住左派的武汉政府、“避免在条件不利时进行决战”、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以免“向中国人民的敌人提供新的武器，他们可利用新的武器反对革命和编造所谓中国进行的不是国民革命，而是在人为地推行莫斯科的苏维埃化的新神话”——这样提法目前**对于布尔什维克说来也许更明智一些**，如今“统一战线”看来已无可挽回地受到破坏，偌大的家底也在最为“不利的条件”下全部败落。（1927年5月9日《社会主义通报》杂志第9/151期第1页，黑体是我用的）

在从华沙到纽约的所有社会民主党报刊中都能够找到类似的和比这更能说明问题的引文。

列·托洛茨基

［1927年8月］

№07511

致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1927年8月4日）

绝密

第12511/C号

受斯大林同志委托寄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皮达可夫等同志“就莫洛托夫同志的发言的声明”，请一阅。

附：第52号件，共4页。[①]

中央委员会书记助理（签名）

① 见本专题文件№07512。

№07512

加米涅夫等就莫洛托夫发言的声明

（1927年8月4日）

第52号件
副本
秘密

发文第12511/C号
1927年8月4日发出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
请予公布

关于莫洛托夫同志有关反对派“起义”的发言的声明

莫洛托夫同志星期六的发言表明斯大林的小集团现在想的和急于干的事情是什么。对关于失败主义或“有条件的护国论”的诽谤，我们已经表过态，在这里再次表示，反对派从未向任何人提出过保卫祖国的条件，而且在为创造取胜的条件进行斗争，将来也是这样。

莫洛托夫同志就此声明（这也是他的态度的惟一目的），反对派的路线像1918年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路线一样，会导致反党和反苏维埃政权的起义。这番话不是对反对派的路线，而是对斯大林的中派集团的路线的十分准确而清楚的概括。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曾与我党临时结盟。他

们在与德国战和问题上与我党有过特别严重的分歧。他们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变成少数派，便发动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起义。对于革命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把他们摧垮。

左派共产主义者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时出面反对布列斯特和约。他们采用了极其激烈的、往往是完全禁用的斗争方法，甚至提出有条件地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他们以在国内战争和出现外部危险时搞分裂来威胁党。即使是这样，事情也没有发展到“起义”、分裂的地步，甚至没有一个人被开除出党。原因就在于，列宁领导下的党中央不但没有挑起分歧，而且，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公开发动起义，尽管左派共产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向它靠拢（曾联手投票），党中央也从未产生过关于“起义”的带挑拨性的怀疑。仅此一点即可看出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在党的根本观念和工作方法上的根本区别。

莫洛托夫所谓统一政党内的反对派要发动“起义”的话决非偶然。他的这番话是早已酝酿成熟的计划的组成部分。同志们，你们许多人已经完成了部分计划和一小部分计划，却没有看到也不知道整个计划。我们去年7月就在我们的宣言的后记中提醒你们注意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即对党的领导层作激进的人事变动（参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速记记录。1926年10月23～26日》第36页）。现在，这个计划的第一阶段快要结束了，莫洛托夫的发言使我们面临计划的第二个也是最后的阶段。斯大林集团的核心对反对派用了“起义”这样的字眼，意在让全党领会粉碎反对派的思想。

我们认为有必要十分明确地提醒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注意这个问题。

说反对派主张有条件的护国，这不是事实。然而斯大林集团在保卫祖国的问题上竭力在党内反对派与其他派别之间制造障碍、设

法在战争危险日益临近的情况下把著名军界人士调往哈巴罗夫斯克、日本和阿富汗等地从而削弱国防力量，却无疑是事实。

说反对派在筹建第二党，这不是事实。斯大林集团一直希望不仅通过党的机关的方法，而且通过国家机关的方法一劳永逸地使党听命于自己，却无疑是事实。

说反对派认为革命进入了热月时期、我们的党也是热月党，这不是事实。党受到了压制，党的反抗能力遭到了削弱。而热月分子在我国确实出现了，他们有恃无恐地把自己的头目塞进党内。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乌斯特里亚洛夫坚持要求斯大林彻底摧垮反对派就是明明白白的、毫不含糊的热月语言。斯大林把整垮党的左派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就是身不由己地扶持和加强乌斯特里亚洛夫一伙的力量，而削弱无产阶级的阵地。

说反对派的道路通向反党和反苏维埃政权的起义，这不是事实。斯大林集团为从组织上整垮反对派而在实现自己目的的必经之路上无情地架起一座立交桥却无疑是个事实。反对派没有发动起义的迹象。然而，却有斯大林集团继续篡夺党的最高权力的真正危险。这一危险已借莫洛托夫之口公开宣布出来，斯大林集团的上层人物实际上已经以“起义”为口实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粉碎反对派的准备，口头上却安抚那些动摇不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说事情不会搞到这种地步，只是吓唬吓唬反对派而已——斯大林集团通过这种办法把更广大的阶层逐步地引上了自己的思路，使他们渐渐地习惯于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全盘端出，今天也肯定会把他们都吓坏的。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应当把这些本来是不言而喻的话都在这里说清楚：反对派既不会被诽谤吓倒，也不会被从肉体上搞垮的恐吓吓倒。动摇分子正在离开反对派，被事变说服了的成百上千的基层党员正在向我们靠拢。恐吓不能吓倒反对派。镇压措施也无法摧垮

反对派。我们会把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坚持到底。我们相信党的无产阶级核心。我们知道，事变对列宁的路线有利，因而也对反对派有利。我们相信，在和平和战争的条件下都可以在既不会出现“起义”和“两个政党”，又不会出现任何动荡和镇压的情况下修正党的路线。反对派是吓不倒的。但要防止党和革命统一受到愈来愈可怕的篡权倾向的侵害。反对派保留自己依据事变进程耐心地、不厌其烦地表明自己观点的权利。但是对进一步践踏党章、对侵犯代表大会的权利、对人为地挑选而成的斯大林集团窃据党的言论和党的报刊，对于由国家机关来堵反对派的嘴巴，对关于斯大林领导核心实行终身制的学说、对篡夺权力（侵权）的理论和实践，反对派将采取一切手段，配合党的革命统一和牢固的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反对派决不允许在斯大林集团的小圈子内决定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应当由党也将由党来决定。我们完全彻底地主张联共和共产国际实现革命的统一。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重申，我们愿意欢迎任何有助于改善党内关系的建议。要缓和党内斗争，要使党和中央委员会在各项工作中便于更合理地使用各方面的力量，以满足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需要；最后，还要创造条件，保证对真正的分歧进行全面的审查，保证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制定出正确的路线。

加米涅夫、彼得松、季诺维也夫、
拉柯夫斯基、皮达可夫、叶夫多基莫夫、
斯米尔加、利兹金、穆拉洛夫、
索洛维约夫、托洛茨基、阿夫杰耶夫、
巴卡耶夫

1927 年 8 月 4 日

№07513

季诺维也夫：斯大林的三个国民党

（1927年8月）

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同志在1917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来之前召开的布尔什维克三月会议上讲过下面一番话（有我要求刊印和散发的现存的速记记录为证）：

“临时政府起了巩固革命人民成果的固定剂作用。工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苏维埃在动员各方力量并实行监督。临时政府固执地、懵懵懂懂地起着巩固人民成果的固定剂作用，这些成果事实上已经掌握在了人民的手中。这种状况有消极的一面，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强行推进事变发展、加快资产阶级阶层向外分离的进程现在对我们不利，他们以后肯定要离开我们的。我们必须赢得时间，阻挠中间派资产阶级阶层向外分离，以便准备进行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

只要临时政府在巩固革命步骤，就要支持它，只要临时政府是反革命的，就不能支持临时政府。”（见党的1917年三月会议）

该速记记录接着写道：

“讨论策列铁里[①] 关于统一的建议。

斯大林：我们应当同意。有必要确定我们关于统一路线的建议：可以按照齐美尔瓦尔德—昆塔尔的路线实现统一。不要冒进，也不要警告可能出现分歧。没有分歧就没有党的生命。我们将在党

① 策列铁里，伊·格·（1881～1959）——孟什维克领袖之一。1917年任临时政府邮电部长和内务部长。1918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首脑之一。后流亡国外。

内根除小的分歧。”（同上）

这话对吗？不对。这是布尔什维主义吗？不是。这像列宁说的话吗？一点儿也不像。但很像斯大林现在针对中国革命所讲的话。是的，确实像。这是斯大林的**第一个国民党**，俄国的“国民党”。

斯大林的第二个“国民党”与1923年的德国革命有关，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问题。这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对此当然需要作出阐述，需要进行研究。斯大林的第二个“国民党”是1923年8月在德国掀起运动时出现的。当时斯大林同志给我和布哈林同志写了信，我们那时都在休假，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同他有分歧，他写道：

“共产党是否应该（在目前阶段）在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情况下力求夺取政权，他们是否已成熟到了这个程度，依我看，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当时在俄国夺取政权，具备以下条件：（a）和平，（b）给农民以土地，（c）绝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支持，（d）农民的同情。这些条件德国共产党人现在都不具备。当然，他们邻近有个苏维埃国家，这是我们当时没有的，但是目前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呢？假如德国的政权现在垮台，共产党人把政权接过去，那么他们也肯定会出丑。这还是‘最好的’情况。最坏的可能是，他们身败名裂并且被抛弃。问题不在于布兰德勒[①]想‘教育群众’，问题在于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的右翼肯定会把这种教育和游行示威变成决战（他们暂时有这方面的一切机会）并把它们搞得落花流水。当然，法西斯分子也并没有打盹，然而法西斯分子先发动进攻对我们有利：这样会把工人阶级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德国可不是

① 布兰德勒，亨·（1881～1967）——1898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1923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1年采取“左派”立场。1923年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929年被开除出党。

保加利亚）。另外，从各方面来看法西斯分子在德国是软弱的。依我看，对德国人要制止，而不是鼓励。”

同志们，我敢肯定地说，这是1917年3月的斯大林倾向的合乎逻辑的继续。这是第二个也就是**德国的**“国民党”。所谓我们不能在没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的情况下去夺取政权、在政权垮台时共产党人不应起来夺取政权、法西斯分子如同1927年的蒋介石一样“软弱”等等问题提法，就是斯大林的第二个，即德国的“国民党”。

最后是第三个“国民党”，那就是1927年初的中国的真正的国民党，对它的情况我也要向你们作些说明。列宁曾经说过：

“一切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资产阶级政客，一贯都用许诺来‘款待’人民和愚弄工人。

来自取消派阵营的卑鄙政客们则说，我们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当支持资产阶级。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道，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工人应该使人民看清资产阶级政客的骗局，教导人民不要相信空话，只能依靠本身的力量、本身的组织、本身的统一，本身的武装。”①

这是否也适用于中国革命呢？完全适用。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8月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8～19页。

№07514

托洛茨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①]

（1927 年 8 月 6 日）

托洛茨基：（念讲话稿）。斯大林同志昨天在这里说，反对派站到了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之下。斯大林同志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特征是否定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同志们，我看这个问题并没有抹掉，而且我认为在最近一个时期内都不会从议事日程上抹掉。引证某些已经形成的决定，即使引证得对，也只能说明应把决定作为明显错误的决定进行重新研究。实际情况是，这个问题从未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充分研究过，也从未就这个问题作出比较全面的决定。

席上插话：也许您会回答昨天给您提出的问题吧？

托洛茨基：另一方面，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极其明显地暴露出那种把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观点说成是与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观点相对立的**托洛茨基**观点的做法很不严肃。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谈的是政治派别问题，首先按政治路线来讨论这个派别，即按似乎与列宁主义分道扬镳的所谓“托洛茨基主义”的路线来讨论。我现在也恰恰想从这种指责所依据的基本路线入手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作出说明。同志们，我肯定地说，这个基本指责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不能抹煞这样一个事实：早在 1924 年即弗拉基

①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1927 年 7 月 29 日～8 月 9 日）速记记录第 3 分册，第 22 页。

米尔·伊里奇逝世以后，斯大林即已完全清楚而准确地表述了他对关于在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的观点。由此可见，斯大林在列宁逝世以后，即大约两年前，发挥了“托洛茨基”对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观点。

卡冈诺维奇：您还是谈谈自己吧。

插话：这个问题已经谈过了。

托洛茨基：可以说，斯大林错了，后来改正了。他怎么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犯这样的错误呢？如果所谓列宁1915年就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一事属实（这根本不属实），如果所谓列宁后来只是加强和发挥了这个观点一事属实（这根本不属实），那么请问，斯大林怎么可能在列宁在世时，在列宁临终前就对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形成他1924年的讲话反映出来的自己的观点呢？由此可见，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个托洛茨基分子，直到1924年以后才不再是托洛茨基分子。

安季波夫：请回答对您提出的问题。围绕第4项日程来谈。别分散注意力。

卡冈诺维奇：您就谈谈1915年的那场争论吧。

托洛茨基：斯大林只要能找出他说过的一段话来证明他在1925年前也谈到过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那就不错了。找不出来！而布哈林？有3段，一段是1917年的，另外两段是1923年的。这些话都证明，我们反对派目前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所发挥的观点，不仅是列宁在世时，而且也是两年或一年半之前，即列宁逝世后全党的观点。布哈林在谈到俄国的无产阶级时曾说过，俄国的无产阶级正在走向政权，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这次在俄国也‘提上日程’的任务不可能‘在本国范围内’完成。这里的工人阶级碰到坚不可摧的墙壁，只有靠**‘国际工人革命’**的撞击才能将其摧垮”。（布哈林著《俄国的阶级斗争与革命》，莫斯科委员会与区域

局 1917 年版，第 3～4 页）

布哈林在 1919 年说得更多：“生产力增长的时期只能当无产阶级在几个大国获胜时才能到来。”（布哈林主编的《共产国际》杂志，1919 年 9 月第 5 期第 614 页）在布哈林看来，不要说建成社会主义，就连生产力的增长都只有当无产阶级在几个大国无产阶级获胜时才能实现。于是就得出了必须千方百计地发展世界革命的结论。

插话：讲实质。

托洛茨基：最后布哈林接着说道，“共产国际将使……”

插话：这样根本不行。讲实质问题。为什么转弯抹角，不直截了当地回答问题？（喧哗声）（会议主席按铃）

托洛茨基：……“各国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支持变成现实，离开了经济上的和其他形式的相互支持无产阶级就不能（不能！）建成新社会。”（《共产国际》杂志，1919 年 5 月第 8 期第 94 页）这就是我对斯大林同志在这里针对我们现在正按日程规定讨论的问题所下断言作出的明确而直截了当的回答，斯大林认为，反对派首先是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上背离列宁主义而走上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道路的。我还要提醒大家，1921 年获得通过并保留至今的共青团纲领中清楚地表述了使我们背上托洛茨基主义罪名的观点。

插话：谈实质问题。你没有勇气对这种指责作出回答。

托洛茨基：同志们，我要问：是不是说布哈林 1917 年，1919 年和 1921 年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呢？不是，当时他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比在其他许多问题上都更加靠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那么共青团的纲领呢？不错，沙茨金曾非常幼稚地试图把起草这个纲领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

沙茨金：纲领是我起草的。

斯克雷普尼克：把沙茨金也扯上了。

托洛茨基：由此看来，沙茨金早在1921年就凭着自己的智慧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旧传统都不对头，他作出这个结论，认为可以把托洛茨基主义的异端邪说写进共青团的纲领并且保留下来。（喧哗声）

什维尔尼克：您最好是谈谈对您提出的那些指责。

托洛茨基：原来，无论是布哈林，还是斯大林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喊声）。待我对最基本的最具原则意义的指责作出回答之后再谈对我提出的其他指责。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布哈林都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就是没有觉察到共青团的纲领中有一段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话，这一段的表述同我们反对派现在的表述完全一样。就连颇具觉察力的列宁似乎也未觉察到这个情况。（喧哗声）。

彼得罗夫斯基：主席同志，应要求发言人扣紧讨论题目。

伏罗希洛夫：对！

卡冈诺维奇：您在1915年是否与列宁进行过争论？

插话：谈谈您1915年的那篇文章。

托洛茨基：如果没人干扰的话，我现在就来谈谈列宁1915年的文章，文章中斯大林的错误最明显。

原来是谁也没有发现托洛茨基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革命关系这个根本问题的异端都写进了共青团纲领，这个纲领已存在了几年，至今仍然存在。

插话：那么是谁纠正您的，难道不是列宁吗？

托洛茨基：我再说一遍：难道布哈林的声明是偶然现象吗？（喧哗声、会议主席按铃。）共青团纲领是偶然现象吗？是偶然现象吗？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这个问题的全部著述都被抛在了脑后。只有被斯大林歪曲了的那段1915年的引文算是例外，斯大林当时正

是在谈到日程第4项时援引了列宁的这段话，我现在的谈话被打断也是由于列宁的这段话。我只好就这段引文谈上几句。

插话：您最好能回答一下热月、克列孟梭和两个政党的问题。回答对您提出的所有指责。

插话：别再谈那段引文啦！

托洛茨基：我要指出的是，恰恰是斯大林，恰恰是在涉及这项日程的时候讲到反对派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背离了列宁主义的立场，说这是我们背叛行为的主要表现，也正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表现。既然主席同志没有打断斯大林同志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发言，那么我也同样请求主席同志给我个机会就这个主要问题作些必要的说明。（喧哗声，有人插话：这已经是挖苦话，够了！）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提纲中……（喧哗声。）

李可夫（会议主席）：参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许多委员都向我反映，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发言脱离了日程规定的议题。（插话：对！）这就使得我让后面的几位发言人有机会就季诺维也夫同志涉及的话题发表意见；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在今天结束第4项日程，那么我们迟早还是要讨论它的。（插话：对！）因此我认为，以下的要求完全可行，这就是：下面就开始讨论与奥尔忠尼启则的报告有关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将两位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插话：对！）

托洛茨基：同志们，既然其他发言人都有机会在规定的时间内谈他们自认为与规定日程有关的一切问题，那么，我想我作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在这个问题上受到指责的人，你们也肯定不会不给我这个权利的。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谈到了作为意见分歧的组成部分的所有问题，或者说几乎是所有的问题，却没有人因此而对他提出过非难……

插话：不对，根本不对！

塔尔贝格：讲实质问题！

托洛茨基：……他甚至谈到了我关于丰收与欠收对苏联经济的作用的评价。因此，同志们剥夺我的发言权，那是你们的权利，而我在预定的45分钟时间里可以就对我提出的指责只谈那些我认为必须谈的东西。如果主席同志认为这样做不对，他当然可以剥夺我的发言权，确认裁决则是全会的事情。我只有服从。但是，只要我还在讲台上，我就可以只讲我认为对于联席全会的第4项日程具有重要的、本质性意义的东西。

插话：你已经说过无数遍了。

插话：谈谈你解散不解散派别集团？给我们讲讲这个问题。

插话：这个我们要听。

李可夫（会议主席）：我想我下面的话是反映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全体委员的意见，那就是，全会希望听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此刻提上日程的问题的看法（插话：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在两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上都讨论过了，已经解决了，并且，确认了好多次（插话：对！），起码谁也不会把它提上这次全会的日程。

伏罗希洛夫（在席上）插话：应当围绕这个问题来谈，谈谈你执行了还是没有执行……

托洛茨基：如果我应当把主席同志的话理解为同意接着往下谈自己的看法，并根据总的原则性考虑作出必要的结论的话，那么主席同志的意思就与我自己确定的发言提纲不谋而合。（笑声，喧哗声）

席上插话：这不符合日程。

席上插话：别强词夺理了。

卡冈诺维奇：谈实质问题。

托洛茨基：如果您是想说，没有权利讲我认为同对我的指责有

关的此次全会的实质……（喧哗声），如果全会认为没有必要听我发言的话，那么它有权剥夺我的发言权。我对此表示服从，这是全会的权利。

卡冈诺维奇：给了您45分钟时间。谈实质问题，别饶舌。

托洛茨基：所以我说，全部问题就在于对实质的看法要是没有分歧，那就再简单不过了。但是在什么是实质的看法上我与卡冈诺维奇同志大不相同。这并不妨碍他去发挥他自己的观点。我发挥的是我自己的观点。

插话：谈实质。（喧哗声）

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的实质问题上我与卡冈诺维奇有分歧，正如在阿姆斯特丹问题上一样。但是我认为，我有权谈自己的看法。

列宁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提纲（1918年1月7日）中说到：“为了社会主义在俄国的胜利，必须有一段时间，至少是几个月……”① 列宁所说的这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其中包括了哪些具体的经济内容和社会内容呢？

伏罗希洛夫席上插话：这全都可以散发和发表嘛。（喧哗声）

托洛茨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1918年初在《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写道：“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俄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②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从开始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时候起曾多次引用过这段话。他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引了这段话，并且立即补充说：“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

① 《列宁全集》第23卷，第24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4卷，第274页。

但也没有愚蠢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①] 非常清楚……

席上插话：有必要重新考虑给他的发言时间问题。

托洛茨基：非常清楚，挖苦话“我们当然比现在要愚蠢一些”指的是“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这个期限太短。（喧哗声）

鲁祖塔克：这些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定没有任何关系。

托洛茨基：不过列宁怎么可能为社会主义的“最终”巩固规定那么短的期限呢？（喧哗声）其中包含了什么样的物质生产内容呢？另一方面，列宁那番挖苦得不厉害的所谓我们在1918年“也没有愚蠢到（喧哗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非常清楚，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的最终巩固不是指在一年时间内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喧哗声）

鲁祖塔克：这不是发言，这是在朗读托洛茨基全集……

托洛茨基：……不是消灭阶级，不是在12个月的时间里克服城乡间的矛盾，而首先和主要是让掌握在胜利的无产阶级手中的工厂和作坊复工。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实质。（喧哗声）为了弄清列宁关于建成社会主义问题的提法，不能把列宁在不同情况、不同背景下，特别是出于不同实际目的所讲的话生吞活剥，任意重新解释。应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列宁的思想。到那时我们就会发现，列宁在1915年，即十月革命的两年多之前提出的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只要跟踪观察这种思想在十月变革后不是要制定纲领而是要给生动的经验下理论定义的年代的发展，才能得到正确的、完全无可争议的阐释。

列宁在1915年写道：“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75页。

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①] 在这番还相当泛泛的话语中（1915 年）不仅包含了同那些即使不能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也应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同时开展革命的所谓革命者的论战，而且也包含了同未来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论战。列宁对前者说，革命可以而且应当在单独的一个国家内开始；从哪个国家开始呢？——从那个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国家开始。列宁警告后者：要想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宣布进行革命战争，光靠夺取政权还不够。（喧哗声）

席上插话：围绕第 4 项日程来说，别讲无关紧要的话。

托洛茨基：……首先要赢得时间（“喘息时机”）并“组织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只有这样才可能积极地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喧哗声），才能发动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举行起义。这完全是两年半前列宁在同拥护革命战争的“左派”的论战中得到大为具体和全面的发挥的思想，难道不清楚吗？单靠政权不足以应付战争，还要把掌握在无产者手中的生产组织好，以便保障人民的生活，也就是保证能进行战争（喧哗声）。而为此“至少”需要“几个月”……由此可见，列宁 1915 年讲的不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初步地组织国家的生产；后来，1918 年关于和平问题的一月提纲也完全是一个意思，他在讲到社会主义时指的是工人阶级在掌握了工厂之后要重新开工、要在一个崭新的基础上恢复生产的不间断性，至少是为了养活正在作战的军队，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的共和国，为了扩展国际革命。1915 年不理解列宁的话尚情有可原。在

① 《列宁全集》第 26 卷，第 367 页。

列宁已经用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对他原来提出的思想进行鞭辟入里的阐释后的今天，怎么还不理解呢！

我们能找出列宁从1917年至1923年止有关反对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的几百条言论。其中的哪一条斯大林都没有作出过解释，也没有驳斥过。用理解错误的1915年的这段引文来同这一切相对抗，岂不可笑！

这个在单独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恰恰在目前具有异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战争危险日益临近，这个问题以最为具体和最为迫切的形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我偶然地碰上了一位工人通讯员。大家知道有一种不为报刊供稿、专门负责为编辑部提供信息的工人通讯员。今年2月底，在尖锐地提出军事危险问题的莫斯科省党代表会议开过之后，我翻看了不是供报刊发表用的通讯员笔记并发现了下面这段精彩的谈话。

插话：这与第4项日程有关？

卡冈诺维奇：这是在胡扯。

鲁祖塔克：您什么时候才能谈日程规定的内容呢？

什维尔尼克：还是围绕第4项议程来谈吧。

托洛茨基：事情发生在国营“十月”糖果厂。一位大约25岁的女工说道：“我们不希望打仗，但是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应当起来捍卫自己的国家。”

一位40岁的工人说：“讲得倒挺好，可怎么收场呢！谁吩咐你们干预英国的内政，往那儿寄钱呢？自找。你们做的那些事就说明你们不希望和平”。

25岁左右的女工说：“我们知道，我们帮助了英国的无产阶级，他们也不会以怨报德，在紧要关头可能会出来防止英国资本主义准备对我们进行的血腥屠杀。”一位50来岁的工人……

（喧哗声。笑声。）

格拉西莫夫：没有来自墓地的消息吧？

插话：70岁的老太太没说什么吗？

托洛茨基：一位50来岁的工人说：“在自己的国家安安稳稳地生活，再搞搞建设不是更好吗？共产党人把我们可以在单独一个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话写遍了每一个角落。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插手其他国家的事务，还要把上千卢布或上万卢布的钱寄给英国的矿工呢？”

一位40来岁的工人……

（喧哗声，笑声。）

鲁祖塔克：这简直成了托洛茨基纲领。

什维尔尼克：为什么年龄只限于40岁呢？

托洛茨基：40来岁的工人说：“可以在一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而且也应当这样做，要是他们愿意打仗就让他们去打好了，我们可不想打仗”，等等。

并不是为了发表而写成的这些精彩的通讯稿证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向工人展示了前景。但展示的是虚无飘渺的前景。这一理论没有包括整个的国际过程，正因为如此，从中得出的结论也是虚无飘渺的；这一理论妨碍我们去认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与国际革命的命运之间的那种休戚与共、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而且会因此而导致非革命的和平主义的结论，我上面谈到的通讯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个理论一旦扎根就会对共产国际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作用。

所以就要为党提供一个不是根据现成的小抄来讨论这一新理论的机会……

鲁祖塔克：你自己就在念小抄。

托洛茨基：……而是通过诚恳的、公开的和真正的争论来讨论这一新理论。应当适时地，即在第15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及时提

出这个问题，不要突然地提出，而要采取全面的思想准备、检验和讨论的办法；为此必须适时地出版资料集。在《布尔什维克》杂志或在专供代表大会前展开争论用的其他机关刊物上适时地展开讨论；让反对派有可能把自己就这个问题的发言和文章单独集辑出版或与中央委员会内多数派的代表们的言论和文章一起集辑出版。

斯捷潘诺夫：这也与第4项日程有关吗？

乌汉诺夫：还不如给我们念点契诃夫的东西呢。

托洛茨基：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说，有关党内关系包括中央委员会同党的关系的问题……

插话：那么您对自己所在的那个党有什么看法？

托洛茨基：反对派似乎持的是“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那么托洛茨基主义究竟是什么呢？雅罗斯拉夫斯基在基辅向积极分子所作的报告把对我们反对派提出的这一指责具体化了，他在报告中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反对派在其派别活动中竟滑到这样的地步——穆拉洛夫和哈里顿向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提出了反对派对加里宁和古比雪夫同志的报告的修改意见。对这种修改提出指责，这当然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权利。但是这还不够。雅罗斯拉夫斯基还把提出修改意见这一事实叫做派别活动和**托洛茨基主义**。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为什么在中央全会批准了中央的路线之后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难道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可以凌驾于全会之上？这是对我党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认识：一旦党团与中央全会有不同意见就越过中央全会而诉之于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

同志们，如果可以这样解释托洛茨基主义的话，那么我敢肯定，每个党员履行自己的最为合法的党内权利的意图都可算作托洛茨基主义了。至于说到尤其是诉诸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这个问题，那么，也许这还可以算中央委员的过错，如果他们确实这样做

了的话。但是问题并不在中央委员身上。我手头恰恰掌握着有关这个问题的非常重要的证据。诉诸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党团的做法永远是违反党内权利、党的传统和党章的行为吗？这是托洛茨基主义吗？

插话：托洛茨基同志，最后请讲讲实质问题吧。

托洛茨基：列宁同志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与中央委员会产生分歧时，他在1922年12月12日给非中央委员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写过信。他写道：“我会写信告诉托洛茨基我赞同他的意见，此外因我生病，还请他在全会上出面捍卫我的立场。我还希望今明两天写好一份就此问题的实质致中央全会的声明并寄给你们。总之我认为这个问题的原则意义非常重大，如果中央全会不能达成一致，我还得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代表大会。在此之前，我要在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俄共党团会议上宣布目前的分歧。”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2月13日写给我的信中说道：“我觉得我和您的意见完全一致，因此我想，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照现在这样的提法就可以消除国家计划委员会是否需要指挥权的争论”。②

莫洛托夫：指的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不是指托洛茨基主义，而是指国家计划委员会。

托洛茨基：不，列宁是指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意见一致，国家计划委员会的问题将退居次要地位。我认为，在一个受到资本主义国家包围的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对外贸易垄断问题是列宁主义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正因为如此，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才希望求助于党团。他说：“在这个问题上一旦我们失败，我们就应该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为此，有必要向参加即将举行的苏维埃代表大

① 《列宁全集》第2版补遗第289号文献。

② 《列宁全集》第52卷，第548页。

会的党团简略地陈述一下分歧所在。如果来得及，我就把它写出来，如果您也这样做，我将十分高兴。”①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于12月15日写道：“我确信，如果我们有失败的危险（在中央全会上），那么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失败并立即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提出声明，总比在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失败有利得多。”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2月15日写给我的信中说：“万一我们的决定通不过，我们就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声明，要求将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

他还接着写道：“如果这个问题在这次全会上被撤销（我想是不会这样做的，而您当然应该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全力反对这样做），那么我想，还是应当向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提出，要求把问题提交党代表大会，因为继续动摇不定是绝对不能容许的。”②

最后，在全会根据季诺维也夫同志的提议于12月21日改变了过去作出的不正确决定之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写道：“托洛茨基同志，好像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地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议继续向谁进攻呢？

插话：向托洛茨基进攻。

托洛茨基：向中央委员会进攻。“……为此要通过一项提案，即向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对外贸易和改进对外贸易的措施问题。这件事要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党团会议上宣布。我希望您不会表示异议，也不会拒绝向党团作报告。”“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就是这个

① 《列宁全集》第52卷，第548页。
② 《列宁全集》第52卷，第550页。
③ 《列宁全集》第52卷，第553页。

样子！

同志们，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指责我在有关《社会主义通报》杂志的文章的问题上“没讲真话”，在介绍《社会主义通报》杂志在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基本分歧中所持的立场时“没讲真话”。

插话：我们听说了。

托洛茨基：我带来了就这个问题起草的一份有关个人问题的声明，篇幅不超过一页半稿纸。但是没有允许我公开宣读。会议主席说要把这份个人声明作为附件收入会议记录和速记记录。

同志们，现在我想围绕我们大家存在分歧的那些尖锐的问题从我的《这引向何处》一文，即反对莫斯科鼓动宣传部的照本宣科之作中列举……

插话：你自己也是在照本宣科嘛。

塔尔贝格：你为什么照本宣科呢？

托洛茨基：……即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印刷厂印制的5000份照本宣科之作，——我想把那个证明我们有暴动打算的可怕的罪证举出来。

说什么，反对派正在以战争时期的法国克列孟梭[①]集团为榜样，纠集力量为捍卫另一种护国政策而斗争，这也就意味着要举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这种说法根本不能自圆其说。

插话：完全可以自圆其说。

托洛茨基：如果讲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就没有必要提克列孟梭；如果想把克列孟梭的政策作为反对派的罪征，就没有必要提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动。有人对我们说，你的反对派像克列孟梭集团一样急欲夺取政权。反对派认为，将他们调离领导岗位是对

① 克列孟梭，乔·邦·（1841～1929）——1906～1909、1917～1920年任法国总理，曾多次出任政府部长。

党的利益的一种损害，他们既没有向中央，也没有向党隐瞒过这个观点。任何一个严肃的思想流派都不能不持这样的观点。我们认为，将反对派调离领导岗位最近大大影响了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

插话：回不到中央去了。

托洛茨基：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性错误恰恰在战争条件下会在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事业中为害特别严重。因此我们认为，即使是在战争条件下党亦应保持，或者更确切地说，应当重新建立一种较为灵活、较为合理、较为健全的党内制度，这种制度可允许适时地对政策提出批评、警告和纠正。怎么会由此得出暴动的结论呢？如果回过头来看一下我为了阐述自己的想法而从法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历史中援引的历史资料即可发现，克列孟梭反对派恰恰不是通过起义，不是通过违反法国的资产阶级法律，而是通过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法律，通过法国的议会制度掌握了政权。法国议会甚至没有改变自己的人员构成。也没有进行改选。以自己的统治集团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根据战争的经验得出结论：由克列孟梭和塔迪厄等人组成的内阁要此由潘勒韦－白里安等人组成的内阁更符合资产阶级在战争期间的利益。从这样一个历史上的例子怎么会联想到起义呢？

我国不存在议会机制，对此可以提出异议，我们大家都对此提出异议。是啊，幸好没有议会制。但是我国有党的机制。党在战争时期应同在和平时期一样对自己的所有机关保持监督。在其例行的和紧急的代表大会上决定主要的问题。党完全可以作出结论，解除反对派的政治领导职务是个错误，党可以纠正这一错误。

塔尔贝格：律师的演说。

托洛茨基：党能不能修改它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作出的决定呢？党能不能在代表大会上决定：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我国的经

济，为了保卫中国革命和整个共产国际，党应按照列宁在遗嘱中阐述的那些原则来组建自己的领导集体呢？能还是不能？我认为能。我想反对派全都认为能。这里根本谈不上所谓的起义，也根本谈不上对两个政党的政策、分裂政策的骇人听闻的指责。

为了加大在这里提出的含糊其辞的关于起义的指责的分量，有人竟围绕我就军事问题给中央政治局写信的事编造了有些不同寻常且骇人听闻的故事。

丘巴尔：你拐弯抹角地指的是什么呀？

托洛茨基：在革命后的10年间我曾10次给中央委员、非中央委员、个别军事工作者和军事工作者团体写过这样的信。从来没有人想到党员给中央写信提醒中央注意在武装力量的组织或整个军事政策方面的不当之处是反党行为。

丘巴尔：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从来没有发生过游行示威吗？

托洛茨基：这里已经有人说过，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一个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军事反对派在军队建设方面以一种分散主义的和游击主义的方针对抗无产阶级的集中制的方针。不曾有人想到这是反党倾向，伏罗希洛夫同志说我就是由于这个问题才不敢出席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我就此向中央递交了一份谈我个人问题的声明，在声明中我准确地引证了政治局关于尽管要开代表大会也一定要我去前线的决定，因为我军在东线连连失利，我军在乌法近郊撤退。遗憾的是，这个声明也未公布。会议主席同志答应把它收入我们的会议记录。

再回过头来谈谈那个军事文件。1924年初我在军事科学讲习班搞过一个文件，就是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书，参加起草的有德宾科[①]同志、费季科同志、乌里茨基同志、别洛夫同志和其他几位

① 德宾科，帕·叶·（1889～1938）——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陆海军事务委员会委员、海军人民委员等职。

同志，报告书谈的是军队建设问题。通过卡哈尼亚克同志和另外几个同志征集了几位军事工作者的签名以便上报中央。确实有人私下对我说过，这件事不会有什么特别的风险，因为有些中央委员已经了解这个文件。文件经过了许多人的手。文件也谈到了我的报告书，也谈到的军事方面的困难，不过角度不同罢了。所有在这份声明上签名的人不仅平安无事，而且几位积极参与者还在递交报告书之后很快得到了提升。

我想作为一名中央委员，我有权呈递根据同上面提及的几位军事工作者商量的结果写成的报告书。当我这样做了的时候竟引起了令人生畏的哗然、指责甚至威胁。因为报告书最后一页没有写完，晚交了半小时，整个全会的机制竟因此开动起来，温什利赫特同志带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正式决定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白色走廊上。有什么必要这样做呢？甚至还用上了“军事阴谋”的字眼。这里的军事阴谋就是一位中央委员向中央呈递了一份报告，而且在呈递报告时还通报了曾与他共同商量过某一方面的军事问题的那几个为数不多的、绝对忠诚可靠的党员的姓名。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中的原因无人不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日后给反对派加上策划起义的罪名积累材料。自然，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决不会使党内的关系缓和，也不会为党内生活创造正常的条件；为了实现我们正在捍卫的那些主张，我们争取党内生活的正常条件的努力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位党员，并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我要说，不管我们之间的分歧有多么大、多么尖锐，在就党内的尖锐问题展开争论的时候指责某个党员“枪杀共产党人”，这是共产主义关系中从未见过的，也自然会引来刺耳的、其他场合不能容许的高声喊叫。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就作过这样的表示，奥尔忠尼启则当即制止了他……

席上插话：是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

托洛茨基：完全正确，是在书记处。奥尔忠尼启则刚一出面制止雅罗斯拉夫斯基，我当然也就没像现在这样被迫高声喊叫了，在领导机关，而且是党的机关内部高声喊叫当然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雅罗斯拉夫斯基：当时您把共产党员称作黑帮。

托洛茨基：但遗憾的是，伏罗希洛夫同志在发表声明时并没有受到制止。针对伏罗希洛夫同志所说的这些有损于每一个党员的声誉，也有损于我的声誉的话，我递上了一份书面声明，遗憾的是声明没有公布。我在书面声明中指出，我在任期间、在我的领导下，也根据我的直接指示曾枪毙过逃兵、叛徒和白卫分子，但从未枪毙过共产党人，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对此都应当是清楚的，本来就很清楚。枪毙共产党人的是我们的阶级敌人——白卫分子。如果共产党人混迹于逃兵和叛徒的队伍，那么这样的逃兵理应枪毙。

拉德琴柯：是指巴卡耶夫和扎卢茨基吗？

托洛茨基：如能给我5～10分钟时间，我现在就把有关巴卡耶夫和扎卢茨基同志的全部文件都公布。说我曾经要求枪毙扎卢茨基和巴卡耶夫，这不是事实。当时根据我本人的要求已在中央委员会内澄清过这个问题。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一项命令，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命令规定，每一位政治委员都应当了解与其有工作联系的指挥官的家属现在何处，为的是不把家属在敌人后方的指挥官安排在前线和重要岗位，因为这些指挥官很想与家人团聚，会背叛我们，并把成千上万的红军官兵领上绝路或带到前线去。该命令对政治委员命令很严厉，就是说政治委员必须留意此事。在东方面军一个师出了问题，即指挥班子叛变，给该管区造成重大损失，这时我正在南方面军工作，我通过电报了解到有人叛

变的消息后便给斯米尔加[①] 同志和拉舍维奇[②] 同志发电报询问叛变的指挥官的家属情况，以便立即抓到他们作人质并根据当时的法律处决那些有可能成为同谋和帮凶等的家属。我得到的回答是家属情况不详。我在不知道哪些人是政治委员和有哪些政治委员的情况下（在这一时期有的时候也能够碰到非常可靠的政治委员，这个时期就是一个选拔政治委员的工作做得很不可靠的时期）发了一份电报，我在电报中说，凡是不了解自己的指挥官之家属情况的政治委员均应送上法庭并处以枪决。这并不是关于枪决的命令，这是当时通行的施加压力的办法。我这里有几十份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签署的类似的电报，如果愿意，我现在就来读一读。

插话： 不需要。

托洛茨基： 拉舍维奇和斯米尔加答复我说，我们的某某政委和某某政委是非常好的同志，我们可以为他们担保，如果是我们不称职，那就撤我们的职好了。我的回答的原话是："同志们，别卖弄了，你们是非常好的政委，是最好不过的政委；我想对你们说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要加倍注意有可能投敌叛变的那些指挥官的家属。"大家都知道，巴卡耶夫同志和扎卢茨基都没有被枪决，在我和这些政治委员之间还隔着像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这样的同志，我给他们发电报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不会平白无故地处理人。这只是当时惯用的一种军事上施加压力的方法。所有这些情况我在当时已向政治局作了汇报。

---

① 斯米尔加，伊·捷·（1892～1938）——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俄罗斯人民委员会驻芬兰全权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② 拉舍维奇，米·米·（1884～1928）——1901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历任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员、副陆海军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25、1926年任中央候补委员。在联共第15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党。1928年恢复党籍。

我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展示过一张公文纸，那是弗拉基米尔·伊里伊在关于枪毙共产党人的传闻传到政治局的时候交给我的。有关扎卢茨基同志和巴卡耶夫同志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场误会。但是团政委潘捷列耶夫确实在喀山被处决，这个团的团长和政委在我军被包围的情况下丢下阵地，截获一条轮船并企图向下诺夫哥罗德逃遁。我们拦住他们，把他们交给了法庭，他们被枪决。我们把这件事报告了政治局。政治局认为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有人对列宁说托洛茨基枪毙共产党人，列宁主动地给了我一张表示高度信任的公文纸。我把这张公文纸交给了列宁研究院。公文纸是空白的，只在下方写一句话，你们可以在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速记记录中看到这句话：“同志们：我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的严厉性质，我完全相信，绝对相信托洛茨基同志所下命令是正确的、合理的，是事业的利益所必须的，因此我完全支持此命令。弗·乌里扬诺夫（列宁）。”当我问列宁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说：“是为了防备再有人散布类似的传闻；给你一份现成的空白公文纸，你可把形势要求作出的决定写在上面”。我从来没有给这份文件派过用场。这份文件在我那里作为历史文献保存下来，我交给了列宁研究院。这份文件证明，尽管有磨擦，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认为我不会滥用他的信任，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去作损害事业或损害某些同志的事情，即使是在国内战争的最为严峻的形势下也是如此。

关于……的问题……

卡冈诺维奇：讲讲雅罗斯拉夫尔车站的事情。

插话：讲讲克列孟梭。讲讲热月。

托洛茨基：我正要谈这个问题。奥尔忠尼启则同志在这里引用了10月16日的声明。这个声明的基本思想是不再搞派别活动。我们的10月16日声明是否真诚呢？同志们，我们有足够的材料证明，反对派的中央委员是如何积极地履行这一保证的……（喧哗

声。插话："噢！"，"你们积极从事的是派别活动"，"你在开玩笑"，"在什么意义上？"）……意思是号召反对派不要自我封闭、不要与世隔绝，不要窃窃私语，不要在党面前躲躲闪闪，要公开地在党的各级组织中阐明自己的观点。不错，每一个派别总的说来都要对自己的拥护者负责，当然不是对每个单个的人，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但另外一条也不错：党的制度要对党内批评可能采取的形式负责。（插话：噢！）

至于谈到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简要地提到的那些条件问题，我只能完全赞同季诺维也夫就这个问题讲过的话。把这些条件看成是某些同志能否留在中央委员会里面的条件，当然是错误的。问题自然不在这里。不久就要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在两年的间隔之后召开的这次代表大会除其他问题之外要解决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人员组成问题。在这种条件下，是否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只是反映党内关系今后的发展变化的外部征兆而已，（喊声："噢！"）正是为了捍卫我们在党内捍卫的那些观点……

插话：你们在车站上捍卫！

托洛茨基：……而且把这种捍卫理解为党依据事变和思想斗争的经验对这些观点进行检验。党内斗争及其尖锐摩擦和斗争引起的后果绝非偶然。党内斗争导致了诸如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欢送中央委员这样的事实。没有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然而也没有人认为《真理报》一连几个月以对待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敌人的态度对待一些中央委员是正常现象。两者都不正常。两者相互联系。两者不能割裂开来；尽管有善良的愿望，只要不在党内建立起较为正常、较为健全的制度，就无法将二者分开。（插话：什么样的制度？）我们声明，为了能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和通过这次代表大会改善党内关系（尽管有深刻的原则性分歧），我们准备作出一切努力……

插话：无休止的争论。

托洛茨基：……我们还准备为便于中央利用反对派的力量从事任何工作、和平时期的工作或战时工作，而作出努力。每一个反对派，只要不是混进来的，不是偶然当上的（反对派中当然有这样的人），都会凭着良心做到这一切。（插话：“发表宣言了”，“停止发言”，“让托姆斯基讲”）

会议主席：请托姆斯基同志发言。（鼓掌）

1927 年 8 月 6 日

№07515

托洛茨基等13人声明

（1927年8月8日）

我们撇开问题的论战形式，仅就问题的实质作如下答复：

第一个问题。在帝国主义面前我们无条件地、无保留地主张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

我们当然也无条件地、无保留地主张捍卫在目前这个中央、目前这个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如果说托洛茨基信中人所共知的关于克列孟梭的那一处可能为人提供口实，有人可将这个类比错误地解释为托洛茨基利用军事上的困难进行夺权斗争的话，那么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对引文作这样的理解。同时我们仍然坚持我们的信念：党在战争时期同样不能拒绝批评，不能拒绝修正中央的路线，如果这个路线是错误的话。我们在有关国际问题的决议草案中还提出了下列口号：与苏联交战的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必败、资本主义国家的每一个真诚的无产者都应当为“自己的”政府的失败而积极行动；让每一个不愿做“自己”国家奴隶主帮凶的外国士兵都转到红军方面来、苏联是所有劳动者的祖国；我们从1917年的10月起已经是护国派了；我们的“卫国”（列宁语）战争是“为保卫作为世界社会主义大军中的一支队伍的苏维埃共和国”而进行的战争，我们的“卫国”战争“不是走向资产阶级国家，而是走向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列宁语）[①]；不想做保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77页。

卫苏维埃的护国派的人无疑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叛徒。

关于热月我们要说：在我国热月因素天天在增长，它具有相当深刻的社会基础。我们的要求是党的领导层更加稳步地、坚定地、有计划地对这种现象及其对党内相当一部分组织的影响给予反击。我们批驳所谓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热月党的看法。

第二个问题。我们承认，德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有公开分裂和组成两个政党的危险，被开除出党者有数以百计的同工人群众紧密相连、忠诚于列宁的事业并真心实意地准备彻底捍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老革命工人，仅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上述危险。

在德国建立第二党，此事具有很大的危险。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制止这件事。我们建议联共（布）中央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采取下列措施以防止这种危险的出现：以查封乌尔邦斯集团机关报并要求该集团服从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为条件，允许接受上述条件的所有人回到共产国际中来，并保证他们可在党的报刊上、在党和共产国际的队伍中捍卫自己的观点。

第三个问题。我们坚决谴责有关建立第二党的任何企图。我们认为，在苏联，建立第二党的道路无疑是导致革命灭亡的道路。我们将不遗余力地采取一切措施反对建立两个政党的任何倾向。我们也以同样坚定和果断的态度谴责分裂政策。我们将执行联共（布）和联共（布）中央的各项决定。我们准备坚决地尽一切努力去肃清一切派别活动的成分，这些成分的形成是由于在党内制度被破坏的情况下我们被迫为争取党了解我们的真实观点而斗争，在全国阅读的报刊上对这种观点作了完全不正确的阐释。

回答了全会内我们提出的问题之后，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表明我们的下列深刻信念：

为使建立党内和平和切实肃清派别活动和小圈子习气的尝试不致引起 1926 年 10 月 16 日之后产生的那种后果，必须无条件地做

到：

（1）立即以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名义对出版物中的言论提出谴责，如中央鼓动宣传部的《论战争与军事危险》的小册子，如称反对派为反革命的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党报的文章，如《列宁格勒真理报》的文章（今年8月5日），该文竟在全会召开的日子里说："反对派联盟的宣言成了敌对国陆军部的畅销货，其畅销程度不亚于利润丰厚的企业在资本主义交易所上市的股票"。

（2）停止因观点不同将反对派开除出党或采取其他镇压手段，恢复被开除者的党籍。

（3）保证按列宁生前党内分歧严重时的方式来筹备第15次代表大会，即：

（a）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用两个月的时间在报刊上发表党内各少数派的论点、文章和纲领。

（b）让全体党员都能看到有分歧的重要文件并根据全面的争论作出慎重的决定；

（c）保证以同志式的态度讨论有分歧的问题——不言过其实、不搞人身攻击，等等。

（d）以筹备十五大的主要口号来保证联共党和共产国际的团结统一——不惜任何代价。

阿夫杰耶夫、巴卡耶夫、叶夫多基莫夫、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利兹金、
穆拉洛夫、彼得松、皮达可夫、拉柯夫斯基、
斯米尔加、索洛维约夫、托洛茨基

1927年8月8日

№07516

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的发言

（1927 年 8 月 9 日）

托洛茨基：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解释说，全会有个直接的决定（大厅内有喧哗声），有个直接的决定，要求我们把声明的这两个部分拆开。

既然有直接的决定，那么我们就像服从其他任何决定一样表示服从这个直接的决定。

席上插话： 全会有个建议。

托洛茨基： 我们对全会的建议的答复是我们无法接受，而且还说明了为什么我们无法接受。不能接受是因为这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对于要求我们拆开的决定，我们像对待全会其他决定一样不能有别的回答。但是我们同时不仅要保留自己的……权利，而且还有义务在任何地方……

席上插话： 在每一个角落。

席上插话： 在雅罗斯拉夫尔车站。

托洛茨基： ……在党章允许的任何地方、在党内生活的正常条件允许的任何地方解释清楚：我们的声明的第一部分，即你们人为地决定从第二部分中分割出来的那个部分所谈的义务可能实现，而且有望获得实实在在的，尽管是不会来得太快的成功，但条件是我们的努力不是单方面的，那些比少数派即反对派更能主宰我党命运的同志们不心怀恶意。因为既然斯大林在这里表示了这样的意思，

即多数派没有理由去盲目地相信可能心怀恶意的反对派的话，那么有权作这种表示的就不只是他一人了（喧哗声）。这场斗争的事实会长期在党内留下的遗迹，只有在双方都有诚意的情况下这种遗迹才能消除。

席上插话：这难道不是协议吗？

席上插话：有党。

席上插话：不存在双方。

托洛茨基：……这不是协议，说的是双方的诚意问题。（喧哗声）

完全正确，有党。但是，假如反对派这个作为“谈判一方”的事实并不存在，那么现在所谈的所有问题就不存在了，也就没有必要提什么反对派问题了。反对派并没有进行谈判，而是在回答向他们提出的问题，并发表自己的观点，我们所说的多数派和少数派也只能是就这个范畴而言。

因此我们仍然完完全全地保留我们在声明中所阐述的观点，也就是说，我们声明中的两个部分是统一的整体。你们问我们是否同意把这两个部分分割开来，我们已借加米涅夫之口回答过：不行，我们不能这样做，以免让党产生错觉，以免把党引入迷途，尽管我们的声明写得既清楚又明确，但是你们还是认为应当作出决定要我们把两个部分分开。联席全会作出了要求我们把两个部分分开的决定，我们别无他法，只有服从。（喧哗声）

1927年8月9日

№07517

季诺维也夫的发言草稿

（1927 年 8 月 11 日）

同志们，我们大家都清楚，刚刚结束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对革命和我党的命运均具有重大意义。毫无疑问，我们虽说是部分地，但毕竟使我们的主要敌人国际资产阶级大失所望，他们原以为这一次我们党内准会出现可能导致分裂的事情，我们使张伯伦分子、麦克唐纳分子和毕苏斯基分子之流的这种期望成了泡影。仅此一点即可证明七月全会意义重大。

要是掩盖我们在全会上曾有过尖锐的斗争，那是很可笑的。不过我们作为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处于少数派地位的中央委员，当然有责任在全会作了决定之后服从多数派的意见并且参与联席全会决定的落实工作。我们在实际行动上应当保持一致，也将会保持一致。

今天的《真理报》社论说：“在斗争最尖锐的时刻必须善于保持冷静，善于寻找有可能向党内和平迈出第一步的途径。”这话说得对。我们赞成这种说法，并认为我们有责任向会议声明，我们正是要按照这些话的精神去做。

联席全会的决议写道：“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这一切可能是向党内和平前进了一步。”[①]

我们宣布，我们同意这个评价，也正在尽全力捍卫它。这一切可能是向党内和平前进了一步。

---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 3 分册，第 309 页。

中央委员会内多数派的权威代表人物在全会上说，目前的局面是停战，但又是心怀鬼胎的停战。

好吧，我们都是布尔什维克，我们不怕议论，应当把心里的话公开讲出来。不错，是这样。不错，这只是停战。不错，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如此深刻分歧的情况下，目前只能做到停战。但是停战本身的未来发展趋势可能有两种：（1）把停战变为和平；（2）把停战变为战争。我们完全赞成第一种可能性。

我们的党很快就要进入代表大会前的准备时期。中央确定党代表大会于12月1日举行，中央还决定，至少要提前一个月开始公布有关分歧问题的材料并在党内展开争论。有必要重温列宁说过的话（插入研讨有关分歧问题的文件等等）。

这是把停战变为和平的惟一正确途径。当然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逐渐消除现存的深刻分歧的惟一正确途径。

同志们，你们有机会从报纸上看到了我们的声明。你们可在全会的速记记录中看到声明的第2部分，声明当然要向党的会议通报。联席全会认为我们的声明的这个部分不宜见报。既然联席全会这样决定了，那也只好如此。

既然李可夫同志本人要宣读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宣读了，只需提醒一下并留下这个提醒。

联席全会决定责成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讨论我们声明的第2部分和就我们提出的指责进行调查，这里包括对以绝对无法容忍的手段利用自己的文章和小册子攻击反对派的《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部、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报纸编辑部和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的指责。例如《列宁格勒真理报》在全会期间还在社论中写下如下的话（引文）。

事情很清楚，为了像今天的《真理报》社论公正地指出的那样保持冷静，为了像今天的《真理报》再次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向建立

党内和平迈出第一步，就必须彻底结束这种闻所未闻的指责，就必须永远不再采用《列宁格勒真理报》在全会期间采用的那种不能容许的党内斗争方法。我们相信，联席全会就此问题作出了得到我们的全力支持与捍卫的决定之后，很快就会采取反对采用这种斗争方法的果断措施。

原则性分歧是否仍然存在呢？联席全会直截了当地明确地说依然存在分歧，而且是深刻的分歧。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全部的问题都在于根除分歧。根除分歧的途径只有一个，只能像列宁那样妥善地进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让全体党员预先讨论这些分歧，讨论中不夸大其辞、不搞个人攻击、采取同志式的方式，使党内的每一个少数派都拥有党章和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决议包括第十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决议等规定的那些权利，舍此没有其他途径。我们现在就应当试图通过这种途径，以完全认真的态度并在党内保持铁的纪律的情况下根除这些分歧。

尽管我们党内存在分歧，我们应当千方百计地保证党的统一，保证整个共产国际的统一！

在我党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面临的种种困难，特别是国际上的危险使党团结起来了，帮助党根除了党内的意见分歧甚至危机。现在的困难也不算小。光战争危险就够大的了。联席全会一致确认了这一危险。这些为我们党内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和全体无产阶级所日益意识到的困难和危险唤醒我们大家把队伍团结起来，让张伯伦分子、米留可夫分子、麦克唐纳分子、比尔肯赫德分子、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和唐恩之流彻底失望。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在不引起动荡的情况下通过真正的列宁主义的统一的途径解决这些严重的分歧。

格·季诺维也夫

1927 年 8 月 11 日

№07518

托洛茨基给柏林的克列斯廷斯基的信

（1927年8月12日）

亲爱的朋友：

您的信让我感到吃惊和痛心，与您交谈过的同志们的讲述更加深了我的这种感觉。孤独的日子是不会好受的。

您说不该递交84人声明[①]，说声明递交的不是时候，把关系搞僵了，等等，等等。主张递交集体声明的同志们提出这个想法后就在这里最先听到同您所说的大体一样的反对意见。当时反对者相当多。如今再没有一个同志不承认这个集体声明交得非常及时，它极大地加强了反对派，从而缓和了斯大林派对反对派的打击。这一点不仅为从那时起所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所证实，而且也为我们从另一个营垒中获取的直接资料所证实。您可试试对这个问题作重新评价，那样您就会重新评价您的其他许多看法。

关系变得异常紧张的原因不是由于某一个“不谨慎”的步骤，而是由于中国革命的事态使极其深刻的分歧突然暴露了出来。在我们曾预言过的蒋介石政变发生的当天，我们就说：“斯大林只得以十倍的努力加强同反对派的斗争。”如何去避免呢？办法只有一个：避而不谈所犯的错误，或者缩小这些错误，也不去触及这些错误的基本根源——纯粹的孟什维主义路线。但是那就等于走上思想背叛的道路。如果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直言不讳，那么“调子”问题就

① 即“83人声明”。

是次要的了。另外，我们实在是没往“调子”里掺杂任何多余的东西。正是由于在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问题上存在尖锐而深刻的分歧，才使斯大林产生了尽快击溃反对派上层人物的想法。集体声明让更多的人分担了责任，从而一下子减轻了打击的力度。

这一次也同往常一样，解决党内问题的关键是阶级路线。如果您对中国问题或英俄委员会问题有怀疑，那就另当别论了。但是我认为您决不会对上述两个问题存有怀疑。事变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帮助人们认清斯大林路线的错误和我们路线的正确性，这在布尔什维主义的整个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些同志认为：我们的党内制度确实让人无法容忍；至于其他问题，那都可以争论。这些同志把党内制度看成了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试问：制度为什么那么糟糕？是由于斯大林的坏脾气吗？不对，党的制度是政治路线的从属表现。正是因为斯大林把赌注押在了蒋介石和普塞尔身上，押在了官僚和农村上层人物等的身上，斯大林为了推行自己的政策才不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意愿，而去利用官僚机构自上而下地对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从而反射和转嫁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力。这就是要同反对施加这种压力的反对派进行疯狂斗争的原因所在。

那种认为如果“不把关系搞僵”而持沉默、等待和袖手旁观态度，问题就会自行解决的庸人哲学也同样要不得。这是一个关系到保持革命政党思想发展继承性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培养能在相应条件下使政策得以保持必要方向的革命干部的问题。做不到这一点，斯大林的错误及斯大林集团的衰变就将意味着整个政策继续向右转。那就是所谓的热月道路，即不是靠一个政党取代另一个政党，而是靠同一政党内的成分改组来导致政权产生阶级变动的道路。那就是导致分裂和给革命带来灭顶之灾的道路。要阻止这种（绝非必然的）结局的出现，不能靠消极等待，而要对国内和党内

出现的全部过程进行毫不留情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要对领导层在政策上的滑坡进行毫不留情的批评，要培养干部和保持布尔什维主义的继承性——就是要做反对派现在已在做的那些事情。

不能预先把斗争的调子、尖锐性及速度定下来，然后对政治路线来一个削足适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或全会上的发言的尖锐程度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是，有关这些问题的争论只能在基本路线问题最后商定之后才有意义。对共产国际对内政策这一基本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之深刻程度的任何粉饰都是犯罪，都是与偏离者同流合污，都是取消党，都是为将来的分裂、同时也是为十月革命的破产创造条件。

党内的进一步分化和改组，而且是极其深刻的分化和改组已经在所难免，残酷的打击从右面接踵而来。在反对派的路线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党内群众的分化速度便会加快，同时是无产阶级分子向左转，起决定作用的是党内的无产阶级分子。只有这种分化才能保证在革命的基础上统一。除此而外的任何其他争取党内统一的斗争途径都是不现实的、错误的、非布尔什维主义的。

我深信，如果您能来这里待上一两个星期，并能真正了解党内情况，您就会相信，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惟一可行的政策。

列·托洛茨基

1927年8月12日

№07519

拉狄克：八月全会总结

（1927 年 8 月 12 日）

一

八月全会是在中央委员会内的多数派在国际政策方面遭到严重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执行共产国际的准孟什维主义的政策而导致的中国革命的失败、其部分成员系帝国主义的直接帮凶的英俄委员会的垮台、斯大林关于英国人不敢断绝关系的预言的破产）和反对派得到巩固（反对派联盟融合为一个整体、反对派分子在全国的许多支部内采取的行动、2500 名反对派分子发表声明）的情况下召开的。尽管如此，斯大林还是死不认错，并为本次全会规定了以下目标：向反对派发起猛攻、促成反对派的分裂及思想上的退却，从而涣散其队伍、把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斯大林提出的目标如能实现，就会为进一步大大改变党内乃至国内的力量关系对比扫清道路。把公认的反对派领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就会大大地减轻镇压反对派、将其清除出党的队伍并动用国家机关的力量对付反对派的难度。但是斯大林忽略了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斯大林在政策方面的失败大大地破坏了他在广大的党的积极分子阶层和党内官僚阶层中的威信；第二，实际上正在偏离列宁路线的党内上层人物不会轻易采取开除的行动，这样就等于发出“刹车”信号和提出党的方针向何处去的问题。斯大林还忽略了

反对派的联合所产生的力量，忽略了反对派的反抗能力。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失误，斯大林不得不实行策略上的退却。他败坏反对派的名誉，但一改开除反对派领导人的初衷。这种退却仅仅是一种策略性退即，因为斯大林及其集团并没有放弃把反对派开除出党这一根本目的。他退却的目的是为了以此进行更猛烈打击。他指望利用最近几个月时间来拼凑证明反对派从事派别活动的证据，并利用掌握的材料发起进攻，全会决议为这场进攻确定了方向。这场进攻是围绕下列问题进行的：(1) 党的热月蜕变的危险性问题；(2) 反对派对待战争的态度问题；(3) 分裂危险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两个党的问题。

二

斯大林集团的策略计划在全会之后的头两天就遭到了全面揭露，他作出的对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实行“赦免”的决定之用意也被识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提出的口号是：中央委员会对反对派作了最后一次让步，应密切注视反对派是否停止了派别活动，一旦发现继续活动的迹象就毫不留情地给予抨击。报界的诽谤中伤还在继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反对派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言的意图被几个不起眼的小组给破坏了。当乌格拉诺夫们假惺惺地呼吁让反对派发言时，那几个抱成一团的不起眼的小组用嘘声和口哨声阻止了反对派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说明情况。这就预示着，斯大集团甚至在几周的时间内都不会允许进行真正的争论。在未来岁月里始终对反对派进行中伤的情况下，在两三周时间内能让发表几篇反对派的文章就很不错了，这样一来，斯大林集团以后就可以说什么，“党有机会听取双方的意见”了。一伙又一伙流氓则在千方百计地“证明”党“是了解情况的，是成熟的”，用不着听也不想听反对派的意见，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党内群众

究竟对此抱何种态度，他们为什么会容忍这种嘲弄？在参加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的3000名代表中有好几百名真正的共产党员希望在这次会议上认认真真地澄清一些问题。在基层官方机关中会有数百名官员已经不是出于简单的好奇、而是饶有兴趣地倾听反对派的意见了。他们私下进行的谈话即可证明这一点。但是这部分积极分子没有或者说不想出来反对那些破坏分子。为什么？因为目前的情况尚未使他们感到非常不安，因此他们不想冒险去同那些好斗者对着干，他们知道，在这帮人的背后有党的机关撑腰。

这种情况迫使我们作出这样一个策略结论：用“和平主义的方法”寻找接近党内中间分子的途径的建议在下列意义上才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心平气和地、不厌其烦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不用我们个人的或正式的过激言论击退任何人；但是如果以为关键问题是发言的方式，发言方式关系到能否打通接近党内中间分子的道路，那就大错特错了，党内的中间分子想听取发言，对于那些妨碍他们听取意见的人来说，问题可就不在于方式了。他们想让党内的中间分子听取发言。另外，党内的中间分子并不是党的核心人物。在党内占较大比重的是两种成分：党的机关和党的基层群众。党的机关在风平浪静时具有决定性意义，党的基层群众则在水流受客观情况影响产生波动时具有决定性意义。中间分子平时在党的机关面前畏畏缩缩，到了关键时刻就屈从于党内基层群众，首先是工人的情绪。仅此一点即可说明，党的基层群众应当是我们的基本依靠力量。我们可以而且应当通过反反复复的宣传工作招募党的官员中那些忠顺分子和所谓的中间分子，但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基点。党内中间分子最近几个月关注的焦点是党的代表大会。对于党的基层工人群众来说，近几个月的中心问题是签订集体合同的运动。我们应当以同样旺盛的精力为完成上述两项任务作好准备。

3.[①] 至于说到党的代表大会前的战役，我们认为，我们的纲领将成为它们的主要武器。应从斯大林派在全会上对我们进行攻击的角度出发修改我们的纲领。在有关战争、热月和分裂的问题上持辩护立场是极其有害的。在纲领中要就这几个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讲清楚。任何程式化的东西都是危险的，其原因有二：第一，程式化的东西会让人觉得我们发生了动摇、失去了信心，我们的对立面也会因此在作迂回退却运动，但是其目标始终在于分裂党，党发生分裂之后就要逮捕反对派领导人，即那些即将被开除党籍的领导人（“贵族式的流放”有可能是为此而采取的一种方案）。到那时，一切都取决于是否具有对党和国家的发展趋势及怎么办的问题作过深思熟虑的考虑的第二批、第三批和第四批接替者。

对最近几个月的思想斗争所涉及的三个中心问题应作出如下结论：

（1）热月问题是中心问题。党及其领导机关的热月蜕化倾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a）叫嚷什么，以反对派为代表的部分无产阶级想要勒索农民（这是准备利用我们的农民军队反对我们党的一部分，并因无产阶级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而对整个无产阶级施加压力）；（b）发展生产力的方针，而不问其发展方向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c）发展工业，即不经常注意改善无产阶级的处境和提高他们对工业领导工作的实际参与程度的方针；（d）扩大党的机关的比重，而缩小基层党组织的比重的方针，斯大林在全会发表的声明中对这个方针所作的经典性表述是：只有通过国内战争才能把这些干部撤下来，这个（声明）是对政权脱离党和无产阶级的经典性表述，是对波拿巴式政变所作的经典性表述；（e）在索柯里尼柯夫草拟的对外政策中，这种倾向应公开地称作热月倾向，应指出它在党内（“各级组织”）的势力范围，并公开承认，这种倾向在党内右

① 原文如此。

派（李可夫、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和索可里尼柯夫）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在中派（斯大林）身上得到了部分体现。应公开承认，热月倾向正在增长，正在苏醒，尽管尚未经过周密考虑的表述出现。揭露这种倾向是反对派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只要富农一搞武装发动，或者一有战争，这种倾向就会在极短时间内定型，就会尖锐地提出有可能导致我国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社会和政治变动问题。

（2）在战争问题上纲领中要重复我们在两次发言中谈过的那些内容，并将其归纳到一起，确切地说就是我们的国家是工人国家，尽管企图改变国家这一性质的倾向来势凶猛。捍卫这个国家就是捍卫无产阶级专政。这场斗争分三条战线进行：抵御世界资本的进攻、抵御以白卫分子为代表的俄国过去的统治阶级的进攻和抵御日益增长的热月倾向。不管反对派本身的处境如何，我们都将无条件地手持武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使之免遭世界资本的进攻，然而正是这种捍卫要求我们去同那些国际资本在我国企图依靠的分子，或者是自觉不自觉地用自己的政策恶化取胜条件的分子进行最坚决的斗争。与其说国家资本指望得到俄国贵族或俄国老牌资产阶级中的落伍者的帮助，不如说指望得到富农、耐普曼和专家的帮助。富农会把农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发动起来反对我们。钻进我们的国家机关的专家和耐普曼会瓦解我们的战斗力。同这种危险的斗争不能仅仅是消极的、肃反工作人员的斗争，而首先应是从经济和政治上支持农村贫农和下中农阶层。因此，反对我党部分领导人滑向富农政策的斗争与捍卫祖国的斗争有最直接的关系。这场斗争，而且只有这场斗争才能保证我国后方，才能提高军队的革命气势。对斯大林集团曲解托洛茨基同志拿克列孟梭打比方的用意而提出的问题不应回避，而应作出明确的回答：即使是在目前的多数派实行错误领导的情况下，我们也会一如既往地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些领导人改正错误、党采纳我们的纲领，才是胜利的保证。

（3）在有关两个党的问题上应转守为攻。工人运动中的革命派从来就不代表在工人运动中搞分裂的思想，因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和列宁主义原则是无产阶级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实行联合的惟一基础，是把国家的平民百姓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惟一基础。列宁在与孟什维克实行决裂的同时促成了无产阶级与贫苦农民的十月联合。从历史上看，只有那些以工人阶级的上层与大小资产阶级相勾结、把矛头指向工人阶级的下层群众和农村下层群众的政策去代替捍卫无产阶级这一惟一彻底革命阶级的利益的政策的派别，才是工人运动中的分裂主义者。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恰恰是由于背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政策才产生了反对派。反对派对10年的革命赋予无产阶级的巨大革命能量充满信心，希望纠正党的路线。反对派并没有提出分裂的问题。提这个问题的是那些靠党内卡压手段、靠分裂政策阻挠党纠正自己的路线、阻挠党内改革的人，党内改革就是要搞党内民主，党内民主能够增加无产阶级在党内的比重并帮助党清除那些既不与工人阶级，又不与贫苦农民保持联系的人，清除那些投靠我们执政党的人。我们将不遗余力地为在列宁主义政策基础上实现联共党的统一而斗争，我们不要求享有从事派别活动的自由，我们只要求党具有按照党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和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规定的办法决定党的政策问题的自由。如不按规定的这些办法办事，就必须以迂回的方式来动员党的力量。要想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无产阶级专政。小资产阶级政党也有可能成为实行专政的党，但那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小资产阶级的专政也不可能把无产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相反却必然引发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恢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重要工具——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政党而进行的斗争。

在纲领中应当阐明这些主张，并使之变成我们宣传鼓动工作的中心。这是为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所作的惟一实实在在的准备工作。

淡化这些主张、避而不谈策略上的考虑只会削弱自己。我们党目前经历的危机意味着革命今后许多年会遇到的严重危机。在这种危机中，那些能够深入地思考各种问题并能为此而承受各种打击的志同道合者才是惟一现实的依靠力量。只有在那些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并能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奋不顾身地进行斗争的核心形成之后才能对黎民百姓产生影响。要手腕是免不了的，但是前提是要有善于灵活应付的强手。

三

关于我们对签订集体合同运动的干预问题还有待于我们的工会工作者和经济工作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意见。我们的要求的总体框架已在纲领中提出。按部门、按地区实行专业化势在必行。趁我们的工会工作者利用最短的时间就这个问题进行准备、确定我们的行动的突破口之机，我们应当对这场运动的策略问题作出考虑。这场运动尖锐地提出了我们对待非党工人的态度问题，即第一线的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出过的问题。我们的总的立场应当是：不听信任何蛊惑性宣传，办不到的事情不许诺，我们应当在各支部内外捍卫从工人阶级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角度看来是必要的要求。如果反对派——第一线的工人——能够在党的各个支部内勇敢而顽强地捍卫这些要求，那么肯定也会在非党工人中传播开来。要在非党的、但具备阶级觉悟的工人中开展鼓动工作，鼓动这些工人为纠正党的总路线，特别是有关工人问题的路线而加入到党内来。尽管我们的工厂里的干部还不够坚强有力，也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会随着这项任务的完成而逐渐成长起来。

卡·拉狄克

1927 年 8 月 12 日

№07520

越飞致托洛茨基

（1927年8月12日）

绝密

亲爱的列夫·达维多维奇：

中央委员会内的多数派为全党确立的和我们（反对派）正以顽强的斗争表示反对的那种体制是否正开始渗入反对派内部？“上层官僚”是作决定的，其余的人全都只能服从他们的决定。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13名反对派成员在反对派内部未对递交声明这一事实本身和声明的内容进行预先讨论的情况下即代表整个反对派发表声明①，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

例如我就认为，递交这样的声明是错误的。即便是认为党内多数派是向往党内统一、反对分裂、反对搞派别活动的，也未必能得出必须发表这样的声明的结论。因为党内多数派无疑也是有机会主义情绪的，但是谁也不会因此得出结论说，我们也应当去做机会主义的让步。**未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一事实**肯定会给广大群众留下多数派软弱无力、手足无措的印象，因此，要为这个事实作出某种让步；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全会未作有关解释，声明的事实也必将造成这样的印象，即发表声明的原因在于害怕中央委员会开除这两位同志。

① 见本专题文件№07515。

但即使认为在目前的具体情况下必须发表声明，难道就不能够做到：第一，早些要求多数派全文发表这个声明；第二，避免在声明中使用下列不妥当的提法。

（1）“我们当然也无条件地、无保留地主张捍卫在目前这个中央、目前这个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虽说此话其实不错，但是要这样写吗？这样一写就会使人觉得，我们承认现任领导是正确的好领导；可否清楚而准确地谈一谈我们为什么甚至是在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领导不好时也要主张捍卫社会主义祖国？

（2）关于热月。这里又是外交辞令太多。声明中说的那些话给人的印象是，我们既“否定”“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党变成了热月党”的看法，又“否定”我们党的上层官僚变成了热月党人的看法。

（3）“我们将执行联共（布）和联共（布）中央的各项决定。”有必要这样说吗？我认为，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去年发表的声明给反对派造成了很大危害。事先明明知道我们要反对中央的许多决定，中央也会利用这一点来反对我们，再次指责我们出尔反尔、不信守诺言，现在是否有必要又以反对派的名义来重复这个声明呢？

（4）“我们准备坚决地尽一切努力去肃清一切派别活动的成分……”等等，尽管今后要把“派别活动的成分”的出现归因于“党内的正常制度被破坏”，然而这一切都太微妙，谁也不会理解为，我们只在上述“党内的正常制度被破坏”的现象不复存在时才能承担起“肃清一切派别活动的成分”的责任。如果我们现在不着手肃清派别活动的成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有理由指责我们欺骗党。

也许，若是提前对此类声明展开讨论，就会避免这样的错误。即便认为发表声明是错误行为的反对派分子属于少数派，他们也会

清楚，他们面对的是一种既成事实，而且要为自己不同意的事情负责。

请您好好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握手。

您的　阿·越飞

1927年8月12日于莫斯科

№07521

季诺维也夫的一封信

（1927 年 8 月 27 日）

尊敬的同志们！

你们对我们那封关于将萨法罗夫[①] 同志流放到君士坦丁堡的信所作的回复，再次反映了列宁曾一再提出警告、我们现在和将来坚决反对的那种制度。

我们在信中说，将萨法罗夫同志流放到君士坦丁堡这一不能容忍的做法，就他个人而言，因白卫分子将他的名字同杀死沙皇联系起来而变得复杂化了，你们竟说什么这是出于“与共产党员称号不相称且败坏共产党员称号的怯懦的动机”。这是难以置信的毫无根据的粗暴说法！从什么时候起，对无谓地面临生命危险的同志的关心竟成了“怯懦的动机”?！我们认为靠他人壮胆、无法以党的利益来解释的勇敢并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勇敢。我们认为斯大林—莫洛托夫将许多同志流放的行为并不是什么勇敢行为，斯大林—莫洛托夫知道这些同志在十五大召开前会以布尔什维克的方式尖锐揭露中央书记处的非布尔什维克政策。你们列出了一份你们认为过去和现在均面临同样危险的我们国外代表的简短名单。你们列出的有：参与杀死沙皇并处在“俄国白卫分子中心的”乌菲姆采夫同志，审判社

① 萨法罗夫，格·伊·（1891～1942）——190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21 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土耳其斯坦局成员，1921～1922 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党的 10 大和 11 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在 14 大上追随“新反对派”，后参加托季联盟，1927 年在 15 大上被开除出党。1928 年恢复党籍，1934 年再次被开除出党。

会民主党人的法庭庭长皮达可夫同志，在北京这个照你们的说法是“不乏武装起来的俄国白卫君主主义分子”的地方待了一年的萨法罗夫同志。好极了，你们开列出这个不长的名单（还可以把加米涅夫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名字补充进去）时列出的恰恰是三位反对派，他们都并非出于公务的考虑而是出于纯派别的考虑被派出的。所谓我们并未对将这几位和其他反对派派往国外表示异议的说法是错误的。比如，当企图甚至不以公务为幌子就将皮达可夫同志流放到加拿大时，托洛茨基曾就此事给奥尔忠尼启泽同志写信，季诺维也夫也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讲过此事。最后，我们准备接受对我们的指责，因为过去我们并未始终对日益发展和日益加强的对反对派实施的行政镇压制度予以足够的回击。我们打算今后不再给这种指责提供任何口实。

我们对公务上的反对意见，即对我们所指出的认为流放萨法罗夫同志没有任何公务上的理由这一点，你们无言以对。只好指责我们“在反对派声明（8月8日）准备服从中央的一切决议的第二天就拒绝服从中央决议”。你们断言，我们8月8日保证老老实实地接受官僚主义专横和派别的压制、包括在代表大会召开前驱逐和流放反对派的一切事实，我们坚决批驳这种说法。你们大概还记得列宁针对这种行为都说过些什么话。布尔什维克对中央决议的服从与官员的顺从的俯首贴耳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说有谁违反了最近召开的联席全会的决定，那就是你们。斯大林在全会上讲到“暂时的休战”。如果这些讲话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中央在得知反对派的声明后，将采取措施以改进党内制度，首先是取消最令人恼火的、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尤其不能容忍的对反对派的迫害。我们8月8日声明的第二部分谈的就是这个问题，第二部分与第一部分是分开的，但并未抛弃，而是交给了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驱逐萨法罗夫同志是你们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在所有战线上开始实行的

有组织进攻的表现之一，你们采用了列宁斥之为粗暴无礼的那种手段。我们坚定不移地站在8月8日声明的立场上。但是我们的最好的计划可能因为继续实行斯大林的政策而落空。我们全力保留的对驱逐萨法罗夫的抗议是我们争取建立健康的党内制度的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健康的党内制度才能保证我们所迫切需要的统一和革命纪律。

格·季诺维也夫

1927年8月27日

№07522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什么把我们开除出党？（给党代表大会的信）

（1927年8月）

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将谢列布里亚科夫[①]同志、沙罗夫同志和我开除出党及此前将姆拉奇科夫斯基[②]同志、沃罗比约夫等同志开除出党的通知说，我们被开除出党是由于成立非法印刷厂。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通知对一个基本问题未作回答，即为什么一批具有20多年党龄、在最困难的沙皇反动时期从未停止过党的工作的老布尔什维克同成百上千较为年轻的党员一起，在我国革命的某个阶段不得不组织非法印刷自己的文件、违反党的纪律呢？

然而事情的实质绝不在于印刷厂、印刷机等，这些东西被推上首位，只是掩盖了事情的政治实质和社会实质。非法印刷厂可以是犯罪，但也可以是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的极为有益的工具。全部问题在于，印刷厂为什么政策服务。这才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从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即从惟一正确的角度提出这个问

① 谢列布里亚科夫，列·彼·（1888～1937）——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9～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和中央书记。1919～1921年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1922年起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37年被处死，后平反。

② 姆拉奇科夫斯基，C.B.（1888～1936）——1905年入党。1920～1925年任乌拉尔军区司令，以后是西西伯利亚军区司令。1927年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缝纫机管理局局长。1927年因从事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

题，为什么把我们开除出党呢？为什么我们的要求被党的现行制度视为“非法的”要求？

我们要求增加对基本建设的投资。那就是说我们被开除是因为主张国家更快地实现工业化。

我们要求更快地增加工人的工资，改善劳动保护制度等等。那就是说我们被开除是因为主张改善工人的日常生活。

我们几年来一直要求提高耐普曼和富农的税金以促进国有工业的发展。可见，我们被开除是因为同苏维埃国家内的资本主义发展作斗争。

我们要求采取我们的纲领和反纲领中提到的更切实的措施，以捍卫贫苦农民的利益，并要求对集体农业给予更切实的帮助。可见，我们被开除是由于捍卫我党的土地纲领。

我们要求同苏维埃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弊病作坚决的斗争，反对将党内、苏维埃机关和工会中的官僚变成脱离工人群众的封闭的特权阶层。可见，我们被开除是由于要求实行真正的工人民主。

我们要求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同蒋介石、冯玉祥之流、汪精卫之流等屠杀中国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刽子手决裂。我们被反对这种决裂的人即中国革命中孟什维克策略的传播者开除出党，因为我们坚持资产阶级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策略的起码常识。

总之，我们要求中央委员会在一系列内外政策问题上改变其机会主义的路线，至少对党和国家机关来一次社会主义的中修，以去除充斥其中的延缓我们向共产主义进程的官僚主义弊病。

我们是因此被开除出党的。

我要问每一位党员和党的十五大的每一位代表，以上我们列举的所有旨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及其阶级基础的要求，是不是列宁党内和苏维埃国家内的合法要求？

如果有人对我说：“这些要求是合法的。”那我要问，为什么党

的刊物除了每隔两年在《争论专页》上拨出很少的篇幅而外，过去和现在都不让我们捍卫这些要求？为什么反对派小册子上的几十篇文章被扔进了党报的纸篓里？为什么禁止刊登我们的纲领？仅在最近两个月内就有600多人因刊登和传播我们的纲领、因在纲领上签名被开除出党？如果正常的党内制度使党内少数派可以在我党的一般机关报上刊登这一切，哪个疯子会想到开动印刷机并非法出版自己的文件呢？

这里只能有一个答案。争取上述要求的斗争在我们党内已成为非法的斗争，凡捍卫这些要求者轻则开除出党，重则坐牢。如老工人布尔什维克涅恰耶夫、布罗韦尔及许多其他较年轻的同志就进了监狱。

既然如此，自然会提出下述问题：迫于哪些阶级的压力，进攻“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提高工资、实现工人民主和革命的外交政策等要求在苏维埃国家中竟成了非法的要求呢？迫于哪些阶级的压力，拥护反对派的人被驱逐出党，丢掉饭碗，有人还因此坐牢，而像康德拉季耶夫[①]之流、马卡罗夫[②]之流、萨德林之流和鲁德涅夫之流却可以毫无风险地在其正式发言中批评中央的现行政策是“超工业化”政策，延缓了国内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为人民委员会编制富农的农业建设法案（像中央委员亚·斯米尔诺夫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的名义签署的草案，幸而该草案现已束之高阁）？为什么这些乌斯特利亚洛夫分子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在增大，而拥护反对派的人则面临开除出党的威胁，执笔写这封信的人在为党工作了23年之后已被赶出党的大门外？难道我们所有被开除的人是迫

① 康德拉季耶夫，H.Д.（1892～1938）——经济学家，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行情研究所所长。后遭镇压。

② 马卡罗夫，H.P.（1887～1980）——经济学家、农学家。季米里亚捷夫农业科学院、沃罗涅日农学院教授。俄罗斯联邦农业人民委员部主席团委员。

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压力而被开除的吗？

只有天字第一号的白痴才会这样想。

在作出将我们三人开除出党的判决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我在发言中顺便提到，分裂和剪除反对派的政策表明我们在国际资产阶级面前软弱无力，这只会使国际资产阶级更加肆无忌惮和加紧对我们的进攻；叶·雅罗斯拉夫斯基在作答时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充分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叶·雅罗斯拉夫斯基说，恰恰相反，国外资产阶级报刊说八月全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留在中央委员会内是党和中央软弱无力的表现，而开除反对派将是党的力量的证明。

叶·雅罗斯拉夫斯基的这一想法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把反对派开除出党是迫于世界资产阶级对我党的压力，当然也赢得了我国内部的乌斯特利亚洛夫之流的狂热掌声。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我们的要求可以采取不同的态度。可以同意我们的要求，也可以认为它根本无法实现、早已过时、不合时宜，因而应予抛弃。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政权的正常情况下，不应认为是非法的。如果这些要求实际成了非法的，那么只能说明一点：在暂时未得到先进的欧洲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支持的十月革命届满 10 周年的时候，联共党的左翼**在资产阶级势力对无产阶级专政发起进攻的压力下**在党内和国内均失去了合法性。谁不明白这一点，谁就是忘了按列宁主义的方式思维，谁就没有勇气正视当今的痛苦真理。把注意力集中到印刷机、秘密印刷厂、某些违反纪律的行为上，就是说干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对我们党内危机采取列宁主义的态度，我们的党内危机早已成为是否允许国内外资产阶级扩张并在我国胡作非为的国际性问题，这使得党的领导人迫于资产阶级的压力和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缩小党内和苏联国内的合法性范围，剥夺列宁的党在代表大会前多数派和少数派进行合法斗

争的基础上制订自己决定时的自由。只要没有这种自由，就分不清谁是多数派谁是少数派。形式上监察委员会将我们开除出党，因为我们违反党的纪律。而事实上这是资产阶级和富农之手将老布尔什维克和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较年轻的同志从党的身上扯掉，扯得这个老资格的列宁主义政党遍体鳞伤。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前，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布尔什维克不会因为捍卫共产主义而坐牢，这个国家就是苏联。如今这个国家迫于资产阶级势力的压力也在监狱里关押了几名布尔什维克，使共产党左翼开始失去合法性。只有天字第一号的傻瓜、蠢货和市侩才会认为，只有粉碎反对派，剥夺他们的合法性，才能“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使世界资本主义“保持中立”，从而拖延战争的爆发。只有小孩子才会说进攻“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主义者的纲领的最好序幕是将那些为了捍卫这个并非昨天才提出的纲领而被迫开动印刷机的人开除出党。苏联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必将爆发，而且已为期不远。要使战争再推迟一两年，只有靠大手笔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列宁主义外交政策，并且要有强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后方和真正的党的统一，这种统一不是建立在剪除和开除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正确路线和在致命的危险面前的自觉纪律的基础上。就连公认十分平庸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在备战时也总是力求结成统一战线，包括同社会党人，即同左派资产阶级社会结成统一战线。我们那些通过剪除和剥夺“苏维埃社会左派”即党内反对派的合法性的办法来备战的政治家该怎么称呼呢？在每一支力量都很宝贵的时候，他们用谁来代替那些经受过战斗锻炼的成千上万反对派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呢？又用谁来代替像托洛茨基、斯米尔加、穆拉洛夫、巴卡耶夫、拉舍维奇、穆拉奇科夫斯基、普里马科夫、布特纳这样一些内战老战士的政治经验和军事经验呢？

我向所有党员及党的十五大的代表发出呼吁，请你们在反对派

问题上不要只去注意诸如印刷机、违反纪律等等鸡毛蒜皮的小事，而要考虑一下政治上的基本问题，即在什么阶级的压力下把我们开除出联共的。我肯定地说，而且似已证明，这是在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的压力下干的，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正进逼无产阶级专政，削减苏联的合法权利，剥夺他们最痛恨的党的左翼的合法权利。

不准资产阶级插手联共党！

未受资产阶级削减的党和苏维埃的合法性万岁！

在列宁主义政策基础上的党的统一万岁！

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1927 年 8 月

№07523

叶梅利亚诺夫、霍列奇科：我们对斯列普科夫的回答

（1927年8月）

无论官方的党的路线的捍卫者怎样叫嚷反对派破产了、反对派丝毫没有受到党内群众的同情，但反对派问题并未从党的报刊上消失，并未从党的各级组织，从基层党小组到中央全会、代表会议和党代表大会的议题中消失。同反对派的论战在党内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甚至练出了一批“斥责”反对派的“专家们”，为首的是由马列茨基①、斯捷茨基② 和斯列普科夫③ 等人为代表的“布哈林学派”。每有反对派的文件、讲话或文章出现，这些“专家”就得到斥责的定货，反对派的文章或文件交他们“加工”后再出现时（只要出现），必定配有这些“专家”中的什么人炮制的“解毒药”。在这种时候最喜欢用的方法是从被驳斥的文件中寻章摘句，通过恶意的不负责任的阐释来歪曲作者的原意，甚至直接伪造引

① 马列茨基，Д.П.（1901～1938?）——1919年入党。1925年以前在《真理报》工作。1929～1932年在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计划委员会任学术秘书和经济室主任。后遭镇压。

② 斯捷茨基，А.И.（1896～1938）——1915年入党。1926～1929年任联共（布）中央西北局委员和列宁格勒省委部长。1930～1938年任联共中央部长，1934年起兼任《布尔什维克》杂志主编。后遭镇压。

③ 斯列普可夫，A.H.（1899～1937）——1919年入党。1924～1928年在《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工作，同时于1926～1928年任联共中央组织分配部责任指导员。1928～1932年任中伏尔加区委常务局委员和宣传鼓动工作部部长。后遭镇压。

文。有什么法子呢，既然斥责反对派成了“布哈林学派”“年轻的”理论家们的一门专业，既然反对派无论写什么他们都必须批驳，那么不这样干就不行。既然名为蘑菇，就应听人采食。

但是假如文件的原本和被不负责任地胡乱摘录或伪造的引文放在一起，这种方法就太冒险了。伪造的东西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出来。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读者只去读受到批判的文件而不去读“专家的”批判文章。于是现在官方的报刊便越来越多地开始掌握一种新的手法：只发表批判反对派文件的文章，不发表文件的原本。斯列普科夫、马列茨基及其战友们不仅享有在论战中一锤定音的权利，而且也享有随心所欲地阐述反对派观点和不受惩罚地诽谤反对派的权利。党员和工人则被剥夺了了解反对派观点的权利，他们须对斯列普科夫之流的谎言信以为真，除非他们愿意为阅读“非法的”文件而受到党的审判。

6月27日递交给中央的文件[①] 也遭到了这样的厄运。这是一份有15位同志签名的、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向党阐述他们对党和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的观点的材料。按照布尔什维主义的传统，全体党员都有权了解代表大会的材料。但是现在看来这已成为斯列普科夫式“专家们”的专利。

斯列普科夫同志步其导师布哈林的后尘，对我国国有化工业中“垄断组织的腐败和官僚主义的膨胀”怕得要死，认为造成官僚主义膨胀危险的正是“国有化工业的垄断地位”的事实本身。遗憾的是，赋予斯列普科夫之流的对党的“正确”路线的垄断权已经使他们十分“腐败”，以至尽管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他们的机会主义气味仍然很远就可闻到，不管他们怎样伪装出这股气味来自反对派而不是来自他们的样子。

① 见本专题文件№09450。

斯列普科夫写道："反对派批评家的国际观点充满了矛盾。但透过这些矛盾仍可看出对世界革命前景的取消主义评价。"这是斯列普科夫抛出的第一个指责。

"对世界革命前景的取消主义评价"，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表明世界革命至少在近期不可能发生。15人文件是否有类似的内容呢？没有，其中所说的恰恰相反。为了稍稍掩饰一下自己恬不知耻的谎言，斯列普科夫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捍卫苏联和共产国际策略等问题上兜了半天圈子。但是他最终还得引用文件中的那些清楚地、毫不含糊地谈到这一前景的地方。不过他是以欺诈的方式引用的。因此还是让我们先看看原文吧：

15人文件断言："资本主义世界早在世界大战前就进入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这个时代只必将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告终。"为发挥这一总的观点文件继续说：如果认为在革命和战争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连续不断的武装搏斗，那也是幼稚的。间歇期间会出现某种程度的"和平"发展。但这些"和平"时期与帝国主义时代前的和平时期不能同日而语。在现在的和平时期阶级矛盾仍旧异常尖锐，并且随时可能重新变成武装搏斗。

因此，任何关于稳定，即关于某种暂时的，但却是显而易见的和平生存时期的争论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话。有关革命在某个时期内会爆发（斯大林集团关于"一国社会主义胜利"的理认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任何预言、任何推断都是理论上的巫医术和实践中的机会主义）。

似乎一清二楚，而且与"对世界革命前景的取消主义评价"毫无共同之处。但斯列普科夫认为最好是从文件的末尾引用这一切，并且最先摘出"这方面只能预见和预测几个月后的事情，而不能预见和预测几年之后的事情"这句话，好把"缺乏某种确定的关于世界革命前景的观点"加在我们身上。然而十分明确的是，这句话并

不说明我们没有某种确定的关于世界革命前景的观点，而是说明在我们看来并不存在保持稳定、保持反动的前景。斯列普科夫同志将革命和反动混为一谈可不太好，即使是为了羞辱反对派也不应该。

我们并不是一般地拒绝预测和预见。例如我们在同一章就说到战后的局势“首先使资本主义的欧洲处于社会革命的打击之下”。而在关于共产国际政策一章中也作了这样的预测：“指望国民党政府（无论是过去的广东政府和现在的武汉政府）战为反对帝国主义者战争的政府是错误的，就像指望英国工党成为欧洲和平的工具一样。”在武汉政府可耻地认输、国民党将领同张作霖开始进行妥协谈判、总委员会在战争问题上采取叛卖性立场之后，这个预测的正确性就不必怀疑了。但斯列普科夫说，最好我们对中国革命和英俄委员会的策略专作研究。等着瞧吧。

反正至少有一点很清楚：我们对世界革命前景的评价被斯列普科夫称之为取消主义的评价，其惟一的理由是我们并不承认世界的反动趋势已成定局。斯列普科夫预言反动的趋势前景看好，因此猛烈地攻击我们。

第一，你看，我们由于自己的无知断言欧洲仅接近战前水平，而实际上欧洲已经在 1925 年“在欧洲生产指数方面”超过战前水平5%；第二，“这里所说的不是资本主义**一般的**（黑体是我们用的）尽管是缓慢的发展，而是伴之以合理化、首先是生产的技术设备改造的发展。”斯列普科夫继续说，“说世界资本主义生产超过战前指数还不够，应该说这一过渡伴之以技术的进步、伴之以利用与先前不同的原料制造的新型产品的迅猛发展。”

这里一切都好：既是年轻教授对似能以 5% 的精确度反映现实的“生产指数”的令人感动的天真的信任，又是对资本主义的稳固的令考茨基本人也自愧弗如的赞美诗。既然资本主义能够进行工业的改造，既然资本主义尚未“腐朽”到开始缩减“产品种类”、不

使用某种原料的地步，那就让稳定尚不可靠的说法见鬼去吧，那就谈不上什么革命了。斯列普科夫大言不惭地断言，目前发生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一般发展，而是新一轮资本主义繁荣的开始，在这个时期根本谈不上革命。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他在这里不试图预测一下数年之后的事情。是不是觉得不好意思了呢？

斯列普科夫对反动的趋势的评价绝对不是取消主义的评价，但对世界革命的评价则是彻头彻尾的取消主义的评价。斯列普科夫极力用来掩盖自己稳定论中可耻之处的“暂时”、“相对”之类的字眼，骗不了任何人。既然斯列普科夫由技术的发展得出稳定的结论，既然他并未指出而且不可能指出可能使技术发展陷于停顿的原因，那么试问，在斯列普科夫看来，这个“暂时”有多长时间？

斯列普科夫对稳定问题的可耻的机会主义和可耻的修正主义观点就在于，在他的分析中阶级矛盾不见了。资本主义推动了技术的进步，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稳定是有保障的。至于在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欧洲资本家必须降低工资，至于他们像战前那样只有靠掠夺殖民地国家的财富来最大限度地维持国内某种程度的阶级和平，至于因利用新型的原料，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欧洲与美国之间、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尖锐化，都只字不提。恰恰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一个典型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在某个阶段上会自行停止。恰恰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这种自行停止不会发生，资本主义在阶级矛盾尖锐化的条件下灭亡，我们的任务不是等待资本主义灭亡，而是为此创造条件。难怪斯列普科夫年轻时就曾是个立宪民主党人。

“毫无疑问，”我们在文件中就“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写道，“中央委员会政策的出发点就是默认国际革命将永远推迟发生这个意见。这就是说放弃列宁的‘世界已进入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提法，而采用取消派‘世界革命’的观点。”“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

拥护者反对我们的文件的头一篇讲话中，就假斯大林之手证明对我们的这一指责是正确的。

在世界革命问题上，斯列普科夫公开站在取消主义的修正主义立场上，还肆无忌惮地指责我们把捍卫苏联的利益同国际革命的利益对立起来，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下面这段引文：“西欧的工人运动在这里首先被看作是保卫苏联免受帝国主义者的进攻的方式，而不是通往国际革命的道路。”只要读读15人文件就会明白，所谓“在这里”指的是在一国社会主义论的理论家那里。我们指责这些理论家将捍卫苏联与世界革命对立起来，斯列普科夫对这种指责未予反驳，却反诬我们把两者对立起来。斯列普科夫在这里大肆歪曲，因为他在对我们的文件进行“加工”时，不会不读到下列文字：

“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总是偏离国际无产阶级争取世界革命这一阶级斗争路线而走上同小资产阶级政党合作的路线：在英国是为了保护和平，在中国是为了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战争。但是中央的政策并未达到这些目的。使苏联这**一欧洲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免受进攻，**动摇帝国主义者在东方的势力，这些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争取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斗争来实现。**”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开展世界革命的任务同捍卫苏联的任务是一回事，这与中央的路线是恰恰相反的，中央试图使世界革命服从于捍卫苏联的任务，也正是**因为如此反而破坏了捍卫苏联的事业。**

但是我们的指责对不对？在这里我们不能重复我们在文件里已说过的话。但是斯列普科夫却在这里再次充分证明了指责的正确性。

“外国武装干涉的威胁，”他写道，“只有靠世界革命的胜利来消除，**同这种威胁的斗争也就是争取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

请思考一下这段话。因为其中一切都颠倒了：并不是世界革命

需要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消除外国武装干涉需要世界革命。这样一来，把捍卫由英国罢工运动的叛卖者盘踞的英俄委员会说成真正的革命策略和发展世界革命的策略就不足为奇了。这样一来，如15人文件所说的，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工会运动的利益成了英国工人运动的机会主义者能够和将要进行反战斗争的幻想的牺牲品”不足为奇。难怪斯列普科夫认为英俄委员会最好是“专门谈谈”。

斯列普科夫的全部欺诈行为令人穷于应付。因此我们只得列举其中几条：

1．斯列普科夫硬说我们曾断言我国“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有意撒谎。我们的整篇文件批评中央委员会，正是因为它未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2．斯列普科夫让人相信“文件的作者”认为应将合作社排除出他们的“发展社会主义的计划”，这是当面撒谎：文件中极其详尽地谈到合作社**这样一种从贫农和中农的个体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经济的方式**及将其与国有经济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不过斯列普科夫显然想使**合作社有助于保存小经济**。那就直说吧，不必撒谎。

3．斯列普科夫说“接受恢复苏维埃的口号就是承认我国没有苏维埃”，这是有意诽谤。这同说接受“复兴”苏维埃的口号就是承认苏维埃已经死亡一样地荒唐。我们的“**恢复苏维埃这一保证工人和农村贫民占绝对优势的真正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斯列普科夫认为最好将用黑体标出的部分略去）的口号，就是要求扩大工人民主，同扩大小资产阶级民主的路线针锋相对，就是要求消灭苏维埃中的官僚主义弊病和小资产阶级蜕化变质因素，这是尽人皆知的。至于这种蜕化变质因素已经存在，任何一个工人都可以向斯列普科夫说明。

4．斯列普科夫对我们的声明大发歇斯底里。我们声明，“国家

政治保卫局的活动日益开始转向同**由官僚主义弊病和小资产阶级的歪曲而引起的**（黑体标出的部分再次略去了）工人理所当然的不满情绪的斗争，甚至转向同党内反对派的斗争，红军有变成波拿巴式的冒险行动的方便工具的危险。”他感慨地说，这样的声明，这样的“诽谤”对谁有利呢。他真不如别这么歇斯底里，还是来驳斥一下我们的声明，他真不如来证明一下，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活动（我们在文件中特别强调了它过去的光荣历史）**并未日益转向工厂，国家政治保卫局并未监视反对派，**而红军（与加里宁在中央二月全会上说过的和**辩护过**的相反）的**指挥职位并未被**所谓富裕农民**占满**。对革命的敌人有利的不是声明，而是这类事实本身，既然有这些事实存在，那么闭而不谈就是犯罪。

现在来谈经济政策。斯列普科夫按自己的习惯首先试图指责我们“诽谤”。他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控制数字让人相信：1925～1926年工业固定资本增长了10%。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计算。而实际情况是：南方钢铁管理局成员斯维岑在全乌克兰工商业代表大会委员会的报告中说：“由于投入工厂进行设备改造的资金不足，**冶金企业的技术状况更加陈旧**。同1926年1月1日相比，斯大林工厂、第聂伯厂及绍达尔厂、甘季耶厂的一些车间的技术状况恶化，大部分电机已无法使用，需要更换。因此一些冶金工厂是在一个车间随时可能停工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工商报》，1927年3月2日第50号）来自科斯特罗马的记者报道说：“纺织工厂的机器极度老化，最老的锅炉是1889年出的，最新的锅炉则是1899年出的……蒸汽动力业这种困境可以在所有工厂中看到。”（《劳动报》，1927年3月6日第34号）类似的报道俯拾皆是。

这些事实同固定资本10%的增长率这种理论上的计算怎么能彼此相容呢？我认为，斯列普科夫同志不会不知道其中的奥秘所在。在“控制数字”上早就已说明，“在排除资产、损耗指标及技

术状况的条件下，需作一系列设定。”（“控制数字”第107页）其主要设定为：损耗不是由实际价格决定，而是根据所谓的“折旧定额”，**折旧定额则是以切尔文卢布为单位比照以战前卢布为单位的资产价值计算的**。这就是说，这个理论上计算出的损耗实际上缩小了一半左右。只要这样一修改（计算投资额和资产价值时均作了设定），资产增长的百分比就会一下子减少一半。因此15人文件说，工业方面“目前是极其破旧不堪的设备略有增加”。我们并未像斯列普科夫说的那样在诽谤党，而是他极力地用花言巧语蒙骗党内群众。

价格问题也是如此。即使斯列普科夫列举的降低数字可以无条件地接受，那情况也糟透了。我们在文件中指出，对私人贸易品的加价在1923年10月是8%，到1924年10月就已达到40%，1925年10月为51%，1926年10月为63%，1927年1月为66%。斯列普科夫并不想推翻这些数字。即使私人贸易品价格按指数降低了6.4%（出厂价也同时降低），那就是说加价率大约相当于1月份的水平，即加价66%。私人贸易赖以发财的批零价剪刀差并未缩小。但斯列普科夫深知，降价运动实际上破产了，降低价格的同时商品质量也随之降低，降价**主要涉及到滞销品，各合作社小铺无法弄到好商品**，只得去找私商。只是令人不解的是，斯列普科夫同志在这里花言巧语地打算蒙骗谁？只能蒙骗自己，因为无论是工人，还是农民依自身的经验都知道，“降价”价值几何，斯列普科夫说服不了他们。

斯列普科夫还指责我们“向市场及其规律投降”。请看我们的原话：“工业品价格的降低，”15人文件说，“应该是其价值降低（而不是人为地降低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利润和工资）和市场饱和的结果。”这就是向市场投降吗？不是，仅仅是为了“从市场出发并尊重市场规律，经过系统而严格的考虑和以对市场过程的精确计算

为基础的经济措施，牢牢抓住对市场和货币流通的调节。”1921 年 12 月俄共全国代表会议就是这样确立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党的经济政策任务的。我们至今仍坚持这一立场。现在中央的政策却建立在放弃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对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亦步亦趋，想“改正”市场的缺点，却并不取消市场。中央的政策并不是采取“经过严格的考虑和以对市场的精确计算为基础的经济措施”，而是试图通过行政命令来对市场起作用，恢复蒲鲁东所谓“设计价值”的昙花一现的思想。按照小资产阶级路线修正党的立场的不是我们，而是中央委员会。不过顺便说说，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特点是必遭破产。这次也是如此。

中央绞尽脑汁按自己的方法降低价格已有三年半以上的时间，而结果是劣质商品几乎同 1923 年 10 月一样多，至少**比两年前贵了** 20%。让斯列普科夫同志来推翻这个事实，让他来解释一下中央那貌似列宁主义的政策怎么会导致这种后果的吧。

这项政策不仅毫无结果，而且是对工人的公开欺骗。中央一直抑制名义工资的增长，中央答应工人通过降价来提高实际工资。让他们问一问工人，是否靠这一政策提高了不少工资？

斯列普科夫同志在我国工人政策的问题上表现得更软弱，更无力，实际上他甚至在这里根本没有要反驳的意思，他借口我们在唆使工人去反对党并蛊惑人心来支吾搪塞。这里也没什么可反对的。

我国的工会日益偏离捍卫工人免受经济机关官僚主义弊病的路线，而转向捍卫经济机关的一切措施的路线，日益成为经济机关的附庸，是否属实？工会已失去了自己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是否属实？属实，而且像托姆斯基之类在这件事情上有威信的人也证实了（见他在党的十四大上的讲话）。

“经济制度”靠损害工人来运作，是否属实？每个工人均可证实，因为他们对此有切身体会。

合理化导致解雇工人，是否属实？所有在中央二月全会上发言的中央委员都证实了这一点。

中央指示让企业“摆脱”“多余的”劳力，并建议只有在劳动强度提高的情况下方可增加工资，是否属实？人人皆可在中央关于合理化的决议中读到。

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半年即增加了28万人，失业人数的增加超过了工人的增加，技术熟练工人的失业人数增加得最快，是否属实？属实，而且只要浏览一下《劳动统计》杂志第11～12期及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中央统计局和劳动人民委员部机关报，人人都会确信。

人民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恰恰在失业人数增加时颁布了关于撤销职业介绍所对失业者的登记和补助金的规定，对技术熟练的失业者的打击最大，是否属实？凡是看过这个决定的人均可证实。

工厂中日益确立了管理人员的无限权力，实际上不让工厂委员参与决定工人的去留，工人的去留由技师拍板。技师接受工人的贿赂，而生产协会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复兴”工会的方针早已被置之脑后，是否属实？这又是任何一个工人都早已知道的事情。

最后，工人工资顶多只接近战前水平，同时每个工人在8小时工作日内在设备状况极差的情况下的产量也大大低于战前水平，是否属实？企业内不幸事件的次数增加了，是否属实？我们的保险银行不肯在被保险人身上多花钱，企业医生得到指令不准为因超额工作而患病的工人开假条，是否属实？

对所有这一切，斯列普科夫认为最好是避而不谈。他只是以欺诈手段极力表明，我国的工资已大大提高了，而且这一提高是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的。

我们在文件中写道：“工资至8月（25年）已增长25%，却并未达到战前水平。但从此时起实际工资停止增长，现在甚至低于

1925 年秋天的水平。

斯列普科夫说这是诽谤。我们可举一份很权威的材料，即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向工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所做的工作报告，报告的第 203 页上有一张实际工资及工人月工资表。1925 年 8 月工资提高到每天 131.5 戈比，此后日工资降低了，而在 1926 年 4 月工资仅为每天 119 戈比。9 月工资又渐渐提高到每天 129.2 戈比。12 月，根据中央劳动统计局的材料，下降到日 129 戈比。根据《统计评论》的材料 2 月（1926 年）又上升到 130 戈比。较新的经过核对的材料暂时还没有（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由工作日天数决定的月工资的控制数字只是个初步数字，只可同上月相比）。

至于产量，只有 1926 年 10 月前的数字，同样见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工作报告。

1925 年 8 月的产量为 6.69 战前卢布，9 月为 6.79 战前卢布，即在同期工资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提高了 19%。

可见，从工资在一定程度上接近战前水平时起，工资的增长就停止了，而劳动强度却继续攀升，这个事实怎么也掩盖不了。

我们在文件中写道：“总而言之，与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完全相反，从 1924 年 10 月到 1926 年 10 月（包括 10 月），每个工人的平均产量提高了 47.3%，而战前工资仅提高 26%。”这些数字不是我们主观臆想出来的，甚至也不是我们计算出来的，同样引自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报告。

斯列普科夫想如何脱身呢？他举出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经济形势概况中今年 5 月份同去年 5 月份的月工资的比较。我们已经看到，1926 年 5 月的月工资甚至比 1925 年秋天的月工资也大为降低。此外，1926 年复活节正好在 5 月，工作日少了，月工资就更低。瞧，斯列普科夫根据今年 5 月同去年工资最低的月份所做的比较想证明工资提高了 24%。这不是统计上的欺诈又是什么呢？

至于失业问题，斯列普科夫只剩下一个办法。他企图使工人相信，反对派提不出任何建议，他说："反对派未就同失业作斗争问题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他们所鼓吹的纲领必将使工业垮掉，失业增加，他们冒充失业无产阶级的捍卫者和代言人。"

斯列普科夫同志撒的谎未免太蹩脚了。他一面说我们"未提出任何具体的建议"，一面又说，我们在鼓吹他不喜欢的纲领。只能是其中之一：要么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要么是"纲领"。

我们可是提出了十分具体的东西：（1）靠限制我国发了大财的寄生资产阶级的收入来加快工业化的速度；（2）增加工业企业中失业工人的失业补助金数额，确定对因裁员而解雇的失业工人的补助金应高于平均水平；（3）取消人民委员会作出的可以种种借口撤销职业介绍所对失业者的补助金和登记的决定。这些措施为什么会导致失业人数增加呢？这只有斯列普科夫一人知道。老实说他也不知道。

至于我们的纲领无法实现，那么斯列普科夫在这个问题上只在一点上是对的：在中央实行的那条路线下，在中央害怕资产阶级、害怕国有经济中的积累、害怕"工业的垄断腐败"（国有工业的垄断是十月革命的一大成果）的情况下，这个纲领当然无法实现。可问题就在于抛弃偏离无产阶级阶级立场的路线。抛弃这条路线尤其必要，因为它已经开始直接打击到无产阶级了。

甚至斯列普科夫也深知，工人的状况日益恶化。然而正是在工人政策问题上，中央比任何时候都更软弱无力。

这是对中央政策的无情判决。

正因为如此，我们关于工人政策问题的提法使官方路线捍卫者大为恼火。似乎毫无争议的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绝不允许将改善工人状况问题推到次要地位，绝不允许对所谓工人阶级的"行会利益"采取轻视态度。然而这一无可争议的论点却引起了我

们另一个批评者 H. 曼德尔施塔姆同志的猛烈攻击。他的猛烈已到了可笑的程度，他写道：“被本国的资产阶级腐化的英国工人贵族，不想拿自己的‘文化环境’去冒险，这不也是行会利益吗，却既不能将它推到次要地位，也不能号召英国工人起来革命。”

从所有这番胡诌中只能明白一点：曼德尔施塔姆同志认为必须使我国工人保持半饥半饱的状况，才不会“使他们被文化环境所腐化”。这真是官僚主义者的范例，他们认为无需改善工人状况、无需工人的参与即可替他们建成社会主义。看来曼德尔施塔姆同志认为，通过在各支部“整治”反对派和工人大会上关于改善工人状况根本办不到的报告即可创造工人的热情并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斯大林同志宣称失业人数增至 33 万是有利于整个工人阶级的小小牺牲，便对这一问题的提法作了十分清楚的补充。

还要简单谈谈党的问题。斯列普科夫声称，“党已十分成熟，它能够充分理解存在的分歧，不跟着也不打算跟着反对派走。”显然，正是因为这种成熟，党才能够听取斯列普科夫等人的意见。显然，正是因为党“不打算跟着反对派走”，才不让党了解反对派都说些什么。正因为党员的“成熟”，他们只要读了反对派的文件就会受到监察委员会的追查。有人在明目张胆地对党滥施暴力的同时，竟敢使党相信党是赞成这种暴力的，党员也自愿放弃属于他们的、按布尔什维克的所有传统一直属于他们的那些权利。不是对党的粗暴的嘲讽又是什么?!

中央极力把自己说成领导党的列宁主义政策的传播者。这是谎言。列宁要求让全体党员都可凭手中的文件来检验意见分歧。现中央则将看反对派文件的垄断权交给了前立宪民主党人斯列普科夫、前孟什维克曼德尔施塔姆等人；列宁在出现分歧时总是诉诸党及党内工人。而现中央则最害怕基层党员介入争论。列宁在第 10 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中承认争论是党的工作的基本方法，在斯列普科夫

之流看来则是“争论集市”。列宁善于领导党，现领导人只善于取消党。

我们的文件所反对的是企图取消党的人；是领导无产阶级国家偏离无产阶级阶级路线的人；是在其领导下马尔丁诺夫之流的前孟什维克和拉费斯之流的前佩特留拉政府成员逐渐开始决定共产党的政策的人；是受到路标转换派分子乌斯特里亚洛夫公开欢迎的人。他们因文件而引起的恼怒，他们为文件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都丝毫不会使我们感到吃惊。

我们认为，我们的文件在党内群众和党内的无产阶级部分中会得到完全不同的反应，而且也正因为如此才有人极力向党隐瞒这份文件并对它加以诽谤。

我们相信，无论哪种办法都不会得逞，工人党员终将了解这个文件并能正确判断孟什维主义究竟是在何处：是在我们的文件中呢，还是在前立宪民主党人斯列普科夫和前孟什维克曼德尔施塔姆的诽谤性文稿中。

B. 叶梅利亚诺夫

T. 霍列奇科

1927年8月

№07524

托洛茨基就奥斯特罗乌莫娃的行为致明仁斯基

（1927 年 9 月 3 日）

副本

绝密

尊敬的同志！

我的同事布托夫同志的前妻奥斯特罗乌莫娃对布托夫同志施展种种诡计，意在敲诈和报复。根据我所看到的材料，奥斯特罗乌莫娃看来是一个道德败坏的人。假使奥斯特罗乌莫娃不是见人就说她干的是国家政治保卫局交给的工作，领的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钱等等，那就不会引起注意。也许编这套谎话不过是为了让人觉得她了不起。不过也许她确实是使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某位工作人员产生了错觉。请您过问一下这个问题并将结果告我。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9 月 3 日

№07525

季诺维也夫等四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和共产国际执委会[①]

（1927年9月6日）

尊敬的同志们

联席全会后大家所看到的事情明显地威胁到十五大的筹备工作。

毫无疑问，如筹备工作进展顺利，十五大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并确实会帮助我党摆脱目前的危机。它会促进党的团结，为党指明今后斗争的正确道路，包括使苏联对日益迫近的战争危险作准备的道路。它可以而且应该停止共产国际上层业已开始的分裂。

不过，只有像列宁时期历次代表大会在分歧甚至小得多的情况下所做的筹备工作那样，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才能做到这一切。

列宁时期党是怎样做的呢？

第一，历次代表大会均准时召开。列宁时期甚至推迟一个月都不行。列宁时期中央委员会从未自行将自己的权力再延长一年，即将代表大会规定的任期延长一倍。尽管在严重的内战的形势下召开代表大会比现在要困难得多。

第二，列宁时期，所有党员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真正能有机会在党的报刊上发表自己的建议、提纲、纲领和小册子，并可在任何党

① 集体执笔。大部分是我写的。——托洛茨基注

的会议上发表意见。

第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使所有党员真正能够参加争论，使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能够真正反映党的意愿。先召开实际上预先决定一切的区代表会议，到召开省代表会议时再开始所谓的“争论”，这种办法在列宁时期从未采用过。这样的程序在列宁时期被视为可鄙和耻辱的事情，会遭到大家的嘲笑和驳斥。

第四，列宁时期，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时期内不仅没有把与中央路线有分歧的同志从工作中心驱逐到边远的角落（列宁时期根本不搞流放）的情况，而是恰恰相反，绝对保证那些同中央委员会多数有分歧的同志和集团能够留在大中心，以便他们能够在代表大会前及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对中央委员会路线的批评意见。

现在根本不是这样。一切做法都截然相反。中央委员会违背党章自行将任期延长一倍。中央在十四大过后两年召开十五大，并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变本加厉地迫害思想不一致的人（其中包括流放，下面再详谈）。中央不仅不对筹备代表大会中的这种程序和顺序采取措施，以使全体党员都能真正就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意见，而是相反，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等地的地区代表会议应于10月下旬开幕，有些地方的代表大会却已经闭幕，中央委员会却答应于11月上旬开始正式争论。这就是说，正式争论开始时**各地区代表会议已经闭幕**，或者至少是代表大会的选举已经结束。一切果真如此，那就是对党员权利的嘲弄和侮辱。这将使广大党员认为中央委员会十分**害怕**争论，认为中央绝无通过较为正确和诚实的党内争论捍卫其政治路线的希望。难道这种日程安排可以看作正常的党内民主的正常方式、可以为摆脱目前危机找到出路吗？

我党过去有过重大的分歧，但从未像最近这样旷日持久，这样痛苦和尖锐。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十五大的筹备工作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争论”几乎在党代会召开前一

周才开始；分歧突然降临到党的身上。两个首都（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组织的省代表会议之间的“决斗”出乎全党的意料。整个党根本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分歧已深入到党的内部，对事业造成的危害无法估量。

如果通过日程的巧妙安排和秘密把戏使党毫无可能按照正常途径弄清现有的分歧、接触文件、听取争论各方意见以形成全体党员真正多数的意见，那么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危害就要大得多。中央委员会如在目前情况下采用这种日程把戏，就说明中央对多数党员真正支持它的路线这一点毫无把握，而主要是说明中央不惜一切，甚至不惜破坏党的统一，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就行，一切都在所不惜。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为争论留出的时间本来就吝啬。大家知道，党的十五大定于12月1日召开。而中央委员会准许的党内争论仅限于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一个月，即从11月1日正式开始。这又是对党的利益的明显和招眼的违反。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争论应至迟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开始。这个最低期限适用于最正常、最平稳、最健康的条件，至少是在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下。“不少于一个月”，这就是说，如果情况需要，争论的期限可以更长一些。难道目前党内危机的情况还不算亟待进行全面争论的情况吗？但就连一个月的期限实际上也是一个假象。事实上，由于11月要过节，争论的期限早就剩下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二、三周时间。然而在我国即使《真理报》刊载的重要文件光到达各地也需要整整两周的时间。可见，省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将在党员仅能读到如反对派纲领之类的重要文件之前选出。**如果党中央不立即取消各地区代表会议选举期限的决定，**使这些代表会议的代表选举工作在争论之后进行，**那么这实际上就彻底取消了党章所保障的在召开代表大会前进行的一切争论。**这就使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变成

了走过场，而在目前的情况下其实就变成了笑柄。

代表大会是我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是党内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每个党员说来代表大会的威信是毫无疑问的、不容置疑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但是除非党章可全面保证党员确能影响这些决议、保证由全党而不仅仅是党的机关来投票表决，否则这一切就做不到。

我们认为，政治局应该依据党章责成所有地方组织确立一种代表大会前的工作制度，使全体党员可在支部内及时地，也就是在了解全部重要文件并听取了争论双方意见之后和决定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的选举之前，切实讨论十五大的全部议事日程。中央委员会不仅应该禁止打算欺骗党员并剥夺党员合法权利的书记们搞的日程把戏，而且应该将其钉在耻辱柱上。

*　　*　　*

其次，我们认为必须使你们注意我们许多党组织内存在的一系列事实，这些事实清楚地说明了那种不能容忍的环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后即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党内生活正是在这种环境下进行的。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党内相当一部分颇有影响的官僚现在已经给自己定出了一个目标，即不让党员群众能够平心静气地弄清党内现有的分歧，他们给自己提出了一项任务，即公开对党内反对派的拥护者搞恐怖，不准他们利用在党组织面前捍卫自己观点的权利。

我们仅举几条绝对可信的不可否认的事实。

1．在一系列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罗斯托夫、巴库）中，联席全会之后故意以突然的方式把党的积极分子集合起来，经过几轮“筛选”，将选票只发给“绝对可靠的”人且只有记名选票，却不发给数百名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的老党员。

2．在各地区以及各城市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大概还有其他一些城市早就有一批有组织的，即经过培训并分别安置的、人数不多但不惜付出一切的团伙，它们用叫喊、威吓、吹口哨、骂人来打断反对派的发言。领导人无论在哪次会议上均未采取措施来制止这些团伙的行为或把他们赶出会场。像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这样有25年党龄的、被广大工人所熟知并深受所有同他一起做过地下工作和在红军和苏维埃机关中工作过的同志尊敬的党员，也不能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利用给他的十分钟时间来阐述中央全会的结果。他的绝对有礼貌的冷静发言被打断了，被有组织的一小撮人在会议主席、政治局候补委员乌格拉诺夫同志的纵容下所打断。

3．用流氓的方式打断党的会议的做法在列宁格勒特别盛行。在有省委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基洛夫同志出席的全市大会和维堡区选举大会上，反对派代表开始宣读决议书时“有人”关掉了电灯。彼得格勒区大会上流氓们扑向宣读决议的同志，撕掉决议并发出带有反犹性质的叫喊。有些会议上会议领导人不去捍卫全体党员通过提交决议草案向全党表明自己意见的权利，反而将是否宣读决议的问题提交表决，借以向事先经过挑选的与会者暗示投票反对宣读决议。

4．齐心协力采用这些旨在阻挠反对派通过党的途径向党表明自己观点的方法，以吓唬反对派成员。

某些著名的中央代表在党的会议上（如列宁格勒的中央委员安季波夫[①] 在“布尔什维克”工厂党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米尔佐扬[②]

① 安季波夫，H.T.（1894～1938）——1912年入党。1928年起任邮电人民委员。1924年起任中央委员。后遭镇压。

② 米尔佐扬，Л.Н.（1897～1939）——1917年入党。1925～1929年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书记。1927～1934年任联共中央候补委员。后遭镇压。

同志在巴库的发言等等）用最恶毒的谩骂来围攻工人反对派，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在许多地方已经从威胁转为行动。

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温什利赫特同志在革命军事委员会党支部会上威胁投票反对官方决议的同志，说要把他们当成反革命分子开除出党，开除出军队。

日前12位同志[①]被从列宁格勒“紧急”逐出，其中有9位系1910年至1917年入党的老党员。被逐出的同志是：博戈莫利内、列文、沃伊采霍维奇、季米特里耶夫、格尔茨贝格、冯贝尔施泰因、罗茨坎、科瓦连科、伊万诺夫、格里戈罗夫、皮丘林，皮丘林是一位领导有10万名社员的工人合作社、应得头奖的老同志。他由于在区积极分子会议上发表反对派意见，当即被撤职，流放到波尔托拉茨克。

被逐出巴库的人有：（1）马梅德林斯基（被“赶出”担任区委委员的区委，流放到遥远的农民县），（2）吉尔希克（流放到波斯），（3）米尔佐耶夫（流放到波斯边境），（4）什塔宾斯基（流放到波斯）。

被逐出乌拉尔的有以下老同志：（1）别利亚耶夫，（2）杰里亚宾，（3）涅多列佐夫。

我们把对从未搞过贸易、有20年党龄的著作家萨法罗夫同志派到君士坦丁堡商务代表处任职也算在被流放之列。

在84人声明上签名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编辑出版部编委科瓦连科同志被流放到中亚。撤销科瓦连科同志的职务时打的旗号名义是编辑出版部精简人员，实际上该部人员在撤销科瓦连科同志之后增加了，现由5名均曾被国家政治保卫局追究过责任的原社会革命党人和原孟什维克和1名共产党员组成。而这位老党员就得因莫

① 原文如此。

须有的“思想立场不坚定”滚到中亚去。

安德烈钦同志这位从事国际事务多年的革命家，也被赶到中亚去从事所谓的“经济”工作。

雷若夫、亚历山德罗夫这两位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同志仅仅因为给季诺维也夫同志写信抱怨一个叫波戈金的人在他们的党支部的不成体统的、不知羞耻的报告即受到迫害：雷若夫被开除出党，亚历山德罗夫受到警告处分。季诺维也夫同志在联席全会上宣读了这封信并请求中央监察委员会进行调查。这个调查没有进行，但这两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信任的工人却受到严重的迫害。

莫斯科的马尔丁诺夫同志，这位内战的参加者（获得红旗奖章）因在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党支部会议上援引84人声明而在区委机区监委PK和PKK联席会议上被开除出党。

马柳塔同志因在布琼尼同志放肆地讲话时插话而受到警告处分并被撤销职务。

许多同志因在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同志认为是党内合法的文件的84人声明上签名而受到严重警告和开除党籍的威胁（见8月12日乌拉尔监察委员会的判决书）。因在84人声明上签名而受到严重警告和开除威胁的有杜卡特、谢科尔金、库尔巴托夫、涅多列佐夫等同志。斯维尔德洛夫区监察委员会打算将什么样的同志开除出党，从8月21日《乌拉尔工人报》刊登的杜卡特同志的判决书中的下述鉴定可以看出，其中写道：杜卡特，尤里·伊万诺维奇，1904年起为联共（布）党员，38岁，农民出身，文化程度中等，职业革命家，1906～1909年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1913～1916年关进要塞；在红军中服役5年，从一名红军士兵升任军区司令员；现失业。

列列维奇和罗滕贝格同志在萨拉托夫受到严重警告，并剥夺担任党的职务的权利2年，只不过是因为在党的会议上捍卫自己的观

点。在监察委员会的判决中没有陈述任何理由。也是在萨拉托夫，瓦雷基斯同志（中央候补委员）在教育工作者会议和其他有非党人员参加的苏维埃基层组织的会议上作了关于联席全会情况的报告，《萨拉托夫消息报》还登了这条消息。但我们之中的一个人仅仅因为批评了一下马尔丁诺夫同志就受到谴责，理由是有非党人士参加会议。而中央候补委员瓦雷基斯同志开完全会，迳自去出席有非党人员参加的会议，还在报上公开说这些非党人员赞成哪些哪些决议案。

这里还有另一个例子。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委会机关报（《浪潮报》，1927 年 8 月 30 日）载：“会议决定全体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近期开始仔细研究联席全会的决议，然后在地区非党工人中间作报告和进行谈话。”还有：“第 15 森林工业工场和第 2 森林工业公司联共（布）党支部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联席会议（有非党人员参加）听取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的总结报告之后，认为全会的所有决议是惟一正确和绝对正确的。”（《浪潮报》，1927 年 9 月 3 日第 200 号）

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同志解释说，不得在有非党人员参加的会议上“狠狠批评”反对派。但有人下达了另外的命令。

奥廖尔的瓦尔金同志因不顾民警局长的不满试图捍卫反对派的观点受到警告，被撤销了职务。

还有以开除出厂来处罚工人反对派的报道。在罗斯托夫，1916 年入党的党员坎托尔同志被米高扬鞋业工厂开除并被“提升到”苏维埃任职。这位党员在致边疆州监察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要求“恢复其鞋业工厂蒙面工的工作”。

在巴库被解除工作的有：（1）希巴诺夫——眼下失业，（2）洛加乔夫——已失业两个月，（3）丹尼利安茨——除名，去向不明，（4）弗拉索夫——除名，（5）奥加涅索夫·阿尔森——除名，（6）

弗拉索夫·伊·——因积极参加修改要求全党根据原始材料了解反对派观点的决议案而除名。

这一切都是近几天的事情！这一切都是我们听说的事实。还有许多事实没有听说！原流放到土耳其斯坦、中心地带省会等地的反对派，现在为“防万一”又重新被发配，公然对他们说：“你们在这儿待不了几天了”，“代表大会开会前到其他地方去吧”。这样的事情有数十起。每一位书记都是按照这个模式来“筹备”党的十五大的。至于各县和各大工人居住点的做法我们暂且不知。不过那里的做法也一样，也许只会比这还粗暴。

5. 与这种恫吓的方法同时使用的还有在报刊上对反对派进行最肆无忌惮的、最恶毒的宣传。像过去一样每个冒牌作家和向上爬的人早已知道，只要是针对反对派的，任何庸俗的话语、任何谎言、任何诽谤都可以在报刊上刊登。只有不怕受到反驳才可以这样做，就是说实际上早已决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不得公开发表或者以口头的形式进行争论。

只需说说H. 库兹明在《共青团真理报》发表的那篇相当知名的文章即可，文中这位取代驱赶到日本的普特纳同志的我国年青军人的“导师”将托洛茨基同志提到克列孟梭一事说成是要求战争爆发时枪毙前线的农民。这是什么，这不正是旨在将农民与工人党内的反对派对立起来的热月宣传甚至是黑帮宣传吗？虽然中央监察委员会注意到了这篇文章，这种卑鄙行径却并未遭到党的领导人的任何反击。

这里不去谈斯克沃尔佐夫[①] 发表在《消息报》上的卑鄙的社

①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伊·伊·（1870～1928）——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任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起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工作。1925年起任中央委员、《消息报》主编、《真理报》副主编。1926年起任列宁研究院院长。

论及杰米扬·别德内依[①] 就“党的”问题在该报上发表的诗歌，别德内的依德肆无忌惮，同他思想和创作上的极度地空虚同时增长。杰米扬·别德内依那富农的诲淫的腔调使那些非反对派的、最心平气和的党员日益感到憎恶和鄙视。同时任何人都不会怀疑，别德内依腐朽的文字得到了上面的“鼓励”。大家都知道，书记处，实际上就是斯大林同志通过出版局操纵出版业。

6．雅罗斯拉夫斯基8月26日的文章公开指示地方组织不要将反对派候选人选进党内。这样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已把反对派候选人开除出党。就是对党章的公开嘲弄。这么重要的问题是由谁决定的呢？难道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一个人就可决定这个问题？独断专横还有限度吗？难道有人以为工人党员会对践踏党章的行为听之任之吗？

7．发表的大门对反对派越关越紧。不仅关于有争议的问题的文章如此，凡是反对派介入的东西，即使谈的是没有争议的问题，莫不如此。根据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倡议安排的托洛茨基同志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在《真理报》发表时附了一篇诽谤性的荒唐的编后记，编后记使每一位稍微认真一点的多数派拥护者感到愤怒。因这个“试验”的失败便决定不登季诺维也夫与该代表团的谈话，不刊登这次谈话的决定和不刊登托姆斯基和加里宁谈话的决定都让人一眼就可识破。《真理报》编辑部对拉狄克同志关于萨柯和范齐蒂判处死刑的文章的处理更加坦率（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编辑部不仅拒绝刊登这篇文章（并未说明原因），而且拒绝就文章的命运给作者回信，以免留下任何关于对党的反对派作家恣意妄为的痕迹。拉狄克文章惟一的缺点是文章的水平大大超出《真理报》文章的水平。季诺维也夫的《列宁在1917年7月的日子里》一文也没有刊

① 别德内依，杰·（1883～1945）——苏联作家，诗人。共产党员。

登，《真理报》编辑部甚至拒绝作任何答复。《真理报》仍把这个课目交给那个……斯列普科夫，看来其理由是，斯列普科夫在1918年还是立宪民主党人，原来他倒是最有资格来写列宁在1917年7月的作用！这难道不是一种标志吗？

既然现在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同志仅仅因为他们是反对派，便不能在《真理报》就没有争议的问题发表意见，那么谁还会相信反对派可在代表大会前就所争论的问题发表意见呢？

上述列举的所有事实中我们认为最严重的是：开除和驱逐持反对派观点的工人和党员；由上面组织的团伙破坏党的会议及在报刊上进行攻击性的宣传。我们来看看破坏党的会议的情况。

我党过去在资产阶级政党召集的会议上采用过这些方法，在同孟什维克彻底分裂后同他们一起开的会议上也采用过这些方法。在我党内应最坚决地禁止这类方法。因为他们使我们无法通过党的途径解决党的问题。多数派代表所采用的反对少数派的这些方法表明，掌握了出版垄断权的党的多数派担心，少数派代表只要发表几篇公开的讲话，即足以使人对多数派实行的政策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这些方法有可能彻底葬送有党章和政治局在最近一次全会上的许诺作保障的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党的会议上以暴力破坏对党的事务进行讨论的所有团伙正在准备破坏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党内争论。如果中央现在还不采取措施反对这类方法的话，不是他们葬送这次争论，就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会议上出现最尖锐的冲突。

我们再来注意一下下面的问题。联席全会将13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反对派）声明的第二部分转交给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研究。这第二部分包含有一些使党内生活走上健康化道路的具体建议。但是这件事情至今停滞不前。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故意对联席全会的这一决定不予考虑。我们能允许这么干吗？

与此同时，由中央委员和省委书记等召集的党团积极分子也在紧锣密鼓地行动。书记们利用党的官方机构和手段拼凑成了一个志同道合者，实际上是斯大林党团的秘密会议，讨论了同反对派斗争的最佳方法，包括撤职、驱逐、“提升”等问题。这种行动方式自然促使反对派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开始召集单独的会议，因为只有可怜的冒牌党内庸人才会放弃积极参加筹备代表大会的工作。但是没有一个反对派会放弃。

党内没有人相信也不会有人相信，一切不允许的反党的犯罪方法的采用是出于偶然。果真如此，这些行动就不会这样有组织，就不会扩大，首先是不会不受惩罚。事情正是在于体制。一般认为，这种筹备代表大会的体制，即破坏代表大会的正常的筹备工作的体制有自己的中心，那就是中央书记处，即“管理”党的真正中心。实质上，书记处凌驾于中央之上，试图事先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代表大会，即强加给党。这便是为“筹备”代表大会已全速运转的违背党章的反党机制的意义所在。

*　　*　　*

为了十五大的筹备工作正常进行，为了党的统一，我们坚决要求中央立即采取下述措施：

（1）立即研究（在我们的参加下）尚未向全党公布的13人声明的第二部分，首先是恢复已开除的反对派的党籍。

（2）在报上颁布一份通报，呼吁党的会议的主持人保证全体党员有自由发表自己意见和在党的会议上提交决议案的权利。党的监察机关对妨碍他人利用这些基本权利的党员进行惩罚。应对允许对破坏少数人权利的会议主持人给予党内处分。

（3）绝对禁止在报刊和会议上对反对派未发表的文章、讲话、决议案和纲领进行辩论，将其看做对党章的最严重的违反。只能对

那些可进行一般检查的文件进行辩论。“谁相信口头说的话，他就是不可救药的白痴。”谁要强迫人们这样做，他就是对党犯罪。

（4）以中央的名义号召全体党员了解有分歧意见的文件并自由发表意见；以中央的名义保证持不同意见者不会受到迫害。

（5）必须及时地也就是在现在就着手印刷代表大会召开前的材料并将其分发到各地，这些材料包括：反对派的纲领，反对派就中国问题和英俄委员会等问题发表的文件。

（6）党内争论应在中央的提纲、反对派的纲领和党员的某些组织、小组或个别党员在代表大会前提出的文件公布并分发到各地时开始。此后的一个月内（答应给一个月也行）党员应可自由讨论。应该相应重新确定各地区、县和一般的基层代表大会的日期。必须把争论开始的日期移至庆祝节日之前。

（7）因此我们建议加紧召开最近的中央全会（预定于9月15～20日召开）以通过相应的决定并禁止在此前进行预先确定出席代表大会的人员的“选举”。

需要使十五大真正履行所面临的任务。需要及时消除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和选举工作中的派别性质。那些采取上面提到的方法的人是在破坏十五大的威信。中央首先有义务捍卫十五大的威信并以铁的手腕禁止上面提到的与无产阶级不相称的所有丑行。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

格·季诺维也夫

安·彼得松

尼·穆拉洛夫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6日

№07527

托洛茨基就南方面军问题致谢列布里亚科夫

（1927 年 9 月 12 日）

尊敬的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

在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同志发表了许多荒谬的见解，其中讲道，在他和您一起在南方面军工作期间，我只去过南方面军一次，是偷偷去的，待了半个小时，是同妻子一起乘汽车去的。我当场高声打断了他的讲话说，他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他则回答说，可以为他说的每句话担保，并引用您的话作为佐证。他还补充说：那是冬季里的一个下雪天，托洛茨基夜里到达，马上又走了，因为不准他到南方面军来。我没有逐字逐句地引证，因为我手头没有速记记录，不过我把斯大林讲话的意思转述得相当准确。要确认这一点并不困难，只要斯大林事后不意识到是把梦境当成现实而去修改他所说的话。

1．我从未同妻子一起去过南方面军。

2．从未有人不准我前往南方面军。我甚至不明白怎么会产生这种不准的想法。也许斯大林在我背后提出过此类要求。我对此一无所知。在当时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中有一条性质完全相反的决定，该决定说政治局完全赞成我要求近期内将主要精力放在南方面军的意愿。

3．列车日志可证明，我在南方面军不是只待了半小时，而是待了数周和数月。有关情况列车报《在途中》也可证明。

4. 但是如果有谁相信斯大林所谓我因什么人的禁令偷偷去了南方面军、只待了半个小时、而且是在夜间去的荒谬说法，那就要问：我究竟是瞒着谁呢？莫斯科对我的行车路线知道得一清二楚，因为我随时得到报告，而且列车每到一处，我都及时向克里姆林宫作了通报。我去南方面军司令部时斯大林也在那里，那么我究竟是瞒着谁呢？实在无法理解。

只有居心险恶的人才会说出如此无法自圆其说的废话。

我把此事向您通报，以防万一。请告诉他们正是您记得我去南方面军的情况。在您与斯大林的谈话中是否暗示过我是秘密去的，偷偷去的？所谓在南方面军司令部停留半个小时是我惟一的一次南方面军之行的说法是否属实？

致共产主义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12日

№07528

托洛茨基就叶努基泽问题给埃利钦的便条

（1927 年 9 月 12 日）

致埃利钦同志

请将此件交费多罗夫等同志一阅，并请商议有关收集资料事宜。

列·托洛茨基

1917 年叶努基泽是否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

叶努基泽[①] 同志一口咬定他当时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果真如此吗？叶努基泽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时期曾是布尔什维克，对此没有人提出异议。战争期间他遵循什么路线（需要查清）。

这里所说的是从二月革命起叶努基泽同志遵循的路线，具体地说就是从我自加拿大被俘后回国的 5 月起至十月革命，尤其是 4～8 月，即至科尔尼洛夫叛乱前这段时间。

叶努基泽咬定他在这段时间也是布尔什维克。我曾提醒他说，

① 叶努基泽，阿·萨·（1877～1937）——1898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十月革命后先后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部主任、全俄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秘书。1934 年当选中央委员。1937 年被处死，后平反。

他当时并没有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而是采取了类似埃利亚瓦[①]或苏里茨[②]那样的动摇观望的态度，而且当时我两次对他说："到我们这边来"。叶努基泽对我的这番提醒曾数次反驳说："我从来没有同你讲过话。"还说："我根本不认识他，也从来没有同他讲过话。"

这番十分肯定的话已让人大惑不解。当时（4～8月），在苏维埃领导机关成员包括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及彼得格勒苏维埃工人和士兵的领导人中，布尔什维克屈指可数。我从美国回国后的头几个星期便同他们每个人都联系上了。我怎么会同叶努基泽一次话也没有讲过。而且不认识他呢？他是否出席了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议？出席了还是没有出席？

谁是布尔什维克，谁不是布尔什维克，7月份看得特别清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缺席的情况下）讨论了在全会上采取什么方针的问题。当时叶努基泽是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吗？他是否出席了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

布尔什维克遭到猛烈抨击的时候，叶努基泽起来维护过他们吗？克伦斯基从前线召回的那个团进驻塔夫利达宫的时候，我们被当成叛徒、霍亨索伦的奸细、革命的失败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备受迫害的时候，叶努基泽在哪里呢？他当时在哪里？他出席过人数不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维护过布尔什维克吗？列宁被当成霍亨索伦的奸细受到迫害的时候，他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表示过同意列宁的观点吗？

---

① 埃利亚瓦，沙·祖·（1883～1937）——1904年入党。1923年起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1927年起任外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主席。后遭镇压。

② 苏里茨，雅·扎·（1882～1952）——1903～1914年为孟什维克，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从事外交工作。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隐藏起来、加米涅夫被捕的时候，叶努基泽采取过什么措施来驳斥对他们的无耻诽谤？他是否就此问题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过意见？或是在官方的《消息报》上发表过文章？让他去查找并指出他的讲话速记记录或者文章或者声明。

叶努基泽到过布尔什维克司令部和《真理报》编辑部吗？在关键时期（5～8月）为《真理报》和我们的其他报刊撰过稿吗？

在会议和群众大会上他发表过布尔什维主义的演说吗？

叶努基泽是从哪个组织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谁提的名？向谁报告过工作？这个问题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记要来检查。

科尔尼洛夫反革命叛乱后，叶努基泽转向了左派。但他在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期间的表现如何呢？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未参加过一次布尔什维克为准备夺取政权召开的多次会议。我不能断言叶努基泽在此期间没有同布尔什维克在一起。即使在一起，多半也是采取袖手旁观和观望的态度。总之必须查清，胜利前或胜利后叶努基泽是否参加了党（或回到了党内）？

此外我保留提供许多证人的权利，他们可以证明在最关键时期（5～8月）没有人在布尔什维克中间见到过叶努基泽同志。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12日

№07529

托洛茨基就提纲草稿致季诺维也夫

（1927年9月17日）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

今寄上关于中国革命新阶段问题的提纲草稿。我觉得事情非常紧迫。可别让人家说我们是事后诸葛亮。如果这些提纲是集体签名后寄出，引述《信息报》（Вести）的那一条应作改动。

您可从中看出重点是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代替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口号的问题。

眼下我在纳尔奇克，25日要去基斯洛沃茨克。25日前可向纳尔奇克来信或来电报。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17日

№07530

托洛茨基就洛佐夫斯基的文章致季诺维也夫

（1927 年 9 月 22 日）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

现寄上针对洛佐夫斯基文章的批评提纲。这篇文章进一步向我们表明，我们是多么需要就中国革命最新阶段的性质问题发出适时的、坚决的声明。我认为，不论我上次寄上草稿的总提纲如何，我写的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篇文章）可以寄给《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发表或者寄给中央政治局。要紧的是需按时寄出。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9 月 22 日于纳尔奇克

№07531

他们如何同反对派作斗争[①]

（1927年9月）

（1）斯大林党的体制最显著的特征是在争取自身生存的斗争中毫无原则性。任何一个深深扎根于本阶级之中的政党都会把自己的策略手段、蛊惑人心的做法和无原则性限制在不损害本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斯大林体制（其最主要的支柱是不自量力地胆大妄为的工人官僚以及苏维埃和党内官僚的上层社会结构）能擅自搞毫无限制的无原则性，正是由于它脱离了广大工人群众和农村中最贫穷的阶层。两年中它竟然由布哈林提出的“发财吧”的口号跳到在宣言中号召同富农作斗争，从加强工人的劳动强度到答应实行7小时工作制，等等。在党内政策方面斯大林一伙在夺权的斗争方式上更加不择手段。请看他们的斗争方式：

（2）众所周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开始，国际主义就是世界工作日的重要成果，在解决工人运动的一切问题时，国际主义不能容忍民族局限性和外省小资产阶级的愚蠢。同时它要求对世界形势进行广泛的、不断更新的研究，对当代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研究时不仅要凭书本，而且要靠联共（布）领导成员亲自了解活生生的当代资本主义。反对派的领导同志了解资本主义并且经常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一切过程。在所谓“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独出心裁的擅自发挥的作者看来，

① 不知此文系何人之作，非我所写。——托洛茨基注

反对派领导干部的这一重要的优点竟成了缺点。因此诸如莫洛托夫（于去年）反对反对派中的流亡者的讲话之类的极其反动的讲话纷纷出笼。众所周知，列宁便是沙皇时代最著名的流亡者。他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的西欧派，这指的是列宁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痛恨残留在我们生活中的一切亚细亚和拜占庭式的旧习俗，野蛮人的无知，官僚和共产党官僚的妄自尊大、阴谋倾轧、蛮横无礼、庸俗等等，即莫洛托夫—斯大林式的“领导者”所具有的这些特性。

（3）斯大林和瓦雷基斯[①] 关于一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的出现正好赶上苏联反犹太人运动甚嚣尘上，这绝非偶然。一些著名的党内人士也加入了反犹运动。对于党内的中世纪意识和民族沙文主义的这些极其可耻的残余，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进行过严肃的斗争。更有甚者在苏联报刊上出现了针对某些反对派领袖的反犹运动的歪诗和漫画，博得由党的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赞许的讥笑。去年刊登在《工人报》上的题为“完全落空”的漫画是针对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因为反对派领袖中有犹太人，于是毫无原则的斯大林一伙在党内斗争中便愿意从反犹运动的浑水中捞点东西。因此斯大林一伙对日复一日的反犹运动一直持友好中立的态度。

（4）斯大林一伙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起先试图实行这样的计划：不触动反对派领袖，把他们留在党内，却更猛烈地抨击反对派的基层群众和中层干部。该计划在于“让领袖成为光杆司令”。这项计划落空了，因为尽管数以十计和数以百计的普通反对派分子被开除，还采取了调动，断其生计等办法，又有数以千计的工人党员加入反对派。种种迹象表明，现在正在开始实施一项相反的计划：

① 瓦雷基斯，约·米·（1894～1939）——1918～1937年任党的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委书记。1930年起为中央委员。

让反对派的队伍群龙无首。在监察委员会里同工人出身的反对派分子讲话的态度变得“和蔼”一些了。说什么：“我们不想触动你们，是你们的领袖把你们拉下水的。他们倒没事儿，可你们倒霉了。现在我们就要着手收拾他们。”这一个又一个的圈套均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普通反对派分子决不会让离间他们与领袖之间的关系的图谋得逞，反对派领袖们不过是更早、更清楚地把广大工人党员中因目睹斯大林政策破产而酝酿成熟的东西精当地表达出来罢了。全部工人党员转向反对派一边已在所难免。官员们还会同斯大林站在一起。工人阶级则站到反对派一边。

1927年9月

№07532

托洛茨基：“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与党内制度

（1927 年 9 月 24 日）

围绕所谓“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开展的运动是在强大的压力下进行的。然而这场运动最终并未证实它打算证实的东西。该是对运动进行初步总结的时候了。

我们先来看看联共（布）中央鼓动宣传部和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总结报告材料（1927 年 7 月 29 日～8 月 9 日）》中对“关于克列孟梭问题”是如何下定义的。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的确落了个坏名声。（它搞的提纲在全体会议和报刊上被多数派代表称之为不成功的、蹩脚的甚至是愚蠢的提纲。）不过这时中央鼓动宣传部帮了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一把。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份最具权威性的宣传鼓动文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哪些有关克列孟梭问题的内容呢？

“反对派在其对党和共产国际的攻击中提出如下论点：

（1）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人目前正处于热月蜕化时期；

（2）按照克列孟梭 1914 年在法国**搞政变的范例**对这些领导人来个大换班已在所难免。”（黑体是我们用的）

“按照克列孟梭 1914 年在法国搞政变的范例”等字样是本引文的中心。不过在这一论点中惟有克列孟梭当时曾在法国活动这一点属实。克列孟梭什么政变也没有搞。即使这里的“政变”系指克列

孟梭一伙上台执政，也不是1914年的事情，而是1917年的事情。然而1917年并没有发生任何政变。资产阶级议会把政权拱手交给克列孟梭一伙，认为他们能更好地解决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军事难题。议会是资产阶级借口按正常程序处理国事的机构。那么为什么串通一气的中央委员会鼓动宣传部和莫斯科鼓动宣传部要说克列孟梭搞政变呢？因为如果不说政变，就不能把在这方面仿效发克列孟梭的意图强加在反对派的头上。这里目的非常明确。为什么又要把克列孟梭政变移到1914年呢？我们说，既然是历史上根本不存在的事情，把它移到哪一年不都一样吗？只有阴险的反对派才会在这种枝节问题上吹毛求疵。

徒弟不可能比师傅高明。布哈林同志是我党最官方的理论家。布哈林在给列宁格勒党的积极分子作报告时说：反对派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即使在敌人离两个革命中心80公里的地方“也要用自己的方式在我国搞克列孟梭式政变。”在同一报告的另一处提出了“克列孟梭的小政变（переворотик）”，而且加上了引号，好像是引文，该不是摘自中央鼓动宣传部的材料吧？只是给“政变”一词加了指小表爱的后缀。这完全是布哈林的风格：既然夹杂着谎言，那就婉转点说，结果像在搞缓冲，这也是布哈林在党内争论中的“特殊路线”的实质所在。换成李可夫就会说成“政变”（переворотище），给加上表示蔑视的后缀，以表现其坚定的态度。布哈林说的是“小政变”。客观的鼓动宣传部只用“政变”二字。实际上什么样的政变都不曾有过。却有一篇针对反对派的小抄，为的是改变事情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对雅罗斯拉夫斯基能有什么要求呢？他作为发言者和著作家的主要特点就是不会不加歪曲地表达任何稍微复杂的思想，即使这种歪曲对他毫无利害关系也是如此。他的这种本事（或无能）因为不受惩罚而有了惊人的进步。雅罗斯拉夫斯基从

“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中得出了令人愤慨的结论：“反对派不反对援用从异己阶级那里吸取策略的范例。”这一责难当即具有了一种伟大的历史性总结的形式。跟着雅罗斯拉夫斯基走这条道路只会瞎耽误功夫。被封为预言家的塞·绍尔决想不到“异己阶级的”范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形成中起了什么作用。革命者甚至曾不止一次地用反动派的例子来教育群众，向他们解释说，反动分子有别于自由派分子和妥协分子，“他们不是夸夸其谈的人，而是实干家”。另一方面，众所周知，法国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一事为制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起了重大的“范例”作用。离开异己阶级的策略范例，简直寸步难行。只是必须正确利用这些范例。这里首先是不得伪造历史。

小有名气的尼·库兹明[①]也把那个“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当成取之不尽的知识的源泉加以利用，他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挥了下述思想：据说克列孟梭追求权势是为了用无情地镇压工农的方法迫使法国军队将战争进行到底；反对派不信任农民，他们想取得政权，以便“按照克列孟梭的范例”镇压农民。当然从库兹明那里什么都得不到，因为他可能这样说，也可能那样说。但这并非偶然，库兹明也并不是因为聪明过头（而且恰恰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发挥了这番让人在一公里外即可嗅到热月党人思想臭味的下流话。

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也决不拒绝利用“克列孟梭的范例”，只是得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克列孟梭进行的是帝

① 顺便说说，库兹明之所以小有名气，是因为他善于见风使舵地写文章。对于我的《革命是如何武装起来的》几部书，库兹明曾热情洋溢地大唱赞歌（如1924年5月14日《消息报》第115号）。现在他的态度则截然相反。不管库兹明如何“辩证地”（说重一点是变色龙似地）变化，我对他的作品及本人的态度（我认为这绝不仅是我个人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托洛茨基注

国主义战争，而且是真刀真枪地干。帝国主义战争是与无产阶级和农民基层群众的利益根本抵触的。要顺利地进行这样的战争，尤其是到了第四个年头，惟一的办法是无情地镇压先进的工人和革命的农民。我们的战争将是社会主义战争。只有依靠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理想主义，只有钳制住国内的资产阶级和富农及热月分子，才能进行。克列孟梭依靠的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与富农青年的沙文主义的理想主义，他欺骗、毒害工农，压制任何对战争持批评态度的企图。我们将依靠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英雄主义与果敢精神，让他们将领中农前进。我们只有原原本本地向劳动群众讲清实情，告诉他们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真正的敌人，才能保持和加强他们的革命理想主义。这就是库兹明式的热月党人谎言对国防事业危害甚大的原因，因为它在分清敌我的问题上对工农起了误导的作用。

我们暂且不谈瓦雷斯基、萨拉托夫斯基及其他人的文章。我们来看看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省委机关报《工人边疆区报》，该报是为我国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业区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服务的。8月12日《工人边疆区报》在读到那个极其有害的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时是这样说的：

“托洛茨基同志在其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中表达了类似克列孟梭的思想的想法，克列孟梭在1871年德军进攻巴黎时，声称，为了同外敌（同德军）斗争首先应该除掉内部的敌人。”

您原先不知道这个情况吗？现在就知道了！这段精彩的言词是对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的最精确的、可以说是最“富有原则性的”、至少也是最恰当的解释。糟糕的只是《工人边疆区报》提供的历史资料纯属子虚乌有。真的这么糟糕吗？既然中央鼓动宣传部都把1917年同1914年搞混了，为什么《工人边疆区报》就不能把1917年同1871年搞混呢？不错，在所谓的托洛茨基关于克列孟梭的提

纲中明明说的是 1914～1918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讲的是潘勒韦、白里安等人的内阁；不错，1914 年、1917 年、1871 年均未发生克列孟梭的政变；不错，无论在上述的哪一年克列孟梭从未说过要先消灭内部敌人后保卫巴黎；不错，这种虚构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不过既然要按照发言稿的需要来裁剪历史，那就只好坚决选择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方案，该方案在对反对派进行诽谤时更好使。

先按发言稿的调子对克列孟梭进行一番加工，再拿这样的克列孟梭去套反对派，诸如此类的范例不胜枚举，而且居然全都在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讲话及文章的范围内。至于这些新发现到了县里、乡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工厂或者萨拉托夫的农民那里会是什么样子，就不难明白了。简直难以想像还有比这更系统化的对人们意识的毒害！这一切都不会白白地过去，这一切都在积累着，在准备产生“效益”，这种“效益”既适合于发言提纲、专事中伤的学徒、帮手和行家，又适合于全党。

雅罗斯拉夫斯基继斯大林等人之后在我们引用的《党和反对派》一文中谈到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那本不成功的小册子《论战争和战争危险》。有些人把这本不成功的小册子称之为荒谬可笑的。书中充斥着具有黑帮色彩的无知见解。无产阶级的首都——莫斯科的鼓动宣传部怎么会出版这样的小册子？况且不是一般的小册子，而是政治学习指南，讲的是关于战争和战争危险这样的重要问题。是啊，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倒霉的是甚至不能自欺欺人地借口说这是一种“偶然性”。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的关于英俄委员会问题的发言提纲可说是更加丢丑。发言提纲断言，英俄委员会将成为反战中心，成为国际上动员革命力量的主要工具，等等，等等。当 1926 年 7 月反对派指出这一使党蒙受耻辱的文件时，莫斯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没有受到指责，反对派却受到指责。这个莫斯

科委员会鼓动宣传部在出版论战争和战争危险的小册子的同时，又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指导性小册子，其质量和水平完全一样。最后，在进行了这些试验而且均被揭穿之后，中央鼓动宣传部和莫斯科委员会又出版一本小册子，它向全世界宣布，反对派打算效仿“1914年克列孟梭在法国发动政变的范例”。

这怎么可能呢？答案是不容争辩的：原因就在于党内总的制度和与其相关的人员遴选制度。人们所写的东西并不是他们所了解的，并不是他们琢磨出来的，也不是他们想说的，而是当前形势下要求他们写的。每个执笔者事先都知道，只要他把他们无知或市侩的愚钝拿去对付反对派，就可以不负任何责任。每个执笔者都知道，他没有必要煞费苦心地去查问或者对问题进行研究，因为反对派反正也无法推翻谎言，再说谁想推翻或是想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那他马上就会被打成反对派。扼杀党内批评的制度、封闭的机关连环保制度以及发言稿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大行其道，这些都必定使党的官方理论水平逐步降低。

同时，围绕所谓的“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而展开的整个运动**并非因为**敌人距莫斯科只有80公里，并非因为反对派准备仿效并没有搞过政变的克列孟梭搞政变，而是**为了**进一步压制党内的思想，这样一来当权机关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就更加不受任何约束了。

我援引克列孟梭的例子，援引敌视我们的阶级的政治经验中的一个例子，为的是说明一个极其简单的想法：以自己处于领导地位的先锋为代表的执政阶级，应当保持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改组自己的队伍而不致出现内部动荡和灾难性的力量分裂的能力。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搞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得有两党存在，统一的政党也不得分派。但无产阶级专政需要一种统一和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这种制度使无产阶级政党即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也可以运用革命政党特有的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来监督自己

的所有机关，即安排它们的政策，在实行中考查它们，任免干部。

专政是极其锐利的工具。要正确地掌握它，以免弄钝或打碎。那种关于反对派倾向于民主制的责难是荒唐的。若说这种责难是认真的，那是由于不明白：从理论上讲，在不利的情况和实行错误政策的情况下，对专政制度造成威胁的不仅仅有向民主制演化，而且还有蜕化为波拿巴主义制度。从历史上讲，这第二种情况要比第一种情况更现实。破坏民主和集中的统一，把民主集中制变为官僚主义集中制，就是出现波拿巴主义危险的党内条件。

我们在指名道姓地说到这种危险时，就已预感到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会招致疯狂的责难和迫害。“孟什维克可是说过专政蜕化为波拿巴主义呀！”不错，是说过。孟什维克的发出点是，如果专政不及时地由民主制来取代，专政就必然蜕化为波拿巴主义。我们认为，民主制和波拿巴主义不过是回到资本主义的不同的道路而已。在我们这个具有革命和内战传统的农民国家中，波拿巴主义是一条比民主制更现实的回到资产阶级社会的道路。仅仅因为孟什维克利用这种危险投机便否定历史性危险的存在，岂不是自欺欺人！

乌斯特里亚洛夫梦想按波拿巴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方式（分期）走上资产阶级轨道。孟什维克与一度曾是新资产阶级妥协主义代表者的乌斯特里亚洛夫相反，他们害怕波拿巴主义制度，认为民主制比它好，民主制使小资产阶级能够保留某种表面上的政治作用。当初列宁在回答乌斯特里亚洛夫提出的“策略还是革命？”的问题时表示：策略可能转变成演变。党内制度也是如此。斯大林认为，压制一切批评，用万能的小抄取代集体思想生活以及不停地镇压仅仅是为维持党的平衡所必须的暂时性的恶事。事实上，这些措施日益破坏着民主与集中之间必要的相互关系，加大了专政向波拿巴主义蜕化这一十分现实的历史性危险。

当然，这些过程的根源不在于孤立开来的党内关系，而在于各

阶级间的相互关系、各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政党与各阶级间的关系以及党的政策的总路线。只有诚实的官僚主义蠢材或对明天毫不关心的无耻的冒险主义者才会否认列宁逝世至今这段时间党内制度日益恶化的事实。以上我们看到了这种恶化在党的思想生活领域造成的明显后果：国内的头号组织，莫斯科党组织竟然出版纯属粗制滥造的有关英俄委员会、中国革命、战争危险及党内关系这些极其重要的党的政策问题的指导性小册子。而且这件实际上令人震惊的事情不仅没有受到追究，反倒因对那些指出莫斯科委员会领导人的完全错误的路线的人加紧迫害而掩盖起来了。

斯大林、莫洛托夫、乌格拉诺夫、卡冈诺维奇等党的领导的官僚主义蜕变的最显赫的代表人物自然不去追求官僚主义，恰恰相反，他们想以党内民主的方法贯彻自己的政策，即希望党赞同他们的政策，重新选上愿意贯彻这一政策的人。但是，他们遇到了党的某种无声的抵抗，他们日益被迫自上而下地强制推行自己的政策。在他们看来党代表大会不过是无法躲避的灾难。他们不惜完全违背党章，将这一灾难推迟一年。他们口口声声说争论是绝对的坏事，是对实际工作的干扰，同时却专干以无休止的争论来动摇党的事情，我们上面提到的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一事即是例证。他们一面搞单方面的争论，一面又没完没了地搞严重打击实际工作的组织结论。开除出党成了家常便饭。罪名是什么呢？罪名是散发“秘密”文件。其实真正的罪过是本应成为全党财富的讲话和文章竟被宣布为秘密文件（而且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月！）。他们无法兑现最近几届代表大会宣布的党内民主，只好采取日益有效的党内强制的手段。

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早已被打上面临战争危险的标记。争论被绝对禁止，理由是我们处在敌人的包围之中。为了搞乱全党，制造了反对派以“按照克列孟梭的范例”搞政变相威胁的恶

劣神话。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为了彻底消灭仅存的一点党内民主，最终用当权机关的无上权力取而代之。而在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动、党的领导人的政策也相应地发生变动的情况下，这便是波拿巴主义危险的先决条件。

战争的威胁并非偶然的、短时期的现象。世界性矛盾日益加剧。我们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可能出现的关系缓和是短暂的。基本的发展路线是对抗加剧和战争危险不断加深。按照现行制度的逻辑，这就意味着要彻底打消关于党内民主的想法。借口“克列孟梭式政变”开展的运动如同其他一系列类似的运动以及当前这场从上而下地动摇党的无休止的争论一样，就是要彻底打消使党的生活可能回到民主轨道的想法。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可争辩的是：党内制度是所有危险中最为严峻的危险。就这番话也在报刊和各种会议上开展了一场不受约束的、缺乏思想性的运动。然而这番话是无可争辩的。如果我受到敌人的威胁，但我的眼睛被蒙住了，我的手被捆住了，我也要说，主要的危险不是敌人，而是我的动作受拘束。所谓存在战争危险甚至发生战争的谎言使讨论和解决所有问题、指导和检查自己的所有机关的党自下而上地失去主动性。如果敌人离莫斯科只有 80 公里，那么党需要具有比其他情况下高出 10 倍的主动性。可我们的任务就是避免和防止出现这种情况。只有具备主动精神和充满活力的党才能实现这一任务。就是说，首要的任务是改变党的制度。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9 月 24 日

№07533

托洛茨基就法国债务问题致拉柯夫斯基的信

（1927年9月30日）

亲爱的朋友：

现有一事要马上向你通报。把我和武伊奥维奇开除出执行委员会的第三天，在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辩论中暴露出关于我国国际政策、法国债务等问题。斯大林说了内容大致如下的一番话："可别让反对派说我们同法国签订协议代价太大或可能代价太大。反对派拉柯夫斯基驻在巴黎。不错，在所有反对派中数他执行政治局指示最老实。但是由于他很主动，他总是提出多给、多付等等，所以政治局总是要制止他。一贯如此，而且有文件为证。比如说最近一次在3000万法郎的问题上便是如此。拉柯夫斯基干脆提出把这3000万法郎交给法国政府，以便分别付给有价证券持有者。可我们同意的只是在解决贷款问题的条件下提供这笔资金……"

我当场进行内容大致如下的反驳："拉柯夫斯基仅仅是执行政治局的指示。你们当初要是采纳了拉柯夫斯基的建议，那么我们同法国签订协议的代价就小多了。李可夫在即席插话中也承认了的。"斯大林当时作了内容大致如下的回答："今天李可夫不在场，我们不知道他当时说了些什么。但是，拉柯夫斯基老是提出多给，这是事实。"

至于斯大林在叙述（也就是歪曲）政治局同全权代表的通信时

出言不逊，这是可想而知的。参加联席会议的有六七十人。今天肯定全莫斯科都知道、明天全欧洲都知道拉柯夫斯基喜欢比政治局作出更大的让步。这就是公开向法国资产阶级示意继续施加压力。事情当然不会就此结束。法国债务的问题像石头一样压在党的头上。工人中也议论纷纷。可以肯定，斯大林分子明天将把政治局同拉柯夫斯基的通信摘要送给所有的支部，他们自然是要尽撒谎和歪曲之能事，把事情说成是政治局使苏联免受拉柯夫斯基之害，拉柯夫斯基一心要使苏联沦为法国的奴隶。一切资料表明，这个问题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争论中将起很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大家认为，拉柯夫斯基应对斯大林总是胆怯地拿他当挡箭牌这点立即作出反应。怎么办呢？例如可给政治局写信，简短但措词坚决地说明事情的原委，并对斯大林的诽谤表示坚决抗议。当然，以上引述的并不是斯大林的原话，因为我手头没有速记记录。但是斯大林讲话的意思表达得完全准确。会上我打算当场对斯大林进行内容大体如下的反驳。

（1）拉柯夫斯基只能在政治局创造的环境下执行政策。

（2）拉柯夫斯基指出的达成协议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

（3）在国际形势恶化的情况下，政治局要求拉柯夫斯基不惜一切代价同法国签订协议；拉柯夫斯基正是遵循了这一指示。

（4）如果说拉柯夫斯基在某个场合比政治局走得稍远一点，那么第一，这是总指示的结果，第二，我们都知道，无论向政治局提出什么建议斯大林都要加以修改，哪怕只减少5个美元，这样他日后就可以自吹自擂，说他维护了苏联的利益。同竭力把政治责任转嫁给别人一样，让别人受过，好处全归自己，是斯大林各方面政策的基本内容。

遗憾的是，这些话我一句也没有说出口，因为我没有得到再次发言的机会。

说到这里不能不指出，近年来大多数身处国内和国外的“负责人”在所有较为尖锐的问题上首先关心的是自己可别表现出任何主动性，因为尽人皆知，斯大林为了把自己说成救世主，一有需要便会贬低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指责此人给得太多，或者说给得不够，所以错过了时机，如此等等。斯大林对苏维埃各方面工作、包括外交工作的积极性的压制，使苏联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方面同其他方面一样，斯大林日益无耻地用保全自己的斗争来代替维护国家利益的斗争。

总之，应该考虑到，拉柯夫斯基在苏法谈判中的方针问题在近几周党的生活中将起很大的作用。拉柯夫斯基应立即给政治局寄上简短但措词坚决的声明，并把抄件寄给我们。另外，拉柯夫斯基还可寄来更加详细的材料。这一切均需从速办理。

列·托洛茨基

1927年9月30日

№07534

反犹主义

（1927 年 9 月）

赤塔专区索洪多乡联共（布）候补小组会议记录第 16 号

出席会议的有联共（布）党员伊万·鲁萨克和叶连娜·鲁萨克两位同志，联共（布）候补党员马尔科夫同志，另有 7 名苏联共青团团员、16 名非党人员列席。1927 年 9 月。

听取：3. 关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问题。鲁萨克同志指出：“托洛茨基早就开始实行分裂政策。托洛茨基不可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民族出身就说明他需要搞投机。我记得季诺维也夫在全会上曾一度制止过，不过看来季诺维也夫同托洛茨基交上了朋友。他们误解了俄罗斯精神，俄罗斯的工人和农民决不会跟着这些耐帕奇① 走的。”

决定：将破坏统一和钢铁般的列宁主义的分子从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中驱逐出去，开除出联共（布）。列宁主义的统一万岁！打倒分裂分子！

亲笔签名：主席 E. 鲁萨克

秘书 马尔科夫

[1927 年 9 月]

① 耐帕奇（нэпач）与耐普曼同义，后来渐渐不用了。

附录：

摘自1919年文件

1919年4月1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摘抄

秘密

出席：列宁、克列斯廷斯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同志

听取：3. 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拉脱维亚人和犹太人在靠近前线的肃反委员会、靠近前线和后方的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占了很大比例，而在前线所占比例较小，因此有人在红军战士中进行强大的沙文主义宣传并且得到某种响应。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就在前线与后方之间更加均衡地分配各个民族的工作人员而言，必须重新配置党的力量。

决定：由托洛茨基同志和斯米尔加同志起草一份有关的报告，并将这一报告作为中央的指示下发给负责在中央和地方各单位与前线之间分配工作人员的各委员会。

№07536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

（1927 年 10 月 1 日）

一、关于反对派的印刷厂以及同军事阴谋的“关系”

9 月 12 日夜间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对许多党员进行了搜查。

9 月 15 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听取了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的“关于部分联共（布）党员和非党分子一起参与秘密的**反革命组织**活动的报告”，并决定：“认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动是正确的”。

9 月 22 日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向各级党组织下发了关于发现印刷厂的通知，通知中说：

“部分被捕的非党分子确与某些军界人士有联系，这些人士企图在苏联搞一次类似皮尔苏茨基政变的军事政变。”

通知中多次重复的这一论点，其根据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9 月 13 日的通报。我们认为有必要在此援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通报的主要内容。

“1927 年 9 月 12 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获悉，原工厂主的儿子、非党分子、姓谢尔巴科夫的公民向原弗兰格尔手下的一名军官提出搞一台改良胶质版胶印器；几乎同时又得到情报说，一个姓特维尔斯科伊的人也找过那个军官，此人是个职员，非党分子，同谢尔巴

科夫关系密切，他向军官通报近期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的消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根据上述情报于12日当天夜间对谢尔巴科夫住宅进行了搜查，结果在该处发现了地下印刷厂及党禁止印刷的反对派的反党文件。国家政治保卫局认为有责任扣留这些出版物并在弄清谢尔巴科夫同特维尔斯科伊的关系后逮捕所有与此案有牵连的非党分子。鉴于此案（组织军事政变）的特殊性和必须紧急进行调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得不立即对一些党员进行搜查，结果查明他们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的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当然一个党员也没有逮捕。

因为与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一案有牵连的党员甚多（格林施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奥霍特尼科夫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认为有责任把此案的详细情报以及全部材料转交中央监察委员会。

鉴于被捕的非党分子的供词证实有一个以策划上述军事阴谋为目的的集团，此案的侦查工作仍在继续。”

根据这个通报可以得结论：确曾参加反对派印刷厂工作的谢尔巴科夫为改良胶质版胶印器一事找过原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与反对派印刷厂没有任何关系的特维尔斯科伊也找过这位军官“通报了近期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的消息”。

这样一来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个案件：反对派的印刷厂案件和军事阴谋案件。这两个案件是通过什么或者什么人联系起来的呢？就是通过原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这个人物，谢尔巴科夫为改良胶质版胶印器一事找过他，特维尔斯科伊也向他通报了即将发生的军事政变。

9月23日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致信各党组织，提出如下问题：

“这个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是谁？他姓什么？为什么不提姓名？

他是否被捕？

为什么正好同一个时间既有人找他搞胶印器，又有人向他通报‘近期’在苏联搞军事政变的消息？这种通报是出于什么目的？

‘近期’谁要搞军事政变？是哪个团体？哪个组织？哪些人？”

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通过9月27日致各组织的新通知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明仁斯基同志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回答了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信中的问题。明仁斯基在信中说：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并未逮捕本局在1927年9月27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通报中提到的那个‘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因为这位公民（只有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直接要求下我才能说出他的姓名）已经不止一次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揭露白卫分子的阴谋。例如曾根据他的指引查清萨文柯夫反革命组织的武器库。他曾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揭露同最近一次军事阴谋有牵连的人。

我们所进行的与本案有关的搜查和逮捕，目的就在于揭露这一军事阴谋。

地下印刷厂是逮捕同搞军事阴谋活动有关的非党分子时附带的意外收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过去和现在均未对有党员牵连其中的反对派地下印刷厂一案进行侦查，已将此案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

可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月14日通报判明与反对派印刷厂搞军事政变的阴谋分子之间存在着由原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来体现的联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9月27日的通报承认，这位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并不是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而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于是，根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新的解释，反对派印刷厂和军事阴谋之间的所谓联系是由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来体现的。这是惟一的联系。无论是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通报还是在其

他文件中只字未提其他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显然不能视为反革命分子。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说法，谢尔巴科夫向这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探“提出搞一台改良胶质版胶印器”。显然这句话应该理解为谢尔巴科夫试图通过一位公民搞到胶印器，而这位公民又决不可视为反革命军事阴谋活动的参与者，因为他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如果不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位特工变成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中就是这样做的），那么印刷厂与军事阴谋之间就搭不上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一位姓特维尔斯科伊的公民也找过这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侦探，向他通报准备“近期在苏联搞军事政变”的消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只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侦探介绍为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同反对派印刷厂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位姓特维尔斯科伊的公民向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通报了关于军事政变的消息，显然是为了把这位军官拉入政变活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二个通报对事情的说法则截然相反。

特维尔斯科伊向这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侦探“通报关于组织军事政治变的消息”，显然是为了及时揭露这次政变。那么反对派印刷厂与军事组织之间联系又何在呢？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这位侦探想必是把特维尔斯科伊提供给他的关于军事阴谋的情报向主管机关作了汇报。这位侦探想必也把同谢尔巴科夫就胶印机一事的洽谈情况向主管机关作了汇报，至于洽谈是谁主动提出的并不重要。可见，反对派印刷厂和军事阴谋之间惟一的“联系”便是对白卫分子和反对派进行监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即使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位侦探碰上胶印机纯属偶然，那他也仍然是反对派印刷厂和我们不知道的军事阴谋活动之间的惟一“联系”。

不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只是附带地提到特维尔

斯科伊同谢尔巴科夫关系密切，并未说明是亲属关系、住户关系、政治关系还是组织关系。不错，第一份通报也提到了“查明”一些党员“同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的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

但是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文件和第二份文件，均不得而知。在关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地下组织”的印刷厂一案的材料中也只字未提。与此同时，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这份通报中我们知道谢尔巴科夫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侦探谈过胶印机一事。特维尔斯科伊则向该侦探通报了关于酝酿中的军事政变的消息。为什么称“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呢？是反对派的印刷厂吗？但是特维尔斯科伊同这个印刷厂毫无关系。是军事阴谋吗？但关于谢尔巴科夫参与军事阴谋活动一事只字未提。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组织”是干什么的？从通报中我们只知道他们二人找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同一个特工，不过事由全然不同：一个是为胶印器问题，一个是通报关于阴谋的消息。

现手头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关于秘密组织的说法可以间接地依据一个事实，即他们两个人尽管事由不同，找的是同一个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或者说，同一个白卫分子。不过这种观点自然是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二份通报彻底推翻了。该通报证明，这里所说的不是弗拉格尔手下的军官，而是为了苏维埃国家的利益执行秘密任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因而并不存在任何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地下组织。正是为了维持这种组织的假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份通报才不得不把自己的侦探冒充为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事实胜于雄辩。

9月27～28日，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审理了参与反对派印刷厂的共产党员的案件。中央监察委员会则在9月29日进行了审理。其中没有人坚决支持关于这些党员“同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

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的指控。被告和参加中央监察委员会审理此案的中央委员叶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与托洛茨基一再坚持必须说清楚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以及一些共产党员同这个组织的联系怎么回事，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却愤怒指责提问者，说他们竭力把案件审理引入歧途，说被告把问题搞乱，以便逃避回答关于印刷厂的问题，如此等等。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所谓的印刷厂一案的决定指控一些党员“同非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建立拥有自己地下印刷厂的秘密反党组织”。至于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称反对派为“秘密的反党组织”，那么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了。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反对派印刷厂问题14名党员负有责任，其中12人被开除出党。但是这些党员同军事阴谋活动的联系哪里去了呢？“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反革命组织”又哪里去了呢？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个通报是这样说的：

“因为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一案有牵连的党员甚多（格林什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奥霍特尼科夫等），国家政治保卫局认为有责任把此案的详细情报以及全部材料转交中央监察委员会。”

这样做当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秘密情报”和“全部材料”哪里去了呢？当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奥霍特尼科夫等受到指控的同志要求宣读“秘密组织”（上述党员据说均属该组织）的创建者之一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断然拒绝，理由是，特维尔斯科伊及其供词与所审理的反对派印刷厂案件毫无关系。这样一来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就已宣布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谓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奥霍特尼科夫等人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有牵连的第一份通报是错

误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并无关于此案或详细或简短的任何情报，并无任何材料，为什么呢？显然是因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未将这类材料转给中央监察委员会，他们自己就没有。若是有这类材料，那么就不必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充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了，也不必以此装假为基础去编造似乎一些党员均已牵连进去的“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了。

但是并没有妨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完成他的第二个通报，该通报用下面一段话彻底推翻了关于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的神话：

“如果说反对派的非党知识分子同盟者与图谋发动军事叛乱的军人之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那也并不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过错。”

这是什么意思？“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是怎么回事？这就是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迫于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那封信的压力被迫透露那个弗兰格尔白卫军官并未被捕，因为此人并非白卫分子而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不过局长企图维持以这个莫须有的白卫分子为依据的对共产党员的指控的假象。

当时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9 月 22～27 日的两个通报已下发到各级党组织，直至最基层的党支部。而且，在以所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对党进行欺骗一事揭露后才起草的第二个通报是用下面一段话作为结尾的：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表示，他们要用铁的手腕粉碎使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一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追随他们的力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军事叛乱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的任何企图。”

这些话是不容置疑的：反对派受到的指控是他们不但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还使其追随者军事阴谋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这就是说，反对派企图使军事阴谋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9 月 27

日在揭露反对派印刷厂时是这样写的。而9月29日，签发上面那段话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又对受到指控的共产党员说，特维尔斯科伊及其供词与整个政变一案一样，同反对派印刷厂一案毫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下发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各州委、省委、区委以及联共（布）各级监察委员会的通知上的签字又意味着什么呢？

综上所述，便引出了以下问题：

（1）9月15日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向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说，“一些联共（布）党员参与秘密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当时他是否知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这个反对派印刷厂同军事阴谋之间的惟一“联系”，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

（2）如果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不知道此事，那就是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他起了误导作用。那么应当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中查清罪人，以便严惩。

（3）如果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知道此事，那他为什么不向书记处通报？书记处在决定中承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动是正确的”，是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对书记处起了误导作用呢，还是如上所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雅罗斯拉夫斯基起了误导作用？

（4）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是何时知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的实情的：是发出第一个通知时，还是在收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的公开质问作出的第二个通报时？

这几个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就莫须有的反对派同军事阴谋的联系问题发出的通知已欺骗了党。时至今日党尚未摆脱这一骗局。恰恰相反，这场骗局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扩散开来，并具有日益粗暴的性质。是谁在这场骗局中扮

演了自觉而积极的角色呢？谁受派别的迷惑而卷入这场骗局？谁因疏忽大意和不经心而纵容了这场骗局？最后，谁是这场骗局的真正组织者和策动者？这些问题必须彻底弄清楚。如果不搞清楚的话，就连真心实意地筹备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也是不可能的。

二、关于军事阴谋问题

于是在党内以至党外流传着一个两个版本（第一版和第二版）的卑鄙神话，似乎反对派“企图使力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军事叛乱分子参与联共党内事务”。

这些叛乱分子何许人也？军事阴谋是怎么回事？我们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听说这个军事阴谋同反对派印刷厂毫无关系。我们还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那里听说有关军事阴谋的案件仍在审理之中。只有寄希望于军事阴谋受到揭露、对罪犯绳之以法了。

但我们即使在现阶段也不可对军事阴谋问题熟视无睹，不仅因为曾有人企图通过一个莫须有的、仅靠一名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实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来维系的“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使一些共产党员卷入此案。这个方面我们在上面已尽量简要地进行了研究，把许多细节都抛在一边，其实每个细节都值得独立研究。而“案件”还有其另一方面，这个方面同样颇有教益，而且使人对未来有所认识。

我们已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获悉，除了谢尔巴科夫外，一个姓特维尔斯科伊的人也是反革命秘密组织的参加者，就是那个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通报“近期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的消息的人。这个通报的严肃性无须评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月13日的通报还说：

“被捕非党分子的供词证实有一个以策划上述军事阴谋为目的

的集团。”

于是，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得到了证实。供词内容是什么呢？供词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转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材料中。诚然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拒绝公开这些供词，因为供词与案件毫无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从该主席团获悉，特维尔斯科伊供出的那些阴谋分子被反对派拉来参与解决党内问题。我们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知，格林施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奥霍特尼科夫等人与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组织有牵连。这一切足以证明我们对特维尔斯科伊供词感兴趣是正当的。现在我们援引他供词中的主要部分，只是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代替本人的名字，仅限于使用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通报中已经说出的名字。请看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

“女公民H极其秘密地告诉我她同公民M的谈话内容。公民M对她讲，军界有一个以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显然是军人）为首的运动，这个组织很活跃。没有说这个组织准备搞政变，不过这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女公民H的谈话我断言所指的是反对派，但当我向她提出这个问题时，她说并非完全如此，尽管为首的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由此我又断定该组织有个独特的人物。没有说公民M是该组织的成员，但从整个谈话看来这也很清楚。”

这就是特维尔斯科伊关于“近期将在苏联要搞军事政变”问题的供词。这里我们不再援引公民H和公民M的供词了，因为除了公民M推说关于军事阴谋的情报是一个离莫斯科很远的人告诉他的而外，这些供词并无任何新的东西。特维尔斯科伊，公民H和公民M对军事阴谋均无直接的了解。特维尔斯科伊是从公民H那里知道的，公民H是听公民M说的，而公民M则是听前面提到的不在场的证人说的。特维尔斯科伊对这个阴谋作了最具体的描述，

因为他至少说出领导这一阴谋活动的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叶夫多基莫夫、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托洛茨基就这个问题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明仁斯基进行了谈话，明仁斯基十分肯定地说，目前尚无任何有关军事阴谋案件的其他材料。按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意见，正是这些供词，也只是这些供词证实，不但有一个把组织前面提到的“军事阴谋”作为自己目的的集团，而且有“许多党员”（格林施泰因、格尔多夫斯基、姆拉奇科夫斯基、奥霍特尼科夫等人）加入这个集团。

谢尔巴科夫和特维尔斯科伊均于9月12日夜间被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9月13日当天即已致函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及有人策划“近期在苏联搞军事政变”、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和“在搜查时查明同谢尔巴科夫—特维尔斯科伊秘密组织有直接联系”的共产党员。然而从现有的材料可以看出，作为与“近期在苏联组织军事政变”有牵连的惟一的一个党员是托洛茨基同志。

我们向明仁斯基同志提出既然他认为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那为什么不让托洛茨基同志知道这些供词呢，明仁斯基回答说，他“不记得”这些供词中是否提到了托洛茨基的名字。这里要提醒一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第一个通报是在9月27日发出的，而谈话是9月28日进行的。谈话时在场的亚戈达同志解释说，只要侦查人员指出党员与案件有关，那么有关材料都要转给中央监察委员会。这次也一样。的确，我们已经了解到，特维尔斯科伊、公民H和公民M关于军事阴谋案件的供词在中央监察委员会，是归入反对派印刷厂一案的材料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样什么都没有通告托洛茨基同志。叶夫多基莫夫同志偶然看到了这些材料，随后请托洛茨基和其他反对派中央委员注意这些材料。

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我们暂时不作政治评论。

三、必要的结论

我们建议立即召开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联席会议，以便拟订新的第三个告全党书，驳斥前两个通报中的错误论点。换句话说，我们建议通告全党，要非常明确、准确、坚决地向全党说明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作出的那个拒绝公开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的决定，即反对派印刷厂案和所谓的军事阴谋案两者毫不相干。

我们建议向全党通报：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前两个通告对党起了误导作用。

我们建议通过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特别委员会，并在这两个机关的反对派成员的参与下彻底调查此案，以便查明罪犯并尽快绳之以法。

只因我们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满足我们正当的、最起码的要求抱有希望，我们才不在这里对上述事实和情况作出相应的政治评价。

我们坚决请求通过电话于今日内商定召开这样的会议的问题。

伊·斯米尔加

伊·巴卡耶夫

格·叶夫多基莫夫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1日

№07537

托洛茨基等告全体党员书

（1927 年 10 月 4 日）

仅供联共（布）党员阅读

致中央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从上面散布下来的关于反对派分子同弗兰格尔手下军官和白卫分子的阴谋活动有联系的传闻正在党内流传。

党代表大会两年没有举行了。约 200 名老布尔什维克，其中包括 13 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为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制定了行动纲领。在该纲领中对中央委员会制定的在工人、农民、工业、民族、国际政治、共产国际以及党内制度等问题上的政策提出了批评。但是在斯大林的提议下中央政治局禁止下发这个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行动纲领，虽然政治局的直接责任就是印刷行动纲领并通告全党。几乎全苏各省代表会议均已经定于 10 月底举行，以便选举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而所谓的“争论”却要从 11 月 1 日起即选举大会代表之后方可进行。这不是骗局吗？这不是假代表大会吗？这种行动方式是对党章的践踏，是对代表大会、对全党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打击。我们反对派，即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将全力以赴地散发我们的行动纲领，我们也是这样向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表示的。

14 名无可挑剔的党员承担了用打字机、胶印机等工具印刷行动纲领的工作。他们遭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搜查。其中 12 名被中

央监察委员会开除出党。各地都在开除党员。

但是这一次整套把戏的领导者觉得光是开除、流放和撤职还嫌不够。所谓“张伯伦的间谍”，“第二党”之类的诋毁均不奏效。他们惶恐不安地自言自语道：“党大概会提出一个问题，这个行动纲领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为什么久经沙场的优秀的老党员都愿意为它而献身？这真的是一个反党纲领吗？列宁说：‘在党内争论中不需要文件而轻信空话的人是不可救药的白痴。’我们不想当白痴。将行动纲领给我们吧！”党如果需要行动纲领，就能得到，而只要得到，党就会从行动纲领中看到，反对派在与斯大林领导集团的斗争中始终在维护真正的无产阶级利益和列宁的事业。列宁曾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党内存在严重的意见分歧，那就“只好根据纲领来选举”，“我们无法禁止这样做”。（见十大会议记录，第702页）①

用心极为险恶的机关权势分子决定：用下列办法压倒行动纲领，吓唬党，迫使党躲到一旁，不让党倾听任何理由、任何见解，并按照机关上层人物的指挥棒进行十五大的“选举”。

出于这种目的提出了所谓**对派“印刷厂”**同白卫分子军事阴谋**有联系**的无耻控告。每个党员有责任把这一问题弄清楚。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9月13日给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通报说，在反对派“印刷厂”工作的布尔什维克通过一名非党分子同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建立了联系，这名军官则同一个其任务是“近期”在苏联搞军事政变的军事阴谋有联系。中央书记处同意国家政治保卫局对据说参与“反革命组织”的党员进行搜查的行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9月22日向全党发出了特别通告，说什么印刷我们在代表大会前的行动纲领的反对派工作人员同反革命阴谋分子之

① 参见《列宁全集》第41卷，第101页。

间有联系。这份通告已经或正在直至最偏僻角落的所有党支部广为传阅。关于反对派同军事阴谋有“联系”的谣传正在非党分子中间日益扩散。这一前所未闻的指控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是反对派“印刷厂”的一名工人似乎同弗兰格尔手下的某军官谈论过胶印机。这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对事情的描述。

9月23日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和彼得松（反对派分子）致信中央和各级党组织，信中提出如下问题：

“这个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是谁？他姓什么？为什么不提姓名？他是否被捕？”

只是在这些问题的逼迫下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方以书面形式通报说，所谓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不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曾不止一次帮助揭露白卫分子阴谋活动的特工。于是关于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和“印刷厂”同军事阴谋有关系的整个通报统统是谎言和欺骗，对反对派的谎言和对党的欺骗。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通报的事实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同一个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工既在监视军事阴谋分子，又在监视为第十五次党代会准备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行动纲领的共产党员。有人用心险恶地对各党支部起了误导作用。他们在对此既不了解又没有料到的情况下根据欺骗和伪造作出了决议。军事阴谋案件同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反对派纲领的印刷工作之间毫无关系。这一点在审判所谓的反对派印刷厂参与者时已完全查清。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起诉人只字未提同军事阴谋的关系的问题。这是一则谎言，其依据是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向党冒充为阴谋分子。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通报可以得出结论，是那个实为国家政治保卫局特工的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把反对派印刷厂同某个军事阴谋联在了一起。季诺维也夫同志、斯米尔加同志和彼得松同志（反对派分子）在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问道：

“‘近期’谁要搞军事政变？是哪个团体？哪个组织？哪些人？”

就这些问题我们只得到了案件仍在调查之中的答复。

不过既然调查仍在进行，那么看来就应等到调查结束了。我们提出的关于组建一个有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反对派分子）参加的案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未被采纳。还没等进行任何调查，诽谤就抢先一步了。

谁通报的关于军事组织的消息呢？是一个姓特维尔斯科伊的非党分子，他同反对派和行动纲领的印刷工作均毫无关系。特维尔斯科伊向谁通报了军事阴谋的消息呢？向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至此似乎一切正常。这么说来，特维尔斯科伊得知反革命分子的军事阴谋后，做了每一名忠诚的苏联公民应做的事情，就是向国家政治保卫局报告。可国家政治保卫局又干了些什么呢？他们把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转给了中央监察委员会，作为布尔什维克－反对派分子同反革命阴谋分子有联系的证据。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则把特维尔斯科伊的供词归入与行动纲领印刷工作有关的案卷。

特维尔斯科伊关于“近期在苏联有人准备搞军事政变”的供词的实质是什么？

特维尔斯科伊援引一位女公民的话（该女公民又是援引另一位公民的话）说：

“军界有一个以托洛茨基同志和加米涅夫同志（显然是军人）为首的运动，这个组织很活跃。没有说这个组织准备稿政变，不过这是不言而喻的。”

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本身的通报可得出的结论是，特维尔斯科伊把听到的第三手或第四手关于有一个军界“运动”的消息主动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特工作了通报，这一“运动”的领导人原来是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哪些党员加入了反革命组织呢？是印刷行动纲领的党员吗？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自己坚决地否定了这

一指控。究竟指哪些党员呢？该不是托洛茨基吧？特维尔斯科伊点了托洛茨基，也只点了他的名。不过卑鄙勾当的主谋看来还没有拿定主意端出这第二道更辛辣的菜：关于托洛茨基所领导的军事阴谋！看来，他们认为还不是时候。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把自己的特工冒充为反革命分子，以便证明对共产党员的搜查是正确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处根据雅罗斯拉夫斯基莫须有的关于共产党员参与反革命组织的报告而赞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行为。政治局为此事发了一个通知。在这件事情上是谁在搞欺骗呢？谁受了骗？是谁出于什么目的作假？又是谁恶毒地指责党？

这一切的根子都在斯大林那里。若不是他同意、赞同、鼓励，绝没有人敢向党的队伍抛出关于反对派共产党员参与反革命组织的莫须有的指控。

斯大林在大范围里干的事情，地方上是在小范围里干。愚不可及的官僚或者专事钻营的坏蛋在党和非党会议上恶毒地提出问题：反对派从哪里搞到的活动经费？这些卑鄙的诽谤者看来是不明白，我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党员的自我牺牲和英雄主义精神，并不是靠从外面得到的经费。

斯大林格勒的前任省委书记普特宁指责工人反对派，说他们出卖国家机密，持枪胁迫党员对反对派的活动保持沉默。诸如此类的无耻谰言在许多会议上和报刊上已屡见不解，而且在党内外日益扩散。

我们扼制诽谤的浊流，争取真诚的有原则性的务实争论的一切努力至今毫无成效。我们提出的批驳关于反对派与军事阴谋有关的诽谤的要求遭到拒绝。关于“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的神话传遍全国，毒害着百万党员和数千万非党群众的思想。目的只有一个：掩盖斯大林在政治上的破产，诬蔑反对派，恐吓党，阻挠争论，故意

歪曲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目前的状况。

把党拖出斯大林的泥潭并领上康庄大道只能靠党自己。党应该判断，党应该决定。把全部文件都摆到党的桌面上来！在党内争论中不需要文件而轻信空话的人是不可救药的白痴。目前最主要的文件是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行动纲领。

用莫须有的弗兰格尔手下军官来掩饰政治破产的人可耻！

将反对派的行动纲领摆到党的桌面上来！

就有争议的问题进行的自由而真诚的党内讨论万岁！

打倒颠倒是非、伪造、诽谤、毒害、恐吓和开除等行为！

诚实地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万岁！

统一的和惟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联共（布）万岁！

签名：托洛茨基

季诺维也夫

叶夫多基莫夫

巴卡耶夫

彼得松

伊·斯米尔加

1927年10月4日

№07538

波兹南斯基致《真理报》编辑部

（1927 年 10 月 5 日）

受托洛茨基同志的委托，现寄上他的《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一文，供报上发表用。

附：上述文章①。

秘书　波兹南斯基②

1927 年 10 月 5 日

① 见本卷文件№07539。

② 文章的副本在季诺维也夫处。两份暂存“文章卷宗夹”内。——波兹南斯基注

№07539

托洛茨基：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①]

（1927年10月5日）

法国政府为什么现在坚持要我方召回拉柯夫斯基同志？因为围绕他展开了一场尖锐的辩论。因为什么法国的反动报刊展开了一场针对拉柯夫斯基的辩论呢？就因为拉柯夫斯基签署了一项政治声明，该声明宣布一旦战争爆发，帝国主义军队的每一个有觉悟的忠实的战士都有义务投奔苏联。实在难以想像出比这个更无谓的借口。至于比令人敬重的法国外交界在帝国主义反动势力驱使下的处境更为尴尬的情况，就更是无法想像了。

因拉柯夫斯基签署了上述声明而提出召回他的要求，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有意义，即如果拉柯夫斯基对战争的罪恶观点是他个人所专有，也就是说所有其他苏联外交官和所有处于领导地位的苏联政治活动家都与拉柯夫斯基不同，认为在反对苏联的战争中帝国主义军队内的工人和农民的责任是维护本国资本主义政府的利益。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关于换一个政治上更可靠的人来取代拉柯夫斯基同志的要求或许会有一点政治意义。可情况并不是这样。那个归之为拉柯夫斯基个人过错的简单想法是每个革命者、每个党员、每个布尔什维克所共有的想法。

我党纲领无情地谴责“用保卫祖国的虚伪口号来掩盖维护本国

① 季诺维也夫加的注［列·托洛茨基附记］：“我有一个疑问，如果文章刊登（当然很值得怀疑），那么工人们很可能会想我们同意每年付6000万法朗，需付62年。值得去冒这个险吗？”

民族资产阶级掠夺者的利益”的做法。用我党纲领的说法，目前的整个国际形势“必然使个别国家的国内战争同保卫无产阶级国家的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革命战争结合起来。”① 共产国际关于帝国主义特别是关于反苏战争的所有决议也毫无例外地贯穿着这些基本思想。可见，拉柯夫斯基同志那个令法国帝国主义报刊火冒三丈的罪恶观点仅仅是对共产党纲领实质的引申，更确切地说是简单的重申。此外，承认或不承认这一点是区别党员与非党分子的重要标志之一。可见，拉柯夫斯基同志那个使法国资产阶级大发雷霆的观点所表现的，并不是拉柯夫斯基而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特点。

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究竟意欲何为呢？埃伯特先生应对此作必要的解释。米勒兰、努兰斯先生们及其同伙意欲何为，这是众所周知的，因为这些先生并不隐瞒自己的愿望：他们想让萨宗诺夫或者起码让米留可夫到巴黎任大使。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更换莫斯科的政府。米勒兰、克列孟梭曾经作过这样的尝试。他们是否想重蹈覆辙呢？

政府中的左派激进派意欲何为呢？自不待言，我们对激进派不抱任何幻想。激进派本身也不是铁板一块。总的说来他们可分两类：一类专门骗人，另一类甘心受骗。他们稍加拖延也好，作出反抗的架势也好，归根结底总是去完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想干的事情，只要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特别想干的话。

激进派是否希望苏联政府派克伦斯基来当大使呢？这办不到。只有执政党党员也就是布尔什维克才能当上苏联政府的大使。而大使就其本身而言是受到自己政党的纲领约束的。

激进派先生是否以为我党会改变自己的纲领呢？可我们就是为

① 《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1分册，第530页。

了这个纲领才进行了那场废除沙皇时期的债务并没收工厂的十月革命的。于是，我们每次都回到了原来的起点。这与拉柯夫斯基毫不相干。是共产党纲领的过错，是十月革命的过错。

这就是帝国主义反动派之所以占尽优势的缘故。他们十分清楚，苏联大使在奉行独立的政策方面不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大使。每一位苏联大使现在坚持、将来还会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一旦帝国主义国家进犯苏联（由于债务或者其他原因），资产阶级政府将遭到本国先进工人的反抗，这种反抗情绪将愈来愈强烈，必将遍及社会各界，迟早要传到帝国主义的军队。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战争只能是一场极其严酷、极其顽强、极其漫长的战争，而这就是说，这场战争到一定阶段必须像纲领所说的那样转变为帝国主义国家的国内战争。每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和外国共产党员都会尽力促进这个转变。

当帝国主义各国相互交战时，难道他们不会在彼此的后方策动起义吗？如德国人在爱尔兰，法国人在加里西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等。难道军内开小差现象不会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相互”庇护吗？难道在和平时期法国没有尽全力在阿尔萨斯－洛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吗？在欧洲哪一个国家不在其邻邦境内不遗余力地搞“瓦解”工作呢？而商业和外交关系却照常进行。

当然，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期间搞阴谋主要是在民族因素上作文章。苏联政府则把希望寄托在其与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联系上。我们的打算对我们的潜在敌人来说要严峻得多，深刻得多，也可怕得多。难道这是拉柯夫斯基的某些言论所决定的吗？不，这是由十月革命建立起来的我国的阶级性质所决定的。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激进派或者如白里安之类接近激进派的人说道：“只好要求换掉拉柯夫斯基。”那么下一步呢？假定说新大使具有拉柯夫斯基身

上的一切优点；可他至少也具有他自己的一切布尔什维克的“缺点”。下一步又是什么呢？

帝国主义反动派要彻底一些。他们声言：我们要求撤掉拉柯夫斯基，这里要撤掉的不是拉柯夫斯基这个人，而是布尔什维克。激进派胆怯地反驳他们说：“这么说你们还会要求召回任何一位其他的苏联大使？”帝国主义者回答说：“那当然啦。”“可这就意味着同苏联断绝关系啊！”反动派回答说：“正是这样。”那么下一步呢？反动派的彻底性至此中断了。下一步怎么办？他们没有说。其中有些人想恫吓我们，迫使我们作出更多的让步；还有一些人想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法国拖入反苏战争。

战争是一项严肃的事情。法国有一句谚语：战争就按战争方式行事。如果我们受到侵犯，我们就打算这样行事。不过俄国也有一句谚语：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国与国之间的争吵就是战争。苏联与其他各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坏和平”即友谊是不可能有的。但是经验证明，重要的业务关系，确切地说是外交关系则完全可能。战争就按战争方式行事。我们已彻底理解了法国的这句中肯的谚语。只希望埃伯特先生把我们俄罗斯的谚语“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译成法文。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10 月 5 日

№07540

托洛茨基就发表《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问题致《真理报》编辑部

（1927年10月6日）

我于昨日将《坏和平总比好争吵要好》一文给编辑部寄去。文章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向法国资产阶级说明，在保卫苏联和维护其利益的问题上，它不可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共产党内的意见分歧上。但是如果《真理报》编辑打算像对待我同美国代表团的谈话那样来处理这篇文章，也就是说给加上有损文章政治目的的按语，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就毫无意义了。

正因为如此，我事先声明，如果编辑部想用自己的派别行为取代维护苏联利益的政治宣言，那我便事先拒绝发表这篇文章，并要求将手稿退回。

如果编辑部有某些切实可行的改动、修改或补充建议，我当然乐意在我的文章宗旨的范围之内予以考虑。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6日

№07541

托洛茨基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1927 年 10 月 6 日）

通报：斯大林、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和斯米尔加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 1927 年 10 月 3 日会议第 143 号会议记录摘抄：

“由于托洛茨基同志从 1927 年 7 月 6 日起至今未提供证据以证实其针对施基里亚托夫[①] 同志的声明，可认定托洛茨基没有证据，此案结束。”

我认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作出这种决定只能损害自己的名誉。我曾说过，施基里亚托夫同志，还有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和其他同志正在逐步地、不断地实施斯大林计划，即采取开除、干掉和分开的一贯办法分裂党，也就是由机关分期进行的隐蔽的分裂活动。我曾断言，凡是听了雅罗斯拉夫斯基、施基里亚托夫等人发言的人，都会认识到斯大林打算和准备通过几个月、通过半年、通过一年办成什么事。当初施基里亚托夫私下里对某些党员说的事情，现在已在进行。还需要什么证据呢？

半年前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施基里亚托夫等人曾单独对一些同志说必须除掉反对派的头目。指出这些同志的名字就等于无谓地把这些同志交出去，以充当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施基里亚托夫镇压的牺牲

① 施基里亚托夫，M.Φ.（1883～1954）——1906 年入党。1922～1934 年任中央监察委员。1927 年起任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

品。

谁要我说的证据，他只需看一下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会议记录，其中9月13日书记处的会议记录即对搜查“加入反革命组织”的共产党员一事表示赞许。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6日

№07542

托洛茨基：7小时工作制

（1927年10月10日）

1. 在离建党10周年尚有数周的时候，党得知政治局决定在已经准备好的周年纪念日文告中加上“将工业中的工作日缩短为7小时”这一项内容。

可曾有谁预料到这项改革呢？党对于这项改革是否深思熟虑过？两周前党是否听到了有关采取这项措施的暗示？

答案是否定的，这次政策的出台采取了惊喜、意外、使党措手不及的方式。

党于数周前突然得知政治局打算每年付给法国2200万金卢布，以偿还旧债。今天党同样突然获悉政治局打算在工业中实行7小时工作制。

突然和曲折的政策愈来愈显著，愈来愈难以容忍。

2. 政治局宣布的措施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呢？如果说这是为同严重的失业现象作斗争而暂时缩短工作日，如果这样来理解这种改革，那么这并非改善工人的状况，而是让整个工人阶级来均摊失业的沉重负担。资本主义国家曾不止一次地采取这种措施，它们曾实行不完全的工作周等等。只有当失业率的提高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必不可免的现象时才能提出必须对生产过程进行认真的、艰难的改组的问题。当然这种“改革”毫无任何庆祝的成分在内。政治局决议说的不是这个问题。决议指的不是暂时缩短工作日，而是在整个工业系统有计划地由8小时工作制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

3．真正实行7小时工作制即“不降低劳动报酬”（如政治局决议所说），就意味着提高计件工资定额和大幅度地提高工资（需耗资数以亿计）。直到昨天为止，反对派指出必须较为经常地提高工资的意见还被称作蛊惑宣传，并碰到同样的反对意见：“哪来的资金?”所有中央会议纪要，所有发言稿以及布哈林—斯列普科夫学派的所有文章，全都围着“是蛊惑宣传吗？——哪来的资金?”这个论据转。

原来，向“不降低劳动报酬”的7小时工作制过渡是有资金保证的。这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无情地谴责了在工人问题上对反对派的陷害。任何一名党员，任何一名工人都会说，如果反对派不在前一段时间同对工人阶级的需求和需要的漫不经心、敷衍塞责和“不善管理”的态度进行顽强不懈的斗争，就绝不可能出现如此意外的实行7小时工作制的承诺。

4．谁是蛊惑家呢？是那些主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经常不断地改善各部门工人的状况并认为在这方面的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生产上也能得到补偿的人呢，还是那些“平日”认为可以利用工人来实行节约制度、合理化、工业化，而临近节日、庆祝日却不经任何准备突然宣布实行7小时工作制的人？

5．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行动纲领要求：

“彻底消除任何延长8小时工作日的意图；除非不得已不得加班加点。不得滥招临时工，不得把固定工算作‘季节工’。不得违反业已公布的规定，延长有害车间的工作日。”

乍一听起来这与节日前夕由8小时工作制节日性地改行7小时工作制相比就是微不足道的了。但是任何一名党员都必然会发生疑问：“近年来劳动法典的执行情况包括延长工作日方面越来越糟，现在又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超越劳动法延长工作日、随意加班等等，一下子实行7小时工作制，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认真地

搞改革吗？能够相信这项改革吗？”

6．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对这个主要的问题答复如下：

“对工厂产业工人……必须保证近几年内在不减少工资的情况下由 8 小时工作制向 7 小时工作制过渡。”

为此必须做到：

“根据国内资源、工厂企业的重新装备和合理化进程以及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强度增长的情况，一年之内着手对某些工种工人逐步实施这个决议。”

决定中宣布的改革仅仅是节日前的含糊的承诺，更多的就没有什么了。社会主义的起码知识是：随着技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国家可以由 8 小时工作制过渡到 7 小时或 6 小时工作制，但不得过渡到 9 小时工作制。在周年纪念时承诺这种过渡（由 8 小时工作日改行 7 小时工作日）应当在“近几年内”实现。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在近 5 年内？还是在近 3 年内？或是近 10 年内？

国家计委的五年计划也好，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五年计划也好，所有其他工业远景计划也好，至今根本没有由 8 小时工作制向 7 小时工作制过渡的打算。5 年计划证明，迄今为止只字未提这个过渡。就是说，主管经济的领导机关至今从未认真想过究竟在多少年内可能由 8 小时工作制向 7 小时工作制过渡的问题。恰恰相反，主管经济的领导机关一直在想破坏劳动法典，而不是改善这部法典。

7．可见，所谓“把工作日缩短为 7 小时”，不过是言之无物的老生常谈，实际上纯属冒险主义的承诺，纪念日宣言中的这一承诺会使工人、工会工作人员、经济工作者、农民和所有消费者同样感到惊讶。在周年纪念日之际宣布的这场改革将使消费者为价格而忧心忡忡，尤其是迄今为止所有报刊都异口同声地叫喊工资在生产费用中所占比例过大。突如其来的改革会使工人产生日后必将落空的

过高的期望。节日礼物的政治结果将会与“改革”发起者的初衷适得其反。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十分重要的经济和文化问题，而是要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半月中“盖过”反对派。可见所宣布的改革只会使人对现领导们的整个路线作出很糟糕的评价。

8. 这是不是说，由8小时工作制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在近几年内就做不到呢？并非如此。总的方针是朝这个方向发展。但是，这应当是方针，而不是迂回和冒险的政策。关于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的可能性和实现这种过渡的期限问题，是关于我们整个经济政策的，首先是关于国内工业化速度的问题。问题不在于节日前的叫叫嚷嚷，而在于经济领导者整个方针的改变，首先和尤其是在工人物质状况问题上的方针的改变。为了使党和苏维埃国家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必须坚决采取反对派纲领中制定的那些措施，首先是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前切实恢复十月劳动法典，真正保证实行8小时工作制。

*　　*　　*

周年纪念日宣言拟订不仅给雇农，还给40%的最贫困的农民和农村贫农提供养老保险。目前想给约50%的农民提供保险显然是荒谬的。这类计划或者说承诺是站不住脚的，只要将其同几星期前对建筑工人实际上已取消保险、使之降低到诸如伐木工的地位这事实作个对比，就特别清楚了。这个决定体现了平日的政策。而为最贫困的农民提供保险是大吹大擂的节日承诺，这在政治上就叫做蛊惑宣传。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10～12日

№07543

季诺维也夫等就会议记录问题致联共（布）中央书记处[①]

（1927 年 10 月 12 日）

9 月 8 日召开了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联席会议，会上审查了我们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行动纲领问题。根据会议决定作了速记记录，以便通告全党。我们已对寄来的发言记录及时进行了修改。但是会议的速记记录至今没有公布。会议讨论的是将 13 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提出的行动纲领通报全党这一极为重要的问题，近 200 名老党员和老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该纲领的制定。

该会议记录（如同当年四月全会记录一样）迟迟不予公布，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会上进行的讨论从对政治局极为不利的角度阐明了反对派行动纲领的问题。换言之，应当起到党内民主代用品作用的中央速记报告实际上日益成了党内片面、虚假情报的工具。

格·季诺维也夫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10 月 12 日

① 此文件由签名者之一起草。——托洛茨基注

№07544

托洛茨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团会议上就纪念日宣言发表的讲话

（1927年10月15日）

同志们，刚才基洛夫同志作为一位好客的主人就7小时工作制的好处向我们上了简短的一课。他证明7小时工作制对工人说来有利得多，就文化方面来说比8小时工作制有益得多。（喧哗声）我们这里又不是政治常识学校（遗憾的是，基洛夫同志等人的政治常识学校常常变成政治文盲学校），我们这里是苏联的立法机关（喧哗声）。问题不是7小时工作制的一般性益处，而是要不要实行，什么时候实行和如何实行。（插话：我们这里是党团）不错，暂且是党团，可这是联盟最高机关解决问题的党的党团。我刚才已经听到了有人发表的廉价的指责，说季诺维也夫同志是7小时工作制的“反对者”。（插话：这是蛊惑宣传）我们还不能同你们稍微互换一下角度，因为看来你们很快会指责我们在工人方面的要求不够。所有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大家知道吗，就在那个一提起来就引起一阵笑声的行动纲领中……是的，同志们，先不要急着笑（笑声），先不要急着笑。这个纲领中说：“要彻底消除你们延长8小时工作日的意图；非万不得已不得加班加点。不得滥招临时工，不得把固定工算作‘季节工’。不得违反业已公布的规定，延长有害车间的工作日。”作为开端，我们出来落实这几条吧。问题是：近几年劳动法典和我们的实践有**无缩短或延长**工作日的变化。直到昨天为止，只有延长，只有恶化，直到那一刻，政治局突然决定责成布哈

林同志在已准备好、已经写好的宣言中加上把8小时工作制改为7小时工作制这小小的一段。这是什么意思呢？同志们，如果说问题的处理是基于我们十分重视的国际上的考虑，是基于7小时工作制在文化上对无产阶级的好处，那么可想而知这并不是宣言作者们动笔时的新见解。为什么这一条紧跟着就加进了宣言呢？为什么这么突然？为什么匆匆忙忙？既然我们想公布一项颇有实际意义的法令，那么起码要有所准备。根本没有准备。我想在座的每个人都很熟悉我们五年经济计划的主要特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家计划委员会下被委员会的五年计划。在国家主要经济领导机关制定的任何一个五年计划中，我没有找到，我想你们也不会找到，有关从8小时工作制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的蛛丝马迹。然而这个问题对于经济远景规划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很少有机会看到工会代表大会和各种会议的记录。我不知道，也许我说得不对，托姆斯基同志好像是缩短8小时工作日的倡议者之一，他也许会纠正我的错误，我不知道有哪一次工会代表大会或哪一次会议把这个问题作为实际建议提出来讨论过。同志们，情况究竟怎样呢？是立法措施，还是像基洛夫同志发言那样的一般性宣言？恕我直言，即使从简单的政治常识的角度看来，基洛夫同志对问题的提法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这样来提出减少失业的问题，那么这不是前进，不是日益增长的财富和经济实力强大导致的改革。不是的，这是力图让全体工人都来分担失业风险的措施。只能这样提出通过暂时缩短工作日来与失业现象作斗争的问题。只要是通过缩短工作日或工作周来与失业现象作斗争，这就是让整个工人阶级来分担失业的风险，就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这样一来工资也会相应地减少。但是宣言显然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宣言中说：“不减少劳动报酬。”那么这不是同失业作斗争的临时措施，而是一项主要的、根本的和原

则性的措施。但是这项措施只有纳入我们经济发展的远景规划或至少在五年远景规划中予以考虑才会具有实际意义。否则这只是一则普通的宣言，作为一项考虑不周的措施和随意作出的承诺，它会引起每一名认真的经济工作者、工会工作人员以及工人的不信任。为什么以这种突然的方式宣告这项改革呢？这太扎眼了：不是以经济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方式，而是以庆祝日政治献礼的方式宣告这一改革。通过意外的发现和突然的方式来修改宣言，宣布实行这一措施，这怎么行呢。

同志们，总之，目前实行的意外礼物的政策不会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政策。几星期前，我国工人阶级得到令人不快的意外礼物：他们得知我们准备每年付给法国6000万法郎一事，这一做法的正确与否且不去说它，事实是法国的小铺老板和守门人比我国工人阶级早几个月得知我们在这方面的意图与计划。我国报刊不准许转载拉柯夫斯基同志根据政治局的指示精神对法国报界记者的谈话。为什么？这算什么政策？我们的工人阶级得知政府打算每年向法国政府支付6000万法郎这一意外礼物，而二三周后的今天，他们又得知我们准备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的意外礼物，而近几年来我们违反劳动法典，工作日不但不缩减，反而延长了。这算什么程序？当初我们这些反对派分子在社会立法、改善工人阶级的物质状况等方面无论提出任何简单的措施，在场的许多人对我们说些什么呢？我们所碰到的惟一字眼就是**蛊惑宣传**。最好也不过是遇到这样的问题：**资金从哪里来？**

同志们，既然你们发现了办法，当初你们曾责怪我们不知道这个办法（也就是责问：资金从哪里来？），那么你们应该把这个办法写进宣言。你们应该公开地说：批评我们延长工作日的反对派是恶意煽动者，因为他们不知道资金从哪里来，我们的托姆斯基和古比雪夫同志（这个问题的主要承办人）揭开了这个秘密，便以十月革

命周年意外礼物的形式筹划了这件事。请开诚布公地讲清楚，为什么你们今天之前还在延长工作日，为什么今天突然认为必须宣布向7小时工作制过渡。当然在改善工人状况这件事上我们会全力帮助你们……（喧哗声，有人问：用谁的力量？）用**我们的**力量，但应实事求是地提出这个问题，把它作为认真的经济核算问题，而不是令人生疑的节日礼物问题，不是复活节的红鸡蛋，但今天正是这样宣布的。整个这项“政策”都是为应付目前危急时刻的政治措施，追求政治效果，仅此而已。我来给大家指出这项措施的由来。同志们，刚才大家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行动纲领的发言付之一笑，我要对大家说，要不是这个行动纲领……（喧哗声），也就不会有7小时工作制了。（笑声，喧哗声）（会议主席：您的时间已到。）原来，恰恰在提到纲领的时候我的时间到了。我只好简单说几句来对大家的笑声作答了。这个宣言中除了出人意料的关于7小时工作制的一段而外，还有出人意料的再免去10%的农民的农业税一段。我们当初曾经建议免除40～50%农民的农业税，却被说成是蛊惑宣传、鼓励坐享其成等等。如果在25%免税的基础上出人意料地又加上10%，我们不禁要问：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农村中的分化“不厉害”吗，不是说我们夸大其辞吗，不是说那都是戈连达和加米涅夫的凭空臆造吗，不是说我们夸大了关于富农危险的问题吗，不是说贫农就是懒汉吗，不是说我们在贫农问题上走极端或者有贫农倾向吗？你们为什么在宣言中要赠送意外的礼物——再免除10%的贫农的农业税呢？（会议主席按铃）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大名鼎鼎的贫农代表忍不住了。我再讲一分钟，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加里宁：我这个人很守时，托洛茨基同志更是个守时的人。

托洛茨基：真遗憾，只要提到贫农和富农的问题，您就特别守时。（笑声）显然，谁都不喜欢别人揭他的疮疤，与俄罗斯的谚语

相反。

最后一点，同志们，第三点，关于贫农和雇农的保险问题。

加里宁：……民主。

托洛茨基：加里宁同志，可能您将来也得靠这个民主来保护哩。不要太瞧不起它，它将来也许对你有用。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北高加索的同志会告诉您的，您可以向他们了解“民主”的情况。但是我现在不谈民主问题，只谈贫雇农的保险问题。这个措施好极了！可是同志们，昨天才刚刚取消了建筑工人、大部分食品业工人和大部分水运工作人员的社会统保，使他们落到类似伐木工人的处境。在这个问题上汽车的所有轮子原来都是从左向右转动，到节日前夕变成从右向左转了。既然汽车是从左向右运动，后来是轮子猛地从右向左来个急转弯，这样可别把齿轮磕掉了。为什么要突然来个急转弯呢？当然，可想而知，古比雪夫同志明白这个秘密。托姆斯基同志可能也知道。（喧哗声）这个秘密再简单不过了：秘密在于那个行动纲领，有人先是企图通过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和军事阴谋封锁这个纲领，企图用卑鄙的波拿巴主义的诽谤扼杀这个纲领。（喧哗声，喊声：够了）他们从右面、用波拿巴主义的方式封锁未能得逞，因为党员不相信，于是说：我们再从左面试试（喊声：够了，行了，喧哗声）……以意外礼物的形式出现了出人意料的对宣言的补充，出现了所有这些大张旗鼓宣布的社会改革。原则上对这些措施可以尽量表示欢迎，不过不能仅仅宣布而已，要作为经济计划付诸实施，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相信这些措施，并帮助将其付诸实施。

1927年10月15日

№07545

季诺维也夫在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共产党党团会议上的发言和宣读的建议

（1927 年 10 月 15 日）

同志们，这篇应当具有相当重要意义的宣言草案我还没有来得及仔细去读，多数党团成员大概也还没有机会仔细看看。所以我可能有所遗漏，不过我想我对这个宣言草案的基本印象不会有错。首先是这份文件的一大缺陷十分显眼：国际部分的分析实在太差，甚至几乎完全没有。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文件中连“共产国际”这个词都没有出现过；只字未提中国革命；文件中对英俄断交，法国资本家进攻未置一词。我认为这是本应对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 10 周年进行总结的文件中的一大缺陷。列宁在世时，在我们苏维埃的文件中总要提到这些题目。目前国际问题与我们有关不仅仅因为我们是国际的成员，也不仅仅因为我们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者，还因为我们是直接在苏联进行活动的革命者。现在这绝不只是群众集会上或者茶余饭后要议论的问题。这是我国革命现阶段所面临的极为尖锐的问题。如果我们这篇宣言旨在向人民群众，首先是向工人阶级阐明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以及我们面临的前景，那么现在就不能回避苏维埃国家的国际环境问题。不能闭口不谈英国同我国断交、法国资本家的进攻、中国事件以及共产国际的斗争。不能回避这些问题，因为国际政治问题又几乎同革命初期一样地突出起来了。这些问题正在成为极为迫切的问题，而且又在决定着我们的整个建设。

在如何从实质上阐明目前国际局势的问题上我们可能观点不一致；这方面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意见分歧。至于**这些问题应该阐明**，在这方面本不该有意见分歧的。这些问题必须说明，因为每年工人和进步农民都会问我们目前对国际局势是如何看待的。可这个宣言草案干脆避而不谈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英国同我国断交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这是文件的一大缺陷。一份应该具有相当国际意义却不阐明国际问题的文件是不可取的。

现在来谈谈宣言的实际内容。这份文件最有分量的内容是谈7**小时工作制**的第一段。我想我的说法不会有错，就是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段是意外的礼物。大概大家顶多是昨天或前天到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的。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如果从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来谈7小时工作制，那么这个问题是不容争辩的。**当然，苏维埃国家不应当由8小时工作制向9小时工作制过渡，而应当向7小时，甚至今后向6小时工作制过渡。**这是不容争辩的，这是起码的常识。发表这个一般性的见解，没必要等到革命胜利10周年，此事也无须在宣言中宣布。如果说这个问题是作为一个迫切问题，作为一个实际问题提出来，那么第一，这个问题根本没有作好准备。会上没有说过此举所需费用是多少。我们连最粗略的概算都没有听说过。没有一次工会代表会议讨论过这个问题。党内也没有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也没有征求过广大工人阶层的意见。

我曾了解到，这个问题最先是在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中提出的，记录中说，通过电话征询的方式由政治局委员表决决定将7小时工作制这一条写进宣言。在确实认真考虑采取重大措施时，难道会如此草率从事？这样的准备工作根本不行。

至于问题的实质，我认为，**这是一项错误的提案。**我已经说过，在对待7小时工作制的态度上党员中不可能有原则性的争论。

我们当然有可能进一步缩短工作日。既然目前我国具有我们现有的资源，我国工人阶级又处于我们所看到的状况，那么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我国工人阶级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我想任何一个想做到客观公正的人都会说，1927 **年我国工人阶级最关心的不是工作日问题**。我们的工人阶级可以接受而且已经接受了 8 小时工作制。如果富农有延长 8 小时工作日的意图，我们应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曾经有过这样的意图。然而我们应该考虑到正视工人的现状，正视现有的资源。**我们应当看看目前工人阶级最关心的是什么？**

如果我们想说：我们打算实施 7 小时工作制工作是作为与失业现象作斗争的一项措施，那么首先应当讲清楚，不应把它作为若干年和五年的远期展望提出来。就应该比较实际地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为了与失业现象作斗争。就应该讨论在这方面可能采取的一切实际措施。我们知道，即使资产阶级国家在同失业现象作斗争时也采取每周 5 天工作制以及其他缩短工作日的做法。但是，那里并没有社会主义建设。

作为工人政府，我们应该直率地、明确地同工人阶级说话。讲的是什么呢？如果讲的是同失业作斗争的措施，那就应该这样提出问题。那就应该提出一系列实际建议和计算结果等等。如果想“离开失业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知道，最近我们养成了“离开”最迫切的问题，包括国际局势问题的习惯），我再说一遍，如果想“离开”失业问题和工人的整个现状来讨论这个问题，那纯粹是虚伪。好吧，让我们提出一两年后实行 7 小时工作制的建议，可我们的五年计划说的是**近几年内失业人数将急剧增加**。所有经济机构的计划和所有的五年计划都这么说。如果讲的不是与失业现象作斗争，而是我们在经济上已经站住脚跟，需要采取社会主义的措施，那就是绝对的谎言了。我国工人阶级目前关心的是如下迫切的

问题。**首先是工资不够，至今我们的工资还很低，这一点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其次是失业，这是我国工人阶级关心的问题，失业使工人阶级情绪低落，影响他们发挥积极性和主动性。**再其次是住房建设。这些就是工人阶级当前最关心的几个主要问题。

我们知道，最近一个时期破坏劳动法典的情况日趋严重。我有一张表，可惜没有带来，它说的是最近劳动法典如何遭到破坏，法典改动之处比条款还多。我们也做了很多损害工人阶级和女工生活的事。不久前我们试图实行无报酬的学徒工制度，缩短工人的假期，取消所谓的“小东西”，如托儿所、电车票等等。详细情况可以看我们的行动纲领（13名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署名的）。（笑声，喧哗声）是的，是的，同志们，我想你们在这份文件中可以找到对工人问题最好的叙述，讲得最准确，最明了。大家知道，曾经多次企图指责我们搞蛊惑宣传。我可以肯定地说，在我党的历史上再没有比关于7小时工作制的建议更具蛊惑性和冒险性的建议了。（喧哗声）拟定这项建议的方法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

同志们，大家可能还记得大约一年以前，1926年9月，在工资问题上也玩弄了这样的把戏。当时专门发布了一项人民委员会的命令，允诺使工人们得到幸福；领布了一个法令，引起全国轰动，后来呢，大家也知道，偃旗息鼓了；只是引起了工人阶级的不满。现在是想拿7小时工作制来玩同样的把戏。

同志们，列宁在世时我们的情况也是困难重重，不过我们对工人们讲清全部真相：这件事能办到，那件事办不到。我们从来不同工人阶级捉迷藏。这就是我国政府、我党同其他政党和政府的主要区别。

今天在座的工会工作人员相当多，建议他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包括托姆斯基同志在内，今后他为此要比其他人对工人负更大的责任。当然，我们这里有许多信口开河的行家。布哈林近日抛出

（笑声）一个口号：“加紧向富农进攻。”这位布哈林现在要“加紧向富农进攻”了，然而，他恰恰是“发财吧”这个口号的作者。（喧哗声）他要加紧向富农进攻了。同志们，这样的诺言和空话已没有任何意义。谁也不会相信的。（喧哗声）

主席：您的发言时间已到。

季诺维也夫：首先，我建议宣言草案应增加**国际部分**，因为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处在我们这种国际环境中，我们无产阶级政党所发表的宣言不能不谈这一时期所发生的重要事件，尤其是今年发生的。

宣言中正确地说明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已具备建成社会主义的一切必要和足够的条件，正如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列宁所教导的那样。但是列宁的教导不止这些。这里你们开始弄虚作假了。列宁还教导说，**假如我们这里没有国际资产阶级的包围，假如不必在国际范围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那就确是如此了。现在的宣言文本中，在这个地方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整个宣言因此而受到损害。其次，我建议取消以蛊惑宣传和不负责任地同工人玩把戏的形式提出7小时工作制问题，以免损害我党的名誉，建议这一处换成我的书面建议。

*　　*　　*

请允许我提出建议。

我提出两点建议。第一，责成委员会对宣言中的国际部分再加以研究（战争的危险、中国革命、英苏断交、法国帝国主义分子的进攻、共产国际的斗争），并把这一部分补充到宣言中去。

第二，

1．在工人问题上去掉第一点，加进以下几点：

（1）彻底根除任何延长8小时工作制的做法；

（2）停止违反业已颁发的条例在有害车间延长工作日的做法；

（3）近期的任务是提高工资，至少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采取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不断增加实际工资的方针。必须通过不断提高低薪阶层工资、但决不降低高薪阶层工资的办法尽量缩小各类工人的工资差别。

2．必须在合理化领域制止官僚主义的胡作非为。

3．为了缓解失业造成的后果：

（1）应按确实相当于当地平均工资的工资计算工人津贴；（2）由于持续性失业应将发给失业者补助金的期限由1年延长至1年半；（3）不得再减少社会保险费，同不支付社会保险金的现象进行坚决斗争；（4）禁止社会保险金库的资金用于全民保健的做法；（5）同“节省用于被保险人的开支”的做法进行坚决斗争；（6）撤消可能有人用来以各种借口撤消现有失业者的补助金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登记的所有决定；（7）采取提高失业者补助金、首先是工业失业者补助金的方针。

必须有长远考虑的周全的和仔细研究的公益工程计划，可在该工程中使用失业工人，这样对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极为有利。

4．不断地改善工人们的居住条件。在房租问题上坚决执行阶级政策。不得靠损害工人利益来改善非无产阶级分子的住房状况。不得将被截减和解雇的工人迁出原住房。

5．集体合同应经过工人大会切切实实的而不是走过场式的讨论。

6．劳动法典应看做起码的劳动条件，而不应看做理想的劳动条件。集体合同应包括在合同有效期间保证不裁减本部职工（准许破例的情况应事先专门说明）。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对原有的集体合同进行使工人处境恶化的修改。

7．增加用于安全技术和改善劳动条件的拨款。强化对不遵守

劳动保护要求的惩罚政策。

8. 重新审查对劳动法典的种种解释，取消可导致劳动条件恶化的解释。

9. 对女工实行“同工同酬”。提高妇女劳动的专业技能。

10. 不得实行无报酬的学徒制度。不得实际上降低未成年徒工的工资。采取措施改善劳动卫生条件。

11. 绝对不许以牺牲工人切身利益来搞节约。必须将已剥夺的“小东西”（托儿所、电车票、较长时间的休假等）归还工人。

12. 工会应加强对季节工的关心。

13. 加强对企业工人的医疗服务（诊疗所、医院等）。增加工人区的工人子弟学校。

14. 通过一系列国家措施加强工人合作社的地位。

第三，在此之后再把实际进行工作日改革提上日程，以期今后将工作日缩短至 7 小时。

假如党团接受此建议作为基础（我对此并不抱太大希望），即可责成该委员会对以上建议进行加工修订。我想我们的这些具体建议会比遥遥无期的东西得到工人们更多的支持，工人阶级对有人一再向他们许诺遥遥无期的东西已不再相信了。

最后，我建议在此之后再把实际进行工作日的改革提上日程，以期今后将工作日缩短至 7 小时。

1927 年 10 月 15 日

№07546

托洛茨基针对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联共（布）中央问题的发言

（1927年10月23日）

我提出的关于单独讨论弗兰格尔手下军官和军事阴谋问题的建议遭到拒绝。实质上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党获悉同反对派有联系的共产党员参与反革命组织的时候，党为什么会受骗？受了谁的骗？如何受的骗？为了再次展示你们对于争论的理解，你们决定把我的关于伪造的弗兰格尔手下军官的简短发言从速记记录中抽掉，就是说对党隐瞒起来。布哈林在这里奉献给我们的是以明仁斯基那以与印刷厂和反对派毫无关系的文件为基础的关于热月的混乱空论。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没有任何价值的布哈林的空论，我们需要事实。但没有事实。因此整个问题就没有任何理由地塞进了有关反对派的争论之中。粗暴和违法已发展到了不能容忍的背信弃义的地步。明仁斯基宣读的全部文件完全是否定现行政策的，只是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加以说明。但是我无暇顾及，我得提出一个主要的问题：现在当权的派别是怎样和为什么一定要欺骗党，把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冒充为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怎样和为什么一定要断章取义地摘引尚未结束的侦查的只言片语，用反对派参与反革命组织这一假情报来恐吓党？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只有这个问题才有政治意义。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甚至是很次要的。

不过首先我想就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问题讲两句。每一个

机会主义者都想用这个词来为自己遮丑。为了制造“托洛茨基主义”，造假工厂开足马力、昼夜不停地生产。关于这一点，不久前我给党史委员会[①]写了一封信，信中约有50处引文及文件揭露了目前当权的理论和政治学派颠倒是非，歪曲、隐瞒文件和事实，曲解列宁原意，这一切都是为了同所谓的“托洛茨基主义”作斗争。我要求把这封信发到参加联席会议的全体代表手中。并没有做到。其实，这封信中几乎全是文件和引文。我要把这封信给《争论专页》寄去。我想连这封信也会对全党隐瞒的，因为我在信中列举的事实和文件足以致斯大林一伙于死地。

在去年的七月宣言中我们就十分准确地预见到党的列宁主义的领导集体受到破坏和暂时被斯大林一伙所接替的各个发展阶段。我说的是暂时接替，因为领导集团取得的“胜利”越多，就越虚弱。现在我们可以用下列最后的结论来进一步充实去年7月的预见：斯大林目前的组织胜利只是他政治崩溃的前奏。政治崩溃是必然的（与斯大林体制相适应），而且马上就要崩溃。反对派的主要任务是：把现领导实行的毁灭性政策所带来的后果对党及党同群众的联系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你们想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我们赞同如下意见：这项措施完全出自斯大林体制发展的现阶段，或确切点说，其崩溃阶段所奉行的方针。把成千上万的优秀党员，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工人开除出党的当权派，胆敢把姆拉奇科夫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罗夫和萨尔基斯等人开除出党（这些同志就可以组成一个比我们现在的书记处更有威信、更有修养、更能体现列宁主

① 全名为“十月革命史和俄国共产党党史资料收集研究委员会”，成立于1920年，先后附属于国家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1921年划归俄共（布）中央。1928年并入联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

义的党的书记处）的机关权势集团；把涅恰耶夫、什特科戈尔德、瓦西里耶夫、施密特、菲舍列夫等许多优秀的党员投入国家政治保卫局内部监狱的斯大林—布哈林集团，靠对党使用暴力、压制党的思想、在苏联和全世界对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搞瓦解的机关权势派，无一不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派别。近一年来追随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的有蒋介石之流、冯玉祥之流、本·蒂列特之流、库西宁之流、什麦拉利之流、马尔丁诺夫之流、康德拉季耶夫之流及乌斯特里亚洛夫之流等。这个机会主义派别甚至在召开代表大会前的一个月都不能容忍我们留在党中央。这一点我们很清楚。

粗暴和无视法律与胆怯是孪生兄弟。把我们的行动纲领隐瞒起来，更确切地说是企图隐瞒起来。害怕我们的行动纲领是什么意思呢？很清楚，**害怕纲领就是害怕群众**。

9月8日我们向你们声明，我们将不顾各种禁令把行动纲领向全党公布。我们这样做了。我们要把这项工作做到底。姆拉奇科夫斯基、菲舍列夫以及负责印刷和散发我们行动纲领的其他同志过去和现在都同我们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的反对派成员团结一致，完全负责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上）进行工作。

列宁曾提到的粗暴和不忠顺已不光是个人的品质，这已成了当权派别及其政策和制度的品质。问题不在于表面形式。现行方针的主要特征是相信暴力（甚至对党本身的暴力）是万能的。经过十月革命我党掌握了强大的暴力机关，没有这些暴力机关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思议的。专政的中心是我党的中央委员会。列宁生前，列宁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党的组织机关服从于世界范围的革命的阶级政策。的确，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从一开始便引起列宁的担心。“这个厨师只会做辣菜。”这是列宁在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在小范围内说的。不过在列宁领导下，以列宁时期的政治局构成，总书记一职扮演了完全从属的角色。从列宁生病时起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通过书记处对人的遴选，斯大林分子的机关权势集团有了独立的、不依赖于政治路线的性质。正因为如此，列宁反复考虑自己离开一线后的前景，向党提出最后忠告：撤消斯大林的职务，此人会把党引向分裂和灭亡的。全党并没有及时听到这一忠告。精心挑选的机关把它隐瞒起来了。后果我们已充分看到。当权派别认为借助暴力一切都可得到。这是个根本的错误。暴力能够起巨大的革命作用，但要有一个必备条件：从属于正确的阶级政策。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暴力（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了巨大成就。克伦斯基和策列铁里对布尔什维克的暴力只是加速了妥协制度的垮台。当权派别搞驱逐、撤职、拘捕，对自己的政党采用了大棒加卢布的办法。工人党员害怕在自己的支部里讲真心话，害怕凭良心投票。机关的专政对本应是无产阶级专政最高表现形式的政党大施淫威。当权派别的党大施淫威使党对阶级敌人的威慑力减弱了。

但是党的制度并非独立自在的。党的领导的整个政策都能在党的制度上得到体现。近年来，这一政策把阶级轴心从左转向了右：由无产阶级转向了小资产阶级，由工人转向了专家，由普通党员转向了机关权势分子，由雇农、贫农转向富农，由上海工人转向蒋介石，由中国的农民转向资产阶级军官，由英国无产者转向普塞尔、希克斯和总理事会成员，等等，等等。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实质所在。

初看起来似乎斯大林的方针必胜。斯大林派左（莫斯科、列宁格勒）右（北高加索）出击。实质上中派的整个政策受到右边和左边两条鞭子的袭击。无阶级根基的官僚主义中派在两条阶级路线之间徘徊，不断从无产阶级路线滑向小资产阶级路线。这种滑落并非沿着一条直线进行，而是以非常曲折的形式进行的。

这样的曲折我们在过去也有过不少。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在富农

的压力下（来自右面的鞭子）扩大选举细则。后来又在反对派的压力（来自左面的鞭子）下取消选举细则。在工人工资立法、税收政策、对待私营企业主的态度等方面的曲折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总的方向是向右。最新发表的宣言无疑是向左的曲折，但我们一刻也没有忽略，这只是一种曲折，曲折本身不会改变政策的总方向，甚至必然（在不久的将来）加速领导核心进一步向右滑。

昨天还对富农喊“发财吧”，今天却又高喊加紧向富农进攻，这并不能改变这条路线，如同7小时工作日之类的纪念日礼物不能改变这条路线一样。现领导的政治路线并不是由某些冒险主义的曲折来决定的，而是由这条路线在同反对派作斗争中集合在自己的那个社会基础决定的。通过斯大林的机关和斯大林体制向无产阶级先锋队施加压力的是一些取得牢固地位的官僚，其中包括工人官僚、行政人员、业主、新生私有者、城乡特权知识分子。这些人开始向无产阶级挥动拳头说：“这不是你的1918年了。”

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左的曲折，而是基本的政治路线。对志同道合者的遴选起决定作用。干部起决定作用。社会基础在起决定作用。既不要扼杀工人党支部，也不要排挤富农。这二者是不能相容的。左的纪念日的曲折一旦要实现时便会遭到多数人的强烈反对。今天说“发财吧”，明天又说“剥夺富农”，这对布哈林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大笔一挥，事情便成了。从他那里什么都得不到。但是富农、行政管理人员、顽固的官僚、乌斯特里亚洛夫分子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不赞成这种纪念日的转变。他们要说出自己的意见。

大概最不知所措的托姆斯基同志也反对纪念日的曲折。托姆斯基预感到工人要唯工会是问，得由他来负责。明天工人们将要求托姆斯基实际哪怕至少是暂时停止实行右的方针，因为在宣言中已宣布实行左的方针。因此执政联盟内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右翼中有一条小业主路线，也有一条工联主义者路线。他们结成了联

盟，这在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屡见不鲜。纪念日的曲折是在小业主和工联主义者中间加楔子。在小业主和工联主义者之间搞平衡的机关权势分子将失去基础。纪念日曲折一方面是对反对派在城乡内部生活的所有重要问题上的正确性的无可争辩的庄严的承认，另一方面这也可以体现当权派在政治上的自我否定，证明本身贫乏。口头上的自我否定，实际上不可能做到。纪念日曲折没有减缓而是加剧了现行方针在政治上的垮台。

党的制度是来源于整个领导政策。极端的机关权势分子的后台是活跃起来的国内资产阶级，而国内资产阶级的后台又是世界资产阶级。所有这些势力都来进逼无产阶级先锋队，不让他们抬头，也不让他们张口。中央的政策偏离阶级轨道越远，便越是需要采用强制性手段从上面把这一政策加强给无产阶级先锋队。这就是令人气愤的党的现行制度的根源。

当马尔丁诺夫们、什麦拉尔们、拉费斯们、佩佩尔们在指导中国革命，而姆拉奇科夫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罗夫和萨尔基斯等人却因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印刷并散发布尔什维克纲领而被开除出党的时候，这些事实并不仅仅具有党内的性质，不，各阶级不断变化的政治影响已在这些事实中有所体现。当然，国内资产阶级不像世界资产阶级那样大胆地、公开地、蛮横无礼地向无产阶级专政及其无产阶级先锋队进逼。但是国内外资产阶级的进攻是相互联系、同时进行的。工人阶级和我党中最先感觉到面临的危险并最先说出这种危险的分子，也就是最革命、最坚强、最敏锐、不妥协的阶级代表，他们现在就是反对派的干部。这批干部既在我们党内又在国际范围内成长起来。最伟大的事件和事实都证明我们是正确的。镇压加强了我们的干部队伍，使党员中优秀的“老头子”聚集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使年轻党员受到锻炼，使新加入进来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聚集在反对派周围。被开除党籍的

反对派分子是**党的优秀党员**。那些开除他们、逮捕他们的人是其他阶级对无产阶级施压的工具，而这些人尚未意识到、领悟到这一点。当权派企图封锁我们的行动纲领，他们在完成乌斯特里亚洛夫即处于上升阶段的中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定货。乌斯特里亚洛夫与正在消亡的老的流亡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同，他是新资产阶级的聪明而有远见的政治家，他不主张搞政变和社会动荡，不想“越过台阶”。目前的乌斯特里亚洛夫的台阶就是斯大林的方针。乌斯特里亚洛夫公开把赌注下到斯大林身上。乌斯特里亚洛夫要求斯大林镇压反对派。斯大林在完成乌斯特里亚洛夫的社会定货，他开除和逮捕反对派分子，就弗兰格尔手下军官和军事阴谋问题对我们提出纯属热月性质的指责。

斯大林的直接任务是分裂党，取消反对派，使党习惯于从肉体上消灭的方法。纠集一伙法西斯哨帮，用拳头解决问题，砸书本或者扔石头，监狱的铁窗，这就是斯大林方针在向前推进之前暂时选定的方针。这条路是预先决定的。既然雅罗斯拉夫斯基、什维尔尼克、戈洛谢金等人可以将厚厚的一本关于控制数字的书往反对派分子的头上砸去？他们何必还要就控制数字问题进行争论呢？斯大林主义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肆无忌惮，发展到公开耍无赖 的地步。我们重申，这些法西斯的方法是盲目地、无意识地完成其他阶级的社会定货。目的是剪除反对派，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已经有人在说：“开除一千，枪毙一百，党内就太平了。”说这种话的是那些不幸的、吓破了胆又气得发疯的瞎子。这就是热月的声音。那些极坏的、被权势腐蚀了的、恨得失去理智的官僚者们正在竭尽全力策划热月。为此他们需要有两个政党。但是暴力在反对派以革命的英勇精神捍卫的政治路线面前碰得粉碎。斯大林搞不出两个党来。我们公开地对全党说；无产阶级专政处在危急之中！我们坚信，党（它的无产阶级核心）将会听到这种呼吁，理解它，并设法补救。党受

到很大激励，明天将彻底振作起来。**几千名反对派骨干**的身后是：三倍于他们的**追随者**，再往后是广大的工人党员，他们开始用心地倾听反对派的声言，向反对派靠拢。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非党工人不相信对我们的中伤或诬蔑。列宁格勒的工人阶级通过 10 月 17 日公开举行示威表达自己对日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压制的理所当然的不满。无产阶级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但是希望实行另一种政策。所有这些过程都是不可逆转的。机关对此无可奈何。镇压越厉害，反对派干部在普通党员和整个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威信就越牢固。每开除 100 名反对派分子出党，就意味着又有 1000 名新的反对派分子加入党的队伍。被开除出党的反对派分子觉得自己是党员，他也确实依然是党员。可以强行夺走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党证，可以暂时剥夺其党员权利，但是他决不会拒绝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当扬松在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上问姆拉奇科夫斯基同志开除出党后准备干什么时，姆拉奇科夫斯基同志回答说：“今后我还会去摇转把儿的。”每一个反对派分子，无论他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中央还是被开除出党，他都会这样回答。我们每个人都会同姆拉奇科夫斯基同志一起说：今后我还会去摇转把儿的。我们始终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转把旁。你们不能使我们离开它。我们还会摇转把。你们不能切断我们同党的联系。不能割断我们同工人阶级的联系。我们懂得什么是镇压。打击对我们说来已是家常便饭。我们不能听任斯大林的政策断送十月革命的成果，斯大林政策的实质可用几句话来表述：**压制无产阶级核心，同各国的妥协分子结盟，向世界资产阶级投降。**

你们在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开除我们的党籍吧！你们把代表大会变成了斯大林派的少数人的资产！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表面上似乎是机关机制的最大的胜利。实质上这次代表大会将标志着其在政治上的彻底垮台。斯大林派的胜利是其他阶级力量对无产阶级

的胜利。斯大林领导的党的失败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失败。党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我们正在这方面帮助党。把反对派的纲领摆到党的桌面上！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后，反对派在党内将比现在强大得多。工人阶级和党的日程表同斯大林的日程表截然不同。无产阶级思考得慢，但是很扎实。我们的行动纲领将加速这一过程。归根到底是政治路线起决定作用，而不是官僚的拳头。反对派是不可战胜的。今天你们把我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正如昨天你们将谢列布里亚科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开除出党，把菲舍列夫及其他人抓起来一样。我们的行动纲领将获得应有的地位。全世界的工人都会非常不安地发出疑问：为什么在十月革命10周年的时候开除和逮捕十月革命的优秀战士？这是谁干的？是哪个阶级干的？是那个取得十月革命胜利的阶级呢，还是那个诋毁、暗中破坏十月革命胜利的阶级？就连由于你们的镇压而觉醒的世界各国的落后的工人也会拿起我们的纲领，以验证关于弗兰格尔手下军官和军事阴谋的恶毒诬蔑。诽谤、开除和逮捕使我们的行动纲领成了国际工人运动最受欢迎、最符合民意、最珍贵的文件。任你们开除好了，但是你们阻止不了反对派的胜利，阻止不了我党和共产国际的革命联合的胜利！

1927年10月23日

№07548

托洛茨基致中央书记处

（1927 年 10 月 24 日）

1. 因为我的发言是按照手稿念的，只作了少许补充，所以不再对速记记录进行修改，现附上我用过的那份手稿。

2. 当时速记员的工作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许多插话都记下来了，但不是全部插话都记下来了。速记员是出于厌恶的心情也许对某些插话避而不记。我决不能因此责怪他们。有人在大会主席团的席位上定期干扰我讲话的情况，速记记录中也没有提到。没有记下有人从主席团的席位上向我扔杯子（据说是库比亚克同志）。在速记记录中也没有记下联席会议的一位与会者抓住我的胳膊想把我拉下讲台等情况。

3. 我的第一篇发言，就是为把弗兰格尔手下军官和军事密谋问题作为专项问题安排到会议议程中的提案辩护的发言，已根据会议的特别决定从速记记录中删除。因此在会议的速记记录中没有记入如下事实，即中央监察委员会成员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在我发言时将厚厚的一叠控制数字材料朝我扔过来。这一事实在道德和政治上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例如一位工人党员因在支部讨论中言词过激而被开除出党，但作出这种开除决定的一位组织者和领导者都认为，在党的高层机关，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也会采用这种只能称之为是法西斯或流氓行为的手段。

4. 在布哈林同志发言时，什维尔尼克同志也向我扔书本，作为对我插话的答复。什维尔尼克同志是原中央书记，现为乌拉尔党

组织领导人。我希望将他的英勇行为载入速记记录。

5. 会议主席团对上述流氓行为（雅罗斯拉夫斯基、什维尔尼克、库比亚克和其他许多人的）未加任何谴责。

因此，只能将联席会议上发生的情景当成最重要的机关向所有党组织发出的关于如何进行代表大会前争论的指示。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0月24日

№07549

托洛茨基：他们怎样瓦解共产主义青年团

（给一位党团员的信）

（1927 年 10 月 31 日）

您是属于官方那一派的，尽管看起来在一些问题上曾有过摇摆。您在给我的信中写道：“看来反对派在一些问题上是对的，但是他们为什么要采用诸如搞非法的印刷厂之类的反党的斗争方式……”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您说的“看来”反对派在一些问题上是对的这句话。您怎么会知道的呢？是从布哈林、斯列普科夫和马列茨基等人系统地歪曲了反对派的观点、使之变得面目全非的文章中了解到的吗？您也阅读了由反对派自己发表的一些文件，您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得以了解反对派在许多问题上是正确的。不过既然只有这样的出版工作使您有可能了解反对派的观点并由此认定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您有资格指责我们搞“非法”出版吗？

我偶然从转播节目中听到几天前莫斯科共青团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我不去评论官方的贺词和答谢词。其中没有任何富有生气的思想！捷尔－瓦加尼扬[①] 同志试图在自己的发言中作一些很谦虚谨慎的评述。捷尔同志在指出共产主义青年团做了大量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之后强调指出，对无产阶级青年的国际主义教育不

① 捷尔－瓦加尼扬，B.A.（1893～1936）——1912 年入党。在 15 大上因“从事积极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被开除出党。1928 年 1 月被流放比斯克，后流放喀山。遭镇压。

够。他指出《共青团真理报》有关国际主义题材的内容太少。说到这里就有人恶狠狠地打断了他的话。捷尔同志试图接着往下说却又领教了一番猛烈的起哄。甚至从扬声器里即可以听出搞暗中破坏活动的是一小撮人。大多数与会者简直被这种起哄帮和哨子帮吓住了。主持会议的科瑟列夫同志事后声称，捷尔同志发言的地方没有选好，“他本该去参加反对派的秘密会议的。”

如上所述，捷尔同志的发言完全是同志式的，心平气和的。他的批评充满了对共青团的深爱之情。然而机关却不能容忍。科瑟列夫同志声称，只有在秘密会议上才能谈论《共青团真理报》的不足，谈论该报缺少国际主义题材的文章。年轻的机关权势分子的这种态度淋漓尽致地说明了反对派分子不得不举行所谓“秘密”会议的原因，在这样的会议上没有哨子帮和流氓分子用敲打吵闹、吹哨以及大声喊叫打断发言的现象。

在10月26日举行的莫斯科积极分子大会上，哨子帮严格按照军事化原则组织起来，由斯蓬德指挥。斯蓬德背向主席台指挥吹哨人。当加米涅夫同志和拉柯夫斯基发言时，暗中破坏变成无耻地起哄。这叫什么事儿？按照1923年12月5日的决议的说法，这就是把甚至最认真负责的坚定不移的共产党员推上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道路的那个体制。

如果您是认真地谈到争论，那么就应当保证参加争论的人拥有最起码的权利。应当呼吁那些扔书本、摔杯子、吹哨子、起哄和一再干扰党员就决议的主要问题交换意见的流氓分子遵守秩序。据与会者所述，圆柱大厅里2000名党员费了很大的劲儿去听加米涅夫和拉柯夫斯基的讲话，他们有的欠着身子，有的把手放在耳边当听筒。但是哨子帮决心不让会议听取反对派代表的发言。这实际上同对行动纲领的所作所为一样。禁止制订行动纲领或在加米涅夫和拉

柯夫斯基同志发言时起哄喧闹的只能是那些害怕党，即害怕党听到和理解反对派发言的人。要是没有理由，那就得乱扔书本和放肆地大吵大叫。这就是搞小圈子和派别活动的主要原因。

每一个诚实的党员都应支持把法西斯分子、哨子帮和流氓分子孤立起来的做法。这是一种与无产阶级政党格格不入的现象。一定要根除它。如您能对此事予以协助，您就是在帮助反对派放弃派别斗争方式。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附言：请将附上的我在联席全会上的发言一并刊登在《争论专页》上。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10 月 31 日

№07547

声　　明[①]

（1927年10月）

第一号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个行动是将同列宁一起领导革命的那批同志从党和革命的领导岗位赶下去的一个步骤。

这一决定意义重大，因为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不是简单地开除两名中央委员，而是开除党内一个政治流派的领袖，这个流派正在为党的列宁主义政策、为对党和革命实行列宁主义的领导而斗争。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对斯大林—布哈林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了批评，开除是对批评中央政策的回答。

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形式上的理由是他们搞“派别”活动。被开除的同志的“派别”活动就在于他们为党章赋予每个党员的权利进行了斗争，这些权利在列宁生前是不言而喻的。被开除的同志的“派别”活动表现在他们作为列宁主义者坚决而勇敢地为反对党内现行的斯大林体制、为在党内恢复列宁体

① 第一号声明也许是我在刚刚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时写的。第二号声明修改稿上签名者有反对派分子，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托洛茨基注
我较为仔细地阅读后得出结论，声明不是我写的。——托洛茨基注

制进行了斗争。

反对派批判了并将继续批判所谓一国社会主义这一小资产阶级的伪理论，继续批判在共产党专政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反对派将毫不留情地揭露斯大林和布哈林在中国革命、英俄委员会等问题上的机会主义错误。反对派将采取各种措施反对把希望寄托在农村中“经济实力雄厚的中农”（即富农）身上。反对派按照列宁的观点来理解和捍卫工农联盟，理解和捍卫“10～20 年维持同农民的正常关系”。反对派反对公开或隐蔽地极力庇护富农的人，反对同富农打得火热，而疏远工人、雇农、贫农及广大的中农阶层，反对对工人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反对派将竭尽全力为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而斗争，也就是使来自富农和耐普曼的资金用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反对派将为反对官僚主义机构挥霍资金、为改善工人状况而斗争。

思想上和政治上已被摧毁的斯大林集团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采用闻所未闻的政治诽谤。他们粗暴地破坏列宁的习惯和党的传统，歪曲列宁的理论和革命实践，用斯大林的“不忠顺”和“粗暴”（列宁语）取代列宁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及条件。斯大林的多数派利用革命历史上尽人皆知的右派反对派的手段，利用日益逼近的战争危险，对反对派提出了闻所未闻的“有条件的护国主义”，“失败主义”及“起义”等等诬蔑指责。反对派在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驳斥了所有诬蔑之词。斯大林在讲话中围绕托洛茨基同志关于帝国主义战争初期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分子克列孟梭在法国取代了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维维安尼等人一事掀起了一场人为的虚假的风波。他煞有介事地说：要搞掉现任的党领导人，除非打国内战争。这骇人听闻的说法完全证实了列宁的担心，他在“遗嘱”中曾指出斯大林可能起分裂作用。

我们痛斥所谓反对派只是有条件地保卫苏联的卑鄙谎言。这个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反对斯大林的政策，它削弱了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外的地位，因而也削弱了国防。

对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质问（三个问题），反对派表示，它反对派别活动，反对搞两个党，拥护无条件地保卫苏联，拥护共产国际的统一。全会进程表明，奥尔忠尼启则同志的问题只是一个把戏，将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是斯大林派预先决定的。党内从未有过像斯大林耍手腕这样道德堕落的事例，他宣称反对派是“失败主义者”和反革命分子，同时又向反对派表示和解。不管出现哪种情况，斯大林的手腕都是欺骗党和工人阶级。

这场诽谤运动的目的是转移全党对真正的意见分歧的注意力。党被所谓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对保卫苏联的欺骗性叫喊搞得“茫然若失”。恶毒的诽谤武器正在瓦解党的队伍。在这种恶语中伤的喧嚣声中，国内的反苏维埃分子（富农、耐普曼、乌斯特里亚洛夫式的官僚）都动员起来了，而在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和白俄侨民的期望值越来越高。

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是斯大林派正在实施的计划的一部分。该计划是从去年7月中央全会开始实施的。其最终目的是将反对派开除出党。斯大林施展各种手腕，一心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力图在从召开全会到十五大这段时间，对反对派用尽陷害、开除和侮辱等手段。斯大林无耻地利用党要求统一的合理愿望，企图消灭我党无产阶级和列宁主义的左翼，左翼是使党背离列宁主义道路继续向右滑的主要障碍。

我们反对搞两个党，赞成共产国际的统一。两个党的口号并不是我们的口号，是口号的发明人斯大林集团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在党内，在党章允许的范围内为修正党的路线而斗争。斯大林的全部政策就是要迫使我们离开这条道路。

我们要求改变从左向右的发展方向。从列宁主义轨道滑向小资产阶级政策泥潭的机会主义倾向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实现真正的列宁主义团结的主要障碍。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是我国革命的最高机关。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沉重打击。党和十月革命的领袖及活动家从党的领导岗位上消失，这样就使党的右翼力量得到了加强。

十五大前夕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具有特别不祥的意义。这一事实充分地揭露了斯大林的分裂政策，其目的是恐吓党。剥夺反对派通过出版物对党的政策施加影响的机会，剥夺反对派领袖在代表大会前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这就是斯大林的党内“民主”。

我们反对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我们声明完全同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向党保证一定要维护我们共同的观点。我们号召忠实于列宁遗嘱的党员阻止斯大林一伙对列宁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捍卫者的分裂活动。我们号召党员要求把反对派的所有主要文件交给党。我们号召全体党员不要怕党内官僚的镇压，勇敢地、像列宁那样在党内维护自己的观点。问题不在于党的领袖们更迭，而在于党的命运。

我们号召全体党员为诚实地召开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而奋斗。只有按照党内必要的民主制度来召开党代表大会，只有向全党充分阐述反对派的观点，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才能弄清并解决党内真正的意见分歧。

我们深信，我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优秀的无产阶级分子将支持我们为维护列宁主义而斗争！

为党的团结而奋斗！

为召开诚实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而奋斗！

第二号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一决定是把那些曾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指导革命的同志从党和革命的领导岗位上撤换下来的又一步骤。这个决定也是消灭老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用新的斯大林的中央委员会取而代之的一个步骤。此后还会有新的步骤：把仍留在中央的为制止党滑到小资产阶级政策轨道而斗争的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一手操纵的中央委员会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的借口是他们搞受到党组织谴责的派别活动。被开除的同志的派别活动是：他们想争得自己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党的地位赋予他们的，斯大林体制的专断却夺走了他们和全党的这种权利，即将对中央委员会在关系到俄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的评价通报全党的权利。斯大林领导的政治局断送了这一阶段的中国革命。斯大林领导的政治局在英国社会主义叛徒的身上栽了跟头，他们原先把这些叛徒当成组织欧洲无产阶级、同战争危险作斗争的主要中心。斯大林把持的政治局没有预见到英俄关系破裂，也没有采取防范措施，他们企图用大叫大嚷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搞派别活动来对全党掩盖一件事实：被开除的同志和我们曾一起提出党面临危险的警告，并且指出了防范的措施。所谓这是全党的意志、所谓党谴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搞派别活动的说法，都是对党的侮辱和嘲弄。因为有些文件并没有通报全党，全党并不知道为什么要谴责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

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不仅是搞掉党的列宁主义领导、而且也是搞掉党本身的一个步骤。开除托洛茨基

和季诺维也夫是为了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这段时间对反对派竭尽污蔑之能事，使在这种气氛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甚至听不到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关于革命面临危险的真相的介绍。党应该是把百万党员联成一个整体的组织，只有让党员自由讨论所有事件，自由交流经验，自由批评中央的错误和选择斗争方式，才能把他们团结起来。一个政党被划分成禁止相互交往、禁止了解有关党的政策的主要文件、甚至禁止听取中央委员的意见的支部，这样的党不会有生命力，无法形成党的意见和齐心协力地贯彻执行党所作出的决定，党将变成那些在开除的威胁下必须按党的官僚们的意志行事的人们的组织，变成在危险的情况下丧失自主能力的机体。

可见开除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不仅仅是对中央委员会和全党的打击，也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打击，党是革命的主要推动力。当威胁着革命的危险日益严重的时刻，革命便受到这种打击。中央委员会和国家机关的所有通报都谈到富农运动不断加强，农村把几百万贫苦农民赶进城里，他们找不到工作，得不到无产阶级国家的帮助，极容易成为反苏维埃宣传的牺牲品。即使不存在外部危险，这也会造成严重的国内局势。工业化速度缓慢，工业工人中失业人数的增加使无产阶级的状况更加恶化，需要采取紧急措施。然而除了这些危险，战争的危险也在日益威胁着我们。中国革命的失败实际上意味着苏联与英帝国主义之战的失败。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英帝国主义在东方腾出手来，拼命建立反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统一战线。英帝国主义为我们的进出口业务设置障碍，阻挠为我们提供国外贷款，利用苏联不稳固的阶级平衡，利用物价昂贵和商品荒竭力使农民与工人阶级同苏维埃国家发生对立，以便利用日趋严重的失业削弱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其保卫劳动共和国的能力。英帝国主义一旦达到目的，就将向苏维埃共和国提出最后

通牒：要么放弃工业国有化，承认债务并偿还资本家，放弃在东西部的革命运动，也就是投降，要么来一场生死之战。我们可以进行这场斗争，但首先必须从工人国家中铲除挑动劳动人民与我们作对的官僚主义，动员工人阶级起来维护十月革命的成果，发挥工人阶级的主动性，依靠雇农、贫农和下中农阶层。在这样的时刻撤掉党内那些反对扼杀工人党员独立性的官僚主义压制、要求争取贫农的支持、要求加倍关心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的领导人，要么是盲目无知、丧失理智的官僚主义的决定，要么就是打算靠牺牲十月革命成果、牺牲工人阶级和贫农来同英帝国主义搞交易。

因此，我们不仅反对把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不仅声明要同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不仅向党保证要继续他们的工作，而且要向全体党员大声疾呼：布尔什维克党在危险之中！无产阶级专政在危险之中！中央委员会中的斯大林多数派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证明，他们不能预见共和国面临的危险并与之进行斗争。斯大林在中国证明，让他自行其是只能葬送中国革命。我们号召全体工人，所有坚信列宁遗嘱的党员都来阻止斯大林扼杀俄国革命和分裂列宁的党——无产阶级革命的捍卫者。我们号召全体党员在各自所在支部要求向他们提供反对派的所有主要文件，首先是84人声明，使之清楚地了解我们的指责，结成统一战线去反对分裂政策，反对滑向小资产阶级轨道的政策，反对用出卖党内列宁主义的反对派的领袖的方式同张伯伦搞交易的政策。

我们号召党员不要害怕党内官僚的镇压。勇敢地，像列宁那样维护自己的观点，千方百计地在党内传播这些观点。问题不是更换某些领袖的问题，而是在苏联要不要搞无产阶级专政，苏联要不要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纷纷起义的殖民地各族人民的堡垒的问题。我们深信，列宁当年孜孜不倦地工作，决不是为了由于缺乏坚定性，由于不能作出牺牲而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使革命受到打击，听

任那些逐渐忘掉列宁学说的基础、一再压缩革命成果、渐渐地从无产阶级政策滑到小资产阶级政策的领袖们恣意践踏革命。我们深信，国际共产主义的优秀人物会支持我们为遵循列宁的教导而进行的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共产党万岁！

国际革命万岁！

一批联共（布）中央委员

一批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

1927 年 10 月

№07550

托洛茨基：反提纲

（1927年10月）

八、我们困难的根源

第一个出路是反对派提出的必须向占农村10%的殷实的富农户借粮1.5亿～2亿普特。

（6）**选拔人员**问题（自下而上）和我们之间不正确的相互关系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是财政问题。选拔工作做得越糟，需要的资金越多。官僚主义制度阻碍正确地选拔和建立正常的关系。

（7）经济领导工作中的**尾巴主义**实际上意味着损失几千万卢布，这是对缺乏预见、互不协调、舍本逐末和落后的罚金。例如，在很大程度上因缺乏预见和没有计划而引起的我国工商企业以及其他企业工人的盲目流动一项，就使国营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据初步估算，约有5亿卢布。（1927年8月2日《工商报》第173号）

十一、在农民问题上对列宁主义的修正

其次是形成富农会很好地长入社会主义这种使人麻痹的理论。“富农和富农组织反正将走投无路，因为在我国，总的发展范围是由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所预先规定了的。”（布哈林的《到社会主义之

路》第 49 页）

“实际上，在工业品匮乏的情况下，好收成可能意味着把粮食更多地用于制作私酒和加重城市里的排队现象。从政治上说，这将意味着农民进行反对对外贸易垄断，即反对社会主义工业的斗争。”（1926 年 4 月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托洛茨基同志对李可夫同志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案）第 164 页）

事实证明反对派的担心并非多余。斯大林同志企图歪曲提出警告的用意，用庸俗的嘲讽敷衍了事。

斯大林同志说：“看来托洛茨基同志的出发点是，我国的工业化要经过某种所谓‘不好的收成’来实现。”（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会议速记报告第 459 页）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同样令人信服和更为重要的标准，这就是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既然国民经济确实在增长（这话不错），既然社会主义的积累确实比私人积累增长得快（中央委员会不顾事实地这样说），那就叫人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最近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恶化了，为什么最近签订的集体合同成了尖锐磨擦和激烈斗争的焦点。任何一个工人都无法理解社会主义成分对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成分的这种“优势”，在这种“优势”下，非无产阶级阶层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工人的这种实际的、现实的标准与理论标准完全相符，也是对中央委员会表面和形式上的乐观态度的驳斥。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10 月

№07551

希望听取反对派意见的工人名单

（1927年10～11月）

压力计工厂钳工车间工人非常希望听反对派领袖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或拉狄克的讲话。

[以下为23人签名。]

希望听反对派（托洛茨基、拉狄克、季诺维也夫）讲话的非党同志的名单。

[以下为55人签名。]

希望听取反对派方面的意见的工人名单。

[以下为29人签名。]

致列·达·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同志：

我们莫斯科服装总厂“红色防线”二厂的工人请您参加俱乐部组织的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晚会，并请您亲自讲述当年十月革命的情况。①

地址：苏舍沃大街27号，“十月革命”俱乐部

签名：[以下为427人签名。]

1927年10～11月

① 在文件的左上角有托洛茨基的笔迹：“8日晚。”

№07552

托洛茨基致伊里奇工厂全体工人大会

（1927 年 11 月 1 日）

尊敬的同志们：

贵厂 250 名工人同志联名提出在庆祝十月革命 10 周年的全厂大会上发表讲话的建议我已收到。不用说，我十分愿意向贵厂工人作报告。可惜信上没有定好日期。今天贵厂举行的全厂大会，我在会前一小时才偶然听说。非常抱歉，我今天不能作报告，因为我今天的日程均已排满。我愿另定时间作报告，但条件是需事先通知开会的时间。

致真诚的同志的敬礼！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11 月 1 日

№07553

托洛茨基致《争论专页》编辑部

（1927年11月2日）

请将以下短文在《争论专页》上发表：

1.《争论专页》第2号假借我在联席会议上的发言，罗列了许多对我进行谩骂和攻击的言论。然而我照手稿宣读（为避免报纸的歪曲）的那次发言的全文就在《争论专页》编辑部手中。因此不出所料，《争论专页》并不是用以向全党通报反对派的某些观点（两年一次也行），而是用以在两年来对反对派的谩骂之外再加上更为不堪入耳的谩骂。

2.许多同志感到奇怪：甚至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这两个中央机关的成员面对反对派的政治结论为什么、怎么能除了疯狂地谩骂和扔书本、摔杯子（雅罗斯拉夫斯基、什维尔尼克、库比亚克和其他人）之外，竟然别无他法。

这是张皇失措或者惊恐不安的机关权势分子的心态使然。他们把党的代表大会看成是一道障碍，因此就尽可能地往后拖延。他们使代表大会的选举避开了批评和争论。主要的选举已成过去，争论只是走走过场。虽然如此每一句批评都使机关权势分子惶恐不安和暴跳如雷，他们甚至劈头盖脑地大骂起来。于是吹哨的、起哄、主张用拳头教训的人纷纷出笼，代替了党内的思想斗争。《争论专页》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出版的，没有登载反对派的发言和文章，却登载了谩骂反对派的言论。

3.《争论专页》首先宣称只能登载简短的报章体文章。于是，

在沉默两年之后，反对派只能就国内外主要政治问题，也就是说只能就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的主要错误发表简短的报章体文章。

然而实际上我们看到，《争论专页》（例如见第2号）几乎登满了布哈林、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和扬松的讲话稿以及许多谩骂反对派的言论。最近几年《真理报》的各个栏目不也是完全向这种“争论”开放的吗？那么《争论专页》与普通的《真理报》有什么不同呢？难道其不同就仅仅是对反对派的攻击和谩骂更加无所顾忌吗？

4. 列宁在自己的遗嘱中主张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职位上撤下来时，提出的理由是斯大林行为粗暴，不忠顺，爱滥用权力。不忠顺用俄语来说就是心存不良，侵犯他人权利和不诚实。《争论专页》正是列宁对斯大林所作鉴定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明。所以，列宁的遗嘱也像反对派的文章、讲话和提纲一样被向党隐瞒起来，这不难理解。在搜查共产党人时将列宁的遗嘱同反对派的行动纲领一起没收走。

5. 有的同志会说：两年来未受惊忧的惶恐不安的机关权势分子在会议期间因一时激动破口大骂和乱扔东西，这还可以理解；但是为什么事后《真理报》要对此加以报道呢？

原因很简单：这是指导全党如何进行争论的方式。在一些只有积极分子参加的范围的会议上，即在机关权势派的秘密会议上，书记们教大家如何在会上起哄，如何吹口哨，如何推挤，等等。但是看来《真理报》编辑部是认为，顶好是表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是怎样做的。这是最高级的指导形式。然而机关权势分子还一再说：“对不起，反对派有充分的机会发表意见。”

这样一来还有必要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工人党员集中在私人住宅里交换关于党内状况的意见吗？

6. 监察委员会的代表越来越多地光顾这些私下里进行的常有

反对者发言的党员聚会，他们有时敲桌子，有时发出威胁。监察委员会的同志常说："你们为什么搞'非法'集会？为什么不参加一般的争论？为什么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不向《争论专页》投稿？"如此等等。

《争论专页》第2号是对所有这些非正常现象的最好的解释。只要争论不能正常地进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党员去私人住宅参加党员聚会。《争论专页》第2号说明，离正常进行争论还十分遥远。

7.《争论专页》编辑部还有我的下列文章：《论我国对世界市场的依附性》、《正确的道路》、《中国革命和斯大林同志的提纲》、《陈独秀谈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难道还不该清醒吗?》、《汉口与莫斯科》、《该明白了，该是重新考虑的时候了》、《论全俄五金工人联合会的决议》、《坏和平总比好争吵好》、《关于克列孟梭的提纲》、《期待什么，又得到了什么（英俄委员会的平衡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引向何处?》、《争论是怎样进行的》、《论我国对中国的政策问题》、《论对十月革命史、革命史和党史的伪造》。

此外编辑部还有我在历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以及我在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讲话。

8.我认为首先必须刊登我写给党史委员会的信[①]。这封信揭露了杜撰所谓"托洛茨基主义"（以便于破坏列宁主义的革命基础）的情况。我给党史委员会的信几乎全由文件即信件和引文组成。我引用了斯大林、雅罗斯拉夫斯基、古谢夫、拉斯科尔尼科夫和其他同志前不久在关于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义问题上发表的与现在截然相反的意见。我还在这封信中多处引用了列宁的文章和列宁在晚年写给我的8封信。这些文献驳斥了到处散布的关于我对列宁的态度和列宁对我的态度的那些流言蜚语。我在信中还直接而准确地引

① 发表在1932年于柏林出版的《斯大林伪造学派》一书。

用了一些为了迷惑党而对全党隐瞒起来的最重要的党内文件。我要求首先发表这封信。

9. 我真希望能将这封信刊登在《争论专页》第 6 号上。不过我对此并没有信心。因此，一旦《争论专页》拒绝刊登这封信，我将请同志们尽可能广泛地散发这封信，在一切可能的场合，在党的会议上宣读这封信，相互转抄和传递这封信。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11 月 2 日

№07554

托洛茨基：关于争论中的发言

（1927年11月2日）

1. 行动纲领的重大意义在于，指出了意见分歧的阶级根源，详细分析了党内制度，认为这是阶级的政治演变的结果，即党的领导逐渐由无产阶级路线滑向小资产阶级路线的结果。可见，正在进行的斗争关系到党的阶级性质和国家的阶级性质。

2. 只有这样公开而明确地提出主要问题，才能向普通的工人党员说明斗争的尖锐性，使他们认识到斗争的必要性。纯粹形式主义地提出“党内制度”、“纪律”等问题，与革命路线脱节，是同布尔维主义根本抵触的。处处违反党章的机关竭力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表面化的纪律或者说上下级关系问题。广大党员群众越不明白分歧的意义及其深度，机关就越能得逞。

3. 因此任何回避严重分歧的圆滑的发言都对反对派有害无益。党员听了这种无论口气和性质都更像是自我表白而不像谴责的讲话必然要发出疑问：“值得为这些并不重要的分歧惊动全党吗？”

4. 某些同志担心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会使那些持缓冲态度的人与我们疏远。这种担心是任何党内重大斗争中都会经常出现的“经典性”错误。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错误尤其不可原谅，因为它已经经过实践的检验。我们有些倍受尊敬的党员发表了起缓冲作用的讲话。但是这样的发言只获得极少数人的赞同。相反，反对派越是公开、坚决和明确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就越能赢得更多的票数。只要口气稍一变软，稍有缓和，必将削弱我们的力量，促使敌人加

倍地进攻。

5. 斯大林—莫洛托夫集团企图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来“吓倒”反对派，据说代表大会将宣布承认反对派的行动纲领与党员身份不相容。

这项决定意在通过颠倒是非的代表大会在组织上施加压力，以引起一种政治上的自弃，即叛变。不用说，任何一个严肃、正直的共产党员都不会选择这条道路。即使斯大林派的积极分子以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名义作出这种对党极其有害的决定，也不难预料，这一决定的实施将会遇到巨大的和越来越大的障碍，而且可能使党内的反对派得到加强（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

6. 距离代表大会结束大约还有一个半月。反对派的队伍尽管较为缓慢、却是在发展壮大，只要我们实行一条坚定不移的进攻路线，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我们将得到大大的加强。每个支部中的反对派小组将得到相当大一部分党员的同情和半同情。在这种情况下将反对派一批接一批地（首先是工人支部）开除出党的做法必将激起每一个支部中相当大一部分党员的抵制和抗议。广大党员都想知道，为什么要将反对派开除出党。如果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采用开除反对派的做法，那么在代表大会之后关于行动纲领的问题将重新尖锐地提到党的面前。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之前一度受到压抑的争论也将在代表大会之后再度激烈展开。应该努力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

7. 被开除出党的姆拉奇科夫斯基、谢列布里亚科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沙罗夫、萨尔基斯和格林施泰因等同志不会脱离党。即使将几千名反对派分子开除出党也无法中断我们和党的联系，首先是和党的无产阶级部分的联系。

8. 逮捕党员并不能阻止被开除出党的党员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将几千名反对派分子开除出党意味着必定要逮捕几千人。斯大

林和莫洛托夫的政策把党推上了这条道路。党本能地感到这是一条使专政招致毁灭的道路。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再安慰广大党员：不会到这个地步；反对派“会害怕”并屈服于凌驾于党之上的机关权势派别的独断专行（正是这种凌驾于党之上的机关的独断专行，现在被称之为党的纪律）。

显然，只要讲话的口气稍一变软便会被机关权势分子解释成反对派的退缩，解释成斯大林施加组织压力的政策的正确性得到证实。

可见，政治上进攻的路线不仅是反对派在组织上自我保护的锐利武器，而且是使党的统一免受斯大林蓄意分裂路线破坏的惟一手段。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2日

№07555

托洛茨基致租让总委员会联共（布）支部书记

（1927 年 11 月 3 日）

尊敬的同志：

据我所知，在对关于安杰依钦同志的决议进行表决时，支部认为无法把我的一票计算在内。在这个问题上支部可能是对的。支部有权不计算缺席同志的票，对此我绝不会提出异议。不过请允许我通过这个书面声明表示赞成多数同志的意见，支持安杰依钦同志提出由上级检查机关重新审理他的案子的请求。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11 月 3 日

№07556

托洛茨基致《争论专页》编辑部

（1927年11月3日）

受季诺维也夫同志委托，兹向《争论专页》寄上《我们的意见分歧和非党工人》[①] 一文。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3日

① 见本集文件№07557。

№07557

季诺维也夫：我们的意见分歧和非党工人

（1927 年 11 月 3 日）

斯大林一伙早已将我们党内的争论弄到街头上去了。新经济政策下的资产阶级街头兴致勃勃地在玩味着斯大林的手法，对他表示支持。

广大非党工人群众日益关注我们的意见分歧，也日益渴望了解真实情况，首先想了解反对派的要求是什么。

这是阶级对工人政党内发生的事情的正确合理的兴趣。

斯大林、乌格拉诺夫、马列茨基及其同伙竭力用轰动一时的消息和反对派同“弗兰格尔分子有联系”的卑鄙谎言来掩盖关于阶级路线的争论。

但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根本利益要求让工人群众了解真相、倾听双方的意见、了解如列宁遗嘱之类的至关重要的文件。

在莫斯科的巴斯卡科夫工厂出了一件事。在一次有关全厂 11 月 7 日庆祝活动筹备组会议上，厂长（党员）建议制作一幅打倒反对派的专题的宣传画。

这时一名筹备组成员（非党老工人）站起来严词抗议这种做法，他说工人们反对这样做，他们是不会跟在这幅宣传画后面走的。厂长的提议遭到否决。另外莫斯科委员会机关也在召集“范围很小的积极分子”开会（即斯大林分子的派别会议），这些会上直截了当地讲，委员会应该与党外群众达成协议，以便把 11 月 7 日的游行变成反对反对派的游行。例如波隆斯基（罗戈日－西蒙诺沃

区委书记）10月31日就召集了这样的会议。

在中央委员会公布的“口号”中也存在这方面的“提法”。

毫无疑问，“哨子帮”将被启用。斯大林和乌格拉诺夫之流将使出浑身解数把伟大无产阶级革命10周年的纪念活动变成一场闹剧。

吹口哨，起哄戏弄，向反对派的发言者扔杯子，把成百上千的人开除出党、从工厂除名，以至对共产党人的搜查和逮捕，这就是斯大林和乌格拉诺夫一伙“领导”们所使用的方法。

他们公开指责我们这些拥护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反对派）与非党工人来往。公开宣布这是对党的犯罪。

斯大林之流每天都在各家报纸上往反对派身上泼脏水，报纸可是人人都有的，党外群众也不例外。在大小会议上，在城市和农村，机关权势分子总想诽谤反对派。此外，反对派工人只要向车间同事、非党工人说明反对派在维护列宁的事业，而所谓与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有联系”之类的无耻谎言均系政治破产者一手炮制，那他就会被开除出党。

我们反对派赞成党内争论只在党内进行，当然是用不着哨子帮，也不用堵谁的嘴。**可斯大林派连这个也不许。**[①]

在列宁时代我们曾吸收非党工人参加清党，尽管清党是党内的事情。我们对非党工人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们召唤他们加入我们的党。明天他们就会成为党员。明天他们将同我们一起为列宁主义，为改正党的路线而斗争。

我们现在争论的问题是：及时增加工资；工厂里的压制；为食品排队；富农和私人企业主增加；如何与官僚作斗争；与失业现象作斗争的措施；承认债务；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苏联如何更好地

① 黑体是托洛茨基用的。

组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防。这些都是涉及到每个工人、所有非党工人、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

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非党工人的基本群众已开始关心我们的争论，开始明白反对派是对的。

1927 年 10 月 17 日列宁格勒工人举行的游行示威表明工人群众对反对派极为同情。

这是两年的主要结果：整个工人阶级开始关心机关权势分子与反对派的争论，他们看到反对派是对的，便开始支持反对派。这就保证了布尔什维主义必胜，保证了斯大林派的失败和错误不致毁掉革命，保证了列宁缔造的党保持统一。

我们坚信，工人们会坚决制止试图歪曲工人节日的意义的机关权势分子和哨子帮；他们会采取列宁格勒工人 1927 年 10 月 17 日的那种方式；他们将支持联共（布）团结的口号；他们将反对分裂、搜查、逮捕、压制讲话、吹口哨和起哄；他们会支持我们提出的把斯大林封锁的列宁遗嘱公之于众的要求。

格·季诺维也夫

1927 年 11 月 3 日

№07558

拉柯夫斯基致《争论专页》编辑部

（1927年11月3日）

现寄上发言稿一篇[①]，请在《争论专页》上发表。

致同志的敬礼！

克·拉柯夫斯基

1927年11月3日

① 见本集文件№07559。

№07559

拉柯夫斯基：反对派和第三势力

（未能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会上发表的发言稿）[①]

（1927 年 11 月 3 日）

同志们，我愿意遵循布哈林同志呼吁全会采取冷静态度的忠告，尽管遗憾的是多数派并未听从他的忠告，他们继续把反对派发言人从讲台上拽下来，继续使用一些缺乏说服力的论据，在用订成册的大部头书砸过之后，又向发言人投掷水杯。我打算在讨论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问题时尽量保持冷静和平静的态度。

在十月革命将满 10 周年之际，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拟订了一份将我党两位最著名的活动家、列宁的两位亲密助手从我们的队伍中开除出去的提案。这种情况不会像普通事件那样轻易地过去。无论怎样给党员做工作，无论怎样使党员对这个结局做好思想准备，只要这个提案一通过，它就是对全党的沉重打击。

我曾急切地期待负责同志、多数派领导人的发言，我也聚精会神地听取这些发言，不插一句话，不放过一个意思。我期待听到他们的论据。我必须弄清楚，属于多数派的党的领导者、政治局委员、全会参加者是否问过自己，大批党员被开除出党，真正的和最

① 此稿是我准备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就将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发言的提要。由于轮到我发言时会议辩论终止了，于是我只得将发言提要发表在《争论专页》上，以通告全党。——拉柯夫斯基注

忠诚的列宁主义者被逮捕，甚至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一切对国内外的阶级关系会有什么影响，这是否会对加强党的队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苏维埃政权、扩大和加深共产国际的影响有所助益？

每一位中央委员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我原以为这个问题会提出来，于是便聚精会神地期待会有人来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怎么一回事？假如某位党外人士列席我们这里的辩论，那么他会因主张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论据之贫乏（说得不客气点儿）而大吃一惊。论据中对国内外局势稍加分析了吗？考虑到阶级斗争了吗？根本没有。所有的论据都归结到一点，那就是全部发言者，包括讲10分钟的，讲上几个小时的，都以不同的方式举出同一个理由：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违反了党的纪律；他们不顾历次中央全会的多次警告，我行我素，因此应予开除。据说这是维护党的统一的利益的需要。

同志们，老实说，这就是多数派发言者一天内发言的主要内容。少数派发言者中有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他们发表了意见，但是他们处在被告的地位，对穆拉洛夫同志和对他们两位一样，都不让把话说完。只有多数派的发言者在讲话。

不能把斯大林同志在会上指出的事情作为开除托洛茨基的理由。例如他说托洛茨基1904年出版的小册子是献给“亲爱的老师帕·波·阿克雪里罗得[①]”的。我不知道斯大林同志是忘记了还是不知道列宁也称阿克雪里罗得为“亲爱的老师”，而且比托洛茨基还稍早些。也不应把所有这类胡说以及所有这些伪造的和真实的传记材料作为理由，这些材料在这里大量引用，却受到有理有据的来自

① 阿克雪里罗得，帕·波·（1850～1928）——19世纪70年代为民粹派分子，1883能参与创建劳动解放社。后为孟什维克领袖之一。

反对派方面的理论批驳。当然，我明白为什么反复提到有关纪律的理由。广大党员群众和同情党的党外群众更易接受和理解这些理由。举出这些理由也更容易激起人们对反对派的仇视和愤恨。党不知道谁是有计划地违反党章、党纪和党的统一的首要责任者。多数年轻党员们倾向于把党的现行制度看做是正常的制度，把任何偏离（不是对党章的偏离，而是对畸变的党内制度的偏离）都当成是违反党章，违反党的纪律和统一。

但是在我们争论的如此关键时刻应当以党的利益、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为重。大家刚才听到的那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冷漠无情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并非党、无产阶级、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国际为章程而存在，章程的存在是为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能够实现自己的阶级任务。列宁曾不止一次地指出，关于同政治路线和革命实践无关的革命纪律的议论是“空喊”，是“空话”。

在我们明显地感到由于存在着党的错误制度，革命的列宁的党正面临着危险的时候，在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由于实行不正确的内外政策，无产阶级专政正面临危险的时候，章程，即使是真正的章程，而不是我们的机关所提的那种章程，自然尚未失去力量，但已退居次要地位。

布哈林同志曾经提到“第三种力量”。他似乎想越过这个官僚主义的形式主义的魔圈，关于将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争论就塞进了这个魔圈。然而对布哈林同志来说，这“第三种力量”就是一些曾疯狂地仿效皮尔苏茨基的冒险分子和前高尔察克分子以及社会革命党人。这不过是饮茶时的空谈呢，还是某个组织初露端倪？以后的侦查会作出结论。不过这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我要谈明仁斯基同志的报告，那首先是为了指责布哈林同志，他对于竭力使反对派卷入这个与它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

或间接关系的案件的不能容忍的卑鄙的手段竟从未表示反对；其次是为了指责布哈林同志，他把对于我国革命今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重大问题——关于“第三种力量”的问题和我们对待“第三种力量”的态度问题归结为只配放在我们报刊最后一页的司法杂谈的栏目里。

这里，托洛茨基同志和季诺维也夫同志已经指出，明仁斯基同志的报告出现在讨论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问题的时刻真是奇怪，另一方面，反对派关于对“弗兰格尔手下军官”问题进行专门辩论的提议又遭否决，而且掀起了轩然大波。

有什么必要恰恰在今天，在讨论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问题时用长达一小时的时间宣读“阴谋事件”参与者的供词，而这些供词证明这个事件与反对派的斗争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我不禁想起去年用法文出版的一本书，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对这本书特别感兴趣，他建议大家都来读一读。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勒特尔的法国人。书名为《罗伯斯比尔和圣母》。该书是根据档案材料编写的。书的主要内容是：当议会中的右派开始准备推翻罗伯斯比尔时，以罗伯斯比尔的政敌为首的“社会保安委员会”开始挖空心思地收集有关一个自命为“圣母”的半疯半傻的老妇人的一切材料。这位老妇人曾接待过神智学者和招魂术者。她曾经与罗伯斯比尔有过纯系偶然和非直接的关系，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罗伯斯比尔曾应某人的请求使她免受斩首的极刑。看来罗伯斯比尔还从未见过这个老妇人。然而罗伯斯比尔的政敌却根据这种胡言乱语拟订了一份针对他的起诉书，就像起诉一名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利用这一材料是为了指控议会中的左派领袖参与了反对宪法的阴谋。

难道历史应该这样丝毫不差地重复吗？我相信，与“弗兰格尔手下军官”有关的阴谋必然适得其反。

我们再回到“第三种力量”这个问题上来。

处心积虑地利用我们党内分歧、我的内忧外患和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以及城市失业增加的“第三种力量”是什么货色，我们都很清楚。无须为此用一小时的时间向我们宣读关于存在阴谋或有阴谋动机的证词，这种阴谋在苏维埃政权存在初期屡见不鲜，大概在我们摆脱资产阶级包围和国内反革命势力骚扰之前也还是少不了。我们感到困难的并不是同这些冒险家的斗争。使我们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的并不是这些事实。

还有另外一些事实说明存在真正的第三种力量，存在着富农、官僚和在新经济政策下的资产阶级，存在着国际资本主义，证明国际资本主义正欲插手我们的意见分歧，扩大分歧，在共产党人和工人之间、在工人和农民之间、从上到下制造分裂。这第三种力量指靠什么人呢？本应该谈谈这个问题，而布哈林同志关于第三种力量——这种反动的和可怕的力量，竟只字未提。我想比较详细地谈谈这种力量。

不过我必须事先作一保留。我不仅对关于我们党内有这样那样的集团的说法不承担责任，而且我还要明确地说，对这些集团的意图所作的解释是我们阶级敌人的主观评价。而且那样的评价对我们来讲是极其危险的。即使在被认作多数派的意图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时候，党内进行的斗争几乎毫无例外地被国外看做是党内的革命派（反对派）同温和派（多数派）之间的斗争，这种情况增强了我们的敌人进攻我们的决心。

让我们看看一位与美国统治集团的首要人物塞弗关系密切的美国知名人士艾维·李·对我们党内关系的评价。他这样写道：“有一个以斯大林、李可夫和契切林为首的温和派，他们认为俄国应当首先发展自己的社会政治经济，认为可以通过与拥有世界主要金融来源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正常的关系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温和派相信，至少目前必须放弃世界革命的理论……以托洛茨基、季诺维

也夫、拉狄克和加米涅夫等人为首的一派已失去了权力……这个共产党左翼的基本观点是，要竭尽全力地不断推进世界革命，第三国际及其所从事的一切暴力活动和秘密工作应当在其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努力中得到支持。

我怀疑有哪位俄国要人愿意证实上述革命理论真正代表了某一位共产党领袖的观点。当然，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仍在高喊‘打倒资本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红军万岁！’……虽然俄国政府的某些领袖还在老调重弹，可实际上他们在自己的日常工作中正在逐步使自己的行为适应现有的情况。”

这就是艾维·李·笔下的结论，与他持同样看法的还有几十位乃至几百位各国资产阶级最具权威的政治家。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实际结论呢？我们的敌人在说些什么呢？先说债务问题。资本家们说，不要匆匆忙忙地取消债务问题。时间对我们有利，布尔什维克迫于无情的经济现状的压力并在摆脱“左派”的批评之后将逐步地向我们作出昨天和今天他们还拒绝作出的让步。他们将不得不承认债务，并且将来他们支付的款额会更多，比他们现在准备支付的数额还多。

我并不是认为政治局有人打算承认债务，但是那种因我们自己的疏忽和错误而造成的我们软弱无力的概念，会使我们的敌人敢于更加苛刻、更加厚颜无耻。

我想仅以我们国际政策方面的事实为例。我们最近与法国的纠纷就是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世界帝国主义把赌注下在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温和态度上，向我们发起挑战，而且最主要的是他们竟然能得手。

我事先声明，我不准备在这里讲述这起纠纷的经过。我只想指出这个事件的一个方面。巴黎掀起的反对苏联全权代表的风波事出有因，这就是拉柯夫斯基无法得到本国政府的保护，因为他属于反

对派。这种看法使要求召回全权代表的法国报刊极为放肆无礼，寸步不让，终于迫使苏联政府召回自己的全权代表，尽管法国政府早在9月4日即宣布有关拉柯夫斯基的事件已经结束。

为证明这一点我再为大家举几个例证。

在这里援引领导反对我的那场运动的《晨报》的几条口号，对于说明我们的阶级敌人的心态还是很有意义的。例如：“对苏维埃只有一种武器——强硬的态度，只有一种行动路线——镇压”，不幸的是敌方的强硬态度表现得淋漓尽致，而我们却缺乏这种态度。

下面我就来谈事实。

9月6日白里安[①] 对《埃夫勒报》记者巴尔特发表如下看法：“拉柯夫斯基属于俄国共产党的少数派，所以也许多数派会很幸运地利用这个机会将他召回。”

值得一提的是，在纠纷的这个阶段白里安声称，法国政府对契切林在法国报刊上发表指责拉柯夫斯基的声明表示满意，他还说关于拉柯夫斯基继续在巴黎留任的问题现在由莫斯科自行决定。

所有资产阶级报刊（左派除外）都与白里安一唱一和：“被本国政府取消代表资格（受到谴责）的大使不能继续留任。”

法国政府在其大概在10月4日发出的最后一份照会中指出：“召回拉柯夫斯基是宣布取消他代表资格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11月17日《自由者报》发表一篇该报主编、议员尤热·洛季叶署名的文章，文章说：“拉柯夫斯基事件特别令人想起驻巴黎的德国大使拉多林公爵事件。德国首相毕洛夫公爵对本国的大使采取了听其自然的态度，因为他不喜欢拉多林，以致拉多林不得不离开巴黎，现在契切林对拉柯夫斯基也采取了顺其自然的态度，真是如

① 白里安，阿·（1862～1932）——法国政治家、律师。1909～1931年先后11次出任法国总理，17次任外交部长。

出一辙。”

我在这里还可以援引许多法国报刊上发表的声明，例如《晨报》的声明：“拉柯夫斯基在巴黎不受欢迎，如同在莫斯科不受欢迎一样。”不过我不想占用你们的时间。

在这里我只是引用了法国报刊上每个人都可以去核对的内容。而且我引用的不过是法国报刊宣传的百分之一，或者也许是千分之一。不过除此而外我可以向你们通报更明确的、政治上更具权威性的法国部长们和领导人的声明。这些声明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假如苏联政府没有以其行动向我们暗示苏联政府并不反对把拉柯夫斯基从法国召回的想法的话，我们也就不会坚持召回拉柯夫斯基了。“不能让拉柯夫斯基留任，因为契切林本人不支持他。”

我再补充说说社会党议员穆泰的声明。10月14日他在对社会革命党人报纸《白日》的记者发表谈话时说：“对于拉柯夫斯基事件，我的回答大概会使你们感到惊讶。我个人认为，拉柯夫斯基在那份臭名远扬的声明上签字的全过程是斯大林与反对派斗争的插曲之一……甩开所有的反对派大使对斯大林有利。找到了这样或那样的办法来迫使他们签字。于是便出现麻烦事。余下的情况大家都很清楚了。”①

看来论据并不准确，而且它与我党通常的做法相抵触，众所周知，我们的做法恰恰是把反对派分子作为全权代表派往国外。

不过举出这些实例意在向你们说明我们的敌人在采取行动时怎样地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而这种信心来自一种看法，即因为他们确信，拉柯夫斯基属于少数派，多数派不会保护他。这种信心已通过

① 当10月21日《法兰克福报》发表巴黎通讯时，我的发言稿已写完。巴黎通讯断言，如契切林不囿于党内意见，并对拉柯夫斯基给予协助，拉柯夫斯基就不会被从巴黎召回。——拉柯夫斯基注

外交人民委员部和政治局对自己驻巴黎代表所持的消积态度得到初步证实。

回到关于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的问题上，我向你们声明：同志们，你们在对这种开除要负起责任的时候，应该知道，你们现在正在签署日后必须向帝国主义兑现的期票。

最近法国与苏联发生纠纷的历史作用在于，以政治局认为是惟一符合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原则为基础的谈判失败了。现在法国政府将提出另外的要求。以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宣布承认我国为开端的四年时期结束了。在这个时期我们曾经认为我们能够与资本主义国家达成协议（当然是暂时的，因为谁也没有认为能够同他们建立牢固的联合），当然是“平等相待”。现在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只有在我们作出让步的条件下才能达成协议的新时期。

只有坚决地改变党的总方针，才能使业已形成的局面变得有利于我们。而现在只是对反对派表现出毫不留情的态度，对假朋友搞妥协，对帝国主义分子则是动摇和犹豫。我们必须采取哪些措施呢？必须在革命的基础上恢复党的真正统一，结成统一战线，同反对派一起给厚颜无耻的敌人以坚决的回击。

同志们，你们看，把党内的分歧问题归结为破坏党的纪律问题是多么地幼稚，多么不合适，多么不符合布尔什维主义。我知道有这样一些机关权力的拥护者，他们断言，无疑也相信自己的论断：只要能甩掉左翼，堵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中央委员的嘴巴，把反对派分子清除出党，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人投入监狱，党便会因此而得到加强。这纯属自欺欺人。机关战胜了党且自以为强大到了极点，我们的阶级敌人正是把这样的时刻看做是打击苏联的最有利时机。共产党如果不再就内外政策的重大问题进行自由讨论，当然是在真正的党章范围内进行的讨论，那么这样的党便不能保持自己对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作用。

如果党的领导者和政治局仍然认为在国内外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不依靠自觉的党员而是依靠机关权势分子就能够领导一个伟大的革命国家，我真可怜他们。我真可怜这些同志，他们依靠的都是一些只能充当领导者的影子、只会按照宣传鼓动部门吩咐随声附和的人。这样领导国家不行！

你们讲统一。当然，没有统一我们会丧失政权。在一个工业无产阶级相对于全体居民只占少数的国家，在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搞两个党那就等于事先使革命必遭失败。

造成这种局面是谁的过错？你们把全部过错都推到反对派身上。我要对你们说，假使在你们的领导中没有其他的错误，只是犯了把列宁最亲密的助手排挤出政治局、随后又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把老布尔什维克中最优秀、最忠实的同志开除出党这条错误，那也应该受到蹩脚领导人所受的那种谴责。

你们能否回头，不再走那条毁灭之路呢？你们过分沉湎于自己的憎恶、自己的成见、自己理论与实践上的失策。纠正领导人的错误只有靠党自己。

克·拉柯夫斯基

№07560

就反提纲致列·加米涅夫

（1927 年 11 月 4 日）

托洛茨基同志建议对反提纲作如下补充（对最后“何处筹资”一节中关于因为经济缺乏预见性等而付出巨额罚金一条）：

“据测算，仅因我国工商业和其他企业工作人员的流动性一项，国有经济就要支出将近 5 亿卢布，而这种流动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预见性和无计划性引起的。”（《工商报》1927 年 8 月 2 日第 173 号，切卡季洛的文章）

1927 年 11 月 4 日

№07561

季诺维也夫致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和伊·捷·斯米尔加

（1927年11月4日）

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已于昨日将所提供的文件交给这里的负责人，请您自己将文件副本送交中央委员会。总之，认为需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记述得如同照片一样准确。所有材料说明，这种不成体统的事对我们的事业将大有裨益。

您那边的情况如何？甚念。

我们这里结合搞得很好。大转折对我们有利。我们暂时不准备离开这里。对此您有何看法，请告。

您必须尽快交出有关经济工作的提纲。

我想很可能明天斯大林将作出令大家极为扫兴的“解释”。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告诉公众。请您也采取措施。

致热烈的敬礼！

您的　格·季诺维也夫[①]

1927年11月4日

格里［戈里］·叶夫［谢耶维奇］要求补充两点：

① 这是季诺维也夫的秘书格林贝格所写。但季诺维也夫写上了以大写字母开头的“您”。

1．不是最后的文本。

2．如有修改，最终修改意见将用电话传送。

格林贝特

№07562

穆拉洛夫等三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

（1927年11月7日）

我们认为，在逍遥法外的官僚主义集团的无耻行径尚未被世界无产阶级了解之前，有必要立即把所发生的事件简要记录在案。

正当我们和托洛茨基同志沿着市区驱车行进，向工人队伍致敬时，少数人，确切地说是一小撮经过专门训练的配有哨子的破坏分子，企图激起游行队伍的愤怒，导致斗殴。只是由于工人们针锋相对地反对这一小撮人名符其实的法西斯行径，他们才未能得逞。

在谢苗诺夫大街，民警和军人（在布琼尼、齐洪等人眼皮下）在我们背后开枪射击（看样子是朝天开枪）。我们将车停了下来。一伙法西斯分子（5个人）粗野地叫骂着奔向汽车，砸坏喇叭，打碎车灯玻璃。警察甚至没有过来看看汽车。为什么尾随我们开枪，始终没有弄清楚。

后来我们驶抵联共（布）中央委员斯米尔加同志的住宅。这里一大早就在窗户的上方挂上了“实现列宁遗嘱”的宣传画和带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及托洛茨基肖像的红色旗幅。斯米尔加同志的妻子是个党员，她将一些陌生人拒之门外，这帮人企图把带有号召实现列宁遗嘱和带有列宁、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肖像的“犯罪的”旗幅扯下来。这些专门派来的人企图用钩子从房顶上扯下旗幅。楼里的妇女手持地板刷以其英勇的行动来阻止他们。我们进楼后，摘取宣传画的行动更加凶狠，这使克里姆林宫、车库和共产国际大楼之

间的广场上聚集许多游行示威者。同大街上的游行队伍一样，绝大多数人对摘取宣传画的愚蠢而无耻的举动感到无比气愤。

聚集在这里的游行示威者向阻止摘掉列宁宣传画的同志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最明显不过地表达了他们的情绪。但是这并未能制止失去理智的机关权势分子的行动，他们得到了一小撮哨子帮的支持。事情是这样收场的，有15到20名中央委员会学校的指挥员和军事学院的学员砸开了斯米尔加同志的房门，他们将门砸碎，闯进屋内。很显然，他们所表现的愤慨是经过严格组织的，他们的暴行不仅受到当局的纵容而且受到当局的公开鼓励。这时从上面抛下的一个铁钩钩住了列宁的画像，把画像撕成几块。被撕碎的还有“犯罪地”提到列宁遗嘱的宣传画。闯进屋里的军人把撕坏了的列宁肖像的旗幅作为“战利品”拿走了。地板上留下了木板、碎片、铁钩、碎玻璃、摔坏的电话等，算是纪念十月革命的英勇行为的证据。广场上一大群人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在斯米尔加同志家窗户周围发生的一切。我们中的某个人在窗前一露面，便有几十人，有时是几百人吹起哨子，几千人欢呼鼓掌。就领导和组织与反对派斗争的人而言，从周年纪念的角度来看，从执政派的利益出发，再没有比这更无耻、更不成体统、更愚蠢的行动了。

我们在这里通报的只是发生在各地区的包括巴黎饭店周围的事件的百分之一。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同志从饭店的一个阳台上与游行队伍互致敬意，此后即遭到有组织的法西斯式的袭击。所有这些事件都已记录下来。将对其进行详细的调查。全世界无产阶级必将知道这一切，就像今天全莫斯科的工人已经知道，明天全苏联的劳动者都会知道一样。

每一个诚实的工人都会发出疑问：极少数人“何以”对我们有这样丧心病狂、愚蠢和无耻的怨恨？他们在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采用袭击和大肆破坏的手段更加明目张胆地与绝大多数劳动群众

为敌。

我国和全世界的工人都非常想了解反对派的观点，正是由于这些观点反对派不断遭到来自机关的上层官僚的如此迫害。

每个人都会发出疑问，为什么在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不允许出现提到列宁遗嘱的宣传画和列宁亲密助手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的肖像呢？

这种最明显不过地暴露出思想上软弱无力的恶毒攻击只会有利于我们的政治纲领。支持我们的人数将不可遏止地日益增加。

我们在中央委员斯米尔加同志遭到破坏的住宅里给你们写这份简短的报告。我们的任务是立即确认你们每个人以及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对所发生的事件应负的责任。每一个莫斯科的党员都知道，法西斯集团得到了各区委书记的指示，所有这一切令人鄙视的行动的中心是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作为驯服的和可以应付一切的工具。大家都很清楚，你们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没有上面直接下达的命令，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事关党的命运、革命的命运和工人国家的命运。党将会作出裁决。工人阶级将会作出裁决。我们对会作出裁决毫不怀疑。

穆拉洛夫

斯米尔加

加米涅夫

1927年11月7日

№07563

托洛茨基：口头左转之后大步右转

（周年庆祝总结）

（1927 年 11 月 8 日）

1．斯大林派进行的整个“争论”，即对反对派的迫害至今是在“党的统一”的口号下进行的。现在斯大林分子正在失去这个口号。越来越多的党员这样谈论党的统一：“不要迫害反对派，不要动用哨子帮，不要开除和逮捕共产党人。”

机关权势分子抛弃“拥护联共（布）的统一”的宣传画。这个口号已成为反对派的口号。

2．11 月 7 日反对派提出这样的口号：“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分裂，拥护列宁党的统一。”在斯大林把持的机关的指使下，带有这种口号的反对派的宣传品均被销毁。举着这种标语牌的工人惨遭毒打。这是可想而知的，“反对机会主义”就是反对斯大林。“反对分裂”，这不是反对斯大林又是反对谁呢？“拥护列宁党的统一”，这显然是对斯大林的攻击。

3．“拥护列宁的联共（布）中央”。莫斯科的机关权势分子也拒绝将这个口号作为游行口号。他们说：“人们会把拥护列宁的联共（布）中央理解成是拥护列宁生前的那个中央。”对！斯大林分子需要的是斯大林的中央，而不是列宁的中央。

4．反对派打出了写有“向右开火，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这类口号的标语牌。但是标语被撕毁。抬标语牌的工人遭到毒打。仅此一事就彻底暴露了现任党的领导集团的真实路线。人们常常问

我们这些反对派，你们认为什么是热月的危险？我们的回答简单明了。当布尔什维克因为要求向右开火——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而遭毒打时，热月的危险就显而易见了。那些打手，那些策划者，那些策划毒打的人，都是热月分子或是姑息纵容者。

5．在周年庆祝宣言和官方发言人的发言中都谈到必须强化对富农和耐普曼的打击。按照布哈林的说法，这在两年前尚不合时宜。而现在，庆祝10周年之际正是时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1927年11月7日要捣毁那些要求将斗争矛头指向富农、耐普曼和官僚的标语牌呢？对这些事实进行的对比彻底揭露了现任领导集团的政策。斯大林和布哈林在口头上宣布向资产阶级分子施加压力。反对派却想将这一行动付诸实施。因此斯大林和布哈林之流对反对派施加压力。

6．“实现列宁遗嘱。”这是可恨的反对派的标语牌中的一种，这种标语牌被夺走，用铁钩从墙上扯下，又在众目睽睽之下销毁。列宁遗嘱在实际中表现得越明显，机关权势分子对列宁遗嘱的仇视就越疯狂。在许多会议上，特别是在一些个别谈话中，怀恨在心的斯大林分子公然说，列宁是在病态中写下自己的遗嘱的。这是机关权势分子与列宁斗争的最后的论据。他们只是忘记了遗嘱大概正是在1922年12月25日至1923年1月4日这个时期写的，在此期间列宁撰写了《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论合作社》（1923年3月26日[①]）、《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1923年1月23日）等几篇文章。全党都知道，这几篇文章最出色地体现了列宁思想的强大力量。斯大林和布哈林还试图根据断章取义地摘自《论合作社》一文中的一话来建立自己的一国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理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恶毒攻击列宁的遗嘱是病态思维的

① 原文如此。实际上此文写于1923年1月4日和6日。

结果，几乎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文件。

7. 反对派领导者的肖像早已被严厉查禁。在商店里几乎无法买到这些肖像。悬挂这些肖像等于是违法行为。但是在许多地方反对派分子自觉地冒着危险在街上悬挂或打开反对派领导人的肖像。这些勇敢者遭到无情的毒打，肖像被撕成碎片或践踏。然而这并没有阻止其他反对派的行动。

斯大林的肖像无人禁止。相反地，悬挂斯大林的肖像是升迁的一种途径。不过无论是在橱窗里还是在游行者的宣传画上，根本看不到斯大林的肖像。事实胜于雄辩。前国家出版社社长，不朽的布罗伊多曾企图通过强制手段使斯大林的肖像深入到国家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有些事情绝不是靠单纯的迫害所能办到的。

*　　*　　*

斯大林领导集团的政策是由短暂的左转曲线和大踏步右转组成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反对派）的政治纲领是这样说的。斯大林领导集团只是在最近几天遭到反对派鞭挞后才走上左的曲线。宣布实行 7 小时工作制，压制富农，设立贫农保险，等等。几天没过，在口头上的左转之后，实行了新的坚决的右转。疯狂袭击反对派的标语牌显然是受富农、耐普曼和官僚们的阶级利益的驱使，庆祝周年宣言使这些人对左派感到惊恐，为此便匆忙采取报复行动。斯大林执政机关中的坏分子伙同街头的社会渣滓猛烈袭击反对派的列宁主义口号。这正是 1927 年 11 月 7 日的一大教训。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11 月 8 日

№07564

托洛茨基等就游行中的暴行致政治局、中央监委主席团[①]

（1927年11月9日）

我们正式要求就1927年11月7日庆祝周年游行期间发生的全部暴行和具有破坏性质的行为立即进行准确的调查和追究犯罪者的责任。

1. 我们已经以书面形式向你们通报，有一伙人（绝大多数是军人，而且绝不是普通的红军战士）闯进了联共（布）中央委员斯米尔加同志的住宅，他们破门而入，强行摘下了带有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肖像的红色旗幅。

同时他们还试图借助于铁钩、木板和其他工具从房顶扯下写有“实现列宁遗嘱”口号的招贴画。窗户玻璃被打碎。

在砸开房门之前，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特工和其他人多次敲门，要求让他们进去摘掉招贴画。住宅的女主人，斯米尔加同志的妻子只得把孩子们领到另一处住宅。破门而入的那伙人把住了所有的门和楼梯，监视着所有进出的人。查明捣毁斯米尔加同志住宅的罪犯不是什么难事。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这次暴行的组织者之一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军校校长拉舒克。我们可以提供许多证人，他们看见破门入室者，可以轻易把他们认出来。现在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破门入室者的姓名。

① 由我执笔，显然系集体签署。——托洛茨基注

2．第二次袭击的地点是巴黎饭店的阳台。当时在这个阳台上有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格林施泰因、阿尔斯基和其他人。法西斯分子的组织者是这里小有名气的波里斯·沃林，对其道德面貌无须评价。强盗们向阳台猛烈投掷土豆、冰块等物品，然后闯入房间，用殴打和冲撞的手段把上述同志挤出阳台，接着又把他们拘留（事实上是逮捕）在巴黎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达数小时之久。许多反对派分子遭到毒打，托洛茨基卡娅同志被打倒在地。强盗们边殴打边下流地辱骂，其中有一些醉汉。

3．正当加米涅夫、穆拉洛夫和托洛茨基乘坐的汽车沿着谢苗诺夫大街行进时，发生了神秘事件，如想查清这一事件，不必花大力气。汽车从游行队伍旁边驶过，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夹杂着极少数人的口哨声。与这辆汽车相向而行的另一辆汽车上坐着布琼尼、齐洪等同志，他们顺着另一条路线从游行队伍旁边驶过。很明显这两辆汽车行驶都是一样合法的。当加米涅夫、穆拉洛夫和托洛茨基同志乘坐的汽车驶过游行队伍时，紧接着传来连续4声枪响。庆祝游行期间的枪声大出人意料，车上的人最初还以为这是别的什么声音（轮胎爆裂等等）。但是有几个人在拼命追赶汽车。司机放慢了速度。一个消防队员（系指挥官）跳上汽车踏板，另一侧跳上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一下子抓住方向盘。消防队员突然粗野地大声叫骂起来。这时又跑过来几个人给他助威，他们企图达到肉体摧残的目的。幸亏一些参加游行的人赶来才制止了他们。消防指挥官的嘴里含着一个角质的哨子——法西斯哨子帮使用的那种哨子。车上一个人把哨子夺了下来，这个哨子在调查时可以出示。人群中有人说是民警开的枪。但是没有一个民警来到汽车跟前，也没有向我们提出任何要求。查明开枪者和追车者的身份并不费事（当时布琼尼和齐洪在场）。

4．各处的游行队伍纷纷向反对派扑过来，毒打他们。这种攻

击还常常伴有无所顾忌的黑帮式的喊叫，包括反犹主义的喊叫，根本不管被毒打者是属于哪一个民族。1927年7月列宁格勒大街上布尔什维克遭毒打的情景与这里发生的事件如出一辙，最反动的黑帮分子表现得非常积极和坚决。很多被伤害的共产党人我们都认识。根据他们这些见证人提供的证词可轻而易举地查明罪犯。况且这种行动绝不像是一大群人干的暴行，恰恰相反，都是在人群背后进行的，目击者为数不多，由一些官方或半官方人物坐地指挥，前面已经说过，找到他们并不难。

我们向你们提出质问：你们是否打算就我们讲到的和许多没有讲到的针对反对派分子或有反对派嫌疑的人的流氓暴行进行正式、公开与公正的调查？这个问题对于我国内部今后发展的意义无须解释。如得不到你们的答复，我们将从我们党、我国革命和世界工人运动的利益出发，采取一切措施，阐明此事全部真相。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9日

№07565

尼古拉耶夫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1927 年 11 月 10 日）

抄送：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

A. 尼古拉耶夫，1913 入党

党证号：0030392

于德维诺列斯

声　　明

十月革命 10 周年纪念日，即 1927 年 11 月 7 日上午 10 时，我的住宅（位于鲍曼大街和巴枯宁大街拐角处一栋楼房的二层）遭到当地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袭击。在这伙强盗中有区委书记齐洪、孟什维克霍多罗夫（大学教员）和区苏维埃主席萨夫罗诺夫，他们在民警的协助下，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和体力上的优势干下了如下暴行：

他们下流地叫骂着闯进了住宅，从阳台上扯下我悬挂的一些已经出版发行的列宁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画，上面有下列口号：

（1）“执行列宁遗嘱！”（2 张）

（2）“向右开火，反对耐普曼、富农和官僚！”（1 张）

（3）“争取真正的工人民主！”（1 张）

（4）“世界革命的领袖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

此外还扯下了后来悬挂在一个红军五角星框子里的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肖像。

我质问区委书记齐洪，他和苏维埃主席萨夫罗诺夫有什么权利闯进一个共产党员的住宅，并且同法西斯分子霍多罗夫一起践踏苏维埃的法律，谁对这种独断专行的行为负责？

齐洪喊叫起来："住口，恶棍，别以为你是在干革命！"

我又问他支持谁，是支持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呢还是反对他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执行列宁遗嘱？

齐洪回答说，他拥护党。

我问我们党何时开始保护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列宁的党何时成了富农党？

齐洪冲着我的脸挥着拳头叫道："住口，恶棍，否则我逮捕你！"面对齐洪的威胁我回答说，逮捕的威胁并不可怕，我在沙皇制度下和克伦斯基时期都坐过牢，逮捕吓不倒革命者。

事件发生后，齐洪、萨夫罗诺夫和孟什维克霍多罗夫吩咐民警对所有在场的人一一登记，并且不允许我走出住宅，我在被软禁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要求把我放了。

民警分局局长（不知姓名）同意放我，但条件是要我把"战利品"（撕下来的宣传画）作为物证交给他，我同意交出，条件是给我出张收条，我拿到收条后（见附件）与民警同时离开了住宅。

我走后大约过了20分钟，有一个同志来找我，他看到领袖们的肖像（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试图拿到窗前展示，但是肖像还没有来得及在窗前展开就被站在拐角处的民警扯掉了。

民警局长闯入房间威胁说要逮捕我妻子。

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就是这样度过的。

这伙不受约束的"党员"强盗闻所未闻的无耻行径使我非常气愤，他们作为负有重要责任的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在当

地民警的保护下，居然当着上千人的面污辱列宁主义的口号，污辱列宁及其最亲密的学生和战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的肖像。特此奉告，我请求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不顾情面地”（列宁语）追究所有参与这种卑鄙勾当的党员的责任。

A. 尼古拉耶夫

1927 年 11 月 10 日

附　件

收　条

遵照齐洪同志的命令我摘下如下标语：

（1）执行列宁遗嘱（2 张）。

（2）拥护真正的工人民主（1 张）。

（3）苏维埃在这里（1 张）。

其余两条标语被齐洪同志拿走。

[签名]

1927 年 11 月 7 日

№07567

1927年11月7日“巴黎”宾馆事件始末

（1927年11月10日）

11月7日上午11时许，正当哈莫尼基区的游行队伍通过时，联共（布）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同志、列宁时期的原中央委员会书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几位同志，来到苏维埃第27号楼办事处（前“巴黎”宾馆）一个朝向猎用品市场大街和特维尔大街拐角处的阳台上。他们在阳台上向通过这里的游行队伍频频致意。为了向十月革命的领袖表示敬意，他们还在阳台上列宁同志肖像下面挂起红色横幅，上面书写着标语：“回到列宁那里去！”游行队伍一齐对来自阳台上的致意作出回应，走在每个企业前面旗帜下佩带着哨子的个别人除外。这一小撮哨子帮吹着哨子，声嘶力竭地地喊着“打倒！”但是这些个别分子的哨声和喊叫声时而淹没在游行群众高喊“乌拉”的声浪中，时而与游行队伍向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反对派领袖的吹呼交织在一起。

起初惊慌失措的游行指挥者们可能是得到了有关指示，开始从行进着的游行队伍中拉出几支人数不多的队伍，这些人带着哨子，拿着黄瓜、西红柿、石头、木棍等物品聚集在特维尔大街和猎用品市场大街拐角处苏维埃第27号楼的阳台下面。与此同时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柳京、红色普列斯尼亚区苏维埃主席米奈切夫、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莫罗兹和莫斯科委员会及莫斯科监察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驱车来到这里。军区政治部主任布林带着一伙军官也赶来

了。

聚集在阳台下的这些人在集中到一起的当权者的领导下开始吹哨子，叫喊“打倒”，“揍反对派！”并且向站在阳台上的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同志投掷石块、木棍、木片、黄瓜、西红柿等物。同时从位于对面苏维埃第1号楼的波德沃伊斯基同志住宅的阳台向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扔冰块、土豆和劈柴。

游行队伍继续对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致意报以欢呼声，同时对哨子帮和无赖们的行径表示愤慨，他们高喊“打倒哨子帮和无赖！”“打倒分裂党的法西斯分子！”

根据军区政治部主任布林的命令，派出一名铁道部队的红军战士从外面顺着墙爬上阳台，执行站在下面的指挥官下达的扯下带有列宁同志名字的横幅的命令。这时，站在阳台上的同志们又挂起了另一个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的红色横幅。这个横幅的出现引起游行队伍的热烈欢呼，同时聚集在阳台下的那群哨子帮和无赖们发出更刺耳的哨声和喊叫声，并且更猛烈地投掷石块。在这群无赖中有因犯有一系列刑事罪而被解除编辑工作的前《工人莫斯科报》编辑弗拉德金（波里斯·沃林）和在加里宁同志接待室工作的维克多·沃兹涅先斯基，他们开始号召这伙人闯入旅馆惩罚仍在阳台上的反对派分子。这时在这伙人当中除了喊“打倒”和“揍反对派”，还传出“揍反对派—犹太人”和“揍犹太人”的喊叫声。

首先闯入苏维埃第27号楼大门的是柳京、沃兹涅先斯基和米奈切夫。沃兹涅先斯基大叫他“为了农民”，他是“农民的儿子”，要求门卫警察和看门人让他们进去惩罚反对派分子。而站在那里的楼内住户坚持不放这些人入楼，担心楼房会受到损坏，担心自己会受到迫害。这时柳京通过电话与门内某人取得了联系，他招呼民警过去听电话，并告诉站在门厅的人，他已获准将人群中的20人放进楼内。楼内住户开始表示抗议并要求民警出面阻止。但是民警分

局副局长放下电话后告诉大家，他毫无办法，因为他得到了对双方都不加阻拦的命令。这时沃兹涅先斯基从看门人手中夺下入口的钥匙，把门打开，以弗拉德金、布林等人为首的几十个人闯入楼内。闯入楼内的还有醉鬼。

闯进来的人径直扑向房间里靠阳台站着的格林施泰因（1904年入党，服过苦役）、叶努基泽、卡尔佩利等同志，对他们进行毒打。布林抓起一把椅子将阳台门的玻璃打碎，闯进来的人开始通过被砸坏的门猛拉在阳台上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其他几位同志，殴打他们。布林和一伙军人还对在阳台上的师长马尔采夫同志下了手，把他摔倒在桌上殴打。遭殴打的还有中央委员阿尔斯基、金兹堡、姆季瓦尼、玛柳塔、尤什金等人。

殴打时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莫罗兹和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委员齐夫里诺维奇在场。受害者要求制止打人的行为，并要求弄清打人者的姓名，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书记莫罗兹喊道："住口，否则更糟！"而莫斯科委员会常务局委员齐夫里诺维奇却答道："就该这么对付你们。"当时在场的民警分局副局长沃尔柯夫同志报告说："虽然我没有入党，但是没有见过这样不成体统的场面，纵容流氓行凶，还不准民警干涉。"楼内的住户说，在行凶作恶的那伙人中有几个醉鬼，是莫罗兹趁人不注意留下的。按照莫罗兹的命令，遭殴打的那些人，其中包括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被逼到饭店的一个房间里，锁在屋内。门口由军人布哨，走廊里也布下了许多岗哨。不准出房间。上厕所有人押送。莫斯科委员会委员舒米亚茨基和米奈切夫在房间里监视被拘禁者。

当被拘禁者要求准许他们去苏维埃第2号楼时，舒米亚茨基和米奈切夫断然拒绝，借口是外面那群人在等着收拾他们。可是当以斯米尔加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首的被拘禁者不顾这种警告冲破卫

兵的阻拦来到外面时，那里已空无一人，于是他们在跟随他们出来的以莫斯科监察委员会成员（没有能弄清他的姓名）为首的卫兵们的陪同下来到了苏维埃第2号楼德罗布尼斯同志的住所。陪同的哨兵想强行闯进这所住宅，但是不让他们进去，他们就站在门口。后来邻近住宅的一个住户前来报信说，站在门外的哨兵正在打电话叫一个分队来闯进德罗布尼斯同志的住宅，被拘禁者便从后门走了。

伊·斯米尔加

1927年11月10日

№07568

阿尔希波夫声明

（1927年11月11日）

联共（布）党员И.М.阿尔希波夫（党证号：H0027537）
致联共（布）莫斯科公用事业局第二汽车库支部

亲爱的同志们，非常遗憾，我不得不给你们写这份材料，因为在我们支部的历史上至今还未见过类似行为。现在我不得不非常遗憾地确认，出现了一个纯粹是反党反工人性质的团伙这一事实。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今年11月7日，当游行队伍在亚历山德罗夫斯克车站集合时，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和穆拉洛夫同志来到我们中间，他们受到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工人们的热烈欢迎，工人们高呼“乌拉！”这时一个事先组织起来的，有我们支部的代表艾坚诺夫、科罗廖夫和其他许多人参加的具有纯粹法西斯性质的哨子帮，扑向我们领袖乘坐的汽车，目的是把领袖们从车上拽下来。我作为一名忠诚的党员一贯维护工人的利益，参加了与这种现象的斗争。就在艾坚诺夫登上汽车企图用拳头殴打托洛茨基同志时，我拽住我们支部的这个公认的法西斯分子的衣领，把他拉开了。当载着世界革命领袖的汽车驶离这里时，这些法西斯分子向汽车投去了苹果、面包、赃物和他们手里所有的东西。我们支部的法西斯分子，就是艾坚诺夫和科罗廖夫等人，直接参与了这个行动。当我们返回到自己的队伍时，我批评艾坚诺夫说：“只有法西斯分子才会这样做。”这时科罗廖夫挥起拳头打我的头，只不过是因为我尽了一个正直的工人、一个党员的义务，保卫了世界无产阶

级的领袖，这是每一个即使不是共产党员的正直工人保卫领袖的义务。

回到自己的队伍后，大家就发生的事件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尽管我讲话的态度是真诚的，但还是不止一次地听到科罗廖夫发出要痛打我一顿的威胁。

因此我认为在我们党的支部里绝不容许存在这种现象，请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并作出应有的结论，因为我认为工人阶级的领袖被截断了与群众的联系，而他们不想断绝这种联系，所以常常不顾危险来到工人群众中。从这次游行活动可以得出结论，由于受到误导而产生误解的工人阶级希望在游行中见到自己真正的领袖托洛茨基、加米涅夫等人，但是有组织的哨子帮和法西斯分子不让他们这样做。从我个人来讲，我认为有义务声明，这种现象应当予以制止，因为它妨碍工人阶级正确了解当前的政治，依靠这种哨子帮就可能使十月革命获得的所有胜利成果付诸东流。至于自己的支部和有组织的哨子帮，我认为全部过错在支部书记身上，他姑息纵容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全部后果应归咎于支部书记和给哨子帮下达这种任务的上层机关权势分子，因为工人阶级从来没有容忍，也不可能容忍这种现象存在，他们对妨碍工人事业的人从来不讲情面。

无论什么样的哨声都不能干扰反对派这一列宁思想惟一捍卫者努力使工人阶级认识到自身的阶级利益和斗争方式，因为列宁这样说过。

1927 年入党的联共（布）党员　阿尔希波夫

1927 年 11 月 11 日

抄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莫斯科监察委员会、区监察委员会、托洛茨基和穆拉洛夫

注：支部书记认为无须将这个声明提出来研究。已经过了一个月，我仍未争取到进行审理的决定。

阿尔希波夫

№07569

反对派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①]

（1927 年 11 月）

尊敬的同志们，党内生活中的事件发展得如此迅速和尖锐，最近几天已有最终打击党的统一并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面临无法补救的事实的危险。

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这一使整个局势空前激化的事实，其论据是所谓反对派的活动已演变为反苏活动。这个论据当然就意味着决定转入对反对派的大逮捕。不用说，这使党的工人阶级深感不安。这吓不倒反对派，因为以为这种措施能够迫使我们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放弃我们对其正确性深信不疑的观点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这会给党和苏维埃政权带来无法治愈的创伤。

指责我们的活动具有反苏性质，这与我们工作的整个含义、目的和任务是极其矛盾的。

中央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为 11 月 7 日的游行确定了一系列直接针对反对派的口号（带有“打倒反对派”等口号的标语牌数次从红场上通过），这样就使党内争论开公化，也使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些独立的口号（“向右开火——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回到列宁那里去”等）。谁都不难看出，推出这些未经批准的口号显

① 写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被开除党之后（1928 年底）。作者不是我。究竟是谁，很难说。很可能是加米涅夫、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人写的。——托洛茨基注

然违反党的纪律，但是无论是在这些口号中，还是在我们11月7日的活动中，都绝无反苏的成分。

现在反对派在党内是少数。它为自己规定了符合自身地位的任务：阐明和维护自己的观点以影响党内舆论。如果党内情况正常，就决不会因此产生当前使全党受到震动的那些冲突。那种把这些冲突解释成是反对派力图转向“反党”甚至“反苏”道路的结果的做法，与我们基本的和惟一的任务完全相抵触，面对接踵而来的闻所未闻的迫害，我们的任务依然是：阐明、维护和宣传我们在党内的基本观点。因此怀疑反对派力图走上“起义”和“政变”之路，只能是痴人说梦。

我们同样断然拒绝接受所谓组织“第二党”的指控。我们一再声明，现在仍然声明，我们是在党内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无论反对派的处境如何，无论反对派在党内维护自己观点的斗争有多么困难，也不管现在针对反对派的斗争有多么尖锐，我们仍将坚持统一的列宁主义的政党。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允许搞第二党的观点是我们整个观点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无论怎样镇压，无论怎样迫害，也不管怎样歪曲我们的观点，都不能迫使我们放弃我们的原则立场，正如开除党籍不会阻止我们仍然把自己看做是负有党员责任的联共（布）党员一样。

开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的直接理由是这两位同志“拒不接受”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不私自举行党员大会和不把党内争论扩大到党外的建议。这个说法不对。无论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还是我们，从来没有拒不接受，现在也没有拒不接受这个建议。我们是被迫采用这种与工人党员建立联系的方式的，因为在党的会议上和在争论开始的时候，事先组织起来的哨子帮不让任何一个反对派分子（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积极分子、列宁格勒的积极分子、普罗霍罗夫卡以及其他地区的积

极分子）讲话。然而我们从不认为这种不按党章规定的做法是正常的。现在这样的会议还在继续，显然有造成党内正常生活长期难以得到恢复的危险。所以我们公开声明，我们决定一旦中央明令强行取缔这种会议，即不再召开这样的会议。

我们同时严正声明，我们从未打算，现在也不打算让非党人士来充当党内争论的评判人，而且坚信在党的基本的政治问题上对党外群众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他们是党的阶级基础，也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向党外群众通报党内的事情，而应该像列宁时期那样客观地叙述党内存在的观点。

我们不知道你们是否认为我们就向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同志提出的两个问题的声明足以让你们采取措施来防止党内状况进一步尖锐化。当然我们是在意识到现在每一个共产党人肩负的重大责任的情况下这样做的，而且直接目的就是防止出现那种会使恢复党内正常生活的希望破灭的事件。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要在空前严重和危险的党内形势下作出决定。我们一次代表大会都未曾面临过如此责任重大和困难的任务。这也是第一次在党将几千名忠于党的布尔什维克开除、斗争空前尖锐化和对部分党员提出从事反苏的指控时召开的代表大会。

公布反对派提纲和反对派代表的一些文章及发言稿为党提供了了解我们部分观点的机会，尽管晚了一点。我们将全力在全党面前维护我们这些观点。我们相信，这些列宁主义观点的正确的阶级性是对付对我们进行猛烈镇压的护身法宝，我们决心全力支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恢复党的统一和党内生活的正常环境的每一个步骤。

［列·加米涅夫］

［1927 年 11 月］

№07570

托洛茨基：提纲

（1927年11月13日）

1．党的统一或分裂问题已进入一个新阶段。

党的右边界限日益模糊。在农业人民委员部的会议上，斯维杰尔斯基通过秘密的方式与一些社会革命党和立宪民主党的教授磋商如何更好地与反对派斗争。这些教授还参加了有莫洛托夫出席的关于制定农村提纲等诸多问题的秘密会议。

由于成百上千的优秀党员被开除出党，党的左翼界限也模糊了。

无视这两个基本情况奢谈党的统一，就是想入非非。

2．这两个情况具有深刻的阶级根源。右边纯粹资产阶级分子进入党内，左边纯粹的无产阶级分子被排挤出党，这反映出非无产者阶级正在向无产阶级进攻，同时意味着国家正在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

3．斯大林的机关在政治上完全是为从右边施加压力服务的，尽管在组织上仍坚守自己的独立性。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13日

№07573

奥博林等致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

（1927 年 11 月 13 日）

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将对残酷的党内斗争作出总结。在这场党内斗争中，中央委员会未等代表大会召开便将几百名不同意其机会主义政策的党员开除出党，从而开始了分裂活动。

我们在许多文献——在十五人行动纲领、告中央十月全会和全体党员书和关于工业远景规划以及农村工作的反提纲中批评了中央的政策，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路线和自己的具体建议。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我们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说过，工业发展速度不够快，落后于国民经济的需要。中央对此提出异议。而事实证明，工业不仅不能吸纳新的劳动力，甚至许多部门还在精简工人。失业人数增加。形势严峻。商品荒日趋严重，已到了“供应不足，有些地方工业品甚至无货可供”的地步，苏联国家计委在 1927 年 11 月份的行情一览表（《经济生活报》第 274 号）确认，工业品短缺直接导致粮食收购量急剧下降：10 月份的粮食收购量仅相当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二；而 11 月前半个月的粮食收购量比去年同期减少了一半。

我们指出中央现行的价格政策很荒唐，中央不知根据什么将这一政策称之为降价政策。我们说，实际上这是一种提价政策，它只会使工业积累减少，商品荒更加严重，商业机构臃肿，投机商牟取暴利。现在事实证明价格并未下降，而是不断上涨。在莫斯科甚至

在出厂价降低的情况下，仅10月份一个月“私营市场的布匹价格就上涨了5.7%，鞋的价格上涨了10.6%，五金价格上涨了4.8%”。（见苏联国家计委行情一览表）

我们指出工人劳动条件正在恶化，两年来工资几乎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工人的工作量（劳动强度）却在不断增加。现在纺织工人已从看3部机器改为看4部机器，而实际工资在4～9月份稍有提高后，根据苏联国家计委行情一览表，10月份又降低了2%。同时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在有关重新签订集体合同的信件中指出，“经济管理机关在不使工人的生活条件严重恶化的情况下腾出非专用资金”，就是说已公开承认恶化，只是恶化还不算“严重”。

我们说过，延缓提高工人工资的政策和错误的住房政策必然导致本已相当糟糕的工人生活条件更加恶化。从苏联国家计委制定的住房建筑5年规划可以看出，5年期间人均居住面积从1925～1926年的11.31平方俄尺**减少**到1930～1931年的10.71平方俄尺，而符合卫生条件的**最低**标准是人均居住16平方俄尺。

我们说过，伏特加酒的投产使工人受到越来越大的打击。我们要求“立即开始缩减伏特加酒的产量，特别是在城市，为的是两年内完全停止生产伏特加酒”。中央委员会则认为伏特加酒不过是“挤掉私酒。”而实际上自从生产40度的伏特加酒后，1924～1926年莫斯科的饮酒成癖者（其中85～90%是工人和工人家属）增加了3倍，因酒精中毒而死亡的现象也增加了3倍，而在列宁格勒因醉酒被拘留者增加了8倍。（见《布尔什维克》第19～20期发表的杰伊奇曼的文章）尽管如此，在远景规划中仍规定以最快的速度生产伏特加酒——5年内产量增加近两倍。

我们要求立即增加工资，现在工人的劳动强度比战前高多少就增加多少。我们还要求加强工人群众对生产的管理，取消著名的三人领导小组——工厂经理、工厂委员会主席和支部书记的针对工人

的统一战线，使工会成为真正按照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维护工人利益的机关，使工会真正成为共产主义的学校。我们还要求通过适当提高计件工资的办法切实实行7小时工作制。

我们一再坚持终止那种由于中央实行的价格政策而滥用国有资金，使投机者从中渔利的情况，我们要求紧缩用于官僚机构的开支，加强对耐普曼和富农征税。我们要求利用这些资金提高工资，加强工人住宅的建设，努力帮助贫农户向集体经济过渡，要求实行使中农也能走上集体化的道路的中农合作政策。

我们要求按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实行党内民主，因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加强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党内无产阶级才能够反击敌对阶级对党的影响，才能肃清党内现已稳坐党的机关，把持党的报刊的“前”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佩特留拉分子、达什纳克党人等。我们要求让那些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被开除的人重新回到党和共产国际的组织中来。最后我们要求国家机关和国家政治保卫局停止干涉党内事务，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

只有实现这些要求才能使苏联走上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屏弃中央日益加速地把国家引向下滑和蜕化变质的道路。然而我们就因为这些要求被指控为“新孟什维克”或干脆就是孟什维克、搞派别活动、违反党章。极力支持这些指责的是前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甚至还有立宪民主党人，我们的要求正是针对他们提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利用他们反对党内的无产阶级部分以保全自己。

对于说我们是孟什维克或“新孟什维克”的荒唐指控，我们不屑一顾。至于指控我们违反党章和搞派别活动，其罪责不在我们，而在中央委员会。是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反对派，违反党章规定将代表大会推延一年举行。是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反对派，在党内斗争中利用了国家机关的力量。是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反对派将第十

次和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束之高阁。最后，是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反对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争论期间大批开除和逮捕反对派。如果已经开始的党的分裂终成事实，那么中央委员会应就此对党和工人阶级承担全部责任。

中央委员会最近拟订的关于农村工作、关于工业远景规划、关于土地占有和土地规划的基本原则的提纲，是试图表明中央委员会正在向左转并抹掉其最近几年公开采取的右倾措施造成的印象。因此这些提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明确和相互矛盾的地方。

中央委员会允诺修改工业发展规划以进一步扩大工业生产。但与此同时，中央委员会完全保留了现行的政策，由于这一政策中央甚至没有足够的资金去实施现在拟订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关于加强发展工业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中央委员会有意回避加强发展工业靠什么资金兑现的问题）成了空洞的愿望。

中央委员会企图以实行7小时工作制来“冲淡”反对派关于改善工人劳动条件要求，这种许诺显然已变成在8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增加劳动强度的新托词。而最近所有关于劳动和工资的决议都公开宣布，**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苏维埃国家劳动政策的基本原则。如上所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有关重新签订集体合同的指示，直接预示着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恶化。

中央委员会承诺“加紧对富农的进攻”，与此同时却嘲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至健全的理性，在其提纲中认为富农在经济上发展壮大的同时政治上削弱了，认为富农在增加，贫农在减少，这样中央委员会就与公开支持“发财吧”口号者携起手来，这些人早就认为富农经济的发展对农村的各个阶层都有益处，政治上不会构成任何危险。

中央委员会照搬反对派的一些口号，主要是在口头上采取一些

左的措施，同时极其残酷地迫害那些坚持左的路线和惟一能够实际贯彻这些左的措施的人。这充分说明作出向左的“让步”只是确保右倾方针的一种策略。中央委员会宣布“加紧对富农的进攻”，其拥护者在十月革命10周年纪念日按照中央的指令当着广大工人群众的面，撕碎了写有“反对富农、耐普曼和官僚”口号的标语牌，这样一来其伪善的态度就暴露无遗了。

我们说过，中央委员会的党内政策实际上是分裂党和毁灭党的政策。最近进行的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争论”经过完全证实了这一点。违背党章间隔两年才召开的、将决定党的命运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是在争论开始之前，甚至是中央委员会为代表大会拟订的提纲公布之前进行的。争论专页变成了反对反对派的专页，没有刊登拥护十五人纲领中的一篇反对派的文章或反对派的提纲。早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十五人纲领提交给代表大会之后，中央委员会便事先认定这个行动纲领是反党的，因此不让广大党员知道。在十五人纲领上签字的达什科夫斯基和萨普龙诺夫被开除出党，一些工人因传播和宣传十五人纲领被开除出党或者被逮捕。向全党隐瞒反对派的观点，而对诽谤反对派的攻击却大开方便之门。开除出党和逮捕司空见惯，成为“党内争论”的组成部分。中央委员会只有通过向全党隐瞒反对派的观点、有组织的诽谤反对派运动、有组织的妨碍议事的行动、利用党和国家机关对党的有组织的暴力，才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但是这个“胜利”是以高昂的代价，即以进一步破坏党在工人阶级心目中的威信为代价换来的。众所周知，工人的意向与争论结果截然不同。

在奥列霍沃－祖耶沃区各工厂、在“压力计”工厂、“杜克斯”工厂、“红十月”工厂、波多利斯克“国营缝纫机”工厂、哈尔科夫电气总公司工厂、彼得罗夫斯基印刷厂，在公开举行的支部大会和工厂会议上，当提出反对派的问题时，工人们纷纷要求反对派派

出报告人，当机关权势分子拒绝这一要求时，他们便退出会场。上述事实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存在。中央委员会在对反对派的斗争中试图把非党工人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却完全落空了。中央的政策必然导致党和工人阶级分离的结果。

中央委员会获得“胜利”后，想彻底利用这一胜利。中央委员会并不满足于把自己的机会主义路线强加给党。中央委员会想把反对这条路线的人统统开除出党，剥夺反对派今后在党内坚持无产阶级路线的任何机会。此外中央委员会将所有反对机会主义的人宣布为国事犯。国家政治保卫局无所顾忌地为反对反对派效劳。托姆斯基厚颜无耻地声称：“谁试图与党作对（机会主义者现在以党自居），就让他坐牢。”布哈林威胁并夸口说：“如果反对派企图挑起‘灾难’，党必将使他们死无葬身之地。”乌格拉诺夫发出的威胁已不是针对反对派，而是针对工人：“不久我们要铲除新生的腐化分子，教他们按照列宁的要求去工作。”（也就是按照乌格拉诺夫，这里与列宁毫不相干）他是在威胁杰多夫斯克纺织厂的工人，他们一致拒绝实施乌格拉诺夫的“合理化”，即在不提高工资的情况下将看12台机器改为看15台机器和解雇自己的同志。反对反对派的斗争和反对工人的斗争在协同进行。

中央委员会的政策一方面在使党濒临正式的分裂和毁灭，另一方面使党脱离工人阶级。为了满足小资产阶级的要求，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进一步压制工人，用开除出党的办法排挤党的无产阶级部分，千方百计地对苏维埃国家的政策施加影响，中央委员会使无产阶级专政濒临蜕化，尽管国内客观的阶级力量对比完全可以使无产阶级专政得以保持和加强。难怪乌斯特里亚洛夫和奥托·鲍威尔都赞成中央委员会的路线，难怪他们欢迎将反对派开除出党，难怪资产阶级报刊赞扬中央领导是“现实主义的政治家”。

我们清醒地意识到，残酷的镇压不久将落到反对派的头上。我

们绝不讳言：处于遭受镇压的危险境地，好些意志最不坚定、过去与官僚制度关系最密切的反对派分子，甚至一些反对派团体会放弃自己的路线或放弃进行积极的斗争。反对派的运动并不受个别人或个别团体的左右。它已在工人党员和工人阶级中深深扎根。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政策只能引起广大革命工人更加强烈的抗议。无论怎样镇压，无论反对派的队伍中发生什么动摇，都不能消除来自最下层，来自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对放弃十月革命成果的政策的抗议，也无法阻止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为己任的运动。

瓦·奥博林　Ф. 皮利片科　Т. 哈尔琴科

季·萨普龙诺夫　Э. 杜内　М. 明科夫

М. 米诺　И. 达什科夫斯基　Н. 扎瓦里扬

М. 斯米尔诺夫　弗·斯米尔诺夫　Л. 吉洪诺夫

瓦·叶梅利亚诺夫（卡林）　А. 斯利多夫克尔　С. 施赖贝格

№07571

托洛茨基致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

（1927年11月15日）

谨奉告，根据对我作出的决定，我已于昨日，11月14日，迁出我在克里姆林宫内的现住所。在找到固定住所之前，我暂时寄居在别洛博罗多夫同志的住宅（格拉诺夫斯基大街3号63号住宅）。因我儿子身患疾病，近几日内妻子和儿子仍将留在克里姆林宫内。现住宅可望于11月20日之前完全腾空。

列·托洛茨基

1927年11月15日

№07572

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明”和党内状况

（1927 年 11 月 17～20 日）

1．何谓反对派？就是党内列宁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左翼。反对派的性质在其行动纲领中已经阐明。反对派是党内的少数派。由此决定了他们的工作方法。反对派正在为争取在党内的影响，首先是为争取对党的无产阶级核心的影响而斗争。

反对派主要的斗争方式是宣传，阐明自己的观点，将其应用到实际问题上，维护这些观点。

2．在党的制度正常的情况下，全党领会反对派观点的主要内容就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反对派也不必采用党章上未规定的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体现了非无产阶级压制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内官僚主义制度扭曲了党内的一切关系，特别是扭曲了少数派争取影响党内舆论的斗争方式。

3．当反对派通过私下座谈或通过在卷烟纸上转抄文章和发言稿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就是在以这种被缩小的、不完整的和似乎“非法”的方式履行党员参与制定党的集体决议的基本权利。

在这个时期机关权势分子常说：“反对派为什么不在支部里公开活动呢？”然而为了在彼此隔离的支部内了解反对派的观点，必须将这些观点发表出来。但是这遭到了拒绝。因此反对派的“派别活动”的方式就无法避免了。当反对派的观点传播到各支部的时

候，就因为党员发表公开言论，机关找一些不沾边的偶然借口将他们开除出党。可见，即使在这个时期也是官僚主义制度把人推上了派别活动的道路。

4. 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受到官僚机关压制的党内思想政治热情又活跃起来。由于支部之间人为造成的相互隔绝和无法在支部里发表自己的意见，广大党员便走上私下里举行座谈会的道路，与会的人数为20～30人，后来发展到50～100人，甚至将近200人。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成千上万的工人党员参加过这种座谈会，其中不仅有动摇分子，而且有多数派路线的拥护者。他们都很清楚，参加这种座谈会有遭受迫害的危险。如果在党内能够正常地交换意见，就没有一个党员会参加这样的座谈会。现党章未作规定的这种座谈会（“结合”）是由官僚主义制度引起，也仅仅是由它引起的。

5. 技术学校中的大会是由所谓“结合”发展而成，因党员的人数多，私人住宅里容纳不下。当然，这里也仅仅是宣传反对派观点。宣传采取这种“占领”的方式，显然是一种不正常的方式，是党的制度的极端不正常造成的。

6. 反对派带着一些标语牌参加11月7日的游行是由于必须针对毒害党内外群众的谎言和诽谤介绍反对派的真实情况。反对派的标语牌要说明什么呢？所谓我们主张掠夺农民的说法纯属谎言，我们主张压制富农。所谓我们主张资产阶级民主的说法纯属谎言，我们主张执行列宁的遗嘱。反对派通过标语牌以最简单、非论战性的和真正符合党的原则的方式表示对卑鄙诽谤的驳斥，也就是竭力避免斗争尖锐化。当然打出独特的标语牌本身是不正常的。但是这种不正常的行为是在党的路线和党的制度处于一种极端的、令人感到痛苦的、危险的和不正常的状态下被迫采取的。

7. 机关组建了自己的战斗队，对反对派分子进行人身迫害。列宁格勒事件可以证明问题并不在于标语牌。那里的反对派没有打

出任何标语牌，却遭到了发生与莫斯科一样的暴力袭击。

8. 11月11日中央委员会宣布，今后凡在私人住宅举行的党员会议均应强行解散。中央委员会必须采取这样的措施，即党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行使警察的职责，这本身就证明党的制度已经严重扭曲。机关此举表明，甚至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争论期间，无论是在党的公开会议上（吹口哨、起哄、敲打物品甚至大打出手，以至在会议议程上搞阴谋）还是在私下的座谈会（“结合”）上都不能容忍宣传反对派的观点。

9. 中央委员会的决定造成了新的情况。“结合”对反对派来说仅仅是一种宣传形式。机关则决定把“结合”变成党的两个部分发生暴力冲突的形式。十分清楚，反对派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想也不能走这条路。

当权机关在最近一个时期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为了使反对派的宣传具有暴力冲突的形式，并在此基础上制造所谓反苏工作、搞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街头动员以及准备发动内战等恶毒谎言。这些诡计的目的在于恐吓党，不让党弄清反对派的提纲和文章的实质，即阻挠党内少数派的宣传工作。

10. 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反对派11月14日声明的目的和内容。

反对派声明停止举行所谓的“结合”，他们不想帮助斯大林策动争吵，哈尔科夫已经发生了在对骂中动用手枪的情况。

反对派再次重申并提醒党，反对派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不过是党内的**少数派**，其主要任务是宣传自己的观点，目的在于争取党内舆论，至少是争取无产阶级的核心舆论。说反对派有叛乱、盲动和起义等其他种种目的都是谎言，像弗兰格尔手下的军官事件一样，与反对派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性质大相径庭。

11.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党的统一问题。机关竭力使反对派对自

己观点的宣传具有内战的形式，即使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内战形式。这势必会造成党的分裂。反对派与这种手段毫无共同之处。他们采用的是改良主义的办法。反对派坚定地希望通过党和工人阶级内部的手段来修正党与工人国家的路线，避免发生革命的动荡。

12. 反对派的这种基本观点决定了他们对待非党工人群众的态度。企图说反对派打算使非党群众与党对立起来或者说打算依靠非党群众来反对党，这是根本错误的，是蓄意欺骗。然而反对派不能消极地坐视当权机关的政策使党与非党工人即工人阶级明显疏远开来。这种日益明显的疏远严重地危及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派要求通过党通常采用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意见分歧，同时要求不能让非党群众受到有关反对派的谎言的毒害。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工人阶级不能不问党内发生的情况消极地跟着党走。工人阶级很想了解分歧也有权了解分歧。过去非党工人群众总是从陈述两方面意见的争论材料中了解党内意见分歧的实质。如今只有一方讲话，而且讲的是关于另一方的谎言。这样做已有好几年了。工人阶级越来越领悟到这是多数派的机关对他们采取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强制手段。这种情况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要想修正路线，党首先应该了解真实情况。非党工人群众应当对意见分歧有正确的认识，以便帮助党修正路线。

13. 对于反对派的声明，当权派有两个现成的方案：①声明是反对派的投降书；②声明是企图欺骗党。这两种评价过去已为人所共知。两者都是谎言，都不会妨碍反对派通过声明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将有关反对派的真正意图和斗争方式的真相告知全党。

14. 反对派真的投降了吗？面对一些共产党员因在私人住宅中开座谈会而受到人身迫害的威胁，反对派因此放弃了“结合”，如果投降指的是这一点，那么应该说，面对这种暴力威胁反对派确实是后退了。反对派的任务是在党内作宣传，而不是同那些选派的战

斗队较量。如果投降指的是放弃自己的立场，放弃自己的观点，放弃在党内的宣传和辩护，那么反对派对此只能表示鄙视。反对派思想上的正确性从来没有如此明显。中央委员会政治上的破产也从未像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的今天这样无可争议。那种蓄意的欺骗伎俩和有组织的镇压手段使争取无产阶级先锋队人心的正确路线无法实施的事情，历史上尚无先例。

15. 反对派果真想欺骗党吗？反对派没有兴趣去欺骗党，也不可能有兴趣，然而总是有人在欺骗党，污蔑反对派。反对派无须给造成比他们的实际情况更好或者更坏的印象。反对派是党内的少数派。他们愿意而且将会为自己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列宁主义的行动纲领努力奋斗。反对派最关心的是使党搞清楚和批驳机关所谓反对派密谋反苏和准备起义等谎言。反对派采取党章未有规定的斗争形式来维护自己的观点，是因为中央委员会践踏了并且仍在践踏党章，剥夺了党员的基本权利。反对派愿竭尽全力将自己的宣传工作纳入党内生活正常方法的轨道。但为此必须恢复这些党内生活的正常方法。反对派愿在这方面尽力予以协助。尽管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召开方面存在着极不正常的情况，反对派愿支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为真正恢复党内正常生活而采取的每一项措施。

16. 无庸赘言，镇压是吓不倒反对派的。这些镇压手段是粗暴和违法地滥用职权的表现。列宁曾指责斯大林存在这样的问题（见遗嘱），现在这种滥用职权的行为已成为当权的斯大林派的惯用手法。反对派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除了反对派的纲领联共和共产国际别无选择。认清自己的正确性不仅增强了继续斗争的力量，也增强了在斗争中自觉遵守纪律的信心。镇压吓不倒反对派，但是也不会使他们走上机关中的坏分子栽赃给他们的建立两个党和搞其他冒险的道路。党越来越想理解他们。反对派正竭尽全力让党了解和理解他们。党的路线将得到修正，党的统一

将得到维护。

17. 反对派声明的主要目的是向受到误导的党报告反对派的真正意图，以促进党内关系的缓和和改善。假定中央委员会真的相信反对派要举行起义或有其他类似的图谋，那么30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必定会向中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员会的任务是确认反对派在暴力冲突的威胁下已放弃了所谓的结合，中央委员会就有责任尽快让全党知道这个声明。中央委员会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全党隐瞒了声明。同时在机关里散布反对派“投降”的荒唐传言。党有意表现出困惑不解和担心：反对派投降了吗？还是动员起来创建“第二党”、打内战等等？实际上这一切均纯属子虚乌有。反对派正在继续以全副精力为自己的观点而斗争，正在放弃那些有利于斯大林推行其加快分裂政策的斗争形式。

18. 为了尽可能广泛地展开代表大会召开前的镇压运动，中央委员会就一定要隐瞒反对派的声明，尽管是暂时隐瞒。此外斯大林派还能做什么呢？反对派的反提纲非常明显和令人信服地暴露出中央委员会提纲思想上的贫乏。反对派的行动纲领仍在发生效力。7小时工作日的把戏等显然具有玩弄权术的性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报刊都赞成声讨反对派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镇压是斯大林派采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惟一的手段。为了替镇压辩护，需要制造反对派所谓企图起义的恶毒的谎言。30位反对派分子的声明，揭露了这种谎言。正因为如此要对全党隐瞒这个声明。由于隐瞒不能持久，就使镇压行动具有匆忙、大规模恣意妄为的性质。现在甚至已经不去搜寻堂而皇之的开除理由了：只要同情反对派就够开除条件。

19. “你们会服从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吗？”提出这个问题的是那些通过严重违反党章来筹备并在筹备期间继续进行镇压的人。按照斯大林派的意图，将数百名优秀党员开除出党，直至将季诺维也夫

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无非是企图迫使反对派转向第二党的地位。是否存在这样的危险，即精心安排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批准斯大林派的这一政策，或者至少是通过取消来确认这一政策呢？不可否认存在这种危险。反对派会服从这种进一步走向分裂和两党并存的决定吗？反对派决不会服从这样的决定。反对派决不允许把它与苏联共产党分开，也决不会组织第二党。反对派也不能允许将自己推上这条道路，即使动力来自精心安排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不管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作出什么决定，反对派都将把自己看做是联共的一部分，并据此来采取行动。如果反对派在党内处于孤立状态，斯大林派很可能通过将大批党员开除出党来达到分裂的目的。但是情况已并非如此。跟着反对派走的还有准反对派，跟着准反对派的是同情者，他们虽然尚未决定投反对派的票，但是他们通过不参加投票的形式表达出自己不赞成党的现行制度的态度。这样的人很多，而且数目还在增加。他们正在向反对派靠拢。对反对派的镇压把这一层人推到我们这边来了。将数百名甚至数千名反对派分子开除出党割不断他们与党的联系。党决不会分裂。反对派决不会脱离党。

列·托洛茨基

1927 年 11 月 17～20 日

№07574

反对派领袖提交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两份声明①

（1927年12月10日）

一

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宣布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并宣传其观点与留在布尔什维克党内不能相容。可见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不仅不接受我们的观点，而且禁止宣传这些观点。我们在代表大会面前维护对其正确性确信不疑的原则性观点，同时在提交代表大会的声明中强调指出，我们认为自己必须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不管这些决定对我们来说有多么沉重。

整个情况提出了第二党问题。我们拒绝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走建立第二党的道路，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原则性的。有鉴于此，也是为了服从代表大会的各项决定，我们声明如下：

（1）反对派应停止存在，（2）我们全都同意执行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宣传反对派观点的决定。

我们呼吁我们的全体志同道合者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作出自己的结论。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站在党所指定的位置上，全力以赴地在日常的实际工作中贯彻党的决议，帮助党走向列宁提出的目标。

① 发表在1927年12月20日的《真理报》上。

同志们，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而被开除出党的同志已向代表大会提出恢复党籍的请求。我们在此重申他们的请求并表示支持，同时认为释放那些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而被捕的同志是不言而喻的，也是绝对必要的。

（无季诺维也夫）[①]

二

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加入反对派与留在党内不相容的决定促使我们提出如下声明：

我们服从代表大会的决定，停止一切派别工作，解散所有派别组织并让志同道合者也这样做。我们坚决拒绝走第二党的道路，我们认为在这方面进行的任何尝试是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存在完全抵触的，因此是注定要失败的。

毫无疑问根据代表大会的决定，我们承担不用派别方式宣传我们观点的责任。

同时我们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在党的面前维护我们在行动纲领和提纲中提出的观点。在党内放弃维护自己的观点在政治上等于放弃自己的观点。如果我们确信这些观点是错误的，即不符合联共（布）党章或是从党的命运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角度来看并不重要，那我们必定会放弃这些观点。否则放弃维护自己的观点实际上就是放弃履行党员对党和工人阶级承担的义务。

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志同道合者，包括被开除出党的人，将证明自己对列宁的党的忠诚，并将毫不动摇地维护党的统一，把这

① “无托洛茨基”、“无季诺维也夫”看来是指此人未签名。——托洛茨基注

视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条件。

我们坚信，党一定有办法恢复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被开除的同志的党籍，释放因从事反对派活动被捕的同志。

（无托洛茨基）

1927年12月10日

№07575

穆拉诺夫致托洛茨基

（1927 年 12 月 18 日）

最近有关广州起义以及后来关于这次起义被镇压、同苏联断绝关系等消息使我非常清楚地想起今年 11 月 15 日我与《消息报》副主编格龙斯基同志的那次与此有关的谈话。格龙斯基同志在劝我放弃反对派的行动时顺便提到了中国问题，他认为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自然而然地被取消了，因为那里正在酝酿发生全新的事件，以往所有的失败已退居次要地位。

格龙斯基同志对我说：“广州正在酝酿而且不久将爆发新的、导致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起义。”

我很了解格龙斯基同志，当时对他的话并未特别在意，现在看来，格龙斯基同志预言的准确性以及他在“说服反对派”与中国事件之间的奇怪联系，不能不发人深思。

穆拉诺夫

1927 年 12 月 18 日

【专题说明】

托洛茨基的第三次流亡

（1928 年 1 月至 1940 年 8 月）

1927 年 12 月联共第 15 次代表大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次年 1 月，托洛茨基被流放阿拉木图。在这里他并没有停止领导反对派的工作。1929 年 1 月国家政治保卫局决定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这样，开始了托洛茨基一生中的第三次流亡生涯。托洛茨基一行于 2 月 12 日抵达土耳其君士坦丁堡，住在普林基波岛。1933 年 7 月移居法国。1935 年 6 月在挪威获得避难权，在此一直住到 1936 年底，于 1937 年 1 月移居墨西哥，住在小镇考约阿康。流亡期间，托洛茨基一方面从事著述工作，写了几部有关俄国革命的历史和理论以及分析苏联现状的著作，出版了颇有影响的《反对派通报》；另一方面，创建了第四国际。由于流亡国外，他逃过了 30 年代莫斯科的三次审判案，但最终没有能逃过克格勃的杀手，1940 年 8 月在住地遇刺身亡。本专题涉及托洛茨基整个流亡时期的活动，对驱逐和流放过程记载尤详，其流亡日记主要不是记事，而是记其所思，对研究托洛茨基的思想颇有价值。

（本专题由郑异凡编辑和校注，
乌传衮翻译）

№03609

列·谢多夫[①]：押解阿拉木图

（1928 年初）

亲爱的朋友，你请求详细描述我们迁往阿拉木图的旅途情况——好吧，我就以有闻必录的日记形式来做。有些地方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加以删削。

经过最后几天极端折磨人的日子，特别是令我们虚惊一场的“出发”这一天，睡了很长时间。我还在穿衣服，这是 12 点多的事，听到门铃声，然后是走廊里的脚步声和陌生人的讲话。“国家政治保卫局。”——一个念头闪过脑际。果然如此，走廊上站着他们一大群人，都穿着军装。为首的是昨天在火车站发号施令的那个人。他手上拿着一纸命令（我后来知道），内容大体如下：“着令卫队长 K.……同志押解公民托洛茨基去阿拉木图市，立即执行。”签字的是雅戈达。警备长向列·达·报告说：“您出发的时间定在今天 2 时 25 分。”“什么？那东西呢？我们来不及收拾……在火车开动前 2 小时才通知，真不像话。”“我们来帮忙，帮忙整理。”他们无奈地重复着这句话。列·达·拒绝自愿上路，走进最里面的一间房间（卧室），我们都跟随着他走了进去。除了我们，也就是说，除了娜

① 谢多夫，列·李·（1903－1938）——托洛茨基和谢多娃的长子。就学于柏林工艺学校，帮助其父从事政治活动。《反对派通报》的编辑和出版人。1938 年 2 月 16 日死于巴黎。

塔利娅·伊万诺夫娜[①]、弟弟[②]和我（阿尼娅在上班），还有碰巧在我们家里的И. 和Ф. В.。我们锁上了房门……门外传来声音："托洛茨基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说几句话……""让明仁斯基来接电话"。"是。"停顿了一会儿。（在门外）"托洛茨基同志！明仁斯基不在"。"那就找雅戈达。"走了。我们等着。"来接电话。"——我们听见说话声，但声调有些迟疑。列·达·打开了门，走到走廊上，我们的电话就在那里。从那里传来以下的对话："喂！""我在听。""是谁？雅戈达同志？""不，我是杰里巴斯。"他没有再答话，挂上了话筒。然后，转向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说："伊万·尼基季奇·斯米尔诺夫在前线没有多补一枪把临阵胆怯的杰里巴斯打死，我不想和他说话。我是请求与明仁斯基或雅戈达通话。"又锁上了门。"他们不在。""他们躲到床底下去了，不敢来接电话。"沉默了几秒钟……"托洛茨基同志，听我说完，您何必躲着我？"列·达·默不作声，然后勃然大怒。他一直走到门旁，喊道："不要放肆，你们闯进我的住所，还竟敢说我躲着你们……"他们沉默了。我想去走廊；要他们允许我给妻子打电话或派人去找她。（除了列·达·，我们任何人都不和他们单独谈话，——这是他要求的。关于我要求在动身前见一见妻子并从那里取来我所必不可少的眼镜的事，他已经提出过。他们答应了。）回答我说："可以，""稍等一下，"但什么也不办。我拿起电话。"不能打电话！"我走进厨房，那里也有人，是从后门进来的；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壮小伙子。我走回我们的"碉堡"。听见门铃声，是来找谢尔盖（弟弟）的一个同学，非党大

① 谢多娃，娜·伊·（1882～1962）——托洛茨基的第二任妻子。1902年在巴黎认识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逝世后仍住在墨西哥。卒于巴黎近郊。

② 谢多夫，谢·李·（1906～1937）——托洛茨基和谢多娃的次子。生于维也纳。学者、莫斯科鲍曼高等技术学校教师。1937年10月29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判处枪决。

学生，结果中了埋伏。不让他走了。他一脸惊讶之状，也略有些害怕。（在“内部监狱”关了他大约两周时间。）我迅速走了回去，在我后面锁上了门……外面还是那个声音：“我不得不用强制手段带走你们。”（这当然是事先商量好的。）我们沉默不语。他们用了个什么东西拨弄锁孔，未能成功。我提议用家具堵住门。列·达·坚决不许。门外传来下命令声：“把门砸开！”看来在找什么东西，终于找到了，打碎了门上的玻璃。通过洞孔可以看到，他们动用的是我们的凿子。然后，一只手臂伸了进来，有点慌张畏缩地迅速打开了门。他们走了进来，准确点说，是一下子涌了进来。他们神情紧张，我们也很激动。“托洛茨基同志，我必须执行命令，即使采取强制办法也要执行……向我开枪吧，开枪吧！”——突然之间他又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对他们的回答是：“你们胡扯些什么，谁也不打算向你们开枪。”立刻都安静了下来。几个穿便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摆着放肆无礼的架势走了进来。其中有我们见过的人：昨天那人（一个讨人厌的胖子，无赖）和巴雷奇金。他原先是梅季希的工人，一度曾是一个不坏的革命者（据列·达的评价），现在则彻底堕落，成了一个酒鬼，而且挥霍无度。“便衣人员，请把帽子脱下来，你们不是在街上。”他们不知所措了。“我们是共产党员，”——轻声地回答说。放肆无礼的气焰当即消失在走廊里了。为首的吩咐说：“去拿大衣和帽子来。”然后，他转向列·达·：“我们是士兵，要执行命令，您自己知道，您曾是军人。”“我从来没有当过士兵，我曾是十月革命的士兵，而这不是一回事。”……他简略地向他们叙述了美国人那一次如何在加拿大强迫他从轮船上下岸，也同样说“有命令，”“我们是下级，”等等。我跑到走廊上，在自己房间里拿了文件和香烟。Ф. В. 在给自己家里打电话，通知自己被带走了。我拿起另一只电话，要了两个号码，但是偏偏又都占线。那个身材高大的壮汉现在站在电话机旁，但并未阻拦，也

许是不知所措，也许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是别洛博罗多夫。我只来得及说了声："喀山车站，现在要带我们走。"为首的抢走了话筒，还郑重其事地喊道："这不诚实！"蠢货，——我真想顶他一句——但没有讲话。列·达·被拉着手臂从走廊拖走；这是我丧失相对平静的时刻。娜·伊·一面穿衣服，一面跟在他后面。他被推出门外，也放她过去，然后关上了门，不让我们过去。我一面穿衣服，一面喊："我也去，放我过去。"无济于事，"不行，""没有命令。"弟弟对他们大声呼喊，准确点说，是在大骂。没有时间迟疑。我们一起扑向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把他从门边推开。我打开门跳了出去。谢尔盖把那个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顶在角落里。这时，Ф. В. 和 И. 跟着我冲了出来。在他们之后是谢尔盖。门已经攻破。列·达·坐在楼梯台阶上。我真切地回忆起加拿大……"打倒英国……不，是斯大林的横行不法。"我从楼梯跑下去，开始跟娜·伊·一起挨家按门铃。玻璃门上出现了受到惊吓的面孔，我向他们大喊一些什么。他们把列·达·从楼梯上抬了下去。事后他讲了一个可笑的细节：一共是3个人抬他，觉得很重，他们一直是气喘吁吁地异常吃力，而且不时地停下来休息。

院子里在门厅旁有一辆汽车，简直是把我们塞进去的。谢尔盖上车时车子已经开动，他连帽子也没有戴。街上有几个人困惑不解地看着。车上紧紧地挤了9～10个人。从窗口我们看到前后都有汽车"护送"。在路上，我建议弟弟跳下车，去通知同学和阿尼娅。没有想到，在混乱之中 И. 跑掉了。在卢比扬卡广场我们作了一番尝试：我们拼命挣扎，但被看得紧紧的。谢尔盖只来得及伸出两条腿——车门把他挡住了。我们俩被牢牢抓着。驶近卡兰切夫斯克广场——几个火车站所在地段。拐了一个弯，但没有去喀山车站，而是一直驶向著名的雅罗斯拉夫车站。驶进广场，有人跳上踏板，指着路。几乎靠近站台我们才下车。别连基一伙从后面一辆汽车跳

了下来（这个胆小的蠢货竟也在这里）。“东西怎么办？”列·达·问。“所有的东西，全都会弄来的。”别连基回答。“您撒谎，如同那一次在死去的越飞[①]那里撒谎一样，说没有给我的信，其实是自己偷了信。”他们拉着胳膊带走列·达·，然后又把他抬着走。空寂无人。远处站着少数几个铁路员工。我向他们喊道：“工人同志们，你们看，他们是怎样抬走托洛茨基同志的。”其中一人（看见了列·达·）脸色激动。我被人从后面抓住脖领。听到粗野的骂声。“闭嘴……”突然之间又把我放掉了，我一下子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继续呼喊着。后来得知，是谢尔盖给了抓住我的人（就是那个巴雷奇金）兜脸一拳。他后来叙述说：“因为他那靶子很宽，这一下子打得不坏。”那人立即放下我，用手捂住脸，走向一边……

靠站台边上只有挂在机车上的一个车厢（北铁 5493）。住所门旁的情形又重复了一次，——不让我们任何人进去。后来又同意我们全部乘车去目的地。一片混乱——手足无措。

在车厢里我们占了一个指定给我们的包间，靠窗边还坐了一名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另一名站在开着的门旁。列·达·开玩笑，回忆绑架的情况，总之，寻找这次“远行”的开心之处。谈到杰里巴斯，列·达·说：一个渺小可怜的官迷。谈到别连基则说：那一个格里沙（他的哥哥），在国外时是侨民革命者，而这一个只不过是逃避服兵役的人。然后，他又故意大声说起，我们连流放也不会安排得像样一点，正如不会搞经济一样。都是一个样。他带着憎恶的心情谈到办事粗糙，——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特点……在经济上，理论上，流放方面都是如此。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特点。（顺便说一下，安排流放的事据说是由布哈林领导的。）接着他又走出去和

① 越飞，阿·阿·（1883－1927）——1918 年布列斯特和谈期间曾任苏俄代表团首席代表。后历任驻柏林、中国、奥地利全权代表。自杀身亡。

押送人员“解释清楚”。他说，对个人而言，他们只不过是执行者，对他们没有任何意见，示威行动（即拒绝自愿出发）是纯粹政治性的。又向他们讲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不善于安排流放。掀起一阵喧闹，莫斯科全城都知道了这件事，而这恰恰是他们想避免的。一片唉声叹气……卫队长喃喃地大致说：“是的，搞得不怎么样……”列·达·笑了。“我曾经参加过，也安排过比这更复杂的行动；我要是处在你们的位置上会怎么办呢？……”接着他向他们设想了一个安排押解出境的计划……然后，可以说作为教训，又向他们叙述了1910年负责把列·达·押解出法国的警官比捷·福巴的故事。这个比捷·福巴后来到了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留下未走，好像在1918年被契卡逮捕。还把他带到列夫·达维多维奇那儿。押送的正是那个杰里巴斯，如今由他负责把列·达·流放到阿拉木图。列·达·当即认出了比捷，此人没有刮脸，没有戴硬领，皮肤松弛。“嗯，是的，先生，这是我。”列·达·问他：“怎么会这样？您曾经放逐别人，可现在却蹲在我们的监狱里。”“这就是事变的进程。”那人的回答颇有哲学意味。（后来用他换回了某个人。）列·达·对听他讲话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说：“你们看到，历史在重演；它还会展示许多东西，历史。”

就这样，我们乘火车行进。在前面某处应当把我们挂到“莫斯科—塔什干”列车上。一路上我们缺少最必要的东西，没有手套、靴子，要知道，这是冬天。我们的“列车”从北方铁路转上喀山铁路，一直驶到距莫斯科50俄里的福斯托沃车站。我们停在距站台80～100俄丈之外；要在这里等候去塔什干的列车。我走出车厢；没有人阻拦我。我走向车站，想作一番“侦察”，也许可以发一份电报。在我身后两步远一名“护送人员”踱着步子跟着。我走进一间阴暗的小吃店，要了一杯茶，环顾四周。我的随行者一下子钻进了挂着“电报局”牌子的门。我决定也进去一下，看他在那里面想

干什么。在那里（“护送人员”在场）我们进行如下对话：“在那儿发电报？”“这不是电报局。”“那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原来是电报局。”“那为什么门上挂着牌子？”我继续问下去。“没有来得及把牌子摘掉。”“那现在这里的电报局在哪里呢？”我揶揄地问。“这里根本没有电报局。”于是我指着房间里的电报机，又问：“那这是什么？”“这是……这是……”他们张口结舌，无言可对。我笑了笑（这是我惟一可以做的），走了出来。照旧把我护送到车厢。

不久一趟列车到达，随车带来了我们的几只箱子。我们被挂到了这趟列车上。我们在这里同送我们到此的两个人：谢尔盖和Φ. B. 告别。他们将在这里等几个小时然后乘去莫斯科的火车；这是正常的乘车了。还好，有人从列车员那里给弟弟要来一顶棉帽子。我们的车开动了。驶向阿拉木图。

开始安顿起来。分给我们2个单间，一间放行李，用作饭厅，还有我住。另一间是列·达和娜·伊·。

从以上所述，你不难对《真理报》（谎言报）上关于“老爷派头”等等的短文作出评价。如所周知，车厢不是我们选择的，是护送我们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定的，我们一路上没有用品。人们在纸上什么都可以写。

几个小时以后，在一个什么站上，我想下车走动一下；却不让我出去。我告诉我们的人，这一次决定先不作声。列·达·认为，最好不要搞僵，这不会有任何好处。相反，应当逐渐争取某些行动自由，例如，把那个国家政治保卫局人员从包间里挤出去，以便让娜·伊·能入睡。这一点到傍晚做到了，他搬到走廊上靠近包间开着的门旁。我想去餐车吃晚饭，又不让去。列·达·请卫队长（或者是，带队的，列·达·就是这样称呼他的）到他那里来，对他说：“并没有通知我说我的家人也被捕了。这是怎么回事？”“没有被捕，但我无权。”那人回答说。娜·伊·建议说：“请派个押解人员跟着

他。”“我觉得这样不合适。不能看管着（装出为难的样子）。”“我觉得十分合适。”我试着插话。“那给他派个便衣，你们反正有便衣人员……”“这不合适。”卫队长重复了一遍，就走了。我饿了，十分恼火。突然他又走回来了，说：“请去吧。”列·达·问：“怎么回事？”“请原谅，我错了。”莫名其妙。并且按照我们所提出的，派了一名便衣人员跟着我。没有让我从站台上走，而是从另一边，即从铁道线路上走。难以理解的小心谨慎。

夜里，当我的“老人们”躺下睡觉以后，有人来敲我的门。“列夫·达维多维奇已经睡了？”“也许吧。”“能不能麻烦您（多么礼貌）说一下，根据条令门必须开着。”“你们自己去说吧。”他们敲了门，通知了。列·达·回答说，门没有上锁。“反正是一样，至少要留一条缝。”怕他跑了，还是怕什么。

他们在门上滚珠滑动的地方钉上了一块木板，使门无法关严。门晃动着，吱吱作响，妨碍入睡……只好忍受。我心安理得地锁上门（反正我没有被捕），躺下睡了。就这样，不管怎么说，过了不同寻常的一天。

我们走后在我们住所里发生的所有一切，在数以千百计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住所里都发生过。几个昼夜之内连续设伏，挨户搜查，逮捕了25～30个前来告别的同志。他们同成百成千的反对派分子一样“蹲”了监狱，起先在“内部”的单人牢房，不给书报看——处于完全隔绝的状态；然后关进布德尔基监狱，卫生条件极差，同所有各种“专业”的刑事犯关在一起。到处都是蛮横无礼的对待，态度粗野，侮辱人格……绝食成为惟一的抗议方式——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所共知的！[……]

№03610

托洛茨基为基什金出具的证明

（1928 年 1 月 21～22 日）

如果把按第 58 条放逐我的做法的反革命性质，以及把我和我们一家遣送出莫斯科的令人愤慨的条件（看来，这一切并不取决于押解队及其队长基什金公民）放在一边的话，那么在火车乘行方面我对基什金公民没有任何不满的意见。他为了使我和我们一家路上方便做了他在上级授权范围内能做到的一切。

列·托洛茨基

［1928 年］1 月 21～22 日

于突厥斯坦站

№03611

托洛茨基就住所问题致明任斯基和加里宁

（1928年1月31日）

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长明任斯基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

电报

流放我和我一家应当是安排有住处的。但是，阿拉木图的所有住宅均不许动用。当地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不给予任何协助。国家政治保卫局让我们住进条件近似监狱的旅馆。我们在餐馆就餐，其伙食对身体健康有致命危害。由于没有住房我们无法从行李中取用衣衫和书籍。旅馆和餐馆的费用我们根本支付不起。需要有够住的带厨房的住所。

托洛茨基
1928年1月31日
阿拉木图

№03612

托洛茨基就生活条件致奥尔忠尼启则、加里宁和明仁斯基

（1928 年 2 月）

致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
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明仁斯基

电报

1. 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局长阻止我外出打猎，拒绝签发书面命令。这无异于用逮捕代替流放。

2. 我仍然和家人住在旅馆。拨给的住房没有厕所，厨房是坏的，但就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旁边，完全是为了他们的方便。

3. 在莫斯科就可以创造监禁的条件，没有必要发配到 4 千俄里以外来。

托洛茨基
1928 年 2 月

№03613

托洛茨基致志同道合者们的信

（1928年2月27日）

简要向你们通报我们离开莫斯科以后发生的一切。关于出发的情况你们肯定已经知道。我们乘特快列车（一台机车和我们一节车厢）从喀山车站开出，超过一趟被滞留大约1个半小时的快车。在距莫斯科47俄里处，我们的车厢挂到了一列快车上。我们在这里告别了为我们送行的弗兰尼亚·维克多罗夫娜·别洛博罗多娃和谢廖沙（小儿子）。在车厢里我们没有任何东西。经接连不断地打电报，给我们发来了所有的东西。直到第7天或第8天行李才赶上我们，那已经是在皮什佩克（伏龙芝）了。我们之所以行驶了如此长时间是因为积雪的缘故。从皮什佩克又改乘卡车出发。途中冻得够呛。通过库尔代山口时，我们乘坐的是大车，一共走了约30俄里。然后又乘坐从阿拉木图派来迎接的汽车。东西则装在卡车上跟在后面走，但护送人员竟有本事丢失了两只装有最有用物件的箱子：我的关于中国、印度的书还有一些其他东西都丢了。我们于1月25日夜间到达阿拉木图，被安置在一家旅馆里。凭良心说，我应当承认，并没有臭虫。总的说来，住在旅馆里十分令人生厌（我这样说，是因为现在正式承认“自我批评”是必要的）。由于哈萨克斯坦政府即将于4月份迁来这里，所有的住房都登记备用。于是就开始了一场客气点说是拖拉战。直到我向莫斯科一些最高层人士发了几份电报，才终于在滞留旅馆3周之后给我们提供了一套住房。不得不购置家具，修复损坏了的炉灶，总之要从事一番建设，当然这

都是计划外的项目。建设直到今天尚未竣工，因为可敬的苏维埃炉灶烧不热。在途中我又发烧了，来到这里后更是不时发作。不过总的说来，我的自我感觉还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当报上出现了两个倒霉的火枪手所写的信时，我不知是第几次又回想起谢尔盖有先见之明的话："无论同约瑟夫还是同格里戈里都不要联合，——约瑟夫会骗人，而格里戈里会溜之大吉。"格里戈里果然溜之大吉了。不过，联盟还是起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先进工人联盟的作用。看来可怜的火枪手期望的是，有了他们那封可怜而又愚蠢的信他们会得到宽恕。事与愿违：《真理报》客客气气地发表了马斯洛夫的驳斥，一下子打中了他们的要害。除了许多重大的坏处之外，至少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几个虚假的大人物退出了牌局，而且很可能是永远退出了。

我在这里对亚洲作了大量的研究：地理、经济、历史，等等。目前只收到二份报纸：《真理报》和《经济生活报》。阅读很勤奋。国外的报纸少得可怜。我已经写信请人给我转寄报纸，即使不是最新的也罢。邮件一般要迟误很久才到达这里，极不正常。开始是因为积雪路阻。后来又发现，皮什佩克和阿拉木图之间的马匹邮递安排得不好。当地的报纸是《杰德苏伊火星报》（每周出版 3 次）。人们应允说，邮递方面的混乱现象即将"克服"，因为已着手同新承包人谈判。总之，"正在整顿"。

1928 年 2 月 27 日 [……]

№03614

托洛茨基致索斯诺夫斯基[①]

（1928年5月5日）

……对您论述农村政策的长信，我将在最近回复。我认为，对于当前形势的判断我们没有分歧。值得注意的是，我顺便说一下，目前全部精力都已用于同“过火行为”作斗争。真令人惊讶，同极左的过火行为已经斗争了几年，似乎已给自己上了100%的保险，可是才开始向上指了指，就立即出现了极左的过火行为。从哪里来的呢？

广州的形势也是这样：用了5年时间教训人们说，历史的罪恶根源主要在于“不断革命”。而在广州，当共产党稍稍从国民党的控制下摆脱出来，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就被说成是犯有这种“不断革命”的原罪。那也就是说，又是过火行为。当然，负有罪责的是执行者。但是，执行者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知道吗，我偶然得知这样一种事，在16世纪俄国的公文中解释当时人们反复无常的原因时说，这是因为他们“精神上好走极端”。我很喜欢这种说法。根据16世纪这种至今仍保持着新鲜感的理论，用好走极端精神教育出来的人办事总是过火。不过，还是应当补充一点来减轻这些好走极端者的罪过，那就是，他们处于措手不及的状态。而

① 索斯诺夫斯基，列·谢·（1886～1937）——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4年（有间断）任《贫苦农民报》编辑。1921年任党中央鼓动宣传部长。1927年在党的第15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被流放巴尔瑙尔，1929年作为不改悔分子被关押在车里雅宾斯克政治隔离所。

要解释目前反对过火行为的警告，应当考虑到存在一种来自下层的深刻的、有机的、出自本能的反抗。因为除了“好走极端者”这种几乎抽象的个人之外，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世界上还存在地方上的土生土长的人们，他们比“好走极端者”更加强大，他们正在进行，而且今后还将进行简单的或者联合的反抗。又需要有其他一些土生土长的人来与他们相抗衡，而为此需要……等等。

您是否读到过科列奇卡·巴拉博尔金关于反对派和分析我们的困难的报告。这真是一件有典型意义的东西。他得出结论：按照我同您的观点，富农之所以横肆暴虐，是由于我们“技术经济落后”，而要反对这一点是无能为力的，除非由“组织成国家的西欧无产阶级”前来帮助我们。由此可见，结果是，按照我和您的观点，科列奇卡·巴拉博尔金无论是在粮食采购的困难上，还是在使粮食采购落到了持戴季陶观点，即否认阶级存在的人们手中，都没有任何罪责。所有这一切的原因——仍然是按照我们的观点，是大自然的规律，是经济落后的规律。与此相反，科列奇卡·巴拉博尔金进入广场说：“不要相信我，正教徒们，我有罪，我偷盗了。”即使他并没有逐字这样说，那么从他的寓意深长的全部论说中也绝对得不出任何别的结论。

我还想问您，您能否向我解释一下，实施“自我批评”的口号意味着什么？什么是自我批评？是否应当从字面上来理解，即批评自己，还是从精神上理解，即有可能批评主管人员。如果采用后一种意义作为指导思想，那么任何口号都不会有，因为批评的愿望和批评的需要并不缺乏，而问题可以说是在于有没有可能性。因此，“口号”不应当是“自我批评”，而应当是有可能把那些“好走极端者”撤职，因为他总是一成不变地把自我批评转向下一层楼，而每一层楼都坐有本楼层的“好走极端者”，最后只好改变地理的经度。这个题目又需要作更广泛的叙述。

我又想起了“好走极端者”。他们的原型就是那个五等文官佩列德拉金，他很善于写关于宪法的好处的报告，也能写宪法害处的报告。诚然，当他写好处的时候，写出的仍然是害处。日前我又翻阅了谢德林的《色彩斑斓的信件》。写得多好。正因为这是一篇天才的讽刺作品，它的打击力量就超出了本时代的范围。

我们这里似乎终于是春天了，算一算已是第5次了。可惜，它带来的，除了满园繁花以外，还有疟疾横行和食品乃至整个粮食危机的尖锐化。可记得我曾写信给您说过，在我们停留此间的时期，小麦面粉的价钱约在1普特8～10卢布之间。今天，有一位消息灵通人士刚才说，市场上1普特面粉已要25卢布了。日前本地报纸写道：“粮食告罄的传言在市内不胫而走，但事实上大量满载粮食的马车正在源源而来。”马车，诚如所说，正源源而来。但目前谣言在发挥作用，疟疾在发挥作用，而粮食则没有发挥作用……

关于健康状况：娜·伊·和我都显然得了疟疾。不过总的看，我仍有工作能力。

1928年5月5日

№03615

托洛茨基就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致梁赞诺夫

（1928 年 5 月中旬）

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梁赞诺夫[①]

亲爱的达维德·波里索维奇！

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第 1 卷使我产生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是带根本性的。我首先要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起先我认为对付不了德文本，因而甚至忽略了我手头就有德文的第 1 卷。但是着手之后，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参阅德文本。我得出这样的结论：译文高于苏联中等水平的译本，但仍极其相近。没有达到可以而且应当达到的准确性，而且有些地方甚至令人不解，为什么要用转述来取代翻译，尽管是很有水平而且是很用心的转述，但毕竟是转述。作为样例，我把自己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献词和序言的开头一段的译文寄上。我没有翻译，而只是按照德文本对打印的译文进行了修改，也就是说，做了依我看来至少必须进行的修改。对我作出的每一处修改，如需论证则加以论证。现举例如下。

（1）马克思说：“我亲爱的**慈父般的朋友**。”我会就这样翻的。再不行，也可以译为“**父亲—朋友**”。无论如何不能翻译成“**父亲和朋友**”，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这两个称谓作为各自独立的词加以并列，而是把它们溶合为一体：是朋友，但不是一般的朋友，而是

① 梁赞诺夫，达·波·（1870～1938）——早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是著作家团体“斗争社”的组织者之一。1917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布），从事工会工作。1921～1931 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1931 年被开除出党。

慈父般的朋友，父亲—朋友。

（2）马克思说：在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封面上。译者加成了：**如此**微不足道的小册子。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句子的语气。马克思决不是想说，小册子微不足道，也就是没有价值；他是想说，对写献词来说小册子的分量还不够。

（3）献词的第二句我几乎逐字翻译的，这样可以使它具有另一种心理色彩。

（4）献词第二自然段的开头，由于增加了“我但愿”（я желал бы）的字样，致使马克思原先的昂扬激越的语调变成了个人感伤的语调。

（5）**惊讶**（изумлять）一词译者改用**景仰**（преклоняться）。虽然献词的写法语气极其夸张，但青年马克思未必就是想表示对威斯特华伦的**景仰**。至少他用的不是这个词。

（6）充满青春活力的（юношески сильный）老人不知为什么被改换为永远年轻的老人（вечно юный）（我没把德文抄下来，因为我用的是俄文打字机，请您自己用德文本作比较）。

（7）紧接着**老人**一词之后，是一个从属句，译者通过使用形动词“欢迎的”（встречающий）将其简化；但是，下一个与之平行的从属句却没有再加以简化（“从不倒退……”）（который никогда не отсупал）；于是整个句子挤在一起，甚至意思遭到损害。结果，似乎“从不倒退……”这个从属句不是用来说明“老人”，而是用来说明“世界”。

（8）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面对时代上空的浓云迷雾”（перед темным облачным небом времени），他指的是反动**时代**（эпоха）。但是译者却翻译成“面对阴暗的地平线”（перед темным горизонтом）——这就失去了形象比喻的历史特点。

（9）马克思说：“透过所有遮盖，或外壳，或面具，或面罩来

看”（смотрел через все покровы，или оболочки，или маски，или личины），而译者却翻译成“透过各种变化看”（смотрел через все превращения）。马克思在这里是将精神同它的时间外壳、它的皮壳，即某种物质的东西相对比。“变化”一词完全没有表达出这层意思。

（10）马克思说：“肉体的康健”（телесное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肉体的”在这里是同“精神的”相对立的，是使用献词常用的哲学－圣经语言。译成“身体的康健”（физическое благополучие）就使马克思的意思庸俗化了。

仅限于举这几个例子。其他地方从我寄去的文本就可一目了然。不过，下一步怎么办呢？您当然很清楚，就这样对译文修改下去不啻是把全部工作从头再来一遍。不过，也许其余的译文会准确一些。博士论文以外的我暂且没有再看下去，我特意把最开头一部分寄给您，是为了避免让人怀疑我故意挑一些译文不妥之处。如果把德文原文放在一边，只作修辞方面的修改，那么我怕由于上述译文的特点，即译文近似，纯粹的文字修订会在无意中使翻译离原文更远。

这是我的根本困难。我愿意接受研究院的任何决定，即按照原文作根本修改或作表面修饰。按前一种方式工作，大体说来，所需时间会比后一种方式修订多 20 倍。请告知您的决定。

［1928 年 5 月中旬］

№03616

致志同道合者们的信（摘录）

（1928年8月20日）

……认为可以用外交方式进入党内，然后再为党的健康化而进行政治斗争的想法太天真了，如果不说得更重一些的话。季诺维也夫、皮达可夫和其他人的经验太有说服力了。这类人目前在党内比他们被开除的一周之前要少得多了。那时，他们发意见，一部分党员还听他们的。如今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他们不但不能发表批评意见，而且甚至颂扬也不行。季诺维也夫的文章不予刊用。中派分子更是特别粗暴地压制季诺维也夫集团，要求他们沉默和不要败坏中派分子的声誉。这些表示悔过的先生们留在党内，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莫非在于国家银行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向他们敞开大门？但是，为了要在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中央联社工作，其实无需先在行动纲领上签名，然后再宣布与之决裂。

1928年8月20日于阿拉木图

№03617

托洛茨基就停止政治活动问题致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①]

（不早于 1928 年 12 月 16 日）

今天，12 月 16 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全权代表沃伦斯基以该委员会的名义用口头形式向我提出了以下最后通牒：

“……您在国内的志同道合者的工作——这差不多是他的原话的逐字记录——近来具有了反革命的性质；在阿拉木图提供给您的条件使您完全有可能领导这一工作；为此，局务委员会决定要求您绝对保证停止您的活动，否则局务委员会将不得不被迫改变您的生存条件，即让您完全脱离政治生活，同时也将提出改换您的居住地点的问题。”

我向国家政治保卫局全权代表声明，只有收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书面最后通牒，我才能提交书面答复作为回应。我之所以拒绝口头答复，是因为根据以往的所有经验深知，我的话会再次被恶意曲以欺骗苏联和全世界的劳动者。但是，不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此事中不起独立作用，而只不过是从技术上执行斯大林派原先的，我早已知道的决定而已）今后将如何动作，我还是认为有必要将以下情况告知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向我提出的放弃政治活动的要求，意味着要我摈弃我不间断地进行了 32

① 1928 年 12 月 16 日，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全权代表从莫斯科来到托洛茨基住处，向他提出最后通牒：中止领导反对派工作。托洛茨基就此致函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年，也即在我生命中全部有意识的年代进行的为国际无产阶级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企图把这种活动说成为“反革命”活动的是这样一些人，即我向国际无产阶级提出指控的人，他们破坏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基本原理，损害世界革命的历史性利益，背离十月革命的传统和遗训，无意识但因而更危险地为热月作准备。[……]

理论思考和政治经验都证明，历史停顿、历史衰退时期，也即反动时期，不仅仅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可能出现，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以后也会发生。在苏联，反对十月革命的反动势力日益增强，从而在为热月政变扫清道路，我们在这种条件下生活了6年。这种反动活动在党内最明显和最完整的表现，就是对左翼的野蛮迫害和有组织的打击。在自己最后对抗公开的热月分子的尝试中，斯大林派是依靠反对派思想的“碎片”和“残余”而生活的。他们毫无创造能力。同左派作斗争使他们丧失了全部稳定性。他们的实际政策没有一个中心点，是虚妄的，矛盾百出的，不可靠的。吵吵嚷嚷的反右倾危险的运动，有四分之三是故作姿态，首先是为了对群众掩盖这一场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真正毁灭性的战争。世界资产阶级和世界孟什维主义同样都把这场战争神圣化：这些裁决者早就承认“历史的正确性”在斯大林一边。

如果不是这种适应于官僚和市侩们的盲目、胆怯而拙劣的政策，劳动群众的境况在专政的第12年应当安适顺遂得不知多少；军事防御能力也会强大可靠得多；共产国际也会站在完全另一个高度，而不必在背叛原则和出卖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人面前一步步后退。

貌似强大的机关反动势力的无可救药的弱点在于，他们无法控制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执行敌对阶级的意愿。对于脱离革命而又破坏革命的派别而言，没有比这更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了。

目前看起来软弱无力的反对派却拥有巨大的历史力量，这是因

为他们把手搭在世界历史进程的脉搏之上，清楚地看到阶级力量的变动，洞察明天的形势，并自觉地为之作准备。放弃政治活动就意味着放弃为明天的日子作准备。

以改变我的生存条件和使我与政治活动隔绝相威胁，听起来似乎我并没有被放逐到距莫斯科 4000 公里以外，离开铁路线 250 公里的地方，这里离中国荒漠省份的边界也不过相距这样远近，而且凶狠的疟疾同麻风和鼠疫一起肆意横行。听起来似乎斯大林帮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就是他们直接管辖的机关）还没有竭尽其全力来将我不仅同政治生活，而且同所有别的其他生活隔绝开来。莫斯科的报纸到达这里约需 10 天至 1 个月或更长。给我的信件能够寄达是少有的例外，而且是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中央书记处的抽屉里放了 1 个月、2 个月和 3 个月之后。从国内战争时期就跟随着我的两名身边工作人员，谢尔穆克斯同志和波兹南斯基同志，自愿陪我到流放地，但一到达他们就被逮捕，和刑事犯一起被关进地牢，然后发配去了北方的边远角落。我的女儿被你们开除出党，剥夺了工作，她病重垂危期间从莫斯科医院寄给我的信走了 73 天，以至于我的回信未能在她生前寄到。第二个女儿也被你们开除出党和剥夺了工作，她得了重病后别人从莫斯科写给我的信于 1 个月以前寄到，是发信后的第 43 天。询问健康状况的电报常常无法收到。目前处于这种境况以及处境更差的，有成千上万无可指责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他们对于十月革命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功劳大大高于关押他们和放逐他们的那些人。

狭隘的斯大林派别在策划新的、越来越严厉的镇压时，总是试图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诬陷反对派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有某种联系。而列宁在遗嘱中说到斯大林粗暴，不忠顺（不诚挚）时，他的这类品质还没展现出百分之一。现今的领导人在小圈子里说："这是为了群众所必须做的。"有时还更加厚颜无耻地说："这是为傻瓜

们做的。”我的一名身边的工作人员，整个国内战争年代一直主管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的奥尔基·瓦西里耶维奇·布托夫遭逮捕后被关押在闻所未闻的条件下，硬要这个一身清白、诚实谦逊、无可指责的党员承认显然虚构的，伪造的，按热月精神捏造的人为指控。布托夫以英勇的绝食作为回答，绝食持续了近50天，直至今年9月在狱中身亡。对于优秀的工人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忠于十月革命的精神而施加暴行、殴打、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这就是许多人所处的条件，而这种条件，用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的话来说，至今也未能“妨碍”反对派的，也包括我的政治活动。

说要改变我的这些条件使我进一步与世隔绝，这种可悲的威胁无非是说斯大林派决定用监禁代替流放。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这种决定对我并不新鲜。这种决定早在1924年即已预先作出，然后通过一系列的过渡状态逐渐实现，以便使被压制和受蒙骗的党慢慢地习惯于斯大林的方法，而通过这类方法粗暴的不忠顺如今已经发展到中毒很深的官僚的厚颜无耻的地步。

在我们递交给［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声明中，我们批驳了对我们的诽谤（这种诽谤只能使它们的炮制者名誉扫地），再次重申我们愿意采用党内民主的所有手段（没有这种民主手段，党就会窒息、僵化、分崩离析）在党的范围内为实现马克思、列宁的思想而不懈努力。我们再次表示我们坚定不移地准备用言论和行动帮助党的无产阶级核心通过协调一致的努力在不造成震荡和灾难的条件下改进政策方针、健全党和苏维埃政权。我们现在就站在这条道路上。对于说我们进行宗派活动的指责，我们回答说，要消除这种情况，只能通过如下办法，即取消言而无信地加在我们身上的“第58条”，并作为不背叛自己旗帜的革命战士，而不是作为检讨悔过的令人置疑的罪人，恢复我们的党籍。而且，似乎预见到今天提交的最后通牒，我们在“声明”中写道（逐字重复）：

“只有彻底蜕化的官吏才会要求革命者放弃这一切（放弃政治活动，放弃为党和国际革命服务）。只有可鄙的叛徒才会作出这类保证。”

对这段文字中我不能作任何改动。我再次把这些话告知对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承担全部责任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于我们所捍卫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的最终胜利如此满怀信心。①

人各有志。你们想今后仍然奉行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阶级力量的训示。我们清楚自己的责任。我们将彻底履行自己的责任。

［1928 年 12 月 16 日以后］

① 这段话在手稿中被删去。

№03618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局务委员会特别会议记录摘抄[①]

（1929年1月18日）

听取：

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的案件。根据刑法典第58－10款他被指控从事反革命活动，其表现为组织非法的反苏政党，该党近期以来的活动旨在挑起反苏行动并准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

决定：

将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

1929年1月20日

阿拉木图

经查核无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阿拉木图区分局局长

托洛茨基的签条

“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特别会议1929年1月18日作出的实质上犯罪的而在手续上也属非法的决定，已于1929年1月20日向我宣布。

列·托洛茨基。”

① 1929年1月20日，国家政治保卫局全权代表在大批国家政治保卫局武装特工的护送下来到托洛茨基的住所，向他出示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这个决议。

№11173

托洛茨基致福金

（1929 年 2 月 12 日）

致国家政治保卫局全权代表福金公民[①]

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局务委员会代表布拉诺夫称，您接到了坚决不可动摇的命令，不管我怎样抗议都要采用强制方法使我在君士坦丁堡下船，即交到凯末尔及其特工手中。

您之所以能够履行这一委托，只是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即斯大林）同凯末尔订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土耳其民族法西斯警察联合力量强制地把无产阶级革命者转移到土耳其的协议。

如果我在这种时刻不得不听由暴力摆布，而这一切都是列宁过去的学生（斯大林及其一伙）罕见的背弃信义行为而造成的，那么我认为有必要同时警告您，十月革命、联共和共产国际必将，而且我希望，很快就要在真正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基础上得到复兴，那时我迟早将有可能对这次热月罪行的组织者及其执行人追究责任。

列·托洛茨基

1929 年 2 月 12 日

于“伊里奇号”轮船驶近君士坦丁堡之际

① 1929 年 2 月 10 日托洛茨基被押解到敖德萨，然后政策“伊里奇”于输般去土耳其。船上的负责人是国家政治保卫局全权表福金。

№03619

托洛茨基致凯末尔

（1929年2月12日）

致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先生阁下

阁下！

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前我有幸奉告，我来到土耳其边界绝非出于自身的选择，我之所以跨越边界，只是屈服于暴力。

总统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

1929年2月12日

№06771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外国部给明仁斯基的报告

（1929 年 2 月 20 日）

1929 年 2 月 20 日

第 53167 号

2 月 20 日君士坦丁堡方面报来谢多夫[①] 致凯末尔的信的译文：

“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先生阁下。在君士坦丁堡大门前我有幸奉告，我来到土耳其边界绝非出于本人的自由的选择，我之所以跨越边界，只是对暴力的让步。总统先生，请接受我的敬意。列·托洛茨基 1929 年 2 月 12 日。”

今天警察局长已将当地省长对这封信的复函面交谢多夫。谢多夫在同警察局长谈话时称，给凯末尔的信中关于暴力的那句话并非指土耳其当局，而是指苏联当局；他不打算长期留在土耳其，他对土耳其人也没有任何要求，谈话是由领事馆的译员翻译的。省长复函的准确内容我们尚无所知。

① 此处指列·托洛茨基。

№11174

托洛茨基致编辑部的信

（1929年3月22日）

君士坦丁堡的某些报纸报道说，在同土耳其新闻记者谈话时我说过，我打算：（1）在苏联进行一次新的革命；（2）建立第四国际。

这两种说法都同我所讲的话全然相反。我对这两个问题的观点在大量演说、文章和书中已有表述。

致以深深的敬意。

列·托洛茨基

1929年3月22日

№03987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①]

（1929 年 4 月 29 日）

亲爱的同志，可惜，从信看我怎样也无法猜到您是什么情况。我会很高兴同您建立经常的联系。目前我还暂时留在君士坦丁堡。正在为出版几本书，首先是自传，进行准备。此信同时按两个地址寄发。

1. 您同俄国有无联系？如有新的消息，请告。

2. 请把我申请挪威签证的材料寄来。还有议会会议记录等。柯伦泰起什么作用？

3. 请立即（用挂号）将您在信中所说到的列宁研究院的材料寄来：这是我写自传所**绝对不可少的**，首先是弗·伊·致普列汉诺夫的信。

4. 您是否有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信（1922 年）[②] 的复制件？这信是我极为需要的，而我的文件中没有此信。

总之，如果您有什么有助于我撰写自传的有价值的材料，请寄来，也可请其他人帮忙。十分感激，一切都将奉还。

紧紧握手！

列·托洛［茨基］

---

① 库罗耶多夫，彼·谢·（1894～1932）——联共（布）党员。1929～1932 年任苏联驻奥斯陆全权代表处密码译员。与女密码译员柯甘同居。1932 年因肺结核去世。

② 指列宁的《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见《列宁全集》第 43 卷。

又及：巴黎出版了我的一本俄文小册子（我为资产阶级报刊写的文章的汇编加上其他材料）。可按以下地址预订：Mr Maurice Paz 8，Cesar Franc Paris.

请在信中，用法文或俄文（不过这时要写 pour Joseph），提到是我说的。

我的住址：Madame Jeanne Molinier ismet pacha konak Jl Prinkipo par Constatinoplo.

这个地址不常用。

№03987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

（1929 年 6 月 13 日）

亲爱的同志：

终于收到了您的回信。而我已经几乎完全绝望了。十分感谢寄来列宁那封信的复印件。我不知道有这封信。它是从哪里复制来的呢？直接从原件，还是在什么地方已经刊印过？

现在谈谈您个人的命运。当然，如果您得以坚持下来，那很好。但是，如果由于“清洗”等等无法坚持，您有什么下一步的打算？您的其他语言怎样？也许，我们能够更好地安排合作？请就此尽量详细地谈谈您的看法。特别是：是否考虑一旦发生事故便回去，还是留在原地？

随信给您寄去近期有关拉狄克[①]、德国的右派分子的著作。所有这一切希望都能转寄到俄国去。

您提出，可以从苏联获得一些东西。我本来需要一些涉及革命、红军等的有价值的照片，也包括涉及我本人的。这是出版者提出的要求，而我几乎什么也没有。获得这些照片所需要的花费，出

① 拉狄克，卡·伯·（1885～1939）——1904 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国外支部，1908 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1919～1924 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 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书记。1925 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1927 年在 15 大上因派别活动被开除出党。1936 年被捕，后平反。1929 年拉狄克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恢复了党籍。《真理报》发表了他的悔过信，其中声明：“我已明确同列夫·达维多维奇决裂。我们是政治敌人。”托洛茨基写了几篇论拉狄克的文章，分析了拉狄克的言行。

版社应当会支付的。

您提到速记记录的事。那么，您是速记员吗？有丰富经验吗？您住处附近有俄文印刷厂吗？印刷费用贵不贵？先提出这几个问题作为最初步的考虑。

您何时休假？您能否在休假时来见面谈一下？您也许知道，我向英国政府[①] 提出了去英国的申请。如果麦克唐纳作出肯定回答，那么和您会面会十分容易。我对此将十分高兴。暂时写到这里。紧握您的手。祝一切顺利！

您的　列·托洛茨基

① 英国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后组成的新政府。

№03989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摘录）

（1929 年 7 月 4 日）

亲爱的同志：

十分感谢您给我寄来议会辩论[①] 的译文，现在我十分急切地等待余下的部分。虽然我应当说，目前坚持提出这个要求未免于心有愧，因为从您的信中我第一次知道您有病在身……

关于您所寄手稿的问题，由您自行决定，也就是说，请您根据情况决定。我今后仍将继续给您寄手稿，既供您本人参考，也可在有可能时转寄出去。

再次感谢。

紧握您的手，并祝健康！

您的　列·托洛茨基

① 指挪威议会。

№06772

谢多夫致弗拉切夫[①]

（1929年7月9日）

亲爱的朋友：

您怎么一点儿消息也没有？（不过其他朋友也一样。）侨民区的生活怎么样？自我感觉如何？对卡尔的鬼把戏采取什么态度？盼告。地址：谢多夫，普林基波（伊泽特－帕恰），当然还要写上君士坦丁堡。

我们这里没有变化。老头子工作很忙——他准备出书。身体马马虎虎，患有疟疾、疲劳过度等病症。另外，这里的情况很不好，而从奥斯丁爵士到索索[②]的统一战线哪里也不让去[③]。这里的生活与阿拉木图的不大一样。请试着给写点。谈谈邻居们的情况，加布里埃尔怎么样？

请向他们问好。

祝身体健康！

我很愿意给朋友们写信，可他们都没有音讯，我不知道往哪里

① 弗拉切夫，伊·雅·——生于1898年。1917年入党。国内战争期间先后任师长、集群司令。1923年加入托洛茨基反对派。1927年在联共15大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积极分子”被开除出党。1928年1月被流放沃洛格达，在这里同托洛茨基建立了通讯联系。

② 奥斯丁指张伯伦（1863－1937），1924－1929年任英国外交大臣。索索指斯大林。

③ 指托洛茨基谋求得到欧洲某国的护照一事。

寄。列·谢·[①] 怎么样？

您的列·谢多夫

① 指索斯诺夫斯基。列·谢·（1886～1937）——1904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8～1924 年（有间断）任《贫苦农民报》编辑。1921 年任党中央鼓动宣传部长。1927 年在党的第 15 次代表大会上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骨干分子被开除出党。1928 年 1 月被流放巴尔瑙尔，1929 年作为不改悔分子被关押在车里雅宾斯克政治隔离所。

№03990

托洛茨基致彼·谢·库罗耶多夫（摘录）

（1929年8月26日）

亲爱的同志：

十分感谢您寄来的材料的其余部分。我已经在自传中使用了一些。

[……] 我们一切如旧：住在普林基波岛上，工作，受着酷热的折磨，并且不断得到拒签的消息①。

我的自传要到10月15日才能出版。您想要哪一种语言的版本呢？

从俄国来的消息极少，不过还是有一些。您是否从那里获得了什有价值的消息呢？

[……] 紧紧握您的手，并祝一切顺利！

① 到达土耳其以后，托洛茨基立即提出签证的申请。还在驱逐出境之前，他就请政治局替他办理去德国的签证。他在君士坦丁堡申请去英国的签证，英国下议院直到1929年2月才讨论这一问题，被拒绝了。1929年6月托洛茨基向新成立的工党政府提出申请，又被拒签。法国、德国和捷克政府也以不同的借口拒签。1935年春，托洛茨基向挪威政府提出避难的申请，获得准许。6月他来到挪威，但到12月19日又被驱逐到墨西哥。

№03992

列·李·谢多夫致彼·谢·库罗耶多夫[①]

（1931 年 4 月 27 日）

亲爱的库·同志：

我很久没有给您写信，因为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您也许已经知道，我在德国已经几乎两个月了。[②] 这里有多少新的事情、问题、人物等等向我蜂拥而来，以至于我根本无法坐下来给您写信。

十分高兴和您恢复通信。

给您寄去 15 份（使用薄纸的）通报[③]（政纲），供转寄苏联。转寄政纲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要尽一切可能把它“捅”到祖国去。

其中包括通过在奥斯陆和其他港口的苏联海员带回去。在这件事上，与您有联系的挪威人……也许能帮助您。

只能给您寄去 15 份，是因为不知道您在转寄方面有多大可能。也可以通过邮政（熟悉的地址）在寄发商业报纸的邮件中转寄，等等。

如果您有可能转寄 15 份以上，请告知，**当即寄上**。

您身体怎样？有什么打算？从国内听到些什么？等待消息，原

① 这是列·李·谢多夫受托洛茨基的委托写的信。此前不久，托洛茨基给谢多夫去信，请他查明：“1. 沃罗夫斯基对列宁的态度，这里每一个细节都是重要的。2. 沃罗夫斯基对待波兰、波兰语、波兰党等等的态度……”

② 1931 年 2 月列·李·谢多夫获得签证到柏林的高等工艺学校学习。

③ 指《反对派通报》。其编辑和出版人是列·李·谢多夫。

谅我久未写信。

致以最诚挚的敬意！

您的　列·谢·

又及：我正在给列·达·为他的书《我们和他们》（政治肖像和特征。一方面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另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领袖们）收集资料。其中也包括有关瓦·瓦·沃罗夫斯基[①] 的。（涉及斯佛尔查[②] 的诽谤）

我感兴趣的是以下问题：

（1）沃罗夫斯基对列宁的态度；

（2）对波兰的态度（语言、民族、政党，等等）（斯佛尔查说，沃罗夫斯基作为波兰人认为俄国是别人的国家）；

（3）沃罗夫斯基的病，列宁对他的态度。

无论是告知史料，还是说明事实及一切您认为有价值的资料，我都会非常感激。这些并不急迫。

再次问一问，身体怎样？难道我们相互近在“咫尺”，竟无法见面？

等待关于政纲的消息。

通报我们目前在柏林办。

您提到您（用挂号邮包）寄钱给通报的事。我们去年夏天收到过一次您寄给通报的钱。不要寄钱了，——您一定需要钱用。但

① 沃罗夫斯基，瓦·瓦·（1871～1923）——189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11月起任苏俄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大使。1921年起任驻意大利全权代表。在洛桑被白卫分子杀害。

② 斯佛尔查——意大利外交家，一本轰动一时的书的作者，其中涉及对沃罗夫斯基的评价。

是，既然您已经寄出了（2～3个月以前），那就应当查询一下。无论是伊斯坦布尔，还是巴黎，都没有收到钱。

致以敬礼！祝健康！

背面有以下字样："Bokforlaggareog Fru Hansson Appelviken Stockholm（'Fritt Forum'）"

№03620

托洛茨基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的信

（1932年1月4日）

绝密

历史再次走近了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德国目前正在决定德国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命运。共产国际的政策正在必不可免地把德国革命引向灭亡，正如曾经必不可免地把中国革命引向灭亡一样，虽然这一次是从相反的一头这样做的。就此所必须做的一切事情我在其他地方已经说过。在这里重复一遍并无必要。也许最多只剩下2～3个月时间，来改变其责任应完全应由斯大林来负的造成致命后果的政策。

我在这里没有说到中央，因为它实际上已被废除。苏联报纸，其中包括党报在内，谈论“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的六条指示”、“斯大林的规定”、“斯大林的总路线”，而把中央弃置不顾。行使专政的党被贬低到这样的程度，致使某一个人的愚蠢无知、本能的机会主义和不忠顺竟会对伟大的历史事件留下印记。斯大林在中国、英国、德国，在所有世界各国，以及首先在苏联搅得一团糟之后，为了挽回个人的虚假威信，现在又在德国支持一种必然要自动导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灾难的政策。

为了不给斯大林制造麻烦，已经降到奴隶状态的“党的”报刊对于德国的事根本不置一词。然而却大肆谈论“托洛茨基主义”。

整版整版的报纸再次充斥着“托洛茨基主义”。其任务在于迫使人们相信，“托洛茨基主义”是一个“反革命”流派，是“世界资产阶级的先锋队”。第十七次党的代表会议正是在这种标志下召开的。十分清楚，这类一成不变的宣传追求的并不是某种思想意识上的目的，而是一种完全确定的实际任务，准确点说，是针对个人任务。如果简要地加以表述，那就得说：对待左翼反对派代表人物的政策，提上日程的是图尔库尔化。①

斯大林通过西方国家的官方政治性报刊揭露白卫恐怖组织的计划，而与此同时却对苏联的工人隐瞒此类事实。在国外刊发此类揭发材料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与图尔库尔将军的共同活动中保证斯大林并不在现场。列入高尔基和李维诺夫的名字，主要是便于进行伪装。

还在图尔库尔以前，在 1924～1925 年期间，斯大林就提出过对本信的作者使用恐怖手段的问题。斯大林在少数人的会议上曾经权衡过同意和反对两种理由。同意的理由是清楚而明显的。反对的主要理由是这样的：勇于献身的青年托洛茨基分子太多，他们可能会报以反恐怖行动。

这些消息我是当时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转到反对派方面以后从他们那里获悉的，而当时所处的情况和提到的那种细节使人不可能对消息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但愿你们没有忘记，和斯大林一起组成高居于中央之上的统管一切的“三人小组”，他们了解普通中央委员根本无法知悉的情况。如果斯大林强迫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否认他们当时的证词，谁也不会相信的。

① 托洛茨基得到消息说，原沙俄将军 A.B. 图尔库尔（1958 年卒于国外）在组织对托氏的暗杀。

到1925年问题已经取消；但当前的事态表明，只不过是推迟。

斯大林得出结论认为，把托洛茨基驱逐出境是一个错误。他本来希望，这从他当时记录在案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言论可以知道，没有“秘书处”，没有经费，托洛茨基只会成为官僚机构在全世界范围内策划实施的诽谤活动的孤立无助的猎物。只知运用机关的人失算了。与他的盘算相反，结果发现，思想有自己的力量，即使没有机关和没有经费也一样。共产国际是一个庞大的机构，但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却完全一无所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包括革命的列宁主义）的未来，今后是同左翼反对派的国际干部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什么样的捏造也无济于事。反对派的主要著述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用各种语言出版。所有国家都存在坚不可摧的干部队伍，尽管目前人数还不多。斯大林清楚地知道，国际反对派思想的坚定性和蓬勃发展对于他本人、对于他那虚假的“威望”、对于他拿波那巴主义的力量，是多么可怕的危险。

斯大林认为，应当纠正错误。他的计划通过三个渠道展开：第一，在国外透露关于图尔库尔将军正在策划（在斯大林为他创造的最为有利的条件下）用恐怖手段暗杀托洛茨基的消息；第二，发起一场国际性的“思想”运动，这个运动应以通过党代表会议和共产国际的决议告终——斯大林需要这样的决议作为同图尔库尔合作的某种政治委托书；第三，斯大林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之手查明并采用真正野蛮的残暴行动消灭一切可疑的、不可靠的、令人担心的东西，以保证自己不受反击。

我当然不了解有关图谋的技术细节：是图尔库尔把自己所做的事透露给了斯大林用以讨好，还是斯大林躲在图尔库尔背后出谋划策，这我不得而知。但是，雅戈达一伙人中总有人很清楚此事，他们在协办臭名昭著的“弗兰格尔军官”事件中起着中介作用。

没有必要说明，斯大林的计划和阴谋从任何方面都丝毫不能对

左翼反对派的政策，其中也包括我的政策发生什么影响。斯大林这个败坏党的罪人、中国革命的掘墓人、共产国际的破坏者、德国革命的候补掘墓人的命运早已注定。他的政治上的破产将是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的失败事件之一。问题不在于斯大林，而在于拯救共产国际、拯救无产阶级专政、拯救十月革命的遗产，在于复兴列宁的党。斯大林视为依靠的，在苏联以及在共产国际所有支部里的大部分官僚，只要一听到最初的几声惊雷，便会四处逃命，溃不成军。左翼反对派则将始终忠于马克思和列宁的旗帜！

本文件将以有限但完全足够的份数保存在若干国家的可靠的人手中。专此告知！

［托洛茨基］

1932 年 1 月 4 日于卡德凯伊

№03991

托洛茨基致亚·李·勃朗施坦（索科洛夫斯卡娅）[①]

（1933年1月8日）

亲爱的萨莎：

不知怎样写信告诉你所发生的那件可怕的事。人世间不再有季努什卡[②]了。我暂且也只是在3天前（1月6日）中午从电报中得知这事的。今天是1月8日，傍晚。我不能早些写信。怎样才能理解？怎样才能解释？当她在这里，在土耳其生活期间，她和我们都认为是肺结核。相反，医生们却说肺部状况良好。季娜不相信他们，总说是肺结核。医生们则回答说这都是由于她神经有问题。在离开这里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她的精神平衡确实遭到破坏。从各方面情况判断，她孤身一人在家十分痛苦[③]。我们希望，柏林，柏林的医疗条件，会做出最后的诊断。

[……] 神经病科医生说，惟一的拯救办法是回归正常的普通的生活条件：丈夫、家庭、工作、责任。但是，这又恰恰是无法做到的。发生了第一次严重的精神危机……她试图自杀。

[……] 在我们去哥本哈根[④]之前不久，她又出现了第二次危

① 索科洛夫斯卡娅，A.Л.——托洛茨基的第一个妻子。

② 勃朗施坦·季娜伊达·李沃夫娜（夫姓沃尔柯娃）（1901～1933）——托洛茨基和索科洛夫斯卡娅的长女，死于柏林。

③ 季娜伊达的丈夫在政治流放之中，女儿留在莫斯科。

④ 侨居普林基波岛期间，托洛茨基在遵守安全措施的条件下曾离土耳其去哥本哈根，用的是谢多夫名字的护照。1932年11月14日至12月12日托洛茨基到了希腊、意大利、德国、法国、丹麦。在哥本哈根他对两千人发表了演说，接受了美国电台的采访。

机。

[……] 我可怜的萨莎，就这样我们的这一个女儿也死了[①]，她年纪轻轻就离我们而去了。

多么可怕，这个消息将会怎样到达你那里，将会多么使你震撼……你已经知道了吗？还是从这封长途旅行的信里第一次知道的。我已完全茫然失措，无法写下去，人如在雾中……医生们还提到整个环境、周围状况、人际交往、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一切，一切的一切加在一起，压到她身上，把她压垮了。

亲爱的，亲爱的舒拉，说什么好，还能向你说什么呢？再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唉，什么都说了，什么都说了，什么都说了……

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你满是白发的头，让我的眼泪和你的眼泪流在一起。[②]

你的　列夫

① 托洛茨基和索科洛夫斯卡娅的小女儿尼娜·李沃夫娜·勃朗施坦（夫姓涅韦尔松）死于1927年。

② 托洛茨基的信过了好久才送达列宁格勒的索科洛夫斯卡娅手里。

№03621

托洛茨基就国内局势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1933年3月15日）

秘密

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再一次尝试诉诸目前领导苏维埃国家的人们的责任感。你们比我更清楚国内和党内的局势。如果国内的形势继续沿着目前的轨道发展下去，那么灾难将必不可免。没有必要在这封信中分析实际形势。在日内即将问世的《反对派通报》第33号上做了这种分析。敌对势力将用另一种形式利用困难打击苏维埃政权，其打击的力度并不会低于法西斯对德国无产阶级的打击。企图仅仅使用镇压的办法来控制当前形势的想法，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必然招致灭亡。这种做法不会成功。斗争有自己的辩证法，你们早就越过了临界点。镇压越是延续下去，就越会更大地引起与预想效果相反的结果：不能吓住对手，反而相反，只会激励对手，引起他殊死搏杀的力量。最易发生的最直接的危险是对领导的不信任和日益增强的憎恨。对这一点你们知道得不比我差。但是，推动你们沿着斜坡滑下去的是你们自己政策的惯性，而在斜坡的下面是深渊。

应该怎么办呢？首先应当使党重新振兴。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必须经历这一过程。左翼反对派——这一点我一分钟也不怀疑——愿意全力协助中央不受震荡或者以最小的震荡使党转上正常生存的轨道。

对于这样的建议，你们中间的某人可能会说：左翼反对派想通

过这种办法取得政权。对此我的回答是：这里涉及的问题比起是你们一派掌权还是左翼反对派掌权的问题要大得多。这里涉及的是许多年内工人国家和国际革命的命运。当然，只有当反对派本身能够重新获得在党内正常工作的可能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派才能够帮助中央在党内恢复信任体制，而这种信任体制没有党内民主是不可思议的。只有历史地形成的**各种派别**能够坦诚而真心地合作，而其目的又是为了把它们变成党内的**流派**并在今后使之消融于党内，在目前的具体条件下才有可能恢复对领导的信任和使党获得新生。

顾虑左翼反对派会试图把镇压的矛头转向另一个方向是没有根据的：这样的政策业已经历了试验，而且已经彻底破产；当前的任务恰恰在于运用共同的力量消除这一政策的后果。

左翼反对派有自己在苏联和在国际舞台上的行动纲领。当然，放弃这个纲领是根本谈不上的。但是，涉及在中央和在全党面前陈述和维护这个纲领的方法，更不用说贯彻这一纲领的方法，可以而且应当事先协商一致，以求防止发生破裂和震荡。无论气氛多么紧张，还是可以在双方都怀有善意的情况下经过依次发展的几个阶段使之缓和下来。而危险的规模之大要求拥有这种善意，准确点说，迫使人们拥有这种善意。本信的目的在于声明，左翼反对派具有这样的善意。

此信我只寄出一份，仅供政治局阅悉，以便政治局在选定采取何种做法时拥有必要的余地，在它鉴于整个情况认为有必要进行初步谈判时不至于宣扬出去。

列·托洛茨基

1933 年 3 月 15 日于普林基波

№03622

托洛茨基1933年日记（摘录）

（1933年7～8月）

启程之前（1933年7月15日）

总之，在我们的护照上盖上了清晰无误和毋庸置疑的法国签证印章。两天以后我们就要离开土耳其了。当我带着妻子和儿子到达这里时——四年半以前——，美国“繁荣昌盛”的太阳灿烂地照耀着。如今，那个年代令人感到是史前时期，几乎是童话了。

普林基波是一个平静而无忧无虑的小岛。国际生活迟迟才传到这里，而且已经无声无色了。不过危机也得以来到这里。从伊斯坦布尔来这里歇夏的人一年比一年少，而来这里的人带的钱也越来越少。没有人购买，丰足的鱼虾又有什么用？

在普林基波用笔头做文字工作是再好不过了，特别是到秋季和冬季，当岛上几乎空无一人，公园里出现丘鹬之时。这里不仅没有剧场，而且也没有电影放映员。用汽车代步也在禁止之列。世界上能有多少这样的地方？我们房子里没有电话。驴子的叫声对神经起着镇静的作用。关于普林基波是一个小岛的事实，一分钟也无法忘却，因为窗外就是海，而且岛上没有一个看不到海的地方。我们在距石头围墙10米处钓鱼；到50米处可以钓大螯虾。常常整整一周时间，海水平静无波，像是一个湖。

不过我们同外部世界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因为一直收到邮件。

这是一天的高潮。邮件包括最近的报纸、新书、朋友的信和敌人的信。在这一堆铅印的和手写的纸张中有许多出乎意料的信息，特别多的是来自美国的。难以置信，世界竟有这样多的人关心备至地要拯救我的灵魂。这些年来我收到的宗教书刊之多，岂止拯救一个人，足够拯救整整一个劳改队的迷途罪人。劝善书籍中所有重要的地方都在页边加上重点提示。但是，也有为数同样多的人热衷于我灵魂的毁灭，而且用值得嘉许的直率语气表达了相应的愿望，虽然并未签上名字。笔相家们一再要我把手稿寄给他们，以便判明我的性格。星相家则请求我告诉他们我的生辰八字，以便为我占出星图。亲笔题词收集者则不断地劝说我把自己的签名同两位美国总统、三名拳击冠军、阿尔贝特·爱因斯坦、林德伯格上校，当然还有查理·卓别麟等人的签名放在一起。这类信件几乎全部来自美国。渐渐地我学会了根据信封猜测出，是要把我手杖收入家庭博物馆，还是想招募我去充当卫司理派的传教士，或者相反，预见到一旦某一个炼狱出现空缺我将去永世遭受苦难。随着危机不断尖锐化，其中涉及地狱的信件比重也就明显增加。

邮件传来大量意外的消息。几天以前带来法国的签证。怀疑论者——在我周围也有——出了丑。我们即将离开普林基波。我们的房子几乎搬空了，楼下放着一批木箱，年轻的手在敲钉子。在我们那幢空荡荡的旧别墅里，今年春天漆了一遍地板，但油漆的配料出奇，直到如今，4 个月以后，桌子、椅子，甚至人的脚往往粘在地板上。真是怪事，我觉得我的双脚这些年来也似乎长在普林基波的土地上了。

这个小岛只要两个小时便可以绕行一周，我同它实际上很少联系。然而，同轻轻拍岸的海水却有更多的接触。53 个月以来，我在不可替代的教师指导下与马尔拉海十分亲近起来。这就是哈拉拉姆勃斯，一个年轻的希腊渔民，他的世界就在普林基波岛周围大约

4公里半径之内。[……]

图书室里的书架空空荡荡地张开大口。只有在拱形窗户上面的角落里旧的生活继续不停：燕子在那里筑巢，并且就在布列颠《蓝皮书》正上方繁衍雏燕，而这些雏燕根本不在乎什么法国的签证。

不管怎么说，“普林基波”这一章正在打上句号。

托洛茨基

1933年7月15日于普林基波

托洛茨基：移居法国（1933年8月11日）

1929年2月，我和妻子到达土耳其。1933年7月7日，我们又离开土耳其前来法国。报纸上写道，法国签证似乎是根据……苏联政府的申请而发给的。很难臆想出更加离奇的说法了，主动进行友好干预的不是苏联外交机构，而是把我的书译成法语的法国作家莫里斯·帕里雅尼。在一系列作家和左翼政治家，其中包括议员盖诺的支持下，签证问题这一次得以顺利解决。我第三次侨居国外的四年半以来，从我自己方面以及从我的同情者方面，都为我能前去西欧作过不少努力。拒绝签证的材料简直可以订成相当厚的一个集子，其中的签名者有魏玛共和国总理社会民主党人赫尔曼·米勒、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他当时还是社会党人，而不是半保守党人）、西班牙革命的共和派和社会党的领袖们以及许多许多其他人。我的话中没有丝毫责难的意思，这一切只是事实的记述。

关于迁居法国的问题是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激进派和社会党人的联盟取得胜利以后提出的。但是，在此之前，有一个情况使事情早就变得复杂化了，那就是：1916年，战争期间，我曾被法国内政

部长马尔维以所谓进行“和平主义”宣传的罪名驱逐出境，而实际上是应沙皇大使伊兹沃利斯基的一再要求。尽管马尔维本人大约一年后即被克列孟梭政府也以策划和平主义阴谋的指控而驱逐出境，但对我的驱逐令仍然有效。1922 年，在爱德华·埃里奥第一次出访苏俄期间，他在热情地参观了国防人民委员部以后告别时问我，我何时想去巴黎。我开玩笑地提醒他曾被从法国驱逐出境。埃里奥笑着回答说：“谁现在还记得这个!”但是，工作机构的记忆力却比人要牢固得多。在马赛港从意大利轮船下船时，给我送来一份文件要我签收，是“保安总局”局长送给我的关于取消 1916 年命令的通知，我应当说，很久以来我已经没有如此心满意足地在官方文件上签字了。[……]

为了避免在马赛港下船时有人举行抗议示威或引起其他麻烦，我的法国朋友们决定乘摩托艇到公海上来接船。由于这样一个简单的设想，又产生了新的麻烦。摩托艇的主人，可尊敬的庞舍蒂先生，由于未被告知此行的目的，竟一夜不眠地费神猜测：为什么两名年轻人，又不带女眷，凌晨前往公海。这种情况在他的生活中尚不曾有过。而恰好这同一天土伦正在审判一宗两名强盗在海上杀死一个船夫并抢走钱财的案件。虽然已经收过了订金，庞舍蒂先生还是决定避开这次危险的航行：在最紧要的关头他声称发动机坏了。这时候要在附近找另一个船夫是根本不可能的。直到请保安局长出面证明两个年轻人出海确是为了和平目的，这才挽救了局面。船夫承认自己有过怀疑，顺利地把旅客从轮船送到远离码头的岸边。在那里等候我们的两辆不起眼的“福特”牌小汽车，不久又被新闻界炒成是两辆具有特大功率的汽车。

仍然是那些报纸写道，在马赛迎候我们和陪同我们遍游法国的有大批警察。事实上，除了曾经劝慰过船夫，公开向我宣布取消驱逐令并随即告别而去的局长以外，我们没有和一名警察有过接触。

为了让人们知道在没有监控与警卫的情况下乘汽车在法国南部旅行有多么心旷神怡、引人入胜，我应指出，自1916年起，也就是说，在最近16年里，——再前面一段旧时的生活时期我暂且不提——我曾一直是在“警卫”的随行之下出行的，友好的也好，敌意的也好，但始终是有“警卫”的。

不过，直到现在我们一个字也没有谈到最主要的事：关于我们前来法国的目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既不是看病，也不是为了丰富藏书，更不是为了留连于其他的法国文化享受。总应当有一个别的，“真正的”，加以仔细掩盖的目的。第二天我们从报纸上获悉了这个目的：前往法国……是为了同李维诺夫会面。我擦擦眼睛：同李维诺夫？从这些报纸上我才第一次得知，外交人民委员现时正在法国的某一处疗养地。一些最能洞察一切的新闻记者还告诉我们，为什么必须有这样的一次会见。原来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我完全被一种幻想所折服：一定要死在俄国并埋葬在故土。诚然，就我自己而言，至今为止关于我将埋葬在哪里和用什么方式埋葬的问题，似乎一直是我最少关心的问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我一贯最敬仰的人物之一，他曾嘱咐把自己火化，并把骨灰盒沉入海洋。如果说这份遗嘱有什么真令我感到惊奇的话，那并不是恩格斯对于故乡武珀塔尔的土地漠不关心，而是预先考虑到如何消灭自己的骨灰这一事实本身。为什么恰恰是海洋？但是报界的洞察力是确定不移的。今天我又看到关于我千方百计通过李维诺夫和目前也在罗亚疗养地的苏联驻土耳其大使苏里茨取得返回苏联的权利的消息。但是，这两位外交官却都断然拒绝和我见面，而这成了对我的生活的“最为可怕的震荡”。不仅如此，关于我恰恰想要通过李维诺夫来进行返回俄国的谈判的想法应当使他比我更加吃惊。这类问题绝对应在莫斯科由党的系统加以解决，而在党的机关内李维诺夫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很久就不起任何作用。在苏联的制度下，他不可能超越出纯粹

外交事务的范围。这一篇故事——请洞察一切的记者们原谅我——只不过是标准的激动人心的廉价谎言。我没有到过罗亚，也没有设法同李维诺夫见面。我没有丝毫理由要这样做。

关于事实真相通过多么复杂困难的途径才能在报刊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一事，足以写出极富教益的学术研究著作。要在现代战争中杀死一个人需要许多吨钢铁。而为了确认某一件事实的真相，需要多少吨印刷铅字呢？在这种情况下报刊的错误在于，它们在没有疑点的地方寻找谜案。我对当今苏联政府的态度并不是秘密：自从我被放逐到土耳其以后，我每个月都在《反对派通报》（柏林、巴黎）上，以及在外国报刊上，对苏联的内政和外交问题作出反应。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不止一次在报刊上声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和以前一样，在任何岗上为苏维埃国家服务。但是，同我们的合作不可能依靠迫使我们放弃我们的观点和我们的批评来达到。可是，对于统治集团而言，他们的全部问题恰恰又正在这里。他们已经把自己的威信丧失殆尽。由于没有力量通过正常的党代表大会重新恢复威信，他们必须重新而且更加努力地承认自己的罪行。恰恰是这一点上，他们别想在我们方面得到。真心诚意的合作，是可以的！用虚假的政策向苏联和全世界的舆论掩饰自己是不行的！在双方态度如此明朗的情况下，破坏外交人民委员的夏日休假是没有任何必要的。[……]

1933 年 8 月 11 日

№03558

托洛茨基1935年日记（摘录）

（1935年2月7日～9月29日）

1935年2月7日

日记并不是我所喜爱的写作样式：我现今会更喜欢日报。但是没有报纸……与积极的政治生活相隔绝的状态迫使我不得不求助于私人日记这类政论文章的代用品。战争初期，当我在瑞士处于封闭状态之时，写过几周日记……后来在西班牙，当1916年从法国被驱逐出境后，也曾短时间记过日记。这似乎已是全部了。如今又不得不再次采用写政治日记的做法。会写很长时间吗？也许是几个月。无论怎么说，也不会是几年。事态总应当朝某一方面得出结果，然后把日记本合起来。如果斯大林、希特勒或他们的法国朋友兼敌人们派来的特工从角落里射来的子弹没有更早地合上这本日记的话。

拉萨尔有一次写道只要能把**所能做**的事哪怕实现一部分，他乐意把他所**知之**事情留存不写，任何一个革命者对于这样的愿望是太理解了。不过应当如实地掌握形势。正是因为我有机会参与过重大事件，我的过去才排除了我如今行动的可能性。只能对事件加以说明，以及力求预见它们今后的发展进程。从事这种活动至少会比消极的阅读给人以更大的满足。

在这里我几乎只能通过报纸，有时也通过信件，来同生活接触。如果我的日记从形式上能够像期刊的评论，那倒不错。但并不

是办报人本身使我感兴趣，而是通过报刊歪曲反映出来的更深刻的社会力量的工作引起我的兴趣。但是，我自然不会预先就用这种形式来限制自己。日记的长处，唉，也是仅有的长处，恰恰在于它可以不受任何写作的责任或规则的限制。

1935 年 2 月 12 日

丘巴尔从哈尔科夫调到莫斯科当时是悄悄进行的，我现在甚至难以回忆起这到底是什么时间的事。不过这项调动是有政治意义的。丘巴尔作为莫洛托夫的“副手”[①]，迟早要把莫洛托夫排挤掉。另外两名副手鲁祖塔克和梅日拉乌克，不是这样：前一个地位已经下降，而且开始懒散慵惰，后一个在政治上又太微不足道了。不管怎么说，莫洛托夫在 3 名副手的监管之下生活，正在盘算末日何时到来。

再也没有什么货色比一个正在积累的小资产者更加令人厌恶的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靠近地观察过这样的家伙。

1935 年 2 月 13 日

恩格斯，毫无疑问，是伟大人物行列中最为优秀出众，最为完美无缺，在品格气质上最为高尚可贵的少数人之一。重塑他的形象，是一项崇高的任务，同时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责任。在普林基波时，我曾从事一本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的写作，素材都烧掉了。未必会重新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能把关于列宁的书写完也就很

① 俄文 заместитель 既有“副手”的意思，也有“取代者”的意思。

好了——然后可以转而写作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书——关于瓦解中的资本主义。

基督教创造了耶稣的形象，目的在于使不可着摸的万能之主具有人的特点，更加贴近凡夫俗子。站在奥林匹克神马克思身旁，恩格斯更加“人化”，更加贴近普通人；他们两人是多么和谐地相互补充；准确点说，恩格斯是多么自觉地去补充马克思，尽自己终生之所能消耗自己去补充马克思，把这看做为自己的使命，并从中找到乐趣，丝毫没有作牺牲的影子，而是始终如一，永远乐观愉快，一贯高出于自己的环境和时代，具有广阔的智力兴趣，从不冷却的思想炉灶之中总是燃烧着真正的天才之火焰。在日常生活方面，恩格斯总是比马克思更能赢得好感（但这无损于马克思）。记得，我在自己的军用列车上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之后曾把自己对于恩格斯这个人物的赞赏心情告诉列宁，意思是说：在同巨人马克思交往的背景下，忠实的弗雷德没有失去任何东西，相反地，却获益多多。列宁兴奋而热切地，我应当说，欣然赞同这一看法：他热爱恩格斯，正是因为恩格斯的天性和丰富的人情味。记得当时我们颇为动情地一起注视着少年恩格斯的照片，发掘着存在他身上的，后来在其一生中大大发扬光大起来的那些特性。

当你读够了勃鲁姆们、波尔－弗尔们、加香们、多列士们平淡无味的作品，从而吸满了琐事细节、放肆无礼、卑躬屈膝、粗俗无知的细菌时，没有比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通信（他们相互间的通信，以及他们同别人的通信）更能够使人顿感清新舒畅的了。以嘲讽挖苦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暗示、对个人的评价，有时是难以置信的，但却始终是深思熟虑的准确精当的，充满着多少深刻的教益、清新的智慧和山野的清风。他们自始至终生活在顶峰之上。

1935 年 2 月 14 日

恩格斯的预测始终是乐观向上的。它们往往超前于事态此后发展的实际进程。但是，总的说来，不烧毁若干中间阶段（按照法国人的说法），历史的预测是可以想象的吗？

归根结蒂，恩格斯始终是正确的。他在致威什涅威茨基夫人[①]的几封信中就英国和美国发展所说的，历经 40～50 年之后，直到战后年代才完全得到验证，但却是多么充分有力的验证！资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中有谁哪怕稍稍预见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当前的局面？劳合－乔治们、鲍德温们、罗斯福们，更不用说麦克唐纳们了，和年事虽高但眼睛明亮、具有远见卓识的恩格斯相比，就是今天也仍然显得（今天甚至比昨天更加显得）像一些瞎了眼的黄口小儿。所有这些凯恩斯们的脑袋是多么冥顽不化，竟然宣告马克思主义的预测已告破产。[……]

夜里 1 点。我很久没有在这样晚的时间写作了。我已经几次试着躺下睡觉，但是愤怒的心情一次又一次把我从床上掀起。

在霍乱流行的年代，愚昧无知、惊慌失措又被激怒了的俄罗斯农民曾杀死医生，焚烧药品，捣毁霍乱隔离病房。难道迫害“托洛茨基分子”，把他们驱逐出境、开除出党，以及告密出卖——而且是在部分工人支持下进行的，不正像是绝望无告的农民在毫无意义地任性发作？但是，这一次发作的却是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充当调唆者角色的又是工人政党的“领袖们”。打手只是一小批人。群众惶惑不解地注视着，惟一知道病因和药物的那些医生们正在遭到殴打。

---

① 凯利－威什涅威茨基夫人，弗·（1859－1932）——美国社会党人，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英译者。

1935年2月15日

《时报》刊登了该报驻莫斯科记者一篇很表同情的电讯，说及对集体农庄庄员，特别在私人饲养大小牲畜方面的新的优惠规定。看来，正在准备对农民的小资产阶级倾向继续作出让步。目前的退却能够在哪一条线上停止下来，暂时还难以预料。退却本身是由前一时期官僚主义的宏伟幻想造成的，这是事先不难预见的。从1929年秋天开始，俄国反对派通报就曾对集体化的冒险主义做法敲过警钟。“在步履严重失调的状态中蕴藏着在最近的将来必然发生危机的因素。”后来看到了：宰杀牲畜、1933年的饥荒、无数人惨遭牺牲、接连不断的政治危机。现在则是全速退却。正因为如此，斯大林又开始去砍杀他左边的所有的人。

革命就其本性而言常常不得不去夺取比它所能坚守的地方更大的范围：当有地方可退时，退却才有可能。但是这条总的法则决不能用来为全盘集体化作辩解。全盘集体化之所以不合理，并非群众自发施压造成的，而是官僚机构盘算错误造成的。不是根据生产和技术资源的状况来对集体化作出调整，不是根据实际经验来扩大集体化的程度——包括广度和深度，吓坏了的官僚们开始用鞭子把吓坏了的农民驱赶进集体农庄。斯大林的经验主义和才智不足，在他对于全盘集体化的阐释中最为明白无误地暴露了出来。然而，对于如今的退却不作任何阐释。

《时报》2月16日说：“我们的议员准备埋葬经济自由主义。莫非他们竟没有看到，这样做他们也就是在给自己准备葬礼？因为如果说经济自由注定要灭亡，那么议会也必然要随着它们走进坟墓。”

这话多么精辟！《时报》的“理想主义者们”竟然没有想到，他们居然签字认同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理之一：议会民主制无非

是建立在资产阶级竞争体制之上的一种上层建筑。和它一起存在，也将和它一起消亡。但是，被迫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来的话却使《时报》的政治立场比之社会党人和激进社会党人的立场来更加强大有力，后者想赋予民主制以“其他的”经济内容而得以保存下来。这些空谈家并不懂得，政治制度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恰如罐头食品与铁皮包装罐之间的关系。

结论：议会民主制如同自由竞争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问题仅仅在于，谁将成为继承人。

1935 年 2 月 17 日

让我们设想一下，有这样一名受过相当教育并拥有丰富经验的医生，他竟日复一日地眼看着他这名老医生的一位亲人在一些庸医和走方郎中的治疗下濒临死亡，而只要遵守起码的医疗规则这个人即可得救。这几乎是我如今眼看着法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们”的罪恶行为时所处的状态。是自命不凡？不是，是坚定而不可动摇的自信。

我们在这里的生活与蹲监狱并无不同：关在房子里和院子里，会见的人不比探监时更多。近几个月来固然装起了 TSF 无线电收音机，但是要知道，现今就是在某些监狱里也有了收音机，至少在美国是这样（在法国当然没有）。几乎只听音乐演奏，如今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了相当显著的地位。我听音乐经常是浮光掠影而已（音乐有时有助于写作，有时则有妨碍——总的可以说，有助于构思纲要，但妨害细致地完善加工）。娜塔利娅总是十分投入和精神集中地听。现在她正在听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作品。

TSF 提醒我们，生活是那样广阔无垠和丰富多彩，但与此同时又给予这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以极端经济而又轻巧淡然的表现。总之，收音机对于监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真是监狱一般的环境。

1935年2月18日

1926年，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经过3年多时间和斯大林一起共同密谋反对我以后，参加到反对派一边来了。他们向我提出了一系列并非多余的警告。

“您以为，斯大林现在正在寻思怎样来反驳您?”加米涅夫在论及我对斯大林—布哈林—莫洛托夫的对华政策、对英国政策等等进行批评时大致这样说“您错了。他想的是怎样来消灭您。”

“?”

“从精神上，如果可能，也从肉体上。污蔑诽谤，策划军事密谋，还有，一旦准备好土壤，则进行恐怖活动。斯大林在与您不同的另一个层面作战。您的武器对付他是无效的。”

另一次，也是加米涅夫对我说：我通过以前的工作，通过共同的流放，和通过在“三驾马车”中的合作，对他（斯大林）了解得太透彻了。我们刚一同斯大林决裂，我和季诺维也夫就拟写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其中声明：一旦我们“意外”死亡，应当认为斯大林是罪魁祸首。这份文件保存在一个可靠的地方。劝您也这样做。

季诺维也夫曾经有些愧疚地对我说过：“您以为斯大林没有讨论过从肉体上消灭您的问题？考虑过，而且讨论过。是同一个想法制止了他这样做：青年们会要他本人对此承担责任，并报以恐怖行动。因此，他认为必须分化反对派年轻骨干。但是，有备无患。请您采取必要的措施。”

毫无疑问，加米涅夫说斯大林（其实他自己和季诺维也夫在此前一个时期内也是这样）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和使用另一类武器进行斗争的，他是正确的。但是，进行这种斗争的可能性本身之所以得

以存在，则是因为一种完全独特的、独立的苏维埃官僚系统已经形成。斯大林力求把权力集中在官僚体系手中，并把反对派从官僚的队伍中排挤出去；而我们则正在为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奋斗，从而使自己与官僚体系的保守主义和追求安宁、满足和舒适的企图对立起来。在世界革命长期低落的情况下，官僚系统的胜利，即斯大林的胜利，是预先注定的。被漫不经心和头脑愚笨的人们归功于斯大林个人力量（充其量也只是他的异常的狡诈而已）的那些结果深深地植根于历史力量的进程之中。斯大林只不过是革命第二章的半昏迷状态表现，它的醉酒状态。

当我们在阿拉木图（中亚）居住时，曾有某一个苏联的工程师来找我，似乎是他自己主动要来，而且本人同情于我。他详细问及生活条件，深表痛心，并十分小心地顺便提到："您不认为有可能采取某种步骤求得和解吗？"显而易见，这名工程师是被人派来探口风的。我大体按这样的意思给予回答：现在根本谈不到和解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不想和解，而是斯大林不可能采取和解的做法，他不得不沿着官僚机构为他设置好的道路一直走到底。

"这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结果会很糟糕，"我回答说，"斯大林不可能用其他方式结束此事。"

我的来访者不禁抽搐了一下，他显然不曾料到会有这样的回答，很快便走了。

我想，这次谈话对于作出将我驱逐出境的决定起了重大作用。很可能斯大林早就想这样做，但在政治局遭到反对。现今他获得了有力的论据：托洛茨基自己声称，冲突要一直发展到流血的结局。驱逐出境，这是惟一的出路！

斯大林用来证明必须将我驱逐出境的理由，我早在俄国反对派通报上予以披露了。

但是，对于共产国际的关注为何未能阻止斯大林这样做？毫无疑问，他对这种危险估计不足。对他而言，关于力量的观念是同关于机关的观念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只是在事先已能保证由他最后作出定论时才开始公开进行论战。加米涅夫讲的是真话：他是在另一个层面上作战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于纯粹的思想斗争的危险估计不足。

1935年2月20日

1924～1928年期间，斯大林和他的助手们把他们日渐加强的活动指向我的秘书处。在他们看来，我的这个小小的“机关”是一切邪恶的根源。我未能很快理解到有人对我的一小批工作人员(5～6个人）存在的那种迷信般的恐惧情绪的原因。一些由自己的秘书代为起草演说和文章的高层官员们真的以为，排除了对手的“办公室”便能使其解除武装。关于我的工作人员的悲惨遭遇，我当时曾经在报刊上加以叙述：格拉兹曼被逼得自杀，布托夫死在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监狱中，布柳姆金被枪决，谢尔穆克斯和波兹南斯基遭流放。

斯大林没有料想到，没有“秘书处”我仍能进行系统的文字工作，而这一点又反过来有助于建立新的“机关”。可见，甚至连某些很聪明的官僚在某些问题上也显得令人难以理解地欠缺才智！

在又一次侨居国外的年代里，我大量从事著述和通信，这样又在各国和世界各地促成了数以千计的自觉而积极的志同道合者出现。为建立第四国际而进行的斗争也间接打击了苏俄的官僚体系。于是经过长期间歇之后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反托洛茨基运动的时期。如果能够收回把我驱逐出境的决定，斯大林会不惜付出高昂的代价：举行“公开”审判的情景多么诱人。但是，过去的事不能挽回。不得不寻找审判之外的别的办法。无庸置疑，斯大林正在

（按照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警告中提到的意思）寻找这类办法。但是，被揭露的危险实在太大：自基洛夫事件以来，西方国家的工人对斯大林的卑劣伎俩的不信任感只是进一步加深了。斯大林诉诸恐怖行动（最大的可能是在白卫组织的配合下，因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其中派有许多间谍，或者利用法国的法西斯分子，找到他们也并不困难）的做法，在两种情况下很有可能：一种是战争迫在眉睫，一种是斯大林本身的地位急剧恶化。当然，也可能会有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我很难说清，这类恐怖行动会对第四国际形成多么严重的打击，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会将第三国际置于死地……

只要活着，就能看到。我们看不到，别人也会看到。[……]

1935 年 3 月 7 日

在 1927 年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 7～8 月联席全体会议的记录中（似乎正是在这一批记录中），人们（能够接触这类秘密记录的人们）可以看到玛·乌里扬诺娃为斯大林进行辩解的特别声明。声明的主要内容是：（1）列宁在第二次发病前不久中断了同斯大林的私人关系，纯属个人原因；（2）如果列宁不是把斯大林看做一个革命者，那列宁就不会向他提出只有向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才能提出的那种请求。声明中有意识地没有讲明的话，涉及一个十分重大的情节。我想在这里把它记下来。[……]

在我的自传中讲到过，斯大林在列宁患病的第二阶段（在第二次发作之前）力求把他隔离起来。斯大林以为，列宁已经不会再好转了，因此千方百计妨碍他书面发表自己的意见。（例如，斯大林力图阻止印发列宁关于组织中央监察委员会同官僚机构，也就是首先同斯大林的派别作斗争的文章。）克鲁普斯卡娅是病中的列宁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斯大林于是便开始迫害克鲁普斯卡娅，而且采

用最粗暴的方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生了冲突。1923年3月初（好像是5日），列宁写了（口授）一封给斯大林的信，表示要断绝一切私人的和同志的关系。由此可见，冲突的起因完全不是私人性质的事，而且列宁也不可能有私人的……

乌里扬诺娃在书面声明中提到的究竟是列宁的什么请求呢？当列宁感到自己的病情再次恶化时，在2月份或3月的最初几天，他找来斯大林，向他提出了极其坚决的请求：给他弄毒药来。由于害怕自己再次失去语言能力而成为医生手中的玩具，列宁想自己成为个人今后命运的主人。他曾经对于表示宁愿“join the majority”[①]而不愿作为废人活着的拉法格表示赞赏，并非偶然。

玛·乌里扬诺娃写道：“这样的请求，只有向一个革命者才能提出。”……列宁认为斯大林是坚定的革命者这一点，是完全没有争议的。然而，要向他提出这样一个特殊的请求，只具备上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列宁显然认为，在担任领导工作的革命者中，斯大林是不会拒绝给他弄毒药的一个。不应忘记，提出这项请求是在宣告最后决裂的几天之前。列宁了解斯大林，知道他的打算和意图，以及他对克鲁普斯卡娅的态度和他因预期列宁不能再好转而采取的行动。列宁是在这种条件下问斯大林要毒药的。有可能，这样做[……]，除了主要目的以外，也是为了考验斯大林，以及考验医生那牵强的乐观态度。不管怎么说，斯大林没有按这一请求去做，而是将此事转告政治局。所有人都表示反对（医生仍然继续认为有希望痊愈），斯大林则避而不谈……

1926年克鲁普斯卡娅向我转述了列宁对斯大林的评论：“他缺乏做人的最起码的诚实。”在遗嘱中表达的实质上也是同样的意思，只是更谨慎一些。当时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直到如今才充分展

① 英语，意即死去。

现出来。谎言、伪造、作假，拼凑假案等等做法达到了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规模，而且正如基洛夫案件所表明的那样，又直接威胁着斯大林的政权。

1935 年 3 月 9 日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彼得大帝》，是一部杰出的作品——就其对古代俄罗斯的感觉的纯真自然而言。当然，这并不是“无产阶级文学”——阿·托尔斯泰完全是在旧的俄罗斯文学的基础上培养成长起来的，自然，也是在世界文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但是，无庸置疑，恰恰是革命——根据反差法则——教会了他（也不是一个人）特别敏锐地感觉到古代的俄罗斯，包括它的始终不变的、充满野性的、未加装饰的独特之处。革命还教会了他某些更多的东西：在意识形态观念、幻想、迷信的背后寻找出各个社会集团及其社会代表人物的朴素的切身利益。阿·托尔斯泰以极高的艺术洞察力揭示出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各种思想冲突的物质内涵。于是，描绘个人心理的现实主义便由此而上升为社会的现实主义。这毫无疑问是革命的直接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成就。

莫里亚克——一个我不熟悉的法国小说家、“院士”，有关他的介绍不多——不久前写过或者说过：当苏联创作出与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在同一水平上的新的长篇小说时，我们就会承认苏联。看来，莫里亚克是用这条艺术的、唯心主义的标准，来同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的、唯物主义的标准相抗衡。但实际上这里并没有矛盾。12 年以前，我在自己所著《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前言中曾经写道：

“成功地解决起码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艺术的发展是对每一个时代的生命力和重要

性的最高检验。”

但是，阿·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无论如何还不能被看做是新时代的“精粹”。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因为什么原因。被正式列入“无产阶级艺术”范围（在彻底消灭阶级时期！）的那些长篇小说，还完全没有艺术价值。当然，这并没有“吓唬人”的意思。为了使全部社会基础、道德、观念的彻底变革能在新的轴心上产生艺术结晶，那需要时间。艺术始终落后于新的时代。而宏大的艺术门类——长篇小说，更是特别步履迟缓。

当前还没有新的宏大的艺术，这一事实是完全自然的。这一点，如上所述，不应当也不会“吓唬人”。但是，按照官僚的命令而令人生厌地假造新的艺术则是可怕的。企图对艺术发号施令的现今“苏维埃”波拿巴主义的前后矛盾、弄虚作假和愚昧无知，排除了进行任何一种艺术创作的可能性，因为艺术创作的首要条件是真诚。旧工程师倒还可以不心甘情愿地生产涡轮，正因为不是心甘情愿地工作，涡轮可能不会是第一流的，但他仍能完成自己的职责。但是，不心甘情愿就不可能写出诗歌来。

阿·托尔斯泰退到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时代去，并非偶然，这是为了获得必要的艺术自由。

1935年3月10日

我仔细地翻阅了法国劳工总联合会经济计划的各种文件。思想多么贫乏！但又仓促地用官僚主义的华丽词章加以掩饰。而且在老板面前又是多么令人屈辱地表现了懦弱卑怯！这些改良主义者不是在向工人说话，呼吁他们挺身实现自己的计划，而是在向老板倾诉，以便让他们相信，计划实质上是保守性质的。

事实上也确实没有任何“计划”，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

经济计划应提出的不是代数公式，而是确定的算术数值。当然也根本谈不到这一点：要编制这样的计划，必须自己成为主人，也就是说，要手中掌握有所有基本的经济要素，而这只有当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后才能做到。

但是，就是若奥一伙的代数公式，也简直会让人们对其中显现出的毫无内容和模棱两可而大感震惊，如果不是事先知道这些老爷们全神关注的惟一目的的话。那就是：把工人的注意力从工团主义改良主义破产的事实上引开。

1935 年 3 月 21 日

春天了，阳光灼人，紫罗兰盛开已经有 10 天了，农民在葡萄园里忙碌着。昨天听波尔多来的瓦里基利亚谈到半夜。规定了两年制的兵役期限。德国在增强军备。正在准备新的“最后一次”战争。农民平静地砍掉葡萄的藤蔓，在两行葡萄之间的地块上施厩肥。一切正常。

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写文章反对两年兵役制，而为了造成声势，动用起最大号的铅字。可是在心灵深处，“领袖们”希望，一切总能过去。这方面也是一切正常……

但这种正常秩序毕竟是在无可挽回地挖自己的墙脚。它必将可耻地崩塌……

1935 年 3 月 22 日

在挪威，几天以来是工人党掌权。这在欧洲历史的进程中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在我的生活进程中……至少，出现了**签证**的问题。

只是在1917年从纽约去彼得堡途中路过挪威——我对这个国家没有留下任何记忆。对易卜生倒记得更多一些；年轻时写过有关他的文章。

1935年3月23日

费定在长篇小说《攫取欧洲》中——这部长篇小说从文学上说写得不够深刻，常有矫揉造作之处——指出了一点：革命教会了（或者迫使）俄罗斯作家更加仔细地注视那些反映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社会依附关系的各种事实。正常的资产阶级的长篇小说都有两层楼：只有在二层才有感觉的体验（普鲁斯特！）；地下一层的人们刷靴子和倒夜壶。关于这一切在小说中讲得不多，这被认为是自然而然的事；主人公不断叹息，女主人公呼吸着空气，也就是说，他们也完成着其他的功能：应当有什么人跟在他们后面打扫收拾。

记得我看过一本路易斯的长篇小说《阿穆尔和普叙赫》（一部异常虚假和庸俗的文字垃圾，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结尾竟是由令人无法忍受的克洛德·法雷尔续写完成的）。路易斯把仆人们安排在某一个阴暗的地方，这样相爱中的主人公们永远看不到他们。对于相爱中的无所事事者和他们的艺术家们，这真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结构。

实质上费定的注意力也集中于二层楼上的人们（在荷兰），但是他在努力地——尽管是一带而过地——展示出司机和金融巨头、水手和船主之间关系的心理状态。他并不曾有什么新的感悟，但毕竟对于现代社会借以建立的那种人们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角落作了描述。十月革命对于文学的影响还要到将来才能显现！[……]

1935 年 3 月 25 日

只有在记述了［……］关于娜·的事件以后，我才意识到：在前面几页中我记的并不是私人日记，而更像是政治和文学日记。其实，怎么能够不是这样呢？从实质上说，正是政治和文学构成了我个人生活的内容。只要把笔拿到手上，思路本身就自然而然地驶向政治性陈述……这一点已经无法改变，特别是在 55 岁的年纪。

顺便记起，一次列宁（重复屠格涅夫的话）问克尔日扎诺夫斯基："您知道什么是最大的罪孽吗？"克尔日扎诺夫斯基答不上来。"年龄超过 55 岁。"列宁自己没有能活到这个"罪孽"的年龄……［……］

拉柯夫斯基实际上是我同老一代革命者之间的最后的联系。在他投降以后，再也没有剩下谁了。虽然同拉柯夫斯基的通信已经中断——由于信件检查的原因——自从我被驱逐出国之时起，拉柯夫斯基的形象似乎仍然是同老战友们之间的象征性的联系。现在再也没有谁留下了。在一起共同交流思想、共同讨论问题的需要早就无法得到满足。不得不同报纸进行对话，也就是说通过报纸同事实和观点进行对话。不过我仍然认为，我现在进行的工作——尽管分量极端不足，而且十分零碎片段——是我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工作，比 1917 年更加重要，比国内战争时期等等更加重要。

为了更加清楚起见，我想这样说，1917 年如果我不在彼得堡，十月革命照样会发生——只要有列宁在和有他的领导。如果列宁那时不在彼得堡，而我也不在，那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一定会阻止其发生（对这一点我没有丝毫怀疑！）。如果列宁不在彼得堡，那我未必能应付得了布尔什维克上层分子的反抗，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早在 1917 年 5 月就会展开，革命的结局就会成为问题。但是，我

重复一句，只要有列宁在，十月革命反正一定会取得胜利。关于国内战争总的来说也可以这样讲。（虽然在国内战争初期，特别是在辛比尔斯克和喀山失守期间，列宁曾经颤抖了一下，表示过犹豫，不过这无疑只是短暂的情绪，而且除了对我以外甚至几乎没向任何人承认过。）

因此，即使对于我在1917～1921年期间的工作，我也不能说我的工作无人可以替代。但是，我现在进行的工作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而且是就这个词的全部意义而言。在这种想法中并没有丝毫的傲慢自大。两个国际遭到覆灭的事实提出的问题，必须加以研究，但是这两个国际的领袖中的任何一个人都绝对不能胜任此事。我个人遭遇的特点使我具备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来面对这个问题。超越第二第三国际领袖们之上，以革命的方法来武装新的一代，现在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能完成这项任务。而我又完全同意列宁的看法（其实也就是屠格涅夫的看法），即最大的罪孽是活过55岁。我还必须至少进行5年连续不断的工作，才能保证前后的继承性。

1935年3月27日

1903年，为了给《火星报》募集经费，曾在巴黎上演高尔基的《底层》。人们试图让娜塔利娅扮演一个角色，这差不多是我的倡议：我感觉她能很好地、“真诚地”演好自己的角色。但是不行，角色让给了别人。我感到惊奇和懊丧。直到后来我才懂得，娜·在任何方面都不能“扮演”。她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条件下——整个一生——，以及不论情况如何（而我们经历的情况不少），她始终如一地是她自己，不允许外界环境影响她自己的内心生活。

今天我们散步——登山……娜·累了，她突然脸色发白，一下子坐到了干的落叶上（地面还是潮湿的）。她很能走路，至今走路

不累，而步履轻快得像年轻人，如同她整个体型一样。但是，最近几个月来，心脏有时不好——她工作得太多，太专注（她干什么事都是如此），结果今天登山上陡坡时有所发作，娜·一下子坐下，看来不能再向前走了，于是表示歉意地笑了笑。我顿时为青春感到惋惜，为她的青春感到惋惜……一次夜间我们从巴黎的歌剧院手牵着手跑回加桑迪路 46 号，作为步行练习……那是 1903 年，我们两人加起来 46 岁，——娜·当时看来简直是更加不知疲倦。有一次我们一大群人在巴黎郊外游玩，走近一座桥梁。陡峭的水泥桥墩从很高处降低下来。两个小男孩从桥的护墙爬上桥墩，从上面看着行人。娜·突然沿着陡峭而光滑的桥墩斜坡向这两个男孩走去。我一下子惊呆了。我以为，是不可能走上去的。但是，她穿着高跟鞋以谐调匀称的步伐，脸上带着笑容走向两个孩子。他们期待地等着她。我们全都紧张地停了下来。娜·不看我们走了上去，和孩子们说了一回话，然后若无其事地走了下来，没有多用一点不必要的力气，没有多做一个不必要的动作……当时也是春天，阳光和今天一样明亮地照耀着，而今天娜·突然一下子坐到了草地上……

“现在没有任何手段能防治此事……”恩格斯这样论及年老和死亡。按照这条无可更改的弧线，在生死之间安排着人一生的事件和感受。这条弧线便是人的一生。如果没有这条弧线，那么不仅没有老年，也不会有青年。老年之所以“需要”，是因为它积累着经验和智慧。青春之所以如此美好，归根到底是因为有老年和死亡。也许所有这些思想是由于 TSF 电台转播了瓦格纳的“众神的黄昏”。

1935 年 3 月 29 日

应当说一下，国家政治保卫局怎样从我的档案库里偷走文件的。不过，这不必着急……

1935年3月30日

“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原先的公爵、伯爵、宪兵这样一些臭不可闻的渣滓，这一伙败类合在一起，妄图摧毁我们国家的城墙。”

当然，这是从《真理报》摘引来的。没有提到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也没有提到社会革命党人：“合在一起”的只有托洛茨基分子和公爵！在这则消息中有某种无比蠢笨的东西，而在蠢笨之中又有某种命定不可避免的东西。只有历史注定要灭亡的集团才会如此堕落和愚蠢！

与此同时，这种蠢笨行为的耀武扬威的架势，又证明了有两个相互联系的情况存在：（1）他们有什么不妥当之事，而且是很不妥当之事；这种“不妥当”又位于官僚系统自身内部深处，甚至就在上层统治集团之中；把渣滓和败类合在一起，目的在于对付第三种人，他们既不是托洛茨基分子，也不是公爵们，很可能是为对付占统治地位的官僚体系队伍中的“自由主义”倾向；（2）正在策划某些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新的实际步骤，以便对斯大林波拿巴主义的某些更加接近的和更加亲密的敌人的打击作准备。可以设想，正在准备某种新的“苦迭打”，以求从法律上巩固自己个人的权力。但是这种苦迭打能够表现为什么呢？总不至于是王位吧！莫非是“领袖”的终身称号？但这太会让人想起“元首”来了！波拿巴主义的“技术”问题，看来会造成越来越大的政治困难。正在准备某种新的阶段，对这一新阶段来说，暗杀基洛夫只不过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1935 年 3 月 31 日

真是奇闻！……苏联历史学家弗·伊·涅夫斯基[①] 比之其他的许多苏联历史学家，既不坏些，也不好些：粗枝大叶，漫不经心，刻板守旧，但是又带有一些天真幼稚，这一点在“有意识”地捏造事实的大背景下却显得颇为真诚。涅夫斯基不属于任何一个反对派。尽管如此，他还是长期受到迫害。为什么呢？且看原因之一。在自己所著，于 1924 年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历史》中（在著作评述中），涅夫斯基指出：

“诸如康斯坦丁·莫洛托夫的小册子《论党史》之类的书籍，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而且直接带来危害，其错误竟多到这样的程度：仅这本书的 39 页内容中我们就发现了 19 处错误！……”在 1924 年，涅夫斯基不可能知道，莫洛托夫的命运之星竟会升得如此之高，而小册子中的“19 处错误”并不足以妨碍它的作者成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看来正是莫洛托夫通过他一度（很早了！）在其中为所欲为的组织局迫害了可怜的涅夫斯基……但是，时代是不断变化的：莫洛托夫的这颗星已经发暗，而谁又知道，涅夫斯基关于人民委员会主席不学无术的话，也许还会使惨遭厄运的历史学家获得更大的荣耀。真是奇闻！……

1935 年 4 月 2 日

艾登在莫斯科的谈判，以广为传播的外交公告的形式宣告结

① 涅夫斯基，弗·伊·（1876～1937）——历任交通人民委员、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党的农村工作部部长、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校长、党史委员会副主任。

束，其中包含有相互承担义务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和福利的内容。在去华沙的路上，艾登立即强调说明，这不仅是英国对苏联承担的义务，也是苏联对英国承担的义务。这里涉及的是中国、印度、共产国际、“苏维埃”中国。那么，在这些方面莫斯科作出了哪些承诺呢？从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情况，可以验证克里姆林宫所承担义务的性质。代表大会没有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参加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莫斯科谈判之后，有中国人、印度人和英国人参加的代表大会有可能召开吗？

归根结蒂，如果斯大林保证悄无声息地取消共产国际，那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倒有极大的好处。但与此同时，这样的义务又明白无误地证明，苏联官僚体系已经同世界无产阶级彻底决裂了。

*　　*　　*

昨天，我又进入发病状态。身体虚弱无力，有轻度的寒热，两耳轰鸣。上一次发生类似的情况时，亨利·莫里尼埃正好在当地的行政长官那里。地方长官询问起我的情况，当得知我生了病，他确实惊慌得大叫起来：“这非常令人不快，非常令人不快……如果他死在这里，我们便不能用假姓名来掩埋他！”各人有各人关心的事！

*　　*　　*

刚刚收到巴黎的来信。亚·李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同孙子们住在列宁格勒的我的前妻，被流放去了西伯利亚。国外已经收到她发自托博尔斯克的明信片，她是在去西伯利亚以远地区而路经此地的。小儿子谢廖沙在工学院任教授，它的音讯也已中断。他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在他周围传播着一些令人担心的谣言。看来，他也从莫斯科被流放到外地了。我不认为亚·李沃夫娜·索科洛夫斯卡娅近几年来会表现出什么政治上的积极性：上年纪了，又有3个孩

子要照看。《真理报》几个星期以前在一篇论述同“残余”和“渣滓”作斗争的文章中，用通常的流氓方式，提到了亚·李·的名字，不过只是顺便提及，而且给她安的罪名是：对一批似乎是林学院的大学生——在1931年！——造成过有害的影响。《真理报》揭发不出以后的任何罪行。但是，提到了名字就明白无误地说明，也要准备好接受这方面的打击。

普拉东·沃尔科夫，已故季努什卡的丈夫，在流放地又一次被捕，发配去了更远的地方。谢武什卡（外孙），普拉东和季娜的儿子，8岁，不久前刚刚从维也纳来到巴黎。在他母亲生前最后一段时期内，他在柏林和母亲在一起。当谢瓦在学校时，她自杀而死。他们迁到大儿子和儿媳那里住了一个短时期。但是，由于法西斯制度明显逼近，他们不得不仓促离开德国。他们把谢武什卡送到维也纳，以免重新学习语言。由老朋友们把他安排进了学校。在我们迁来巴黎和奥地利发生反革命动乱以后，我们决定把孩子接到巴黎来，交给大儿子和媳妇。但是，7岁的谢武什卡怎么也拿不到签证。在交涉奔忙中，好几个月过去了。直到不久以前才得以把他接来。在维也纳停留期间，谢瓦把俄语和法语完全忘了。当他5岁时随妈妈来普林基波看我们时，他讲一口多好的俄语，一口莫斯科腔调！在那里的幼儿园里，他很快学会了法语，以及一些土耳其语。在柏林又转学德语，到了维也纳完全成了德国人。现在，在巴黎的学校中，他又转而讲法语。他知道母亲的死，也不时询问“普拉托沙”（父亲）的情况，对于他来说，父样已经成了神话。

小儿子，谢廖沙，与大儿子相反，而且部分地也是为了直接和他对立，从12岁起就脱离政治而不再过问政治：从事体操运动，醉心于马戏，甚至一度想当一名马戏演员，后来学习技术课程，工作很努力，当上了教授，不久前还和别的几个工程师一起出版了一本关于发动机的书。如果他确实遭到流放，那绝对是有人出于个人

报复的动机——不可能有任何政治上的理由！

至于他在莫斯科的生活条件：谢廖沙结婚很早；他和妻子一起在一个房间里住了几年，这是我们迁出克里姆林宫后所住最后一套住所中留给他们的。1年半以前，谢廖沙和妻子离了婚；但由于没有多余的房间，他们继续一起生活直到最后的日子。看来，现在只有国家政治保卫局得以使他们分手，各奔西东……也许，连廖利娅也被流放了？这不能排除！

1935年4月3日

我显然对于有关“托洛茨基分子渣滓”的声明（见3月30日所记）的直接实际意义估计不足；“行动”的矛头这一次又指向我的一个个亲人。当我昨天晚上把大儿子从巴黎的来信交给娜塔利娅时，她说：“他们无论如何不会流放他［谢尔盖］的，他们将拷问他，以得到些什么，然后将他消灭……”

看来，流放1074人是在针对反对派采取新的行动前有意安排的前奏。“伯爵、宪兵和公爵”只是混合配方的前一半，是它的基础。不过，最好还是更完整地摘引《真理报》上的一段话：

“针对敌人的阴谋，必须采取完全现实的措施。由于存在奥勃洛摩夫习气和轻信之风，由于对遵照外国情报机关的指示而行动的反党分子和敌人采取机会主义的宽容态度，他们有时得以钻进我们的机关。

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原先的公爵、伯爵、宪兵这样一些渣滓，这一伙败类，合在一起，妄图摧毁我们国家的城墙……

近日反党分子被揭露的事实、不久前发表的有关列宁格勒逮捕、放逐的审讯原沙皇官员的报道表明，有一批政治和刑事恶棍正

在无孔不入地打进来。

不久前，莫斯科审判了一个骗子，名叫沙波什尼克，他到了许多城市，冒充工程师。一些傻瓜给他安排了工作，把国家财产托付给他，过了很久他才被揭露出来，关进监狱。再如另一个骗子和敌人克拉夫斯基，他又名扎格罗德尼，自称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会委员。一伙傻瓜信以为真，使他得以混入选举委员会担任委员，在那里犯下了罪。在萨拉托夫边疆区，一名间谍利用一张可笑的伪造证件，担任起负责工作，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才被揭露和处决。”（见3月25日《真理报》）

那么，关于：“外国情报机关”的话指的是谁呢？指公爵们，还是托洛茨基分子们呢？《真理报》补充说，他们“合在一起”。至少，把一切人都罗列在一起，意思是让国家政治保卫局可以把“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当作为外国情报机关的间谍处置。这是绝对清楚的。

且看关于1074人的最初报道：

“近日来，在列宁格勒，因破坏居留规定和身份证制度的法令，逮捕和放逐了一批公民，他们是原先的贵族、沙皇官员、大资本家、地主、宪兵、警察等。其中：原公爵41人，原伯爵33人，原男爵76人，原大工厂主35人，原大地主68人，原大商人19人，原沙皇各部高级官员142人，原沙皇军队和白军的将军和军官547人，原宪兵队、警察署和暗探局高级官员113人。

部分被放逐者因从事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和为外国效力而受到检察机关的追究。”（见3月20日《真理报》）

在这一次还没有一个字提到托洛茨基分子，而关于“为外国效力”的活动暂时指的只是原“公爵和宪兵”。直到5天以后，《真理报》才向我们报道说，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他们“合在一起”行动！这种把不同事物糅合在一起的手段是多么拙劣。

1935年4月4日

对谢廖沙、亚·李·、孩子们的惊恐不安，把当前个人生活中的一切“窘困艰难”都推到了次要地位。昨天我对娜·说：“直到接到廖瓦最后一封信之前，我们目前的生活令人感到几乎是极其美好和宁静安详的……”娜·表现得非常勇敢，那是为我着想，但对所有这一切的痛苦感受要比我更加沉痛得多。

在斯大林的镇压政策中，个人报复的动机始终占据很大的分量。加米涅夫曾向我说过，他们3个人——斯大林、加米涅夫、捷尔任斯基——1923年（或1924年?）一个晚上在祖巴洛夫度过一天，一面喝酒一面“倾心”交谈（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是他们开始了反对我的斗争）。酒后他们在阳台上谈起了触动感情的题目：个人兴趣和爱好这样一类的话题。斯大林说：“最大的享受是：瞄准敌人，做好准备，尽情地报复，然后去睡觉。”

他对我的复仇感完全没有得到满足：可以说，身体上的打击是有的，但道义上没有得到任何东西：既没有放弃工作，没有“悔过”，也没被孤立；相反，开始了一个新的不可阻挡的历史性飞跃。这就是斯大林极度担忧的根源所在：这个野蛮人最怕思想，知道思想的爆炸性威力，也知道自己在思想面前软弱无力。但与此同时，在另一方面他却十分聪明，即深知就是今天我也不会同他交换位置：这种深感被刺痛的心理就由此产生。但是，既然在较高的层次上进行报复未能成功，而且显而易见也不会成功，那么剩下的只有运用警察手段对我的亲人进行打击了。毫无疑问，斯大林没有一分钟不在想对我策划暗害行动，但他又害怕承担政治后果：罪责必然无疑地会落到他的头上。对我在俄国的亲人进行打击并不能使他得到必要的“满足”，同时也会在政治上造成麻烦。难道宣布谢廖沙

“遵照外国情报机关的指示”工作？过于荒诞不经，也会过于直接地暴露出个人复仇的动机，对斯大林个人名誉的损失未免过大。

*　　*　　*

“苏联承担停止在英国及其自治领进行共产主义宣传义务[①]

伦敦4月3日电。在不久前同艾登先生举行谈判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先生声明，他将莫斯科政府停止在英国及其自治领进行共产主义宣传的决定通知了掌玺大臣。

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用于进行这种宣传的费用近几个月来日渐减少。”

这很像真话。李维诺夫——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早就认为共产国际是一个无利可图和极其有害的机构。在心灵深处斯大林是同意他的。资助经费逐日递减的细节是十分具有深意的：克里姆林宫给每一个党规定了一定的“清理”时期。当然，共产国际各支部即使在这个时期之后也不会消失，但必将大大收缩，并不得不根据新的预算安排自己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还应考虑会出现人员的变动、离去、脱逃和揭发。共产国际的大部分“领袖”、记者和宣传人员都纯粹是卖干乳酪的人，卖夹肉面包的人：既然不付款，那就再也没有信用。

在对外对内政策方面的右转，迫使斯大林竭尽全力向左面出击：这是预防反对派活动的保险措施。但这种保险措施是绝对无补于事的。苏联整个社会生活体制的变化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尖锐的政治震动。

① 贴在日记上的一则从法国报纸剪下的消息。

*　　*　　*

目前撰写关于列宁的书是十分困难的。思想怎样也无法集中到1893年。近几天来，天气骤然发生变化。虽然花园里面百花盛开，但今天下了雪，从清早就开始下，一片茫茫白雪覆盖了大地，后来融化了，现在又下了起来，但随即融化。天空是灰蒙蒙的，浓雾从山顶向山谷降落，室内既寒冷又潮湿。娜·带着沉重的心情忙着搞家务。

生活不是轻松的东西……如果自己没有一个崇高的思想，使自己高出于个人琐事之上，高出于软弱胆怯之上，高出于种种背信弃义和愚蠢粗俗之上，就不可能在生活中不陷入意志消沉或厚颜无耻……

1935年4月5日

我们在这里收不到邮件。大部分邮件是遇有机会从巴黎（每月2次）捎来的，特急件则是通过中间人转寄，但也稍有迟误。现在我们正等待关于谢廖沙的消息——娜·等得更是焦急，她的内心生活完全处于这种等待之中。但是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消息并不简单。就是在更加平安的时期，同谢廖沙的通信也是如同摸彩票一般。我根本不给他写信，为的是不让当局对他借端兹事。只有娜·写信，而且只谈些生活琐事。谢廖沙的回信也是这样写的。常有很长一段时间收不到书信。后来突然一张明信片自天而降，通信又恢复一段时间。最近的一些事件（基洛夫被暗杀等等）之后，对国外通信的检查必然会更加粗暴凶狠。如果谢廖沙被关进监狱，自然不会让他向国外写信。如果他已经被流放，那么处境要好一些，但一切都取决于具体条件。流放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拉科夫斯基一家同外部世

界完全断了联系。连一封信，甚至连一封近亲的信都没有收到。关于谢廖沙被捕的消息只有近亲才会写信来。但是，谁呢？看来，没有人……而且即使有些友好的人在，也不知道地址。

*　　*　　*

雨停了。从16时至17时我和娜·外出散步。天气宁静、温和，天空布满阴云，山间浓雾笼罩，空气中有一股粪肥的气息。“3月那时像是4月，而现在4月又像3月。”这是娜·说的。若不是娜·把我的注意力拉回来，我对以上景色几乎视而不见。她的声音击打着我的心。她的声音略带嘶哑。在痛苦之中，显得更加低沉深远，似乎是由灵魂直接说出来的。我多么熟悉这个充满柔情和痛苦的声音！娜·（经过很长间歇之后）再次谈起谢廖沙。“他们能从他那里获得什么呢？要他悔过吗？但他并没有什么可悔改的。要他和父亲‘断绝关系’吗？……在什么意义上说呢？但是，正因为他没有什么可悔改的，于是也就没有前途了。要把他关押多久呢？”

娜·回忆起，在政治局会议之后（这是1926年的事）在我们住所里坐着一个当时的朋友等待会议的结果。我和皮达可夫一起回来（他作为中央委员有权出席政治局会议）。万分激动的皮达可夫介绍着“事件”的过程。我在会上说，斯大林把自己彻底放到了党和革命的掘墓人的地位上。斯大林离开会场以示抗议。根据惊慌失措的李可夫和鲁祖达克的建议，对我作出进行“斥责”的决定。谈到这里时，皮达可夫转向我用力地说：“他为此永远不会忘记您，不会忘记您，也不会忘记您的孩子们，甚至孙子们。”当时，关于孩子和孙子的话——娜·回忆说——感到极其遥远，更像是句习惯用语；但果然波及到孩子，甚至孙子们了：他们和亚·李·被迫隔绝开来，他们还有什么呢？而大孩子列武什卡，已经15岁了……

*　　*　　*

一个人的本性，它的深度和力量，是由它的精神储备所决定的。人一旦被迫脱离习惯的生活条件，他们的本性就会完全显露出来，因为到这时不得不把自己的储备动用起来。我和娜·结合在一起已经33年了（三分之一个世纪），而我每到境遇悲惨的时候总是对她的本性的储备惊叹不已——是否因为力量已经衰竭，或者是由于别的什么原因，我非常想把娜·的形象留刻在纸上，哪怕铭记一部分下来也好。

*　　*　　*

列瓦转寄来一张亚·李沃夫娜已是从流放地发出的明信片。还是那种清晰的，略带稚气的笔迹，仍然没有抱怨的话语……

1935年4月9日

白党的报刊曾经十分热烈地争论过，是根据谁的决定把沙皇一家处死的……自由派似乎倾向于认为，是与莫斯科消息断绝的乌克兰执委会自行其是处置的。这是不正确的。决定是由莫斯科作出的。事情发生在国内战争中万分紧张的时期，当时我几乎全部时间都是在前线度过的，因此我关于沙皇家庭事件的回忆是不连贯的。下面把我所记得的记述下来。

在一次我短时间回莫斯科期间——我想是在处决罗曼诺夫一家的几周之前，我在政治局曾顺便指出，由于乌克兰局势紧急，应当加速对沙皇的审判。我建议举行公开的司法审判，以便把沙皇统治的情景全部展现出来（农民政策、工人政策、民族政策、文化政策、两次战争等）；要通过无线电（?）把审判过程向全国播发；在

乡里，要每天宣读审判的报告和进行评论。列宁的反应大体是：如果能够实现，这倒是很好的事。但是……时间可能不够……没有进行任何讨论，我因为忙于其他事务而没有坚持自己的建议。而且据我记得，我们在政治局只有3～4个人：列宁、我、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好像不在，列宁在这一时期情绪相当忧郁，他不很相信能够把军队组建起来……我再一次来莫斯科已是叶卡捷琳堡失陷以后了。在同斯维尔德洛夫谈话时我顺便问起：

“那么，沙皇在哪里呢？”

“当然，枪决了。”他回答说。

“那他的家人呢？”

“家人也跟他一起。”

“所有人？”我问道，看来带着惊奇的口吻。

“所有的人！那又怎么样？”斯维尔德洛夫回答说。

他等待着我的反应。我没有作任何回答。

“是谁决定的呢？”我问。

“我们在这里决定的。伊里奇认为，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一面活的旗帜，特别是在目前困难的条件之下。[①]”

我再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也不再过问。实际上，这项决定不仅是适宜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严厉的镇压措施向所有人表明，我们将无情地进行斗争，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处决沙皇一家不仅对于恐吓、威慑敌人，打破敌人的希望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振奋自己的队伍，表明已经没有退路，前面不是彻底胜利就是彻底灭亡，对这一切也是不可缺少的。在党的知识分子群中，很可能存在怀疑和否定的看法。但是，工人和士兵群众一分钟也不曾怀疑过：他们

① 稍后，托洛茨基援引某别谢多夫斯基的回忆录，把处死沙皇一事归咎于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

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作出任何别的决定。这一点列宁感觉得很清楚，他具有一种非凡的为群众思考和感觉以及和群众一起思考和感觉的能力，特别是在重大的政治转变问题上……

在《最新消息报》上我看到关于枪决、焚烧尸体等等的描述，那已经是在国外了。至于所有这一切是真实的还是编造出来的，我不得而知，因为我从来不曾对如何实施处决感过兴趣，坦白说，也不理解这会有什么兴趣。[……]

1935年4月10日

今天同娜塔莎一起上山散步时（天气几乎同夏天一样），我回想了就审判沙皇一事同列宁的谈话。很可能除了时间问题的考虑（“我们来不及”把大规模的审判进行到底，因为前线决定性的事件可能较早来临）以外，列宁还对沙皇一家人另有其他的考虑。通过司法审判程序，要想镇压沙皇全家当然是不可能的。沙皇一家是构成君主制核心的那项原则，即王位继承原则的牺牲品。

*　　*　　*

关于谢廖沙没有任何消息，也许不会很快有消息来。长时间的等待使最初几天的惊恐情绪有些麻木了。

*　　*　　*

当我在辛比尔斯克和喀山两处失守之间第一次收拾东西准备去前线时，列宁的情绪消沉。“俄罗斯人太老好”，“俄罗斯人磨磨蹭蹭，笨头笨脑……”，“我们这里是一锅粥，而不是专政”。我对他说：“要使坚强的革命核心成为部队的基础，他们可以从内部维持铁的纪律；还要建立一些可靠的拦阻支队，他们可以从外部同部队

内部的革命核心一起发挥作用，不惜处决临阵脱逃者；要保证有懂行的军队指挥人员，但要派有带手枪的政治委员监督专家；要成立革命军事法庭和设置表彰个人作战英勇的勋章。”列宁的回答大体是：“这都正确，绝对正确，但时间太少了：如果行事过于陡急（这是绝对必需的），——我们党自己就会加以干扰：有人会大诉其苦，有人会到处打电话，有人会抓着一些事实进行干扰。当然，革命能够锤炼一切，但时间太少了……”当列宁通过谈话看出我对胜利充满信心，他就全力支持我外出巡视，多方为之张罗，关心备至，一天来 10 个电话询问准备情况，要不要装一架飞机在火车上等等。

喀山陷落。社会革命党人卡普兰刺伤了列宁。我们又收复喀山。把辛比尔斯克也夺了回来。我去了趟莫斯科。列宁在哥尔克养病。斯维尔德洛夫告诉我说：“伊里奇请您到他那里去一下。想一起去吗?”我们去了。从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接待我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是多么急迫和热切地等着我。列宁情绪极好，身体看起来也很好。我感觉到他用某种不同的眼光看着我。他善于钟爱别人，如果这些人向他展示出某一个方面之时。在他的热切的关注之中就有这种“钟爱”的成分。他贪婪地听我讲述前线的情况，时而欣慰地，几乎是怡然自得地出着长气。“我们党赢了，”他说，突然，又转而用严峻、坚定的语调说，“既然我们能够在军队中建立起秩序，那也就是说，我们到处都能做到这一点。而秩序井然的革命是无往而不胜的。”

当我和斯维尔德洛夫上汽车时，列宁和娜·康·站在阳台上（恰好在正门上方）——我又一次感觉到伊里奇用他那种略显腼腆的、眯着的目光看着我。可以看出，他还想说些什么，但没有说出来。突然警卫人员搬来几盆花，放到汽车上。列宁的脸因感到担心而阴

暗起来“您会感到不方便吧?”他问道。我没有注意到花，也没有理解列宁担心的原因。直到驶近莫斯科，这是1918年秋天饥饿而脏乱的莫斯科，我才感到极其尴尬：现时载着花驱车行驶合适吗?我这才理解了列宁的担心：他正是预见到了这种尴尬。他善于预见。

在下一次会面时我告诉他：“您上一次问起花的事，在会见忙碌之时我没能理解到您讲的不方便是指什么。直到进市区时我才突然领会了……像是个投机倒把的贩子?”列宁生动活泼地问道，并且温和地笑了。我再一次捕捉到他那种特别友善的目光，反映出他因我领会了他的意思而甚感欣慰……在哥尔克会面的种种情景和细节都清晰无遗、细致入微地印入脑海而无法抹去!

我和列宁之间有过几次尖锐的冲突，因为每当我在重大问题上同他发生分歧时，我总是要争论到底。这类情况许多人都清楚记得，后来也有不少人人云亦云地相互流传和写将出来。但是比这类情况多一百倍的事例是，我和列宁通过讲半句话就能相互理解，而且我们的团结合作保证了一些问题毫无磨擦地在政治局通过。列宁对这种团结和合作是极为珍视的。

1935年4月11日

在最近一届工党政府成立之前，还在竞选期间，维伯夫妇，即悉尼·维伯[①] 和比阿特里萨·维伯[②]，到普林基波来看我们。这些

① 维伯，悉尼（1859～1947）——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费边社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两度出任工党政府大臣。

② 维伯，比阿特里萨（1858～1943）——英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悉尼·维伯的妻子。

“社会主义者”很乐于赞许斯大林在俄国倡导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提法。他们有些幸灾乐祸地等待着美国爆发激烈的国内战争。但是，对于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他们却仍然宁愿维护和平渐进的社会主义。为了给不愉快的事情（十月革命、阶级斗争的爆发、法西斯）让步，以及为了保持自己费边主义的成见和偏爱，维伯夫妇给自己的盎格鲁撒克逊经验主义创立了一种社会发展“类型”论，并给英国从历史上安排了一种和平类型。而恰恰在这个时候，悉·维伯正准备从自己国王手中获得帕斯菲尔德勋爵的称号，以便以陛下大臣的身份来和平地改造社会。当然，比之对列宁的态度，维伯夫妇更接近鲍德温。我听维伯夫妇讲话时，感到他们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上的人，虽然他们学识非常渊博。固然，他们自己夸耀说，他们不属于教会。

1935 年 4 月 14 日

3 个社会主义的逃兵：墨索里尼、赖伐尔[①] 和麦克唐纳各自代表本国的“民族”利益。其中最微不足道和最没有才干的是麦克唐纳。他身上散发着某一种奴仆性格的东西。甚至当他同墨索里尼谈话时连动作手势都是这样（见报纸上的照片）。很能说明这个人特性的事是，在自己的第一届部长任内他忙不迭地给了莫斯利一个职位，而这个贵族出身的纨绔子弟只是为了寻找飞黄腾达的捷径才在前不久参加工党的。如今这个莫斯利正在试图把古老明智的英国变成欧洲疯人院的一个分院。而且，即使不是他，只要法西斯在法国获得胜利，也会有别的什么人照样乐意地做到这一点。工党有可能

① 赖伐尔，皮埃尔（1883～1945）——法国政治活动家。1925 年起多次参加政府，曾任总理。1942～1944 年是亲希特勒的维希政府的首脑。

上台的形势这一次将会强有力地推动英国法西斯的发展，并且总的说来能在英国历史上揭开一个和鲍德温们和维伯们的历史哲学观背道而驰的充满风暴的篇章。

1935年4月27日

关于谢廖沙的命运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　　*　　*

《时报》在莫斯科电中报道说，今年的五一节口号只提同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作斗争，而根本没有谈及右翼反对派。这一次的向右转将走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远，比斯大林所预见到的会远许多。

*　　*　　*

在最近一期（第43期）我出版的俄国反对派通报上，我未免惊讶地看到一则注记：出版第7年。这就是说，第三次侨居国外已经是第7个年头了。第一次为时2年半（1902～1905），第二次长达10年（1907～1917年），第三次……第三次会持续多久呢？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侨居国外期间（直到战前），我自由地遍游欧洲，并且毫无阻碍地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即将来临的报告。只有在普鲁士才必须采取预防措施；而在德国其他地区警察大都宽大为怀。至于欧洲其他国家，其中也包括巴尔干国家，就更不必说了。我旅行用的是一份十分可疑的保加利亚护照，但似乎仅仅只检查过一次，那是在普鲁士边境。那时还真是自同自在的时期！在巴黎的公开集会上，俄国侨民的不同派别就恐怖行动和武装起义问题论战到半夜和后半夜……两名法国警察站在街上，好像是舒瓦齐大道，

110 号，他们从来不进入大厅，也从来不检查进出的人。只有咖啡馆老板在半夜以后有时熄掉灯光，以便驱散过于放肆的激情——对侨民中的有害活动没有其他的监督。

在那些年里资本主义制度要强大和自信得多！

1935 年 4 月 29 日

从最近的电讯知悉，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仍将于 5 月在莫斯科召开！显然，斯大林已无法再取消或推迟大会召开了，否则就太丢脸了。也可能是因艾登的访问毫无结果和同法国的谈判存在困难，想出了这样一个主意：用代表大会来“恫吓”当事人。唉！这次代表大会吓唬不了任何人！……

1935 年 5 月 4 日

法苏协定得以签署。法国报刊的所有评论，虽然细节上存在差别，但都在一点上取得一致认识：条约的意义在于，它约束了苏联，不容许苏联同德国眉来眼去；我们真正的“朋友”仍然是意大利和英国，加上小协约国和波兰。苏联更像是人质，而不像是盟友。《时报》报道了 5 月 1 日莫斯科军队检阅的引人入胜的景色，但又意味深长地补充说：评价军队的实力不是看检阅，而是看工业实力、运输水平、供应状况等等。

波将金同赫里欧互致贺电，开头是“我国的朋友……”。在国内战争初期波将金曾去过前线，显然是在接连不断的动员中的某一次被征召入伍的。当时斯大林坐镇南方战线，任命波将金为某集团军（或师？）政治部主任。在巡视期间我到过那个政治部。我第一次看到的波将金用异常低声下气和虚伪客套的词句致词欢迎我。工

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政委们都为之甚感尴尬。我几乎把波将金从桌子边上推开，不致答词而直接谈起前线的形势……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政治局在斯大林的参加下研究了南方战线工作人员的组成。讨论到波将金。我说："是个讨人嫌的家伙。显然，根本不是自己人。"斯大林袒护他说：他在南方战线似乎曾把某一个师"引上东正教信仰"（即整顿好了纪律）。季诺维也夫在彼得堡期间对波将金略有了解，对我表示支持。他说："波将金像雷斯涅尔教授，只是比他更坏。"这时我才似乎第一次得知，波将金也曾是教授。列宁问道："那他究竟坏在哪里呢？"我回答说：他是沙皇廷臣！列宁看来是这样理解的，即我暗指的是波将金对斯大林的卑躬屈节的态度。但是，这个问题我想都没有想过。我指的只是波将金那篇对我的欢迎词。不记得我是否就这一误会作过解释……

1935年5月5日

TSF正在播放《蝴蝶夫人》。是星期天，只有我们两人在家：主人一家外出了，有的去做客，有的去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投票……街上驶过一群骑自行车的人，为首的唱着《国际歌》：看来是工人竞选宣传队。2个工人政党和2个工团主义组织都已经虚弱不堪，但仍然拥有历史惯性赋予的强大力量。社会过程，其中也包括政治的有机物特性，在危急时期，即当旧的"革命"组织尾大不掉，无法及时实行必要的转变时，就特别直接地表现出来。M. 伊斯特缅等人关于革命工程师的说法荒谬无比——这些工程师按照自己的设计图纸用现有材料制造出新的物质形式。而这种美国的机械理论竟被说成是比辩证唯物主义前进了一步。社会过程更加像是有机物（从广义上说），而不像机械。依靠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革命者，从思维和关注的类型来说，更接近于医生，特别是外

科医生，而不像工程师（尽管美国人伊斯特缅对桥梁建造也只有真正儿童般的认识）。如同一名医生，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仍然应当依靠生命过程的自主机制……在目前法国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看起来像是一个宗派教徒，历史的惯性，其中也包括工人组织的惯性，是与他对立的。马克思主义预测的正确性必定要显示，但是它可能以两种方式显示出来：通过群众及时转上马克思主义政策的道路的方式，或者通过无产阶级被击溃的方式（这就是现今时代的非此即彼的选择）。

1926 年，当时我和娜·在柏林时，魏玛民主制国家还处于兴旺时期。德国共产党的政策早已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这是因为德共毕竟曾一度完全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但党本身却仍然是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我们用化名在亚历山大广场参观五一节游行。人群汹涌，旗帜飘扬，发表的演说令人振奋。人们不禁感到：要扭转此等汹涌大潮的方向是很难的……

但是，回到莫斯科后第一个星期四的政治局会议却给我留下了难以忍受的印象。当时由莫洛托夫领导共产国际。此人不笨，很有性格，但才智有限，十分呆板，缺乏想象力，他不了解欧洲，不能阅读外文书刊。由于感觉到自己的弱点，他更加顽固地维护自己的“独立见解”。其他人则硬是予以支持。记得，鲁祖塔克有一次同我争论，试图修改我所作的《人道报》的一篇译文，说是“有倾向性”：他从我手里把报纸拿过去，用手一行行比划，颠三倒四，搞不清楚，又用厚颜无耻的办法进行遮掩。其他人则又一次予以“支持”。连环保被作为不可更改的法律规定下来（1924 年通过秘密的特别决议，规定政治局委员保证任何时候都不公开相互进行争论，而在同我辩论时则一定相互支持）。我站在这些人面前简直如同面对一面严实无缝的墙壁。但这当然并不是主要的。在个别人的愚蠢无知、才智浅薄、顽冥不化、怀抱敌意的背后，甚至可以用手指触

摸到这个特权帮派的社会特征，即一旦涉及他们的私利，就十分敏感，十分有洞察力，十分积极主动。德国共产党就整个地依附于这个帮派。局势的历史悲剧因素就在这里。1933年结局到来了：人数众多的德国共产党，由于已被谎言和伪造从内部蛀蚀一空，一遇法西斯的进攻便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了。这一点莫洛托夫们和鲁祖塔克们却没有预见到。而这本来是可以预见的。[……]

*　　*　　*

两周的紧张工作以后病了，读了几部长篇小说。[……]

帕乌斯托夫斯基的俄罗斯短篇小说《科尔希达》。作者看来是参加过国内战争的老派海员。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从技术上看要高出于所谓的“无产阶级作家”们。对大自然的描写很精彩。看得出有一双海员的锐利的眼睛。在描绘苏联的生活时（在外高加索），常常像是被捆住胳膊的杂技体操演员。但是也有反映努力工作、勇敢牺牲、热情洋溢的动人场面。他写得最成功的，尽管令人惊奇，是那一个流落在高加索而被卷入共同工作的英国海员。

读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是雅科夫·伊利英的《巨大的传送带》。这已是被叫做“无产阶级文学”的纯粹样板了，而且是不坏的样板。作者讲述了一个拖拉机厂的“故事”——从建造到投产。有许多技术问题和细节以及更多的有关争论。尽管仍然存在学生腔，但写得相当生动。在这部“无产阶级”作品中，无产阶级却远远站在一边的次要位置上，处于近景的是组织者、行政人员、技术人员、领导干部以及机床。上层与群众的脱节现象贯穿着位于伏尔加河上的这部美制传送带的整个史诗。作者对于总路线表现得异乎寻常的虔敬，对领袖们的态度也浸透了官方的崇拜之情。这些感情的真挚程度很难判断，因为它们具有人人必须遵守和强制推行的性质，正如同时对于反对派必须憎恨一样。在小说中，托洛茨基分子占有一定

的位置，诚然是次要的位置，作者力求赋予他们以从《真理报》社论里抄袭来的观点。但是，尽管有人如此的蓄意精心安排，这部小说仍然有不少地方像是针对斯大林制度的讽刺作品。庞大的工厂尚未完工即投入生产：机床有了，但工人却无处住宿，工作未组织好，水源不够，到处都是无政府状态。必须停工，以便做好充分准备。停工？那斯大林会说什么?! 不是向代表大会提出过保证吗？令人厌恶的拜占庭主义取代了务实的考虑。结果是惊人的人力浪费和质量低劣的拖拉机。作者转述斯大林在经济工作人员会议上的演说："降低速度？不行。那西方呢?"（1927 年 4 月斯大林力图证明，速度问题与在资本主义包围中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没有任何关系——速度是我们的"内部事务"。）总之，降低上面规定下来的速度"是不行的"。但是，为什么提出的指数是 25，而不是 40 或 75？提出的指数反正是达不到的，而力求接近它则要付出代价，那就是质量低劣，消耗工人的生命，浪费设备。这一切伊利英都看得很清楚，尽管作者表现了官方的虔诚……

某些细节令人吃惊。奥尔忠尼启则对工人说话（在小说中）用"你"相称，而工人回答他时则称呼"您"。整个对话都是在这种氛围下进行的，而作者认为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传送带故事中最阴暗的一面，则是工人们，特别是只受到凡事均要服从教育的无产阶级青年，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而且一个个都看不出个性。对于一名反对接受过重任务的年轻工程师，党委向他提醒他不久前表现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以开除相威胁。年轻的工人党员争论的题目是：为什么青年一代中间在任何一个州里都没有一个人作出杰出的贡献？谈论者以混乱不堪的看法安慰着自己。其中一人突然冒出一个调子：莫非是因为我们受到压制？于是对他群起而攻之：我们不需要自由争论，我们有党的领导，有"斯大林的指示"。党的领导——没有争论——那就是"斯

大林的指示”，而“斯大林的指示”则不过是官僚用经验主义方法总结的经验。官僚永远不犯错误的教义扼杀了青年，使他们的神经浸透了奴隶主义、拜占庭主义精神、虚假的“领袖英明”。必定无疑有一些大人物在工作，也许静悄悄地待在某处。但是，给年轻一代涂上官方色彩的人们身上必然存在无法抹去的尚未成熟的印记。

1935年5月8日

老年是人生中最令人感到突然的事情。

*　　*　　*

挪威工人党政府似乎不可改变地应允发给签证。看来不得不使用这一份签证。继续留居法国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而且在两种可能的情况下都是如此：无论是反革命势力不断取胜，还是革命运动顺利发展都一样。由于不可能把我驱逐到其他国家去，政府从理论上把我从法国“驱逐出境”，但又不敢把我遣送到某一个殖民地去，因为这会引起太大的风波，而且会提供给人始终不停地进行宣传鼓动的口实。不过随着国内关系的日益激化，这些次要的考虑就会被放弃，而我和娜·就可能移居某一个殖民地。当然，不是去条件相对舒适的北非，而是很遥远的某处……这将意味着一种政治隔离，比在普林基波更加严密得不知多少倍的政治隔离。在这种条件下，不如及时离开法国。[……]

挪威当然不是法国：语言不通，一个小国，远离大路，邮件不能及时到达，等等。但毕竟比马达加斯加要好多了。语言要学到能看报并不需要很长时间。挪威工人党的经验本身就极有价值，而在英国工党上台执政前夕就更有意义。

当然，一旦法西斯在法国得胜，斯堪的纳维亚民主“堑壕”也

支持不了多久。但是，在当前形势下，能够谈到的也只是“喘一口气”而已……

在娜·收到的谢廖沙最近一封信中，他似乎不经意地写道：“总的形势看来极其严重，要比可能设想的严重得多……”一开始让人感到这是指个人的处境而言。但现在十分清楚，指的是基洛夫被害以后以及在与此相关的新的迫害活动浪潮以后（信是1934年12月9日写的），对于谢廖沙而言的政治形势。不难真正地设想到，他不得不经受的是怎样的处境：不仅在会议上和阅读报纸时，而且还在私人接触、交谈以及（无疑！）一些卑鄙的追逐名利之徒和坏蛋的大量挑衅中。要是谢廖沙具有强烈的政治兴趣，怀有帮派情绪，所有严酷的感受也算罪有应得。但他完全没有这种内在的动机。这样他就会更加痛苦。[……]

1935年5月13日

皮尔苏茨基[①] 死了……我从来没有和他本人见过面。但还在第一次流放西伯利亚期间（1900～1902年），就听到波兰流放者对他的热烈反应。当时，皮尔苏茨基是PPS（波兰社会党）的青年领袖之一，因此，从广义说，也是“同志”。曾经是同志的还有墨索里尼，还有麦克唐纳，还有赖伐尔……多么长的一串叛徒群像！[……]

1935年5月14日

皮尔苏茨基自愿充当列宁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案件的证

① 皮尔苏茨基，约·（1867～1935）——1918～1922年为波兰国家元首。1926年举行军事政变，任国防部长（1926～1935）和总理（1926～1928，1930）。

人。皮尔苏茨基的弟弟也卷入同一案件（1887年3月1日暗杀亚历山大三世案），是被告人……

最近几十年中历史发展很快。其间，某些反动时期，特别是在1907～1912年期间，却似乎无休止地存在着……布拉格前几天庆祝了老民粹党人拉扎列夫的80岁生日……在莫斯科，活着的还有维拉·菲格涅尔[①] 和其他一些老人。在沙皇俄国从事过最早的群众革命工作的人们还没有全部退出舞台……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已面临工人国家出现官僚主义蜕化的问题……不，我们当代的历史是按第三挡的速度运转的。可叹的只是，破坏有机体的微生物活动得更快。如果它们在世界革命取得新的大步进展之前把我打倒——而这极有可能——，在我死去的时候，我仍将对于我为之献出一生的事业的胜利充满不可动摇的信心。[……]

1935年5月17日

昨天报纸公布了关于赖伐尔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正式公告。其中最为重要的，也即惟一重要的地方是：

“他们完全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真正忠于和平事业的政府，应当通过参与寻求保证这种和平的相互担保而表明自己和平生活的愿望。这首先要求它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放松自己的国防。据此，斯大林先生理解并完全赞同法国为使其武装力量保持相应水平而执行的国防政策。”

尽管我对于斯大林在政治上的厚颜无耻、无视原则和目光短浅的实用主义有足够的了解，但读了这几行文字以后我仍不能相信自

① 菲格涅尔，维·尼·（1852～1942）——俄国革命活动家，女作家，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委员。

己的眼睛。狡滑的赖伐尔很善于讨好这个徒慕虚荣而又才智有限的官僚。斯大林无疑因法国部长请求他对法国的武力作出评价而深感得意，因而泰然自若地在这个问题上把自己的名字从莫洛托夫和李维诺夫的名字中单列出来以示突出。外交人民委员当然会由于如此公开而又狠狠地踢了共产国际一脚而狂喜不已。莫洛托夫也许稍感不安，但莫洛托夫又算什么？在他背后已经站着准备接替他的丘巴尔。而布哈林和拉狄克，作为官方的办报人，对什么都可以对“人民”作出解释……

但是，5 月 15 日的报道不会不受到惩罚。问题过于尖锐，而背叛也过于赤裸裸了。正是背叛！……在德国共产党向希特勒投降之后我曾经写道：这是第三国际的“8 月 4 日”（1914 年）[①]。有些朋友表示反对说：8 月 4 日是背叛，而这里“只不过”是投降。问题也恰恰在这里，那就是：不战而降揭露出内部的腐朽，由此又必不可免地要发生进一步的蜕化。5 月 15 日的公报已经是从完整意义上讲的背叛行为的公证性文件。

法国共产党受到一次致命的伤害。可怜的“领袖们”避而不采取社会爱国主义的公开立场：他们想慢慢地和不知不觉地把群众引向投降。如今他们背信弃义的阴谋已暴露无遗。无产阶级由此只会得到好处。新的国际的事业正在不断前进。[……]

1935 年 5 月 25 日

今天收到廖瓦的信。和往常一样，信是用隐语写的。

这就是说，挪威政府发出了签证，该准备动身了。“Crux”指的是我。正如阿拉木图一位老工人所说：“不断乔迁之喜”。[……]

① 1914 年 8 月 4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会投票赞同军事拨款。

1935年6月1日

日子难过得真是度日如年。3天以前我们收到儿子的信：谢廖沙蹲在监狱里，如今这已不是猜想，即使是几乎真实可靠的猜想，而是直接来自莫斯科的消息……他的被捕，看来就在通信中断的时候，即12月末至1月初。从那时至今差不多已经半年了……可怜的孩子……还有可怜的，我的可怜的娜塔莎……［……］

1935年6月8日

我收到一群爱丁堡大学学生（他们是“所有各种色彩的政治思想”的代表）的建议，要我竞选校长。这个职务常常是“名誉的”，校长每3年选举一次，公布什么住址，还采取某些象征性的行动。在其他校长中提到的有：格莱斯顿、史密斯、南森、马科尼……只有在英国，也许现在只有在苏格兰，才会有可能出现这种稀奇古怪的想法：提出要我竞选大学的校长。我当然友好地婉言谢绝了：

“我非常感谢你们向我提出的出乎意外的而又使我引以为荣的建议：提名我为爱丁堡大学校长的候选人。这项建议表现出来不拘泥于民族主义观点的态度，使爱丁堡大学学生的精神获得崇高的荣誉。你们自己说，即使英国政府拒绝发给我签证也不能阻止你们这样做，这使我更加珍惜你们的信任。但是，我仍然认为自己无权接受你们的建议。如你们在信中所说，校长选举是在非政治基础上进行的，而你们是所有各种色彩的政治思想的代表。但我本人却持有过于明确的政治立场：我从青年时代起的全部活动都奉献给了使无产阶级从资本的枷锁下获得革命解放的事业。我并没有任何其他功劳，足以担任负责的职位。因此，我会认为自己不在布尔什维主义

旗帜下进入任何公众舞台，既会是对于工人阶级的背信弃义，也是对你们的不忠诚。我不怀疑，你们一定能找到更加符合你们大学传统的候选人。

衷心祝愿你们在工作中取得成功，我将永远感谢你们。”

关于我们受到的打击，我日前有一次对娜塔莎说起大司祭阿瓦库姆的传记。不安分的大司祭和他忠实的大司祭夫人一起在西伯利亚流浪，一次陷入大雪之中，疲惫不堪的可怜女人一次次跌入雪堆。阿瓦库姆叙述道：“我走了过去，可怜的人对我抱怨说：‘大司祭，这样的苦难还要很久吗？’我说：‘马尔科夫娜，要一直到死为止。’她叹着气回答说：‘好吧，彼得罗维奇，再慢慢走一阵吧。’”

我能够说的只有一点：娜塔莎从来没有“抱怨”过我，从来没有，现在，在最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抱怨，在这人们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时候……

1935 年 6 月 9 日

约翰·冯·赫耶诺尔特来到这里，带来了挪威工人党政府发出签证的消息。预定明天从这里动身，但是我不以为在两天之内能拿到从比利时过境的签证：轮船是从安特卫普启航的。可我们还是一面等待签证，一面收拾行装。显得异常匆忙……娜塔莎又要准备午饭，又要整理东西，又要帮助我收拾书籍和手稿，还要照顾我。至少，这使她稍稍摆脱谢廖沙的思念和对未来的考虑。除了种种事情之外，还要加上我们没有钱了：我花费太多的时间用于党的事务，最近两个月又病了，一直没有好好工作。到达挪威后我们会一文不名……但这毕竟是各种忧虑中最小的一件事。[……]

1935年6月20日

政府表示了一种愿望，要我们居住在离奥斯陆2小时路程的农村。报纸很容易就打听到了我们的避难地点。总的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不过看来一切都能顺利。保守党人自然“深感愤慨”，但表示得相对节制。小报采取中立态度。农民党——这个党对于政府的存亡在议会方面至关重要——并不反对发给签证。工人党报刊如果不是坚决地保护我，也是坚定地维护避难权。保守党人想向议会提出质问，但看到其他党派不表支持也就作罢。只有法西斯分子举行了抗议集会，口号是：“世界革命的首领想在奥斯陆干什么？”与此同时，斯大林分子第一千零一次宣布我是世界反革命势力的首领。[……]

1935年6月26日

还在生病……

这天夜里，准确点说已经是早晨了，我梦见同列宁谈话。从周围环境看，是在轮船上、在3等舱的甲板上。列宁躺在铺板上，我不是站着，就是坐在他身边。他关切地询问我的病情。“看来，您是精神劳累，积劳成疾，应该休息一下……”我回答说，疲劳以后我总能很快恢复，因为我天生精力充沛，但是这一次是更深刻的病理现象……“那就应当认真地（他强调了这个词）听取医生的意见（提了几个人的姓名）……”我回答说，已经多次找过医生，并开始叙述那次柏林之行，但是，看着列宁我想起他已经死了，不过我当即尽力驱走这个念头，把谈话进行到底。当我讲完1926年柏林看病的事，我想加一句：这已是您去世的以后的事了，但是我制止

了自己，说：这是您生病以后的事。

娜·正在整理我们的住所。不知是第几次了！这里没有衣橱，缺了许多东西。她自己钉钉子，拉绳子，挂衣服，改动位置，绳子常常断掉，她叹口气，又重头开始……这时她关心的是两条：清洁和美观。记得她1905年曾经无比投入地，甚至十分动情地向我描述了一名女刑事犯的事，说起她如何“懂得”清洁，怎样帮助娜塔莎整理牢房。我们共同生活33年以来换了许多次“环境”，无论是日内瓦的顶楼、维也纳和巴黎的工人住宅，还是克里姆林宫和阿尔汉格尔斯科耶庄园，或者是阿拉木图郊区的农舍、普林基波的别墅，以及法国更加简陋的郊外住所……娜·对环境从来不是毫不在乎的，但一切不取决于她。我在困难条件下很容易“降低身价”，也就是说，听任周围肮脏杂乱，而娜·则从不如此。她要把任何环境都提高到一定的清洁整齐的水平，而不允许水平下降。然而，这需要付出多少精力、智慧和生命力！……［……］

1935年7月13日

这些天里一直躺在院子里，看书报，向扬［弗连克尔］口授信函。报纸和信件开始直接寄到这里，数量也逐日增加。

近几天，我们的房主人有客人来，也是党的刊物和编辑，来认识一下。“挪威不可能有法西斯主义。”“我们是老民主派。”“我们人人有文化。”“此外，我们学会了许多东西：我们限制了我们的资本主义。”“而如果法西斯在法国、英国取得胜利了呢？”“我们会坚持住的。”“为什么当英国货币贬值时，你们不控制住自己的货币？”

什么也没有学到。实质上，这些人并不怀疑世界上有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而战争、十月革命、法西斯造成的动荡却对他们没有留下印象……未来却正为他们准备一桶冷水和当头棒喝。［……］

1935年9月29日

从我住进奥斯陆的医院起，已经10天了……差不多在20年以前，当我躺到马德里监狱的床上时，我十分惊讶地问自己：为什么我在这里？随之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直到入睡为止。而现在我有时仍然十分惊讶地问自己：我是怎样住到奥斯陆的医院来的？竟然是这样……

№03601

托洛茨基关于离开挪威情况的证词[①]

（1935 年）

我和妻子，经过 4 个月的拘留生活以后，乘“鲁夫号”油轮离开挪威。这次出行是挪威当局安排的。准备工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挪威政府，据我理解，担心这艘油轮会成为我的政敌袭击的牺牲品。航行持续了几乎 20 天。油轮没有装载任何东西，如果不算 2 千吨海水的话。天气对我们极为有利。从油轮船长和全体船员方面，我们受到的只有关心和善意。我的妻子和我在这里向他们所有人表示衷心的谢意。在途中我收到美国一些新闻社和报纸发来的无线电报，请求回答一些问题。可惜我未能满足这些请求，因为挪威政府认为自己有责任防止我的思想影响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剥夺了我使用油轮电台的权利。我甚至都不能就旅行本身的纯粹事务性问题同美国朋友保持联系。为了进行监督，有一名高级警官陪同我们航行。我们走的时候满怀对于挪威人民的真诚好感和尊敬。至于所谓社会党的挪威政府，那么对它的行动的惟一解释是来自外界的外交压力和商业压力。这个事实是否真有根据，我在这里就不讲了。我希望就这个问题很快可以作出必要的详细说明。对我进行的拘留的正式理由，是我在挪威境外的写作活动，例如特别是我在纽约《民族》周刊上发表的关于法国事务的文章。无论多么难以置信，但事实如此！至于我的妻子，那么拘留她根本就不作解释。

① 这是为调查莫斯科审判案提出的指控而成立的委员会写的证词。

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又根据少有的特别法剥夺了我控告诽谤者的权利，甚至根本不允许我采取步骤批驳令人发指的指控。幸好，我住在巴黎的儿子列夫·谢多夫及时出版了《关于莫斯科审判的红皮书》。在该书第125页上罗列了一批揭露莫斯科捏造行为的无可批驳的材料。

对于墨西哥政府愿意向我们提供避难权一事，我们十分感激。特别是与挪威政府的闻所未闻的行动方式使我们难于获得任何一国的签证的做法相比较。墨西哥政府无需怀疑，我无论如何绝不会破坏向我提出的，而且同我本人的意图完全一致的条件：完全而绝对地不干预墨西哥的政策，而且绝对不采取任何能够破坏墨西哥与别国关系的行动。至于说到我在世界各国报刊上的写作活动，那么始终有我的签名和由我承担责任，而且至今为止它在任何地方也从来没有引起过合法的追究。但愿今后也不会发生这种事。

在航行的20天中，我整理了我作为那批挪威法西斯分子夜间袭击我的档案库（1936年8月5日）的目击证人对挪威法庭所作的4小时的证词。我的证词不仅涉及那次袭击本身，不仅涉及我的政治活动和我被拘留的原因和条件，而且涉及莫斯科对16人（季诺维也夫等）的审判和对我本人提出的诬告我和盖世太保勾结在一起策划恐怖行动的令人发指的指控。作为对我在法庭宣誓下提供的上述证词的补充，我又增加了广泛的说明，描述了最近莫斯科审判的准备，主要被告人的个人状况、获取自愿承认的方法等等。这本小书[①] 很快将用各种语言出版，希望它能帮助广大读者认识到，到底应当到哪里去寻找罪犯，是在被告席上，还是在原告席上。我一再全力强调各国无可指责的杰出政治活动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提出的成立国际调查委员会以审查苏联最近几次审判案的所有案卷和

① 指托洛茨基的《斯大林的罪行》一书。

资料。我将乐意把自己的大量档案材料提供给这个委员会使用。

至于我今后的计划，现在我能说的不多。我想就近了解墨西哥和整个拉丁美洲，因为我在这方面的认识特别不够。我打算恢复自己在20多年以前中断的对西班牙语的学习。写作工作中处于第一位的是完成列宁的传记：生病和拘留使这项工作停顿了1年半时间。我希望年内能将它结束。

我离开了欧洲，离开了这个正在被可怕的各种矛盾撕裂开来又因预感到新战争即将到来而受到震撼的欧洲。这种普遍存在的惊恐不安促使涉及各方面的，其中也包括涉及我本人的大量令人惊慌失措和荒诞不经的谣言到处流传。我的敌人则巧妙地利用这种普遍的惊慌气氛来反对我。他们无疑也将在新大陆故伎重演。在这方面我不抱任何幻想。我的防卫手段仍然是，我愿意随时向社会舆论公布我的观点、计划和行动。我坚定不移地寄希望于新大陆新闻界优秀人物的不偏不倚和客观公正。

№03603

托洛茨基1937年日记（摘录）

（1937年1月7日）

不管纯粹的唯心主义信徒说些什么，道德毕竟是社会利益的反映，因而也就是政治的反映。布尔什维主义可能曾经对待敌人残酷无情，但它始终客观地说明事物的实情。人人都知道，布尔什维克想要干什么。我们没有必要向群众隐瞒什么。正是在这个中心点上，目前在苏联进行统治的派别与布尔什维主义的道德是水火不相容的。斯大林及其同事不仅不敢大声说出他们想些什么，他们甚至不敢把他们所做的事想到底。官僚不得不把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福利说成是人民的政权和福利。统治派别的全部思想都浸透了伪善。为了掩饰每走一步都要显露出来的言论和行动之间、政纲和实际做法之间、现今和过去之间的种种矛盾，官僚建立起一个巨大的伪造事实的工厂。由于感觉到自己在道德上的地位摇摇欲坠，又十分害怕群众，官僚对于试图把批评的光荣聚焦到他们的特权制度上的任何人都恨之入骨。斯大林寡头统治集团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和诽谤当作自卫的最重要手段。由于长期以来动用了无所不包的诽谤手段（遍及一切政治主张、公务职能、家庭关系和私人交往），迫使人们不得不走上自杀、精神失常、意志沮丧、背叛原则的道路。在实施诽谤和迫害方面，联共、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共产国际配合默契。这个系统的中心便是斯大林办公室。莫斯科审判就是从这里开始精心策划的。

一名多年涉足共产国际事务的挪威老社会党人士Ш. 曾向我

说起，当他在莫斯科驻留期间（也许是在克里木），共产国际报刊掀起了一场对他进行人身攻击的宣传运动。对于这一事件的政治动因，他只能猜测。Ш. 说："我的最初反应是纯粹生理上的：突然呕吐发作，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同共产国际宣告决裂。"这个挪威人回挪威了。但受贬黜的苏联公民则无处可去。从法西斯国家逃出的大量侨民处于此种境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把他们看做自己要弄各种阴谋的原料。

在西方，对最近13年来苏联究竟有多少反对整个左翼反对派，特别是具体及对本文作者的书籍文章，人们并没有哪怕近似的概念。数以万计的报刊文章印了几千万份，难以计数的攻击性演说都有速记记录稿流传，普及性小册子印数高达几百万册，大部头的书籍日复一日地散布着由数以千计的丧失良知、缺乏主见和毫无想象力的雇佣文人炮制出来的最卑劣无耻的谎言。当我们被拘留期间，我们偶尔几次收听到莫斯科的广播演说（经过几番犹豫和拖延，社会党政府宽宏大量地允许我们在我们受拘留的住所拥有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其中说：托洛茨基想推翻西班牙和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并消灭苏联的领袖们，以便保证希特勒在未来的反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演说者"单调平淡而又令人厌恶的声音在几分钟内毒化了我们房间的气氛。我看了看妻子：她脸上是无比的厌恶；不是"憎恨"，不是，而是厌恶。我转了一下旋钮，扼住了演说者的喉咙。在桑德卑，可以允许自己这样潇洒自在。而在苏联呢？共产国际的外国报刊是按照莫斯科《真理报》的意旨定调的，而且，如果力量允许，还要力求超过它。在1935年1月就基洛夫案件进行第一次审判时，在起诉书中不经意地提到（没有结论性的话），某领事曾向尼古拉耶夫[①] 要过一封致托洛茨基的信。此

① 刺杀基洛夫的凶手。

后斯大林在西方的主要机关刊物《人道报》就宣称："托洛茨基的双手沾满了基洛夫的鲜血。"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杜克洛，现今是众议院副主席，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文字间谍。《真理报》在那些日子里还是相当小心谨慎的：关于拉脱维亚领事的话题曾经烫伤过手指……在挪威的纳粹分子袭击了我的住所以后，还是这家《人道报》以奥斯陆电的形式报道说，挪威政府开始对我进行侦查，因为查明我同夜间对我进行访问的法西斯分子有联系。我只是顺手举出一些例子，看来还不是最鲜明的例子。肮脏不堪的谎言浊浪一直持续了12年以上，直到转而采取莫斯科司法审判的形式，而这又是败坏我们星球声誉的所有审判中最为背信弃义、最为卑劣无耻的一次审判。

法国的"人权联盟"决定就莫斯科审判发表权威性的评论。它成立了一个几乎全部由资产阶级的"苏联之友"组成的委员会。委员会委托律师罗森马尔克提出报告。我不知道这方面他有哪些材料。有人写信告诉我，这是一位民事方面的名律师。他的报告是丹尼斯·诺维尔·普里特报告的第三版。人权联盟匆忙地把罗森马尔克（这个法律上极端愚蠢和政治弄虚作假的高度典型！）的报告作为自己的正式版本刊印了出来。啊！当然，只是作为报告人的个人意见，但是却对他奉上了大量的恭维话。调查刚刚才要开始，至于如何进行、限于何种范围和用何种速度进行，都不得而知。而只是为了表示对苏联"友好"，就出笼了这样一份可耻的文件。罗森马尔克直截了当地写道，若在任何别的国家，托洛茨基必定被缺席判处死刑了，而莫斯科法庭"仅仅"决定一旦托洛茨基在苏联领土上出现即将其逮捕而已……这个资产阶级商人认为，这样一来我与盖世太保勾结进行的"恐怖"活动的罪行就算得到了证实。感到奇怪吗？如果查阅一下1917年和下一年的法国出版物，那就不难知道，所有这些罗森马尔克当时就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德国总参谋部

的间谍。由此可见，法国的民主主义爱国者继续保持了自己的传统；只是1917年他们同沙皇外交官，同米留可夫和克伦斯基一起反对我们，而现在则是作为斯大林、雅戈达和维辛斯基的正式“朋友”反对我们……

“人权联盟”当然（从右面）向人民阵线及其政府靠拢。在这方面不妨提醒一下，当达拉第政府于1933年向我提供避难权时，共产国际的全部报刊，当时就是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报刊，大声疾呼道，我去法国是为了帮助达拉第和布鲁姆最终实现对苏维埃国家的军事干涉。认为莱昂·布鲁姆是对苏维埃国家实施军事进攻的积极组织者之一的看法，当时被认为是完全得到证实的：莱昂·布鲁姆当时既不是盟友，也不是朋友，更不是“亲爱的同志”（见《人道报》），而不过就是一个社会法西斯主义者。但是，时代在变化，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借口也随之在改变。

国家政治保卫局漫不经心地安排审判，显然是对于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至少忽视了我和我的儿子有可能来得及对莫斯科闹剧中涉及我们在国外的生活和活动的那一部分给予他们以毁灭性的打击。还在审判进行之时，我就通过挪威电报局批驳了两名重要证人即戈尔茨曼和奥利贝尔格的证词。这以后工作一天也没有停止。在即将离开挪威之前我得到来自巴黎的消息说，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在部长的档案中找到了我妻子给当时的部长埃里奥的电报和埃里奥给法国驻柏林领事的电报——指示给我们的儿子进入法国的签证，以便在我们于1932年12月从丹麦回来时同我们会面。这两份电报加上儿子护照上的签证——即使没有有几十名证人的证词，也能完全、彻底和充分地驳斥戈尔茨曼关于我儿子在哥本哈根“布里斯托尔”旅馆（自1917年起已不存在）遇到他并带他同我见面的证词。

戈尔茨曼的例子特别鲜明有力而且无可批驳地表明，被告们为了满足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需要而撒谎到自己头上，目的只是为了把

我牵扯到案子中去。既然戈尔茨曼的证词如此这般，那么凭什么说其他被告的证词就一定会好些呢？

它们确实并不好一些。奥利贝尔格的供词由于本身前后矛盾引起一片哗然，此外又被准确无误的文件和无懈可击的证词批驳得体无完肤。几十名证人坚持不懈地为我在哥本哈根停留一周的情况进行了辩护，宣誓证明当时访问我的人中（访问者的名单已准确认定）既没有别尔曼，也没有弗里茨·达维德。对共产国际这两名间谍的证词进行粗浅的分析便可以发现，不幸的是，他们虽然十分小心谨慎，但确是在撒谎。几十种经过确认的和有文件为据的次要情况也补充说明，对于审判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整个“哥本哈根”那一章根本不能成立。姆拉奇科夫斯基和德雷采尔的证词（关于化学信件的事）一碰到“技术”评析就站不住脚了，而且与其他被告的供词直接矛盾。斯米尔诺夫的“供词”，尽管在正式的报告中已被卑鄙地加以删减和以伪造的手法作了“概括”，还是提供了这位诚实真挚的老革命家同自己本人，以及同所有的宗教裁判官的悲壮斗争的相当鲜明的情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供认初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毛病，但根本没有什么实际内容，这是一些鼓动性的演说和外交照会，但不是生动真实的认证文件。而恰恰又正是这一点使它们露出了破绽。而且还不只是这一点。只要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936年8月的供词和他们自己1935年1月的供词，以及他们以前的（自1927年12月起的）所有供词和检讨相比较，就不难发现他们在9年长的时间内屈膝投降、自我作践和消沉沮丧的绝无仅有的那种几何级数似的变化轨迹。如果用这个悲剧性变化的数学系数加以分析，那么16人审判案中的供词就会在我们面前呈现为某一个长链中在数学上必不可少的最终的一个环节……

对于诉状中事实方面的整个分析和批判工作已经进行，一部分已经公诸于众（列·谢多夫、B. 谢尔日的若干小册子，一批文章

等)。所有这些材料用来要求组织反审判已经绰绰有余了。一个有权威的，公正无私的，能够在完全独立条件下开展活动的调查委员会，即使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共产国际进行抵抗，也能够对莫斯科审判的所有组成部分，也即斯大林捏造阴谋的每一部分，作出正确的判断和评价。我们一定能够促成这样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成立。就是现在世界各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其中包括一些其声誉无可指责的著名活动家，在为这一项任务而工作着。在这个未来的委员会面前，我们不会空手面对。我们绝对不想低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力量。对于莫斯科的“领袖”来说，这是一笔价值过大的赌注，因此他们将不惜动用最为致命的手段（抢走我在巴黎的档案材料只不过是锋芒小试），来妨碍我们揭露真相。他们还会从肉体上妨碍我们中的某一些人把这项工作进行到底。在这方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技术则是处于邪恶力量的高峰。但是，即使采用从肉体上消灭幸存于世的“被告”的办法，也仍然无助于莫斯科的博尔贾家族。问题已经公开提到世界论坛面前。增加一、二宗暗杀事件只会使工人组织的社会舆论和所有正直人们的良知受到更加深重的震撼。调查离开一些人手，又会有别的人用手接住。对斯大林及其一伙的审判一定会进行到底！

我不想用这几页旅途日记来取代调查，我只是想为调查提出一个政治上和心理上的引论。所有我写在这几页上的仓促的，也许过于仓促的文字，都是与我的整个一生，与我每天的思想和感情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我自己都难以判断，其中某一种看法对于读者有多少说服力。至少，我是在努力为他们提供一些进行独立分析的哪怕只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线索。

№03602

关于列夫·谢多夫之死

（1938年2月18日）

伤痛还记忆犹新，以致我仍然难以当作死者来谈论列夫·谢多夫，而他不仅是我的儿子，而且还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必须当即对之作出反应：这就是他的死因问题。我应当从一开始就说明，我手头并没有任何足以认定列·谢多夫之死是出自国家政治保卫局之手的直接材料。在我妻子和我所收到的巴黎友人发来的电报中，没有丝毫超出各个通讯社报道的内容。但是，我愿意提供某些间接的情况，这些情况对于巴黎的司法侦查却可能具有重要意义。

（1）说儿子似乎患有慢性肠胃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关于他有这类疾病的消息对于母亲和我都是完全出乎意外的。

（2）说他最近几周内似乎得了重病的说法是不确实的。我手头有我收到的他2月4日写的最后一封信。在这封充满乐观情绪的信中，一句话也没有谈到生病。相反，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列·谢多夫这些天来非常活跃（特别是由于杀害赖斯的凶手即将在瑞士受审），而且准备继续下去。

（3）看来列·谢多夫的死亡是在15日至16日的夜间发生的。这就是说，从发信到死去仅仅有11天时间。换句话说，生病完全是突然的事。

（4）对于法医技术鉴定的公正无私，不论其结论如何，自然没有根据加以怀疑。不过，尽管我不是专家，但我还是可以指出一个

情况：如果有被毒死的可能，那么涉及的就不是普通的下毒者。国家政治保卫局拥有极其少有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以致使法医技术鉴定的任务变得无比困难。

（5）国家政治保卫局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接近我儿子的呢？在这一点上我也只能够用假设来回答。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几次发生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间谍与莫斯科决裂的事。所有立意决裂的人员自然会设法与儿子取得联系，而由于在他的活动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勇敢无畏，他会坦然地前去会见。此类决裂难道不会有什么圈套？我只能提出这样的设想。是否如此则有待查实。

（6）法共报刊一直对列夫·谢多夫极表关注，自然，是敌意的关注。然而，关于他的死讯却没有一家法共的报纸登过一行消息（参见巴黎的电讯）。在伊格纳季·赖斯在洛桑被暗杀以后也完全如此。这类“审慎的态度”特别令人感到意味深长，如果考虑到在莫斯科感到尖锐的问题上法国的共产国际报刊是通过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老间谍雅克·杜克洛等人接受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直接指示的话。我什么也没有认定。我只是说明事实和提出问题而已。

列·托洛茨基

1938 年 2 月 18 日午夜 1 时

于考约阿康

№03605

托洛茨基遗嘱

（1940年2月27日）

血压高（而且不断升高）欺骗了周围的人，使他们不了解我真实的身体状况。我积极活跃，能工作，但看来离收场也不远了。这几行文字将在我死后发表。

我在此没有必要再次驳斥斯大林和他的代理机构对我进行的愚蠢而卑劣的诽谤：在我的革命荣誉中没有一丝污点。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我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过任何幕后的勾结，而且也没有同他们哪怕进行过任何谈判。斯大林的数以千计的对手成为此类虚妄指责的牺牲品而死去。新的一代代的革命者必将恢复他们的革命荣誉，也将给克里姆林宫的刽子手们以应得的惩罚。

我热切地感谢那些在我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依然对我忠实不贰的朋友们。我不一个个提他们的姓名，因为我不可能提及所有的人。

不过，我认为我有权把我的女友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谢多娃作为例外。除了享有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战士的幸福之外，命运还使我有幸成为她的丈夫。在我们差不多40年的共同生活中，她一直是爱情、宽容和温馨的永不枯竭的泉源。她承受了巨大的苦难，特别是在我们生活的最后时期。但是我感到欣慰的是，她也有过幸福的日子。

在我43年的自觉生命中，我是一个革命者，其中有42年是在

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斗争的。如果我能够重新开始，我自然要力求避免某些错误，但是我生活的总的方向是不会改变的。我将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名不妥协的无神论者死去。我对于人类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现在与年轻时同样炽烈，而且更加坚定。

娜塔莎现在从院子里走到窗前，把窗子开得大一些，好让空气能更顺畅地流入我的房间。我看到了墙边绿油油的一片草地，墙上方蔚蓝的纯净天空，洒向各处的阳光。生活真是美好。但愿未来的一代代人扫除生活中的邪恶、压迫、暴力，能够充分地享受生活。

列·托洛茨基

1940 年 2 月 27 日于考约阿康

我死后遗留下的全部财产，我的全部写作版权（从我的书、文章等获得的收入）均应归我的妻子娜塔利娅·伊万诺夫娜·谢多娃所有。

列·托洛茨基

1940 年 2 月 27 日

一旦我们两人都死去……

1940 年 3 月 3 日

我的病（血压高而且不断增高）属于这样一种性质，据我的所知——结局应是突然来到的，而且最大的可能——还是根据我自己的猜想——会是脑溢血发作。这是我所能希望的最好结局。不过，

也可能我搞错了（我没有兴趣去看这类专业书籍，而医生自然不会讲真话）。如果硬变拖延下去致使我有可能长期丧失自理能力（现在相反，由于血压高我感到精力充沛，但这不可能持久），那么我保留拥有自己决定死亡时间的权利。“自杀”（如果这一个词在这里适用的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灰心丧气和陷入绝望的表现。我和娜塔莎不止一次说过，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身体状况，到那时候还不如自己缩短自己的生命，更准确地说，不如自己缩短过于缓慢的死亡过程……

然而，不管我的死亡属于何种情况，我将怀着对共产主义未来的坚强信念死去。这种对人类和人类未来的信念现在就赋予我一种强大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都无法给予的。

列·托洛

№03604

托洛茨基致墨西哥总统的信

（不早于 1940 年 5 月 24 日）

总统先生！

1936 年末，当不仅我的生命，而且还有我的政治荣誉面临极端危险之际，我从遥远的挪威向您求助，而您果然对我表现了宽容大度和殷勤好客。如今，又逢墨西哥警察当局对待我的工作人员和我采取了明显错误和明显不公正的态度的紧急时刻，我不得不再一次向您直接投诉。我的房屋遭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匪徒的袭击。努涅斯将军以您的名义向我宣布，警察机关将尽一切可能查清罪行。我自然对于您领导下的当局不能有别的任何企望。但是，我不得不惋惜地认定，最近 3 天以来警察机关对于案件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转变。袭击者动用了庞大的暗杀机器竟然未能致我于死地，却间接地诿过于我。匪徒约有 20 人，夜间袭击了我的住房，捆绑了警察，打破了我办公室的门，向屋里和院子里投掷燃烧弹，炸伤了我的孙子，而且看起来劫走了我的一名警卫人员。罪行是否查清？我不得而知。但是，我的两名身边的工作人员，原先和我一起是袭击的受害者，却由于……——我事先说明——显然错误的怀疑而被逮捕。奥托·舒斯勒在长达 11 年的时间里一直伴随着我到处漂泊。查理·科罗内尔住在我家近一年了。如果警察当局在逮捕他们以前问我一下，我无疑会打消他们的错误怀疑，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无可指摘的老实人，无条件地忠于墨西哥，对我本人也忠实可靠，而且信守自己的原则。但是，却从来没有任何人询问过我有关导致逮捕他们

的情况，而我自然是比任何别人都更加熟悉这些情况的。

客观上近几天来什么都没有变化：我房子仍然满布遭到毁坏的痕迹，我的孙子们天天出去换药。当然，我全力协助当局查清案件的意愿也没有变化。但是，侦查部门对待我的房子的住户的态度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袭击的受害者越来越变成了被告。

总统先生，这种行动方式并不新鲜。当 1936 年挪威的法西斯匪徒袭击我的住所，意在抢走我的档案材料，如果有可能也要将我本人劫持走时，挪威当局也是从逮捕罪犯开始，但后来就走上了阻力最小的路线：宣布法西斯分子的袭击是“一场闹剧”，并且逮捕了我和我妻子。几个月之前，这场“闹剧”的认定者却帮助希特勒占领了挪威。

侦查者走了误区。我不怕作出这样的声明，因为每一个新的一天将一再驳斥关于自我谋害的可耻假设，并将使这种假设的辩护者名誉扫地。

总统先生！我除了向您坦诚公开地说出真相以外，无法更好地表达自己对您本人的深切敬意。我愿意，只要您一有要求，就提供一切必要的说明。

［1940 年 5 月 24 日以后］

№03607

关于托洛茨基死亡的报道

（1940 年 8 月 24 日）

托洛茨基去世

塔斯社伦敦 8 月 22 日电。伦敦电台今天报道：

托洛茨基因遭其亲信之一的暗杀，颅骨破裂而在墨西哥医院去世。

《真理报》，1940 年 8 月 24 日

国际间谍之死

电讯传来托洛茨基死亡的消息。据美国报纸报道，近年来侨居墨西哥的托洛茨基遭人暗杀。刺客为雅克·莫尔丹·汪顿德拉伊什，是托洛茨基的亲信和追随者之一。

离开人世进入坟墓的这个人，全世界的劳动者都以鄙视和诅咒的口吻说起他的名字，许多年来此人一直反对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布尔什维克党的事业。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失去了自己的一个忠实奴仆。外国情报机关损失了一个长期为其效劳的干练的间谍、暗杀行为的组织者，他为了达到自己的反革命目的从不惜采用任何手段。

托洛茨基走过了一条从事背叛和出卖、政治上的两面派和伪装

的漫长道路。无怪乎还在1911年列宁就给他起了“犹杜什卡”的外号。而这个恰如其分的外号就此永远留给了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是作为孟什维克－反革命分子开始自己的政治活动的。还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他就疯狂地反对列宁，维护和支持马尔托夫和其他反革命孟什维克首领的观点。不久，在日俄战争开始前，托洛茨基就更加原形毕露地显示出其变节者和反革命分子的嘴脸。他滑到极端恶劣的护国主义的立场上去，即捍卫沙皇、地主和资本家的“祖国”。

托洛茨基用臭名远扬的“不断”革命论迎接1905年革命的到来。这是使无产阶级解除武装、涣散无产阶级力量的理论。1905年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支持孟什维克取消派。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关于托洛茨基写过这样的话：

“托洛茨基的行为表明他是一个最卑鄙的野心家和派别活动者……嘴上滔滔不绝地谈党，而行动却比所有其他派别活动者还坏。”①

众所周知，托洛茨基是所有反列宁派别和集团联合起来的反革命孟什维克八月联盟的组织者。

托洛茨基，如同所预料的那样，是站在街垒的另一边，即站在支持帝国主义屠杀的阵营中迎接1914年8月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他用关于同战争作斗争的“左的”词句，用旨在欺骗工人阶级的词句掩盖自己出卖无产阶级的行为。在有关战争和社会主义的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上，托洛茨基都反对列宁，反对布尔什维克党。

资产阶级二月民主革命以后，布尔什维克对工人阶级和士兵群众的影响日益增长，列宁的口号在人民群众中广受欢迎。但孟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却作出不同的评价。他于1917年7月和自己的一

① 《列宁全集》第45卷，第241页。

批志同道合者加入了我们党，声称他彻底“解除了武装”。

但是，后来的事件表明，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并没有解除武装，一分钟也没有停止反对列宁的斗争，而参加我们党则是为了从内部破坏党。

就在伟大十月革命发生的几个月之后，1918 年春天，托洛茨基和一批所谓“左派”共产主义者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一起策划了反对列宁的卑劣阴谋，妄图逮捕和从肉体上消灭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如同任何时候一样，托洛茨基这个奸细、凶杀的策划者、阴谋家和冒险家自己却躲在阴暗处。他在这一场幸好未能得逞的罪恶行动的策划中所起的领导作用，直到 20 年后，在 1938 年 3 月“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审判案中才被完全揭露出来。直到 20 年后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所犯肮脏罪行的全部细节才得到完全理清。

在苏维埃国家抗击数量众多的白卫军和干涉者强盗的国内战争年代，托洛茨基以他的背叛行动和破坏性的命令千方百计地削弱红军抵抗的力量，为此列宁曾禁止他前去东方战线和南方战线。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托洛茨基出于对老布尔什维克干部的仇恨，妄图枪决一系列对他无益的负责的前线共产党员，以便由此策应敌人。

在上述的那次对于“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的审判过程中，在全世界面前揭露出了托洛茨基所走过的全部背叛和出卖的道路：这次审判中的被告们，也即托洛茨基最亲近的同谋们供认，他们以及和他们一起的头子托洛茨基早在 1921 年就成了外国情报机关的奸细，成了国际间谍。他们在托洛茨基率领下卖力地为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情报机关和总参谋部效劳。

当 1929 年苏维埃政府把反革命分子、叛徒托洛茨基驱逐出我们祖国国境之时，英美的资本主义集团把他迎入自己的怀抱。这不是偶然的。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托洛茨基老早以前就已经转而

为工人阶级的剥削者效劳了。

托洛茨基陷入自己织成的罗网无法自拔而堕落到人格极端蜕化。正是他的拥护者们杀死了他。结果他的正是那些由他教会进行暗杀、从事反对工人阶级和苏维埃国家的背叛活动和罪恶勾当的那些恐怖分子。曾经策划过凶狠地暗杀基洛夫、古比雪夫、马·高尔基的托洛茨基，他本人成了他自己炮制的阴谋、背叛、出卖和罪恶活动的牺牲品。

这个卑鄙的人就这样不体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额头上刻着国际间谍和杀人犯的印记走进了坟墓。

《真理报》，1940年8月24日

为工人阶级的剥削者效劳了。

托洛茨基陷入自己织成的罗网无法自拔而堕落到人格极端蜕化。正是他的拥护者们杀死了他。结果他的正是那些由他教会进行暗杀、从事反对工人阶级和苏维埃国家的背叛活动和罪恶勾当的那些恐怖分子。曾经策划过凶狠地暗杀基洛夫、古比雪夫、马·高尔基的托洛茨基，他本人成了他自己炮制的阴谋、背叛、出卖和罪恶活动的牺牲品。

这个卑鄙的人就这样不体面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额头上刻着国际间谍和杀人犯的印记走进了坟墓。

《真理报》，1940年8月24日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